论兵新语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与实践

军事科学院　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论兵新孙吴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与实践

军事科学院　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2 号

论兵新孙吴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与实践

军事科学院　编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海淀军科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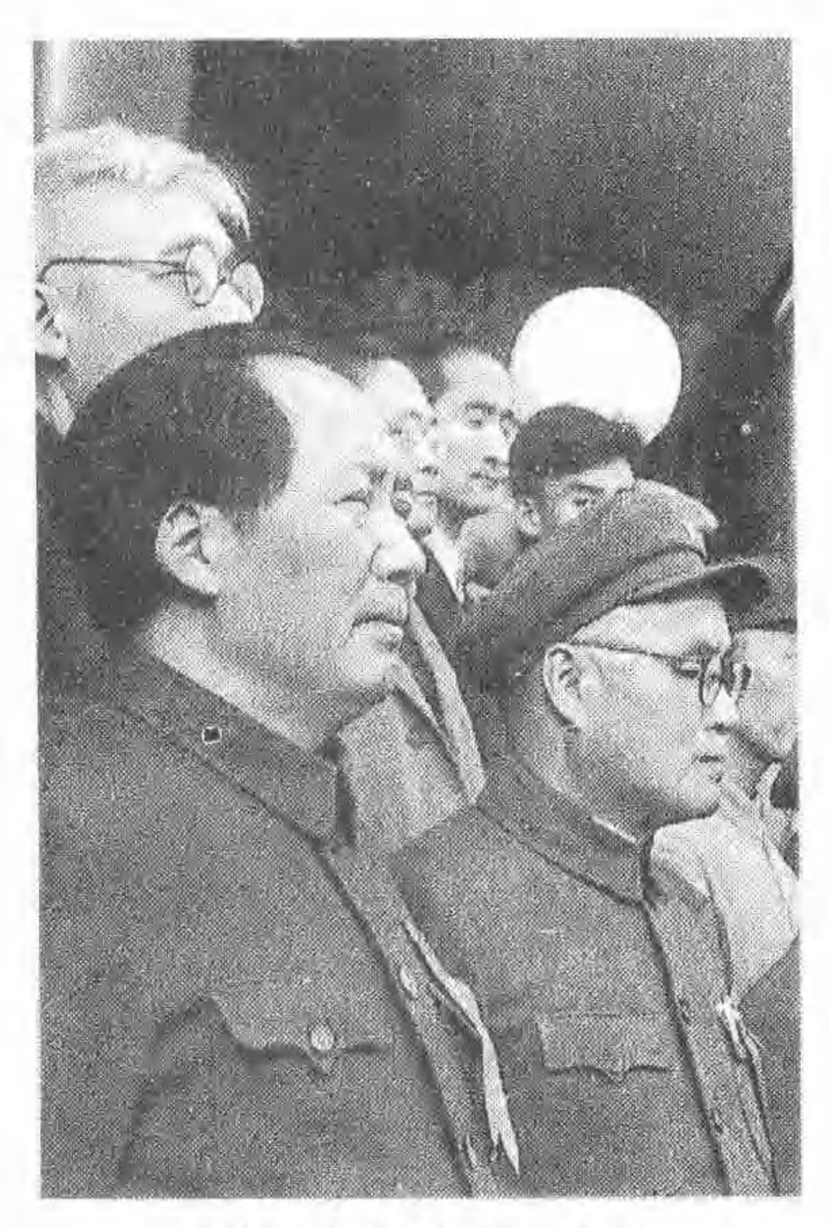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125 印张　4 插页　657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一版　199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021—606—3/E·485(平)
ISBN7—80021—607—1/E·486(精)
定价:16.50 元(平)　　21.00 元(精)



刘伯承元帅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长与“刘伯承诞辰 100 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代表合影



毛泽东与刘伯承在天安门城楼上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战争年代

继承刘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遗产把我军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江泽民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廿四日

用兵典範
治軍楷模

劉華清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論兵新孫吳

功業四山秋

張震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前　言

刘伯承元帅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我军的缔造者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戎马一生，不但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而且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艺术在国内外屈指可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贡献。为继承他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刘帅诞辰 100 周年之际，由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于 1992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刘伯承军事理论研讨会。

这次会议，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为会议题了词；江泽民、薄一波、张震、秦基伟、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王平、肖克、陈锡联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张震、薄一波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总部领导机关、全军各大单位和原第二野战军的老首长、老部队对会议给予了极大关心和支持，为会议提供了学习刘帅军事理论和用以指导实践的文章。入选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共 70 篇，其内容基本上覆盖了刘帅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各个主要方面，且多出自我军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之手。会议论文具有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充分展示了研

究刘帅军事理论和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为集中反映这次研讨会的研究成果和扩大学术交流，特将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题词和在研讨会上的讲话，会议开幕词、闭幕词（会议小结），入选的论文及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编纂成书。

刘伯承元帅的军事理论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斗争实践，既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之精华，又约之马克思主义军事原理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陈毅元帅曾以“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诗句来赞誉刘帅军事理论的恢弘精深和具有的古名将风。因而本书就以《论兵新孙吴——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作为书名。

全书各篇篇目按论文内容排列。为了压缩篇幅，在编辑过程中对论文原稿有所删节，旨在集录精粹，着重反映论文作者的基本观点。本书由军事科学院郭善仪同志任主编，唐行民、魏德松、胡文龙、于延民、耿成宽、王辉青同志分别承担了各分篇的编辑工作，胡文龙、王辉青同志参与了全书的统稿工作。国防大学王培昆、崔淑霞同志在会议筹备阶段，对组织和审定院校系统的论文稿件曾付出辛勤的劳动。全书由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张晶副部长审定。

编　　者

一九九三年元月

目　　录

战略战术篇

军事辩证法篇

军事谋略篇

指挥艺术篇

武装力量建设篇

军事教育训练篇

院校建设篇

司令部工作篇

借鉴外军经验篇

古代兵法运用篇

古名将风篇

综　述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在纪念刘伯承元帅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科学学会联合举办刘伯承军事理论研讨会，很有意义。我受江主席委托，代表中央军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刘帅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拯民于水火”，投身辛亥革命，并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党的领导下，他发动了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又参与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中，他作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与邓小平同志一起率部转战华北敌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是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十万大军按照党中央战略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序幕。在上党、平汉、淮海、渡江、解放西南等一系列重要战役中，他屡建奇功，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新中国建立后，他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全局出发，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建议创办我军高等学府——南京军事学院。这是我军第一所各军兵种的综合学院。他命令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第一期学习。他本着治军先治校的方针，亲自培训师资、审阅教材，为造就我军高级指挥人才，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刘帅一生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党性坚强，为

了党的整体利益，总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重担，排除万难去完成任务。他勤奋好学，二十岁才学俄文，在中央苏区战争频繁时期，翻译了《劳农赤军野战条令》，传播苏联红军经验。他功勋卓著，却从不以功臣自居，一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严守纪律。他的高尚品德与情操，在党内外深孚众望，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刘帅不仅身经百战，而且是我党我军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通晓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成功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闻名于世。这一点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的许多指挥原则和谋略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他的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我军现代化建设和作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志们，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标。对军队来说，就是要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按照江主席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使我军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当前，军队建设正处在一个高新科技发展时代。许多新式装备用在作战中，使作战样式、组织指挥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需要我们研究对策。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老一辈军事家总结的我军建军和作战经验，借鉴外军军事理

论和作战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武装力量建设和人民战争的规律。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军新时期建军实践的科学总结，对我军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全军同志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运用于军队建设的实际。军事科研工作要解放思想，面向部队，服务于我军建设，以刘帅为榜样，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对策性研究，更好地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作战服务。要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不断提高军事科学研究水平。我衷心地希望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同志们，刻苦学习，潜心钻研，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最后，预祝刘伯承军事理论研讨会圆满成功！

薄一波同志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主席、同志们：

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本来没有准备讲话，临时接到通知要我即席讲几句。我想了一下，关于军事理论方面的东西，在座各位同志会详细讲，而且会讲得更好。我就讲几句有关军事政治工作方面的话吧！把我1989年4月13日回忆刘帅标题《师长与战友》一文中的一段话念一下，权充“即席发言”：

伯承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他常讲，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如果不服从党的领导，就会滑到军阀主义道路上去。记得他在一次报告中，曾经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作过这样的阐述：战争胜负的因素，不完全是军事装备和技术，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政治力量与技术力量的结合程度。军阀们的武器很好，有的军事技术也很高，但他们还是被我们打垮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我们这样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力量。我们原来是个什么家底呢？129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靠一支拐子枪起家的。120师是从湘鄂西拉出来的，是两把菜刀起家的。115师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发展起来的。拐子枪、菜刀战胜了机关枪、迫击炮，还不就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如果没有政治优势，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就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就会一事无成。这些话虽然是几十年前说的，今天仍觉言之谆谆，意义犹深。

伯承同志对政委，对所有政治工作人员，都是很尊重的。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各纵队的司令员都要尊重自己的政委，尊重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他和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工作中始终是互

相切磋，互相支持，配合得十分默契。每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在最后下决心以前，伯承同志都要请小平同志发表意见，并且常常在会议结束时宣布：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小平同志对伯承同志也是非常尊重和关怀的。他们的团结合作和真挚友情，在党内、军内一直传为佳话。1942 年 12 月，在伯承同志 50 寿辰时，小平同志在祝词中曾这样说过："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小平同志的这番话，记得当年听到时，就曾感思殊深；如今重温，更觉历久弥新。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都能按照"这样的精神"去做，不好自以为是，而尚虚怀若谷，不为个人的利益、声名所累，而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彼此忠诚的合作共事，同心协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那我们的工作就能确保立于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我们的事业就会不断地走向成功之域。

这里，我还想插述一段周恩来同志和我的谈话。那是在 1950 年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一天在闲聊中，恩来同志若有所思地问我：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我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协有致。他摇摇头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我未假思索地反问道：总理，你是老领导了，又与他们相识甚早，你看呢？他爽然一笑：好啊！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我也笑了：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们这叫"解问还需提问人"嘛！恩来同志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

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我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接着，恩来同志又问我：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未等我作答，他就讲开了自己的看法：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后来，我不时忆起恩来同志这次和我的谈话。我常想，一个领导干部要同时兼具这两种工作方法，的确很不容易。但是从党的工作、一个领导班子的工作来说，却是必须同时具有，缺一不可的。在进行战略决策和解决重大问题时，必须有“举重若轻”的方法和气势，方能增强信心，当机立断，否则就可能迁延不决，贻误时机；而在决策以后，确定具体战术和具体措施时，则必须处处注意“举轻若重”，方能周密细致，扎实稳妥，否则，就可能出现疏漏，招致失误。能否善于掌握和运用这两种工作方法，是衡量我们工作中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在
“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
上的开幕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今年12月4日，是刘伯承元帅诞辰100周年。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由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共同主办的“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现在开幕！首先，让我代表主办单位，向亲临今天会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军委首长，总部及驻京大单位的领导同志，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向应邀到会的刘帅夫人汪荣华同志和刘帅生前的老战友，向刘帅曾经直接领导过的部队的代表，以及来自军队和地方的论文作者，向与会的新闻工作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刘伯承元帅是我们党老一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外驰名的伟大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和人民，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统率大军，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他一生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胸怀坦荡，严于律己，自奉俭薄，廉洁奉公，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刘帅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以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形成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独特的作战风格。建国后，他在培养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所需人才方面，呕心沥血，卓有建树。刘帅一生学而不厌，勤读不倦，

对于战略、战役、战术和部队教育训练、院校建设、司令部工作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著。这些论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宝库增添了光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今天，在刘帅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浓厚的缅怀之情，汇聚一堂，举行刘伯承军事理论研讨会，目的就在于学习刘帅的高尚品格，研究刘帅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理解，推动军事科研工作的深入发展，把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

刘伯承元帅的军事理论植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之中，同时也与他终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求学精神分不开。刘帅熟读兵书，既善于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之精华，又能约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军事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在军事与政治关系方面，他提出要把军事斗争置于党的政治领导之下，把军事战略方针置于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之下。在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方面，他认为人民军队应当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成为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他创造性地发展了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思考我军未来的建设问题。他特别强调院校教育训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刘帅的思想和理论，对我军建设和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这次研讨会时间较短，而刘帅的军事理论又博大精深，因此会议期间，要紧紧围绕刘帅军事理论和实践中最核心的最具特色的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运用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研讨的重点拟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刘帅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着重探讨他关于战争观、方法论，以及人民战争的基本论述；

（二）刘帅的军事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特别要对他促成强弱转化，达成以弱胜强的用兵之道，作深入的剖析；

（三）刘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其中对体现刘帅战略战术思想特色的“敌进我进”、“分遣与集中灵活变换”、创造和打击敌人弱点、在宽大机动中调动和歼灭敌人等一系列克敌制胜战法的精神实质，进行深入探讨；

（四）刘帅关于加强军队建设的理论，特别是他关于“技术决定战术”、“治军必先治校”的思想，要展开深入的讨论。

有关刘帅对古代兵法、外军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以及刘帅的品德风范，可结合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同志们，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规划了我们国家和军队今后发展的宏伟蓝图。新的军委班子组成后，江主席、刘副主席、张副主席一再指示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大胆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进一步加强内外团结；努力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理论；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人民军队本色。我们研讨刘伯承元帅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学习他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问题的思想品格，学习他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献身精神，这对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和军委首长的重要指示，推动军队各项工作上新台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这次研讨会，从准备情况来看，提交的 70 篇论文内容很丰富，基本上覆盖了刘伯承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各个主要方面，并且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亲自撰写论文，一些当年在刘帅领导下工作的老同志积极参加这次研讨会，为会议增添了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这次研讨会计划开 3 天，采

取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希望大家以十四大精神，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军委江主席、刘副主席、张副主席最近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军的历史经验和当前建设的实际，相互学习，相互切磋，深入发掘刘伯承元帅的军事理论遗产，促进我军军事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宋文中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首长和同志们：

刘帅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经过三天来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今天就要结束了。这次会议，受到了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江泽民、薄一波、张震、秦基伟、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幕式；薄一波、张震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江主席和刘华清、张震副主席为会议题了词。与会中央领导同志还和大家一起照了像，给大家以极大地鼓舞。

全军各大单位领导和广大指战员对刘帅怀有深切的缅怀之情，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许多领导同志亲自撰写了论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还得到了原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老首长们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刘帅生前的老战友和汪荣华同志对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曾在刘帅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特别是刘帅领导指挥过的部队，都热烈响应并派出代表积极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不少老首长、老同志，不顾年迈体弱，甚至带病为会议撰写论文，充分表达对刘帅的敬爱和缅怀之情。会议期间，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新闻机构，都对会议情况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宣传。在此，我谨代表主办单位向给予研讨会以关怀和指导的各位首长，以及为研讨会做出贡献的所有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此次研讨会人选论文有70篇，论文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展示了近年来研究刘帅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由

于时间关系虽然只有20位论文作者在大会发言，但在分组讨论中，与会同志都围绕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及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运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可以说，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刘伯承的军事理论博大精深，涉及整个军事领域。这次研讨会论文的内容和会中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覆盖了刘帅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各主要方面。根据大家的论文和讨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研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归纳，供同志们参考。

一、关于刘伯承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通过讨论，与会同志认为，刘伯承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大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他所领导的、由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参加的战略区的军事实践活动，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伟大实践的组成部分，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他的许多重大创见和建议，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其特有的智慧。三是他对长期军事斗争实践所作的精心指导，特别是他的军事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以及他总结出的军事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理论体系的宝库。四是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泛地汲取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的军事学术思想，为我所用，增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作为人类军事思想优秀成果的光辉。刘伯承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切从战争的实际出发，既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具体的军事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他对应用、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态度和思想方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关于刘伯承在战争问题上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许多论文提到，刘伯承作为一个大军事家，他深刻领会和把握了军事理论的精髓——军事辩证法。首先，刘帅对战争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并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一是他坚持为人民而战的正义战争，反对损害人民利益的非正义战争。二是他着眼政治，运筹军事，坚持军事行动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军事战略要服务和服从于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三是他坚持人民战争思想，认为“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主张对敌展开“综合群力”的战争，即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一切力量，对敌展开全面的斗争。他在战争问题上的这一系列基本思想和主张，既是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体现，又是他坚持军事辩证法的必然结果。其次，军事辩证法思想，还贯穿于他全部军事实践之中。做为独当一面的战区指挥员，刘帅特别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强调战争的“情况是辩证的”，正如他所说的，“必须由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等，而求得辩证的学术。”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揭示了军事领域特别是错综复杂的战争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对军事与政治、全局与局部、强与弱、虚与实、攻与防、游与击、集中与分散、存人与失地、内线与外线、五行要素、袭击与反袭击等矛盾运动中包含的辩证哲理进行了深刻地阐述，进而为军事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三是强调运用军事辩证法就要贯彻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防止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学以致用”，反对墨守陈规。主张从我军之实际的独特之处出发来对待书本上的定论，不能一成不变，要在实

践中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他说，有经验的人，要把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刘帅这些精辟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既是其灵活多变战略战术思想和高超指挥艺术的灵魂，又是其军事理论的思想基础。

三、关于刘伯承的战略战术思想

与会同志指出，刘伯承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理论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善于从战略全局来论兵用兵。强调在政略指导下来确定作战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强调必须从敌强我弱、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总形势和总条件去制定战略战术，强调必须着眼战略全局组织实施好每一个战役、战斗，为了全局的需要，既要“吃肉”，又要“啃骨头”。二是他善于根据进攻和防御的两种不同的基本作战类型，实施作战指导。同时，强调无论防御、进攻，都不能搞“牛抵角”，都要在宽大灵活的机动中趋利避害，创造战机，争取主动。三是他善于集中兵力，合理运用作战形式，促成强弱转换。强调要“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每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确定主作战和支作战，确保作战重点。在作战形式上，他认为游击战、运动战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鸿沟，必须根据情况恰当调剂它们的份量，搞好多种作战形式的结合，密切作战的协同和配合。四是他善子造势，重视战役布势，创造敌人弱点，进面抓住战机，突击敌人弱点，使敌难以躲避和抵挡。五是他善于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组织合同作战。他认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一切战术都要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离开技术的战术就等于零”，“部队开不动，打不准，联不上，指挥不灵，就是抽筋（忽略了技术）的结果”。他主张，必须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与组织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

四、关于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

与会同志认为，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是其军事理论中的瑰宝，与其战争观、军事辩证法和战略战术思想融为一体。就其军事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来说，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指挥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突出之点。一是强调指挥必须掌握“五行术”。他指出：“研究情况要从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五行”以任务为首，以了解敌情为关键，敌情我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着矛盾的运动。指挥员指挥作战，必须掌握“五行”。“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二是强调辩证指挥，他指出：“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物质是变动的，环境是迁移的，昨天的正确战术到今天不一定是正确的了”。一切都要因敌变化而取胜，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三是强调指挥方式的多样性。“集中指挥用于打死猪，分割指挥用于打野猪”。对重要的作战方向要亲临一线指挥，对下级的指挥，必须注重战法的指导、任务的明确，并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四是强调建立科学的指挥体制，特别是高效能的司令部。他指出：“指挥是有条件的，指挥没有可靠的支助是无法打仗的，同样没有一个好的司令部和科学的编制体制将会失去指挥的意义和作用”。

刘伯承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他的谋略思想斑驳陆离，光辉灿烂。总体看有以下主要之点。一是强调对敌斗争不仅是斗力，也是斗智。他把智力的发挥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把以弱胜强作为军事谋略的出发点。他认为，人民战争的战略就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略。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的就是要靠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三是将军事谋略贯穿于军事行动之中。刘帅认为，军事谋略的运用，应与作战行动和指挥艺术溶为一体。在

战争中，没有不带谋略的军事行动。部队一动，即应将奇谋妙计寓于其中。四是不拘常法，见机而作。刘帅主张“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照常规用谋设计，也就无所谓运用之妙了，也就打不了胜仗。因此，他的谋略运筹，常常一反常规，不拘一格。这是他谋略思想的重要特色。

五、关于刘伯承的军队建设思想

刘伯承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与会同志认为，刘帅在军队建设方面除坚持军队必须革命化外，特别表现在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从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面对现代战争的特点，他提出了一系列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思想。他认为，军队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象一部大机器一样，能有准确的运行规律，向共同的目标协调一致地行动。他认为现代化与正规化，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实现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关键一环，是要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的战略位置，并且“治军必先治校”、“治校要重人才”。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受中央委托，创办军事学院，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培养了一代人才，并形成了一整套院校教育的思想理论体系。刘帅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工作，强调其战略地位。他认为，军队要打仗，就离不开后勤，特别是现代战争对后勤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后勤工作，后勤建设，特别是后方基地的建设和补给问题，不是第二位的工作，而是战争中首先要考虑的工作。要象“大

树”一样，建立军队战略、战役、战术后方。

与会同志高度赞扬刘帅的革命品质和高尚风范，表示要学习刘帅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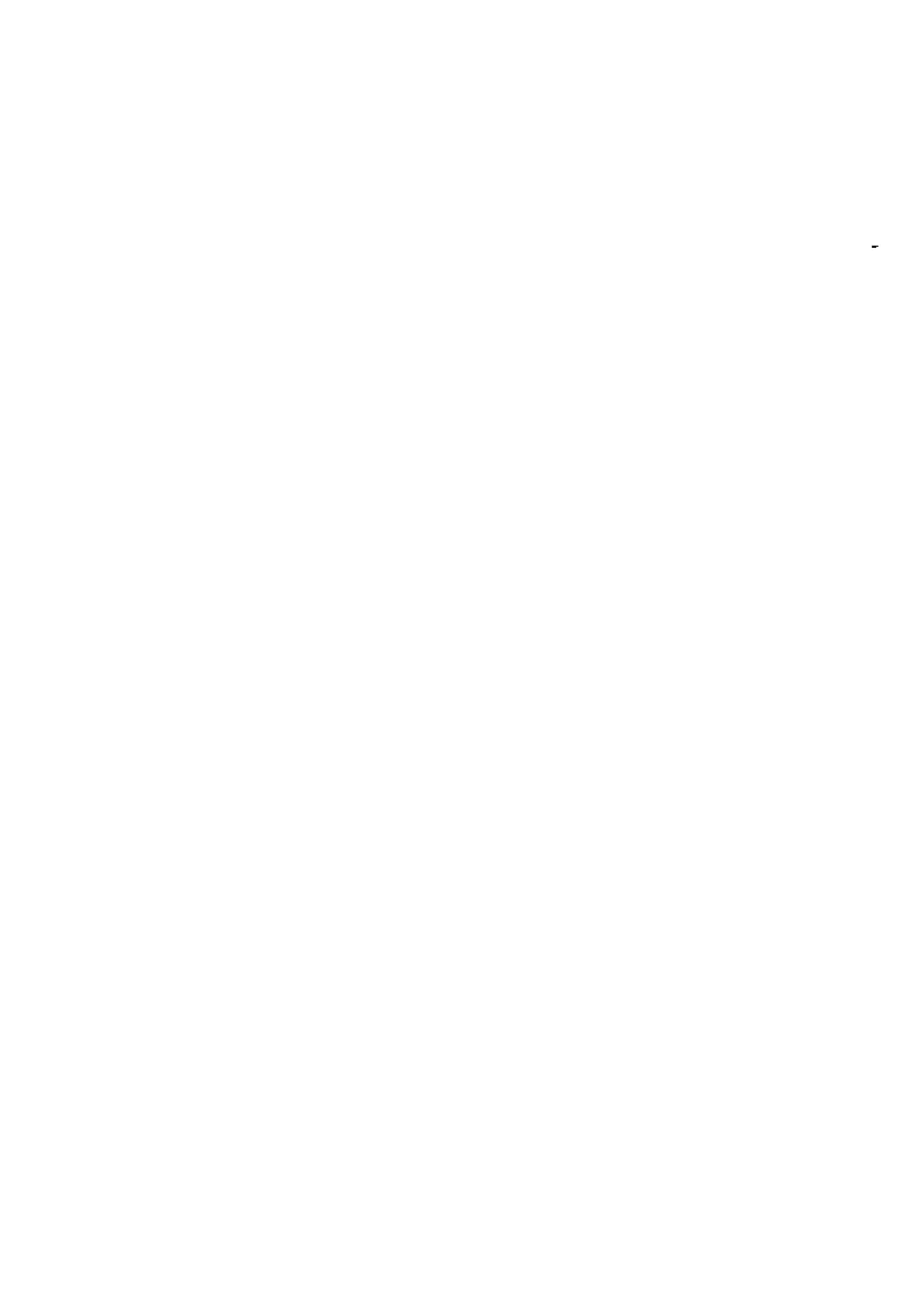
上面只是简要的概括和归纳。由于我们这个研讨会时间较短，有些问题还没有充分展开。今后，还要进一步系统地深入学习和研究。这是我们从事军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责无旁贷的任务。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正处在大变动时期。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江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十大任务”，并把“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十大任务”之一。这就更加迫切要求我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学习和研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军事理论，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指导，解决我军新时期军事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预祝同志们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理论与实践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达到新的水平。

这次会议，由于军科条件有限，在会议保障和生活服务方面有许多不到之处，请同志们多予谅解。

在与会同志共同努力下，刘伯承军事理论研讨会现在胜利结束。祝各位一路平安，顺利返回岗位。

谢谢大家。



受命中央千钧负　号令三军行如流

——学习刘帅执行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坚定性与创造性

张　震　上将

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十四大精神，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步前进的新形势下，在刘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刘帅光辉业绩，研讨刘帅军事理论，这对于落实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针，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伯承元帅戎马一生，先后转战大半个中国。从南昌起义到太行抗日，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到挥师横渡长江，从解放大西南到创办军事学院，他率部拒虎打狼，威扬太行；南征北战，逐鹿中原；渡江追穷寇，西南扫残敌，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人们赞誉他是“常胜将军”，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将才”、“无产阶级的孙吴”。长期以来，人们从不同侧面、角度和层次探讨研究刘帅的军事斗争业绩和指挥艺术，以从中汲取营养，受到教育与启迪。从我的亲身感受看，坚定不移地贯彻军委战略方针，在执行中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刘帅最突出、最具特色之点，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和发扬的。

战国人孙膑在《孙膑兵法·客主人分》中，以“令行如流”比喻善用兵者指挥作战，其令就象流水一样势不可挡。刘伯承同志在中共七大发言中，曾说他是“既不能令就要受命”。“不能令”是刘帅的自谦之词，而“就要受命”，则表达了他贯彻中央指示和军委战略方针的坚定性。我认为，作为一代元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既能受命又能令，把受命的坚定性与行令中的创造性完

美地统一了起来，可谓“受命中央千钧负，号令三军行如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决心“一息尚存，革命不止”的布尔什维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其间，他执行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贯彻军委战略方针的坚定性就有了初步展现。根据党的决议，他协助周恩来、叶挺、贺龙发动起义于南昌，担任了起义军的参谋长。在红军总参谋长的岗位上，先是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继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王明、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以至被贬为五军团参谋长。为了贯彻党中央、军委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长征途中，他或是殿后，或为先遣，“所负任务无不完成，尤以乌江、金沙江、安顺场、大渡河诸役为著，更表现了艰苦卓绝，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和军事的奇才”（朱德：《祝刘师长五十寿辰》）。同时，与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更表现了他政治上坚定不移”（朱德：《祝刘师长五十寿辰》）。

八年抗日战争，更加显示出刘帅贯彻军委战略方针的这种坚定性品质，及其富有创造性的卓越才华。他坚决贯彻中央“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率改编后的第八路军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前线。夜袭阳明堡首战得手，设伏七亘村再创胜绩，神头岭打援，长乐村急袭……这诸多出色的战斗初步打开了敌后抗战的局面，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落到实处。在大规模的游击战开展起来以后，他及时总结了伏击、袭击、急袭、吸打敌援、断敌交通等一系列游击战术，组织健全了游击集团的作战体制，创造性地贯彻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他在分遣部队发动群众，创建了以太行山区南段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较早挺进平原地区，开辟了冀豫平原根据地，为实现党中央关于“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部署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环境中，晋冀豫根据地始终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两面夹击之下，刘伯承率部"既要前门打虎，又要后门拒狼"。他与顽固派将领多次会谈，在政治上晓以团结抗战之大义；对顽固不化者，在军事上则毫不退让，毅然发起冀南反顽战役、卫（河）东战役、磁武涉林战役，给国民党顽固派以迎头痛击，保卫了抗日根据地，表现出军事服从政治、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高超艺术。从1937年8月至1945年9月的整个抗战时期，刘伯承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创造性地贯彻军委战略方针，率部"凭歼日寇镇幽燕"（朱德诗句），"撑住平辽半壁山"（叶剑英诗句），相继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使"东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北至仓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刘伯承：《我们在太行山上》）。全区部队从不足万人发展到30万人，成为一支拥有40万人的民兵武装，2400多万人口的敌后最大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中，刘帅贯彻军委战略方针的坚定性与创造性展现得更为充分。其中，尤以如下几点使我感受最深。

一是军事行动服从政治斗争需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下山摘桃。蒋介石一面电邀毛泽东主席赴渝谈判，一面命令军队向解放区进攻。1945年9月至11月，刘伯承司令员与邓小平政委一起率部反击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首战上党全胜，再战邯郸大捷。作为解放战争序幕的这两大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和打通平汉路北上的企图，"守住了球门"，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

二是战役局部始终服从战略全局。可以说刘帅指挥的每次战役都是如此，其中要数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最。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刘伯承与邓小平同

志率 12 万大军，于 1947 年 6 月 30 日强渡黄河，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狼山战捷复羊山”，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尔后迅即挥师横跨陇海铁路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直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艰难条件下，为了全局，刘邓大军宁愿“啃骨头”，“同敌人来了四个回合”，实现了战略展开，“对全国尽了责任”。同年 9 月，他又率部与出击陇海路的华东野战军陈粟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逐鹿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歼灭敌大量有生力量，为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精心组织战役，以战役的胜利实现中央军委的战略企图。中国革命战争几经战略转变，刘伯承同志在每次战略转变关头，总是以其高超的战役指挥艺术，在总的战略意图之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如：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刘伯承同志率部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10 个月内连续取得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和豫北等战役的胜利，使“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得到具体落实。淮海一役，歼灭了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使其在长江以北的主力丧失殆尽，取得了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第二个战役的胜利。1949 年冬组织指挥的西南诸役，出色地执行了毛主席、中央军委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在较短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如此等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刘伯承同志“堪称执行党的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悼伯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刘伯承元帅在 70 年的军事生涯中，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之所以如此坚定不移和富有创造性，我认为，其“源头”有五。

一、源于他政治上的坚定信念

军事战略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一定的军事战略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国家、政党的路线和利益服务的。这就要求，军事指挥员特别是高级将领必须贯彻一定阶级、国家既定的军事战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始终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邓小平：《悼伯承》）。所以他能够“绝对服从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肩负重任，驰骋沙场，临危不惧，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要求自己：“勉作布尔什维克，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现之；要在危难之中发挥顽强性”（刘伯承50岁自铭）。他“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邓小平：《悼伯承》）。正因为如此，在长征途中，他坚持贯彻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面对张国焘的威胁拉拢，他坚决地表示：“北上是党中央的决定，我刘伯承是个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他和邓小平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吸引国民党军南线主力，以自身在艰苦环境中的奋斗换得全国其他战场局面的改观，更是堪称执行军委战略方针的典范。

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担任一个战略区最高指挥员的刘伯承，他深深感到中央军委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的战略方针，是服从和服务于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是以解放人民、建立和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只有坚决并富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军委战略方针，把打军事仗与打政治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军事行动不脱离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明确指出，我军战术的基本特点之一，“就在于具有明确坚定的政治信念与泼辣顽强的战斗作风，以达成抗战建国的战略任务”（《刘伯承军事文选》第214页）。这字里行间，都体现着刘帅执行军委战略方针的坚定性。

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战友、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刘伯承，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身当其时、身当其事”。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他发自肺腑、深切感到：“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刘伯承：《回顾长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对毛泽东军事学说“遵之则胜，反之则败”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中，他逐步形成了坚信毛主席、坚信党中央的强烈意识，锻造了一代元戎坚定不移贯彻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素质修养，展现了他卓越的创造性才能。

二、源于他正确理解军委战略方针

唐代“安史之乱”时期的张巡，不仅以精于韬略，依托孤城、临难不苟为后人所重，更因他提出“兵识将意”的主张，而为后世兵家所推崇。此话告诉人们，兵士对上级的意图（将意）理解与否，关乎消极执行命令还是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问题，并进而影响到作战的胜负。而对于为将者来说，“将识士情”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将要识全局，要理解指导战争全局的军事战略。被誉为“无产阶级孙吴”和“常胜将军”的刘帅，善识全局正是他论兵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论兵，是围绕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而论；用兵，是在充分理解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军委战略方针的基础上而用。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和中央军委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制定的具体战略方针，刘帅总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加

以正确理解，而后指挥千军万马，坚决而富有创造性地付诸行动。

纵观刘帅平生，他对军委战略方针的理解，既非常全面、系统，又准确而深刻，始终坚持：就军事，思政治；就局部，思全局；就本部，思友邻。因此，他指挥的战役，总是符合毛主席的部署、军委的战略意图。

就军事，思政治。就是军政兼顾，把军事行动放到政治目标上去考虑。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胜负是双方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因素综合较量的结果，因而绝没有脱离政治的军事战略。抗日战争初期，刘伯承同志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部署的认识，就是从抗日救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政治目的出发，看到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党我军、积蓄革命力量，建立支撑长期斗争战略基地的英明决策，是发动群众，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正确途径。他率一二九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以武装斗争为主，与其他斗争紧密配合，胜利地领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建立。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及本区实际，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融合，适时调剂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分量"的思想，组织了"游击集团"这一人民战争形式、实行"敌进我进"的作战行动，从而使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广泛开展，不断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就局部，思全局。对于毛主席、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刘帅总是以其敏锐的战略眼光，上下结合，前后照应，纵横联贯加以思考，就大势与全局，理解中央军委的战略企图和战略部署，认清所在局部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局部行动可能给全局带来的影响，寻找和把握有利全局的契机，决定自己的行动。只要全局需要，有利于军委战略企图的实现，他总是坚受不辞，挥军以赴。抗日战争时期，他与邓小平同志一起，纵横太行内外，创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为夺取抗战全局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战

争前夕，他率部担负起作为“严重的战略任务”的“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之重任，于上党战役之后紧接着发起了平汉战役，全歼北犯的国民党部队两个军，争取了一个军起义，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以战役局部的胜利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大贡献。解放战争第二年，为实现中央军委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重大决策，他和邓小平同志亲率晋冀鲁豫12万大军，首破蒋介石黄河防线，继战鲁西南，再千里跃进，涉险历难，直插大别山，把自己战略区的行动看作全国战争中的重要一环，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

就本部，思友邻。作为一个战略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刘伯承同志总是就本部，思友邻，既上下结合，从战略、战役的层次上，又左右兼顾，从本部与友邻关系上，正确理解军委战略方针。他称所在的晋冀鲁豫战略区为“四战之地”，要担负起“四战之军”的任务，策应东西南北作战。他还把解放战争看作全国一盘棋，二野与其他野战军是配合作战的。为实现中央军委总的战略企图，在本部配合友邻的作战中，他导演出许多出色的活剧来。解放战争伊始，为了支援中原战略区李先念部突围，反击国民党对苏北解放区的进攻，吸引敌人在新黄河以西以南布防，他组织发起了自国民党军向南线解放区进攻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外线出击战——陇海战役，在历时13天的作战中，歼敌1.3万余人，破坏铁路300余里，有力地支援和接应了中原突围，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蒋军主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路。1947年初，他率部再度南下进行的豫皖边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华野的鲁南战役和莱芜大捷。再如巨金鱼战役、宛东战役、成都战役等，刘帅都从全局出发，给予友邻以有力的配合。象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期间中野与华野的配合，那更是典范之作。

三、源于他从战役实际出发，灵活执行军委战略方针

战争史告诉人们，统帅的伟大与将军的才能，战略的正确与战场的胜利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其指挥下的一大批智勇双全的将军们的共同奋斗，中央军委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各战场的辉煌胜利相统一、相结合的结果。刘帅率军驰骋疆场，在中央军委总的战略意图之下，从战役的实际出发，在战役作战中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灵活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以战役的胜利把逐步夺取战略的主动变成了现实。在抗战初期开创太行根据地时，他成功地组织了黄崖底、神头岭、长乐村等战斗，继而打破侵华日军九路围攻，粉碎其“囚笼”政策，使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得到很好贯彻。上党战役，不仅军事上取得了解放战争首战重大战役的胜利，且政治上有力地配合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斗争。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 1946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在给刘、邓、陈、粟的电报里提出在“八月十日至九月十日一个月内”，如“刘邓军能占领汴徐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城，并歼敌二至三个旅”，“则于大局有极大利益”（《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289 页）。结果至 9 月 8 日，刘邓军便成功地进行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歼敌 6 个旅（师）共 3 万多人，攻占 10 余城，超额实现了毛主席的要求。9 月 12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称定陶战役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胜利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的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南方前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刘帅总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作战方针、原则作出透彻分析和精辟理解，而后根据战场实际，纵横捭阖于战场，克敌制胜于战役。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原则，他“以一个人扭打三个敌人，就得以抽出三个人痛打一个敌人”的通俗比喻道出

其中的真谛，每每打出许多以少胜多的战役。对战役目标通常选打弱敌的原则，他用“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的哲理把握其中辩证关系，选择每次战役攻歼目标，无不奏效。对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他以“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的深邃理解教育部队，以成功的运动战战役，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解放战争内线作战仅三个月，就以冀鲁豫十七座空城，换得歼灭蒋介石6万多人的巨大胜利。

刘帅卓越的指挥才能，非凡的战役指挥艺术，在于他始终坚持从战争的实际出发。他将兵布阵，施谋用略，不萧规曹随，死守教条，也不独处一隅，迷信经验，而是深入调查研究，把握“五行术”（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他料敌如神，量敌用兵；打法多变，战而不复。就拿实行歼灭战方针来说吧，同样打的是歼灭战，“猫盘老鼠”战平汉，“闪击纵深”打陇海，“猛虎掏心”夺滑县，“釜底抽薪”胜巨、金、鱼。所有这些，都是他坚持实事求是指挥战役的佳作。

四、源于他注重总结，把握战争指导规律

刘帅执行军委战略方针的坚定性和创造性，得益于他认真并善于总结作战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把握军事规律。我记得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帅常说的一句话：“经验好比一堆零散的钱，理论好比是一根钱串子，把各个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从这形象的比喻中足以看出刘帅对总结实践经验的深刻认识。几十年来，每次战役战斗刚结束，他都及时而认真地对作战经验加以总结，上报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发部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著述甚多，总结中央苏区游击活动的经验。1934年5月，他在住院治疗期间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抗日战争期间，他及时而全面地总结了

许多重大战斗战役的作战经验，写出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目前的战术考察》等重要的、系统的军事著作数十篇。1945年，于上党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就写出了《上党战役总结》。解放战争期间，战斗极为频繁，刘帅在率部一百天接连打五仗、五战皆捷的情况下，于1946年12月完成了校订补译《合同战术》下部。当时华北局《人民日报》记者著文称“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他写出了百多篇战术战役作战经验和总结。

刘帅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通过对亲身作战经验的总结，集中群众智慧，使之上升为理论。他提出的那些克敌制胜的办法，概括出的许多著名作战原则，都是他把握了战争指导规律特别是战役规律的结果。1942年，他写出的《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当时被誉为“太行山区的《论持久战》”。还有我们大家熟知的：对游击战他提出的“游来击去或游去击来”的方针。在战役实践中，他先后提出了“趋利避害、趋胜避败”，“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宽大机动，紧握主动”，“支作战与主作战配合；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主突击方向与箝制方向配合”，“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等制胜要诀。所有这些，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力地指导着战争实践，保证了军委战略方针的贯彻落实。

五、源于他炳烛不倦的学习精神

古往今来，人们评论将帅，历来推崇一个“学”字，看好一个“学”字。这“学”，一是指学识，学问。中国古代就认为将领“有勇不如有学”。二是指获取学识的的途径。“闻鸡起舞”，讲的是东晋名将祖逖的学习精神；“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说的是三国东吴名将吕蒙通过学习而取得惊人的提高。三是指治学之道即

学风。刘帅集学识、勤学和良好学风于一身。

刘帅的学识有口皆碑。邓小平同志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悼伯承》）。他以“学必成，不学则一无所成”勉励自己，涉猎中外，博览古今。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政治、军事到经济、外交，从中国的兵法到外国的军事论著，从苏联的合同战术到美国、德国的战斗教令以及日本的典范令，他都潜心研读，使自己成为通晓马列，熟谙兵法，精于韬略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那璀灿夺目的指挥艺术之花，正是深深扎根于博大精深的学问沃土之中的。

刘帅的勤学倍受称誉。博学是勤学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与刘帅长期并肩战斗中，称他是“勤读不厌的模范”；陈老总写诗颂他“苦学入梦寐”。刘帅的勤学感人至深。他以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激励自己，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手不释卷，苦苦攻读；战争年代，他置鞍马劳顿于不顾，宵衣旰食，抓紧时间学习；不顾视力不好，常常借助于放大镜，顽强地学习。《说苑·建本》中有一篇《炳烛》的故事，里面记录了春秋时期晋平公与师旷的一段有关学习的对话。我记得师旷说的一段话：“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长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刘帅就是少而好学，长而好学，老而好学，终生好学的人。

刘帅的学风堪称楷模。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时，邓小平同志写文称他“不特重视理论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是对刘帅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最准确而又精辟的概括，也是刘帅治学之本色所在。刘帅从政治责任与任务的需要上，认为“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把学习和使用之间好好地融洽起来。他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就是：“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特别强调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一要反对教条主义即“死理论”，二要反对经验主义即“瞎实际”。刘帅就是把马克

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战争实际很好融洽起来的典范。他南征北战，每每亲临前线，勘察地形，明确任务，激励士气，在战争实践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作战原则和战役战法，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刘帅在日无稍懈的学习中，特别是在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期间，总结出许多宝贵的学习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又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诸如“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和业务家”的治学思想；“人人当院长”的治校群众路线；借鉴孔老夫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而提出的“要博而约，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的研究军事科学方法；“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的永不满足态度，以及“必须扼要踏实，反对铺张浮夸”的要求，等等。所有这些教诲，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倍感亲切！

刘伯承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贡献

蒋顺学　中将

刘伯承元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和军事翻译家。他在大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中，指挥过数百次战役战斗，屡建奇功，以足智多谋闻名于世；他博学古今中外军事，写下了100多万字的军事著作，翻译和编译了几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论著；他数度担任总参谋长，以战略家的气度和胆识，运筹帷幄，协调全局，迭挫强敌；他从担任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校长到建国后创办我军最高军事学府，数次主持军校工作，开创了我军现代化军事教育的先河。刘帅在长期指挥作战中，一向坚持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不懈地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把实战经验总结上升为军事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

刘帅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现在很多方面，最富有特色的是以下几点。

一、提出"综合群力"的观点，精辟地概括了人民战争的本质特征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我党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指导路线。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充分调动和综合运用各种类、各方面的力量，是人民战争战略战

术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帅为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全民抗战路线，针对日寇侵华不仅实行武力战，而且实行包括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文化战在内的“总力战”的实际，匠心独运地提出了“综合群力”的战略思想。他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必须综合各阶级、各抗战团体、军民和政府等一切生动力量，在党的一元化领导或党的纲领指导下，对敌开展以军事斗争为轴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反特务斗争相结合的“全面战全力战”，以粉碎敌人的“总力战”。

按照“全面战全力战”，即“综合群力”的总体思想，刘帅在根据地建设中，把狠抓人民武装建设与各种群众组织建设、各级人民政权建设、地方党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组织对敌全力斗争中，以政治进攻为主，以武装斗争为骨干，辅以一切民众斗争手段。根据“综合群力”的需要，他扩展了战术的运用范畴，认为“战术被运用的范围，不应只限于武装斗争，而且应该普及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斗争。军事战术和政治策略的含义本来就是一样的。”“我军战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把战术与群众对敌的一切斗争结合运用，以发扬全面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全力战（党政军民一元化）的威力”。他强调，实现“综合群力”，必须做到武装与非武装相结合，劳动力与战斗力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民众对敌斗争相结合，积蓄力量与消耗敌人相结合，注重从人民的本质上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刘帅指出，“综合群力”与“集中兵力”是相辅相成的。“综合群力”是基于持久作战，以政治战略为首，达成“以面对点”；“集中兵力”是基于速战速决，以军事行动为主，达成“以强对弱”。一个被侵略的弱国，“集中兵力”必须建立在“综合群力”的基础上，而“综合群力”的最高体现是保证达成“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作战中，刘帅不时抽调大批干部和分遣必要兵力，在各地散布成面的活动，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到处打地雷战、麻

堡垒。不间断地欺骗、迷惑、疲惫、牵制和消耗敌人，陷敌于四面楚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地，保障了正规军机动自如地集中兵力，抓住战机干脆利落地歼灭敌人。

要实现“综合群力”，党和军队必须抓住三个关节：一是取信于民；二是依靠各级政府；三是建立军政一体化的指挥体系。刘帅常说，“要紧的就是和群众有血肉的结合”，“这就是表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他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一方面，把关心和保护群众利益作为带兵打仗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也力求不让人民群众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注重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在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和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全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适时为人民谋利益，减轻群众负担。再就是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做到“兵马未动，纪律先行”。刘帅十分尊重地方政府的领导，努力维护军政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有的同志打了胜仗骄傲自满，不尊重地方党和地方政府时，他就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紧密地团结地方党，团结地方政府和一切民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保障”。为了建立稳定的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刘帅在敌后抗战中，按县、区、村行政区划建立起了军政合一的指挥部。县、区、村长和党委书记兼任县、区、村指挥部的指挥和政治部主任，既履行各级党组织、抗日政权的职责，又统一指挥各级的游击集团和通过同级人民武装委员会指挥民众游击战争，切实形成了全面全力的游击战争的一元化领导。

刘帅非常重视运用政治攻势对敌占区人民力量的发动和敌人内部民主力量的争取。他认为，“政治攻势不只是燃起敌占区同胞的抗战热潮，而且也燃起了日军反战热潮。”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争取敌人阵营里的民主力量，乃至瓦解敌人，争取敌人反正，是“综合群力”作用的最高发挥。他和邓小平同志创建的武工队，就是发动政治攻势的产物。从军区、军分区选调一大批政治素质

好、经过专门培训的班、排骨干，组成二、三十人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繁殖游击战争，变敌占区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

刘伯承在抗战初期提出的“综合群力”论，十分准确地把握了人民战争的本质特征，使指导人民战争的思想和行动方针更为明确。“综合群力”与当今共识的“综合国力”，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不仅表明了刘帅对人民战争的远见卓识，而且“综合群力”的理论和实践，对今后如何依靠“综合国力”来发挥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也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二、实行“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核心。刘伯承提出的“敌进我进”，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贯穿于刘帅一系列论著之中。早在1934年，他根据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在《现在游击队要解决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对付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我们游击队应该乘隙而入其后方交通线上，实行袭击；边区游击队再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主张在“敌进我退”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向敌后方和深远纵深破袭，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灵活机动的作战，以配合主力兵团的正面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刘帅针对蒋军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军长驱直入，国土大片沦陷的严重形势，认为必须采取“敌进我进”的新方针。他明确提出：“‘敌进我进’，就是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在战略上，要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游击力量；在战术上，要转到

敌人侧背作战，实施全面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随着“敌进我进”战略在整个敌后抗日战场的普遍推行，有力地扼制了日军的全面攻势，推动了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的发展。毛泽东曾十分赞赏地说：“伯承同志你那个‘敌进我进’的办法好啊，搞得日本人没办法。”

解放战争时期，刘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运筹和部署，在实行“敌进我进”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他和邓小平同志指挥10万大军，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千里跃进大别山，大胆脱离后方，插入敌人胸膛，一举改变了敌攻我守的战略态势。当蒋介石调集33个旅对大别山实施围攻时，刘邓旋即实行“敌向内，我向外”的方针，以“大踏步的分遣，撕破敌人的合击阵势，随即寻机向心集结，围歼可以歼灭之敌”，同时“以蔓延宽面的游击战争，扩大新的地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中原根据地。在战争实践中，“敌进我进”已发展为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方面：在战略上为转入反攻而大胆向敌人深远后方挺进；在战役战术上为转入外线作战而大踏步地机动兵力。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全国性的战略反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个评价，是最贴切不过的。

在整个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中，刘帅对“敌进我进”的运用十分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用挺进的样式深入敌后，分兵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扩大战场，牵制敌人，掩护正面作战；二是以跃进的样式插入敌人腹心地带，改变战争态势，配合和支援友邻战区，推动战局的发展；三是以突围的样式转人外线作战，打破敌人合击阵势，粉碎敌入的多路围攻；四是以大踏步进退的样式透入敌人纵深，调动敌人，诱击敌人，吸打敌援，寻歼弱敌。

“敌进我进”方针的核心，是以积极的进攻夺取战争主动权。

毛泽东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观能力的竞争。"夺取战争主动权，一要把握主动的作战形式；二要选准作战的主要方向。"敌进我进"正是充分运用"进攻"这一主动的作战形式，跳出敌人选定的战场，而向敌兵力薄弱的方向和地区开辟新的战场。它用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达成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争取劣势中的优势、被动中的主动，从而实现"消灭敌人而不被敌人消灭"的目的。为充分发挥"敌进我进"作战的威力，刘帅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一切地方部队，特别是游击队要抓主动权，实行先发制人，出敌不意；游击队要把握主动地位，必须到处采取进攻，绝少防御，更不应筑守支点。刘帅还反复强调：无论大小部队都应采取积极的、主动的进攻作战，而避免消极的、被动的受迫作战。倘不幸陷于被动时，尤应当机立断，转为主动。如果死板不动与消极防御，则有被消灭的危险。"敌进我进"与"敌进我退"，并不矛盾，而是异曲同工。"敌进我退"是避敌锋芒；"敌进我进"是避实击虚，都是从被动形势中争取主动的作战。

"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在我国革命战争中，曾产生过巨大威力，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敌人的现代化程度高，战争的形态和特点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但是，"敌进我进"，从被动的形势中夺取战争主动权的思想完全适用于现代条件。采取何种新的形式和战法，进入敌人的纵深和后方作战，削弱敌人的进攻能力，破坏敌人的战争企图，仍将是我们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课题。

三、"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融合"，灵活运用适应战略转变的作战形式

作战形式是实现战争目的的手段，它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适时改变和正确运用主要作战形式，既是战时战略转变的基本内

容，又是促成战略转变的重要方法，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说："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到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刘伯承对这三种基本作战形式的不同特点和三者之间相互配合与转换的规律，有非常透彻的见解，尤其是对游击战、运动战的理解和运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创造。

1、首创"游击集团"

为适应抗战的新形势，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决定我军实行战略转变，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军，从打运动战为主转变到打游击战为主。刘帅为贯彻"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战略方针，根据游击战机敏灵动、分散隐蔽和突击力小、顽强性弱的特点；从解决游击战不易统一指挥、难以密切协同与正规军变游击军所面临的新矛盾这一实际需要出发，创立了"游击集团"的编组和作战样式。刘帅在 1941 年发布的《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中指出：游击集团是以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相结合而组成的广泛经常的游击战争组织形式，是游击队、自卫队、基干军队三个成份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的作战形式。他形象地说：游击队是"筋"、基干军队是"骨"、自卫队是"肉"，三个成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打击敌人的"拳头"。刘帅按三个成份的不同范围和层次，组成了村、区、县等游击集团，使松散的、独立行动的游击力量，构成了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成为世界被压迫者创造的精彩的作品"。刘帅首创的"游击集团"，适应了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要求，为顺利实现战略转变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形式。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对刘帅创造的"游击集团"形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游击集团形式的成功运用，不仅在抗日战争中闹得日寇如芒在背，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在 1948 年的大别山斗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创造性地实践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

毛泽东历来强调，以运动战为我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军按照“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实行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为贯彻新的战略方针和实现新的战略转变，刘帅把能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具有广大回旋余地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作为运动战的通常样式。他说：“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是面对点的战争，故我们选择战场必须宽大机动。”他主张以大踏步地前进，来突击敌人弱点而消灭之；以大踏步后退，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特别避免敌人的合击。他秉着“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的行动方针，创造了许多在大踏步进退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光辉战绩。例如，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辗转冀鲁豫战场，先以大踏步前进，取得了陇海战役的胜利；接着大踏步后退，在内线作战，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在检讨了巨野战役的“牛抵角笨拙状态”以后，即以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跟进，尔后回马一枪，取得了鄄城战役的胜利。战后又大踏步后退以休整部队，然后再大踏步前进以猛虎掏心之势取得了滑县战役的胜利。连续与敌作战 7 次，有 6 次都是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取得胜利的。在此之后的千里跃进和战略展开，渡江南下的千里追击，进军大西南的八千里大迂回大包围，都堪称大踏步前进的杰作。

3、揭示了作战形式之间相互融合和相互转换的规律

作战形式是作战指导思想的体现，是敌我双方情况、作战企图、作战任务和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同主观指导相互作用的产物。刘帅透彻地研究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主张从战略的高度，适时调剂三者份量，以更好地发挥三者相互为补、相互融合的作用。

刘帅认为，游击战和运动战之间并无鸿沟，而是互相连贯、互相影响的。连贯两者的“环”，就是趋利避害的“机动歼敌”。“游”是为了“击”，“运动”也是为了更好的歼敌。如敌大军猬集，不利于我集结大的兵力行动时，则应分遣我军到各地去领导和强

化游击战争；一旦敌人兵力分散或有隙可乘时，则应迅速集中附近区域的部队打运动战，以达到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目的。就主动歼敌而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不过是兵力大小不同，作战威力不同，指挥方式不同，战术范畴因之不同罢了。刘帅还指出："运动战与阵地战，时常是互为变换的。如遭遇战，就是标本的运动战，但它一转到固着一地时，就变成了阵地战。如阵地战的阵地一被突破，又变成运动战"。正规的运动战与阵地战之间的转换，也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

刘帅认为，人民战争的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众武装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决定了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必然始终并存和互寓，在战争的不同阶段，主要是如何适时调剂其份量问题。人民战争的全过程，是个敌人由强变弱和人民武装力量由弱变强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战略阶段的划分；伴随着三个战略阶段又派生出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基本作战形式的主辅地位转换。刘帅主张，"应根据当前敌我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军队数量、质量以及技术条件的优劣，乃至地理经济条件"，进行对比和估算，并依此决定各作战形式所占的份量。作战形式在战略阶段的份量调整，就是军事战略转变；而在每一战略阶段的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的不同时机的调整，则是战役战术层次上作战形式和作战阶段的转换。

遵循作战形式相互为助、相互融合的规律，适时调剂其份量的思想，对我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正确运用作战形式，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刘帅在《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而奋斗》一文中预言：在现代战争中，仍然需要我们以前那样的劣势装备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敌后还是要打游击战，在次要方向还要打紧密配合主要战场的运动战，而这样的游击战与运动战将与以前一样打胜仗。

四、“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创造性地总结出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战法

刘伯承熟知古今中外兵书，精通我国古代兵法，但又不囿于书本，而是汲其精华，灵活而巧妙地用于实践，打了很多漂亮仗。他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超常思维，大胆求异创新，在实战中创立了一系列具体的战术原则，通俗易懂地归纳出许多克敌制胜、脍炙人口的战术要诀，留下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光辉战例。邓小平同志曾赞誉刘帅“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任何战法，都是指挥员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比较后所抉择的。刘帅多年苦心孤诣创造和运用的一套战法，是以以弱胜强为显著特征的战法。他在选择和运用战法时，有三点最为突出：第一是审时度势，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因敌而变，因情而变。刘伯承之所以能够“料敌如神”，“用兵神妙”，关键就在于“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语）。刘帅把实事求是地指挥作战归纳为“五行术”，即“对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作综合估计、考虑，据此定下决心”。“五行一定，必定打胜”，“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第二是着眼于化敌强为弱，转我劣为优。在我军战争史上，敌强我弱是最基本的事实。因而战法的选择，只能把立足点和着眼点放在敌我双方的强弱转化方面，使敌人由整体的强转变为交战时的弱，使我由整体上的弱转变为交战时的强。刘帅常说：“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弱点，才会有依据。”寻找敌人的弱点，创造敌人的弱点，抓住敌人的弱点，以我一时一地的优势歼灭一时一地的薄弱之敌，这是刘帅选择和运用战法最突出的特色。第三是科学分析作战中的各种矛盾，利用矛盾，扬长避

短。刘帅善于从进攻与防御、分进与集结、内线与外线以及动与静、虚与实、点与面、正与奇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出以弱胜强之道。他反复强调，我们的斗法，就是要使自己逐渐地“盈”和“长”，使敌人不断地“虚”和“消”。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刘帅归纳出许多作战要诀，集中起来大体上有 10 条：①政治与军事配合，“政治主张要公开，要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②选择作战目标，“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③作战行动要以“趋利避害、寻机歼敌”为原则。④“袭击驻止之敌，是在创造其弱点，故用兵不要大；伏击运动之敌，是在打击其弱点，故用兵要大”。⑤攻打集中强大之敌，须“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⑥打运动之敌，须“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⑦攻打孤守据点之敌，须“小的吃掉，大的困死”。⑧歼灭对我钳击之敌，可“攻其一点，吸敌全来，啃其一边，各个击破”。⑨进攻分据各点、以交通线相互支援联络之敌，要“以面对点，线线切断，点点包围”。⑩进攻首尾相联之敌，则应“挟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死地而后快”。这些要诀，至今读来仍如珠落玉盘，闪烁着以弱胜强的深邃哲理和指挥艺术的夺目光彩。

刘帅长期担任战区和野战军的指挥员，他总是从战略方针与战役布势相结合的高度，以机动歼敌为核心来考虑战法；同时，又以教练员的身份给下级传授具体战法。刘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法，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战术体系。按作战的规模，有大兵团到小分队的各式战法；按作战的形式，有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相互融合的一系列战术；按作战的样式，有“牛抵角”、“马的战术”、“狼的战术”种种；按作战的地域，有平原、山地、隘路、村落、攻城等战术原则；按作战的进程，还有行军、宿营、侦察、包围、分割、穿插、迂回、追击、撤退等各种战法。

为了便于广大指战员理解战法的要点和灵活使用战法，刘帅特别擅长把各式战法形象化，画龙点睛地归纳成字诀、口诀。比

如，他把游击战的袭击战术比喻为“狼的战术”；把分遣兵力疲惫、袭扰敌人的战法称为“麻雀战术”；把从四面八方向心攻击敌人称为“黄蜂战术”；把先疲后打的战法比喻为“猫盘老鼠”；把分散敌人集中自己，以我之众击敌之寡的战法比作“杀鸡要用牛刀”；把先割后歼、各个击破的战法拟人化为“挟其额，揪其尾、截其腰”；把纵深突贯，首歼敌指挥机关的战法称为“猛虎掏心”；把撤退前预设伏击，称为“拖刀计”、“杀回马枪”；把围点打援、围城打援、攻城打援、夺城打援等战法，统称为“吸打敌援”等。刘帅亲自总结的这些以弱胜强、机动歼敌的战法，好懂易记，往往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被广大指挥员娴熟地运用于战场，对统一作战思想和协调作战行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刘帅认为，战法是高明还是笨拙，检验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他说：“研究战术是拿它打仗的，能消灭敌人才算数。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他主张“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正因为如此，刘帅指挥作战，才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总是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创造性地用之于新的实践。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全面游击战争，创造了三天内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伏击日寇，被誉为“重叠的待伏”的作战范例。在范村，我以 4 个排对敌步骑炮兵 700 余人，激战两天，敌伤亡 600 余人，而我未折一兵一卒。在潞城神头岭，我攻敌一点，打敌二援，被日军叹服为“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斗”。在香城固，我以弱诱敌，把伏击发展为机动的围攻，成为反“扫荡”中的模范诱伏战斗，等等。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根据不断变化着的敌我情势，继续创造了一系列大兵团宽大机动、机动造势、寻机歼敌的光辉战例。比如，因兵力运转灵活迅速，处处争取主动，计划周密，善伺机会，巧于出奇制胜而令敌人折服的上党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采用“猫盘老鼠”战法，将敌盘软后再吃掉的平汉战役；被毛泽东主席称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典范

的定陶战役；采取“纵深闪击”战法，在敌纵深大踏步的机动，从侧背兜击割裂敌人的鄄城战役；采取“攻其一点，吸其全来，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的鲁西南战役；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小的模范战役”的襄樊战役；“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歼灭敌人终”的双堆集歼灭战；挥师渡江，长驱直入浙赣线，扩大京沪杭会战；以大迂回、大包围、远距离奔歼的成都平原围歼战等。

这些脍炙人口的战术要诀、用兵如神的光辉战例，雄辩地证明了刘帅指挥作战的雄才大略和高超艺术，显示了他不拘一格用战法的智慧和胆识。这对我们探索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

刘帅历来认为：“物质是变动的，环境是迁移的，昨天的正确战术到今天不一定是正确的了。”在全国解放以后，刘帅敏锐地认识到，“我们军队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现在又要向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变了”。这一次转变，要比以前历次转变都大得多，任务也重得多。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化转变，创立新的军兵种学术，探讨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方法，将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而从制度上、条令上规范诸军兵种的协同动作，则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基本任务。

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是实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基础。早在我军刚刚步入和平时期的50年代，刘帅就面向世界，着眼未来，提出了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为轴线，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大思路。他主张以协同训练为核心内容，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以干部培养为重点，把办好院校摆在优先地位；注重吸收世界先进军事科学成果，努力缩短我军与世界先进军事大国的差距。刘帅指出：“现代战争在主要战场上的正规战，是诸兵种的合同战斗。”军队的协同作战，已成为研究现

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课题。有效地使用现代化装备和善于组织各军兵种协同动作，是摆在全军面前的严重任务，也是指挥院校教育训练的基本任务。为了研究现代战争，迅速提高我军打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能力，他主动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恳切请求中央“让我去办院校”。在军事学院时，他“三更灯火五更鸡”，拿着放大镜校订和审定合成战术教材；亲自组织了临淮关协同作战实兵示范演习，率先垂范探讨合成训练的新路子。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的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他亲手培育的大批干部，已成为我军继承和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栋梁之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刘帅“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刘伯承元帅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组织指挥了数以百计的战斗，无论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阵地战，无论是对国内敌人作战还是对国外敌人作战，从小规模的战役战斗到百万大军对阵的大会战，都是在以弱胜强、以劣胜优这一基本态势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特质就是以弱胜强。刘伯承的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和具体战法，正是从这个特质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在未来的高技术战争中，武器装备的重大进步，尽管会引起作战思想和战术原则的重大变革，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创造的反映战争基本规律和作战基本原则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将永远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

邓小平同志在给军事科学院的题词中指出：“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刘伯承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发展的思想理论和光辉实践，是继承我军优良传统的重要方面。他对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求真求实和标新立异精神，是研究开拓现代条件下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

争战略战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发掘和探索刘伯承给我们留下的军事理论宝库，让他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大放光彩，熏陶、感染和激励更多的后来人。

（参与本文执笔者　苏志荣大校）

学习刘伯承关于深入敌后作战的几点体会

杜义德

1947年7月至9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其它解放区战场的有力配合下，首先出动，强渡黄河，挺进国民党战略要地大别山地区，调动敌人回援，在外线歼灭敌人，创建中原解放区，从而迅速地促进了战略形势的根本转变。跃进大别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军以大兵团，远离根据地，深入敌人后方，进行无后方作战。这个决策及实施，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实践和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我作为刘伯承同志的老部属，在刘伯承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回顾跟随"刘邓"深入敌后作战的经历和经验，谈几点深入敌后作战的体会，以纪念敬爱的刘伯承同志。

（一）

深入敌人后方作战必须做好准备，大兵团进入敌后作战，尤需如此。这种准备，需要在战略防御阶段，特别是这个阶段的后期，积极地进行。思想准备是首要的准备。深入敌后作战，必然会引起部队思想的巨大变化，同时又是对部队的严峻考验。因此必须及时地有步骤地对全体指战员讲清形势、任务、战略方针和领导上的决心，讲清完成这一任务对全局的作用，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尤需教育干部要从最困难着想，启发部队的高度责任感、荣誉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全体指战员坚决完成这一艰苦的战略任务。只有如此，才能临危不惧，知难而进。同

时，还必须加强三大任务的教育，做好到新区去执行打仗、发动群众、筹粮筹款这三项任务的准备。

政策的准备有着决定的意义。对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应事先进行学习和研究。军队的一举一动，处处都体现党的政策。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有力工具，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按党的政策办事，积极对新区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是人民军队的重要政治任务。

要对敌情、新区的群众条件、阶级斗争状况、经济状况、气候、交通、地形等条件进行调查研究，这是考虑作战和根据地布局的必要前提，也是决定政策的依据。

干部的准备是决不可少的，必须准备军队和地方两套干部。军队干部又要有野战军和地方军两套；地方干部则要有党、政权、财政经济、群众组织等方面的干部。所有干部都要准备打游击单独坚持斗争，都必须军事化。同干部的准备相关连的，是组织机构的准备。要根据事先规定的区划，组织好各级党政军的机构并配好干部，以便随着军队的展开而各就各位，迅速开展工作。

进入敌后作战，军队供应主要依靠就地取给。物资器材准备必须适应部队轻装远行的要求，除必要的弹药、医药、经费外，笨重的装备和不必要的物资要坚决留下，以免妨碍行动。

作好这些准备，就可以使指战员首先是使干部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争取战争的胜利。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胜利。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服从总的战略决策，要迅速进行，而决不能延误时机。一声令下，就必须不顾疲劳，不顾困难，不顾暂时的某些损失，不顾严重的敌情和任何自然障碍，迅速向敌后挺进。当然，所谓准备好总是相对的，不能一切准备齐全了才行动，好些情况要到敌后才能摸清，许多问题要边斗争边解决。我军跃进大别山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二）

深入敌后作战，指挥员必须树立战略全局的观念，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不能贪图小便宜，因小失大。在我军突破敌防御地带，举行千里跃进时，中途即便有某些战机也不恋战，而以雷霆万钧之势，昼夜兼程，打破敌之追击和拦阻，克服重重障碍，直奔战略目标，先敌进入，先敌展开。

一进入战略目的地，主力即应乘虚展开，迅速捕歼敌之地方武装，掩护我地方党政机关迅速铺开工作，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寻机歼敌，以打破敌人的进攻。

反动地方武装是地头蛇，是敌正规军的耳目手足，是我集中兵力寻机歼敌、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的障碍，因而歼灭反动地方武装，尤其是聚歼大片的地方反动武装，其意义并不亚于歼敌正规军。我军在展开过程中即迅速捕歼各县反动地方武装。如1947 年 12 月 3 日聚歼鄂东北麻城等数县保安团骨干及残部 2000 余人的宋埠战斗，1948 年 1 月中旬在桐柏区聚歼敌 11 个保安团万余人的邓县战斗等，就是很好的例子。进入敌后作战，应尽力捕捉战机打歼灭战。这对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振奋民心，补充自己，争取休整以利再战，有重大作用。这就要掌握“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不打则已，打则必胜。1947 年 10 月 8 日在安徽西部六安、舒成地区歼敌一个旅及一个师部的张家店战斗，同年 10 月 27 日在湖北东部广济、浠水地区歼敌一个整师及一个旅的高山铺战役，就是很好的例子。

进入敌后作战，需要选择地形险要、群众条件较好的地点，建立临时后方，以便部队轻装和有依托地进行机动作战。这种后方的建立，必须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同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地方政权，组织群众等任务结合起来。

在执行歼灭敌人、发动群众两大任务的时候，要善于灵活运

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的原则。无论是野战军和军区部队都要善于运用集中与分散的原则，不失时机地拖住敌人，歼灭敌人。但一般地说，野战军应以集中歼灭敌人为主，军区部队应以分散发动群众为主。我军分散时，必须照顾到下一步的集中。集中歼敌成功时，应抓住敌人由于害怕分散被歼而集中行动或集结据守要点的时机，扩大战果，发动群众。歼敌不成功时，要迅速脱离敌人，或再度分散，创造新的战机。我军分散时，常可诱使敌人也分散开来，这时我要善于迅速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部。对敌地方武装则往往相反，由于我积极活动，到处歼灭其分散的地方武装，便会迫使其集中活动或固守要点，有利于我相机将其一网打尽。

在深入敌后作战时，要善于处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关系。要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要求我们执行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的原则；但为发动群众，创立根据地，又必须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放在重要的位置。当敌人和我争夺战略要地，集中兵力向我进攻，在敌情、地形、供给等方面都不利于我集中歼敌时，就必须以分散的游击战争和打小歼灭战为主。经过反复斗争站稳脚跟之后，又必须以军区部队单独坚持游击战争，拖住大量敌人，主力则适时集中转移到有利于机动的战场打歼灭战。

深入敌后作战，要善于处理内线和外线的配合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我军以野战军主力由内线转入外线，执行战略进攻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打破敌人继续把战争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战略方针，同时以部分野战军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留在原地区，在内线歼灭敌人，这是战略上的内外线配合。我进入敌后作战的部队，必然引起敌人的围攻，我又处于内线作战。这时，以一部在内线坚持，而以主力跳到外线，或与邻近地区的部队形成犄角之势，互相配合粉碎敌人围攻，这又是一种内外线配合。善于运用内外线配合，对于调动敌人，抓住敌人弱点，捕捉战机，歼灭敌人，有重要意义。如 1947 年 12 月，敌集中 33 个旅对大别山大

举围攻时，华东野战军一部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另一部在平汉线郑州至武汉段发起大破击战，我进入大别山区的部队以一部坚持内线斗争，同时以3个纵队分向桐柏、江汉、淮西作战略再展开，跳到外线打击敌人，终于巧妙地运用内外线结合粉碎了敌人的严重围攻。

深入敌后作战，保证军队供应是个大问题。要反对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只顾解决给养不顾党的政策，只想到这一步不想到下一步的错误观点，同时也要防止和克服不敢大胆解决大兵团赖以生存的吃饭、穿衣等问题的片面群众观点。要使群众也了解，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必须服从于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要节约人力物力，树立长期打算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在部队工作中，要把抓后勤供应、抓部队生活放在重要位置。

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特别是插入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由于敌情严重，群众尚未发动，作战、行军和生活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加强战时思想政治工作，发扬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对于团结自己，战胜困难，打败敌人，意义很大。我军在千里跃进中，部队士气昂扬，能够排除万难，连续作战，根本经验就在于此。但也有些干部叫苦，叫困难，怕伤亡，怕减员，有些单位纪律松懈。因此，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必须反消极，鼓斗志。要不间断地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激发部队不怕敌人，不怕困难，不怕无后方作战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发扬共产党人、革命战士越困难越团结的高尚风格；发扬艰苦朴素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办好事的光荣传统。要严格整顿纪律。各级领导干部尤需以身作则，否则就不可能团结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甚至会因为站不住脚而失败。这是各项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在敌后作战，情况瞬息变化，政治思想工作特别要加强战斗性、群众性、及时性、不间断性和灵活性。

瓦解和争取敌军，在敌后作战比在老根据地作战其迫切性和

可能性都更大。在进入敌后之前，应释放一批经过初步改造，表现较好的中、下级俘虏军官，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作战中尤其要重视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要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积极开展对敌宣传攻势，普遍调查和争取当地敌军家属，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

要和敌人反革命的总体战针锋相对，在对敌人展开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同时，还要展开经济的、文化的斗争，领导群众进行反对敌人抓丁、抢粮、烧杀的斗争，保护群众利益，通过各种形式，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我党我军的胜利和主张。

（三）

没有战略基地，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深入敌后作战，当我们站住了脚跟之后，就要进一步解决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这时，在军事上，需要由军区武装坚持内线作战，开展游击战争，野战军则转到外线，在有利的战场，汇合友邻部队，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我之主力转到外线，也必然会调动窜入根据地的敌人，从而有利于内线的坚持，大大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使根据地出现比较稳定的局面，有利于发动群众和根据地的巩固。

根据地由开辟阶段到巩固阶段的过程，就是由军事胜利打开局面到深入发动群众的过程。深入发动群众，是根据地巩固的主要标志。军事胜利打开局面之后，就要抓紧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发动群众首先要组织力量。军队、党和政权工作的力量，都要把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面。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更好地建党、建军、建政。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深度，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而决定的。因此，既要反对不敢发动群众的保守思想，又要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觉悟程度的急躁和蛮干情绪。这样，才能有效地团结和争取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站到我军方面，有利于孤立

与打击少数顽固的敌人，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

随着群众的发动和地方党、政权的建立，开辟阶段许多原来由部队担任的工作，就要逐步转移到地方党和人民政府手中去，部队供应也要由军队就地取给改变为政府统筹统支。这样，有利于稳定人心，巩固根据地，支持长期战争，也可以使军队集中精力执行作战任务。

为要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就要力争使几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因而必须强调各根据地互相配合，积极地进行打破敌人分割的斗争。要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展开全面的斗争，把敌人线线切断，点点包围，使敌人陷于支离破碎、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

各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互相结合的。巩固阶段必须反对保守主义，积极把战争继续引向敌占区。但向外发展，又不能放松深入发动群众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并且要积极打击敌人的蚕食和进攻，求得巩固地向前发展。巩固和发展两个环节，要根据情况在各个阶段有所侧重。

邓小平同志说："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在未来战争中，比之过去进行的战争，将有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这就要向刘伯承同志那样，善于研究新情况，钻研新问题，不断为推动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发展作出努力。

战略家刘伯承

杨国宇

刘伯承的战略思想精深博大，十分丰富。他在军事谋略和作战指挥中，一贯重视战略问题，善于从战略全局来论兵用兵。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和邓小平不仅重视研究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而且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认清自己所处的这个局部的地位和作用，寻找和把握有利于全局的契机，决定自己的行动。为了全局的胜利，甘愿挑重担，甚至牺牲局部也在所不惜。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毛泽东不仅总把刘邓大军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执行重大的战略任务，而且在革命战争的重大关头，往往请刘伯承参与研究重大战略问题。例如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行将结束时，毛泽东即电告淮海前线："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①即使在他晚年身体欠佳之时，中央军委还委派他担任战略小组组长的职务。历史已经证明，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为毛泽东军事科学体系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他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已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仅就个人的见闻和学习体会，对刘伯承在我党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几个历史关头所起的重大作用，试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历史上曾有过以作战形式的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三次军事战略的转变：第一次是从国内游击战争到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第二次是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

变；第三次是从抗日游击战争到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的军事战略正处于第二次转变时期。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这是在“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即“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刘伯承当时虽然立足于一二九师的局部，但他时时着眼于全局，敏锐地观察着战略形势。他深深懂得，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部署，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全局出发的。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决策，才能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党我军，积蓄革命力量，建立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最后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他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之后，同邓小平一起，有计划有步骤地先后实施两次战略展开。首先，部队在晋东南、冀西展开，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继而以太行为支点，分兵向冀南、豫北发展，把山区和平原联结起来，相继建立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控制了东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到沧石路、正太路，南到陇海路及黄河的广大地区，并贯通了同晋绥、晋察冀和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晋冀鲁豫区军队已从抗战初期的近万人发展到 30 万人，民兵 40 万人，拥有人口 2400 多万，成为我党最大的根据地之一。它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解放战争初期又成为抗击国民党军向我华东、东北、晋察冀、西北解放区进攻的中央大门。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能在晋冀鲁豫区得到如此圆满贯彻，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特别值得加以剖析：一是在抗战初期全力抓了太行军民战略思想的转变；二是在严重的斗争关头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行动。下面先说第一点。

刘伯承在抗战初期抓太行军民的战略思想的转变，首先是抓

好一二九师本身的转变。我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加上一部分陕北红军改编而成的。当时华北战局已十分危急，因此，不待改编就绪，就开赴抗日战场，转战于同蒲、正太沿线。其间，虽然成功地进行了夜袭阳明堡、伏击七亘村等著名的战斗，但总的来说，不少指战员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对游击战的战术更是十分生疏，有的甚至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持怀疑和抵触态度。刘伯承敏锐地看到，这支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部队虽然英勇善战，但是如不迅速完成这个转变，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计划就有落空的危险。1937 年 11 月 15 日，进驻辽县（今左权县）城的当天，刘伯承师长就召集有关人员布置办游击训练班的任务。他指出：今后华北抗战的重担就要落在八路军的肩上了。全师排以上干部和地方县、区级干部争取一年内都要轮训一遍。刘伯承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与游击战结下了不解之缘，发表过很有见地的军事理论。他在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建树，为毛泽东同志游击战争战略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辽县培训游击干部的过程中，刘伯承不断总结游击战的新鲜经验，发展和完善了组建游击集团的组织形式和开展游击战的理论，并亲自写教材、讲授课程、写文章、作报告，把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心得和实践经验传授给广大骨干。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展起来之后，他又及时总结了袭击、破路、劫车、断敌交通、麻雀战等经验，及时向部队推广，使部队的战略战术水平迅速提高。不仅如此，刘伯承多次出生入死，亲自组织指挥了一系列著名的战斗，特别是设伏神头岭的战斗，打得日本侵华军心惊胆战，惊叹为“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刘伯承正是由于在战略转变的重要时刻抓住了主要环节，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来武装太行军民，从而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壮大人民武装、坚持敌后抗日战争、建立根据地开创了局面。

再说第二点。刘伯承提出敌进我进的战略战术思想，用进攻的手段打破敌人的进攻，大大改变了斗争的局面。众所周知，在

抗战初期，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我军不仅人数少，连枪支也不足。开始，日军并没有把我们八路军放在眼里。等到吃了几次大亏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华军提出“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的口号，对我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辗转抉剔”等毒辣手段，实行“三光政策”，反复“扫荡”，企图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对我边沿地区则进行蚕食，步步推进。对敌占区则加紧搜括人力、物力，以达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我抗日军民要生存下去都十分困难，发展壮大就更是不易了。为了扭转斗争局面，刘伯承创造性地运用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战术思想。这是对“敌进我退”原则的一个发展，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在战略上，“敌进我进”是指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战役战术上，是指以一部或主力机动到敌人侧背拊击敌人，以进攻打破敌人的进攻。根据这一战略战术思想，我一二九师在抗战初期就以团或旅的机动，在当时敌人的重兵集团进攻中选择弱点，拊其侧背，取得了阳明堡、长生口、黄崖底、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并顺势转入敌后，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尔后，又派遣部队到冀南依靠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与山地游击战争相策应，进而发展了鲁西北、冀鲁豫根据地。在根据地一度被压缩、分割的严重形势下，我以武工队、小部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进而逐步逼退敌人，把敌占区变为抗日根据地。在刘邓指挥下，晋冀鲁豫区广大军民机动灵活，神出鬼没，使日军企图将我“一网打尽”的阴谋一次又一次落空。在空前残酷激烈的斗争中，抗日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自己。这一切，为尔后对日军进行大反攻和在解放战争中抗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

我党的军事战略从抗日游击战争到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是在更为紧迫的情势下进行的。抗日战争胜利时，我晋冀鲁豫区周围的敌情是：日伪军已被迫退守铁路沿线，但拒绝向我投降，甚至还在继续骚扰。而蓄谋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已驱使国民党军队向晋冀鲁豫区推进，并企图在日伪军的接应和掩护下，经同蒲、平汉、津浦铁路向平津前进。这样，处于战线中央的刘邓野战军就首当其冲。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晋冀鲁豫战略区一开始就处于针锋相对的“针锋”上。这也就是说，解放战争的第一仗的序幕要在晋冀鲁豫区揭开，它对全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当时，部队还处在分散游击状态，而敌人已经重兵压境，情势十分紧急。由于刘伯承和邓小平善于“就大势与局部沉思”，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领会透彻，做到了全局在胸，因而对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看得准、抓得狠。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刘邓就从延安电令晋冀鲁豫区各部队立即从分散游击状态转变到组建、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路进犯的国民党军。飞返晋冀鲁豫区后，刘伯承不失时机地起草了《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明确了打运动战的战法，统一了部队的战术思想。当阎锡山军以13个师的兵力自临汾、太原向上党进攻时，刘伯承正确果断、机动灵活地指挥部队彻底消灭了进犯之敌，打赢了解放战争第一仗。接着又在平汉线进行了邯郸战役，歼灭国民党2个军，另一个军起义。这两个战役对战略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不仅标志着我党军事战略转变的胜利，也保证了我党在政治战略上大大加强了同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的地位。

为了使部队广大官兵都能自觉地贯彻党的军事战略思想，为赢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发挥最大的作用，刘伯承反复强调晋冀

鲁豫是东南西北四面都可支援配合友邻作战的“四战之地”，号召部队不要辜负“四战之军”的光荣使命。刘邓一再表示，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就是牺牲局部也在所不惜！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施战略上从中央突破的伟大壮举。当时，蒋介石手中还握有几百万大军，无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仍占优势，而且控制着全国广大地区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了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的决策，准备派晋冀鲁豫野战军担负“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的战略出击。刘邓深深懂得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因为我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迫使国民党军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但是，刘邓也清楚地看到，率领十几万大军，不要后方，长驱直插敌战略纵深，在四面包围之中进行作战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毛主席对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的前途作过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指出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去争取最好的前途。刘伯承和邓小平一起，毅然肩负起这一重担，并以自己这种坚强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十几万大军统一了思想，同心同德，排除万难，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大别山地区站稳了脚跟。这一胜利，调动了山东、陕北两重点战场的敌军主力，把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的战略前进基地，并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使中国革命进程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中共中央于 1947 年 12 月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毛主席说：“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接着，刘邓奉命转出大别山之后，又提出了“向西！向西！向西！”的新战略，刘邓大军与陈粟、陈赓部“三路野战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 多个旅中

约 90 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毛泽东语）②这充分体现了挺进中原对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

毛主席说："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又说："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时"'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③刘伯承的战略眼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表现在他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领悟透彻，因而与中央的意图息息相通，在使用局部性的东西时常常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在淮海战役中，他提出攻克宿县的建议就称得上是"神来之笔"。当时，毛泽东主席已提出了在战役第一阶段"直出徐蚌线"的战略构想，但非常不容易实现，因为我军各部都各自担负着对敌的包围、牵制等作战任务，刘邓所部刚经历过大别山的艰苦斗争，人数大为减少，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毛主席事后也说：在战役发起前，对隔断徐蚌，使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④面对这一切，正在西面担负揪尾任务的刘伯承，密切注视着敌我态势的变化，于 1948 年 11 月 3 日向中央军委并陈、邓提出了应力求首先攻夺宿县截断徐蚌铁路，斩断敌军中枢的建议。他认为蒋军虽众，其补给线只有一条津浦路，其重要补给基地和交通枢纽就在宿县。攻克了宿县，在兵法上是做到了"攻敌所必救"，各方面的敌人必然都会来援，这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敌人就会由主动陷入被动。党中央、毛泽东采纳了刘伯承的建议，并作出了进一步的指示。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攻克宿县这一着棋使全局皆活，使各处敌人欲援不得，欲逃不能。于是，才导致了黄维兵团被围于双堆集，导致了杜聿明被围于青龙集，把整个淮海战役搞得高潮迭起，有声有色，而敌人则处处被动，只有灭亡。

（三）

我党历史上以作战形式的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三次军事战略转变，固然各有其独特的内容和明确的转变标志，但不同的作战形式又不是截然分开、互不相关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作战形式都是为战争目的服务的，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刘伯承在谋略和指挥中，不仅吸取了古今中外有关这三种作战形式的战争经验，而且还多次详细阐述了这三种作战形式的特点、相互区别与相互联系。尤其是把这三种作战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融合、相互转换，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在实际运用时从不机械、教条，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中说：“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英明的指示：‘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我们一般是执行了这个指示，因而取得了相当的胜利。我们在上述的第一个时期，在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中，特别在日寇用兵狂妄的有利条件下，曾常以正规军作大踏步的进退，取得了运动战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在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下，运用宽大机动的理论，在广阔的战场上大量地歼灭敌人。而另一方面，只要条件许可，也配合以阵地战。例如在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就是“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刘伯承对作战形式的运用之妙，真达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程度。在进军大西南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全面分析了敌情，判断敌以为我必定由陕入川，故把防守秦岭作为其重点的重点。刘邓以其高度的智慧和创造性，拟定了进军西南作战的要旨：避开敌人的正面防守，出其不意地实施千里大迂回、大包围（实际行军里程达两千公里，四兵团达四千公里），突然掀敌侧背，断敌逃路，各个歼灭。这种气势非凡的部署，确实是大战略家的手笔，蒋

介石及其高级将领一个都没有料及。为时40天的川黔作战，就歼灭敌军1个兵团部、10个整师及51个师的大部，解放了重庆、贵阳等132座城市。于是，蒋介石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也就成为瓮中之鳖了！

刘伯承在其一生中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最为特殊、最为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全过程。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基本态势下，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战役到数十万大军对阵的大会战，战争的对象、形式和特点都在不断地变化。要解决这些崭新的课题，既不能单纯依靠古人的经验，也不能生吞外国的教条，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刘伯承就是这样在战争中不知疲倦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刘伯承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杨闇公早在20年代就赞为“天才”，是他亲自与吴玉章一起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刘伯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征途中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卓越的军事家。邓小平的评价是：“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我虽然有幸在刘邓麾下13年，但由于自己学习不够，认识肤浅，以上的点滴体会很可能挂一漏万，甚至难免有错。只希望能与大家一起探讨、研究，为继承和发扬其军事思想宝贵财富尽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注　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66页。

②《刘伯承军事生涯》第264页。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④《刘伯承元帅研究》（二）第201页。

论刘伯承在战略进攻中的创造性实践

王普丰少将　王辉青少校

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是中国革命战争史册上波澜壮阔的篇章，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胆魄和丰功伟绩。其中，刘伯承元帅的创造性实践又别具特色，对丰富和完善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在战略防御阶段预筹战略进攻

刘帅是一位在战略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总是能够深刻地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透视敌我战略态势，预见战争发展的趋势，从全局利益出发筹划自己指挥的局部。最可贵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尚处于战略被动的情况下，他就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防御作战与尔后的战略进攻有机地衔接起来，予以通盘考虑。

早在1946年6月，毛泽东、中央军委对于南线我军的外线进攻作战就有了设想，提出：在形势有利的条件下，"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①7月，中央军委根据战局发展的具体情况，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到外线"②。1947年1月，又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准备在5、6月间举行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③。可见，在适当时机以我军南线主力出击外线，是毛泽东、中央军委筹划解放战争的一个基本战略考虑。

对于这个战略设想，刘帅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联系本区的战略地位形象地指出，晋冀鲁豫好比"解放区的大门口"，晋冀鲁豫

野战军不仅要在战略防御中把好“大门”，还要准备将来从“大门”反攻出去。他还说，“我们守着大门口，是四战之地：东配合山东，南配合中原，西配合陕北，北配合晋察冀。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兢兢业业挑起担子。”④基于对所处战略地位的深刻理解，刘邓要求部队在完成好战略防御任务的同时，以积极的作战行动为尔后的战略进攻作战创造有利的态势。一是多打胜仗，陷敌于被动。刘帅指出，战略防御作战必须坚决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方针，一旦“消灭相当数量的蒋军主力，我军大举反攻的局面即将出现”⑤。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晋冀鲁豫军区在与友邻部队的相互配合中，歼敌正规军30个旅，近30万人。由于敌机动兵力被大量歼灭，国民党为维持在山东、陕北的攻势而不得不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当面转为局部守势，而晋冀鲁豫部队则逐渐取得了相对主动的地位，这就为转入战略进攻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态势。二是结合战役性外线作战，为向南进击“探路”⑥。在战略防御阶段，晋冀鲁豫部队曾两次南出陇海线。这两次转出外线的作战，在战略上除了策应中原、华东我军外，另一个目的就是为挺进中原“探路”。故此，刘帅意味深长地将这两次作战称为“试探性的突破”⑦。通过两出陇海线，晋冀鲁豫部队以实际的作战行动探查了前出道路上的敌情、民情和战场条件，摸索了大兵团脱离后方机动作战的经验，也使部队得到了相应的锻炼。三是在战略反攻中进一步创造出击条件。1947年3月至6月，晋冀鲁豫部队在豫北、晋南战场相继发起战略反攻，不但有力地策应了华东和陕北我军的作战，而且扩大和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为挺进中原创造了出击条件。四是适时加强当面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以将敌人防御体系压缩到少数孤立据点或狭小地区守备，为尔后的战略进攻开辟前进道路和机动作战的战场。

刘帅对于在战略防御中积蓄力量的问题也十分重视。由防御转入反攻和进攻，是战略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实现这个转变，既有赖于通过多打胜仗削弱敌人，也有赖于通过努力建设发展自己。

早在1946年11月，刘帅就强调“在长期的战争中，我们不但要使用武力，而且要积蓄武力”⑧，并着重指出：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相比，解放战争的反攻和进攻作战的任务将更加艰巨，斗争将更加残酷，因此更要下大力建设好人民武装力量。刘帅尤其重视作好充分的干部准备，并特别强调：部队干部不仅应当善于做军事工作，还要学会做地方工作，以利于在执行外线作战任务时，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斗争。刘帅还十分注重作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准备。他指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⑨因此，积蓄力量不仅要努力发展人民武装，而且要大力加强解放区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使之成为我军建设和作战的可靠基地。这些筹划对于迎接战略进攻的到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深远的战略预筹，所以在内线的反攻与外线的进攻之间只有短暂间隙的情况下，刘邓大军能够不失时机地转入战略进攻，有力地贯彻执行毛泽东、中央军委的宏筹大略。1947年5月，中央军委指示南线我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⑩。此时，刘帅对于大反攻前夜的战略态势和本部将要担负的战略任务已了然在胸。刘帅指出：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之后，企图采取有重点的“钳形攻势”，将主要进攻指向山东、陕北两区，而在我当面则部署所谓的“黄河防线”，作为联结两“钳”的“铰”即战略支点。但是，这个战略支点已处于被动之中，成为战略弱点。他比喻说，敌人的这种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意图，就是要抓住敌人的要害和薄弱部分，实施有力的中央突破，使之成为转换全局的战略枢纽。遵照军委指示，刘邓大军遂在原有准备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了出击直前的各项准备，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毅然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二、史无前例的千里跃进和战略展开

解放战争南线我军的战略进攻，是按照毛泽东筹划的“三军配合，两翼箝制”的部署进行的。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实施主要突击，以品字形阵势展开，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其中，刘邓大军担负着率先实施中央突破，跃进至大别山地区展开，建立战略进攻前进基地的重任。这个战略行动在军事学术上是一个创举，它充分体现出刘邓实现军委战略意图的坚定性、灵活性和创造性。

在战略进攻发起之初，作战指导上的首要问题是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打开战略进攻的出击通路。为此，刘帅精心指挥了强渡黄河的作战。刘帅把主要突破方向选在鲁西南的濮县至东阿之间。这个河段虽然河宽水深，但敌人自恃这一天险可抵“四十万大军”，其守备力量相对薄弱，利我迅速突破。而且，由此突破东有华野部队支援，南有豫皖苏区地方武装策应，还有较为宽阔的战场，便于协同作战，发展进攻。围绕着主要方向上的作战，刘帅采取了声东击西，支作战配合主作战，以及多点强行渡河与秘密渡河相结合的打法。结果我军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一举突破敌人“黄河防线”，克服了南进路上的第一道障碍。当我突破“黄河防线”之后，敌人急忙调动部队来援，企图逼我于狭小地区作战。刘帅将计就计，采取“攻敌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乘势发动鲁西南战役，歼敌 9 个半旅和 4 个师部。刘帅指出，鲁西南战役的实质是战略突破⑪。它在国民党统治区战线中央打开了缺口，这样既削弱了其东西两翼的战略联系，又使其腹地暴露在我军面前，以致迫使其从战线两端向中央缩拢，其战略部署被进一步动摇。这个战略突破，为我军向敌人纵深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同时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两区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扩大我军在突破敌中央防线之后取得的主动地位，使之发展为牵动全局发生有利于我之根本变化的战略枢纽，这是需要审慎处置的关键问题。着眼于此，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⑫。刘邓深明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心放弃原定于鲁西南战役之后稍事休整的计划，抓住敌人作战部署尚未调整完毕之机，提前执行挺进大别山的任务。为此，刘邓在结束鲁西南战役之后，立即率领十余万大军隐蔽突然地直向大别山猛进，不惜流血牺牲，也不惜舍弃重装备，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慨，突破了敌人的层层拦阻，胜利地完成了跃进千里的壮举。刘帅曾经指出，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独特的进攻样式”⑬。这主要是指在突破敌人战略防线之后，随即实行了深远的战略跃进，即：不象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刘帅称这个战略进攻样式体现了“人民的战略”，认为它“不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而是贯彻着“从人民的本质上发挥一切力量”的人民战争思想⑭。刘邓大军成功地实践了这个跃进的战略进攻样式，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跃进至大别山之后，刘邓大军随即实施了不同寻常的战略展开。刘帅指出：“我军深入到敌人战略纵深地带，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实施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⑮当时，刘邓大军面临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大兵团脱离后方依托，深入敌战略纵深要地，面临重兵追击和围攻，部队尚不熟悉新的作战环境，战略展开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基础又曾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等等。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战略环境中，刘邓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成功地组织实施了战略展开。这个战略展开的主要特点：一是通过创建、巩固、再扩大大别山根据地“三个回合”⑯的行动，逐次完成展开与再展开；二是战

略展开的基本内容是“歼灭敌人与进行土改”⑰，依靠这“两个轮子”⑱开辟根据地，而不单纯是建立军队作战部署；三是不仅有在大别山地区的内线展开，还有转到桐柏、江汉和淮西等地区的外线展开，由此形成了内线和外线相互策应的局面，从而继续保持了战略进攻的主动态势，并加强了与友邻部队的相互配合与支援。由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展开，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建立了巩固的战略进攻前进基地，恰似一把利剑插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至此，刘邓、陈粟、陈谢三军鼎立的战略进攻部署业已完成，逐鹿中原的斗争随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对于这个战略性胜利的意义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⑲

在外线作战中执行带有战略性的防御作战任务，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又一重要特色。刘帅指出：“我军跃进大别山后，从全国战局来说，我们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我们则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了。”⑳在战略上是前进了，在装备、供应方面却后退了，部队一举一动都受到无后方作战的严重困难。所以，大别山地区的内线反围攻作战是战略进攻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前所未遇的新问题，也是作战指导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刘邓对大别山斗争的战略特点作了正确的分析，认为：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只是战役进攻，它发生在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因此，大别山地区的防御作战要从全局着眼，既应坚决地粉碎国民党重兵的追击和围攻，又要有力地配合其它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促进全国战局的发展㉑。刘邓大军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的防御作战，贯彻了这个指导思想，其主要特点是：防御作战服从战略展开的需要，如阻击追敌，掩护战略展开等；灵活运用集中与分遣的方法，集中野战军打大仗，分遣军区部队占地盘；内线部队与外线部队密切配合；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国民党军队于大别山周围，以此支援其它战略区。同我军在战略防御中积极实行的

攻势行动丰富和发展了战略防御的理论与实践一样，刘邓大军在外线作战中成功实施的防御作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战略进攻的理论与实践。

三、在中原逐鹿中斗志斗法决战决胜

我军在中原战场完成战略展开之后，逐鹿中原的斗争便随之进入决战阶段。此时，国民党的战略进攻已被彻底打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举行了全面的反攻和进攻。中原决战，是决定中原斗争胜负结局的最后搏斗，也是解放战争总决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帅指出："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协同互助中，我们南线解放军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鲁西南实施战略突破，粉碎了蒋介石钳形的重点进攻起，迄一九四九年一月完成淮海战役，又粉碎了他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战略防御为止，借用一句老话来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可谓'中原逐鹿'，而鹿竟死于南线解放军之手了。"㉒

中原决战，由一系列战役组成。刘邓大军主力同陈粟、陈谢两军会师中原后，三支大军遂密切协同，接连实施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重要战役，"纵横驰骋，扫荡中原"㉓，粉碎了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随后，中原野战军（1948 年春由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而成）和华东野战军（1947 年初由原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合编而成）又协力举行了淮海战役，把中原决战推向高潮。正如刘帅所总结的那样，"这三军在布成品字阵势之后，通常互为犄角，作向心的机动，以突击敌人。其协同动作的密切，随着不断的胜利面日甚一日，以至最后会合一个战场，完成了淮海战役。"㉔在这气势磅礴的决战历程中，刘帅亲临沙场，直接指挥或参与指挥了几乎所有重要战役，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解决了诸如大兵团协同、机动、攻坚、合围等一系列战略进攻的军事学术问题，发展和创造了与之相应的战法，其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日臻完善。其中，刘帅参与指挥的淮海战役，尤其充分地展示出他

全局在胸，善于用兵布阵，斗志斗法，围歼敌人重兵集团的决胜之道。在整个战役的筹划和实施过程中，刘帅始终关注着如何协调地运用两大野战军合力歼敌的问题。他抓住决战的关键环节提出战略性建议和实施指挥，为赢得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密切协同，组织有力的战略牵制作战。淮海战役是在我军战场总兵力与敌军大致相当的情况下，由战役性歼灭战发展起来的战略性合围战役，当时敌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战力尚强。因此，为达成歼灭敌人的目的，在作战指导上除了需部署强有力的主作战外，还需围绕主作战部署足以牵制和割裂敌人的支作战，并使两者取得密切的协同。1948 年，中央军委指示中野在全国战场的攻势中协同华野作战，歼灭中原敌人，解放全中原㉕。据此，刘邓指挥中野连续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作战，密切配合华野。其中，奔袭襄樊一役堪称战略牵制作战的范例。襄樊地处川、陕、鄂三省要冲，是江南的重要门户之一。刘邓料定攻取襄樊必能打在白崇禧集团的痛处，使之面临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遂在配合华野实施豫东战役即将结束之际，立即令中野一部冒雨开进，“乘机钻隙”㉖，直取襄樊。其后，中野又在江汉、鄂豫两地积极展开战略佯动，将敌张淦、黄维两兵团分别牵引向平汉路以西、不便机动、远离中原决战主战场的大洪山和桐柏山地区。中野的这些作战行动，锋芒指向中原战场西部敌人顾虑我军“过江”、“入川”的要害地区，切中敌中原防御体系的弱点，攻敌之必守，使其不能不防，尤其是白崇禧集团为“防我渡江”，只得以主要力量固守其“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而无法东顾㉗。这样，中野的牵制作战既有力地策应了华东战场，又进一步牵制和隔离了中原之敌，使之陷于更深的孤立和被动之中，为实施淮海战役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态势。可以设想，如果在淮海战役中敌得以腾出白崇禧集团之 2—3 个兵团一起压向徐州，将会大大增加我实施决战的困难。事实上，白崇禧敢冒违抗蒋介石命令之不韪，仅仅以黄维兵团驰援徐州，而将其它主力机动兵团留守华中的重要原

因之一，正是深感老巢武汉受到威胁。这一点，恰好说明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及其实施战略牵制作战的重要作用。

洞察战场态势，打击敌人弱点，造成合围之势。刘帅在指挥使白崇禧集团不得它顾的战略牵制作战的同时，十分关注整个战场的形势。他认为，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致命弱点在于其陆上补给完全依赖津浦一线，十分害怕此线被我斩断。因此，我在战役发起之初如先求控制徐蚌路，则可造成会攻徐州之势，此举必可动摇敌人防御部署。这是一个精敏准确的判断，刘帅据此提出的切断徐蚌间铁路以斩断敌人中枢的建议㉘又一次切中敌人要害，无疑完全符合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此后，遵照军委指示，中野及时实施了进击徐蚌路、攻克宿县的作战，不仅切断了徐州向南的战略联系，提前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而且因攻敌之必救，从而调动了敌人。这个行动，既有力地支援了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又为尔后作战创造了“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是我军胜利地完成淮海战役的一个关键之举。

分割、合围敌人重兵集团，逐个歼灭之。淮海战役前夕，刘帅还根据中原、华东战场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对即将到来的中原战场之最后决战作出了设想，提出此役将是两大野战军的大规模联合作战，打法是华野主力挟额、中野一部揪尾、中野主力斩腰。淮海战役的发展，证明了刘帅所作预想之精妙。战役发起后，中野部队除继续牵制华中之敌外，还担负了迟滞、阻击黄维兵团和牵制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任务，有力地保障了华野全歼黄伯韬兵团。随后，刘帅又与陈毅、邓小平等共同筹划了逐个歼灭敌重兵集团的作战部署。这个部署，被刘帅形象地比喻为“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即利用敌人被分割成几块的有利态势，先求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围困杜聿明集团，监视阻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歼灭黄兵团之后，即集中力量歼灭杜集团，尔后再视情况解决李、刘两兵团。按此部署，中野和华野部队密切配合，胜利地完成了淮海战役。

合围作战是战略进攻，尤其是战略决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个重大军事学术问题。刘帅认为，对于在装备和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我军来说，为达成合围歼敌的目的，在作战指导上必须善于在宽大机动中集中优势兵力，敏锐捕捉敌人弱点，关照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建立主作战与支作战密切配合的作战部署。完成合围之后，各部队必须机断行事，协同动作，实施有力的向心突击，坚决割裂敌人防御体系，各个歼灭敌人。这是刘帅合围作战思想的一些精要所在。在战略决战中，刘帅指挥的战略性牵制作战，适时提出的控制徐蚌路之良策，以及同陈、邓等共同筹划的“吃、挟、看”的歼敌部署，都极其准确地抓住了徐州之敌的要害和我两大野战军协同围歼该敌的关键问题，充分反映出刘帅筹划和指挥大规模合围作战的决胜艺术。

四、发展渡江胜势实施战略追击

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是战略决战的继续，也是战略进攻乃至整个战争的结束阶段。在这个阶段，刘邓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率领部队与其它野战军密切协同，乘突破长江天险的破竹之势，在广阔的南方战场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进攻和追击作战，为胜利地达成全歼国民党余部于国境之内的战略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象在以往每一次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样，刘帅对于战略决战之后的战略态势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同样作出了准确的分析和预见。还在战略决战将要结束之际，他就指出：目前敌我双方态势的基本特点是，我军乘决战胜利之势在长江北岸展开成“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处于争取最后胜利的攻势之中；而敌人方面则已现出崩溃瓦解之态，但仍有很大的可能依托长江天险组织战略防线，以求固守江南。据此，刘帅向中央军委建议，我军在完成战略决战之后，应首先着眼于“稳健地集中兵力”在长江沿线打一

个大仗，同时应及早为向江南发展战略进攻作出准备㉙。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建议。1949年初，中央军委决定集中百万大军实施渡江战役，求歼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统治中心京沪杭地区。这个新的战略行动将战略决战与战略追击连成一气，及时而有力地发展了战略进攻的前进攻势。

在渡江战役前夕，刘帅又对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的部署和渡江战役的可能发展作出了缜密的分析，指出：敌组织“长江防线”只能着重于采取“直接配备”，即将主力直接部署于长江南岸沿线。这样构成的防线前无有力的屏障，后无足够的防御纵深和机动兵力，加之全军上下士气萎靡，如同“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憾”㉚。基于这个分析，刘帅正确地预见到敌“长江防线”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迅速崩溃的极大可能性，要求所部作战中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发展连续挺进的攻势而得破竹之效率”㉛。这就为尔后将渡江战役不停顿地导向战略追击作战，确立了明确的作战指导思想。

渡江战役，是我军向江南进军的战略行动。根据战役发展情况，刘帅不失时机地率部直出浙赣线，将渡江作战导向大纵深的追击作战，使之成为我军在南方战场实施战略追击的一个重要先导。对于渡江作战的部署，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确定，战役分为三个阶段实施，同时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并指示“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㉜战役发起后，情况正如战前预料的那样，渡江作战发展顺利，南京及其以东守敌纷纷向沪杭方向退守，二野当面守敌则向南溃逃，企图依托皖浙边山区，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组织新防线。有鉴于此，刘邓为“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㉝，经总前委批准，决心改变原定作战方向，“不以

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先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㉞，并要求部队“不顾一切疲劳，不为辎重及小的俘获所拖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长驱直追，大胆迂回，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㉟。这样，二野的渡江作战便顺势发展为指向敌战略纵深的追击作战。此举既密切配合了三野围歼沪杭之敌，又“使沿浙赣线南北诸敌，无法收容部队组织抵抗”，“造成了今后对赣西与闽南机动的便利条件”㊱，并为继续略定东南、进军西南建立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继渡江追击作战之后，刘邓又指挥了进军西南的作战。进军西南是我军在战略追击中实施的一次极其成功的战略性歼灭战，它是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展开的，战略指导上的主要问题是乘势将国民党余部围歼于国境之内。为此，毛泽东、中央军委作出了首先抑留西南之敌主力于秦岭地区，同时迅速截断敌向南溃逃的通路，尔后再加以分割歼灭的部署，并指示第二野战军“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㊲。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刘邓作出了多层次深远迂回的作战部署，即：一部由湖南出贵州进而迂回川南，另一部由湖南直出川东，再一部由广西迂回昆明。按照这个部署，二野部队在广阔的西南战场实施了勇猛果敢的远程机动作战，其主要特点是：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更原有部署，被动应战；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加速敌人之覆灭㊳。刘帅在指挥进军西南作战中，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的作战原则于战略追击，成功地实践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追击样式，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又一杰出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担负重任，实施了独具特色的战略进攻作战。刘帅在这个富有创造性的战略行动中，堪称是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学习这段历史使我们深切地感到，刘帅深刻领会中央意图，熟谙战争规律，从全局着眼，从实际出发，

受大任知艰难千里跃进，临危险凭智勇迎刃而解，运筹帷幄，多谋善断，在劣势条件下屡克强敌。他知识渊博，通晓韬略，熔古今中外兵法于一炉，升华为独特创见。他的战略战术思想求实辩证，而言语表达又十分精妙，简明易懂。他的指挥艺术切合“五行”（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灵活善变，不泥法而法自在，风格独具。总之，刘帅的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今天，我们纪念刘帅百年诞辰，要进一步学习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像他在战略进攻中指挥作战那样，敢于和善于以前无先例的办法创造性地解决前所未遇的军事战略课题，为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而不懈努力。

注　释

①②⑩⑫《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5、第 286、第 304、第 306 页。

③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2、第 383 页。

④⑤⑦⑧⑨⑪⑬⑭⑮⑯⑰⑲⑳㉑㉒㉓㉔㉖㉗㉘㉙㉚㉛㉝㉞㊱《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88、第 471、第 526、第 459、第 387、第 526、第 762、第 534、第 772、第 771、第 529、第 545、第 780、第 781、第 584、第 785、第 584、第 571、第 544、第 574、第 576、第 586、第 587、第 594、第 594、第 594 页。

⑥《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 页。

⑱《刘伯承逐鹿中原》第 88 页。

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4、237 页。

㉜《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九六五）》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2—133 页。

㉟㊳《刘伯承用兵要旨》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3、第 495—504 页。

刘帅在战略进攻中的兵法运用

章安翔

我在刘帅司令部作战科当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参谋。从1947年4月到1950年10月，先后三年半的时间，刘邓首长天天都在作战科办公，我看到了一些场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几年受委托帮助整理刘帅的资料，又进一步引起回忆和思考。现谨就刘帅在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期间的兵法运用加以介绍和论述，作为向刘帅诞辰100周年军事理论研讨会的汇报。

一、着眼全局，勇挑重担

一切从全局利益出发，这是刘帅兵法运用的最大特点。他一惯从战略的高度观察和考虑问题，事事照顾全局，服从全局，要求为全局的胜利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必要时，即使牺牲局部，亦在所不惜。

解放战争第二年，为了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刘邓大军奉命千里跃进大别山，承担了无后方作战的艰险任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党中央、毛主席转入战略进攻的决心是1947年5月定下的，并确定了三军配合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其中，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率先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向大别山进行主要突击。千里跃进大别山，当转入战略进攻的先锋队，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险的任务。

刘邓首长在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后，立即停止夺取安阳的战斗，全军进入休整，准备迎接新的战略任务。6月10日，在

安阳附近前线指挥部所在地石林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讨论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会上反映了不少问题，如反攻时机究竟到来了没有？反攻出去打不打大城市？安阳都打不下，能打哪里呢？反攻出去能不能站住脚？等等。总之，对党中央的决策还存在着疑虑。刘邓首长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与到会者一起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当时的形势是：经过我军一年的内线作战，蒋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打了败仗，陷入全民包围的困境中。与蒋军情况恰恰相反，我军数量扩大，装备增强，战斗力大为提高，士气高涨，后方巩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很需要我们去促进它快些来临。这是形势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蒋军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是装备上还占着相当大的优势（370 万与 195 万之比），控制着蒋管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并且正在拼命训练新的师团，千方百计地抽调兵力加强重点进攻。总之，蒋介石正在拼命挣扎，企图继续把战争引向解放区，彻底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结论是："开始第一年是内线作战，也必须在内线作战。歼敌 112 万以后，转入外线作战，也必须转入外线作战"。时机已经成熟，要抓住机遇，不能迟疑等待。

刘邓问："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正确的答案当然是后者，因为"蒋介石到处被动，好象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我们要以主动出击外线，"带动全国革命的高潮，帮助鼓励多方力量，相互呼应。"这样的解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说服力是很强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刘帅兵法运用的又一显著特点。说时机已经成熟，这表示客观上已存在着可能性，机遇已显出苗头，但还须主观方面去争取，才能成为现实。千里跃进大

别山，就是主观能动性的极大发挥。十几万大军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蒋介石卧榻之旁，对蒋介石是一次极为重大的打击。因此，他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抽调兵力来与我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从哪里抽兵呢？除了陕北、山东两地，别处都无兵可抽，这就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了。“攻其所必救”，“釜底抽薪”，毛主席这一着是击中要害的。对全局来说，这是战略上的一次空前的大胜利。

对于刘邓大军来说，这一战略行动，无疑是一次艰险的历程，决非轻而易举！因为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深远后方去作战，建立根据地，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史无先例的。首先，在前进道路上就横梗着重重障碍，敌人可以利用陇海、平汉、津浦铁路机动兵力，对我实施尾追、堵截。我军能否克服重重难关，顺利地进入大别山，是很难预料的。进入大别山后，敌人必然调集重兵围攻，我军能否站得住脚，也不是一两个回合能够解决问题的。毛主席就曾设想几种可能：（一）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毛主席要求我军在思想上作好充分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帅认为：“我们被指定的任务是很光荣的，推车子我们在第一位，走在前头，这是釜底抽薪，是厉害的。”“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刘帅要求全军上下，为了全局的利益，必须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这副重担。要把尽可能多的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让兄弟野战军减轻压力，便于休整，好打大仗。我们以一个人扭住三个敌人，就可使兄弟野战军用三个人去打一个敌人。还有一层，晋冀鲁豫当时养着 83 万军队，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人民负担很重，济源地区已有人逃亡。如果再不转入外线作战，就有可能演成中央苏区的结局，那就正好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了。

这次会议，时间虽短，问题谈得深，分析透彻，刘邓首长这种为了全局的胜利，不惜任何牺牲的精神，对各纵队领导的教育

很深，统一了认识。全军指战员经过一个月的整训和渡河准备，士气高涨，人人要求在大反攻中杀敌立功。

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在鲁西南战场连续作战近月，接着挥师南下，克服敌人的前堵后追，于8月27日进入大别山，为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打开了局面，有力地扭转了整个战局。随后蒋军集中了33个旅实施围攻，我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敌人浴血奋战了半年，终于站稳了脚，争取到党中央、毛主席预计的最好前途，为全局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进军期间刘邓首长与全军指战员同甘苦，共患难。关键时刻，刘邓首长就出现在第一线。有一张照片，刘帅柱着一根竹竿，后面站着三个警卫员，这是在鄂皖边境上的一座大山——三角山上拍摄的，拔海总有一千几百米。这一天，刘帅开始骑马，后来马不行了，就换了一匹骡子，到了三分之二的高度处，骡子也走不动了，只好下来步行。这一段山路的坡度，估计总有四五十度甚至更大。刘帅当年已55岁，九处负伤，象这样的道路要步行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在警卫人员帮助下，这一段艰难的路程他也走过去了。隆冬将至，十几万大军没有棉衣御寒，党中央准备从华北送棉衣到大别山。刘邓首长考虑路途遥远，中间有重重阻隔，决心自己解决，办法是将部队分遣至皖西和鄂东的沿江富庶地区，筹借棉花、布匹，发动部队自染、自缝。不到一月，十几万人的棉衣，全部解决。

有些同志认为大别山生活苦，病号多，敌情紧张，部队拖瘦了，没有象过去那样有机会大量歼灭敌人，总觉得吃了亏，颇有怨言。刘帅对这种本位思想，反复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同志们看问题必须从全局着眼。他在《关于大别山与全局斗争》一文中着重提到：“打仗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就吃肉，这次我们也啃一次骨头，就好像输不起一样，这是什么思想方法？”“我们要从战争全局来看大别山，全局的胜利，

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刘帅和邓小平政委反复强调，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正是由于这种坚强的全局观念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十几万大军统一了思想，同心同德，义无反顾，排除万难，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毛主席曾经说：“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二、鲁西南战役的要诀

1947 年 7 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在鲁西南地区连续作战 28 天，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敌人 9 个半旅，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野战军粉碎敌重点进攻的作战，为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打开了通路。有人说这是刘帅兵法运用的杰作，这一评价是切合实际的。

（一）声东击西，一举突破黄河天险

渡河前，蒋军主力正在山东和陕北继续其重点进攻，鲁西南地区兵力薄弱，从开封至东阿 250 公里的河防，只用了刘汝明 4 绥区两个师的兵力，另以 70 师置于嘉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敌人自恃这一河段水深河宽，是能顶 40 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只在河岸有重点地构筑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结合炮兵和空军火力，阻我强渡。估计战役发起后，守敌可能迅速收缩至郓城、鄄城、荷泽等要点固守，尔后从豫北（王仲廉有 9 个半旅）和豫皖苏（有 4 个半旅）等地抽兵增援，阻我向纵深发展。

为了迷惑敌人，刘帅采取了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与主作战配合以及宽正面、多渡点、突然同时强渡的战法。在发起渡河作战的前几天，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进攻；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视线；野战军主力 4 个纵队则从豫北地区隐蔽快速地开赴渡河地点，并派冀鲁豫军区部队先一日偷渡至南岸，以接应主力渡河。

在渡河准备阶段，刘帅亲自拟定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以帮助各级指挥员练兵和实施强渡。这是刘帅关于渡河战术经验的结晶，短短两千字，既有精到的指导原则，又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刘帅心细如发、稳妥落实的作风，是永远值得称颂和学习的。

6月30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之我军展开积极行动的时候，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共12万大军，在南岸我军的接应下，从濮县至东阿15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分8个地段一举突破敌人黄河天险，守敌全线崩溃．当夜我军即渡过6个旅的兵力，使鲁西南地区的敌人直接暴露在我军的强大突击之下。

刘帅说："政治主张要公开要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这次敌前渡河，在兵法上取得很大成功。首先，支作战方面，对豫北展开的进攻，使敌误认为是我野战军主力在进攻，对我军的渡河准备和行动毫无觉察，甚至在我强渡前把距河岸较近的王仲廉部由滑县调往安阳，远离我渡河出发地。其次，我军所采取的宽正面、多渡点、突然同时强渡的战法，使敌防不胜防，对尔后鲁西南战役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将计就计，各个击破

我军胜利地突破黄河天险，使敌人大为震惊。蒋介石为堵住这一缺口，命令刘汝明坚守郓城、荷泽，同时从豫北和豫皖苏战场抽调兵力，由王敬久统一指挥，经陇海线分两路北援。王敬久企图坚守郓城、定陶地区，吸引我军屯兵城下，而以东路重兵从巨野地区西进，拊我侧背，会同西路之敌钳击我军，迫我背水作战。王敬久的如意算盘是把我军歼灭于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逼我返回黄河以北。

刘邓首长一眼就看穿了王敬久的意图和侥幸心理（他的钳形西路太弱了），决心将计就计，采取"攻其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作出了周密部署。战役的进程完全按照刘帅既定的计划发展。1纵于7月8日全歼郓城守敌、2纵于6日解放曹县，6纵9日攻克定陶，全歼153旅，3纵也如期到达了

冉固集、汶上集地区，这就完全打破了王敬久的钳形攻势，我军主力则已转至东路敌人之左侧背，完全处于主动地位。此时，王敬久之 3 个整编师也完全按照刘帅的意图，被吸引到巨野、金乡间之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成为一条断断续续的一字长蛇阵，其左翼完全暴露，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

刘帅说："攻硬者，则软的亦硬；攻软者，则硬的亦软。"又说："即使一个敌人今日成为重点，则因我歼灭其相依相存的弱邻(特别是在运动中的与驻守补给线上的)，明日即变为弱点。"东路敌人 3 个师原来是很强的，它与西路军构成钳形攻势，开始我是不好打它的。但当其西路的钳子已被打断，我军主力转至它的左侧后，其一字长蛇阵的严重弱点就暴露无遗了。刘帅此时抓住王敬久东路援军队形分散，正在运动中，首尾不能相顾等弱点，当即立断，集中 4 个纵队和 2 个独立旅 13 万人的优势兵力，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将敌人 3 个整编师截成 3 段，最后被分割包围在六营集和羊山集两个集镇之内。对这两地被围的敌人，刘帅分别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战法：对六营集之敌，采用了"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逼使敌人突围，进入我军预伏阵地，被我全歼于六营集东南方圆十里的大洼地内。对羊山集之敌，则采用"围城打援，先打援军，后歼守敌"的战法，经一昼夜激战，终于全歼该敌，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

鲁西南战役的节奏十分急促，机动方式多样，打法变化多端，内容极为丰富，充分体现了刘帅作战指挥中的高度智慧与艺术。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十分重视研究情况的变化，一切从战争的实际出发，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处置，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法，战术上灵活多变，指挥时因势利导，得心应手。这是刘帅战役指挥的杰作，解放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西进的考虑、实践和意义

刘帅深湛的战略眼光，站得高、看得远，立足局部，着眼全局，立足现在，着眼未来，“走一步棋，看三步棋”，真可谓袖里乾坤，胸有成竹。

1947 年 10 月底，高山铺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分散在长江边。刘帅经常站在五十万分之一挂图前，凝神注视着江汉河淮之间的中原大地直至秦岭、巴山和四川盆地，特别注意淮西地区(淮河、沙河间)、平汉路沿线以及汉水流域。参谋们都在揣测着，是否又要有什么大的行动了？会不会过江？先后约一个多月，他和李参谋长多次交谈：“淮西地区，自古为中原与东南连系之枢纽，对我们今后的机动很重要。”“从淮西连系豫西乃至豫陕鄂开辟战场，结合桐柏、江汉，机动歼敌，变汉水为内河，十分有利。”有人说，刘帅很重视研究地形，善于通观整个战区的地理形势，巧妙地予以利用。他把地理形势与敌我双方战略部署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前后照应，上下结合，纵横联贯，对敌人当前和尔后可能的动向作适当的判断，随时都心中有数。

当时陈（赓）谢（富治）兵团已在豫西展开两月，陈（毅）粟（裕）大军也已进到豫皖苏地区一个多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已初步站住了脚，我军在中原互为犄角的品字阵势已经形成。昔日蒋军进攻我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如今变成了我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蒋介石对此感到十分恐慌，他有三怕：一怕我在中原生根，二怕我渡江，三怕我突破大巴山入四川。现在他已无可奈何地转入战略防御了，但是战役上的进攻在中原地区还是经常发生的。为了实现“坚持中原，经营华南”，以维持其反动统治，他企图用侵华日军的“总力战”来与我争夺中原，首先是集中兵力与我争夺大别山这块战略要地。

为了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和

陈谢兵团向平汉线郑州至信阳段发动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并令晋冀鲁豫老区增调两个纵队（10纵和12纵）给刘邓，以增强反围攻的力量。考虑到大别山地形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不宜集中过多的部队在内线打大仗等情况，刘帅和邓小平政委决定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针。一方面，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组成前方指挥部，指挥2、3、6纵队在内线，尽力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以利于外线兵团的歼敌与展开。另一方面，以刘帅和张际春副政委组成后方指挥部，率1纵队转出大别山在淮西地区展开，并指挥10纵队和12纵队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刘帅对淮西这个四通八达的枢纽地带，十分重视。他说："淮河上游除雨季涨水外，可以转移，且可东、西、南、北机动，协同各方作战，特别淮西区连接皖西、鄂豫、桐柏、豫西四个区，便于抓住西安至南京公路之信阳、横川段，以策应大别山作战。"大别山的反围攻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斗争，我军不仅在山区站住了脚，而且还卡住了淮河，进入了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大洪山，越过了汉水，直抵长江。

刘帅认为，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们依托三山，控制四河，与蒋介石逐鹿中原，颇为踏实、主动。由于我军主力转出大别山之后向西机动，使刘峙、白崇禧两集团首尾难于相顾，而我两大野战军密切配合，自3月至7月，连续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开封、豫东、襄樊诸战役，四个月内歼敌15万之众，把蒋军的中原体系打得支离破碎。

襄阳、樊城，地处汉水中游，为豫陕鄂三省之要冲，我军攻取该地，将汉水变为内河，向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伸展，可以切断蒋军华中与西北的联系，直接威胁武汉，进而南渡长江，西入四川，这是蒋介石、白崇禧最怕的两着。因此，白崇禧受到我军很大的牵制，使其在尔后的淮海战役中也不敢以重兵出援。当我华东野战军开始歼击黄伯韬兵团的时候，其张淦兵团仍被吸在大洪

山区，黄维兵团则被抑留在桐柏山区，直至11月6日，始由确山东援。刘帅转出大别山后即着意调动蒋军西进，并乘隙打下襄樊，把张淦兵团始终箝制在平汉路西，滞留黄维兵团于西线至11月初，对淮海决战中各个歼灭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四、斩断敌之中枢

1948年10月下旬，我军即将发起淮海战役的前夕，刘峙集团以徐州为中心互相靠拢，企图固守徐州，控制陇海路商邱、海州段和津浦路南段，屏障南京。白崇禧集团控制平汉路南段，扼武汉、信阳、襄樊，屏蔽华南。敌人各个集团不仅不能构成完整的战线，而且处于被动挨打，面临覆没的困境。

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于徐州以东地区为目的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即将于11月6日打响。此时，陈毅和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于发动郑州战役之后，正沿陇海路向东攻击前进，准备钳制徐州之敌西顾，以配合东线之作战。11月2日，陈、邓进至商邱西南地区，发现孙元良兵团向宿县转移，并判断刘汝明可能放弃商邱，退守砀山、黄口地区；邱清泉兵团可能自砀山、黄口之线缩回徐州，似有东援黄伯韬模样。因此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估计敌人有三种可能的动向及我之三种打法，其主要意图是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徐州采取攻击行动，以钳制邱、刘两部，并拟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孙元良北援时歼其一部。此件电报军委并发刘邓（子恢）李。

当时刘帅与邓子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2、6纵队和豫西、陕南、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分别钳制、滞留张淦和黄维兵团于大洪山、桐柏山区，以配合东线歼灭黄伯韬兵团的作战。刘帅于3日中午接电后即与邓子恢、李达反复研究，几乎整个下午都没有离开作战室。刘帅再三推敲，总觉得方案偏多，思路分散，有未能击中要害之瑕。刘帅认为，津浦路之徐（州）蚌

（埠）段为敌人生死攸关的要害，孙兵团之被调至宿县即为此。从西面攻击邱兵团，对会战重点支援之力不大，如兼顾西、南两面，则力量分散，打不痛敌人。只有集大力截断徐州、宿县间铁路，斩断敌之中枢，击中其要害，才能引起震动，吸敌回顾，才能减轻敌人对东线的压力。

刘帅当日亲自起草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江（三日）酉电。电文如下：

报军委、陈邓：

同时接到军委2日20时及陈邓冬午两电：

甲、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江日已全到）。邱清泉、刘汝明两敌，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要线斩断敌人中枢的方法，收效极大。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请陈、邓切实考虑，机断行事。

乙、我们仍令2纵6日到息县（走商城多2日以上行程，且多翻山经沙、淮水网，不便机动）。6纵8日赶到上蔡、汝南间（因距敌较远，不能先敌到太和），分由南北夹击东进之敌，并令6纵力求保障陈、邓之左侧背。

丙、已令桐柏、江汉部队继续破击平汉路，妨害85军向确山集中（我桐柏原10纵，现仅1个独立旅，在武胜关破路并闻）。

刘邓（子恢）李

江酉

电报发出，天已经黑了好久了。

刘帅运用他的“五行术”综合判断变化多端的战场情况，对敌情看得深，摸得透，能抓住要害，形之文书，肯切、扎实、有力。60年代编写二野战史时，重读这份电报，仍感句句落到实处，字字掷地有声，真是我军作战文书中的杰作。

11月4日晨，刘帅从皂角树出发上前方与陈邓会合，临行前在作战室向李达面授中原作战若干机宜。李达送到门口，我记得刘帅最后喃喃道别的两句话：“责任重大，不能不去呀！”11月10日在柘城与陈、邓会合。

中央军委采纳了刘帅的建议。我军于15日攻占了宿县、固镇及附近地区，将徐州蒋军与南京大本营的交通线拦腰斩断，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作战，还提前完成了对徐州敌军的战略包围，为尔后歼灭黄维兵团准备了良好的战场。刘帅在军委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立足于局部，关照全局，在关键时刻主动献计献策，为夺取战役的全胜，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刘帅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素以足智多谋的当代孙武闻名于世，他的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并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实践。刘帅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很好地学习和研究。

刘伯承对淮海战役的杰出贡献

胡兆才　上校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实施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大决战。这是毛泽东、中央军委战略决战思想的光辉胜利,也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及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领导同志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结晶。其中,包括刘伯承元帅的杰出贡献。在淮海战役中,刘伯承运筹帷幄,献计献策,灵活运用战法,对夺取淮海战役胜利起了巨大作用,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

一、关照战役全局,密切配合主战场作战,保障首战获胜。

战役全局与战役局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战役全局高于战役局部,统率战役局部,对战役局部的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指挥员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上面。因此,关照战役全局,是对战役指挥员的基本要求。淮海战役前,刘伯承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局形势,果断地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并以自己的行动积极促进战役全局的发展。

关照战役全局,首先要心想全局了解全局。只有了解战役全局,才能深刻理解战役在战略中的地位作用,才能站在全局高度筹划战役。1949年9月24日7时、济南战役临近结束之际,华野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根据中央军委7月间提出关于“今冬明春夺取徐州”的计划和中央赋予华野第三年歼敌40个旅的任

务，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攻克济南后，以华野主力进行淮海战役的计划。刘伯承接到电报后，以战略家的目光敏锐地看到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战略进攻，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比较，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占优势，具备了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尤其济南即将攻克，华北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徐州刘峙集团必将处于华野、中野的夹击之中，华东野战军此刻举行淮海战役正是良机。刘伯承立即和陈毅、李达商量，他说：淮海战役是大动作，我们中原野战军要配合好，协同好，粟裕在东边挟住敌人的额，我同子恢、李达在这里揪住敌人的尾巴，陈毅和小平上去截断敌人的腰，置敌人于死地！对此，陈毅、李达表示赞同。9月25日中午，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和粟裕，同意乘胜举行淮海战役，并提出中野采取分遣歼敌方针配合华野进行淮海战役。9月25日晚上，中央军委复电华野、中野："举行淮海战役甚为重要"，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可以歼敌十几个旅，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有利于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英雄所见略同。粟裕、刘伯承等和中央军委都想到了要举行淮海战役，充分反映了他们全局在胸，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棋高一着，计高一筹。适时举行淮海战役，是他们对时局的精辟分析和准确把握时机作出的伟大决策。10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战役第一阶段重心，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随后，中央军委又批准了中野的作战方案：刘伯承等率领中野一部在豫西牵制敌人，陈毅、邓小平率主力东进。10月中旬，中野按方案兵分两路行动。刘伯承指挥2、6纵队和陕南军区12旅及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在豫西佯装主力，大造声势，紧紧地揪住白崇禧集团，把黄维、张淦两兵团拖向远离徐州的桐柏山和大洪山，阻止或推迟该敌向徐州战场集中和增援。陈毅和邓小平率1、3、4、9纵队于22日攻克郑州后，沿陇海路向徐州急进，以吸引徐州之敌西顾。10月22日，

中央军委在一份电报中高度评价刘伯承的行动:"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2、6纵队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跟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3、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25日,刘伯承指挥部队攻克应城、安陆,歼敌28军军部等4000人,并破击平汉路南段,威胁武汉。中野的积极行动迷惑了敌人,为顺利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见,要夺取战役胜利,战役指挥员必须把握全局形势,并从战役全局出发坚决完成自己的任务,以促进和推动全局的发展。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局面的形成,与刘伯承当初胸怀全局的大胆战略构想和积极主动的配合行动分不开。如果没有刘伯承等积极主动钳制西面敌人,我军在东面全歼黄百韬兵团必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二、科学预见战役进程,提出隔断徐蚌铁路,完全孤立徐州之敌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的预见,对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如同自然界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现象一样,战局的变化总是有其征候的。因此,战役指挥员应该善于观察战役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征候,"走一步,看三步",力争在战役前对战役的发展作出科学预见。不然,"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淮海战役中,刘伯承在知己知彼、科学预见的基础上,提出截断徐蚌铁路的建议,对推动淮海战役由"小淮海"向"大淮海"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后,10月22日,中央军委曾提出截断徐蚌线的设想,但没有作出具体部署。10天后,刘伯承判断,徐州以北为我华野占领,西面郑州、开封为中

野攻克，围歼黄百韬兵团战斗打响后，徐州以东也为我控制。唯有徐州以南未被我掌握，蒋介石必然要依靠津浦路调兵东援并作为补给线。如果切断徐蚌线，徐州之敌将孤立无援，有利于我各个击破。刘伯承、邓子恢、李达于11月3日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陈述以上理由，急切地建议"陈邓主力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势。"还指出这一行动将斩断徐敌中枢，邱兵团可能被迫南顾，便于我运动中歼灭，减轻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极大。11月5日，中央军委复电赞同此方案，命令陈邓立即进击徐蚌路。11月9日中央军委果断作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刘峙主力，勿使南逃的总方针。11月10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陈邓："控制徐蚌路，断敌退路，愈快愈好。"同日，刘伯承从豫西赶赴淮海前线，与陈邓会合，一起研究攻占宿县截断徐蚌路方案。12日发起了徐蚌作战，15日攻占了宿县，破击徐蚌路曹村至固镇200华里路段，斩断了徐蚌敌人北援南逃通道，完成了对徐州之敌的战略包围任务。

刘伯承等及时提出截断徐蚌铁路，打中了敌人要害，起到了"一箭三雕"的奇效：一是斩断了徐州之敌中枢，肢解了徐州刘峙集团，使敌人相互不能照顾；二是阻止了南线敌人北援，直接支援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三是切断徐州之敌的补给线，隔离徐州集团与南京国民党大本营的联系，扩大了战役规模，由原来歼灭徐州集团右翼一部扩大到以歼敌徐州集团主力为目标，为我军进行大规模南线决战，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

从切断徐蚌铁路作战中我们可以看出，战争往往是时间和效率的竞争。在敌对双方为赢得时间而进行激烈斗争的条件下，预见性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能为提高指挥效率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善于预见战役的发展变化，是实施正确指挥和提高指挥效率的重要条件。只有正确预见战役可能的发展变化，及时看出敌人行动的特点和战争发展趋势，并采取相应措施，才能左右敌人，把握主动，因势利导地指挥战役向胜利方向发展。

三、选择有利的歼击目标，提出先打黄维兵团，促使杜聿明集团南撤被围

能否选择有利的歼击目标，是战役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而目标选择得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指挥员深谋远虑，多谋善断。淮海战役是敌我双方大兵团决战，敌人高度密集，增大了选择目标的难度。在歼敌目标的选择上，要力求拣弱敌打，更要从决战的目的出发，根据战局的发展和战役上一阶段与下阶段联系的情况，选择既能多歼又能震撼敌人的目标。歼灭黄百韬兵团战斗接近结束时，淮海战场敌军主力被分割在三个地方：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在徐州及徐州以东；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在蚌埠及其以北；黄维兵团在南坪集。战役第二阶段我军在什么地区歼哪一路敌人，是要把握的关键一着。

为了慎重选择第二阶段的歼敌目标，中央军委与总前委、华野、中野的领导，从11月7日起就开始研究协商。7日，中央军委致电华野、中野，预计第一仗歼敌22个师，第二仗打黄维、孙元良。11月11日17时，毛泽东致电华野、中野领导："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铁路，徐州就处于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11月13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刘邓：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野准备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建议中野歼灭黄维兵团。11月14日10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黄维兵团15日可达阜阳、太和，作出了三种估计并提出三个方案，三个方案都是以歼击黄维兵团为目标。15日6时，毛泽东复电："我们和你们基本方针是一致的，需待黄兵团歼灭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11月16日至18日，毛泽东连发三封电报，强调华野要歼灭邱、李兵团4至5个师。11月19日9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依据黄维兵团到达蒙城和李、刘兵团的态势，提出华野经过

连续作战，已相当疲劳，刀锋似已略形钝挫，如不休整，接着歼灭比黄百韬更强的邱、李两兵团，诚非易事。而中野只有7个纵队，要对付黄、李、刘3个兵团，困难颇多。建议歼灭黄百韬后，华野监视邱、李、孙，并抽一部兵力协助中野歼击李延年和黄维。11月20日20时、21日5时，毛泽东指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由于黄百韬没歼灭，情况尚未明朗，毛泽东和华野、中野分别提出了几个方案，酝酿筹谋。

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歼，黄维兵团猛攻南坪集，邱、李、孙缩回徐州，固镇的李延年、刘汝明也不北上。刘伯承分析形势认为，黄维兵团虽有4个军11个师，加一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是诸路敌人中的强敌。但该敌远道疲惫，脱离后方，骄傲自大，孤军深入，尚处运动之中，歼灭该敌胜利的希望大。刘伯承将上述看法讲给陈邓听，并指出解决黄维是完成徐蚌会战的关键。陈邓同意刘伯承看法，23日致电毛泽东：李延年、刘汝明迟迟不进，现在歼击黄维兵团时机甚好，中野决心聚歼黄维，建议华野以一部兵力牵制李、刘兵团外，抽出4个纵队参加打黄维。24日15时，毛泽东复电："（1）完全同意先打黄维。（2）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3）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确定先打黄维兵团后，中野主力从11月24日起向黄维兵团攻击，25日晨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双堆集，并歼灭18军1个师。蒋介石得悉黄维被围，急令徐州杜聿明指挥3个兵团30万人，放弃徐州，向西南方向突围，经肖县、永城击中野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11月30日杜集团弃城西撤。华野主力展开追击、堵击，于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狭小地区。刘伯承把当时淮海战役局势形象比喻为"吃一个（黄维），挟一个（围困杜聿明），看一个（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

筛选第二阶段作战目标，创造了淮海战役中数敌并进，选歼

强敌的范例。确定先打黄维，是最高统帅与前线指挥员共同精心优化决策的结果。在毛泽东模范的民主作风大气候下，刘陈邓19日的电报和23日的电报，对形成和确定先打黄维的方针，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选择有利的歼击目标，对于夺取战役胜利关系极大。淮海战役中选择黄维兵团为第二阶段歼击目标的范例，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现代条件下遂行重兵集团决战，一定要选择既能全歼又能推动下阶段发展的目标，才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这是未来作战中可借鉴的有益经验。

四、灵活运用战法，实行一点突破与多点突破相结合，彻底歼灭黄维兵团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制胜之要，在于变；两军相搏，善变者胜。决战性战役，敌我双方的情况千变万化。因此，对敌作战的战法也必须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战役指挥员必须适应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战法。淮海战役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由于战法不断转换，加速了战役胜利进程，说明指挥员灵活运用战法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共12万人，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而我军开始参战兵力只有12万人，与黄维兵团相当，武器装备与黄维兵团相比处于劣势。这一仗如何打？刘伯承说：“打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战役，一定要打好，敌人有装备上的优势，我们有战术上的优势。”当时中野司令部围绕采用什么战法打黄维展开讨论，出现了两种意见，邓小平、张际春主张用阵地战歼灭敌人，司令部作战室一些参谋倾向于用“围三阙一”战法，放开一个口子，用口袋阵歼灭运动中的敌人。刘伯承说：“我赞同邓政委、张副政委意见。开始，我也曾考虑放开一个口子，让敌人进入我们预设阵地，但是，敌人被围后警惕性高，不

会轻易上当。而且放一个口子，敌人占一村巩固一村，还能得到民间粮食，对我很不利。权衡利弊，采取阵地战一点一点吃的方法。”11 月 28 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11 月 29 日，中央军委同意此种打法。参战部队遂集中兵力稳步攻击作战，不失时机地利用敌突围和出击予敌以大量杀伤。但一点进攻效果不大理想。12 月 3 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采用华野打碾庄的经验，采取有重点的多面攻击。次日，中央军委复电：“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根据中央军委电报精神，刘陈邓采取 4 条措施：1、调整作战部署，组织东西南三个攻击集团；2、发挥近战威力，将交通壕挖到敌人第一道鹿砦内，使敌之空军、炮兵不能发挥作用；3、实施多方向而有重点的进攻，使敌人摸不清我军重点所在，分散其兵力火力，保证我军每次攻击都有收效；4、发挥诸兵种的整体协同，集中步炮火力攻击，同时组织战壕政治工作和良好的物资供应，使部队保持旺盛斗志。实施 4 条措施后，12 月 6 日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至 13 日，将敌人压缩在东西不过 1.5 公里的狭小地域。随后又调整部署，加强南集团攻击力量，对黄维实行最后总攻。15 日下午 4 时，黄维兵团在敌机掩护下，仓促向西突围，刘伯承等察觉敌情变化，适时改变战法，将攻坚转为出击，又一次调整部署，在敌突围方向堵击和追击，于当日 24 时彻底歼灭了黄维兵团。由于歼灭了黄维兵团，保证了我军有足够兵力和充裕时间，在第三阶段从容不迫地歼灭了杜聿明集团，夺取了淮海战役的全胜。第二阶段真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歼击黄维兵团的胜利，是刘伯承等领导善于从战场实际出发不断变换战法的结果。实践证明，单一的战法是不能取得战役胜利的，不能因战场发展而变换战法，同样也不能取得战役的成功。

只有不拘一格，因时因地适时变换战法，才能夺取战役全胜。

淮海战役已成历史过去了40多年，刘伯承和老一辈革命家对淮海战役作出的贡献，永远为人民所怀念和称颂。40多年来，世界在变，战争在变，指导战争的原则也在变。但是，他们夺取淮海战役胜利的高超的指挥艺术，仍然闪烁着光芒，将成为我国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灿烂明珠。我们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认真学习和研究，必将有益于我军战役指挥艺术的丰富和提高。

注：文中电报引自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淮海战役》第一册；文中刘伯承讲话，引自《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出版）。

刘伯承作战指导思想探要

贯启玉　少将

刘伯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组织指挥了众多的战役战斗，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作战指导思想。

一、贯彻用兵的重点主义，各个歼灭敌人

刘伯承用兵作战，强调实行“重点主义”。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通常 4 倍以上），各个歼灭敌人。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强调在作战中集中兵力。在这方面，刘帅的作战指导思想独具特色，尤以其辨证性最为突出。他说：“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①，“必须由实际出发，……而求得辩证的学术”。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时，必须反对那种抓住重点不顾一切的“超重点主义”。刘帅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贯彻于作战指导，正确把握了集中与分散、主攻与助攻、重点与非重点之间的辩证关系，赋予用兵重点主义以新的内涵。他说：“有重点，也有其他非重点的次要方向。集中兵力、火力对付一点，以次要的兵力放在其他方面，钳制敌人，达到重点方向的胜利。”③没有次要方向，也就没有重点方向；没有助攻，就无所谓主攻。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点时，如果没有次要兵力箝制、分散敌人，结果只能是以集中对集中，也就失去了集中兵力的意义。在邯郸战役中，我集中大部兵力担任主要突击任务，而以部分兵力钳制和佯攻其他敌人。看起来我没有集中全部兵力在主突方向，但实际上起到了分散敌

人的作用，确保主突方向对敌兵力对比的绝对优势。

二是形成兵力重点时，还必须选敌弱点实施打击。刘帅重点用兵的思想极为深邃，与歼灭战、速决战、打有把握之仗等指导思想紧密相关。作战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拼死较量，我军集中使用兵力，还必须选敌弱点实施突破，才能确有把握地速决全歼敌人。刘帅说："突击敌人弱点，则这样的歼灭战斗，就可以得到速决了。"④他认为，敌人的防御总是有强点也有弱点，而且是互为依托、互相联系、可以转化的。"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⑤其意是说，集中兵力打敌弱点，容易得手，弱点被打掉，强点失去依托与支援，也就弱了。反之，如选打强点，久攻不克，消耗了兵力，敌之弱点也变强了。

刘帅重点用兵的思想，贯穿于作战过程的始终，即不但强调以绝对优势兵力发起进攻，而且在作战过程中还要割裂敌人，各个歼灭。用他的话说，就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的合击"。"要把核桃打碎来吃，不要啃整个核桃，囫囵吞枣是无法下咽与消化的"⑥。而要割裂敌人，通常应实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1945 年 12 月 1 日，刘帅在总结平汉战役的经验时强调指出：要割裂歼敌，必须达到至少两处突破，以便对敌纵深实施钳形攻击，"最好是使几个突击箭头突入敌阵，能互相策应，将敌阵戳穿、撕破、切碎之"⑦。一般不可采用四面八方围攻的办法，这样往往迫使敌人作"困兽犹斗"，这是不合算的。

刘帅强调钳形突击，割歼敌人，"砸吃胡核桃"，实质是强调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始终贯彻用兵的"重点主义"，使我军不但在一个战场的总体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优势，而且在战场的每个局部地域对每一部分敌人作战时，始终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临之。他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在 1946 年 9 月的定陶战役中得以完全贯彻。这次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以 5 万余人面对 30 万敌人的进攻，兵力处于绝对劣势。但我军以少数兵力结合群众游击战争，箝制各路敌军，保障了我军集中优势的兵力歼灭整 3 师。在攻歼该师时，

又首先割歼其所属第20旅，以打开局面，再歼其师部与第3旅，继而又转用兵力分割围歼整47师等部敌军。此役后不久，毛泽东科学总结了各战略区的作战经验，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其中就包含了定陶战役的基本经验。⑧

二、把握作战过程的基本规律，周密筹谋，不打无把握之仗

刘伯承指导作战非常重视把握作战过程的基本规律，并周密筹划战役，不打无把握之仗。

（一）“就大势与局部沉思”⑨。作为战役指挥员，必须胸怀全局，深谋远虑，根据上级总的意图、敌我态势和战场情况，运筹决策，谋势造势。刘帅组织指挥作战，能够通观全国战场和战役全局，正确估价战役的地位与作用。1947年5月，他在分析战争形势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战役地位时，认为国民党的进攻部署是“两头粗，中间细，哑铃式的”，⑩晋冀鲁豫解放区为“四战之地”。在谋划定陶战役时，他通过科学分析全国战场和晋冀鲁豫战区形势后认为，必须打破敌钳形攻势中的西路，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而打破西路敌人的进攻，关键在于首先歼灭敌整3师，其中的关键又在于首先攻歼第20旅59团。刘帅抓住关键中的关键，亲临前线指挥，对取得定陶战役的胜利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深察“五行”要素，“了解敌人，了解自己，……抓紧本质而不受现象的影响”⑪。刘帅指导作战，非常重视了解情况，提出了著名的“五行术”。比如，他对敌人的情况总是了如指掌，哪是嫡系、哪是杂牌，敌人的指挥官哪个优柔寡断、哪个骄傲恃勇，敌军部队作战哪个会轻敌冒进、哪个会畏缩不前，都清清楚楚。他在总结定陶战役的经验时说：“如打蒋嫡系，杂牌增援一般不积极”⑫。在定陶战役中，刘帅决定首先打敌整3师，就考虑到

该敌是嫡系，围歼该敌时杂牌军整编41师、47师不会积极增援。

对于如何判断敌人的企图，以确定战役指导的正确方向，刘帅特别强调要抓住本质而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在总结宛东战役的教训时指出："要正确判断侦察到的材料，不可为某种片断材料所束缚"⑬。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在宛东战役中，由于我西兵团为敌表面现象所迷惑，误认为敌张轸兵团东进，没有从西面实施迂回包围，结果该敌大部西逃。

（三）"必须预见战场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⑭正确的战役指导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即与下一步可能发生的战场情况相符合。因此，要把握战役指导的正确方向，必须善于预见战场情况的演变，处处走在敌人的前面，因势利导，先敌准备，先敌行动，先敌采取应变措施。

刘帅非常善于预见战场情况的演变，料敌如神，出奇无穷。他每次指导战役，对敌人的意图，可能采取的行动，都能准确判断，致敌而不致于敌。在定陶战役中，刘伯承判断，敌之东路较强，西路较弱。西路中敌整3师是主力，其次是整47师。歼灭此两师，敌人的进攻即可打破。敌整3师系蒋之嫡系，骄傲轻敌，故我示弱骄敌，其必然轻进。结果，敌整3师被我诱至预定战场，大部被歼。还在我军围歼整3师时，刘伯承即判断该敌残部将向南突围，企图与整47师靠拢。基于此判断，我军预设了"口袋"，一举将敌整3师全部歼灭。

刘帅还强调，战役指挥员在科学预见战场情况的演变后，还要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在上级"总的意图下，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向胜利方面扩张战果"⑮。他认为，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敌人狡猾如兔，不易捕捉。指挥员不能守株待兔，只等上级命令行动，而"必须发挥指挥员捕捉战机的灵敏性与责任感"；而上级对部属的指挥，"宜以训令方式示之（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以便于下级机断行事。"⑯

三、实行趋利避害的宽大机动，避实就虚，拣弱的打

实行趋利避害的宽大机动，避实就虚，拣弱的打，是刘帅用兵之道中别具特色的重要内容，是他几十年作战指导的精华。

刘帅一贯强调，"'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⑰，是争取主动和自由的途径。他说："毛主席的人民的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更需要机动"。⑱通过几十年的军事生涯，刘帅对机动作战的战略战术有深刻的研究、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以劣势兵力与优势兵力之敌作战，必须寻找敌人的弱点，而要避实就虚，就要靠机动调动、疲惫、消耗敌人，"猫捉老鼠盘软了再吃"。机动的主要形式是大踏步进退，要善于灵活地分遣，又要能够迅速地集中。所以他在作战中要求部队"不要怕行军，行军也是战术"，并引用苏沃洛夫的名言："脚才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⑲，说明不会行军就谈不上战术，更谈不上夺取作战的胜利。

在作战中实行趋利避害的宽大机动，是刘帅对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实践中，刘帅十分强调把机动和歼敌紧密结合一起，明确指出：机动的本质是歼灭敌人，并在实践中体现这一本质。他说："机动是消灭敌人的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硬是把敌人消灭，才是解决战斗。这就是对机动作战的认识。"⑳他在阐述机动与歼敌的关系时说："战术的全部结晶是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好是采取运动战的方法，结合着游击战。"㉑又说："我们进行的人民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游击战争也是大游大击，中游中击，小游小击。"㉒因此，我们的作战机动，必须"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人的弱点而消灭之（这是主要的），或者大踏步地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㉓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帅指挥的几

十个著名的战役战斗，都是以实施宽大机动来达成歼灭战的。挺进大别山，更是高度机动之最集中最精彩的体现。刘帅机动作战的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运动战和游击战一元化㉔，在机动中疲惫、消耗敌人，创造敌人的弱点，达成突然袭击。刘帅在作战中不但强调大踏步的进退，通过宽大机动调动敌人，而且非常重视开展游击战和游击性的小规模运动战，对敌人实施袭扰、破击，疲惫、消耗敌人，以创造战机。他说，打运动战要象猫捉老鼠那样，盘软了再吃。这里所说的"盘"，包括两层涵义，一是调动敌人，二是疲惫、消耗敌人。1946年11月4日，他在濮阳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遂行机动的时候，一定要派出小部队前出到距主力一日行程左右，迷惑敌人，保障大部队适时地消灭敌人。小部队在敌人的前后左右神出鬼没地独立活动，其作用很大，既可以帮助游击战争的开展，又可以迷惑敌人，掩护大部队的机动。"㉕在定陶战役中，我军就采取了这种战法。

对如何实现运动战与游击战一元化的问题，刘帅通过科学总结我军长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调剂运动战与游击战分量的思想，并对如何调剂两者分量作了深刻论述。他说："要严格综合、估计和对比，根据当前敌我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军队数量、质量以及技术条件的优劣，乃至地理、经济条件如何运用来决定。"㉖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悬殊甚大的情况下，以游击战为主。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逐步扩大运动战的分量。解放战争时期，则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性作战为辅。但在各个时期和具体的战役中，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两者的分量，既要保障主力能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又要使游击性作战保持适当规模。在通常情况下，以主力部队打运动战，以地方部队和民兵实施游击性作战。例如上党战役，我集中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的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3.1万人遂行机动作战任务，以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民兵、自卫队遂行游击性作战任务。必要时，也可抽调

主力部队之一部，遂行游击性作战的任务。前面提到的定陶战役，我军以 6 纵 2 个团，在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以运动防御的形式调动、疲惫与消耗敌人，对夺取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敌进我进，渗入敌后，机动歼敌，夺取战场的主动权。“敌进我进”，在刘帅“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作战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曾经作过如下表述：“‘敌进我进’就是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后方，与广大群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㉗

“敌进我进”，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是达成防御中的进攻、内线中的外线，取得劣势中的优势、被动中的主动的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刘帅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敌进我进”的作战原则时说：坚壁清野太被动了，打伏击也不是完全的主动，敌进我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完全主动了。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赏，他说：“伯承同志，你那个‘敌进我进’的办法好啊，搞得日本人没办法”。㉘

“敌进我进”是刘伯承作战指导思想的精华，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刘帅对这一作战指导思想的运用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进入敌后作战，开辟与扩大战场，创建根据地。抗战初期，面对日寇的大举进攻，我军分兵挺进敌后，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成为打击日军的坚强堡垒。

二是转到敌人合围圈外作战，从侧背打击敌人，打破敌人的合击阵势。抗日战争中，日军对我实行“囚笼”政策，并采取“捕捉奇袭”、“反转电击”、“铁壁合围”等手段，进行频繁的“扫荡”。刘帅根据敌人“腹地兵多、边地兵少和敌占区空虚”等情况，及时抓住战机，以少量兵力坚持腹地斗争，主力则跳出圈外，奇袭敌人要点，破坏敌人的交通和补给，袭击敌之留守。当敌人被迫回巢时，则以敌占区活动部队回击，在敌补给线上活动的部队侧

击，在腹地的部队追击，协调一致，打击敌人。

三是实行宽大机动，避开强敌进攻的锋芒，置解放区腹地丢失于不顾，转到外线进攻分散、孤立之敌，打乱敌人的全局计划。在巨金鱼战役中，刘邓指挥野战军避开敌主力，向东南挺进100余公里，突然袭击巨野、金乡、鱼台驻守之敌，迫敌收兵回援，粉碎了敌人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四、势险节短，陷敌于必败之地

作战中力求势险节短，是刘帅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兵法，总结概括的作战指导思想，也是他高超作战指挥艺术的一大特色。

自古以来，明智的军事家都主张用兵要“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谋势造势，力求险峻，作战节奏力求短促。孙武认为，势之险应如转园石于千仞之山，节之短应如猛禽捕食。刘帅十分注意研究战役的“势”与“节”的问题，他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以后致陶汉章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正在研究战役法中的战役布势与战役的持续时间及其发展速度”㉙，也就是解决战役中“势险”、“节短”的问题。刘帅认为，势险节短是为将者用兵作战的必求之术。作战指导者应不遗余力，力求使自己处于主动、机动、灵活、多变的有利态势地位，战略、战役、战术行动概莫例外。正是基于这一点，刘帅在作战实践中，始终把握势险节短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并在敌强我弱的战争实践中，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地步。

所谓“势”和“节”，刘帅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势者，用兵之势又称态势，不是指作战的形式、格式。势不是固有的，是靠指挥员的良好的军事素养，稳操胜算的指挥艺术，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在战略、战役上的深思熟虑，才能造成。在作战中，怎样做到势险节短呢？刘帅认为，战役布势、战斗部署要力求险恶，作战行动要快速勇猛，战役战斗过程要短促，要

使敌人的处境就象“驼子走下坡路，趋势很陡”！敌人想要挡住我军的进攻，就象“抓沙子搪水”，徒劳无功。

“势”和“节”反映了作战中存在的客观现实，是敌我态势在战场上所显示的利害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抽象。“势险”是从空间的角度，就敌我双方的态势（包括军队的布势，所占的地势，心理上的气势）而言的，其势越险，形成的打击力越大，正象激流可以漂石。在作战中，往往占有地形之利，拥有兵力兵器的优势，指挥员足智多谋，能抓住战机，出敌意外地打击敌人等，便能造成不利于敌而有利我的险恶态势。而“节短”是从时间的角度就敌我双方冲突对抗的过程而言的，过程越短，越能陷敌与被动和混乱，以致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在作战中，转用兵力迅速，部队战斗素质优良，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坚决、顽强等，便可以使作战节奏加快，使战役战斗的过程大大缩短。“势”和“节”是相辅相成的，一般情况下，作战态势险恶，作战过程才能短促。抗日战争时期的神头岭伏击战就是一个范例。刘帅在总结这次“势险节短”的战斗所使用的战术时指出：火力与白刃格斗相结合，采用迂回式的横宽队形，猛扑敌人。在敌人毫无准备，在它的新式步兵炮尚未放列、骑兵尚未上马、火网还来不及组成的时候，就干干脆脆地完蛋了！刘帅在解放战争中指挥的许多战役，也都具有“势险节短”特色。

五、因敌制胜，灵活运用战法，力求达成战役战斗的突然性

善于机变，活用战法，因敌制胜，是刘帅用兵艺术的精华，是他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批判地汲取前人军事思想的精华，通过长期革命战争实践形成的作战指导思想。他反复强调：一个指挥员“懂得战术是容易的，适应新的情况，灵活运用战术甚至变换战术就不容易了”㉚。怎样才能因敌用变，活用战术呢？刘帅

认为："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㉛

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家认为："用兵之术，惟因字最妙"㉜，即根据具体情况活用兵法最妙。刘帅指导作战因敌用变，因人异施，因地作势，因情措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一）战前筹谋，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战法。敌战斗力较强，指挥官恃勇骄纵，刚愎自用，他就诱敌深入，暗设"口袋"，采用伏击式战法围歼敌人。敌军战斗力较弱，指挥官狐疑不决，打滑头仗，他就突然包围敌人，网开一面，虚留生路，诱敌出逃歼灭之。敌善于防守，深沟高垒，固守待缓，他就攻其必救，吸敌来援，歼其援者。敌士气沮丧，军心动摇，他就采用重兵围困战法，促敌投降或起义，等等。举例来说，在鲁西南战役中，打郓城"围而不阙"，是因为郓城城墙不坚固，我兵力占优势，围而不阙有把握全歼敌人，"阙"了反而容易让敌人逃掉；打六营集之敌则"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因为六营集敌人较多，把敌人调出来容易歼灭，如不"阙"，敌作困兽之斗，则于我不利。

（二）临机应变，适时改变战法。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和智慧的较量，"用兵虽有成法，然以应变不与为奇"㉝。所以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强调战法运用和作战指挥的灵活性。刘帅深谙古代兵法，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作战，特别重视灵活运用战法。1947年1月他在总结作战经验时指出："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下，必须预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成歼敌任务。"㉞可以说，灵活机动用兵的思想，贯彻于刘帅一生的作战实践。1945年10月上党战役开始时，我拟用围（攻）城打援战法，以一部分兵力逐次夺取长治外围诸城，调长治之敌出援，歼敌于运动之中。但敌惧怕被歼，一度出援，又很快缩回，打援企图未能实现。当我相继攻占外围诸点之后，发现长治之敌企图固守待援，遂即决定强攻。战斗正酣，强攻未下，敌由太原驰援长治，刘帅遂

果断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攻城，集中主力伏歼援敌。在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援敌之后，又迅速回师，再歼灭突围之敌。在整个战役中，刘帅因敌施变，灵活运用围城打援，夺城打援，伏击攻歼等多种战法，出神入化。

刘帅灵活运用战法，非常强调达成战役战斗的突然性，把这一要求上升到原则的高度，贯彻于各种战法和作战行动中。他说："隐蔽接敌，突然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军要时常把握这一原则。"㉟他还结合具体作战实践，对各种战法如何达成突然性具体进行了论述。例如，攻城，最好利用夜暗隐蔽接近，突然乘梯子登城；打援，部队要耐心隐蔽，待援敌通过后，再发起战斗；追歼突围之敌，先以围城部队穷追，使敌只顾其后，另以主力从另一方向突然驰往截击，等等。

刘伯承作战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未来战争中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发掘其深邃内涵，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参与本文执笔者：黄培义上校、兰　政上尉）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㉚㉛㉞㉟《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47、第 445、第 477、第 404、第 421、第 427、第 422、第 485、第 444、第 455、第 553、第 481、第 481、第 481、第 192、第 461、第 541、第 447、第 539、第 215、第 461、第 461、第 126、第 372、第 509、第 509、第 481、第 404 页。

⑨㉙《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24、第 180 页。

⑲㉘《刘伯承指挥艺术》第 104、第 96 页。

㉜《阵纪·因势》。

㉝《明宣宗宝训》卷四《谕将帅》。

论刘伯承战术思想的主要特色

李学勇上校　印胜洋中校　王国志上尉

刘伯承的战术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中的一颗瑰丽的明珠。学习研究刘伯承战术思想的特色，对于继承和发扬他的宝贵军事理论遗产，指导我军进行现代战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根据强弱转化规律，创造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进攻战法

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为指导，研究指挥战斗行动。他认为，优势与劣势是相对的，只要我们能准确地把握敌我的长短曲直，正确而灵活地运用各种战术，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就能够改变我总体上的劣势状况。据此，围绕如何实施强弱转化，他创造了一整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以劣胜优的进攻战法。

第一、采用“狼的战术”，突然袭击敌人。刘伯承曾生动地讲述过一个故事：“成都有一条坡路，狼在坡路上静坐着，一个推车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推车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了，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①刘伯承认为这种“狼”的战术就是袭击，它是一种灵活的扬长击短术。他认为我军采用这种袭击的战法打击敌人，一是可以乘敌不备，使其优势的武器、强大的兵力的作用得不到发挥。正如他针对日军作战所生动指出的那样：当敌人摆着皇军的臭架子唱歌前进的时候，我们以冷武器汇合热武器奔杀敌人，让敌人在炮还没有架起，骑兵还没有上马，火网还没有组成的时候，一下子就完蛋了。二是可以利用地

形之利，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在风居村伏击战中，刘伯承将 386 旅 771 团放在风居村、巩家庄一带的高地上，待敌进到黄崖底河谷时（尤如推车人进到了半坡中），我遂集中全部火力，以居高临下、锐不可挡的冲击力给敌以突然的短兵相接的袭击，300 多日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都被消灭。三是可以创造和选择有利的战机打击敌人，主动性强。刘伯承说："袭击就是偷偷地接近敌人，给以不意的打击"。②他认为无论敌人部队大小，无论在运动中还是驻止，无论是消灭它还是消耗它，也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城市或乡村、陆上或水上等，都可以采用袭击的方法。刘伯承把袭击具体分为袭击和反袭击、伏击与反伏击、急袭和吸打敌援③，指出：袭击就是敌人在驻止中我们找着去打；伏击就是敌人在运动中，我们预先埋伏好等着它来打；急袭就是敌我在运动中碰着的时候打；吸打敌援就是袭击和伏击的混合体，以小部队去袭击一处驻止之敌，让它求救，当另一处驻止之敌前来救援时，在它通过的路上伏击它。他总结说："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④是袭击的战术的要诀，实施时则要"突然、迅速、猛烈、干脆"⑤。

第二、打碎"核桃"吃，各个歼灭敌人。刘伯承指出："敌我双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此盈彼虚，此长彼消。"⑥我们的战法就是要使我逐渐地"盈"、"长"，使敌人逐渐地"虚"、"消"；就是说要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由小吃逐步蔚成大吃。在刘伯承看来：按一般战术原则，大量消灭敌人，必须是合击与聚歼，但为了容易消灭，又必须将整个敌人防御配系割裂几块，才便于达成对敌人各个歼灭的目的。他认为即使只是消灭一个营或一个团，也比击溃一个师毫无所获好得多。他说："对各个敌人的消灭，也必须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有小的合击，才容易达到消灭的目的"。⑦他生动地比喻这是把核桃打碎来吃，不要啃整个核桃，囫囵吞枣是无法下咽的。

打碎"核桃"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合围、割裂，将整个核桃剖开来，切成小块吃。他讲到：围歼敌人的关键"第一

是合围，防敌逃走；第二是割裂被围之敌，以便各个歼灭”⑧。他认为在敌人躯干联系的关节薄弱部，给以重点的（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敌人弱点）割裂的突破，贯穿到底、卷击两翼，以肢解其防御体系，就能使强敌分成数块而由强变弱。平汉战役的胜利，与运用这种方法是分不开的。

二是调动、分散敌人，分开吃。对难以割裂之敌，要根据战场情况，灵活巧妙地调动和引诱敌人，使敌人脱离有利地形和良好的补给保障环境，迫敌改变其猬集状态，自破“核桃”。刘伯承说：“拿我们分散的部队去消耗敌人集结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的集结的部队去消灭敌人分散的部队。”⑨抗战初期，刘伯承在太行山区吸打潞城日军就是一例。当时集居在潞城的日军 3000 多人，装备精良，不可一世。刘伯承采用攻城打援的方法，先强袭黎城日军，迫潞城日军 1500 多人增援，由此调动和分散了敌人；在伏击歼击增援之敌时，刘伯承又集中了 3 个团的兵力，对敌形成了优势，达成了速决全歼。刘伯承指挥部队在调动、分散敌人时，以多种形式，采用麻雀战、地雷战、袭击战、伏击战，欺骗迷惑、疲惫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集中消灭敌人。他还善于灵活采用“围城打援”、“夺城打援”、“调虎离山”、“调虎进山”、“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等等战法，化敌整体为零散而各个歼灭之。

第三、用牛刀杀鸡，聚优克劣打击敌人。“杀鸡用宰牛刀”，这是刘伯承克敌制胜的用兵方法之一，也是他在几十年革命战争实践中，贯彻运用毛泽东关于战术上“以十当一”的思想屡克强敌的经验结晶。他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扭转被动、不利的局面，我们应该在战役、战斗上把它改过来。就是说：将敌战略上的进攻变为我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将敌全局的优势变为我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也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以一当十”，战役、战斗上“以十当一”。

“杀鸡用宰牛刀”就是强调：“作战只有一个重点，而不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重点，反对平均使用兵力。”“集中兵力火力对

付一点，以次要的兵力放在其他方面，箝制敌人，达到重点方向的胜利。猴子掰玉茭，最后只能得到一个。”⑩他还形象地比喻分散兵力歼敌是“用五个手指去按五个跳蚤，只只都会跳跑，一个也捉不到。”“分散兵力，处处防守，是牛抵角的战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战术。”⑪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分九路向我太行山“围剿”，刘伯承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分三个方向与敌其中一路周旋迂回，在武乡、长乐村一带歼敌 2000 余人，将敌三条运输线破坏了两条半。他风趣地说：如果我们平分兵力对付九路敌人，就如“公公背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⑫。

“杀鸡用宰牛刀”就是要在战役、战斗上对敌形成数质量的绝对优势，用大于 4 倍以上的兵力，给分散、孤立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他不仅注重在数量上以多打少，还善于从质量上以我之强击敌之弱。他说：“战术上我应以少数兵力箝制其他方向，借此腾出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常易得手。”⑬“以弱耗强，以强灭弱，就是拿我们强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弱的部队。”⑭对散敌、弱敌的歼灭，他还强调要寻找其弱中之弱，如其没有弱点，就要制造之，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来突击这一弱点，并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援救其被突击的弱处。他认为敌阵地的翼侧、接合部、突出部、侧后、指挥机关、交通线、补给线等，都是敌人的弱处；在敌人移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周中，都可以寻找和创造它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更加突出重点，保障重点。

“杀鸡用宰牛刀”要求集中优势兵力，但又不是一切地方都要集中，而是指主要作战方向和目标要集中。对次要方向、次要目标，则要根据情况和任务布置相对优势兵力，甚至相对劣势兵力即可。他说：“我们可以在次要方向用一个人去扭打三个敌人，这样就能在主要方面抽得三个人来痛打一个敌人，求得总体上的胜利。”⑮刘伯承还要求集中在主要方向上的强大兵力，要作纵深梯次的配备，以便适时机动，扩大战果，“要控制预备队，在紧急情

况下预备队使用尽时，要及时重新抽集新预备队，以应付情况变化。”⑯此外，他总是不断地变换战术，巧妙地调动敌人，灵活地使用钳制兵力，致使敌由强变弱，由“牛”变成“鸡”，而我则集中优势兵力，由弱变强，使用“宰牛刀”去杀“鸡”，这样就更能大收奇效。

运用“牛刀杀鸡”，刘伯承创造了“以大打小，吃敌一块”、“正面牵制，侧背攻击”、“包围钳形攻击”、“击头，折腰，截尾”、“纵深攻击”、“猛虎掏心”、“卷击，兜击，追击（平行追击、超越追击、跟踪追击）”等以劣胜优的进攻战法，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二、胜算在先，周密细致地做好战斗准备

胜算在先，周密细致地做好战斗准备，是刘伯承战术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说，秘密而周到的计划与准备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基础⑰。他认为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胆略”，侦察情况、计划工作、部署兵力要象“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致。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胜算在先，谋定而后动。他坚决反对作战组织上的粗枝大叶，马马虎虎。他曾十分严肃地批评那些用士兵勇敢来替代和弥补指挥无能和意气用事的人。他告诫各级指挥员：勇敢绝非莽撞，大胆不是随心所欲地蛮干。军队是一盘复杂精细的机器，打仗是力量和智慧的角逐，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尤其是对优势之敌，更要严谨缜密，决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心理。他的周密细致的作风主要表现在：

1、细察“五行”。刘伯承组织战斗从不草率行事，不主观武断，不侥幸取胜，而是从实际出发，用辩证的观点去认识和指导战斗行动。他根据多年的战斗经验，把对作战行动最有影响的五个要素，既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之为“五行”，指出这是组织战斗的基础和核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⑱他

身体力行，细察五行。为了掌握敌情，尽管工作很忙，他都千方百计地亲自收集敌人的战斗文书、公文、信件、报刊杂志，俘虏的口供乃至私人日记等资料，认真审阅研究，有时还亲自到最前线观察了解敌军的活动规律，作战特点等，连一些细微末节也不放过。他经常亲自勘察地形，精心选择战场，对每条道路，每条河流，甚至每个山头，都仔细进行研究。他总是深入部队了解情况，从部队的伤亡情况到干部的补充，从部队的情绪到同志间的团结，从部队的训练水平到战斗力的现状以及走路、睡觉、吃饭等问题，他都询问了解。对部队的作战特点，那个能攻，那个善守，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2、缜密计划。刘伯承强调制订作战计划，要从实际出发，精细缜密。他把计划通俗地解释为“计算时间”和“划路线图”，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抓住计划的实质和关键。他要求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要因敌制胜，量力而行，精密计算，“不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⑲。强调根据战场情况的可能变化设想多种方案，不断地检查计划与变化着的实际是否符合，是否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判断定下新的决心，作出新的计划和新的部署，以求主观与客观一致。

3、明示任务。在给下级明确任务时，刘伯承总是强调：必须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发出具体指示。对战斗命令，他总是逐字逐句的推敲琢磨，决不贸然下达。他说：“打仗这玩艺，可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战斗的成败。”⑳他在《平汉战役的战术指示》中，分析了敌军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野战、村落战、夜战和特种兵作战的具体战术，强调要利用地形地物，村落战斗要注意控制制高点，夜间战斗要注意规定联络信号，甚至具体的联络办法也写得清清楚楚，如用石灰撒地指路或燃香指路，或用绳索等物牵引队伍行进，或以低声联络、反戴帽子识别敌我等等。

4、严格检查。刘伯承组织战斗精细严密处处可见，事事如一，

他不仅考虑得周到，计划得严密，检查指导也抓得很细。解放战争指挥龙固集防御战斗时，他亲自到担任运动防御的第5旅指导组织战斗，要求旅指挥员贯彻“依托工事，移动防御，软顶硬打，把敌人盘软后再打”㉑的作战方针。在担任主要防御任务的第14团，刘伯承指导该团调整了一线平分兵力的战斗部署，采用了三角队形，加大防御纵深，增强了防御的稳定性。在14团主力营，刘伯承又向全营排以上干部作了具体防御战术的指示。他在《关于中原野战军四个月指挥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检查每次战斗各兵种在协同作战中的技术战术，步兵的战斗队形与战斗动作，炮兵、重机枪等火力组织，工兵的爆炸、架桥等对于完成战斗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对响堂铺、香城固、神头岭战斗的组织准备情况，不但具体交待，而且检查仔细。

三、每战都力求达成战斗的突然性

战斗行动对作战指挥、战法运用起到最根本、最直接的影响。刘伯承认为：战斗行动的出奇不意可以给敌以重大杀伤，使敌茫然不知所措，意志沮丧，失去有组织的抵抗，丧失优势和主动；可以弥补我兵力、火力之不足，以小的代价夺取大的胜利。因此，他特别强调每战力求达成突然性。他说：“隐蔽接敌，突然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我军时常要把握的一条原则。”“在进攻敌人中，应采取出敌不意，攻其不备。”㉒

为达成出奇不意的战斗行动，刘伯承强调：一是善于造成和利用敌人的疏忽、疲惫和不意突然攻击之。他认为采取多种保密、伪装、欺骗措施，在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迷惑敌人，能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在他指挥的神头岭战斗中，神头村的人民群众就积极协助我军对敌实施欺骗，对战斗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善于利用夜暗或不良天候而突然攻击之。刘伯承一贯重视夜间战斗，他说：“夜间是我们最有利的

战斗机会，我们要发扬夜老虎的光荣传统”，“夜间战斗不依靠火力，而应以突然的动作，短兵相接与手榴弹相结合”㉓，使敌人毁于一旦。三是善于利用地形之利而突然攻击之。神头岭伏击战时，有人认为伏击地区地形复杂，不便我展开，但刘伯承却看到，不利我展开，更不利于敌技术兵器展开，利我先敌占领隐蔽部署。在长乐村、响堂铺、黄崖底、七亘村等伏击、急袭战斗，我军都充分地利用了地形的优势给敌以突然猛烈的攻击。四是善于运用行动的快速性而达成突然攻击的效果。兵贵神速是刘伯承用兵的一大特点。他认为快能生巧，快能长利，快能争取主动，快能制敌于死地。大杨湖歼敌59团时，我上午撤出，敌下午赶到，晚上刘伯承就组织指挥部队回师将其歼灭，行动之快，是敌人意想不到的。刘伯承强调，出敌不意的行动要建立在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基础上。他常讲勇是军人最可贵的品质，“狭路相逢勇者胜”。他要求部队“战斗作风要猛要顽强”，“我们的部队有的很猛，有的很顽强，都应当相互学习，使部队既猛又顽强”㉔，使敌人望而生畏。

四、通过灵活机动的指挥控制，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的战斗潜力

刘伯承认为：战争是复杂多变和不确定的，在基本作战原则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各种智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制定出敌不意的决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部队的战斗作用。他说：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说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战法，以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便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地步。《历代名将言行录》中指出：“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刘伯承运用这些兵法，能够视实际情况而定，不是把它看作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七亘村重叠待伏，乍看好象是违背了“贵在不复”的原则，其实正是刘伯

承摸透了敌人的意图，巧妙地运用战术，大胆、灵活地指挥战斗的一个范例。刘伯承灵活机动的指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智胜在先。刘伯承认为，战斗的双方都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只有料敌在先，才能用兵有术，高敌一筹。凡指挥战斗，他总是精心研究敌军部署、作战特点、行动企图，找出敌行动规律。鄄城以南歼灭蒋军119旅时，刘伯承判断119旅属蒋军非嫡系部队，嫡系的新5军和整11师不会全力营救。而且，新5军和整11师刚遭我打击，没有掌握我主力的准确位置，不敢贸然行动。据此，他果断定下打敌119旅的决心。战斗进展果然不出刘伯承所料，当我发起攻击一昼夜全歼了119旅后，增援之敌只向前推进了4—5里。刘伯承通晓天文地理，善于把握地形、时间等因素对敌我战斗行动的影响及利弊关系，把被动留给敌人。例如，他指出："朝阳是从东方照射的，在清晨应从东方主攻，夕阳是从西方照射的，在黄昏应从西方主攻。这样可收朝阳和夕阳照明目标之助，而敌人对我则不便观察。"㉕

二是灵活用兵。刘伯承认为：灵活用兵"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不能取胜。"㉖他认为在敌情尚未判明之前，应首先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以适应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当敌情判定后，能歼则歼，不能歼则不打，只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如果在战斗中发现无胜利把握时，就应临崖勒马，只派小部队给敌相当的消耗或威胁，主力迅速撤出战斗。

三是活用战法。刘伯承指挥战斗，战法不拘一格，打法多样。他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先进战法，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形成了进攻、防御、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袭击、强攻、歼灭战、围攻战、打援战、遭遇战、伏击战、追击战等一整套的战法。他善于应变，因情施法。他反复强调一个指挥员"懂得战术是容易的，适应新情况，灵活运用甚至变换战术就不容易。""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员重要任

务。”㉗同样是伏击，根据不同情况，他有的伏击其救者，有的伏击其退者；有的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法，有的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有的是围师不阙，紧缩敌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虚张声势攻城，有的则是真围真打、既围城又打援。同样是歼灭战有的是拖刀计、回马枪，有的猛虎掏心。凡此等等无不说明刘伯承运用战法机智灵活，得心应手。

四是活用指挥方式。刘伯承善于灵活运用集中和分散的指挥方式。他强调要发挥战术指挥员的主动创造精神，提倡积极的机断行事。他说：“计划、命令是建立在最现实的情况上。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指挥员应充分发扬机断行事。”㉘他要求指挥员在作战中不能光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而要在注视战斗的进展中，以自己的积极行动消灭敌人。上级指示应以训令（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方式出现，以便下级机断行事。刘伯承在129师北上抗日时规定了三条原则：师部一般地确定任务，具体打法由各级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机断行事，根据敌情自行灵活作战；行军途中，可打则打；为了不误战机和保守秘密，各团有自行决定权，可以打完仗后再向师部报告。我769团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大获全胜，就是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表现。刘伯承还注重对战役全局起重要影响的战役性战斗实施集中指挥。定陶战役中，歼灭蒋军整3师第59团的战斗对战役有决定性影响，刘伯承遂亲自到担负攻歼敌59团的6纵，指挥部队全歼该敌，使战斗的胜利迅速发展成战役的胜利。

注　释

①⑥⑪⑫《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4、第140、第191、第193页。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⑬⑭⑮⑯⑰㉒㉔㉖㉗㉘《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35、第

160、第216、第445、第216、第445、第404、第216、第62、第437、第122、第404、第465、第509、第509、第508页。

⑱⑲㉑㉓《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第286、第207、第244页。

⑳《元帅用兵之道》海潮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80页。

㉕《军事学术》1982年第12期第10页。

试析刘帅战术思想的基本特色

李世选大校　崔亚峰上校　李梦鹤上校

刘伯承元帅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军"战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把战术与民众对敌人的一切斗争结合运用，以发扬全面战与全力战；就在于在敌我技术不平衡的条件下，不断地窥破与创造敌之弱点，经常保持主动权，给敌以突然的袭击，以消灭敌人生动力量；就在于具有明确坚定的政治信念与泼辣顽强的战斗作风，以达成抗战建国的战略任务。"①这段话，从斗力、斗法、斗志三个方面精辟地概括了我军战术的特点，集中体现了刘帅战术思想的鲜明特色。

一、综合群力与敌斗力，是刘帅战术思想的基石

力，即力量，是最基本的作战要素之一。刘帅提出的"综合群力"思想，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是其战术思想的基石。它反映了我军的传统，指出了我军打胜仗的一个基本条件。

（一）"战术社会性的扩大"是刘帅综合群力战术的理论根据

刘帅总结古往今来战争的历史，深谙毛泽东讲的"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他结合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经验，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战术社会性的扩大"的论点。他指出，这里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战斗争的成员问题，另一个是斗争的战术问题。"他认为，参加抗战斗争的成员，"必须是每一个中国人，而不单是某些少数人，尤其不是几个军人。几个军人，只能是侧重于武装斗

争的成员，但他又不能限于武装斗争。”因此，“战术被运用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武装斗争，而且应普及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斗争。”所以，“我们抗战的每一成员，必须掌握各种斗争的战术，不过个人都应抓紧个人斗争业务，而侧重于掌握自己的某一斗争的战术，并一般地掌握其他斗争的战术，以便与之结合（如战争、生产、教育等）而成一元化的斗争。”②

学习刘帅的这些论述，我们领悟到：战术，这个一向被认为仅是武装斗争中运用的事物，在人民战争中的确有广泛的社会性。一方面，战斗力的基本因素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人民群众，这是无产阶级群众观在战术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反映。另一方面，战斗力的发挥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必然涉及到了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领域中的知识和手段。所以，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头脑，就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员。必须在综合群力的基础上掌握和运用战术，才能不做刘帅所说的“单纯军事观点、脱离广大民众的军人”，才能“不做过时的人物”。③

可见，刘帅“战术社会性的扩大”的论点，解决的是关于战术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问题，是综合群力战术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三个因素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有机配合作战”，是综合群力的组织形式

刘帅所说的“三个因素”是指抗日作战的自卫队、游击队和基干军队等三种组织形式，亦即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这是刘帅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一贯坚持的武装力量基本体制，反映了刘帅十分重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的重大作用的作战指导思想。他强调普遍建立自卫队，在自卫队中成立村、区、县级游击队，使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强调以自卫队、游击队配合基干军队作战，强调以地方武装钳制、监视、迷惑敌人，以主力攻打点线守敌和增援之敌，以地方武装结合民兵带领广大群众参战，破击敌军的交通线，维护我军后方交通，担任放哨、侦察、警戒、除奸防特等战斗勤务，把各种战斗力量组

成一个整体。

为充分发挥“三个因素”的力量，刘帅不仅十分明确地指出“军区、军分区应依据各县、各区的军事行政系统，负责组织自卫队、游击队配合基干军队作战。……要以基干军队为核心、受它指挥，以争取作战的胜利。”④“基干军队应随时随地指导游击集团”，使他们在统一的作战意旨下活动，并为他们“设想周到，不可给以不能胜任的任务，有时并派出小部队领导他们游击。”⑤这就是刘帅贯彻其综合群力战术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在他所亲自组织指挥的著名的“白晋铁路破击战”、“百团大战”、“挺进大别山”和“大别山反清剿”等战役战斗中充分体现并凝为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丰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灵活机动与敌斗法，是刘帅战术思想的主体

法，即方法。战术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与敌人“斗法”，就其实质而言是个“谋略”和“战法”问题。刘帅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潜心研究古今中外之兵法，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创造出一套具有我军特色的与敌斗争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避强选弱、灵活机动、突然袭击、讲求实效等四个方面。

（一）立足于敌强我弱的不平衡，树立“以弱耗强，以强灭弱”的谋略思想

在刘帅的军事生涯中，他所面对的，都是一个个在军事实力上明显强于我的作战对手，这种总体上的“不平衡”成为刘帅研究战争、与敌斗法的基本立足点。他认为，总体上的这种不平衡，使得我们在战略上是打强的，需要树立“以弱耗强”的思想，而在战役、战术上则应是避开敌人强点，选择敌人弱点，通过“以强灭弱”实现战略上的“以弱胜强”。

刘帅这一谋略思想，在战术运用上充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以兵力重点打击敌人弱点而各个消灭之"。刘帅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扭转被动、不利局面，应该在战役、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就是说，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进攻，变成我军对敌军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将敌军对我军在全局上的优势，变成我军在各个局部的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这样，在打具体的每一仗时，就能以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就可以把集中兵力与打敌弱点结合起来，采用"杀鸡用牛刀"的战术，保证歼敌胜利。他指出："在战术上通常是'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故在兵力运用上，我们应以少数兵力钳制其他方面，借以腾出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常易得手。"⑦他用"按跳蚤"与"啃核桃"作形象比喻进一步说明：因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如果没有拳头，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正如我们按跳蚤一样，用五个指头同时按五个跳蚤，结果一个也按不住，如果看准一个、集中力量去按一个，就会按住一个、消灭一个。核桃很硬，一口是咬不动的，只有集中力量狠击一下，将它打碎了，才能一块一块吃掉。这种"以大吃小、吃敌一块"的战术，正确处理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以小打大、以散打集、以弱打强、消耗敌人"和"以大打小、以集打弱、歼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是我军战胜强敌最重要的战术原则之一。

二是"集中兵力火力于敌人弱点"，抓住作战重点。刘帅指出："按着战争来说，作战只有一个重点，而不应有两个或几个以上的重点，反对平均使用兵力。……集中兵力、火力对付一点，以次要的兵力放在其它方面，钳制敌人，达到重点方向的胜利。"⑧刘帅在战术范围内非常恰当地处理了重点与非重点、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攻击与钳制诸方面的辩证关系。他强调指出："我们可以在次要方向用一个人去扭打三个敌人，这样就可能在主要方向抽得三个人来痛打一个敌人，求得总体上的胜利。"⑨例如，刘邓首

长亲自指挥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定陶战役，面对国民党军队从徐州、郑州两个方向的进攻，抓住威胁大、距离近、兵力弱的郑州方向进犯之敌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在这个方向的5个师中，又把蒋之嫡系整3师作为重点，在该师中又把20旅作为围歼重点，形成了我集中9个旅对付敌1个旅的绝对优势，尔后再逐步扩张战果，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

三是要善于寻找敌人的弱点，并抓住它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刘帅在长期的作战中不断研究总结选择敌人弱点的方法和经验，指出：在兵力部署上，敌军阵势的结合部、突出部、指挥机关等有利于突击的部位是其弱点；从不同派系分析，杂牌部队为弱、嫡系为强，非主力为弱、主力为强；在作战空间上，孤军深入、态势突出之敌，常易强变弱；指挥官水平低劣，不同指挥系统之间矛盾，缺乏主动协调之敌，也常可成为供我军利用的弱点。为创造敌人弱点，应故示之以弱，纵其骄，诱其孤军躁进，在合围中予以有重点打击。对长于固守之敌，应压迫与引诱其突围，使其脱离筑城地带，变成弱敌，而我则扬长避短，以战斗动作上的出敌不意施行奇袭，消灭敌人。

（二）依靠“英勇的机动”，趋利避害，创造战机，经常保持战斗的主动权

刘帅把掌握战场主动权作为指挥打仗的重要秘诀，认为无论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都必须抓住主动权，并把“英勇的机动”视为争取主动权的必由之路，强调只有机动才能赢得主动，也只有掌握了主动，才可以机动灵活有效地歼灭敌人。他说：“在战术上最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受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⑩他明确地指出“走路也是战术”，“要吃肉就得机动，牛抵角只能啃骨头，至多也只能吃到排骨。”⑪

当然，刘帅所提倡的“英勇的机动”并不是无目的、无目标的盲目机动，他对机动的总要求是“把握住主动性、秘密性、迅

速性、坚决性和干脆性，主要是力求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⑫他告诫部属，要把机动与选敌弱点和选定主要方向结合起来。那种“不知机动要找敌人的弱点而以主力突击之，乃单是勇往直前去单攻敌人的正面，常演成对抗状况；或攻而得势，既不扩张战果更不防备敌人的反机动，这样当然不容易取得廉价的胜利，间或遭受到不需要的损害”；那种“不知机动要选主要方向、在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集中主力去突击敌人，乃单凭主观的诱敌深人，到处分散兵力，发觉有不合之处，就随便调动部队，牵弄兵力，使其不能适时参加战斗”的机动，是绝对不宜提倡的。⑬

刘帅还一贯坚持把快速机动与连续作战结合起来，提倡在运动中保证兵力的迅速前进和后退，适时集中和展开，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人。刘帅的机动艺术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诸如：大踏步前进和后退，把敌人调动起来打；敌进我进，驰骋敌后，纵深作战；看准敌合击的间隙，跳出圈外机动，奇袭敌人空虚要点；“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等，都曾使敌大损大耗，大伤脑筋。

（三）给敌以“突然的袭击”是最基本的战法

刘帅认为，在敌我力量不平衡的条件下，袭击是弱军战胜强军一个最基本的战法。他指出：“给敌以突然的袭击”是基本的战术手段，“以突然的袭击消耗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的捕捉为避害。”⑭袭击，可在战场上广为运用，无论是正规部队、还是非正规部队，无论敌人大小，无论是在运动中还是驻止着，都可以用突然的袭击战术。具体分为三种：一是袭击，用于敌静我动态势下，我找着去打他；二是伏击，用于敌动我静态势下，我预先设伏，等着来打他；三是急袭，用以敌动我动的态势下，碰着的时候打。通过分析比较，他认为“对运动之敌比驻止之敌好打得多，而伏击又是打运动之敌的好战术。”⑮

刘帅特别强调把“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视为袭击的要诀，并且强调袭击的灵活性。他主张根据当前敌情、我

情、地形与时间，灵活地计划和决定袭击动作，“如已计划实行袭击，忽然情况大变，以致胜利没有希望时，则游击队就应灵动地停止袭击或急速退出战斗。”⑯

刘帅在运用袭击的具体战法时，特别强调侦察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要求“隐蔽接敌，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提倡袭击战术应采取割裂合击手段，在合击中割裂，在割裂中合击，把割裂比喻成“要把核桃打碎来吃，不要啃整个核桃，囫囵吞枣，是无法下咽与消化的”。⑰在运用袭击战术的具体打法上，刘帅指挥作战更是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他提倡隐真示假，示形于敌，虚而实之，乘虚蹈隙，避亢捣虚，打击敌人。刘帅创造的许多战法，诸如“猛虎掏心”的纵深战；“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围歼战；“重叠设伏”、“利诱而伏”、“威胁而伏”的伏击战，以及“打头、打尾、拊侧背”，“夹其头、揪其尾、截其腰”，“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等，都是袭击战术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对我军战术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以“消灭敌人的生动力量”为战斗的主要目的

刘帅认为：“战术的全部结晶是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⑱，只有用武器打死敌人，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切战术的本质。

为了实现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战斗目的，刘帅非常注重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作战对象的作战手段、技术装备的特点和变化，研究探索新的斗法之术，“玩一点出乎典范令之外的新的花样”，提倡战术上的主动、灵活和实效，以能否最终吃掉敌人为检验战术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不论黄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他指挥过的战役战斗中，同样的伏击战，有的伏其救者、有的伏其退者，有的是“诱伏”，有的却是“威胁而伏之”；同样是运动战，有的是“猫盘老鼠，盘软再吃”，有的是“拖刀计、回马枪”，有的是“釜底抽薪”。战术手段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标准是基本的。

为了实现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战斗目的，刘帅还非常重视组织

指挥好每一场战斗，要求严谨缜密，实事求是，确保集中兵力达成全歼的目的。在具体组织指导中，他提倡周密计划部署，认为“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要因敌制胜，量力而行，精密计算，不打拼命仗、糊涂仗；提倡“深入海底”的作风，把歼灭敌人的胜利落实在准备工作的方方面面，认为只有准备工作做深做细，困难想得多一些，准备工作充分一些，深入战斗基层深一些，歼灭敌人的把握就大一些；提倡工作严格落实，包括思想工作的落实、作战技术的落实，以及战术手段、战斗方法的落实。

三、政治为本与敌斗志，是刘帅战术思想的灵魂

“志”，志向和意志。它是一种精神与情绪的体现，也是一种政治信念的反映。战争，不只是一种力的抗衡和法的较量，而且是一种志向和意志的斗争。刘帅明确提出了“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的论断，认为“无论现代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武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使用它的人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与纪律的训育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⑲因此，他总是告诫部属，在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环境中，更需要健全部队的政治生活，提高政治素养，充满战斗精神，把与敌斗志视为战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灌输为真理而战的思想

战场上两军对垒，既是一种物质力量的对抗，也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较量。敌对双方，谁能够用进步的政治武装士兵，赢得人心，鼓舞士气，谁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技术和战术，并最终将战胜对方。毛泽东指出：“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与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

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⑳毛泽东所指的“进步的政治精神，”其基本内涵就是为真理而战的思想。刘帅指挥作战几十年，一贯重视这种“政治精神”在战术运用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强调用进步的政治精神灌输部队，教育士兵，从根本上提高他们为真理而战的自觉性，为战术运用提供动力。他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与人民有血缘关系的子弟兵，不同于其他军队的主要特点，也在于它不但能够以窳败的武器，数量较少的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且它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战！也只有当它懂得了为什么而战——掌握了真理，它才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㉑他认为，只要我们的士兵懂得了打仗的目的，是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而战，在战斗中就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抗日战争时期，他面对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总是把时事教育和其他宣传工作，放在各项反“扫荡”作战准备工作的首位，揭露敌人的阴谋，讲明斗争的意义和前途，以坚定抗日军民保卫根据地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把游击战术的运用建立在“为真理而战”的思想基础之上。所以，无论敌人使用多少兵力，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对我根据地“扫荡”，每次总是被我抗日军民打得头破血流，以失败而告终。

（二）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斗作风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刘帅的一句名言，也是一种勇敢顽强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其实质是“良好的政治情绪与饱满的战斗精神”。刘帅认为，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往往比先进的武器装备更为重要，是战斗取胜的主要因素。如果军队没有高昂的士气和勇敢顽强的作风，即使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也不能取胜。所以，每当处于艰苦恶劣的形势下，他总是要提出响亮的口号，激励部队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困难，摆脱被动，争取胜利。

刘帅十分注意在向部属赋予战斗任务时，既交待战术，又鼓舞斗志，首先在精神上战胜敌人。解放战争时期的巨野战役中，第2纵队担负在龙固集一带阻击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的敌第5军。

战前，刘帅亲自深入该旅，面授机宜，作思想发动工作。他对5旅的干部说："我们硬是要把这两只老虎打个头破血流。要软顶硬打，先把敌人盘软，然后再打。象教师爷打架一样，先让后打。"㉒他这种大无畏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战斗中，虽然敌人的炮火异常猛烈，但指战员信心十足，勇敢顽强，硬是顶住了敌人的巨大压力，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三）注重政治攻心战，为战术运用注入活力

历史早已证明，要战胜敌人，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而且也特别需要政治手段。政治攻心战，就是这种政治手段的一种体现，把政治攻心战，融汇于战术运用之中，从意志上战胜敌人，这是刘帅与敌斗志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政治攻势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他经常强调，对于我军内部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以调动广大指战员的杀敌热情；对于敌人，也要开展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斗争，打垮敌人。他还强调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不能只靠军队"单枪独马的苦战，而应成为党政军民的共同任务，也不应把政治攻势视为只是政治机关的工作，而应视为司令部门的一个重要组织任务"，共同筹划、协调实施。

"一条标语和传单等于一粒子弹。"㉓这是刘帅对政治宣传工作重要性的高度评价。他说："敌人是非常害怕我们的宣传品的。"(同上）因此，他总是经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政治攻势这一工作，他要求"每个人民武装人员，不但要成为打仗的战士，而且要成为一个宣传者和组织者"。㉔

刘帅认为，政治瓦解，不断扩大敌军的反战和反正行动，是我们打胜仗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说："有了这个条件，才能更顺利地保障我们遂行攻无不克，天下无敌的战术。"㉕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游击战术，而且还提出了瓦解敌军的具体办法："一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民族教育，使其自尊人格，自信胜利，特别揭破日寇任何'以华制华'的阴谋，使每一公民认识伪军干的是出卖民族的勾当，以限制其发展；二是从各方面，尤其是从

亲友方面做工作，秘密进行民族教育，示以抗战胜利的光明前途，给以可能做到的秘密工作，以启发公开反正的义举。我们吸引水冶皇协军第一军的反正，就是这样做的；三是对于顽固的伪军给以消灭的打击，但对被俘的人员，即使是官长，也不杀害或侮辱，而应加以优待与教育，给其他伪军以影响。对于伪军家属，应给以教育，使之进行伪军反正工作。"㉖这些具体办法，对瓦解敌军，展开政治攻心战，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我军战术的运用注入了活力。

通过对刘帅战术思想的基本特色的浅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帅对斗力、斗法和斗志这三个战术范畴中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学习和总结刘帅的战术思想，继承老一辈军事家留给我军的传家之宝，对于发展我军的战术思想，使之成为现代战争条件下"攻无不克，天下无敌的战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⑩⑫⑭⑯㉑㉓㉔㉕㉖《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213、第371、第372、第127、第128、第519、第445、第62、第192、第90、第120、第123、第289、第353、第352、第111、第110页。

⑦《刘伯承元帅研究》重庆出版社，第170页。

⑪《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93页。

⑬《刘伯承军事译文序跋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4页。

⑮⑰⑱⑲《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91、第314、第30、第56页。

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11页。

㉒《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29页。

论刘伯承游击战理论的基本特色

王遵礼大校　韩嘉和大校

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解决了军队建设和作战的一系列实际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军事著述；其中关于游击作战问题，占有显著的地位。从整个游击战争到具体游击战斗，从力量组成到力量使用，从战略指导到战术运用，从行动原则到指挥方法，从基本理论到应用理论等都作了阐述。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游击战的理论体系。刘伯承游击战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关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又胜利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成为克敌制胜的强大理论武器。

刘伯承游击战理论，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研究这些基本特色，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我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正确理解敌人无法对付也无法借用的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也有助于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创造性地运用其基本思想观点，指导新的实践。

一、指明游击战争的人民性，视民众为制胜的重要条件

把游击战争同民众的利益、进步的政治联系起来，把游击战争的胜利同民众运动、军民结合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是刘伯承游击战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

刘伯承十分强调游击战争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指出："我们的游击战争是革命的，也只有革命的游击战争才能发展，因为它

是……和群众利益相结合的。”抗日战争时，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之所以开展得如火如荼，正是由于它与民众的利益完全一致，广大民众能够全力以赴、同心协力地开展对敌斗争所致。为此，刘伯承要求人民游击武装，要宣传教育人民群众，积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每个战士在游击作战活动中，都要时时处处关心和爱护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

刘伯承还强调战争同政治的紧密联系。他认为：革命的游击战争“与政治是分离不开的，不能单纯看成是军事问题。”这就是说，要把战争行为同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当前的政策联系起来处理问题。为此，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贯彻党确定的具体统战政策，把各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其次要在政治上争取群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做好政治工作，明确地、以身作则地实行党和政府的政治主张。他归纳的游击队活动四大要领中，第一条就是“政治主张要公开要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再次，要以政治为尺度来确定战斗活动，特别是部队进入敌后初期更应如此。他指出：“繁殖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主要是以政治进攻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任务的需要与否而决定之。”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以人民群众为首要条件的，革命的游击战争，更需要依靠民众这个条件。刘伯承在《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中，回顾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作战的情况时就说：“我们两年来伟大的战绩，得力于民众至深且大。”他把动员全民族一致抗战，看成是保障我们打胜仗的重要条件之一，认为“有了这个条件，才算发扬了我们传统的‘综合群力’的战术。”正是如此，他一再强调要推进民众的抗战运动，明确指出它对运动战和游击战有密切的关系．他把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看成是进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一个基本问题，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存在。”他还从反面引用国民党军庞炳勋部在“敌进我进”中失败为例作了说明。他认为：国民党军敌进我进军事政策的破产“没有别的道理，就

是自私自利，高悬于广大民众的头上，甚至压迫民众的缘故。”

刘伯承重视民众在游击战争中的作用，归根结蒂落脚于实行军民结合。他多次讲到，军民要“血肉结合”对敌进行同生死共命运的斗争。指出：军队作战结合民众斗争“是民族游击战争的特点，也是革命军队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政策。”“军民结合斗争，即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刘伯承所讲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军队和工农群众的结合，而是党、政、军、民的结合。他在《关于反“扫荡”的准备问题》中就讲到：“每次粉碎‘扫荡’的经验，就是党政军民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结合，是军事斗争和非军事斗争的结合。为实现这种结合，他要求军队必须帮助地方工作，帮助地方党军事化，地方党也要教军队做地方工作；要求加强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规定野战军和地方军的各级指挥机关，应有党政民随军代表，以便指导群众遂行军事勤务，保持军民间的协同动作；要求军队和地方领导机关积极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参加对敌斗争，并派好的干部去领导他们。

二、提出全力战、全面战思想，实行各种力量和制敌手段的结合

刘伯承极其重视对敌斗争整体力量的发挥，明确提出全力战全面战思想。即把军事的与非军事的斗争，正规的与非正规的力量及其作战，这一区域与那一区域的作战，一种作战方法与它种作战方法的运用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展对敌斗争。这是刘伯承游击战理论的又一个特色。

“全力战即是以军事为轴心，配合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战。”刘伯承把这种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的结合，称之为文武两种战术的结合。他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战术被运用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武装斗争，而且应普及

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斗争。”刘伯承特别强调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指出：“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他要求“必须从紧张的游击战争中去发挥各种斗争的威力，首先是政治攻势。”之所以如此，正如他在《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中所阐明的道理：政治攻势；而政治攻势不仅激起了敌占区同胞的抗战热潮，也激起了敌军的反战热潮，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

在军事斗争中，各种制敌力量和手段在同一的或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协调打击敌人，使敌人顾此失彼。这就是刘伯承的全面战思想。这种思想付之行动，便可以战胜日寇各式各样的围攻、“扫荡”、蚕食。

在武装力量组成上，以“三种力量”结合组成游击集团。这三种力量就是基干军队、游击队、自卫队。刘伯承把这看成是对敌作战力量的三个因素，并把它们的结合与配合形象地比喻为打击敌人的手，说基干军队是骨，游击队是筋，自卫队是肉，它们在作战中形成一个一致的、有机体的动作。他要求“我们各级干部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因素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有机地配合作战。这样才算得全面的有组织的抗战”。

在斗争力量使用上，强调劳动力和战斗力的结合。刘伯承指出：“无论是破击战或反‘扫荡’战，我们都要使劳动力与战斗力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战，使敌人顾此失彼。”这是一种战斗力的战斗活动和劳动力的劳作活动的结合。劳动力的劳作活动，用以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军用资材和工程设施等，这对断敌交通和补给来源，以困饿疲敌，具有重要作用。刘伯承多次讲到交通斗争问题，把这看成“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他把破路拆堡、空舍清野，视为消灭敌人有力的辅助手段，指出“如果我们单纯战斗，而不实施破路拆堡，空舍清野，那简直是蠢笨。”在运用劳力对敌斗争中，也强调多种手段的结合。指出：“飞行爆破、大众破坏和技术破坏，细部的破坏和大部的破坏，都要互相结合。”

在作战行动的协调上，强调各个区域的作战相互配合。刘伯

承在《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中，讲到要强化全面战时，简要注释为“到处都有”。在敌人兵力不足而占地又广的情况下，我各地区的游击集团积极活动、主动配合，就能使敌人顾此失彼，无所作为；敌若集中兵力行动，则往往扑空，若分散兵力行动，又会处处遭袭击。为此，刘伯承强调，各游击集团的活动，要独立自主和自动互助。认为“只有如此，才是全面游击战争，使敌人到处都逢荆棘，也无法聚而歼之。只有全面游击战争，才便于集结兵力进行突击。”为对付敌人的多路围攻和合围“扫荡”，要求“必须使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摧击补给线的部队和腹地反抉剔‘扫荡’的部队，各就现势协同动作”。

在作战形式的运用上，强调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相互为用，连贯一气。刘伯承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中认为，在广大民众中繁殖游击战争的条件下，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配合，在长期抗战的战略上，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广大民众参加游击战，才利于打运动战；而运动战的歼灭性效果，又迫使敌人集中行动，而给游击战以更大的活动空间，并使游击战得以加快发展。刘伯承还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并无一条鸿沟，而是相互连贯着的。”从武装力量的发展角度看，县游击集团中的干队，就是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雏形，军分区的基干支队，就是游击队壮大的正规军。从战斗时的任务区分角度看，军分区的基干支队和县区干队，就等于正规战的突击队，而周围的游击队，则等于它的箝制队。从作战形式转换的角度看，敌人大军云集，我则减少集结主力，分遣一部到各地区领导和加强游击战；敌人布兵稀薄或有隙可乘时，我则集结附近的部队作运动战。游击战术的一切特长与方式，运动战都尽量运用。它们之间“在战术上连贯的一环，就是趋利避害的机动”。当然，运动战与游击战毕竟是正规与非正规的两种作战形式。正是如此，他指出在游击作战中，何时以何种形式为主，应当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在整个武装对敌斗争上，强调反蚕食与反“扫荡”斗争的结

合与配合。刘伯承指出："抗战区与敌占区的游击性同时增大，需要我们把反蚕食与反'扫荡'的斗争，结合成为相辅相助而不可分离的工作。"因为反蚕食不仅可以制止敌人的蚕食、扩大反"扫荡"的回旋地盘，而且能够取得敌人"扫荡"的情报，使敌人无法对我实现远距离的奇袭；而反"扫荡"不但可以强固反蚕食的支援地，而且能够沉重打击敌蚕食的主力。他认为，只有这两种斗争的结合，"我们才可以获得空间与时间的自由，使敌人顾此失彼，顾前失后。"他把反蚕食斗争的区域，划分为三种地带，即腹地、游击警备地带和敌后，并认为采取正面抗击同时在敌后发展这种方式为最好。对反"扫荡"，也强调把在敌人背后进行游击和在根据地对"扫荡"敌人进行游击结合起来；把在敌合击圈外的战斗与在敌合击圈内的战斗结合起来；把游击分队对敌人的袭扰、破击和基干军队抓住敌弱点进行强有力的突击结合起来。总之，在反蚕食和反"扫荡"的斗争中，到处都有打击敌人的战斗活动，都需要发挥全面战的威力。

三、强调把握主动地位，发扬游击战宽大的机动性，趋利避害

刘伯承游击战理论的再一个特色，就是特别强调"把握着主动地位，发扬宽大的灵动性，以突然的袭击消耗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的捕捉为避害"。他把"紧握主动权，灵活而有计划的袭击"，作为游击队的动作要领之一。

刘伯承认为，紧握主动权，是指挥艺术问题。要实现这一点，"宽大机动地创造或寻找敌人的弱点，并抓住它的弱点，给以有计划地突然地袭击，是把握主动权最好的方法。"根据这一论述的观点，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侧面来理解把握主动权问题。

一是既要"游"，又要"击"，游与击有机结合。刘伯承在谈到游击战的目的时说，游击战的积极目的是消灭敌人和消耗敌人，

是采用"击"的手段来达到的；消极目的是避免敌人消灭和遭受不必要的消耗，这种目的是采用"游"的手段来达到的。他认为，"游"用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用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因此，应使"游"与"击"巧为配合，"游来游去不对，击来击去也不对，必须游来击去或游去击来才对。"他还说，我们的作战，是先拖后打、拖打兼施的，这就是游与击的道理，但拖中有打，打中有拖，不可机械分开。在游与击的作战中，他强调："游中有击，避免穷追；击中有游，避免被消灭；游要隐蔽，击要突然。"游要"机敏灵动，出没无常"；击要"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为要做到此点，他指出，一要经常对敌情作深入的侦察与研究，先知敌"意"敌"备"，才易于我击敌"不意"和"不备"；二要防谍除奸，严守秘密，散布谣言，多方佯动，采取不规律的行动。

二是善于寻找、创造敌人弱点，并抓住、痛击敌人弱点。刘伯承在谈到机动的要求时，头两条就是"（一）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二）集结绝对优势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他要求："眼快手快，抓到敌人弱点给予痛击的战术，需要在全军中发扬起来"。他提倡"狼的战术"，正是对其上述思想集中而生动的说明。他十分重视对敌交通线上的作战，在对付敌人围攻和"扫荡"时，总是以有力的一部或主力大部在敌人合击圈外交通线的基本段上进行破击；对多路分进合击之敌，则抓住敌人外翼侧，或其他策应不灵之一路予以突击；这就是寻求的敌人弱点。我以一部兵力迷惑敌人，积极袭击敌人，"吸引或迫使敌人到我们所愿意的方向去，以适应基干部队机动的要求。"这就是创造敌人的弱点。而一旦寻求或造成了敌人的弱点，就坚决予以痛击。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正是在敌人主要交通线上予敌以痛击的；而武乡长乐村一战，则是抓住敌人疲困的一路予以痛击的。

三是采取"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

战法。刘伯承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这就是："拿我们的弱的部队去消耗敌人强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的强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弱的部队；拿我们分散的部队去消耗敌人集结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集结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分散的部队。"这是集中兵力原则在游击作战中的具体运用。在刘伯承的游击战理论中，武装力量的分遣和集结是紧密结合的。就一个具体部队来说，是时而分遣，时而集中，分遣以消耗、削弱、疲惫和迷惑敌人，创造战机，集中以歼灭敌人，使主动权从胜利中显示出来。例如对付围攻和"扫荡"之敌，我遍布的游击集团网察报敌情并积极袭击、破击、扰乱敌人，就是在"以弱耗强"，"以散耗集"；我基干部队在游击集团网的掩护与配合下，保持其集中和机动性，抓住敌之弱点而突击之，就是在"以强灭弱"，"以集灭散"。基干部队视情况也要适时分遣与集结，通常是以一部分遣游击，大部集结作战。

四是到处采取积极主动的攻势作战。刘伯承指出："游击队要把握着主动地位，到处采取进攻，绝少防御。""无论大小部队都应采取积极的、主动的进攻作战，而避免消极的、被动的受迫作战。"以进攻来夺取主动，这是两军对抗时通常应争取的。刘伯承认为，这个问题对游击战来说更为突出。他在《对目前的战术考察》中批评有些同志"把游击队当作正规军一样，把布置和动作弄成防御的形式，那是极端错误的。"错就错在这种防御形式由于放弃了游击战极需的主动性和机动性。要采取攻势行动，就离不开有利的机动。刘伯承认为，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行动。趋利，要扩大到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受敌人丝毫的损害。他尤其强调"指挥员切合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这就是说，机动的目的在于摆脱被动而夺取主动，在于创造战机造成有利形势，以有力的进攻来突击敌人的弱点，以达消耗和消灭敌人。

四、明确战斗的基本思想和打法，突出灵活制敌，因敌而制胜

准备秘密周到、袭击迅速突然，战法灵活多变，这是刘伯承游击战理论在具体组织实施游击战斗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这是刘伯承对灵活机动游击战术的一种通俗表述，是他游击战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极为重视在作战中多种形式和具体制敌手段的结合运用，无论何种办法，以能够制胜敌人者为上。他还强调怎么于我有利，我就怎么打。他《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不仅白天要打击敌人，而且要黑夜打击敌人，“敌人白天行军疲劳，黑夜睡下象死猪一样，是最好打的。”他一面要求研究敌人的行动规律，另一面要求我们自己“一切都是没有规律的行动，使敌人无从侦察捕捉。”并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战法。他组织所部进行的七亘村重叠设伏，就是一个打破常规出敌意外的战斗实例。

刘伯承把袭击、伏击、急袭视为游击战的三种基本战斗方式和手段。之所以是“基本”的，就是无论大小规模战斗都可以用，连麻雀战这种游击战中最散的战斗活动，也是用这三种基本打法。另外，这三种打法可以在一次战斗中结合使用。如“吸敌打援”就是袭击动作与伏击动作的结合。考虑到敌人会“以子之术，攻子之术”，为此，刘伯承在《对目前的战术考察》中，把袭击与对付袭击、伏击与对付伏击、急袭敌人与避开敌人急袭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也显示出刘伯承游击战理论的独到之处。

刘伯承明确把“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作为游击战斗的要诀。他说：“游击战争的打法，都是用袭击。袭击的要诀，就是‘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袭击’。”这是对具体组织与实施游击战斗方法的高度概括，对于游击战争的任

何战斗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敌人无论是大是小，我之战斗目的无论是消灭敌人或是消耗敌人，都可以用袭击；正是如此，我无论采取何种战斗方式或手段，也“总是要仔细周到地计划和迅速果敢地动作”。刘伯承十分重视战前对情况的调查（侦察）研究（判断）并及时定下决心作出计划。他把指挥打仗做好这步工作的基本要素，称之为“五行术”（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要求“必须根据当前的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灵活地计划和决定游击队袭击的动作”。要求“计划清楚，作秘密审慎的准备”。他在论述袭击这一手段时，就详细讲到了对敌情、地形、民情的侦察和调查；讲到了决定袭击时机和基本部署，以及战斗保障等问题；讲到了接敌运动动作和注意事项等。他对夜袭阳明堡机场总结的三条经验就是：侦察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

刘伯承善于针对敌人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不断运用新战法。抗日战争中，他在布置和总结反敌围攻和“扫荡”作战时，总要对敌人的情况作一番分析阐述才讲我们的对策和战法。他要求“各级指挥机关各部队首长，都应随时注意研究敌人在‘扫荡’中使用新的兵器、战术和总力战一切新的办法，以及我们对策有新的发明”。并要求不断搜集和通报各部队，以便能防备敌人的新办法，而发扬我们的新办法。他在《论运动战与游击战》中就说：“如果我们作战审计了敌我的长短，玩一点出乎它们典范令之外的新的花样——主动袭击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它们就要感觉难于应付。”他还用平型关、阳明堡、七亘村、广阳诸战斗为例来证明上述观点，指出敌人已感觉对此不易应付，竟至避开我们的情况。

五、提倡作战指挥的机断专行

强调游击队行动的独立自主，指挥的机断专行，主要以训令方式实施指挥，以及对指挥员素质的严格要求，这是刘伯承游击

战理论反映在指挥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游击武装及其指挥员的要求上，强调政治坚定，思想机警，行为机断。刘伯承认为，无论什么武装组织，“它们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干部问题。‘干部决定一切’”。由于游击武装多在敌人后方活动，经常处于复杂、多变的情况和紧张、残酷的斗争环境，其行动往往需要其自身急迫作出决定；而其决定的正确性如何，便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正是如此，他要求游击武装的首长必须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而熟于游击战术，能机断专行，独立自主地决定行动。他在《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中提出，凡独立行动的部队的干部，特别是分遣连的干部，应是在上级总的意旨之下，从政治上积极负责，独立自主，刚胆沉着，机断行事；没有消极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犹豫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等待上级指示才做的事情。

在指挥体系与指挥关系上，确立以“干队”为核心，由主力部队到地方部队再到游击队、自卫队民兵。由于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争，是多种武装力量和多种作战形式、手段的结合，因而在指挥的体系与关系上便有其自身的特点。刘伯承明确的各游击集团的指挥系统是：在军分区直接的军事指挥系统之下，县、区、村均建立游击指挥部，这是各该级所属武装进行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领导机关，同时也是党政军民联合办事处，县、区、村长分别是各该级指挥部的指挥；由于指挥部是依托“武委会”来进行军事工作的，因此“武委会”主任就是各该级指挥部的副指挥。各军分区、各县、各区等地域的任何武装组织的作战事项，都分别归军分区首长、县长、区长、村长统一指挥。若“正规军较大部队在某一地域活动时，……则由军区、军分区指定正规军相当首长统一指挥之。”他要求“军区、军分区、野战旅在战役组成上，应随时把县、区、村三级指挥部的对敌斗争，包括在指导之内”。县、区、村的指挥与副指挥应亲率本级基干队，辗转各区、各村，指导当地的军事、政治等斗争。他还明确，军分区基干团长、野战

军营长率部队到某个县境内活动时，可以指挥该县所属一切武装配合作战，但应经过县指挥部令行之，并由县指挥部派出随军代表。为了在作战时相互配合默契，协同动作密切，要求“基干军队要经常到联系县帮助地方武装的建设工作和民众工作。”

在指挥方式上，要求多采用“训令”。为了发扬游击武装的机断行事，刘伯承主张上级对下级的“指挥方式多用训令”。他还指出，指挥游击武装的动作“不应取决于会议方式。”对于指挥机构，则要求“指挥机关的组织务求减小，人员务求精干。”

刘伯承对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特质的揭示与运用

王宪志少将　李元奎上校　卢来宾中校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将我军的作战原则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刘伯承以其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原则的特质”这一科学概念，对“十大军事原则”的基本精神作了深刻而独到的揭示。他指出机动是毛泽东军事原则的重要特质，并将机动战法运用于战争实践，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作战指导艺术，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1948年7月7日，刘伯承在《〈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编译后言》一文中，以一个军事理论家的高度概括能力，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原则的特质”这一科学概念，并深刻揭示了其内涵。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绝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而应为我们所把握以战胜蒋介石的。”①在这里，刘伯承强调指出“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将机动作为我军以弱军战胜强敌的制胜之道，并以此作为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重要特质，为我们深刻理解我军作战

原则的精神实质提供了一把钥匙。

首先，我军以弱军对强敌作战，“因而就更需要机动”。刘伯承指出：毛泽东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②.“毛主席的人民的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更需要机动。”③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面对的是装备和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军只有通过机动，才能保持主动，调动敌人，“耗散”敌人；才能捕捉敌人的弱点，变全局的劣势为局部的优势，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正如刘伯承所说的：“宽大机动地创造或寻找敌人的弱点，并抓住它的弱点，给以有计划地突然地袭击，是把握主动权最好的方法。”④“我们的作战的机动，必须：一、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二、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三、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之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援救其被突击的弱点。”⑤因此，强调机动，是由我军作战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其次，机动是实现歼灭战的重要条件。我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打歼灭战，这是我军作战原则的核心，而机动是实现歼灭战的重要条件。刘伯承深刻揭示了机动的本质并指出了机动与歼灭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所以我们机动作战就是要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⑥“总之，机动是消灭敌人的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硬是把敌人消灭，才是解决战斗。这就是对机动作战的认识。”⑦他还形象地指出：机动和“牛抵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要歼灭敌人就要机动，“牛抵角”歼灭不了敌人。“我们的爱国自卫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⑧由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机动是实现歼灭战的重要条件，其本质就是消灭敌人。因此，强调机动，同我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歼灭战是一致的。

再次，机动是实现战争目的的有效手段。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是战争的军事本质。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机动。刘伯承指出："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受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那就要靠指挥员切合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⑨还指出：战争中"以主动的进攻与追击消灭敌军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以至变成防御退却为避害。"⑩这就告诉我们，机动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即趋利和避害。趋利就是当着战争中出现有利态势时，迅速地抓住战机向敌发动主动进攻与追击，以消灭敌人。避害就是当着战场情况不利于己时，须避免敌人的突袭，进行必要的防御和退却。由此我们看到，机动就其总体而言，包括了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两个方面，是战争目的的体现，也是实现战争目的的手段，正如刘伯承强调指出的："如果军事行动不秘密，不诡诈，则不能作趋利避害的机动，就不能达到消耗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⑪因此，强调机动，体现了战争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刘伯承将机动这一贯穿我军全部作战原则的重要环节作为毛泽东军事原则的重要特质，是符合我军长期作战客观实际的，是符合我军作战根本指导思想的，也是符合战争目的要求的，因此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他关于机动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深化和扩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内容，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军作战原则的基本精神指明了方向。

（二）

刘伯承不仅将机动作为我军作战原则的重要特质，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而且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机动战法，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指挥艺术。

（一）大步进退　争取主动

刘伯承认为，宽大机动是把握战场主动的最好办法，所谓宽大机动，就是要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他指出："或者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之弱点而消灭之，这是机动的主要方针；或者大踏步地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特别要避免敌人的合击。"⑫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正确把握进与退的辩证关系，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进退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相联系，指挥部队实行大踏步进退，调动和耗散敌人，寻找或迫敌暴露弱点，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性打击。

土地革命战争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堡垒主义，刘伯承提出建立"远殖游击队"，深入敌后。他指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特别在广东敌军没有连续的碉堡）的间隙，而入于其后方交通路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⑬他还强调"游击队在穿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在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才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⑭这些论述体现了大踏步前进的思想，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未被"左"倾领导者采纳实施。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指挥 129 师，在敌后大踏步进退，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1937 年 10 月，为配合忻口、娘子关保卫战，刘伯承率领 129 师深入敌后侧击敌人。先是指挥 1 个团，机动到同蒲路北段敌之侧背，取得了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破坏敌机 24 架，歼敌 100 余人。之后，又指挥 1 个旅转至娘子关方向敌后，取得了长生口、黄崖底、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并顺势转入敌后，创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1938 年 10 月后，日军回师华北，企图控制平原，封锁山区，然后向山区进攻。为打破敌人对平原根据地的进攻，刘伯承指挥 129 师主力挺进冀南平原，与敌

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和发展了冀南、冀鲁豫根据地。1940年4月，刘伯承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他指出：“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要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⑮同年12月，他主持编写的《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中再次提到：“敌进我进：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这些论述，强调了“敌进我进”的重要意义，为大踏步进退的战法注入了新的内容。1942年3月，他依据这一原则，提出了组织大量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除奸除特，瓦解伪军，逐步建立游击根据地，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个创见和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肯定，很快成为指导全国敌后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行，有力地扼制了日军的进攻，推动了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加速了战略反攻的准备。

全国解放战争中，刘伯承更加充分地运用了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战法。1946年到1947年6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辗转机动于冀鲁豫战场，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在运动中调动敌人，迷惑敌人，捕捉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打了许多漂亮的歼灭战。定陶战役中，我军以运动防御吸引敌两路夹击中的一个整编师突出冒进，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予以歼灭。鄄城战役中，我军置敌7个旅组成的强兵集团于不顾，从纵深实行大踏步的宽大机动，突然出现于战场，打敌措手不及，歼敌孤立无援的1个旅。滑县战役，我则实行远距离奔袭，从三股敌人的结合部突入其纵深，猛击敌首脑机关，打乱敌人的部署，创造了可取速决歼敌之效的“掏心战术”。巨金鱼战役中，我军运用“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的战法，避开强敌，大踏步向敌占区挺进，转战于敌兵力薄弱的地区，化被动为主动，各个歼灭了敌人。

如果说这些战役是刘伯承将大步进退的战法运用于战役指挥而取得胜利的光辉战例的话，那么，刘伯承和邓小平所指挥的千里跃进大别山，则是运用大步进退的机动战法而取得战略性胜利的壮举。1947年6月，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取得鲁西南战役的胜利。随后，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直插敌人战略纵深，在大别山实行战略展开，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态势，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当敌集中33个旅围攻大别山时，刘伯承又指挥2个纵队分别向桐柏和江汉地区机动，并亲率1个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机动。当时有的同志认为，这是“前进1000里，后退500里”。实际上，这种退中有进、以退为进的机动，正是刘伯承对大步进退战法的巧妙运用。

（二）合围割裂　钳形攻击

刘伯承认为，要在机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关键在于合围与割裂，合围就是防止敌人突围逃走，割裂才能各个歼灭敌人，而钳形攻击是在机动中合围、割裂敌人的有效战法。他指出，由于我军善于宽大的机动，捕捉敌人弱点，所以战役合围较易达成。完成对敌合围之后，还必须采取迂回、包围等机动样式，割裂敌人，以便于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的劣势兵力实行各个合击，以求得各个歼灭。在各个合击敌人中，仍然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的合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刘伯承强调指出：“运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击方向会合于一点。如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⑯他还具体论述了割裂时的行动。指出，割裂必须判断敌人防御体系，寻找其弱点，如敌人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展开态势的间隙、纵长队形与便于我军接近和割裂的地形。割裂的动作，他要求在主要方向上担任钳形突击的部队，自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开始，必须从突破口透入纵深，贯穿到底；又必须从突破口分向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肢

解敌防御体系。为此，主要突击方向必须有强大的兵力作纵深的梯次配置，以便适时机动，扩张战果。两个突击地段中间地带的部队，则作辅助进攻的钳形突击，或扼守要点防御，或实施佯动，从各方面同时动作，尤其是从各方面同时施行向心的突击，使敌人四面受击，无法使用预备队或从某处抽兵实行抵抗或突围。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上，须根据情况作诱伏或待伏，或作封锁的部署。

以上这一整套围歼敌人的机动战法，是刘伯承吸收了苏联红军合围钳形攻势的精华，结合自己的作战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是其进攻战法的核心。在战争中，他将其灵活地运用于作战指挥，克敌制胜。1948 年 7 月 2 日，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当我军攻克襄阳城敌外围部分阵地后，鉴于城南山区敌主要阵地不易攻占，而城东、西两面防御薄弱的情况，我军一反历史上取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以一部佯攻虎头山、羊祜山，钳制该处之敌；集中主力从城西、东南和东北突然攻城，并将突击方向指向敌指挥所。经激战，一举攻克了敌严密设防的襄阳城。在此次战役的总结中，刘伯承指出，这次战役在“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在淮海战役中，刘伯承充分运用了合围与割裂的机动战法。战役一开始，他就指挥中野一部一举攻占了徐蚌线上的战略枢纽——宿县，不仅保证了华野迅速歼灭敌第 7 兵团，而且分割了徐州、蚌埠、蒙城三处敌军，使徐州守敌陷入我之重围，并迫使蒙城和蚌埠之敌加速北援，从而为我以后陆续歼敌创造了条件。战役第二阶段，刘伯承将集中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方针，形象地比喻为“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这一比喻，深刻地体现了在战役全局上实现对敌人的割裂之后逐一围歼的思想。在进军大西南的作战中，刘伯承依照中央军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在更大范围上运用了合围与割裂的机动战法。他指挥第 4 兵团由广东、广西进

军云南，以第3、第5兵团经湖南、湖北进军川黔，割裂了胡宗南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切断了胡宗南集团逃往国外的退路，将其合围于四川境内，然后实施战役分割，各个歼灭。

（三）外线突击　内线配合

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经常处于敌人的围攻之中，反围攻是我军重要的作战样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就提出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内、外线配合粉碎敌人“围剿”的方法。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我军根据地的“扫荡”，采取分进合击的围攻战术，对我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实行多方面的大合击，形成“铁壁”、“铁桶”、“铁环”式的合围圈。各方面的敌人先在前进道路上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合击。针对敌人的合围战术，刘伯承认为实行外线突击与腹地坚持相结合是粉碎敌人围攻的有效方法。

刘伯承主张，当敌围攻时，主力应跳至外线，与内线坚持部队相配合，实行内外配合的反围攻机动作战。他指出：“正规军本队在大‘扫荡’开始时应在内线活动，及敌人到达利害变换线（被合击的危险圈）时，最好寻求敌人梳子队形的结合部，以转出外线作战。”⑰他还指出，这种机动，其目的不只是要消极地脱离敌人的合击，而且是要积极地奇袭敌占区要点，摧击敌人的补给线，尤其是背击敌人残置封锁部队，以策应腹地游击集团活动及其反抉剔“扫荡”的动作，造成敌人腹背受击的环境。为此，跳至外线的正规军应随时寻找敌人的弱点，集结适当的兵力给以有力的打击，以错乱敌人的阵势，求得有力的机动。为了使内线与外线相配合，刘伯承认为，除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外，正规军应派营或连留在内线加强游击，以创造主力机动自如的局面。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了内、外线部队的作战原则。指出，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他又指出，由于内、外线的交错，故两种原则须交替运用。当敌“扫荡”某一地时，一方面，我内线部队，除以某些游击集团在次要方向牵制

外，其主力应首先击破敌较弱的一路；另一方面，我外线部队的合击，须与内线部队，特别是内线主力协同动作，互相呼应，以使敌腹背受击。

刘伯承还主张，在敌人“扫荡”的条件下，正规军应适时地分遣与集结，以集结为主、分遣为辅。他指出，正规军进行机动作战，必须首先分遣以牵动敌人，错乱其合击阵势。当敌精力疲倦，阵势散乱之时，特别是在敌分兵摧毁民众与资财，收兵归巢时，应集结适当兵力，给予有力的打击。而游击队则以分遣为主、集结为辅，以充分发挥游击队的灵活性，配合主力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指挥我军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中，在更大规模上运用内线坚持与外线出击相结合的机动战法，以邓小平率部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刘伯承率部向外线突击，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而且创建了新的解放区，造成了中原战场更加有利于我的战略态势。

（四）适时退却　力避被动

刘伯承认为，机动作为趋利避害的行动，不但有主动突击敌人弱点的一面，还有避免敌人突击自己弱点的一面，只知趋利而不知避害，就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此，当处于不利态势时，撤退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机动形式，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必要环节。他指出：“退却战斗虽是一般军人所不愿听的事，可又是最难指挥的事，且是在运动战中又确有必要的事。”⑱刘伯承还认为，主动的撤退与被动的败退是有区别的，并指出：“我们的撤退是击退了敌人，为了保障胜利而撤退，并不是被敌打败而撤退。”⑱

为了进行主动的撤退，刘伯承认为在下述情况应果断地定下撤退决心。一是遭敌袭击时。他指出，当遭敌袭击时，假若时间紧迫，反袭击来不及，或来得及但将陷于不利时，则实行撤退。二是没有胜利希望。他指出，“估计能够胜利就打，不能胜利就撤走。或正在打，一见得不到胜利时，也要撤走”，“既使战斗开始才发

现无胜利把握时也应撤退”。抗日战争的长乐村急袭战中，刘伯承指挥129师主力和兄弟部队，与日军激战多日，获得歼敌2000多人的胜利，黄昏时敌援兵赶到，我虽打退其多次攻击，但刘伯承分析，此时急袭战斗已转变为正规的大开大合的战斗，打退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力量有余，消灭敌人全部则力量不足，于是决定巩固已得胜利，不留恋于无把握的胜利，以免陷人被动，果断地指挥主力撤退至山地待机。他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指出，这种急转直下的决心是正确的。

刘伯承认为，撤退是最难指挥的一种机动形式，必须严密组织实施。他主张，在战斗之前，应规定撤退路线和集合场，制定撤退计划。撤退的时机最好选择在夜间。撤退时须下达命令，确实掌握部队，防止溃乱。主力应向有利的隐蔽地形，沿着敌人尤其快速部队难以追击的道路撤退。掩护队应以移动防御掩护和伏击掩护等方法阻敌追击，并适时分散退却，或交替转移，特别应引诱敌人到错误的方向。组织撤退时，指挥部应组织拦阻队，在后方选择要地拦阻撤退部队，使之集中，成行军队形有秩序地实施撤退。

以上，我们对刘伯承关于机动这一毛泽东军事原则重要特质的理论揭示和实践运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通过研究我们感到，在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我军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的今天，应该学习刘伯承不拘泥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结论，而是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并灵活运用于实战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使之永葆其科学性。

注　释

①——⑬⑯⑰⑬⑳《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558、第476、第461、第122、第90、第537、第541、第539、第192、第123、第120、第215、第48、第561、第246、第174、第161页。

⑭转引自《军事学术》1983年第2期，第7页。

⑮转引自《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79页。

⑯《刘伯承军事译文序跋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页。

刘伯承军事思想中几个辩证关系

陈锡联

刘伯承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刘帅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和高尚品德彪炳史册。作为军事家，他丰富的战争实践、高深的理论造诣和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亦为中外所景仰。值此刘帅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在他长期领导下工作的老战士，仅就刘帅军事思想与实践中的若干辩证关系问题做点滴回顾，以为纪念。

(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应充分发扬机断行事”。这是刘帅历来对各级指挥员的基本要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中央为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将红五星军徽换成青天白日军徽。当时部队缩编，红军第4军10师改编为129师385旅769团，我任团长。有些干部战士想不通，经刘伯承师长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教育我们要从全局出发，使大家逐步认识到部队缩编整编，对推动全国抗战，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意义。全团顺利完成整编任务后，刘师长即亲率769团为全师的先遣团，9月30日由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乘同蒲路火车直达太原。一路上，刘师长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精辟地论述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要靠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靠地方党和广大人民的支援，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

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他指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部队富有英勇顽强和坚决执行命令的战斗作风，但习惯于阵地战，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游击战争是必须采取的战略方针。刘师长还讲，山西主要是山地，便于荫蔽和打游击，但地形复杂，要很好调查研究，熟悉敌情、民情和地形。他特别强调各级指挥员一定要亲自侦察敌情、亲自看地形。还讲通信的重要，没有通信联络，就没有指挥，单独行动时一定要有电台，要搞好通信联络。他反复嘱咐我们，今后军事斗争要适应于新的形势，熟悉新的作战对象，研究新的战略战术，方能在今后战斗中克敌制胜。刘师长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比喻和言传身教的指导，使769团指战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军事理论，增强了对日作战的信心。迄今我思之深、感之切，闭目可观，侧耳可闻，终生难于忘怀！

769团10月10日抵太原后，刘师长命令我率部队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以策应忻口友军作战的任务。临分手时，刘师长语重心长地说，第一仗可打小一点，但一定要打好，出师抗日的初战胜利特别重要，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士气，也影响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不要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部队单独行动，你们要在上级总的意图下，独立自主，机断行事，根据千变万化的情况，抓住战机，主动歼敌。可以一边打一边上报，也可以打了再报，不要坐失良机，不然消灭不了敌人，反而自己陷入被动。

遵照刘师长的命令，我带领部队走了两天，到达指定地区。在行进途中，发现日寇飞机频繁出动，不断轰炸忻口方向正面坚守的国民党军队。后经调查，阳明堡有日军飞机场，飞机都是由这里起飞的。我和营长赵崇德、孔庆德等人看了地形，在当地群众协助下，经过详细侦察，了解到敌机场兵力不多，守备松懈，我们几个团领导决定夜袭阳明堡。10月19日晚发起战斗，战约1小时，将敌机24架全部击毁，并歼敌百余人，但我优秀的三营营长

赵崇德同志不幸光荣牺牲。夜袭阳明堡的胜利，是769团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战斗的胜利，加深了全团指战员对毛主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重要性的理解，也加深了对刘师长一路上讲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认识，使我们树立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信心。

（二）

刘邓首长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从战略全局出发，运筹局部战役行动时，经常强调局部要服从整体。解放战争是全国一盘棋，各个野战军都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统一意图下，配合作战的。刘帅讲过，我们的战略行动，战术思想，我们所执行的一切政策，都要服从党中央这个全局。他教育我们考虑问题，什么时候都要从全局利益出发，正确认识与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邓首长从延安回到太行山。当时蒋介石正推行反共内战政策，令国民党军沿同蒲、平汉、津浦路北进，而阎锡山部侵入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心上党地区。中央指示刘邓把住华北中央大门，阻敌北进，以协同各兄弟解放区部队打破国民党迅速进占平津和东北的企图。当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刚开始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武器弹药奇缺，我所在的太行纵队新兵还扛着红缨枪、背着大刀，兵员有限，多数团不足千人。刘邓首长根据党中央的意图和全区部队情况，分析敌人在平汉、同蒲两个方向进攻，而平汉线可能成为敌人主攻方向，我更应重视对平汉线控制，但上党的敌人是心腹之患，如不迅速歼灭，待国民党军北上时我将腹背受敌。因此，刘邓首长决心先歼上党阎锡山部。刘邓首长在襄垣对团以上干部动员时指出，上党战役关系到全局。我们这里仗打得愈好，胜利愈大，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就愈有力量。事实正如刘邓首长所预料，上党战役取得歼敌3万5千余人的重大

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毛主席后来谈到上党战役的胜利时说，我们对进犯之敌老早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

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夺取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主动权，决定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促使战争局势进一步朝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化和发展。党中央把这个艰巨任务赋予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首长敏锐地认识到，突破敌人中央防线，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率领十几万大军，不要后方长驱直入敌人战略纵深，在四面包围之中歼灭敌人和建立根据地，绝非易事。但当时的情况是，解放战争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蒋介石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西边敌集重兵 33 个旅 22 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东边敌集 56 个旅、40 万人，压在山东战场华野部队身上，战争阴云依然浓重地笼罩着解放区天空。刘邓首长以大无畏革命气魄和卓越的胆识，肩负起这一光荣使命。刘伯承同志指出，从战略全局来说，我军尽早尽快打出去，进一步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这是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的大事。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说的“……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怎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刘邓首长率二野主力，强渡黄河，连续作战 28 天，共歼敌 4 个师部，9 个半旅，56000 余人。战果不小，但我方伤亡 1 万 3 千余人，弹药消耗很大，兵员补充困难，加上连日阴雨，黄河水位暴涨，溃堤险情不断，而蒋介石从山东、陕北抽调的 7 个整编师、17 个半旅正向鲁西南扑来。在这紧急情况下，刘邓首长毅然决定兵分三路，提前南进。经过 20 天连续急行军，战胜敌人前堵后追，克服了重重障碍，先敌进入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千里跃进任务，在敌后辽阔的战略纵深实施了战略展开。经过一个月紧张、艰苦的斗争，共解放县城 23 座，歼敌 6800 余人，建立了 17 个民主县政权，打开了局面。

敌欲趁我军立足未稳将我赶出大别山。我各部日夜碾转机动歼敌，我3纵在皖西六安东南张家店，消灭了敌整编88师师部及其62旅；1、2纵队各一部在李家集、柳子岗、歧亭消灭了新17旅大部、52师一部；接着刘邓首长直接指挥1、6纵主力及中原独立旅在高山铺消灭敌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的82旅。这些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远离后方，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都削弱了的情况下进行的。特别是进入12月以来，面对敌人33个旅的反复“扫荡”，刘邓首长指示部队，积极配合地方武装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队牵制大敌，以大部队消灭小敌的方针，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同时还反复教育部队，我们进入大别山，就是为了调动敌人，这是关系到全局的战略问题。我们要多背些敌人，宁可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地歼灭敌人。刘邓首长从全局出发，电致中央军委，建议“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主要是争取一两月内歼灭敌两三个师，使敌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毛主席后来在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纲领时说，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不敢开十二月会议，不敢讲这个话，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讲蒋介石可以打倒。毛泽东主席讲这番话，是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最好评价。

（三）

刘帅在用兵问题上，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常讲“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他独创的十个字的军事口诀，是他戎马一生用兵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他经常告诫我们的名言。所谓“五行”，是指指挥员在战役、战斗之前，首先必须对影响作战决心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个要素搞得清清楚

楚，了如指掌。“五行”中任务是中心，敌情是重点，也是前提。他指出，我们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才会有依据。他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他要求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把侦察勤务当作人们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须臾离不开。他不但要求各级干部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他只要作有关战役、战斗的报告，总是把敌情分析放在首位。他在太行山就开始建立敌情登记和敌情通报制度。强调战前调查研究，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刘帅说过，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他苦心所研究的就是怎样以少胜多，以劣胜优，战胜强大敌人。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从准确研究敌情中，找出敌人的弱点和特点，掌握其规律，从而克敌制胜。刘帅一贯主张“战略上打强的，战术上打弱的”。刘帅认为，任何强敌都不可能没有弱点，我们要“随时尽一切侦察研究以及相关行动之力，注视在它的翼侧、接合部、突出部、后方，特别在其行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充分中”去捕捉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主观能动地创造敌人的弱点，是掌握战场主动的有效办法。战役、战斗开始前，敌人可能没有明显地暴露出弱点，或者因时间匆促来不及详细侦察，难以捕捉到和准确地发现敌人的弱点，这就要想办法调动敌人，创造敌人的弱点。刘帅“集中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歼歼之”的成功的例子是不少的。如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刘邓首长避开进入大名、濮阳地区的强敌（王敬久集团），指挥野战军主力，大踏步向敌占区挺进，攻取敌薄弱据点，开辟战场，调敌来援，尔后集中主力歼灭来援之敌，共歼国民党正规军3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各地方团队共1.6万余人，缴获武器装备甚多，收复巨野、嘉祥、成武等县城9座，迫使敌王敬久集团回援，粉碎了敌打通平汉路、占领邯郸的计划，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鲁南战役。这次战役表现了刘邓首长高超的辩证指导思想和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

刘帅作战用兵的原则和指挥特点充满了辩证色彩。他说：我们作战的基本方式，是钳形攻势，分割包围，但是要因现实情况而有所不同，情况是经常变化的，我们的方式也应是辩证的。他在《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编译后言有精辟的论述："合围钳形攻势，必须各部队协同动作，其关键在合围与割裂。由于我军善于宽大机动，捕击敌人弱点，所以战役的合围较易完成。但无论是阵地战或机动战，尤其是在机动战中，各部队必须根据作战基本命令与具体情况，机断行事，协同动作，才能合围与歼灭敌人"。如在上党战役时，对由太原向长治增援之阎锡山军到达沁县并继续南进时，刘邓首长则以冀南纵队及地方团队伪装主力，继续包围并佯攻长治，以吸敌继续南下，而令太岳纵队主力和我太行纵队全部分别为左右翼队，向预期进至屯留西北之磨盘垴、老爷山周围地区之敌实施钳击。将敌包围后，为力求割裂各个歼灭敌人，并避开敌优势火力，主要利用夜间，凭手榴弹、刺刀对敌占要点实施突击。经数夜激战，敌部分被歼，被迫步步收缩。刘邓首长为避免"啃核桃"，除令我左右两翼部队猛烈钳击敌人外，在北面留一缺口，诱敌向北突围，并派重兵埋伏。敌果然向北突围，我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实施追击，拦击、阻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最后除少数敌人逃回沁县外，近两万之众为我全歼，敌副总司令彭毓斌也为我军击毙。

刘帅在组织战役上是统一计划，而在战斗行动上，特别强调机断行事，在具体作战上，他并不给我们下面的干部要求在那里打，怎么打，兵力怎么使用，火力怎样安排，他从不干涉。他对下级指挥员非常信赖，不包办代替指挥，给下面机动余地，依各级指挥员的指挥水平和职权范围和他们用兵的特长，给予独立自主，要求他们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根据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灵活机动完成任务。这是他指挥上的一大特点。在二野部队大的作战行动中，刘邓首长总是将作战部队分为若干作战集团，指定某一纵队指挥员实施统一指挥，这

样既可发挥下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培养锻炼指挥员的重要办法。

（四）

刘帅一贯高度重视部队教育训练，不管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始终把教育训练提到军队建设战略位置的高度。在这方面，刘帅的军事辩证思想是很丰富的，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

“本”与“流”的辩证关系。刘帅特别强调各级指挥员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他说过，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学说、军事学说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就其军事学说言之，在土地革命时期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现在爱国自卫战争时期又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这些学说，在各时期遵之则胜，反之则败。还特别指出，凡我干部，在研究军事时，首先必须研究上述四种著作，才足以正其本，又必须根据这些著作及其在实际运用中所发展的战例，来读现代战术，才可以清其流。

战术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他提出战术要以技术作基础，要大力加强技术训练。组织师军事研究委员会翻译缴获来的日军教材，编印《射击要诀》、《刺杀教材》，作为技术训练的依据。同时师创办随营学校（后改为抗大六分校），训练连排干部和政治指导员，师辅训队专门辅训营团干部，旅（军分区）、团则办教导队、训练队，师还办了参谋、迫击炮、工兵训练队。此外还办了通信、射击、刺杀训练班等等，以努力提高干部战士的战术技术水平。

总结自身经验与借鉴外军理论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刘帅非常重视我军实战经验的总结，因为这是我们的亲身实践，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财富。每次战役战斗结束，他都夜以继日的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从中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加以锤炼，

作为部队今后作战的理论依据。在他的要求下，各级指战员都养成了每战必须总结经验的良好习惯，形成了打一仗进一步的好作风，使广大指战员的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不断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刘帅也非常重视吸取借鉴外国军事理论。在环境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刘帅总是抓紧战斗间隙，拿着放大镜用视力已严重减退仅剩下的左眼，阅读和翻译外军著作。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连续翻译出版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协同战术概则》等。解放战争中，他又在极端频繁的作战行军环境下连续完成了《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重校工作和《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的编译。刘帅告诫我们注意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就不需要很好学习外国经验，不重视研究敌情，拒绝接受新东西；另一种倾向是不重视我军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一切外国的经验，都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端过来。对这两种倾向，刘帅都是坚持反对的。

作战对象与作战形式的辩证关系。每当作战对象发生变化，刘帅总是提醒我们注意作战形式的改变，并亲自动手拟定手令、文件，要大家研究。如解放战争开始，作战对象成了美国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攻坚战，作战地区由山地到了平原，刘帅就连续亲手拟定了《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后来强渡黄河过长江，又出现了新问题，刘帅又写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和《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等，这些都有力地指导着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实战培养与院校教育的辩证关系。战争年代，部队的培养主要靠实战，在战中学，在学中战。全国解放后，刘帅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充分预见到院校教育和训练在新时期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为实现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他自告奋勇地向中央、毛主席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去办陆军大学（后改为军事学院）。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各

军、兵种的军、政高中级干部，他主持编译和自编了大量军事教材，并亲自考核学员、审阅考卷。他还精心备课，亲自向学员授课。有教员向他请教授课诀窍，他说那就是“昼夜不息”。刘帅为了国防现代化，为了培养造就大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军事人才，呕心沥血。刘帅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领导人之一。他为了党的军事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成绩卓著，贡献最大。可是 1958 年，在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倾向的批判中，刘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仍严格自责，许多干部都为他鸣不平。1980 年，邓小平同志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五）

刘伯承同志的军事辩证思想，同样体现在军事与政治关系之中。刘帅历来主张：军队应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军事战略方针应置于党的政治战略与策略之下，军事运动应建立在党领导的民众运动之上，并与之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常说，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否则就会滑到军阀主义道路上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他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重视，他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刘邓首长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党委建设的各项指示，结合实际斗争和各项运动，努力加强党委工作。确立党委会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对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完成一切工作任务，具有决定作用。刘邓首长认为，加强和建设党委的工作，首先要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既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充分发挥各级军政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加强党委建设的同时，刘邓首长还极为重视基层连队党支部建

设。我们部队之所以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打不烂、拖不垮，上下拧成一股绳，互相信任，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斗集体，靠的是党的领导，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刘帅早在抗战时就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与人民有血缘关系的子弟兵，不同于其他军队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不但能够以窳败的武器，数量较少的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他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战！也只有当他懂得了为什么而战，掌握了真理，他才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也就是说，他善于以政治来战胜敌人。"正是靠不断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教育启发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这是部队战斗力的源泉。

纵观刘帅一生，波澜壮阔。他的军事思想，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华民族军事文化史上一座富饶的宝藏，也是我军的一笔宝贵的遗产。我们要努力挖掘继承，发扬光大。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努力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我们学习刘帅，纪念刘帅，一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

刘帅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向守志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号召全党：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在纪念刘伯承元帅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学习这段话，感到倍加亲切，深受启发。我们这些跟随刘帅驰骋疆场的老战士，早在50年前就知道他有“常胜将军”称号。过去我常想：刘帅用兵如神、屡战屡胜的奥妙到底在哪里？近几年通过学习我军军战史和《刘伯承军事文选》，联系刘帅的言谈举止，从中悟出一个答案：刘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哲学家；他在军事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结果。

一、刘帅全面、系统、深入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

早在1936年秋，毛泽东同志从哲学高度批判党内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军事路线，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军事斗争经验教训，在红军大学作了题为《军事辩证法》的讲演，第一次提出了“军事辩证法”这一术语。刘伯承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担任一个战略区的军事统帅期间，把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与战略区的实际紧密结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且以他独特的创见，全面、系统、深入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

（一）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核心思想。

1948年夏，刘伯承同志在中原军区高干会议上谈到我军的战略战术及作战指挥问题时说："情况是辩证的，我们的方式也是辩证的"；"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必须由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等，而求得辩证的学术。"①在这里，刘帅一连讲了五个"辩证"和一个"实际"，这是在军事哲学史上较早对军事辩证法核心思想的简明、深刻、透彻的揭示。他所讲的"辩证"和"实际"，从本质上说，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如同对待世上一切复杂的事物一样，都必须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发展变化观点、相互联系观点；同时，必须与照搬照套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彻底决裂，必须与墨守成规的经验主义彻底决裂。

刘伯承同志既是军事辩证法核心思想的揭示者，又是军事辩证法核心思想的忠实实践者。他指导战争、指挥作战，从来都是讲"辩证"、讲"实际"的，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恰到好处地运用辩证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故而屡战屡胜。仅以刘帅灵活多变地运用"围"字战法为例，就足以说明他讲"辩证"、"讲"实际"取得的奇效。在解放战争中，他与邓小平同志指挥的上党战役，采取"围城打援"、"网开一面"和"围追堵截"之策，歼灭敌军3.5万余人；邯郸战役，则采取"围三阙一"战法，歼灭敌军1.7万余人；鲁西南战役打郓城，因该城城墙不坚固，又是孤立之敌，便采取"围而不阙"、"暗设口袋"的战法，全歼敌军一个师；鲁西南战役打六营集敌军的两个师，我军为防止敌人"困兽犹斗"，便采取"围三阙一"、"暗设口袋"的战法，将敌军引到野外一个大洼地内，予以全歼；在淮海战役中打被围于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当时参谋人员建议采取"围三阙一"战法，放开一个口子，用口袋阵消灭运动之敌。刘帅笑笑说：情况是变化的，要根据实际决定战法。该"阙"则"阙"，不该"阙"就不"阙"。经权衡利弊，我军紧缩包围圈，终于一口一口地吃掉了被围之敌。在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刘帅是如何讲

"辩证"，讲"实际"，把一个"围"字战法变化得丰富多彩，出神入化，其妙无穷，充分显示了军事辩证法核心思想的无穷威力。

（二）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战争的本质及其以弱胜强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辩证法，包含了刘帅这个方面的许多理论创见。刘帅在讲到人民战争的本质时一再强调："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没有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②"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来反对百分之十以下的人们的斗争"，我们的战略"是从人民的本质上发挥一切力量的战略"③。他讲到自己在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后的经历时深情地说："在战争中比枪炮威力更大的东西，是人和人心的背向。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给你千万只手！"④。记得在解放战争初期，军中流传着一段佳话，说的是：上党战役结束不久，刘伯承司令员聊备菲酌，要替被我军俘虏的29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压惊。这些高级将领有一件共同的心事迷惑不解，即：装备精良的3.8万"国军"，为什么会在很短时间内竟然被"小米加步枪"和只有6门山炮的3.1万"共军"消灭了？刘司令员请这些高级将领先谈谈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国军"犯了孤军深入、指挥犹豫不决等错误。刘司令员笑笑，引导大家想一想：老百姓为什么见到国民党军就跑，还打他们的黑枪？为什么国民党军的伤员没人抬、死人没人埋？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为什么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呢？刘司令员又说："我认为光从战术上来检讨，问题是难以搞清的。只有从战略上——不，说的更彻底些，只有从政治上来检讨，那才能找到问题的钥匙。"刘司令员引用古人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所向无敌"来启发他们。用现代话翻出来，就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没有攻不下的碉堡，我们胜利的秘诀也就在这个问题上。这番谈话，让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们顿开茅塞。这番谈话，也是刘帅对人民战争制

胜理论的生动表述。

刘帅根据人民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把毛泽东同志"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的理论具体化，揭示了"综合群力"、体现人民的本质、以弱胜强的基本规律，亦可简称为"综合群力"的人民战争制胜观。首先，他强调正义战争决不只限于武装斗争，因而也决不能用单纯军事观点来指导对敌斗争。他说：单纯军事观点与轻视武装斗争的作用，都是不容许的。正义的人民战争，必须是以开展武装斗争为轴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全面战、全力战。其二，在指导思想上既防"左"又防右，尤其必须防止和纠正一切过左的东西，也只有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对敌，才能照敌人痛处打得有力。刘帅还引证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中说过的话："不怕蒋介石有美援，只怕蒋介石有'左'援"，'左'倾是对我们的致命打击。⑤其三，在组织上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但党军本身要结合一体进行，而且要结合党、政、民有机地配合进行。"，要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三个成分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其四，在作战样式上把我军的战术与群众对敌人的一切斗争形式相结合，不断窥破和制造敌人的弱点，融汇游击战和运动战并调剂其分量，适时采用袭击、伏击、急袭、吸敌打援等战法。其五，政治主张要公开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发扬部队的良好政治情绪与饱满的战斗精神"，"动员广大民众与军队、政府成为牢不可破的整体"，"扩大敌军的反战和反正"。总之，刘帅提出的"综合群力"的理论，是诸方面作战因素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对事物本质的正确反映，是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检验的、便于掌握和运用的胜利法宝。

（三）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战争中许多矛盾的辩证关系。

人民战争中有许多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如何辩证地认识这些矛盾关系？刘帅明确指出："实际斗争与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处理得好或不好，从根本上说，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在实际中运

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去指挥作战，取得了胜利。”⑥此处所说“思想方法”，就是指军事辩证法。

1、关于军略与政略的关系。刘帅指导战争从来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军事领域，也不是单纯地就作战谈作战；而是以政治家的胸怀，站在时代的政治背景下提出军事问题，把军事战略置于政治战略的统帅之下，使之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并做到两者的有机统一。如在抗日战争中，为了粉碎日寇“以华制华”的阴谋及其总力战、“扫荡”战，刘伯承同志提出把根据地建成坚持抗战国策和抵抗日伪军进攻的中心和堡垒，进行对敌全面战、全力战；必须实现统战政策尤其是武装政策；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力量等一系列政略与军略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在战争实践中都产生了精神变物质的巨大力量。

2、关于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刘帅把全局统辖局部、局部服从全局的观点比喻为：全党全军好比是一个交响乐队，各种乐器的演奏者都听从乐队指挥的指挥，才能演奏出和谐的乐曲。他是善于统筹全局、服从全局的典范，也是善于指导局部、发挥局部最佳效能的典范。如 1947 年 7 月，为了粉碎敌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刘邓首长遵照中央的部署，指挥所部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出其不意地发起鲁西南战役，消灭敌军九个半旅；尔后直插大别山广大地区，背起 40 多个旅的大包袱，直接配合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作战，打破了敌人的重点攻势，成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一个伟大转折。此次壮举，是我军战争史上关照全局、有利于全局的范例。刘伯承同志针对作战中常常碰到的主攻与助攻、主作战与支作战、主突与钳制、围歼与阻击等分工的不同，用“吃肉”与“啃骨头”的比喻来引导大家正确地处理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说：打仗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这是全局作战胜利的需要；认为吃肉就好，啃骨头就吵起来，这样看问题是很不全面的。这是把革命英雄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与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融为一体的军事辩证法。

3、关于强与弱的关系。我军作战初期多是以弱对强、以劣对优，这是正义者抵御非正义者的常见现象。刘帅根据事物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的原理，提出了由弱转化为强、由劣转化为优的基本手段：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斗志和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刘帅又深入分析强弱互相转化的规律，他说："敌我双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虚。如两相长，则强者终强，而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必败。"据此，他制订了由弱转化为强的战法十六字诀："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⑦如此，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在战略上发生量变到质变。

4、关于走与打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说：军队无非是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刘帅总结长期战争经验，对走与打二字的辩证关系在理论上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早在1941年他就说过："能够打到敌人就坚决打，如果打不到就走。"刘帅在研究游击战时，把走与打的关系归结为游与击的关系，且把游击战划分为游与击两个概念，还明确两者的相互关系及其运用原则，是对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重大贡献。按照刘帅的阐述：（1）游与击，两者在军事上各有其用。游，是用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和制造敌人的弱点，为拖垮敌人和消灭敌人创造条件；击，用来发扬自己的特长，避开敌人的特长，以便打垮敌人。（2）游与击，是对立统一，缺一不可。既反对游而不击的"游来游去"，也反对击而不游的"击来击去"。应当是游中有击，击中有游，实行拖中有打，打中有拖，先拖后打，拖打兼施。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大游大击、中游中击、小游小击。（3）游与击，在实战中视情互相转化。该游则游，该击就击，不搞固定模式。刘帅在研究运动战时，把走与打的关系归结为机动与消灭敌人的关系。他说："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机动是为消灭敌人创造条件，而消灭敌人才是本质。敌人不好打，我们就只有机动。"大机动大消灭，中机动中消灭，小机动小消灭。"刘帅还指出：我们的敌人就怕走，走的越远，

战线越长，被人民武装袭扰、吃掉的机会就越多。因此，我们“要准备大踏步的机动，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打。”总之，打是战术，走路也是战术，只要把握好“趋利避害”的原则，适时走与适时打，就一定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5、关于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的关系。刘帅认为：我军之所以强调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结合，是由我军战略特点所决定的。他说：“我们的战略是以面对点线的战争”，而敌人“是以点线对面的战争”。⑧“我们的面越宽越好，越能包围点线。”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战法，就会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刘帅提出和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促使内线与外线相互配合、相互响应、相互转换。比如，进攻者进入了这条线就处于有利的围歼态势，而被围者就要受害；若被围者在敌方合围圈将拢未拢之前击破围攻者一路，转到外线，形成内外线夹击敌人，就会变害为利，化险为夷。其要诀是：利害变换，毫不犹豫，看准火色，转到外翼。具体运用，可以依情千变万化。刘邓首长指挥的抗日军民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作战、千里跃进大别山等战役战斗，皆是巧妙运用“利害变换线”的极好的注解。

（四）科学地创造了军事辩证法的许多新术语、新概念。

刘帅论述军事辩证法，十分重视从战争、战役、战斗中抽象出特有的属性，创造了许多别有特色的新术语、新概念。

一是借用旧有语词，而赋予新内容。例如“五行术”，就是刘帅对军事辩证法的一个创造。“五行”一词，古代早已有之。刘帅借用“五行”这一名词，赋予新内容，用来指导战争。他说：战场最现实的情况有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五个要素，即为“五行”。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是定下决心的基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帅用兵出奇制胜，是同他的这一“五行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从认识论来讲，刘帅讲的“五行”是客观存在，要求指挥员必须首先弄清，然后形成作战的决心、命令、计划，这是由客观到主观、由现实到思维、由物质

到精神的过程，也是认识论的第一次飞跃；刘帅讲的“五行术”，要求指挥员在完成第一次飞跃之后，用决心、命令、计划去指挥作战，这是由主观到客观、由思维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也是认识论的第二次飞跃。可见，刘帅的“五行术”，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军事学上的创造性运用，也是战争中使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辩证统一的妙术。

二是借用典故、俗语，加以改造，并赋予新的含义。例如，“狭路相逢勇者胜”，是刘帅借用“狭路相逢”成语，加了“勇者胜”，就变成鼓舞斗志的响亮口号和一种新战法；再如“啃骨头”和“猛虎掏心”、“杀鸡要用牛刀”，皆是刘帅借用生活中的俗语，分别说明战争中的勇于打硬仗恶仗的精神和深入纵深打敌要害、集中兵力歼敌的战法，成为广大指战员易于理解和运用的军事语汇。

三是反用旧有语词，而赋予特定的属性。例如刘帅为了正确地实施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有机配合，依据“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兵法原则，大胆地创造了“敌进我进”的特殊新战法。他指出：“敌进我进”，是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的一种新战术，是我军舍己为国、至大至刚的行动；“敌进我进”，又是敌军作战条令上没有的内容，故容易被敌人所忽视，因而亦为我军乘隙歼敌。

四是从战争实践中抽象、概括出具有特定含义的新术语。例如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中的“利害变换线”；人民战争中的“综合群力”及“全面战”、“全力战”等，都是刘帅的新发明、新创造，填补了军事辩证法的许多空白。

二、刘帅研究军事辩证法的方法及特点

刘伯承同志研究军事辩证法，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吸取古今中外军事哲学之精华，既

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通过长期战争实践形成了他的鲜明个性和独树一帜的特点。

（一）着眼于指导战争的需要，有的放矢地探索急待掌握的军事规律。刘帅经常申明："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⑨这是他既反对空谈理论、又反对盲目实践的一贯主张。他关于军事辩证法的论述，都是为了指导战争实践而作，也都是服务于我党我军的军事任务之需要。考察刘帅多年研究军事辩证法的过程，发现他尤其注重转折时期战略战术的探索，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堪称是有的放矢研究理论的典范。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刘伯承同志便很快总结抗战初期的经验，作了题为《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的讲演。事隔一个月，他进一步指出："好象组成了我们打击敌人的手一样，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⑩，形象地阐述了三者血肉不分的辩证关系。1938 年 3 月，他针对某些人轻视游击战的观点，阐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辩证关系。不久，他又总结游击战的经验，提出并实践了"要游要击，并使游与击相互配合"的辩证观点。抗日战争期间，"唯武器论"的观点严重地影响抗日军民的情绪。刘帅为此考察了"现代新武器——飞机、坦克、化学武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剖析了人的质量与新兵器效能的辩证关系；并根据已有作战经验，较全面地论述了"对现代技术兵器的斗争"方法，给了抗日军民以鼓舞和办法。

解放战争初期，他针对人们不理解毛主席关于不在一城一地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说："有真本领的教师爷打架，总是先让后打"。接着，他又从理论上精辟地阐述了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的辩证法。淮海战役结束后，他针对我军面临的渡江作战任务，特地撰写了《"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编译前言》，阐述了宽大正面与有重点同时渡江的关系、从两个方向施行向心的钳形突击与突

击方向的选定及突击主力的组成关系、政治攻势与战斗配合的关系等等。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敏锐地指出：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发扬之！建国之初，他针对我军面临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及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使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大声疾呼：我们要重视这个历史的伟大转变！刘帅的高瞻远瞩，令人欣佩；他探索军事规律的方法，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二）注重以敌为师，研究克敌制胜之道。刘帅十分欣赏《诗经》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他也十分喜爱宋朝哲学家朱熹的名言："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战争中，他主张"以敌为师"，其目的就在于以敌人之道还治敌人之身。他说："我们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才会有依据"。⑪刘帅本人就是我党我军研究敌人卓有成效的典型代表。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总是以极大的注意力来研究敌军。他写的作战指示、战役总结和文章，发表的军事演说，第一部分几乎多是"敌军特点之研究"。他常常亲自进行战场观察和侦察，常与被俘敌军军官交谈，派遣谍报和联络人员，阅读敌军的《教令》、《手谕》等作战文件。每次作战，他总是采取多种手段摸清敌军的战略战术、作战特点、兵力与装备的数量质量、指挥官的经历和癖好、作战企图等等，以求实的精神、敏锐的眼光和惊人的洞察力，按住敌人的脉博，找准敌军强点，抓住敌军的弱点，从中寻找战胜敌军之策，真正做到了"对什么样的敌人打什么样的仗"；敌动我知，我动敌迷，我变于前，敌变于后，使我军永操战争的主动权。军中有个故事说的是：国民党军作战，总是被刘司令员牵着鼻子走，他们的指挥官，与其说是蒋介石、白崇禧、陈诚等人，毋如说是刘将军。由此可见，刘帅用兵的奥妙之一是"料敌如神"，是他纯熟地掌握了"料敌"与"用兵"关系的辩证法。

（三）倡导学洋而不套洋，吸取世界军事成就为我所用。邓小

平同志说：刘帅是我党最早重视吸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的领导人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刘伯承同志在国内攻读洋人的《操典》、《教范》，继而先后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广泛涉猎苏沃洛夫、拿破仑、毛奇、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军事生涯和论著，还学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等军事学术成果，为他日后成为著名军事理论家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回国后的几十年间，翻译和校订了苏军《合同战术》、《军队指挥法》、《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等一系列军事著作。他还研读过日、德、美、印等国军队的《条令》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勇敢地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大胆地提出“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的成就”。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既反对骄傲自大、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的经验主义，又反对不重视我军光荣传统的教条主义。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宜从自己经验中去考证它的实质与结论，吸取其中用得着的东西，拒绝某些用不着的东西，更要发扬自己所特有的长期锻炼出来的战法，实事求是指导作战。”⑬刘帅恰到好处地处理了学习洋人与继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辩证关系，使他的辩证法在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同时，也熔进了世界先进的军事学术成果。所以，他站得高，看得远，富有战略目光，具有雄才伟略。刘伯承同志不愧是我党我军解放思想、放眼世界、认真学习各国先进军事成就的伟大先驱。

（四）坚持师古而不泥古，注人文化遗产以新的活力。中国的古兵法，是世界上罕见的精神大宝库。刘帅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开掘，曾熟读《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吸取古兵法的朴素辩证法精髓，又进行一番再创造，使之成为更加有强大生命力的、适用于人民战争的宝贵精神财富。例如，古兵法主张“用兵不复”。刘帅却以“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的观点，主张“用兵不复亦可复”。前者的“不复”，是坚持变化论；后一个“可复”，是利用敌人对“用兵不复”的迷信，我重复用兵，正是达到又一次“不

复”的目的。这是灵活运用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它体现了事物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而不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循环。刘帅在实践中，采取“用兵不复亦可复”的原则，创造了七垣村“重叠伏击”的成功战例，在三天内、在同一地点，让日军连吃两次败仗，所以被敌军称为“第一流的战术”。又如刘帅的《“孙子”笔记》，更足以看出他是如何学古人但不迷信古人，而且超越古人的情形。在讲到“正兵和奇兵”时，他一反孙武“以正合，以奇胜”、曹操“正兵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的观点，写道：“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统一的”；“奇正之运用，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灵活变化的”。又写道：“奇正相生，讲的是军事辩证法，一定要避免绝对化”。这就赋予古兵法“奇、正”以新的涵义，从而避免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可见，刘伯承同志不愧是我军古为今用的杰出代表。

（五）善用故事比喻等形象语言，阐发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深奥道理。大家都知道，刘帅的言谈，幽默诙谐，风趣横生，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是他工作的一个特点。他常常通过一个故事，或一个笑话，或一个比喻，来揭示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从而把军事辩证法的一些深奥的、抽象的理论问题变得形象化、简明化、大众化，因而便于人们理解、记忆和实际运用。正如古人云：“得道深者，方能浅言。”例如，他在1939年8月所作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报告中，生动形象地说：“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⑭，以后他讲战术曾多次使用这个比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世界观之精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刘帅还说过：“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马的战术比牛的战术高明，狼的战术又比马的战术高明”。⑮在讲到指挥员立足局部、着眼全局时，强调战略眼光，要“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走一步棋，看三步棋。”刘帅说的每个事故、比喻，对军事辩证法作了十分精彩的阐述和发挥，有时往往胜过洋洋万言大作。

三、刘帅研究军事辩证法给我们的启示

刘伯承同志研究军事辩证法的辉煌成就，在我党我军乃至世界军事哲学史上都是少见的。他为中华民族和世界精神文明增添了耀眼的光彩。这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他研究军事辩证法的全过程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研究军事辩证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刘帅研究和运用军事辩证法总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使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他不愧是我党我军解放思想的先驱和实事求是的典范。1、他研究军事辩证法有明确的目的性。他所追求的，既不是为了拼凑一些新鲜名词术语，哗众取宠；也不是闭门造车，扬名显姓，荣宗耀祖。他所追求的是更多地消灭敌人而不被敌人消灭，更多地打胜仗而不打败仗；最终目的是消灭侵略者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派，用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所以，他的军事辩证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属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所固有，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2、他研究军事辩证法有极强的的针对性。他一向着眼于人民战争的需要，有的放矢地探索急待掌握的军事规律。尤其是我党我军在战争各个时期的转折关头，广大指战员急需对战争的发展变化作出新的认识，急需对战略战术的运用有新的指导，适时地向党政军民提供军事辩证法的研究新成果。3、他研究军事辩证法有大无畏的开拓精神。他从来不迷信古人的遗训，不迷信洋人的条文，不把已有的定论视为金科玉律，也从来不囿于个人已有的经验和成见；他对马、恩、列、斯及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同样地不当做千古不变的教条。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也没有盲目地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他一贯

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勇于开拓，大胆创新，标新立异，不法常可；敢于探索前人不曾探索的规律，敢于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言论，敢于运用前人不曾运用的战法，所以，他能冲破许多旧的框框和束缚，获得更科学的新见解。当今，刘帅仍然是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楷模。

（二）研究军事辩证法，必须注重实践和理论升华。通观刘伯承同志的军事生涯，他既不同于书斋里的哲学家，专门从事理论研究；也不同于只是嗜好战场上拼搏的武夫。他倒是类似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既长期参加了战争实践，又注重艰苦的理论探索。然而刘帅与孙武所处的时代相距 2500 年，社会条件不同，刘帅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作指导，这是他之所以超越古人的重要原因。刘帅说过："经验好比一堆零散的钱，理论好比是一根钱串子，把各个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刘帅亲自谋划和指挥了数以百计的战役战斗，在每一战役战斗之前，他总是从实际出发，辩证地筹谋作战，让实战检验和丰富军事辩证法；在每一战役战斗之后，他又不辞辛劳地总结用鲜血换来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形成新的辩证法思想和观点。所以，他不断地以新的学术成果来丰富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宝库。

（三）研究军事辩证法，必须运用新的"博约观"。刘帅常说：研究军事科学的方法要博而约。又说：博学古今中外军事，要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刘帅说的"博"，包括通晓古今兵法韬略，博采中外军队之长，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等；刘帅说的"约"，是要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学习和研究，克服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吸取旧事物中积极的东西，务求发展和精深，寻求其规律性，变深奥莫测为通俗易懂，面向大众，成为人们易于操作运用的指针。这种全新的"博约观"，是对辩证法的一大贡献。刘帅研究军事辩证法，正是运用这种全新的"博约观"取得辉煌成就的典范。在当

今加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重温刘帅的“博约观”，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与本文执笔者　朱清泽）

注　释

①③⑤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547、第534、第547、第216、第538、第285、第77、第457、第685、第557、第132、第445页。

②④⑥《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2、第52、第32页。

论刘伯承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贡献

杨国屏 少将

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研究和指导战争，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认真研究和总结刘伯承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贡献，对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我军建设成为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具有重要意义。刘伯承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以下四个方面谈点认识。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和认识战争，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坚持和发展了战争问题上的唯物史观

在战争史上，无论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都同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战争的结局也与民心的向背和民力发挥的程度紧密相联。如何看待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战争观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历史上的许多军事家，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一些军事家，虽然初步认识到了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阶级局限性的束缚，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考察战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

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句话，极为精辟、深刻，闪耀着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光辉，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历史性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就是农民战争，军队的主体来自人民，一开始就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所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不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刘伯承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20岁开始戎马生涯，早期参加过第一次讨袁之战、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指出：北伐的胜利，一方面不能不归功于革命将士，另一方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他强调："如果这些军阀部队都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我们的同志就应该加倍努力于民众运动，使民众能确实地监督军人，以趋于真实革命之途。否则，只靠军事运动是根本不行的"。刘伯承关于民众运动的这些话，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此后指导战争的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而战，依靠人民群众而战，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体地概括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刘伯承认为，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人和人心的背向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指出："在战争中比枪炮威力更大的东西是人和人心的背向"。进步的正义的自卫战争，必然会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热忱，从而赢得胜利。其二，军队的生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军队就不能打仗，没有军民的共同奋斗，就不能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他形象地说："人民军队没有人民是裸体跳舞"。①其三，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和牺牲精

神，能够直接鼓舞部队的士气，使部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他举例说，在淮海战役中，“没有冀鲁豫上百万人民群众不辞劳苦，踊跃支前，就很难保证我军在风雪侵袭的严冬季节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这也就是二野在大别山战争胜利以及全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②

二是提出了革命战争必须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的观点。刘伯承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与人民有血缘关系的子弟兵”，③必须把为人民利益而战作为革命战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把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这不仅指明了我军区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而且抓住了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从而坚持了革命战争的人民性。刘伯承认为，革命战争和群众利益相结合，就是要求我军作战首先要考虑保护人民大众的利益，要负起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因此，他经常教育部队关心人民的利益，作人民的公仆，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二野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刘伯承反复强调：我军在“大别山能不能站住脚，一方面靠多打胜仗，另一方面靠团结人民，两者缺一不可”。④由于部队遵守纪律好，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工作开展得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很快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

三是创造了在战争中发挥民众作用的新方法。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表现为间接、直接两种形式。间接的形式就是以非武装的形式，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对战争进行支援和保障；直接的形式，就是直接参加战争。只有找到并运用恰当的形式，才能把人民群众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刘伯承对运用民众力量消耗和歼灭敌人非常重视，创造了许多新方法。他认为，我军战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把战术与民众对敌人的一切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动员和发挥民众的力量，实行“综合群力”的战术。他形象地说，正规军好比手之骨，游击队就是手上的筋，自卫队如同手上的肉，

三者要融为一体，有机动作，形成打击敌人的拳头。他非常重视部队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工作作为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并且积极寻求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方法。他指出，敌人打的是点线战争，我们实行的是面的战争。面越宽越能断其线、扼其点。因此，不断抽调大批干部和分遣必要的兵力，分布到各地，与广大民兵游击队结合，散布作面的活动，实行袭击、急击、伏击乃至移动防御，以欺骗、迷惑、疲惫、牵引和消耗敌人，就能使正规军既有耳目，又有手足，机动自如地集结兵力，抓住敌人的弱点，在某一点上干脆利索地歼灭敌人。

综上所述可见，刘伯承不仅从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唯物史观，而且在实践上有发展和创造。他没有停留在对人民群众作用的一般意义的认识上，而是积极寻求使军队与民众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最佳形式，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战争的新形式、新战术，丰富了军事辩证法的理论宝库。

二、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悉心研究强弱转化规律，积极寻求以劣胜优途径，对毛泽东劣能胜优的辩证法思想作出了独创性贡献

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战争面对的最大实际，是战争指导者必须予以正视的严酷现实。然而，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关键是如何实现战争力量对比的转化，达到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就是指导革命军队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认为，强弱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强弱是可以转化的，强可以转化为弱，弱也可以转化为强；强弱转化的条件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刘伯承不仅从理论上承认强弱的相对性和强弱转化的可能性，而且具体地分析实现这种转化的主客观条件，悉心探索强弱转化规律，积极寻求以弱胜强的途径，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他所指挥

的战役、战斗，绝大多数都是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他以其卓越的指挥实践，对毛泽东劣能胜优的辩证法思想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一）坚持斗智与斗力结合，以智谋弥补力量的不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注重斗智，以智增力，对于以寡敌众、转弱为强具有特别意义。刘伯承认为，打仗不仅是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谁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谁智高一筹，指挥巧妙，谁就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因此，他在作战指导上，特别强调巧胜，强调把斗智放在首位，寓斗智于斗力的全过程。他擅长运用隐真示假、避实击虚，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欲速则迟、示此则彼，趋利避害、声东击西等兵家智谋，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斗智与斗力的关系。一方面要求指挥员要善于动脑，灵活运用战术，反对那种置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于不顾，与敌人死打硬拼的“牛抵角”战术。同时，又认为斗智不是战斗的全部，斗智要以斗力为基础，通过灵活巧妙地运用作战力量，“硬是把敌人消灭，才是解决战斗。”⑤所以，刘伯承十分注意作战力量的建设。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我军武器十分落后的实际，要求部队凡能制造的武器由自己制造，自己不能制造的武器，利用自己的土枪夺取敌人的快枪，增强自己的军力。他认为，如果连起码的军力都没有，斗智就无从谈起。

（二）坚持斗志与斗法并举，握住“用兵的把柄”。刘伯承指出，“说到打胜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⑥“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他讲的斗志与斗法，实际是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的关系问题，也是军事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范畴。刘伯承高度评价士气的作用，认为“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⑦部队只有保持常盈之气，一切战术技术才能很好地在战场上发挥出来。军队如无斗志，不但一切谈不上，而且有覆灭的危险。使部队保持高昂的士气，是他治军

和作战的一贯思想。他要求各级指挥员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启发官兵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良好的政治情绪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时重视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对敌进行政治战，削弱敌军士气。他要求部队在作战中要有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在心理和气势上打垮敌人。"两军相逢勇者胜"。如果在精神上先输了，就毫无胜利可言。在斗法方面，刘伯承建树颇多，造诣极深，堪称大师。他认为，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情况下，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战术是"以大吃小，吃敌一块"，积小胜为大胜。他在《我反击合击战法之研究》中具体地阐述了这种战术："敌集结合击我主力，其后方第二线兵力分散、薄弱，采取一个营、一个连驻守一地的方针。我第一步以一个旅、两个旅分别歼敌一个营；第二步再迫使敌人一个团不敢驻守或出扰。达到了这一步，我们才能机动自如，或集中休息，或打较大的仗"。⑧正是靠着斗志与斗法的有机结合，他指挥部队一次又一次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这些胜利，闪耀着他用兵艺术的智慧之光。

（三）坚持技术与勇敢结合，努力提高部队整体素质。部队的素质是技术和勇敢的结合体。在这个问题上，刘伯承始终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他指出，战争的胜败，决定于政治力量和技术力量的结合；"射击的准确沉着，格斗的熟练骁勇，无论在任何战斗中都起着重大的作用"。⑨在这里，"沉着"、"骁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治觉悟，而"准确"、"熟练"则体现了强大的技术力量。刘伯承在其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一贯重视教育训练，认为良好的训练素质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某些不足。要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就必须把立足点放在熟练运用武器装备上。越是装备不好，越要加强训练。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战斗十分紧张，刘伯承仍然要求部队抓紧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整训。通过整训，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明显提高。他要求部队训练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只要条件许可，就应根据可能遂行的作战任务，组织不同规模的实兵演练；他特别重视干部训练，认为

教育训练的重点应放在干部身上。“治军必先治校”，是他的一句名言。红军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为办好红军学校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热情；建国后，他主动请缨创办军事学院，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后来成为高级将领。

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认识和处理战争指导上的诸对矛盾，实事求是地能动地指导战争，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指导的方法论

正确地解决战争的客观规律与主观指导之间的矛盾，是军事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之一。要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般的理论指导。但是，仅此还不够，还必须把它与战争的特殊规律结合起来，把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体化为战争指导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自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研究和指导战争，出色地解决了战争指导上主观与客观、全局与局部、理论与实践等诸对矛盾，实事求是地指导战争，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指导的方法论。

（一）坚持“用兵应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⑪这是刘伯承用兵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客观实际与主观指导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要求对战场情况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战争的客观环境又给认识作战情况带来了困难。战争指导上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刘伯承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钥匙，是坚持认识战争情况的辩证过程，实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具体讲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战前要悉心调查研究“五行”情况。刘伯承强调，要有调查才能研究，要有研究才能组织战斗。他把对作战最有影响的客观要素，即任务、敌情、我情、地

形、时间称之为“五行”，将其作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要求指挥员悉心研究和掌握“五行术”，据此定下作战决心，拟定作战计划。他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⑪第二个环节是要对战场上变化的情况，仔细研究之，正确解答之，适当处理之，使既定的作战决心与新的客观情况相一致。特别是战争情况的不确实性、偶然性和流动性的特点，更要求指挥员及时追踪战场变化，不断搜集敌情、我情及有关资料，适时修正作战决心和计划，以适应新的实际，绝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刘伯承在指挥作战中，总是审时度势，视情而定，随机而变，见机而作，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在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他和邓小平依据不断变化的战场情况，三变作战决心，终于取得了胜利，即是有力的佐证。

（二）坚持以维护全局利益为作战指导的最高目标。刘伯承在作战指导上，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善抓重心，堪称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关系的楷模。一是富有洞察全局的战略眼光。刘伯承长期在一个战略区指导作战行动，十分重视并善于掌握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受命率129师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和邓小平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立足局部，着眼全局，有计划、有步骤地开辟和建设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最大的根据地之一。不仅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成为解放战争初期我抗击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晋察冀和西北解放区进攻的“关隘”，及尔后我千里跃进大别山、逐鹿中原的巩固后方。二是具有全局至上的“一盘棋”思想。刘伯承经常强调，我们的战略战斗行动，都要服从党中央这个全局。他常说，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各个局部的战役战斗行动，也是一盘棋。指挥员要有“一盘棋”的思想和“弹钢琴”的艺术，不能舍大就小，顾此失彼。他指挥作战，特别注意照顾两个战役战斗、各个作战阶段、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主力军与地

方军和民兵、前方和后方以及敌后战场、我方活动和敌方活动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局对局部的统驭作用。三是善于把握重点，抓主要矛盾。在战争指导上，刘伯承总是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全局来说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或动作上，用他的话讲，就是要牵住“牛鼻子”。他强调，指挥员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在复杂的情况中捉住主要矛盾。他认为大的方向有大的重点，小的方向有小的重点，次要方向有次要方向的重点，只有以我们的重点去对付敌人的弱点，才能以弱胜强，取得全局的胜利。

（三）*把握战争指导规律必须着眼特点和发展。*刘伯承认为，研究和把握战争指导规律，必须着眼特点和发展。着眼特点，就是要掌握特殊规律。刘伯承特别强调要具体地研究战争，把书本上的理论与战争实践结合起来。他从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的观点出发，注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重视总结作战经验。他告诫指挥员：打了胜仗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把经验教训总结出来，才算完成了百分之百。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他先后撰写了上百篇战术指导和战役经验总结，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他还注重学习间接的战争经验，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探求战争规律，应用这些规律去指导战争，并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他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指出，“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⑫着眼发展，就是不拘泥于已有的经验，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战争。刘伯承一生打了近40年的仗，和什么样的敌人打仗他都是行家。他有丰富的经验，但从来没有把经验当成包袱。他既重视经验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同时又指出，我们的经验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取得的，有它的局限性，借鉴经验必须防止经验主义。他强调，对传统的经验，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力求适应新的情况，生动运用之。如能以这种作战经验和现实战术的丰富内容，来配合学习现代战术的原则，必能逐渐加强与提高我们的指挥能力。他是这样要求别

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勤奋好学，永不满足，始终站在军事理论发展的前沿。

四、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总目的出发，辩证地处理打与走、集与散、虚与实之间的关系，以独具特色的战法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力量运用的辩证法

战争力量的运用，是军事辩证法的又一基本问题。刘伯承对此既有精辟的理论阐述，又有丰富的实践。他围绕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总目的，依据客观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打与走、集与散、虚与实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战法，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力量运用的辩证法。

（一）*打与走*。打与走是军队在战争中交替采用的两种手段。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缺一不可。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打与走的关系，直接关系到能否取得作战主动权和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刘伯承对打与走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成功的实践。首先，他认为打与走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刘伯承特别反对把打与走割裂开来。他认为，只打不走的战术是“牛抵角”，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和笨拙的“挨打战术”；只走不打是逃跑主义，永远也达不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其次，他强调走必须服务于打。刘伯承指出：“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⑬再次，刘伯承认为，弱军战胜强军必须特别强调“走”的重要性。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弱军能以少胜多，以劣胜优，更需要借助机动。他指出，只有通过实施宽大的机动，大踏步前进或后退来调动敌人，才能在运动中寻求歼敌良机。第四，他主张要依据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机动。当敌人实施大规模并进长追进攻时，要避其锋芒，纵敌冒进，集中主力寻机歼敌；当敌人以密集队形稳扎稳打进攻时，要闪开正面，集中主力直捣敌人心腹或翼侧；当敌人突围或溃逃时，要不惜脚力，进行尾随、平

行和超越追击，以发展胜利。这些论述说明，刘伯承对打与走的关系的认识是相当辩证的。

（二）集与散。实现战争目的，必须灵活地使用兵力，而灵活用兵的要诀之一，就是巧妙地把握集中使用与分散使用的时机。人们常常赞誉刘伯承“料敌如神”，连他的对手也承认他“用兵神妙”。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方面，刘伯承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强调二者相互联结，不可分割。刘伯承认为，在兵力使用上，没有分散就无所谓集中，没有集中就无所谓分散。因此，只有以分散的兵力去破坏敌人的集中，才有利于我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指出：“在兵力运用上，我们应以少数兵力箝制其他方面，借此腾出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⑭以一个人扭打三个敌人，就得以抽出三个人痛打一个敌人。他提出的“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作战原则，包含了极其丰富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二是强调集中与分散重在发挥部队特长。刘伯承要求指挥员在使用部队时，一定要根据部队各自的特点来区分作战任务，扬长避短，使其在作战中充分发挥其特长和优势。例如，擅长游击的部队应以分散使用为主，突击力强的部队应以集中使用为主；原先集中和分散使用的部队，只有在情况必须时，才临时转换成分散和集中使用。三是强调要依据实际情况，把集中使用和分散使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刘伯承不仅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兵力使用上集中和分散的辩证关系，而且在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二者的结合问题。第一，集中使用主力部队与分散使用小部队相结合。如在定陶战役中，以小部队与民兵，四处游击，并伪装主力制造攻击郓城的假象，以吸引邱清泉部，分散了敌人，而主力却集中了3倍于敌的兵力在定陶全歼了蒋军整编第3师。第二，主要方向上的集中使用和次要方向上的分散使用相结合。早在1938年3月，刘伯承就提出：“在次要方向，我们就用极少数的正规军的兵力，甚至不用这兵力，面只使用现地域的游击队或游击兵团”，“在主要突击方向，我们正规军队可以集中绝对的优势兵

力”。⑮这充分体现了兵力使用上的集中与分散的辩证思想。第二，在时间上要实施集中与分散的灵活转换。刘伯承历来强调，集中与分散重在灵活转换。他认为，没有灵活转换，就谈不上集中与分散的正确运用。指挥员一定要依据战场情况和任务，切实掌握好转换的有利时机，做到时集时散，集散结合。刘伯承辩证地处理集散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直接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战争力量运用的辩证法。

（三）虚与实。虚与实是军事辩证法的重要范畴。虚和实，一是指军队实力的强弱优劣，二是指双方实力及其部署的真伪。刘伯承作战指导高超，用兵艺术灵活，还在于他善于运用虚实。首先，刘伯承高度评价虚实变换在战争指导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知兵势，解奇正，讲的是一般制胜条件。而要正确地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导军队的作战行动，还必须切实把握虚和实这个环子。""用兵之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为将者的计谋盖出于此。战争中的计谋、方略无不出自虚实的更换和运用。"⑯其次，他认为设计用谋的目的是欺骗、调动敌人，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使敌视实为虚，视虚为实，作出错误的判断。刘伯承特别强调用诡诈之道，调动敌人，寻求和捕捉战机。他指出："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如果军事行动不秘密，不诡诈，则不能作趋利避害的机动，就不能达到消耗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⑰刘伯承非常善于通过虚虚实实、假假真真的办法诱敌上当。如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固守据点和城镇，欺我火力虚弱，难以攻坚。刘伯承多次采取攻其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声东击西，引敌出洞，在预设战场消灭之。长生口、响堂铺等著名的伏击战，都是巧妙调动敌人的结果。第三，他强调依据实际，因情措法。刘伯承常说，战法无非奇正虚实，要注意"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他认为作战的"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⑱因此，他在作战中总是能够活用原则，打敌弱点，出奇制胜。同样是伏击战，但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有的伏其救者，有的伏其

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是“围师不阙”，“紧缩敌人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则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凡此种种，说明刘伯承对兵法谋略的运用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他的指挥实践，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注　释

①⑤⑥⑫⑬⑮⑰⑱《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490、第541、第457、第716、第537、第91、第120、第547页。

③⑦⑧⑭⑯《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50、第365、第366、第300、第475页。

②④⑨⑩⑪《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27、第387、第366、第22、第35页。

从刘伯承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看其思维特色

许志龙　少将

以儒将称谓闻名于世的刘伯承元帅，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勤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本文旨在透过刘伯承的军事理论和实践探讨其思维特色，以求把握刘帅军事思维的脉络。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导，把提高指挥艺术木平与提高军事思维能力结合起来，打牢思维素质基础

刘伯承提出：博学古今中外军事，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这句话是他戎马一生军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总括，也是他军事思维素质中最核心的东西。指挥员指挥艺术水平是和他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的。刘伯承在探索指挥艺术时，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并贯彻于他的军事活动始终。这一思维方式使他的指挥艺术水平与军事思维能力相辅相成地得到提高，其思维素质便越来越牢固地建构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思维基础上。

1、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思维活动始终贯注辩证的求实精神

刘伯承指出："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①。翻

开刘帅的军事著作可以看到，他始终坚定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上去从事军事理论与实践活动，他一生的军事活动史首先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史。不离开实践来妄谈理论，善于从自己的战争活动中总结经验，并将其升华为可操作的理论。使军事思维总是根植于现实的土壤，是刘帅求实的思维特色之一。

刘伯承在军事实践中运用求实的思维方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体现在坚持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之“矢”射中国革命实际之“的”。早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他就带着“中国革命怎么搞”这个最大的实际问题，去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尤其是军事著作）以及苏联红军的军事理论；也博采众长，广泛涉猎近代西方著名军事家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等人的事迹与论著。他学习和运用求实思维活动的成果是当时所写的《南昌暴动始末记》，这也是他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战争实际问题的起点，这一思维方式贯穿于他革命活动的全过程。二是体现在善于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有一段话很能反映他运用这种思维方法的特点：“经验好比是零散的铜钱，理论好比是钱串子，把实际经验总结起来上升为理论，就好象把零散的铜钱串了起来”②。刘伯承很珍惜流血的经验，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结束之后，即使再忙也要写出作战报告，从理论的角度检讨作战的成败得失，并作为下一次作战之鉴……。一部长达40万字的《刘伯承军事文选》，就是他作为军人一生勤勤恳恳把实践与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硕果。刘伯承对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准确把握、运用，使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同时获得无尽活力，也不断拓展着他的军事活动空间，为他军事思维素质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发挥出最好的指挥艺术水平，使他的思维体现出智勇并重的鲜明个性

刘伯承有句名言：“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的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象‘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③他

在三十多年的战争活动中实践了这一名言，而他之所以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他成功地运用了智勇结合的理性思维，使他的指挥决策出现了许多令对手们惊叹的天才杰作。

一方面，刘伯承同志善于运用手中有限的作战力量与敌斗智。他曾经指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①。因此他总是站在以劣胜优的战略背景下，以相当有限的客观物质条件与强大的敌军展开角逐，而在无法与对手拼实力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智取胜。刘伯承很清醒地懂得这一点，他之所以会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博采众长，借鉴、吸收古今中外军事精华，并兼学多种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想以人类最优秀的战争智慧武装自己，从而能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用谋、斗智、示形，发挥出最优的指挥艺术。刘伯承戎马七十年，亲身经历并指挥重大的战役战斗数百次，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从万里长征到太行抗日，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广阔的疆场上，充分运用他的智慧。他时而设下圈套让敌钻口袋，时而牵住敌人的鼻子引其入陷井，时而声东击西让敌疲于奔命，强蜕变成弱，最后束手就擒。因此，他斗过的敌人不得不承认"刘伯承指挥国防部（蒋军）"、"败在他名下，没说的"。

另一方面，刘伯承与敌展开斗智的同时也展开斗勇。他指出："我们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以期成为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不作乱撞乱碰的鲁莽家"⑤。智勇并重，刘伯承从来都是这样投入战争。军事上往往是这种逻辑：英勇无畏，时常使思维奇迹般地跨越思维道路上的"高栏"，使思维完成一次新的突破、新的超越。刘伯承用兵如神，这连他斗过的对手们也是一致公认的。但是，他这"神"是他敢于亲冒矢石、闯过枪林弹雨、无畏强大敌人的压迫、面对险恶处境的挑战中得来的。越是危机四起的时候，他越是沉着冷静，全力以赴地与敌

人展开斗智斗勇。如1947年刘伯承与邓小平率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部队前有天然障碍（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和敌重兵堵截，后有敌大军紧追，情势十分险恶。而我军又经过连续行军和长途跋涉，十分疲劳。刘伯承就是以他那智勇结合的坚定性，指挥部队勇往直前，逾越天险，过关斩将，胜利完成了战略跃进。

刘伯承的智与勇是辩证的统一体。他的勇敢、他的冒险有足够的智谋作前提，而他的指挥决策等"智"的活动又有"勇"为后盾，勇中有智，智中有勇，使他获得了超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指挥才能。在这智勇结合过程中，他的军事思维活动，不断择优思维方式，拓展多种思路，从时间空间，从局内局外，以新的视角，新的活力，不断地跨越"高栏"。这种一直处在最优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状态，对于他思维素质的提高不能不说是良好的途径。

3、牢记"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的信条，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从事军事理论与实践活动，这又使他的思维注入了群体思维的精华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采访进军西南途中的刘伯承后得出一个结论：刘伯承是他所见过的谦虚将军里的最谦虚的一个。而这一谦虚的品质来源于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说："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不管你是多么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即使一个口令可以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也只是党给予的，个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你如果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向军阀主义倾向，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伯承不仅是自主思维品格良好的军人，善于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鉴别、探索遇到的战争问题。而且又是富有集体意识的军人，他所有成功的作战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都凝结了集体的智慧。他始终自觉地、模范地遵守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虽然是经常南征北战远离中央，但都能一如既往地坚定而又富有创建性地实践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本级

党委决定的作战计划，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责；他从不凌驾于集体之上以个人意志取代集体意志，在作出指挥决策时，他总要同身边的战友们反复商讨，共同拍板；他对下级指挥员还非常信赖，不包办代替下级的指挥，并创造机会与条件让下级指挥员在统一的军事目的下独立自主、灵活机动地去施展各自的指挥才能。刘伯承同志就是这样把个人置于强大的集体之中，在集体中补充自己的思维缺陷，修正自己的思维偏差，完善自己的思维体系，不断吸取众人的思维优长和创新活力以激发出更新的思维，完成思维的自我超越，又把此汇入集体创造性思维的大河，再去发展自己的思维……刘伯承同志的军事思维素质总是在活的机制中获得质量。

刘伯承同志在军事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出对理论与实践、智与勇、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辩证把握，既是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也是思维素质问题，而这一切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受约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毛泽东军事思想。这是刘伯承思维最富特色的一个方面。

二、全面又有重点地把握军事理论与实践中的认识对象及其内外关系和规律，在广阔的战争空间寻求制胜之策

刘伯承向来十分重视对军事活动中的认识对象特点的准确把握，他无论是考察战术还是战役，都不会就事论事，而是把思维的触角延伸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与其相关的广阔领域去进行考察。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所作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报告中指出，打胜仗的战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部队具有良好的政治情绪与饱满的战斗精神；二是动员广大居民参加抗战，并使其与抗战的军队、政府成为牢不可破的整体，进行有组织有配合的斗争；三是日军反战和伪军反正行动的扩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伯承同志善于从内外联系的角度

去把握认识对象的运动规律，找到了制胜之策。这也反映出了刘伯承的思维活动具有鲜明的个性。

1、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作"就大势与局部沉思"，把握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我们的战略行动，我们的战术思想，我们的军队建设，我们所执行的一切政策，都要服从党中央这个大局。这是刘伯承经常强调的。他在漫长的军事活动中之所以能取得非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他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关系的辩证思维方式。兵法上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⑦。刘伯承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从不形而上学地在自己军事活动的局部上转圈圈。就作战指挥而言，他的局部与全局辩证关系的把握与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战争全局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然后以战略眼光，居高远眺，审视全局的方方面面，做到既着眼于本局部的地位和作战形势，又关照"左邻右舍"，让思维纵横到军事指挥的全局空间，努力谋求自己的军事决策真正建立在全局利益需要的基础上。二是把自己思考问题的集束点盯在影响全局、牵动全局的关键点上。刘伯承很善于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总的战争形势，迅速透过纷纭复杂的战争现象，抓住制约全局的关键，找到自己军事决策的中心问题。抗战初期，鉴于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战正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⑧。作为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刘伯承便敏锐地看到：八路军官兵的游击战意识和作战能力将是关系党中央抗日游击战争战略计划能否付之于行动并完成的大问题。于是，刘伯承用战争中学习战争和理论上学习战争两种途径，在短期内迅速强化了官兵抗日游击战意识，提高了部队游击作战水平。三是让思考问题的归宿点依旧回溯到战争全局上，实现比思考问题起点更具高层次的回归。一方面、刘伯承积极发挥自己局部的作用，支援、配合、保障全

局；另一方面，他依据自己在局部的战争实践和对全局的战略洞察，找到战局的发展脉络，为全局指挥员献计献策。刘伯承就是如此位处局部而胸怀全局。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宏伟的战略构想之所以能实现，就是因为有一群象刘伯承这样得力的将帅们。

2、围绕军事目的，把“伐谋”与“伐交”结合起来，把握好知彼与知己的关系

刘伯承之所以称得上儒将，是因为他对问题的思考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项性的。他不仅懂得战场上刺刀见红，更懂得在智斗场上去“不战而屈人之兵”。每战之前，他总要认真研究与作战相关的诸因素，尤其是对敌情与我情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然后把“伐谋”与“伐交”结合起来，选择以最小代价的最佳捷径达到他的军事目的。

从很多事例中都可以看到刘伯承运用“伐谋”与“伐交”巧妙结合的手段，实现了自己的军事目的的成功之举。例如，抗日战争反摩擦斗争中，面对复杂危急的形势，刘伯承指出：“这种在虎狼夹击中的斗争，是华北抗战的广大军民急欲冲破的局面，所以在极短时间内打破狼的一面（指顽军），求得专力打虎（指日军），就成为当时的严重任务”⑨。于是，刘伯承根据驻第129师附近的国民党顽军的复杂情况，制定了“打击、威慑、争取”的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并把军事打击与军事外交相配合。结果既赢得角斗场，又赢得了智斗场，双重的成功使反摩擦斗争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另外，刘伯承还善于运用“伐谋”与“伐交”的结合来创造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机。如在进军西南的作战中，为了达到“避开敌人的正面防守，出其不意地实施大迂回，大包围，断敌退路，各个歼灭西南之敌”的战略目标，刘伯承率二野指挥机关和三兵团乘车由南京、徐州向湘西开进。为了隐蔽企图，一路上他一再公开露面，大肆声张。到郑州时，还公开出现在车站迎候的群众中间，故意放风，宣布解放军要向四

川进军，佯示西进。然而，从郑州始，解放军却没有继续西进，而是秘密南下，刘伯承的行迹从此突然“失踪”，最后终于达成了战略欺骗的目的。

“伐谋”与“伐交”自古至今都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手段，运用得好，就能事半功倍，否则，也将事与愿违。正如刘伯承在总结自己运用这两种手段时阐述的那样：“战争与政治工作，好比厨子做菜一样，不可离火。离火呢？就会吃生菜。打仗没有政治工作，也会打败仗”⑩。刘伯承同志能够面对复杂的战争情势，灵活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配合军事斗争去克敌制胜，表现了他辩证地把握知彼与知己关系的思维特色。

3、准确理解“人民战争”的真谛，以部队的大机动来创造与捕捉战机，把握好走与打的关系

古语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⑪。军事上道理一样。只有使部队实施灵活的机动，才能脱离被动，恢复主动，才能创造与捕捉战机，赢得战争。一位同刘伯承交战多年的国民党将军曾有这样的体会：刘伯承的指挥特别机动，令人莫测高深。纵观刘伯承的军事实践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考虑机动作战时，从不把自己的思维局限于某一点，而是使其尽可能覆盖到整个战场空间。他认为，每一个战机都是在一定的时空场所中获得，每个指挥员的指挥决策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里作出，如果部队进入大机动中，也一定会有最好的战机和最佳的决策时机出现在指挥员面前。所以，他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战场主动，也不因暂时的被动而丧失信心，总是机警而执着地运用“机动”之策。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也给予了他进行这种机动思维的广阔场所，使他导演了许多机动歼敌的成功战例。

刘伯承的机动思维集中表现在他对走与打的辩证关系的准确把握上。早在抗战初期，他在理解游击战的“游”与“击”的关系时指出：“游，所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所以发扬自己的特点，撇开敌人的特长，应使游与击巧为配合起来。

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⑫。基于这种认识，他敢于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不失时机地实施机动作战。他有这样的名言：“我们进行的人民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游击战争也是大游大击，中游中击，小游小击”⑬。可见，无论是敌人的前沿与纵深，无论是敌人的战术还是战略纵深，都是刘伯承思维涉足之处，部队在他的思维中大踏步的进退着，这一运动反过来又拓展着刘伯承的军事思维活动空间。

无论是“就大势与局部的沉思”，还是“伐谋”与“伐交”结合，以及实施“大机动，大歼灭”也好，都说明刘伯承是放眼战争的将军。他努力使自己站高一点，所以他看得远；他努力使自己看准一点，所以他看得深。这些努力表现了他善于从总体上把握军事理论与实践中的认识对象，并对与认识对象相关的诸因素作联系的思考，以求把握其规律，达到辩证地把握认识对象的目的，由此使他的军事思维达到了较为深远的境界。

三、依据战争情况的不同，不拘一格地运用战略战术，充分调动思维的创造性

刘伯承在对战争情势的思考时，总带有超越的意识，就是诚实地从战场的实际出发，依据不断变化着的敌我情况，审时度势地制定、调整、补充或改变作战计划和部署，灵活地运用各种相应的战略战术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刘伯承的思维充满创造性意识，并在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中有着广泛的体现：

其一，强调在作战时既要“看准了下手，”又要敢犯兵家大忌，这是表现了刘伯承善于把常规与反常规相结合的思维特色

刘伯承于1938年初，在第129师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集我们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就是与敌人打仗要依靠游击战和群众，用袭击、突击、伏击、待伏、诱伏等手段，消灭敌人；特别

是要注意手上拿着网，眼睛瞄着鱼，看准了下手，一网打尽，不然，鱼将逃掉。弱军与强军打仗，就要多用心思”⑭。由于他看得准，所以他懂得什么时候常规用兵，什么时候反常规用兵，使他用兵表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敢犯兵家之大忌。《孙子》指出："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⑮。刘伯承在抗战初期指挥的七亘村重叠设伏是同时、同地使用同样的战术，黄崖底、广阳、户封等地连续3次的“重叠待伏”又是一个时期一个地域连续运用一样的战术；《孙子》还有一条名训是“围师必阙”⑯，而刘伯承在指挥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作战中又却使用“围师不阙”取得了全胜。刘伯承敢于犯兵家大忌的行为是他反常规思维的结果。然而，他这种反常规思维是建立在他充分的常规思维基础之上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刘伯承最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古今中外兵家权谋之精华，尤其是对马列主义军事原则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他都认真研究、学习、运用，可以说，他对古今军事家们已形成一定模式的常规性军事思维拥有相当丰富的把握，也是这些给予了他出色的反常规思维能力。从特殊意义上讲，刘伯承在反常规思维之前已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常规思维。如前面提到的围歼黄维兵团的决策，刘伯承在对参谋们的谈话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常规思维："在目前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敌人一定很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你放口子，他就会给你来个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敌人每占一村，不但可利用我原有的工事组织防御，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不利。所以权衡利弊，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想法，坚持紧逼敌人于狭小范围，使其困饿，而我们采取一点一点吃的方法，逐渐削弱他，然后再把他一口“吃掉”⑰。由此可知，刘伯承的反常规决策都是建立在他对“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要素的深思熟虑之上的，按照他的话来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军事思维活动中常规与反常规思维的结合，体现了他把军事辩证思维原理在战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一探索使刘伯承同志在复杂的战争情况面前始

终能保持思维的活性，无论是忌或不忌、常或反常，只要符合现实，他就敢想敢为，从不给自己画地为牢。

其二，既要“攻敌所必救”，又要在出敌不意处用兵，这反映了刘帅具有“跳跃式”思维的特性

刘伯承在对战争的思考时，具有丰富的质与量两方面的活性。他在运用战略战术时，总能把思维的质点跃到对手思维无法企及的高度或跟踪不到的位置，达到攻其不备的效果。他这种“跳跃式”思维具体表现在二点：

一点是刘伯承善于对敌情进行观瞻、统摄、辩证分析和综合比较相关诸因素，在作出决策时思维实施大胆跨越。解放战争初期陇海战役的部署充分体现了刘伯承这一思维特色。当时，陇海路北侧基本被国民党军队及其势力控制，而刘邓野战军行将袭击的正面，正是考城以东到虞城县北部的这一地段。这里，敌人的配备纵深六、七十里，据点、封锁墙和封锁沟遍地皆是。刘伯承认为：解放军如突入敌之纵深，进行宽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解放军要取得预期的战役目的，则突击部队（主力）就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即不可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地撇开敌人的前沿据点，毅然地向纵深目的地挺袭。刘伯承面对攻击目标的大跳跃思维在尔后部队战役实施中得到了成功的论证。另一点是当他的思维遇到强点不能穿过，他会转而去图谋“釜底抽薪”，使其思维视点进行迅速的转移。从权谋的角度说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敌的好办法”⑱。巨金鱼战役，刘伯承先是图谋歼灭运动中的王敬久集团一部，但因该敌始终以几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推进而无法得手。刘伯承便采取“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战略战术，从西线掉头出击东线，威逼敌后方徐州西北地区。于是，王敬久集团各部不得不先后来增援，均被我各个围歼。

刘伯承的“跳跃式”思维表现了他辽阔的智力视野和优秀的

创造性素质。在战场生死存亡的角逐中，他之所以会是“常胜将军”，他的这种思维能力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三，强调“现实是辩证的”，适时地运用“逆向”思维方法去分析敌情，作出决策

古今中外，大凡有成就的军事家，无不善于在军事活动中实施灵活的欺骗活动。这种欺骗活动的频繁展开，实际上就是军事斗智的角逐，使“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⑲等反而示之的“诡道”尤为盛行。对这一战争技巧的运用，直接反映在他分析判断敌情、作出战略战役决策时，所采取的“静中求动，动中求静”的思维方法。静是指敌人活动表现出的共性即规律性的东西，动是指敌人活动的个性即特殊性的部分。敌情的静态与动态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刘帅在分析判断敌情时很注意在敌动态中发现“静”的存在，又在敌静态中发现其“动”的端倪。1948年5月宛东战役，刘伯承决定佯攻确山，吸引张轸兵团由南阳东援确山，在其运动中歼灭之。然而，张轸察觉我围点打援的企图时，又决心西退南阳，但他却又故意制造假象，向东佯动，刘伯承发现了张轸西窜的迹象，令西集团主力将敌主力向东压迫之，并告诫西集团防止敌人西窜。西集团指挥员却被张轸的佯动所迷惑，误认为张轸已进入我包围圈，竟过早率部东移，张轸趁机西窜，失掉了全歼张轸兵团的机会。但这又反证了刘伯承“逆向”思维的准确性。刘伯承还善于运用“积极地构想两个或多个并存的，或者同时起作用，同样正确，但彼此却完全对立的概念、思想和印象”⑳的思维方法，从相反相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作出军事决策。

“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㉑——这是刘伯承运用战略战术时一贯奉行的原则。他深知脱离了战争现实去运用战略战术都是教条主义，必然会导致失败。于是，他在军事思维活动中，竭力挣脱固有模式的羁绊，大胆的运用创造性思维，使思维不断贴近战争现实，最终驾驭战争。

刘伯承以他极其丰富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活动，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他壮烈的战斗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思维的空间感、灵活性、创造意识和辩证的求实精神，是人类军事思维史上最富有个性特色的部分。这不仅给军事思维领域带来了崭新的气息，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思维和毛泽东军事辩证思维增补了光辉的一页，而且为我们研究现代军事思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注　释

①⑫⑱《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645、第104、第482页。

②③④⑬㉑《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8、第41、第338、第39、第92页。

⑤《中外军事名言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302、第84页。

⑥⑨⑩⑭⑰《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265、第154、第155、第141、第273页。

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358页。

⑪《吕氏春秋》（上册）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⑮⑯⑲《五经七书注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9、第34、第4页。

⑳《生存智慧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372页。

真理无华
——刘帅军事理论的独特风格

秦基伟　上将

刘伯承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缔造者之一，是举世公认的战略家，也是众口称颂、甚至连他的敌手也不得不崇仰敬佩的常胜将军。元帅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迭有重要建树，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军事理论遗产。特别是自抗战初期到解放大西南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他与邓小平同志珠联璧合，共同导演了许多震烁天下的战争活剧。刘帅的指挥艺术和军事谋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正如中共第十一届七中全会给他的致敬信中所指出的，他“在一系列的重要战役中，特别是在上党、平汉、淮海、渡江战役中，在进军解放西南战役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其“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13年间，作为直接在他麾下听命调遣、多次亲聆其谆谆教诲的老战士，追昔抚今，深感刘帅确是我党我军不可多得的人才，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的代表。他的军事理论恢弘精深，并有一显著特点，就是没有枯燥的书卷气。他善于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央的战略决策和本战区的实际情况恰当地结合起来，进行举一反三的再思考、再创造，力求悟出真谛，找出契合点。而且在阐述方式上，精练简洁，深入浅出，画龙点睛，富于哲理，如民谚俚语，平易可亲，如陈年老酒，回味绵长。因此，即便是当时文化程度不高的指挥员，听后也都能会心一笑，融汇贯通。在晋冀鲁豫，在二野，刘帅那些为阐发战法要旨，似乎是信手拈来的比喻、故事、笑话，不胫而走，流传很快、很广，成

为广大指挥员与敌人斗志斗法的有利武器。尽管流年似水，却使人久久不能淡忘。

下面，仅举我印象最深的几例。

（一）狼的战术比牛马都高明

初上太行，我们面临的环境是险恶的。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打开局面，振奋国人，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战术，趋利避害，有所作为。为此，刘帅倡导我们学习“狼的战术”。他说，作战有三种战术：一是牛抵角；二是马的战术，用后蹄踢；三是狼的战术，乘人不备，突然袭击。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成都附近有条坡道，狼就躲在坡道附近伺机而动。当推车人载着重物上到半坡，正需要扑下身子吃力的时候，狼就窜出来照准他的屁股狠咬一口。此时，推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脱，只能乖乖地让狼得手。所以“狼的战术”比牛马都高明，你要想“吃肉”，就要避免“牛抵角”，就要始终使自己处于机动的态势。这种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游击战争的主动性、隐蔽性、坚持性和干脆性都说得十分了然。刘帅认为，在敌我力量不平衡的条件下，通过宽大机动能动地去创造战机和发现敌人的弱点，并抓住它的弱点，给以突然地袭击，是把握主动权的最好办法。游击游击，应该是既有游，又有击。游，借以掩护自己的弱点，避开敌人的锋芒，发现敌人的过失，选择所欲的战场；而击，则是发扬我之优长，达成消灭或消耗敌人的积极目的，转换力量对比，积小胜为大胜。游来游去，矢之于右，击来击去，矢之于左，必须是游来击去或击去游来才对头。他强调要游中有击，避免穷追，击中有游，避免被歼，游要游得隐蔽，击要击得突然，追求一种机敏灵活，来去无常，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高妙境界。刘帅指出，敌寇异国作战，丧失人心，地广兵稀，补给线长，有着外强中干、前硬后软的内在弱点，抽调人马扫荡一地，其它地区就必然兵力空虚，不可能不为我所乘。只要我们坚持趋利避害的要诀，不使敌

攻击部署的刀尖部向我，并敢于及时跳到“利害变换线”的另一边，抓住多路分进合击之敌的外翼侧或其他策应不灵之一路，施以势险节短的突袭，定能使敌顾此失彼，陷入推车上坡人那样无可奈何的境地。正是靠了这种“狼的战术”，我们在太行山上，创造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神头岭打援、长乐村急袭等一系列威震敌胆的模范战例，一次次粉碎了日军所谓的“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反转电击”等花样翻新的战术。敌人的报纸称，刘伯承创造了“支那第一流的战术”，惊呼“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若砥柱中流，岿然不动，发展成为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二）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

刘帅在归纳概括平汉战役的特点时说，我们组织这次战役，是抓住了“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这一规律性的东西。“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变本加厉扩大内战规模，首要目标是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平津，夺取东北。针对敌人企图，刘帅指出，晋冀鲁豫瞰制着联系华北、东北的三条铁路干线（津浦、平汉、同蒲）中的两条半，首府邯郸又是“数距四方之敌”的战略要点，因此我们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使命，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这句大实话，生动幽默地刻画了装备复杂的敌人对机动道路顽固的依赖性。郑州、新乡地区的敌人欲寻我决战，走西边是山地，受我威胁；走东边是沙漠，行动困难，因而它非要沿铁路北进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军在漳河、滏阳河之间预设口袋，示弱诱敌，牵引其就我范围，一举歼灭两万余，狠狠打击了进犯蒋军的嚣张气焰，为实现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用兵如神的前题是料敌如神。知道敌人要出来“找厕所”，我们就有办法剥夺敌人的主动。抗战期间刘帅强调的交通破击战，就是毁敌“厕所”，使“狗”无以就食的有力一着。在游击兵团的掩护下，成千上万的民兵和民工铺天盖地而来，有组织地

破敌人的铁路，拆敌人的碉堡，把钢轨、枕木运到根据地，真是蔚为壮观。抗战胜利后，太行部队出击平汉路，拔除敌伪残余据点，控制北起高邑，南到磁县三百里铁路，实际也是先发制人地瘫痪平汉线交通，为我军主力在漳河以北打歼灭战准备必要的战场条件。1946 年夏，为支持李先念部突围，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原和苏北解放区的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不顾与当面之敌兵力对比的悬殊，毅然发起陇海战役。刘帅当时说，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的部署和时间表。二野战史上记载的“三出陇海路”、“三破邯郸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为了遮断敌人组织进攻的机动走廊，隔裂敌人的战略联系，即扩大“狗”离开“厕所”便无计可施的弱点，将敌人逼回到战略防御的态势。刘帅的这一作战指导，最杰出的表现是他在淮海战役时，通观战场全局，认为津浦铁路之徐蚌段为敌生死攸关的要害，建议军委集大力袭取宿县，斩断中枢，扼敌南逃北援之要冲，提前达成对徐州之敌的包围。刘帅的这一建议，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对加快战役进程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被抑留于徐淮地区的敌人最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天寒地冻，伤者无法救治，死者暴尸阵前，状似丧家之犬！刘帅还把陇海路、津浦路形象地比喻为“十字架”，他说，蒋介石是信基督教的，他一定会殉葬于这个“大十字架”。最后的结果，真被我们这位战略大师所言中，蒋家王朝的总崩溃自此不可逆转。

（三）杀鸡用牛刀与猫盘老鼠

“杀鸡用牛刀”，是转换战场形势、实现敌我力量消长的一种有效战法。“杀鸡”本来可以不用“牛刀”，但是为了更有把握地“杀鸡”，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更利于我们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灭弱”，达成战略上的“以弱胜强”。这实际上就是集中兵力与打敌弱点的结合。刘帅告诫各级指挥员，在战术上通常是“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故而在兵力运用上一定要形成重点，应以少数兵力钳制其它方面，借以腾出数量、质量都

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这正如捉跳蚤，五个指头同时去按五个跳蚤，可能一个也捉不住；但是看准了，集中精力去按一个，那只跳蚤就绝无生路。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同时也是战争指导者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调度、运用力量能力的竞赛。次要方向用一个人去扭打三个敌人，主要方向才能集中三个人来痛打一个敌人。当然，这样一来，就要增加兵力使用的频率，加大机动的力度，但确可进入良性循环，立于不败之地。即所谓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没有机动，就形不成"牛刀"，而舍不得用"牛刀"去"杀鸡"，"鸡"也可能会变成"牛"。在太行刘帅指挥的"反九路围攻"就是用的这种办法。我军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分三个方向与其中一路敌人追奔盘旋。当发现孤立、冒进、饿困的好打之敌后，迅速扑上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密集的火力与之激战，数小时歼敌两千余人。这一仗，虽只严重打击了其中的一路，却收到了"杀鸡"惊"牛"的效果，其它诸路敌人闻风丧胆，纷纷回撤。后来刘帅还风趣地说，要是当时分兵对付九路敌人，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成了"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了。解放战争时期消灭整三师，也生动地体现了刘帅的上述思想。我们在次要方向以小部队和地方武装四出游击，伪装主力动作的假象，吸引分散敌人；在主要方向，则集中四个纵队的兵力解决一个旅的敌人。担任主攻的六纵为使"牛刀"更锋利，甚至不惜将机关和后勤的兵员都加强到主要方向。所以，毛泽东同志相当称誉此役的战法。被我生俘的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也不得不承认"刘将军指挥之妙，使人惊叹！""猫盘老鼠"也是刘帅倡导的战法。他说，对付强大的敌人，要象猫逮老鼠那样，先把它盘软，再把它吃掉。"盘软"，不能单纯理解为调动敌人，疲惫消耗敌人，使其锐气顿挫，指挥失当；还应该包括毫不急燥地使用"牛刀"，即在合围中予以有重点的打击（敌人躯干联系的关节薄弱部），以割裂其部署体系，不啃整个"核桃"。这样，"猫盘老鼠"与"杀鸡用牛刀"便成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前者的目的在于“以散耗集”，后者的目的在于“以集灭散”。

此外，刘帅还说过，打仗嘛，你摸过来，我摸过去，无非是要把敌人的脾气摸透，不能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对象。他教育指挥员定下决心之前一定要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个最基本要素。否则，五行不定，便会输得干干净净。他经常说，现实是辩证的，因此指挥也应是辩证的。他认为，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是军人最可贵的品德，打铁先要本身硬，强将手下无弱兵，无角的绵羊受欺负，有螯的黄蜂不可侮。每在成败关头，他总是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相号召，鼓励各级干部身先士卒，知难犯险，发扬打死不讨饶的硬骨头精神。他要求指挥员要就局部思全局，打仗总是有吃肉的，有啃骨头的，不能啃一次骨头，就有意见，像是输不起。这些思想，都有很深的内涵，道来却那样的平易，三五句话便把问题点拨得很透，很容易被广大指战员所理解和接受，乃至潜移默化，成为这支部队光荣传统的一部分。

得道深者，方能浅言。刘帅军事理论的形象化、简单化、大众化，正是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理论与指挥艺术有精深造诣的证明。邓小平同志说他熟谙兵法，博采精华，是国内外屈指可数的大军事家，我党的大知识分子。但是伟大与平凡在刘帅身上又实现得如此和谐。他既是一位远见卓识，统兵威严，有很强党性原则的大军统帅，又是一位循循善诱、谈吐诙谐、敦厚慈祥的兄长。他从不装腔作势地卖弄，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做下去，以至他所表述的真理，都和他淡泊的人格一样，朴素无华。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他之所以能够修炼到这一步，起码有以下几条原因。

（一）全部身心地投入党的事业

刘帅投身革命，不是凭着一时的热情或者某种淳朴的感情，而是通过对马列主义的钻研，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运动的考察，悉心

鉴别比较之后作出的选择,因而这种革命信念有着坚实的基础。他极其忠诚于党的事业,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怀有崇高的责任感,不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都能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他常说，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并以身作则，教育所带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战争年代，他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对于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每战之前，刘帅都要反反复复地查阅有关资料，听取方方面面的汇报，伏在地图上比来量去，苦苦思索，一连几个昼夜足不出户，寝不安席。对于战术指示、训令和作战命令这些重要文书，他都要亲自起草或批阅把关，斟词酌句，推敲再三，觉得不成熟、不完善决不贸然出手。他清心寡欲，几乎没有任何娱乐，完全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终日孜孜以求的就是如何打好仗，如何避免部队无谓的牺牲。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即便在难得的作战间隙，他也不肯虚掷时光，而是伏在老乡家的水缸盖或者坑沿上，挥汗呵冻，从事著译，为枪林弹雨中的“阵地读者”提供精神武器。他不避险阻，甘冒矢石，和部队一起打恶仗，打硬仗，深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推崇与信赖。大家说，跟着刘邓打仗，什么样的敌人也不怕！刘帅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大局为重，宠辱不惊。即使在受到委屈的时候，也不改其初衷地为党分忧，为国划策，表现了一个彻底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情操与磊落胸怀。他说，我去世的时候，能在墓前立一块碑，上书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即感到莫大的安慰。

（二）勤读不厌，求知若渴

刘帅早年在将校学堂就以品学兼优闻名。后来失去右眼，依然三更灯火五更鸡地顽强学习，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几十年如一日，堪称全军楷模。刘帅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

灭敌人》四种著作为本，以其在实际中运用发展的战例为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且涉猎中外，博取古今。中国古代的历史、兵法，西方军事家的经典、传记，域外各国军队的条令、教令，他无不潜心钻研。然而，他又力避教条主义地生吞活剥，坚持师古而不泥古，学洋而不崇洋，务实而不求虚，精深而不玄奥，把握其精神实质，大胆求异创新，在实践中总结创立适合当前情况、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原则，并归纳成基层指战员所喜闻乐见的口语要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他不但重视理论的研究，而且更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教导干部要向下层和向群众学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无论走到哪里，总要随身携带地图、笔记本和放大镜。向部队了解情况时"打破沙锅纹到底"，不但问得很具体，而且记得很认真。在行军途中或宿营之后，则找村干部或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摆龙门阵，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积累民俗社情等兵要资料。他对太行山的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河流、每一个较大的居民点，都能如数家珍，了然于胸，以致能发现国民党军队印制的地图上的错情。刘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是统领一路大军的统帅，军务倥偬。但他却保持着详细阅读从敌军手中缴获的报章、杂志、日记、公文以及审讯俘虏记录的习惯，每每躬听情报部门的汇报，不放过蛛丝马迹。因之他可以把敌方将领的脾气秉性、出身阅历、派系地位、作战特点说得头头是道。刘帅在战争风云中所表现的大气磅礴和料敌如神，是与他这种严谨的学习态度与艰苦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三）善于总结经验

经验好比一堆零散的铜钱，理论好比是一根钱串子，把各个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铜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这是刘帅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治军打仗格外看重的一件事。他告诫指战员，打了胜仗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把经验总结出来，才算完成了百分之百。每战必总结经验，检讨教训，上报下发，以利再战，是

二野上上下下一体遵循的制度。刘帅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中，不顾鞍马劳顿，征尘积肩，亲自动手撰写了上百篇战术指导和战役经验总结，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宝库。他在抗战初期写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文，日后成了部队长期使用的基准教材，《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当时曾被誉为“太行山区的《论持久战》”。刘帅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把指战员们用流血牺牲的代价换来的克敌制胜之法，升华凝炼，概括为许多著名的作战原则，象宛东战役的“夹其额，揪其尾，斩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陇海战役的“乘破竹之势，直透敌人的心脏，割裂、撕毁敌人的防御体系”，巨金鱼战役的“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鲁西南战役的“攻其一点，吸敌全来，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淮海战役的“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等等。由于这些都是部队指战员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又非常好懂易记，所以往往不需多长时间，就被广大群众娴熟驾驭，运用于新的实践，发生精神变物质的飞跃。这对于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统一作战思想和协调作战行动，无疑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建国之后，他主动请缨去创办军事学院，并要求二野全部送军政主官去接受深造，当然也是出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准备人才的高瞻远瞩。

（四）“刘邓不可分”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刘帅是一个有谦虚美德的伟人，他从不凌驾于集体之上，以个人的意志取代集体的意志。他的战争指导与决策都是跟身边的战友们、特别是跟邓小平同志反复商量之后才做出的。因此，刘帅的军事理论中包含有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心血，是情理之中的事。若论气质、风格、资望、阅历，刘邓是不尽相同的，刘帅深谋远虑，小平决心果断。在二野甚至有一种说法，刘伯承的谋略，邓小平的决心。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们既并肩战斗，共同决策，又相互换肩，相互替代，关系非常融洽，确是军政团结的楷模。就

是在各带一路人马分兵与敌作战的时候，他们也配合得非常默契。所以，刘邓不可分一时传为佳话，对二野各级干部的教益是很大的，至今仍是许多老同志的口碑。小平同志对于刘帅提出的作战方针、战术原则，不但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多有精辟的阐发与补充完善。工作中主动分担责任，尽量帮助他解脱军中细务。刘帅也十分敬重自己的政委，重大行动事先都要移樽就教。特别是在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居功自傲和斗志衰退、发动群众整肃军纪方面，他更是全力支持小平的工作，“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应当说，刘帅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这样一个良好的、军政团结的工作环境是分不开的。刘邓同是经天略地的英才，战争艺术的大师。他们共同写就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共同拥有了那平凡无华的真理。

着眼未来　研究刘帅的作战谋略

李德生

今年12月，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刘伯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我作为过去在刘帅指挥下作过战的一名老战士，深深地怀念这位全党全军尊敬的、功勋卓著的老元帅。在过去几十年的战争年代中，刘帅既担任过一个战略方向的指挥员，又长期担任我军的总参谋长，筹划战争全局，表现出卓越的作战谋略。他的作战谋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在战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军战争指导艺术中的宝贵财富，值得很好的研究并发扬光大。

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包括研究刘帅的作战谋略，不是单纯地为怀念过去，为史而史，最主要目的应该是为未来服务。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虽然是就全民教育而言，但是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在面向二十一世纪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研究刘帅的作战谋略，其主要着眼点也在于如何为未来战争服务，这也是我们纪念刘伯承同志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高超作战谋略

刘伯承的作战谋略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指挥过许多战役、战斗，显示出高超的作战谋略，如同陈毅同志所赞誉的那样，是“论兵新孙吴，守土古韩范”。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他不仅多谋善断，用兵以巧著称，面且在统兵

治校中还一直强调，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必须有足够的学识，做一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要认真学习谋略学，不掌握奇谋方略，是无法克敌制胜的，蠢人是要打败仗的。他的作战谋略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为我军在同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以弱胜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刘帅的作战谋略突出的特点，首先在于他具有极其敏锐的战略眼光。在指导作战时，他一向不是仅就局部战场和某一战斗而设谋，而是立足局部，着眼全局，立足于现在，着眼未来。例如在抗日战争初期，他率领八路军第 129 师挺进敌后，就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党我军的力量，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结合起来，建立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的思想，以此来指导晋冀鲁豫地区的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和发展。他根据这一总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运动战和一系列战法，日本侵略者也被迫承认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在挺进大别山的斗争中，他又和邓小平同志一起，着眼于全国的战略形势，以千里跃进，攻敌腹心的方式，不惜自身付出较大的损失，拖瘦了部队，换得了全国战略形势的大转变。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他又从全局利益出发，采取了“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战法，和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同志一起指挥二野、三野部队把国民党主要战略集团当作“一锅夹生饭”吃了下去。凡此种种，确实体现了一个战略家进行谋略的恢宏气度。

刘帅作战谋略的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趋利避害、机动歼敌。他特别指出：“毛主席的人民的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更需要机动。”在指导作战中，他在这方面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原则，如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把敌人调动起来打；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选择敌人的弱点而击之；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特别是后一条原则，即以我弱的部队消耗敌强的部队，以我小的兵力消耗敌大的兵力，以我强的部队打敌弱的部队，以我集中的部队来打击敌

分散的部队。这些，在抗击力量比我们强大的敌人时尤其有效。日本侵略军曾将此概括为“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这种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原则，已被无数战例证明是完全合乎战争规律的，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一项传家法宝。

刘帅作战谋略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兵作战的方法不拘一格。刘帅强调指挥员对战争情况的深入了解，并能从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项客观实际，即打胜仗的“五行术”出发，针对不同的条件运用不同的战法。在建国后，我军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作战对手与过去国内战场上相比也有很大不同，刘帅又根据新的作战对手和我军的新情况，对新的战法进行了新的探索。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这样一场带有现代局部战争特色的作战中，刘伯承同志就特别注意研究战地的特殊地形和对手情况，当时他虽然远在北京，却心在前线，日夜考虑如何取胜的问题，并想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刘帅特别指出：“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在自卫反击战开始前，边界西段新疆方向的敌我双方兵力基本相等，印军又依托坚固的据点工事进行防守，刘帅就此提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这是个大问题，时间长了夜长梦多。”战斗开始后，新疆军区部队采取了集中局部兵力，先歼敌一部，再转移兵力歼敌另一部，逐个拔点的战法，达到了把敌人分散开打的要求，确保了战斗的胜利。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第二阶段开始前，刘帅又针对西藏军区的部署指出：“这次作战，算得上是真正的山地战，我最大不放心的就是道路问题，部队能不能插过去？有没有道路可通行？”刘帅还把印军在东段的部署形象地比喻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提出分进合击的作战建议。在东段第二阶段的作战中，我军正是采取了“打敌之头，击敌之尾，剖敌之腹，切敌之尾，各路向心合击，将敌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取得了

重大胜利。事实也证明，刘帅的这种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的态度，正体现了毛主席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军事领域中的生动反映。

从古至今的军事家都讲谋略，但是刘伯承同志的作战谋略确实高人一筹。他既吸取了中国古代传统谋略思想的精华，又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作了许多发挥，确如朱德总司令所赞誉的，刘伯承同志“具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

高人一筹的谋略来自于先进理论与深入实践相结合

刘伯承同志的作战谋略，一直为全党全军所敬重，甚至也折服了我军的作战对手。在这里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同样作为指挥员，刘帅就能够有高人一筹的谋略，其主要原因何在呢？

刘帅自幼勤奋好学，从军之后又能刻苦钻研。他在受伤残废后，读书学习和工作都比常人困难得多，可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刻苦治学，其榜样闻名全军，成为各级指挥员的楷模。在战争时期，戎马倥偬中不管环境多么艰苦紧张，他始终孜孜不倦攻读，勤奋刻苦译著。这种精神，无疑是他具备高超的军事才智的基本前提。然而，刘帅在军事谋略方面的成就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刻苦勤奋，更重要的在于他能把先进的理论和深入实践相结合。

刘伯承同志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时，看到一条标语写着：“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他非常欣赏这条标语，以后一直将其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刘帅不仅在战场上征战半生，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又擅长于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在国外高等军事院校进行过系统的军事科学训练，并钻研了马列主义的军事学说。他在精于军事理论的同

时，又能把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战争指导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认识上的飞跃。这样，他既不同于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种主要靠自身感性知识认识战争的经验主义者，又区别于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种“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成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刘帅高人一筹的作战谋略，正是这种结合的生动体现。

刘帅在带兵和办院校时，特别注意要求指挥员认真学习军事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他认为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军事水平，首先要解决文化科学知识问题，因为文化科学知识是打开学习政治、军事大门的锁钥。他经常把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通俗地比喻为“钱串子”。他本人也正是以这个“钱串子”将丰富的实践经验串在一起，然后再深入实际。他对待军事理论和上级指示的态度也是一切唯实，从不生搬硬套。邓小平同志在八路军第129师纪念刘伯承师长五十寿辰时的贺文中曾对此有过一段说明：“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注意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语。”正是由于他深入战争实践，又以先进的科学理论驾驭战争实践；既借鉴我国的古代兵法和国外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又根据中国的战争实际予以创造性的发展，运用谋略指挥战争才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

着眼于未来学习刘帅的作战谋略

刘伯承同志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也曾记下了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条语录：“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方法也要随之而变。”在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刘帅总是立足于战争形式的发展变化，在作战谋略方面不断创新。建国以后，刘帅虽然年事已高，身

体条件也每况愈下，但是他仍然不知疲倦地努力钻研现代军事科学，为未来战争献策献计。我们研究刘帅的谋略思想时，同样要本着立足未来的精神，从中吸取对今后我军的建设和作战有益的财富。

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7月10日给南京军事学院所发的训词，认为军事学院本身就“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毛泽东在训词中还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刘帅在研究作战谋略时，就积极适应了这一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他特别注意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认为进行现代化战争已是我军未来的主要课题。在南京军事学院时期，刘帅还根据现代化战争日益复杂，需要多军种、兵种配合的实际，提出了“克服‘单打一’，学会‘弹钢琴’的口号。此后，刘帅在担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长的岁月里，仍以他全部的精力，日夜为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未来战争问题而操劳。在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方面，刘帅早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我军建设真正转到了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进行和平建设的新环境，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经验，主要目的是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服务，为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特别是应付局部战争服务。我们进行军事历史的研究，包括对刘帅等老一代革命家、军事家的研究，在指导思想，选题计划和研究方法上，也都应该以现实和未来的需要作为考虑的重点。

未来作战中克敌制胜的方法，其实可以概括分为两大类，一是从敌我各种实力出发以力求胜，二是运用各种谋略以智求胜。用现代语言讲，也就是“硬方法”和“软方法”。这两种方法常常又是交织在一起使用的。因为现代化战争仍然是武装着的活人的较量，战场条件变化更快更复杂，体现了经验积累、高度的洞察力

和创造性思维的“软件”指导，仍然是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纯“硬件”不能替代的。不仅装备和实力较差的一方可以通过巧妙的谋略运用，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即使是现代战争中和装备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一方，为了达到尽量减少损失并取得较大战果的作战效益，也往往非常注意运用谋略。例如在1991年年初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就非常注重运用中国《孙子兵法》的谋略艺术。事实证明，传统的谋略艺术在现代战争中不仅没有过时，甚至可以在新形势下大放异彩。

谋略主要起到启迪和丰富人们思维能力的作用。作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对于古今中外的谋略思想都应该有所了解并进行研究，但是从我国的国情和我军的军情出发，我们军队的指挥员应该特别注意学习我党我军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谋略思想和艺术。刘伯承同志的作战谋略，既有同国内敌人斗争的内容，又有同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经验；既有进行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方略，又有诸如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这类局部战争的巧妙指导。当然，世界上任何经验的适用范围都是由它赖以存在的条件决定的。要看过去的经验和谋略在现代战争中是否适用，就要把这些经验的历史条件同现代战争的条件相比较来进行分析。刘伯承同志的作战谋略，主要是在过去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这个条件下产生的，是战争以智取胜的光辉范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军同我们的一些作战对手相比，在武器装备和技术条件上仍会处于劣势，想单纯地以力取胜，拼装备、拼技术，是难以战胜敌人的。因此，刘帅的一些作战谋略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在未来战争条件下仍然是适用的。这些作战谋略又是我军自己的宝贵财富，带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又距离我们很近，学起来亲切，感人、易懂，并可以从中受到刘帅等老一代军事家的思想和优良作风的感染。

刘伯承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六年了，但是刘帅的谋略思想无论在今天还是在今后，仍然是我们军队高级指挥员学习的重要内

容。现在，刘帅的作战谋略许多内容还需要我们去继续研究和探讨，希望能通过这些研究，使我军的军事学术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充实和提高，为培养更多的适合未来需要的军事人才起到促进作用。

学习刘伯承“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
探索未来我以劣胜优的作战方法

马凤桐　少将

刘伯承身经百战，功勋显赫，被称为“常胜将军”。他在几十年戎马倥偬的作战中，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尤其是他敢于在强敌面前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反映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风格，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的成功运用。通观我集团军（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战史，无论北进热河，还是南下广东，都凝聚着刘帅善于用兵、出奇制胜的伟大创举。本文结合战争年代刘帅指挥我部作战的成功经验，着眼未来局部战争的需要和发展，浅议现代条件下创造敌人弱点、以劣胜优的问题。

一、刘伯承创造敌人弱点思想的基本内容与鲜明特色

创造敌人弱点，是刘伯承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三。一是积极寻找和主动创造敌人弱点。刘帅在指挥作战中，善于在敌部署中发现、寻找敌人的弱点，在敌弱点暴露不充分或找不到敌弱点的情况下，则强调要主动造势，采取多种积极手段创造敌人弱点。二是集中优势力量打击敌人弱点。刘帅要求，一旦寻找或创造出了敌人的弱点，就要抓住有利战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突然猛烈地一举击溃弱敌。三是通过有效机动，获取创造和打击敌弱点的有利条件。面对强敌进攻，我不应消极被动地迎战，而要在适当时间和适当条件下，通过多种形式的机

动来调动敌人、分散敌人、孤立敌人，使敌破绽百出，暴露弱点，我则在机动中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打弱敌于分散、孤立之中，使其主力不能或来不及援救其弱部。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部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认真贯彻执行创造敌人弱点的用兵思想，成功地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战役和重要战斗的胜利。如邯郸东南崔曲、旗杆章地区歼灭战、郓城攻坚战、千里跃进大别山、高山铺地区伏击战等等，都是正确贯彻刘帅创造敌人弱点思想而取胜的成功战例。在这些战例中，我认为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强调动静结合，在实施机动中创造敌人弱点。*刘帅强调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改变客观条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积极地创造敌人弱点。具体体现在，一是以动制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运动中创造敌人弱点。他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和作战问题》一文中讲道："保持最大的主动的机动性，或者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人弱点而消灭之，这是主要的机动方针；或者大踏步的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①他主张，通过大踏步地前进与后退来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迫使敌仓促改变自己的部署，或者来不及改变部署，在运动中创造和暴露敌人的弱点，使敌人态势向不利方向转化。1945 年 10 月至 11 月，我部在刘邓首长指挥下，于邯郸战役之后大踏步前进，一出陇海线，取得了陇海战役的胜利；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在内线作战，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随即回马一枪，取得了鄄南战役的胜利。刘帅就是这样通过大踏步地机动，调动敌人，创造敌人弱点，及时准确地打敌弱点，积小胜为大胜，从而逐步改善敌强我弱态势。二是以静制动，在兵力分配上创造敌人的弱点。刘帅强调：袭击驻止之敌，是创造敌人的弱点，故用兵不要大；伏击运动之敌，是打击敌人的弱点，故用兵要大。我部高山铺地区伏击歼灭战，就是贯彻执行刘帅创造敌人弱点、打敌弱点思想的成功战例。1947 年 10 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一

纵首长根据刘邓首长以少部兵力创造敌弱点，待弱点形成后予以歼灭的思想，纵队完成在湖北蕲春县高山铺地区预伏的兵力部署后，于10月26日拂晓，以中原独立旅一个连、旅侦队与敌接触，在敌猝不及防之时，我迅速集中兵力，以不到两天的时间全歼了敌整编40师、52师、82旅共1.25余万人。二是动静结合，在集中优势兵力上创造敌人的弱点。"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这是刘帅总结的十六字诀，其核心就是要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谋略和指挥艺术，改变战场上的强弱、优劣的对比，将战略上处于强者的敌人，转化为战役、战术上的弱者，使自己在战略上的弱者变为战役战术上的强者，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造成我之优势，敌之劣势。如定陶战役中，我部按刘帅思想，以少数兵力结合群众性的游击作战，钳制敌整3师以外的各路敌军，保证了我军能集中五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歼灭敌整3师的一个团、一个旅，发展到全歼整个师。

（二）强调谋略运用，在施谋用计上创造敌人弱点。刘帅谙熟古今中外兵法，在他几十年的指挥作战中，无处不反映他足智多谋积极创造敌人弱点的指挥艺术。一是通过奇正相生，隐真示假来创造敌人弱点。刘帅曾指出："积极的声东击西，利诱威胁敌人；消极地隐蔽自己的真实行动，使敌人误解我们的行动，使它在部置兵力时对付我们的尖刀不能向着我们，而是把松懈的弱点向着我们，给我们好去袭击他，……。"②七亘村重叠伏击战就是刘帅奇正相生、施谋用计的成功范例。二是通过斗志斗法来创造敌人弱点。刘伯承说：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处理好斗志与斗法的关系。他强调：敌我双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就是说，我们的斗法，就是要使自己逐渐地"盈"和"长"，使敌不断地"虚"和"消"，这样，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三是通过斗智斗勇来创造敌人弱点。1946年11月刘帅指挥的滑县

战役，是与国民党刘汝明、孙震、王敬久三个集团斗智斗勇取胜的杰作，刘帅在认真分析三个集团兵力部署的特点后，根据孙震集团的兵力分布情况，采取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猛虎掏心的打法，避开了敌人的前锋据点，突然渗透到敌防御纵深 20 余里，先攻歼其指挥中枢，吸引其所属并予以在运动中歼灭。

（三）强调掌握"五行术"，灵活多变地创造敌人的弱点。一方面，刘帅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移意为指挥作战的"五行术"，教导部队指挥员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无穷。要求在每战之前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并分析对比，寻找有利条件，创造敌人的弱点。他认为，充分地利用天候和地形、地物，则弱军变成强军；强军进入不利的天候和作战地区，则强军变成弱军。因此，特别强调依天时地利的条件创造敌人的弱点，增长我军优势。另一方面，强调灵活地用兵创造敌人的弱点。刘帅总结出的"合围与割裂"战术、"杀鸡要用宰牛刀"、"围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等作战指导原则，都贯彻着灵活用兵、有效地创造敌人弱点的精神。我部的郓城攻坚战、蒙城、板桥地区阻击战、黔东至成都西南地区迂回围歼战等各大战役的胜利，都是刘帅指挥我部创敌弱点、打敌弱点的杰作。

二、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在未来局部战争中的指导作用

刘帅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是我军以弱胜强、由弱变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对于未来局部战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创造敌人弱点，是我军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重要手段。刘帅十分重视发挥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把主动创造和发现

敌人弱点，有效打击敌人的弱点，作为改变战场态势，促使我军由弱转强、以弱胜强的重要手段。现代条件下抗敌局部入侵，我在作战指挥上积极筹划创造敌人弱点，在作战实施上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有效战法打击敌人弱点，对于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转化敌强我弱的形势，从而逐步达到以弱胜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这是因为，创造和打击敌人弱点，第一、可以调动敌人，创造和捕捉到有利的战机。现代局部战争，对付武器装备优于我的入侵之敌，敌人弱点不一定都会主动暴露，必须采取强化手段以利诱之、以诛假之、以强逼之，使之暴露，这样才可能争取捕捉到有利的战机。出现了有利战机，我就会在局部作战上打敌弱点，造成局部优势，再由局部优势促进和影响整个战场局势的发展，进而实现全局上的优势。第二、便于集中优势兵力，"以集灭散"。主动创造敌人的弱点，通过各种手段调动敌人，可变敌重点进攻为分散进攻，变敌整体强为局部弱。造成这样一个战场态势，我可集中优势对分散的弱敌予以各个歼灭，以此达到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第三、能达成局部作战的我强敌弱，逐步实现整体上的以弱胜强。我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创造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就能做到每战都有优势，每战都有取胜的把握，这样就可以由局部强发展到整体强。

（二）创造敌人弱点，是现代局部战争中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战争力量的优势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和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刘帅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较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其立足点和着眼点，就是坚持以我为主，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他指出：不断地窥破与创造敌人弱点，经常保持主动权。他不仅要求指挥员要善于发现、寻找敌人的弱点，而且更期望指挥员积极主动地创造敌人弱点，主动地歼灭敌人。未来战争，特别是局部

战争，规模有限，战争持续时间有限，又多为政治、经济和外交斗争所诱发。在这种战争背景下，通过创造敌人弱点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是创造和打击敌人弱点，可为政治、经济、外交斗争创造条件。未来局部战争，在军事对抗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斗争与对抗，因而交战双方都会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制定军事斗争的行动企图。敌局部入侵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更谋求由军事打击而产生的综合效益，迫我于不利境地转入政治解决。我通过军事手段主动创造、寻找敌人的薄弱部位，集中力量打击敌之弱点，使其失其一部，震动全局，就能使我在政治、经济、外交斗争中取得更为主动的地位。二是创造和打击敌人弱点，可削弱敌人的进攻锐气，为我作战反击创造有利条件。未来局部战争，由于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总体上敌处于主动地位，我处于被动地位。由于战争发起的时间突然，力量集中，我单靠正面防守，很难摆脱被动局面。而我在正面坚守的同时，主动调动敌人，创造敌人的弱点，抓住有利战机给敌以局部重创，就可以促使战场矛盾向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这样我不但削减了敌人的进攻锐气，为我实施反击作战赢得了时间，而且牢牢掌握住了战场主动权。三是创造和打击敌人弱点，有利于震撼和威慑敌人，动摇敌之进攻企图。局部战争虽然目的有限，但双方都想打"疼"对方，以打迫让，以打迫和，因面都十分讲究打击的力度和强度。我未来抗敌局部入侵，应充分利用敌出境作战后方无依托、民众无基础、地形生疏、保障困难等不利因素，创造和寻找有利战机，组织一定规模的力量，从多方向伸出"进攻之手"，给敌要害和薄弱部位以重创，把被动强加给敌人，这样就可以动摇敌人的进攻企图，有效的遏制敌人的入侵行动，使我由被动变为主动。

（三）*创造敌人弱点是与敌高技术兵器作斗争的有效措施。*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现代战争呈现出高技术、高精度、高速度、高效能。面对敌高技术力量广

泛用于战场，我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就必须在决策指挥上高敌一筹。英阿马岛之战，阿军实施空中佯动和电磁欺骗，有效地调动了英军的防空力量，取得了空对舰作战的有利态势。这说明高技术可以称雄现代战场，但并不是无懈可击、不可战胜。实践表明，善于发现、利用和制造敌高技术兵器的弱点，专攻敌人的技术死角，就能够使敌高、精、尖武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可见，刘帅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对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仍具有重要意义。我利用寻找和创造敌人高技术兵器弱点与敌斗争，要注重了解敌人高技术兵器的强、弱情况，对敌高技术兵器性能、特点、杀伤能力以及受作战环境制约的因素等做到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要善于发现和寻找敌高技术兵器的弱处，采取各种积极手段和方式给敌高技术兵器造成技术死角，使其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战效能，甚至妨碍其自身作战行动。这样敌武器装备虽处于优势，但却失去了优势的效能；我武器装备虽处于劣势，但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效能。可见，积极主动寻找和制造敌高、精、尖技术兵器的弱点，就能够在一定作战范围内，一定作战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就能够靠现有的武器装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

三、未来局部战争运用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需要把握的关节问题

未来局部战争，尽管战争的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战争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同样是兵力、兵器等物质力量的对抗，同样是敌对双方智慧和谋略的抗衡。因此，刘帅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对于打赢现代局部战争有着更重要的指导价值。把刘帅创造敌人弱点的思想贯穿于现代局部战争，我认为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关节问题。

（一）创造敌人弱点，要知敌熟敌，把握住敌人行动的规律。

在未来的局部战争中，要实现创造敌人的弱点，首先要知敌熟敌，把握住敌人行动的规律。作战中努力获取敌方情报，熟知对手的强弱虚实，对作战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只有掌握敌人的各方面情况，并通过敌我力量的分析对比，才能选准创造敌弱点的对象和部位，才能正确地使用兵力，采取有效的战法。知彼，一要重点了解作战对象的现有编制装备、作战能力、作战特点，尤其要查明当面之敌的战役布势，弄清何为强弱，何为虚实，何为正奇，据此判明敌态势，把握住敌人的行动企图，有针对性地调动敌人。二要弄清作战对象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和手段，尤其要查清敌现代化的侦察、伪装技术和手段，这对我采取措施创造敌人的弱点十分重要。三要掌握敌将帅之习性。对敌指挥员指挥的思想、方式、方法进行认真了解和综合分析，找到有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我摸准敌人的作战企图和行动脉搏，从而达到对敌之弱点选得准，敌之弱点暴露快的目的。

（二）创造敌人弱点，要奇正结合，用好创造的手段。未来战场将是高科技的角逐，敌方将不惜余力投放高、精、尖武器，面对强敌，创造其弱点难度更大。因此，必须采取“以奇制胜”的手段。刘帅在《战术问题》一文中论述找弱点和创造弱点的问题时说：“创造弱点，诱敌深人，以迂为直，走迂回路比走直道好”。③现代战争，战场情况多变，战机稍纵即逝，这就要求在现代局部战争中创造敌人弱点的手段必须多样化，只有不拘一法、灵活多变、奇正结合地运用多种手段，才能创造出弱点。在现代局部战争中巧用“奇正”创造敌人弱点，第一、要通观全局，周密筹划。对任务、时间、地点、环境、敌我双方的行动进行周密分析，对创造敌人弱点要用哪些手段、措施要周密筹划，做到胸中有数，有较大的成功把握。第二、要知敌心理。平时要注意研究军事心理学，积极开展外军研究，尤其要加强对战区周边国家军队情况的了解，研究他们的作战思想原则、方法等，善于与敌进行心理作战。第三、要谙熟兵法。熟练地掌握运用奇正结合的原则是更

好地运用“奇术”的前提，要创造出敌人弱点，就要谙熟运用韬略，博览成败之法，探求胜负之因，不断提高谋略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代作战中巧妙用兵，迫敌就范，创造出有利战机。第四、要重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现代条件下要有效地欺骗敌人，创造敌人的弱点，一方面要尽可能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手段，诱骗敌高技术侦察器材，与敌展开技术对抗。另一方面，寻找和积极创造敌高技术侦测手段的短处，积极与敌开展反技术斗争，降低敌现代侦察技术器材的分辨能力，使敌情报混乱，摸不清我真实情况，为我创造敌人弱点创造有利条件。

（三）创造敌人弱点，要因情因势，把握好创造的时机。未来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把握好创造敌人弱点的时机十分关键，必须根据战场的情况、敌我态势的变化、不同的敌情等，不失时机地乘隙创造。一是要精心谋划，创有成效。要根据作战任务、作战对象、作战时间、作战地点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确立战法的运用、兵力的使用和各种作战行动。要拟制多套方案，设置多种情况，研究多种应付措施，精心谋划，巧妙运筹，做到创有效果。二是要抓住重心，创敌要害。要把创造敌弱点的焦点调到对全局中起决定作用的关节点上，牢牢地把握其重心，不失时机地在敌致命点上使敌人出现弱点，从而达到一个弱点的形成就可以牵动全局的作用。三是要把握战场动态，创造中要有应变对策。未来战场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领域，创造敌人弱点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分析和灵活判断敌我双方不断变化了的情况，做到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在敌我变化中抓住创造敌人弱点的时机，适时创造和打击敌弱点。

（四）创造敌人弱点，要寻、创、打一体化，发挥整体威力。刘伯承说：“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④“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⑤可以看出，寻找弱点、创造和打击弱点是互相联系的整体，找的过程中就有创造的积极性，创造的过程中贯穿着找的行动。无论是

寻找弱点还是创造弱点，目的都是为了打敌弱点，使之成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最后实现以劣胜优的先期手段。把握和处理好寻、创、打的关系，首先要把寻、创、打击敌人弱点的思想一体化．单纯的寻敌弱点，单纯的创敌弱点的思想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做到寻中有创，创中有寻，创中有打。同时，在一些情况中，打的过程也是创的过程，创靠打来实现。其次，要在寻、创敌弱点的同时，采取灵活的战法实施打击。寻、创敌人的弱点是条件，打击敌人的弱点才是目的，这样才能使创造敌弱点在战役战斗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创造敌人弱点，要充分发挥有利条件，提高作战效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决定了未来的局部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在我边境地区的浅近纵深展开。这样，我就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客观环境，给创造敌人弱点提供了很多可利用的有利条件。一是可以充分地发挥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平时在加强既设战场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地形的研究，熟悉战场内地形、江河、湖泊等战术使用价值，通过分析利弊，丰富指挥员知天知地的本领，为筹划创造敌人弱点奠定基础。二是要充分发挥民众的有利条件。敌异国作战，不仅地形不熟，而且还会激起边境地区民众的愤恨，只要我们充分地组织人民群众，采取积极行动对敌实施干扰，打击敌后方，主动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敌弱点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三是要注重战例研究和平时演练。通过对作战地区战例研究，借鉴成功经验，分析失败教训，借石攻玉。还要结合作战地区的特点，积极开展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组织指挥、摆兵布阵、施谋用计、调动敌人等演练，从而提高在未来作战中充分发挥我有利条件、创造敌人弱点的方法和谋略水平。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215、第 122、第 440、第 90、第 90 页。

浅析刘伯承军事谋略思想及其运用

张臣刚大校　周德峰上校　刘转学少校

刘伯承作为身经百战的元帅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谋略思想的精华，在革命战争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军事谋略思想，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认真研究刘帅的军事谋略思想及其光辉实践，对增强我们的谋略意识，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有重要意义。

明代刘基说，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列宁曾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战争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一部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谋略对抗史。回顾刘伯承的戎马一生，翻开他的军事著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精粹的军事谋略学说。他智勇双全，谙练兵法，不仅以骁勇威震四方，尤其以战法多变、用兵出奇，使敌人望而生畏。他常说，一个指挥员不掌握奇谋要略，就无法克敌制胜。把巧用谋略作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战争实践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军事谋略思想。

一、谋势造势，先胜尔后求战

善于造势是刘伯承运用谋略的重要体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之所以能指挥我军取得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战争指导中善于谋势造势，先胜尔后求战。

一是从敌强我弱出发，造“先为不可胜”之势。在敌强我弱

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高明的指挥员，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先发制人，而在于谋求不被敌所制。刘伯承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常常谋求有利和可以依靠的民势。他说：我们进行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实行的战略是人民的战略。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于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率领八路军第129师挺进华北敌后，在积极打击日伪军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抗日自卫队等组织，激发了广大群众积极参战的热情，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着眼整体效益，造全局协调之势。刘帅认为，造成全局协调之势，既可以从战略上分散敌人，减杀敌人优势，使敌陷入被动；又可以使我军分散在各处的力量在战略上形成整体合力，增强我军的优势，使我军争取主动，进而为歼灭敌人，转化敌优我劣的形势创造条件。刘伯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是要求所部开辟更多的根据地，总是注意加强各根据地斗争的互相配合，并使之逐步连成一片。刘伯承在战略指导上，还善于运用“要穴势”制敌于死地。解放战争第二年，刘邓大军进行的鲁西南战役，胜利地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在敌中央战场上打开了一个战略缺口，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重要的道路，切断了敌两个重点进攻集团之间的战略联系，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粉碎敌人对我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整体上同东北、华北、西北等战略区的内线反攻相配合，形成了对国民党军队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再如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时，刘邓大军从南线中央敌人薄弱部位突破，尔后经豫皖边区向大别山挺进时，在中原地区形成“品”字形的布势，造成对敌中央突破、三军挺进、两翼箝制，内外线配合的联网势，从而有效地箝制、调动、分散了敌人，使敌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被动态势。

三是趋利避害，造动中歼敌之势。擅长机动是刘帅造势的重要手段。他一贯强调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为争取主动以达到

以弱胜强的目的，就更需要机动。几十年来，刘帅对机动的战略战术有深刻的研究和系统地论述。他强调脚才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机动的本质是歼灭敌人；机动的主要形式是大踏步进退，靠机动以调动敌人，在机动中寻歼敌人。所以，他要求部队不要怕行军，行军也是战术。他认为游击战是大游大击，中游中击，小游小击。游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击要发挥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做到游与击巧为配合，达到趋利避害之目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邓指挥的几十个著名战役，都是以实施灵活机动来达到歼灭战之目的的。对刘帅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日军感到神出鬼没、无法对付，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更感到“莫测高深，不能不服”。

二、示形动敌，创造和利用战机

示形是讲骗敌，即通过隐真示假，有计划有目的地制造种种假象，以造成敌人的错觉，其目的是隐蔽自己的企图，配合造势，迫敌就范。刘伯承指导和筹划战役战斗时，非常善于示形动敌，形之敌必从，预之敌必取，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如同孙子所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首先，摸准敌人的心理，因势利导。在军事对抗中，军队的行动有赖于指挥员的决心，而指挥员决心的形成又常常受其心理因素的制约。示形作为一种伪装骗敌活动，也只有紧紧抓住敌人的心理特征——企图、欲望、思维方式等，才能达到造敌错觉，而导致其错误行动的目的。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在示形动敌中只有掌握了敌人的心理特征，才算牵住“牛鼻子”，才能使敌人听我调动。刘伯承为了准确把握敌人的心理特征，十分重视敌军研究工作。他常说，打仗弄不清敌情，就是“狗戴沙锅乱碰”。他善于组织多渠道的战略战役侦察，广泛了解敌情，注意从敌人的报纸、缴获的文电和信件、俘虏的口供乃至私人日记中寻找资料。

他对敌军主官的出身、地位、个性、派系和作战特点，以及当面敌人的企图、兵力部署、装备和行动规律了如指掌，为有的放矢地运用示形调敌谋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准确把握敌人心理特征的基础上，善于针对不同敌人的不同心理特征来制敌。上党战役中，刘伯承、邓小平准确地抓住了阎锡山军队重于守城、极不善于野战的弱点，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急于实现取代日军占领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战略区的心理状态，采取攻敌必救，歼其救者，诱敌与我野战的谋略，通过围城打援、夺城打援和消灭突围逃窜之敌三种方式，歼灭阎军13个师3．5万人。刘帅还善于把握战争不同阶段敌人的不同心理特征，而因敌制胜。在不同阶段敌人的心理特征是不相同的。战争初期，敌处优势主动，容易骄纵轻敌，加上他们先发制人的战略指导，往往有一种急于求战、求胜的心理；随着战争的发展，在他们吃了一些苦头，碰了一些钉子后，又容易产生不服气和急于寻机报复的情绪；到了战争后期，敌人元气大伤，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慌、犹豫，有时可能要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有的可能要寻找逃路、退路。刘伯承正是在战争不同阶段，根据敌人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人、因时、因地采取不同战法，达到了有效歼灭敌人的目的。

其次，善于示形，而又无常形。示形，是我军军事谋略的传统原则。若指挥员只懂得一般原则，只会按常规示形骗敌，那就难以取胜于敌。刘伯承在战争中示形调敌所以能每每成功，重要原因就在于善于灵活示形，不拘一格，变化莫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敌人难以判断出我真实意图，从而入我圈套。声东击西是刘伯承常用的一个示形调敌谋略，敌人也深知这一点。但刘伯承对声东击西的运用则每次都有不同的谋略，因而使敌人总是摸不清我军声的是哪个东，击的是哪个西，结果总是逃不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第三，勇于创造调敌新法。在我国军事谋略宝库中，示形调敌的谋略方法是很多的。诸如：虚则实实，实则虚虚，欲擒故纵，

瞒天过海，无中生有，金蝉脱壳等等。对此刘伯承都有娴熟的运用。同时他还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创造了示形调敌的谋略新法。同是伏击战，或伏其救者，或伏其退者；或诱伏，或逼伏。同是口袋战术，有时采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时采取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是围城打援，有假攻城，真打援；有的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等等。他灵活运用并发展了我军游击战、运动战的传统战法，总结出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狼的战术、大迂回包围等新战术。还借鉴和发挥我国古代兵法，创造了许多新战法。对于刘伯承的战法，当时防守黄河南岸的敌第70师师长陈颐鼎后来感叹地说，刘伯承将军真是天下奇才，他的一些打法，自古以来兵书战策上从未有过。

三、巧用诡道，给敌以错觉和不意

自古以来明智的兵家都主张和实行用兵要诡诈的原则。可以说善用诡道是我国军事谋略思想的突出特征。刘伯承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他在谈到游击队的行动时曾经指出："政治主张要公开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诡诈"。如果游击队的政治主张不公开，不明确，则不能组成为广大民众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达成民族解放的政治任务；如果军事行动不秘密，不诡诈，则不能作趋利避害的机动，就达不到消耗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

其一，运用诡道，是刘伯承谋略运筹的重要内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刘伯承从认识路线上肯定了在革命战争中运用诡道的合理性，把运用诡道谋略作为整个谋略运用的重要内容，把秘密和诡诈联系在一起，善于针对敌人弱点来运用诡诈。他还十分注重依靠人民群众实施诡诈来消灭敌人。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指挥的神头岭战斗中，神头村的群众积极协助我军对敌人实施诡诈，有效地打击了敌人。1948年1月7日，参加"围剿"大别山的敌嫡系主力第11师师长王元直在日记中写道："共军好用计

兼城，而我地方行政人员每为其所骗”。

其二，不守常法，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在战争力量的使用上如何善用奇兵，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予其突然的打击，是诡道谋略运用的一个重要内容。刘伯承是善用奇兵的谋略大师。他认为：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的统一，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法则。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变化无穷。因而他总是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创造一个又一个出奇制胜的光辉战例。1947 年 6 月 30 日我 12 万大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就是典型一例。他把渡河地点选定在临濮集至张秋镇之间 300 里的河段上，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称这一天险可抵 40 万大军，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刘伯承通过声东击西和支援作战与主力作战相配合的打击，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达到了突破之目的。

其三，出敌所料，反常用兵。古人说，用兵之法，贵在不复。战场上的搏击抗争，有的是按照用兵常规打了胜仗，也有的是脱出兵家寻常习惯，反常用兵而战败对方。1937 年 10 月 26 至 28 日，刘伯承指挥八路军第 129 师在山西平定县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就是他“反常用兵”的巧妙运用。

四、伐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通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战争是力量的对抗，没有军事上的压力，要屈人之兵是不可能的。所以，刘伯承在指导和筹划战役战斗时，为了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总是以军事打击为主，善于将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斗争手段与军事打击密切配合，对敌人施加压力。或长困久围，陷敌于死地；或以大兵压境，占领战役要点，陷敌于死地；或以大军胜利的余威给敌施

以巨大的心理压力，使敌感到军事斗争的绝望，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尤其通过分化瓦解，造成敌人屈服，是刘伯承军事谋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我军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达成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这方面，刘伯承专门撰写了《怎样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力量》的重要文章，深刻阐明政治攻势在争取抗战胜利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政治攻势作为“敌后抗战的三大中心工作之一”，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发布重大作战命令时，总是十分注意强调瓦解敌军工作。他曾出席晋冀鲁豫地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给“反战同盟”的成员极大鼓舞。1945 年 11 月，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组织部署了国民党军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起义，取得了解放战争中我军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此后，他又多次接见敌军起义和被俘的高级将领，为瓦解敌军做了大量工作。

通过深入研究刘伯承军事谋略思想，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军事谋略是军事领域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一门科学。无论过去和现在，谋略在军事斗争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千姿百态的军事谋略斗争史，每一场战争、战役、战斗的胜负，无一不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赛谋斗智的结果，无不体现谋略的巨大威力。实践已经证明，在军事对抗活动中，巧施计谋，可以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敌对双方在物质条件优劣悬殊的情况下，巧于用谋的一方，能够弥补物质条件之不足，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功效。从 80 年代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到去年发生的海湾战争，无不是硬抗衡和谋略抗衡的结合。一方面，动用大量的军队、飞机、大炮甚至地面导弹进行硬交锋；另一方面，又在战略、战役和外交等方面运用谋略、争取主动，蒙骗对方，以智取胜。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军事领域已成为知识、技术密集的领域，军事谋略正日益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未来战争将更加突出智力对抗，这在武器装备仍

处于敌优我劣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充分发挥军事谋略的重要作用，在战法上胜敌一筹，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我们应重视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辩证地认识武器装备的敌优我劣，不断增强以谋制胜的信心。尽管未来作战与以往战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高技术条件下的人仍然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正如毛泽东早就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现代战争依然如此。虽然高技术装备大量运用于战场，使得武器的射程、射速、命中精度、杀伤性能和自动化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使战争的激烈程度、空间规模、速决性等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战争。但归根到底，武器本身不会自动地发挥作用。它自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要驾驭它还是靠人，要使它发挥最佳的效能，还是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靠军事谋略的指导。在现代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高超的谋略是武器装备性能的“倍增器”。善于发挥人的作用，多谋善断，运用高敌一筹的军事谋略，使我之劣势装备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就能削弱敌之优势装备的作用，从而实现“以劣胜优”。善谋者，寻敌之隙。单纯以高技术兵器制胜的神话，是可以打破的。武器装备的优劣强弱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任何武器装备性能的发挥，都受人的能动作用及时间、地点等条件的制约，在某一条件下看来是优势或劣势的武器装备，在另一条件下就可能互易其位，各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美国海军武器装备堪称世界一流，其特混舰队尽管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火力系统，但由于缺少扫雷设备，对扫除水雷竟无能为力。伊朗掌握了这个弱点，巧妙地使用老古董开展水雷战，使美国不得不用油船开路，军舰尾随油船。因此，认识和掌握武器装备优劣长短的辩证原理，并将其运筹谋划于现代战争实践，必将增大我们战胜敌人的可能性。古今战争实践充分说明，只要谋高一筹，定能以弱胜强。

二是要充分发挥谋略优势，力求在战法上胜敌一筹。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表明，兵以诈立，多谋者胜，谁智高一筹，就鹿死谁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客观规律，创造性地运用战法，从来是弱军战胜强军、劣势装备之军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重要途径。现代战争仍然是敌对双方物质力量和谋略智慧的对抗。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技术兵器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不仅没有降低军事谋略的作用，反而为运用谋略思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在现代战争中，我军要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挥谋略优势，力争在智谋较量中高敌一筹。作为指挥员运用谋略思想以弱胜强，一方面，要注重在造势谋势中实现强弱转化，对敌造成一种有利之势，或迫敌就范，或将敌导向不利态势，或逼其在不利形势下作战，以达先胜而后战。另一方面，要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战法。古往今来，大凡创造过以劣胜优奇迹的军事指挥员，无一不是在战法运用上勇于标新立异，大胆打破陈规。现代作战，高新技术的运用为战法上的奇正变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创造性地运用和变换战法，仍然是我军现代作战中以弱胜强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就需要各级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客观分析敌我双方的具体特点，因情措法，善于利用敌人思想上的不意，作战部署上的不备，技术装备上的死角和意想不到的手段，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三是要着眼现代战争特点，努力提高各级干部多谋善断的能力。现代战争情况复杂，瞬息万变，军事对抗的手段和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要在这一战场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需要认真运筹谋划。能把握有利时机拿出高敌一筹之谋，就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就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希望。因而，加强谋略训练，努力提高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多谋善断的能力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纵观古今，大凡以多谋善断著称的军事家，无不在军事理论上有较深的造诣。我们应该学习和挖掘古代

兵法之精华，启迪思维，丰富谋略思想。同时要学好新近问世的有关军事谋略的专著，了解其理论体系，掌握研究和运用谋略的方法。此外还应学好与谋略相关的学科，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扩大知识面。要提高谋略能力，还必须熟悉外军，了解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建设的具体情况，掌握主要作战对象及周边国家军队的作战理论、原则、编制装备情况及其发展变化，了解最近几场局部战争中参战国的战略、战术的运用等。在平时日常工作中，要结合参与日常的各项军事计划的拟制、组织指导部队的训练和管理等工作，努力学习和锻炼运筹谋划的能力。在战役、战术训练和演习中，要多设些险局、危局、僵局、残局、败局，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指挥员和机关设谋、造势能力，在错综复杂、险象丛生的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练谋略。同时，还应大兴研究之风，充分发挥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聪明才智，大力培养创新、开拓的精神，善于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经验、理论原则，开动思维机器，独立思考，大胆质疑，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建设性意见，全面促进谋略水平的提高。

刘伯承军事谋略思想初探

黄培义上校　王树华中校

刘伯承元帅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批判地汲取我国古代权谋思想和外国军事思想的精华，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军事谋略思想，博大精深、出神入化。值此刘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认真学习和研究他的军事谋略思想，对于进一步加深理解、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军事思想，提高军官的谋略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想法，我们试就刘伯承军事谋略思想的基本特色作初步探讨。

一、庙算筹谋，以智胜敌

战前计料，运筹谋划，预先制定克敌制胜的谋略，是重要的谋略思想，也是刘帅施计用谋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重智不重力是我国古代兵学的传统。“上兵伐谋”，“上略伐智”。历代兵家都认为多算胜少算，战前预谋是取胜的重要条件。孙武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①辛弃疾也讲：“事不前定，不可以应猝；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②具有古名将风的刘帅，认真汲取我国古代兵学思想的精华，非常重视预谋，其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就大势与局部沉思。“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③战前预谋妙算，必须全局在胸，高瞻远瞩，才有可能投下一着好棋子。刘帅作为一个战略区的指挥员，具有极其敏锐的战略眼光。他在谋划战役时，善于通观全国战场，从全局着眼筹划战役，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1947

年 6 月，他在运筹鲁西南战役时，首先科学地分析了全国战场的形势：敌人重点进攻陕西、山东，中间在黄河设防，形似哑铃，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哑玲的把子就断了，敌人就敞开了胸膛，我军主力就可以直捣大别山，威胁敌根本重地，这就决定了鲁西南战役的地位与作用。在具体筹划这次战役时，又首先把攻克郓城、定陶作为重点，以吸其来援，歼其援者。

第二，辩证分析，用好“五行术”。“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是刘帅的名言。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强调战前对敌情、我情、地形、天候的分析判断，但古代的军事家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凭直觉或顿悟观察、分析战争现象，有时还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因此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资产阶级军事家运用唯心辩证法、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方法观察、分析战争，容易得出绝对的结论。而刘帅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分析研究军事问题。他早年留苏，在列宁故乡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是我党我军最早具有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军事家之一。刘帅在战争年代多次讲过：“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④他分析判断敌情、我情、地形、天候等因素，善于看到敌强中之弱，我弱中之强，以及强弱转化的可能性和条件，为能动地争取战役胜利，做到先为不可胜，尔后待之敌可胜。1946 年 9 月，蒋介石遭我陇海路自卫反击战打击之后，集中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的 14 个整编师、32 个旅，共约 30 万人的兵力，由东西两个方向箝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当时我军只有 5 万人，敌我众寡悬殊。但刘帅认为，敌兵力虽多，但兵分两路，嫡系和杂牌军队之间有矛盾，深入我解放区作战，天时、地利、人和均有利于我，遂定下了诱敌深入，首先歼灭西路之战役决心。对西路之敌各部的情况，刘帅也进行了辩证分析：敌整 3 师虽然战斗力较强，但由于该部与其它杂牌部队素有矛盾，打它时其他部队不会积极增援，所谓强敌也就不强了。遂决定先打整 3 师，得手后再歼整 47 师等部，结果取得了歼敌 4 个旅、打破敌人整个进攻的伟大胜利。

第三，把握战役基本情况的发展规律，科学预见战役进程与结局。刘帅通过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概括升华，把握了战役指导规律性的东西，加之他每次作战都能洞察敌情，所以他在谋划每次战役时，都能把握战役基本情况的发展规律，科学预见战役的进程与结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上党战役，他判断我军攻屯留，长治之敌必援；攻长治，太原之敌必援；定陶战役，他判断敌整3师残部必然向南突围，企图与整47师靠拢，等等。实战结果完全证明了刘帅的英明预见。

二、谋势造势，因机立胜

"势"是军事谋略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谋势造势，因势制敌，是我国古代权谋思想的 精华。"善兵者多度势"，⑤"以弱胜强，必因势也"⑥善于谋势造势的指挥员，能在错综复杂的战场上，使部队形成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而使敌人处于不利态势，作战潜力难以发挥，从而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刘帅以善造险势，因机立胜闻名中外。

（一）选点造势，陷敌于必败之地。军队作战的"势"往往是由若干"点"组成的，有些"点"对形成有利的"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选点是谋势造势的关键环节。刘帅选点，具有伟大军事家的慧眼，他熟谙战场结构，胸怀作战全局，通过对大势与局部的深思，选点造势，陷敌于死地。在淮海战役中，他通观战场全局，洞察敌之要害，认为蒋军重兵守徐州，补给线只一津浦路，一旦被我截断，就会陷入死局，因而及时向中央军委并陈（毅）、邓（小平）提出攻占宿县、斩断敌人中枢的建议，军委及陈邓采纳了刘帅的建议，对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在1949年12月进行的成都战役中，刘帅通观西南战局，敏锐地认识到，歼灭胡宗南集团的关键是迅速抢占乐山、浦江、邛崃诸

点，截断敌人最后一条退往康滇的道路。待我军占领以上诸要点后，即对胡宗南集团形成包围之势，敌数十万大军即行瓦解。

（二）料敌察机，适时进行内外势转换。从军事谋略学的角度看，敌我双方所形成的战场态势有内外势之分。宋代梅尧臣注《孙子》说："定计于内，为势于外，以助成胜"。处于内势的军队容易陷入被动，只有适时由内势转变为外势，才有可能赢得战役战斗的胜利。刘帅善于进行内势转换，这是他屡破强敌，成为百胜名将的重要原因。在很多战役中，由于敌众我寡，开始处于内势被动地位，通过周密运筹，调动敌人完成内外势的转换，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转变内外势的方法：一是通过自己的小分散，吸取调动敌人大分散，形成敌我内外势交措的局面，然后以一部兵力箝制、隔绝敌人，集中大部兵力转到敌人的翼侧、后方，由内势变外势，对敌形成包围之势。在定陶战役、鲁西南战役中，刘帅就是这样进行内外势转换的。二是把虚实变化同内外势转换巧妙结合。以一部兵力伪装成主力的模样形成内势，吸引箝制敌人主力，而以大部兵力隐蔽机动至外势敌人之外，寻歼他部弱点。在巨金鱼战役中，刘帅就是这样进行内外势转换的。

（三）善用地形之利造险势。地形，用兵之助，是谋势造势的基础。军队作战，处在高势位则能使打击力增值。唐代杜牧注《孙子》说："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不可止遏合，在山不在石也。"⑦刘帅深察兵势，精通军事地理地形学，特别善于利用险峻地形蓄势，使我军处在高势位，尤如千仞之水，具有势不可挡的强大冲击力，而使敌人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抗日战争中，刘帅筹划的神头岭、七亘村等伏击战，都是利用地形造险势的著名战例。《孙子》产生于冷兵器时代，蓄势强调居高临下。刘帅创造性发展了《孙子》的兵势思想，认为利用地形造势的要旨是"便于我们兵力、兵器的展开行动，同时能限制敌人兵力兵器的展开行动，"⑧有利于造势的地形不单是高山峡谷，有时沼泽地、多砂地地带也利于造势。实战中，刘帅善于利用敌人求战心切、孤军冒进的

弱点，诱敌进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复杂地形，形成有利态势，为歼灭敌人奠定基础。在邯郸战役中，刘帅令第1纵队一部在漳河南北地区扭击迟滞敌人，示弱骄敌，把敌主力第30军、第40军诱至漳河以北、釜阳河套的多砂地区，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善施诡道，出敌不意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古今中外凡明智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以诈术奇计制胜敌人，反对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刘帅精通权谋兵法，非常重视运用诡道欺骗调动敌人。他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将帅要善于以各种手段隐匿自己的意图，迷惑引诱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歼灭敌人创造条件。”⑨因此，“政治主张要公开要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

(一)顺详敌意，巧用虚实。虚实是权谋兵法理论的重要范畴。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⑩他认为只要懂得虚实就能包打胜仗。刘帅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对虚实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知兵势，解奇正，讲的是一般制胜条件，而要正确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导军队的作战行动，还必须把握虚实这个关节。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为将者的计谋盖出于此。”⑪他在作战指导中，虚实变化，出奇无穷，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刘帅善于顺详敌意，他每次指导作战，对敌人的作战意图，兵力的强弱，指挥官的素质、性格，各部敌军之间的关系等，都了如指掌，因此能够有针对性地运用诈术诡道。对兵力强大、急于寻我主力决战之敌，通常实而示之虚，强而示之弱，引诱敌人孤军冒进，聚而歼之。定陶战役中诱歼敌整3师即用此法。对兵力较弱，打滑头仗，惟求保存实力的敌人，则虚而示之实，弱而示

之强，使敌人狐疑不定，贻误战机。有时则采取声东击西的谋略，以一部兵力虚而示之实，迷惑、箝制敌主力，以主力实而示之虚，突然袭歼敌一部。在巨金鱼战役中，刘帅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2纵结合地方武装，伪装我主力模样，在解放区腹地吸引、箝制敌主力9个旅，野战军主力则隐蔽行踪，向东南挺进100余公里，突然向巨野、金乡、鱼台之敌发起进攻，歼敌1．6万人，收复9座县城。

（二）“逆法”用法，反常用兵。自古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般的指挥员大多遵循常法用兵，只有深谙兵法且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军事家，才敢于“逆法”用法。所谓“逆法”，实质是活用兵法。古代军事家说：“善用兵者，诡行反施，逆法诈取”，⑫因敌用变，因人异施，因地作势，因情措形。刘帅正是善于活用兵法理论的伟大军事家。他说：“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⑬在许多战役战斗中都大胆果断地采用一种似乎违反常规、常法的诡诈道术而制胜。例如，“战胜不复”，是自古以来历代兵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然而刘帅却逆而用兵。1937年10月，日军沿正太路西犯，刘帅指挥部队在山西省平定县东七亘村一带，三日之内，在同一地点，对同一敌人两次设伏，出乎日军所料而连战皆捷。再如，襄樊战役中攻打襄樊时，刘帅脱出历来兵家必先争夺南山的惯例，将主攻方向选在强中有弱、似险非险的城西通道上，从而达到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之效。

四、伐谋伐交并用，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不通过交战而使敌人屈服，是重要的军事谋略思想。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⑭此即孙武全胜的谋略思想，是在战争指导

上追求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战争观。刘帅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全胜思想的精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创造。

（一）利用矛盾，打拉结合，分化瓦解敌人。亲而离之，是《孙子》十三诡道之一。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达到兵不钝而利可全的目的，是重要的军事谋略思想。刘帅在指导与筹划战役时，非常重视利用敌人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打拉结合，瓦解敌人。邯郸战役中，刘帅知道高树勋的新8军与蒋介石素有矛盾，对蒋为削弱异己驱使其作为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遂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以促成其起义。一方面调动重兵合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促其动摇，另一方面又开展积极的政治争取。在发起总攻的同一天，派李达参谋长通过火线与高树勋谈判，终于促成新8军起义，对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国内革命战争刚爆发不久，敌人兵力强大，叫嚣要在3～6个月消灭我军，能够争取新8军起义，是难能可贵的。

（二）重兵围困，陷敌于绝境，慑服敌人。孙子提出的“十围五攻”，同样贯彻全胜的思想，以重兵围困敌人，首要的目的是迫使敌人屈服，其次才是战而胜之。刘帅深谙《孙子》和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指挥正义之师，常采取重兵围困，陷敌于绝境，慑服敌人的谋略。1949年12月上旬我军发起成都战役时，敌人尚有第5、第7、第16、第18四个兵团和第15、第20兵团残部。为防止敌人逃跑，争取敌人投诚或起义，刘帅首先指挥部队切断敌人退路，以大军围困敌人，陷敌于绝境，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慑服敌人，迫使敌3个兵团和2个兵团残部及若干军、师先后起义或投诚，减少了流血牺牲与战争破坏。

刘伯承的军事谋略思想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本文只是初步探讨，还有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

注　释

①见《孙子·计篇》。

②见《稼轩集抄存·议练民兵守淮疏》。

③《潴言·二迁都建藩议》。

④《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47页。

⑤《兵法百合·智篇·势》。

⑥《卫公兵法·将务兵谋》。

⑦《十一家注孙子》第119页。

⑧《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53页。

⑨转引自《军事历史》1987年第1期第17页。

⑩《李卫公问对·卷中》。

⑪转引自《军事历史》1987年第1期第17页。

⑫《兵经》下卷（衍部·妥）。

⑬转引自《刘伯承指挥艺术》第201页。

⑭《孙子兵法·谋攻》。

趋利避害　机动歼敌

刘备耕

军事家刘伯承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所赋予的任务，功勋卓著。同时，他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执行了毛泽东军事路线，对丰富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因此，学习他的军事学术是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门不可或缺的课程。

刘伯承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亲自指挥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战斗、战役，在我军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漫长征途上，发挥并发展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指挥艺术。他的军事指挥在当时深受广大指战员所爱戴、推崇和信赖，我们今天纪念他的百岁寿诞，要继承并发扬他的制胜之道，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一)

在八路军第129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前一周，即1937年9月22日，刘伯承师长对战略作了明确的概括："持久的艰苦的民族革命的大战"①，这一个持久战略的认识和提出，既是对当前民族敌人——日本侵略者的研究剖析的结论，又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殷鉴。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错误路线无视敌强我弱这一前提，反对战略上的持久和战役上的速决，要求红军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所谓正规战，给革命战争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新情况下，刘伯承率领这一支近万人的部队，充分运用土地革命战争的成功经验，发挥机动歼敌的威力，完全避

免重复“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的历史错误。不仅如此，在对日作战中，刘伯承通过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还使机动战术有了新的发展。

“游击战争中的战斗手段，都是袭击”。第129师之第769团夜袭山西代县阳明堡飞机场，足以体现刘伯承所倡导的要把握住主动性、秘密性、迅速性、坚决性和干脆性袭击敌人的战术。善于捕捉战机，是良好的战斗作风。刘师长不断地以模范的战例教育指挥员要养成战斗的组织性、主动性、泼辣性与顽强性，其效果十分明显。在群众性游击战争中，更要抓住敌人分散的弱点，给以歼灭的打击，这样才能制止敌人狂妄的分散。刘师长表扬冀南陶馆的游击部队，于1小时内消灭了日伪军100余人，称之谓：“足够机断行事的本领。”他认为：在战斗机动性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尤其是指挥员，在敌我利害时机变换很大，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示的情况下，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刘伯承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指挥上“领导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②

第129师进入抗战，实施“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频繁“扫荡”规模越来越大，1942年夏季达到了顶点。尽管其手段至为残酷，妄图摧毁抗战军民的生存条件。我军拿反围攻对付围攻，造成敌人腹背受击，内线坚持游击作战的同时有计划地从外线打击敌人，攻打其薄弱环节，在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使敌人的计划无法实现。刘师长利用敌人深入我太行腹心地区，使得敌占区空虚的弱点格外突出，其兵少防宽的致命伤成了攻击的目标。新编第1旅奇袭长治（敌36师团司令机关所在地）敌飞机场，烧毁飞机3架、汽车14辆、油库2座。第385旅另一部利用敌后方空虚，一度攻入五阳、黄碾等敌据点，其第769团的1个连（缺1个排），在辽县苏亭把归巢敌军打得狼狈不堪。正规军、军区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游击集团发挥了巨大威力。针

对敌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施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以扩大敌占区的诡计，刘伯承在强化游击集团的同时，果断地组织起一批新型的短小精干的（全队共50人，由队长、政委率领的三个小队）武装工作队，活跃在敌人腹心地区（通称格子网），进行锄奸、宣传、征粮、瓦解敌伪军，摧毁或利用伪组织两面政策等活动。这种机动性极强的武工队，为外线作战增加了特殊的生力军，在配合内线反“扫荡”作战中给敌人造成了难以捉模的后顾之忧。刘伯承为了建立武工队，特意将抗大六分校提前毕业，全体学员分别编成太行各个分区的武工队，同时抽出班、排干部和优秀战士混合编成，由营级干部领导这个小队伍。为了使各个小队伍起大作用，刘师长亲自讲授武工队的任务、活动方式，细致地教授了“敌进我进”的要领。武工队的成就，为机动战术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共七次代表大会上，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谈到路线问题时说：“华北是执行了中共的路线，十大政策也都执行了，而且有了创造。象武工队就是一个创造，这是好的，有功绩的。”③

敌人集结了2．5万人兵力，运用了11年侵华战争以来的作战经验，对我施行“铁壁合围”、“反转电击”、“抉剔扫荡”等等，但同样又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刘伯承采用了腹心区内线的游击集团拖住敌人，外线的主力军频频攻击敌人弱点，连连获胜，内外线有机地结合，达到了“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敌对我是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是大‘换防’，跳出外线去作战”④的思想。这被刘伯承运用自如，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取得新的胜利。

伏击，是刘伯承常用的一种战术。这种对敌人是不预期的遭遇战，而对我则是预期的遭遇战，敌被动，我主动。第129师抗战以来打了好多个著名战斗，伏击战占了可观的数目。1937年11月，第129师在进入山西昔阳地区，开始创立太行革命根据地时，先后在黄崖底、广阳、户封等地连续三次胜利地伏击日军，刘师

长把这三次战斗称作“重叠的待伏”。由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的涉县响堂铺伏击战，经验精当，刘师长加以总结，成为全师伏击战术的教材，对于开展伏击战起了示范作用。1939年2月10日，在冀南威县香城固诱伏战斗取得成功，由于摸透了敌人轻视骄纵的心理，我故意示弱以引诱敌人进入预设战场，施以机动的围攻，予以全部歼灭。伏击战术，成为第129师常用的一种战术。在1942年太行春季反“扫荡”作战中，我以30天的奋战打破了敌人原定两个月的“扫荡”计划，全太行军区约计打了40余次伏击战，成绩也最大。刘伯承总结为“伏击可以打大敌，也可以打小敌，损害最小，收效较大。”⑤到了太行夏季反“扫荡”总结时，刘伯承算了一笔帐，对伏击战术的实现做了令人信服的比较：“根据一个基干部队的报告，敌我伤亡对比，在伏击战斗中为六点六比一（即毙伤敌寇六点六人，我军伤亡一人）；在袭击战斗中为二点九四比一；在麻雀战斗中，为五十三比一。”⑥依照刘伯承的说法，麻雀战也是伏击战的最小单位，三五成群或以班排为单位利用良好地形埋伏射杀敌军，正规军、地方部队、甚至民兵都可以经常使用。伏击战术之所以被广泛应用，因为这是寻找并创造敌人弱点而予以痛击的好方法。在吸打敌援中，伏击战术的作用更是可观。伏击战术等于遭遇形式的进攻战术，是艺术的机动，然而又是避我之所短、扬我之长的战术，因为我军在伏击战中“特别是预先从容展开了兵力兵器，弥补了缺乏战术素养的指挥员的弱点，确是一件很有利的事。”⑦

抗战全过程的交通斗争，是避敌之长，攻敌之短，护我之短，趋利避害，趋胜避败的机动战术。第129师部队结合民众，从1938年5月起，为了策应正面战场徐州与武汉会战，曾经组织对平汉路、道清路与津浦路的大破击10余次，截断了敌人在徐州会战中的接济。1940年，第129师破坏铁路、公路达1.2万余里之长。从此交通斗争即处于此修彼破、彼修此破的紧张状态。这一年里，进行了破击白晋铁路北段的战役、正太铁路破击战役，第129师部

队先后破坏了白晋铁路50公里、正太铁路的三分之二，并破坏了桥梁、碉堡、车辆和仓库等，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交通有无保障，是胜败的枢纽。"⑧交通破击战是内容丰富、战术多样的作战。起初以袭击开始，在地方部队掩护下，成千上万的民兵和民工展开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破路拆堡，运走资材。战斗力与劳动力相结合的战斗场面是非常壮观的，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了。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断了，锁就没有用处了。这两次交通破击战役的胜利，正规军部队打了好几个漂亮仗，有急袭敌重要据点、攻克碉堡、歼灭援敌以及坚守阵地等，都取得了可观的战果。甚至在次作战方面，也都在这两次交通破击战役中，乘敌空虚，主动地大肆破路拆堡，消灭了敌人，改善了本地区的状况，刘伯承特别表扬了这种眼快手快，抓到敌人弱点给以痛击的战术。关于交通战，刘伯承认为破与击两者不可分，必须密切结合。具体地说：消灭敌人的真正手段，要靠我们利用敌人处于这种窘状（指交通受破坏）的时间，进行机动的残酷的战斗。也只有这样战斗消灭了敌人，才能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但如果单纯战斗，而不实施破路拆堡，空舍清野，那简直是愚蠢。

经过屡次反复较量，敌人加强了交通战以巩固其"华北兵站基地"，沿铁路、公路筑起封锁沟、护路沟，碉堡林立，而且比上一年更为坚固。针对这种变化，1941年8月31～9月3日，第129师发起的邢（台）沙（河）永（年）战役中，刘伯承抓住并利用了敌人的弱点，对作战部署做了精细筹划，再进行一次大规模"机动的残酷的战斗。"这次攻势出击的打击目标是伪军高德林部，这是敌人的弱点。高部所处的位置有碍太行与冀南的联系，并拥有造枪工厂和煤窑等设备，这也正好是太行黄烟洞兵工厂所需要的。为此，兵力配备上，第129师大部分都动员了，太行、冀南、太岳三个军区的部队都有任务，配合邢沙永沿线的作战，参战民众不下10万，造成从东西侧夹击平汉铁路的态势。战前准备充分，

部队有针对性地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同时瓦解高部的政治攻势颇为深入。在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冲击下，战果显著，毙伤俘日伪军1300余人（其中有伪军反正300余人）。尽管敌人工事比百团大战时加强两倍，我攻克县城2座、据点8处、碉堡53座，破坏铁路10余里、护路沟填了500里，封锁沟填了100余里，造枪厂主要设备搬进太行山，完成了打断敌人的交通线、打通我们交通的预期目的。本战役配合了冀察晋边区反“扫荡”作战，而且为冀南军区秋季破击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山区与平原相互策应的交通破击战，发展了机动歼敌战术。刘伯承指出：“交通斗争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我们对于敌人的铁路、公路及其护路沟，必须破坏一次又一次；对于敌人挖断我们在山地的小路和平原的沟道，必须修复一次又一次。”⑨直到日军投降前夕，交通斗争从未间断，而且破击交通线与经济斗争的结合益加紧密。例如1945年6月底太行部队发起的安阳战役，战前就有部署，在军民协力下，把敌人纺织厂设备拆运到太行山区，为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其意义堪与把伪军高德林的造枪厂设备搬运进山相比美。我们的机动战越打越精。

（二）

机动歼敌，实现了抗战阶段基本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创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全区西起同蒲路与晋绥解放区相邻，东抵津浦路，与华东解放区相邻；北起正太路、德石路，与晋察冀解放区相依；南至黄河，黄河以南有中原解放区。全区已控制了80多座城市，有人口2400万，处于四战之地，已发展成近30万人的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民兵约40万人，这是从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的持久艰苦作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力量。

毛主席还在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谈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五个师共18000人，在日伪军接应下，侵入上党区，先后侵占我襄

垣、潞城等县城。情况严重！刘邓首长首先集中冀南、太行、太岳三个军区的主力，总共28000人，组成三个纵队。刘伯承深知本区是四个解放区的大门，正像是球场上的守门员一样，对国民党军进攻的第一球绝不可失守，可是又不能采取正面抵御的所谓牛抵角的战术。他知道我军编制不充实，多数团不到千人，装备差，全军山炮只有6门，仅半数的团才有迫击炮2至4门、重机枪3至4挺，弹药奇缺。385旅14团每个战士的子弹不到10发。相反，阎锡山部的装备大大优于我军，并且经过长期训练，技术上也强，还有坚固工事依托，长于防御，但短于近战夜战。假若不把这股敌人歼灭，我军还得进入山区，被阎锡山部掌握铁路、公路，重演日军囚笼政策的祸害。当然，刘伯承也察觉到平汉路新乡地区正在聚集有国民党3个军兵力，又要从东向我区侵犯。上党一役不仅必须打胜，而且还得较快地取胜，使敌人无法从东西两边对我形成夹击，即使与阎部打成平手，也会受到两面夹攻的苦痛。

新情况，是以运动战为主，机动歼灭的原则，仍要坚持，但须要大大地发展。刘伯承的部署，第一阶段，从9月1日至19日，把长治周围的5座县城（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攻克。长治为我军所包围，28日，阎锡山以8个师2万余人，自太原沿白晋线进犯，企图解长治之围。刘伯承对此极为敏感，立即调整部署，将冀南纵队北进打援，留下一部佯攻长治。于是进入第二阶段，采取围城打援，重点是打援。10月2日，阎部援兵被我包围于屯留之间的老爷岭、磨盘垴地区。在野战中，敌军的弱点暴露无遗，不善近战夜战；我军的长处勇猛扑搏，白刃格斗的优点得以充分发挥。刘伯承把三个纵队的兵力集中使用在重点上，成果显著。10月5日，老爷岭主峰和磨盘垴主峰被我左翼队（太岳纵队）和右翼队（太行纵队）攻克，向北突围的敌军，进入了刘伯承为他们敞开的口子，遭到我迂回部队的拦腰截击、跟踪追击和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我后方人员及民兵群众也大显身手，

奋起捕捉溃败之敌。至6日，除敌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副总司令彭毓斌毙命，数十名高级军官就擒。长治敌人得知待援无望，于8日突围，遭到围城部队的跟踪追击和控制了沁河太岳纵队的兜击以及沿途人民武装的截击。到12日，逃敌在沁河以东的将军岭及陵川地区被歼灭。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敌军损失13个师，我以35000人的兵力歼灭了敌人35000人，缴获山炮24门，还有其他多种武器弹药。这是自卫战争的第一仗，充分地发挥了机动作战的威力。还在上党战役之前，滕代远副司令员就去了冀鲁豫军区筹划迎战来犯敌军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在本战役开始时，已接见了国民党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来使，鼓励高反对蒋介石内战的爱国精神，为关键时刻做好立功准备。

过了上党战役这一险关，刘邓首长指挥部队东向。从10月21日平汉战役开始，到11月2日胜利结束，敌人妄图侵占邯郸、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全部破产，共毙伤敌3000余，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以下1.7万人，缴获反坦克炮、火箭筒等美式武器，使我军装备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充实与提高。

平汉战役，敌我双方兵力都是6万人，可是我军有根据地10几万民兵群众参战与担任后勤，这是很大的优势，同时在重要关头，刘伯承亲自到达马头镇欢迎高树勋起义，削弱了敌军实力。本战役的特点，刘伯承概括为："平汉战役是抓紧了'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敌人的企图是打通平汉线，走西边是山地，不便走，走东边是沙漠，困难，非沿铁道北进不可。敌人不仅在军事上不利，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高树勋的起义，孤军深入，不了解我军情况，轻视我们；而我则以重点对付敌人的弱点。"⑩

刘伯承自从担任第129师师长以来，坚持每战必有总结，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平汉战役战术手记》中，刘伯承概括为："总结起来说，我们指导这一战役的一系列思想就是：毫不急躁地寻求与创造敌人弱点（例如：开始故示以弱，以纵其骄，诱其孤

军躁进；在合围中予以有重点的打击，以割裂其布署体系，争取其和平民主分子，以分化其力量。）以及避开敌人长处（敌长于固守，我则压迫与引诱其突围，以使其脱离筑城地带），发扬我之长处（我利于夜战、近战、野战），掩盖我之弱点（无现代技术，火力破坏力弱，不利于火战与攻坚）；然后兢兢业业抓紧敌人弱点，全民全力以赴。在战斗动作上，力求出敌不意，施行奇袭；在兵力使用上，则于估计情况变化时，适时抽集后备力量，以求自己有用之不竭的兵力。”⑪

（三）

根据这个总结的战术思想，刘伯承将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指导原则写成对部队的战术指示，为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做好切实的准备。刘伯承回答了上党、平汉两战役之所以能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是“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假若和敌人牛抵角，最多也不过是把敌人打退而已。”⑫这个总结对于解放战争中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后改编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有指导意义，并且在运用上又有新的发展。

“战术的全部结晶是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⑬1946年8月10日开始的100天内，刘伯承总结了晋冀鲁豫战场上消灭敌军11个旅6万多人，认为意义重大。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我再消灭到一定程度，敌将既无力进攻，又无力防守，终会把新占城镇全部吐出来。

由于我战术运用得当，机动灵活，连续取得了胜利。第一次是陇海战役，敌是步步为营，我消灭了其两个旅。战法是避开敌人前锋，采取直捣其纵深的“猛虎掏心”战术，集中全力一下子奇袭长约150公里上的铁路线。第二次是定（陶）曹（县）之战，敌改成并进长追，又送4个旅。这是在内线诱歼进犯之敌，是成功的运动战，速决机动的歼灭战。战法为攻其一点，再及其余。刘

伯承在指挥上正确地确定攻击对象，扬我之长，隐我之短，乘敌之弱，避敌之优，军民同命，一致对敌，粉碎了敌军歼灭我军的计划。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蒋军必败》中称此战役是三个大胜利之一，“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第三次是龙固集之战，敌军死猪不怕开水烫，又是并进长追，又被歼1个半旅。第四次是鄄城之战，敌再被我歼灭1个旅。至此，我军已由内线机动歼敌转入了主动出击作战。

在新形势中，进行了第五次滑县之战，在敌人后方歼灭了国民党军两个旅。这次作战，按照刘伯承的战法，撇开敌人一切前锋据点和坚固筑城，透入敌人纵深，迅速寻找其指挥中心（打头），不到48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使速决的机动歼敌，猛虎掏心战术再显神威。第六次是巨（野）金（乡）鱼（台）战役，我军消灭了敌正规军3个半旅，连同地方团队共2.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打通平汉铁路的计划。当正面难寻敌战机时，刘伯承果敢地以主力向敌军后方实施猛烈突击，连续行军20余天，辗转300余公里，在宽大机动中大量地歼灭敌人，掌握了主动权。敌人后方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得调回主力回援。在大踏步进退的运动中，我军机动自如，做到：“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⑭刘伯承的这一概括，既是总结，又是机动歼敌的要领。第七次是豫皖边战役，把国民党主力王敬久集团抑留在冀鲁豫战场，自1947年1月24日到2月11日，我主力在陇海路南北两侧创造了机动战场，攻克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控制并破坏铁路70华里，共歼灭敌军1.6万余人，取得了外线机动作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华东我军的莱芜战役。第八次是豫北反攻，策应陕北、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3月23日至5月25日，我共歼敌4万余人，解放了9座县城和广大地区，控制了平汉铁路150余公里，破坏了敌人联系东西两战场枢纽地带的防御体系，为内线继续反攻打好基础，更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有利条件。此战役后期的第三阶段，刘伯承针对敌军行动谨慎，回避野战，决心

以主力逼近安阳，围攻汤阴城，吸敌来援。果然，4月13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严令王仲廉率4个半旅分三路北援汤阴，刘司令员抓住战机，指挥部队进行运动防御，诱敌前进。15日，将敌诱至宜沟、屯子山地区。16日夜，我主力向敌两面夹击，将敌割裂。经两昼夜激战，歼敌第2快速纵队全部、第41、第66师各一部，俘快速纵队司令李守正以下9000余人，缴获其全部坦克和汽车，并收复了3座县城。到了4月下旬，扫清汤阴外围据点，5月1日，刘伯承下令发起总攻，榴弹炮进行轰击，并进行坑道作业，步兵突入城内与敌激战。5月2日上午，全歼守敌近万人，俘国民党暂编第3纵队司令孙殿英以下7000人，为豫北人民根除了长达10年的大祸害。经过10个月解放战争，我每个纵队已拥有10至20门大炮，火力有了较大提高，这些重武器取自于敌而又用之于敌。10个月的连续胜利，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军须准备南渡黄河转入战略反攻。10个月的机动作战经验，对于完成新的任务十分宝贵。

注　释

①《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页。

②《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见《刘伯承回忆录》(3) 第65页。

③《陆定一在中共七大会上的发言》，见《中共党史资料》第83页。

④《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情况》，见《刘伯承回忆录》(3) 第61～62页。

⑤⑥⑦《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第322、第150页。

⑧《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271页。

⑨⑩《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第446页。

⑪《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第309页。

⑫⑬⑭《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62、第447、第482页。

机动灵活不拘一格的用兵之术
——学习鲁西南战役札记

杨国传　上校

鲁西南战役，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6月30日至7月28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战战役。是役，遵照党中央关于挺进中原实行战略反攻的重大决策，我军以突然迅猛的行动，一举突破敌黄河防线，在鲁西南地区辗转机动，取得了歼敌9个半旅及4个师部共5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切断了敌人对我山东和陕北实行重点进攻的两集团间的战略联系，迫使敌人从山东、陕北等地调动了11个师28个半旅驰援，从而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并为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揭开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40多年后的今天，值此刘帅诞辰100周年之际，为缅怀刘帅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伟大革命实践，本文仅以鲁西南战役为例谈点学习的感受，以便从中领略刘帅机动灵活、不拘一格的高超用兵之术。

一、在歼击目标的选择上，辩证处理避强击弱与弃弱扑强的关系，把指挥的重心始终放在歼灭弱敌和削弱强敌上

“拣弱的打”，是我军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亦是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必要条件和基本要求。鲁西南战役中，刘帅辩证地对待敌之总体与局部的强弱关系，始终把指挥的重心放在歼灭弱敌和削弱强敌上，能动地夺取战役的胜利。

（一）两路之敌，一强一弱，刘帅的用兵之术是避开强敌打其

虚弱，通过对弱敌的歼灭进而削弱强敌，最终达成各个歼灭敌人的目的

1947 年 6 月 30 日夜，我军以突然勇猛的行动，一举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揭开了鲁西南战役的序幕。我军的行动，对敌华东战场几十万军队的翼侧及后方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慌忙调兵遣将，企图堵住缺口，挽救危局。他一面命令其原河防第一线的整编第 55 师之 74、29 旅退守郓城，整编第 68 师之 143 旅和整编第 55 师之 181 旅退守荷泽，同时调纵深整编第 63 师之 153 旅进驻定陶，加上盘踞曹县之土顽，组成西集团，以增强西路之敌的力量。一面从豫、皖、苏等地抽调整编第 32、66、58 师，加上原位于嘉祥的整编第 70 师，置于巨野至金乡一线，组成东路和东集团。这样一来，敌在我前进道路上共集结了 6 个多整编师的兵力。敌人的企图是以其西路之敌对郓城、荷泽、定陶三城的坚守，吸我屯兵城下，再以其主力东集团的兵力拊击我之侧背，迫我背水作战或退回黄河北岸，恢复其原河防态势。

面对我军南渡黄河后能否首先站住脚，继之迅速南进这一严峻的形势，为达成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我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要前进就必须拔掉敌人安在我前进道路上的钉子，扫除南进道路上的障碍。当时，敌东、西两路，西弱（2 个多整编师）东强（4 个整编师），东路之敌处于北进之中，西路之敌退居守势，且直接挡住我军南进去路。如我采取避强击弱之策，集中兵力首先吃掉西路弱敌，再转而对付东路之敌，则不仅能够去掉敌之主力屏障，破坏敌人拊我侧背、合击我军的全局部署，而且对东路强敌亦起到重大的削弱作用。刘帅精心运筹，遂定下了攻其一点（郓城之敌）、吸敌来援（吸引东路之敌北上增援）、啃其一边（消灭西路定陶、曹县之敌）、各个击破（分别围歼东路之敌）的战役总决心，并将战役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击弱削强，即避开东路强敌，集中兵力择歼西路各敌，破坏敌人全局部署。第二阶段为集结全力各个歼灭东路之敌，即以突然迅猛的行动割裂包围

东路敌人，尔后由弱到强各个歼灭，一举达成战役目的。

面对西路之敌分守郓城、荷泽、定陶、曹县四个孤城，其中以荷泽之敌兵力最多，定陶、曹县之敌位置居后，郓城之敌孤立突出。我在战役第一阶段若首歼郓城之敌不仅可以就近顺势用兵，扫清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而且还可以吸引东路之敌的来援，使之不及西顾，为我割裂东西两敌的联系和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条件。就荷泽、定陶、曹县三敌而言，荷泽之敌不仅兵力最强，而且设防坚固，进攻该敌则要耗费较多时日。如撇开该敌，以强有力的一部从郓城、荷泽间楔入敌之纵深，直取定陶、曹县，则可打开战场，利于尔后战局的发展。基于以上的认识和分析，刘帅决心置荷泽之敌于不顾，首克郓城，打开缺口，继之直插敌之纵深，直取定陶、曹县。于是我军于7月2日围郓城，8日攻占该城，首歼敌整编第55师2个旅。7月6日我军解放曹县。10日攻克定陶，歼敌153旅。在此期间，由王敬久指挥的东路之敌被我吸引北上，陈兵于巨野、金乡之间，不敢贸然前进。至此，西路郓城、定陶、曹县之敌被我各个歼灭于不意之中，荷泽之敌在我严密监视之下不敢出动，而东路之敌一时难以增援，且失去翼侧屏护而陷于孤军深入之境。

（二）两股敌人，各有强弱，刘帅的用兵之术是毅然放弃形弱实强之敌，以突然迅猛的行动，对形强实弱之敌构成包围割裂部署，逐一加以歼灭

西路之敌除荷泽之敌固守一城外，余均被我歼灭。东路之敌于增援途中，由于依赖公路运输，不得不从北起巨野南到金乡的公路一线摆开了一个长蛇之阵：即70师在最北面的六营集，32师居中位于独山集，66师主力南驻羊山集，万福河南岸的金乡由58师及66师之199旅驻守，各师之间相距10余公里左右。王敬久到达金乡后，一时捉摸不准我军下一步的行动意图是东越运河策应华野，还是南下截断陇海路直逼徐州，故不敢轻举妄动，只命令各师派出部分兵力侦察我之行踪。

按照常规，我军在歼灭郓城、定陶、曹县之敌后，荷泽之敌已成孤立之势，我必趁势聚歼该敌，得手后再转用兵力，对付东路之敌。此时，刘帅对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审慎周密的研究，认为荷泽之敌虽为孤军之敌，但兵力雄厚，城防坚固，实为形弱实强，进攻该敌不仅不易速决，而且付出代价要大，对战局发展不利。而且顺势聚歼荷泽之敌虽为正常用兵之术，但难以达成对东路之敌的突然性。若舍西就东，暂弃荷泽之敌这块作为不大但又难啃的骨头，不仅便于我集中主力对付东路之敌，而且能够造成东路之敌的错觉，各个分割包围于疏忽与不意之中。东路之敌，虽有 4 个师之众，但貌似强大，形强实弱，有着许多的弱点：一是王敬久虽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少壮派中的佼佼者，但他素闻刘、邓大名，对我大军南下心怀恐惧，故在行动上畏首畏尾，犹豫不前，表面看是稳扎稳打，实质上是怕丢兵折将；二是各路敌人兵多势众，似乎不可一世，但均系远道而来、人地生疏，相互之间亦素不熟悉，难以配合作战；三是各师沿公路分散集团配置，摆成一字长蛇之阵，不仅兵力分散，易为我分割包围和各个击破，而且除羊山集外均为荒野小镇，地小兵多，难以施展，且又无工事屏障，不利防守。据此，我军在歼灭郓城、定陶、曹县之敌后毅然放弃荷泽之敌，以舍近求远、弃弱扑强的突然行动，分兵四路，星夜远距离奔袭，直指东路之敌，迅即将万福河以北的敌 3 个整编师分割包围。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使得敌人目瞪口呆，完全失去了主动，从而处于慌乱招架的境地。

对于东路之敌，我军在割断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各敌间的联系，以及阻止金乡之敌北上和万福河以北之敌向南收缩的同时，将位于独山集的敌整编第 32 师作为首歼目标。其基本的考虑是：其一首歼该敌，不仅可以更好地孤立和削弱六营集、羊山集之敌，而且亦为我尔后各个歼灭该两敌创造条件。其二当我对东路之敌形成割裂包围之势后，32 师奉命弃城与六营集之敌会合，从而为我歼其北上途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首歼独山集之敌后，我

军又先后各个歼灭了六营集和羊山集之敌。

鲁西南战役，从战役第一阶段的避强击弱到第二阶段的弃弱扑强，都始终贯穿了以下的基本指导：首先是拣弱的打，先弱后强，各个歼灭。如在战役全局上，是避开东路强敌打西路；在对西路之敌的攻歼上，是避开荷泽强敌打其他；在对东路强敌达成割裂包围态势后，首先将位居中央和处于运动中的32师作为首歼对象。其次是着眼于歼灭弱敌，削弱强敌。如通过歼灭郓城、定陶、曹县之敌，进而削弱和孤立荷泽之敌；通过对西路之敌的歼灭，削弱东路之敌主力；通过歼灭32师，削弱和孤立其70师和66师等。再次是弃弱扑强，反常用兵。在荷泽之敌陷于孤立，但城防坚固，兵力又较强大的情况下，我军毅然置该敌于不顾，突然转兵东向，完全出乎敌之意料。但这里的弃弱，是弃形弱实强之敌；扑强，是扑形强实弱之敌。因而就其总体和实质而言，仍然是贯彻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通过对弱敌的歼灭，达到消耗、削弱强敌，最终为我各个歼灭的目的。这就是军事上的弱强辩证观，也正是刘帅用兵的高超和高明之处及一贯思想。

二、在作战方法的运用上，灵活选定网开一面与强攻硬取的战法，把指挥的重心始终放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上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之一。鲁西南战役第一阶段，我在以一个纵队攻取郓城的同时，以2个纵队从敌东西两集团之间径直南下，前进百余里，直取定陶和曹县，歼敌第153旅于立足未稳，并清除盘踞于曹县的千余土顽，以优势的兵力取得了各个歼灭敌人的重大胜利。战役第二阶段，我军以4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在对东路之敌3个师形成分割包围之后，刘帅作出了先围困羊山集敌66师，待各个歼灭敌32和70师后再攻歼羊山集之敌的部署。在具体的兵力使用上，对独山集我

以5个旅打敌2个旅，对六营集我以7个旅打敌3个半旅，在歼灭羊山集敌之2个旅时，我先使用6个旅，继则集中全力，确保有把握地歼灭了敌人。这样，整个战役，我在总兵力只有4个纵队15个旅（内含冀鲁豫军区2个独立旅）的情况下，灵活运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取得了歼敌9个半旅的重大胜利。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既是对歼灭战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歼灭战的基本途径。如何实现各个歼敌呢？刘帅从战场和战局的实际出发，十分重视对歼灭战方法的运用。如对郓城之敌的进攻，我采取了先行兜击包围，尔后选择敌防御薄弱和地形条件又对我有利的西门作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的战法。总攻发起后，仅一夜激战，即将守敌全部歼灭。对定陶之敌，我则抓住敌人立足未稳，尚未与荷泽守敌靠拢之机，以突然的奔袭行动歼其于猝不及防之际。对独山集之敌，我则利用该敌北上与70师会合之际，因势利导，顺势歼其一部于运动之中。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六营集和羊山集两敌在作战方法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灵活与巧妙运用。

六营集——网开一面，聚歼突围之敌于运动之中

六营集，是一个仅有400户人家的小镇，由第70师及32师大部共2个师部3个半旅的兵力驻守。这样一个小镇，挤进这么多的部队，不仅部署上施展不开，就连吃水都成问题，其混乱拥挤之状便可想而知了。在我大军压境，处于四面重兵包围和与其主力联系被割裂的情况下，该敌已成惊弓之鸟，既不能就地固守，又不能向南突围与整编第66师靠拢，唯有东向济宁突出我军重围。但这股敌人毕竟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两师之众，是一块难啃的大骨头。若我先行四面包围使之走头无路，再作强攻硬取，势必迫敌作困兽之斗，不仅不利于速决以腾出手来解决它敌，而且还会增大我之伤亡。刘帅从权衡敌我双方及战场、战局的实际出发，决定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纵敌突围，歼其于运动之中的战法。据此，我军从北、西、南方向对

敌形成三面包围态势，而在镇东留一缺口，以1个纵队的兵力，预先布下伏兵。7月11日，我军总攻开始，敌人乱作一团，32师在左，70师在右，没命地奔跑，左冲右突逃不出去，人挤马踏死伤无数，最后一齐拥向镇东郊外，利用夜暗和青纱帐作掩护向东夺路而逃。当敌人钻入我预设口袋后，我军四面伏兵尽起，敌人溃不成军，一夜之间，即被我全歼于六营集以东方圆10多公里的大洼地内，打了一场痛快淋漓的歼灭战。

羊山集——强攻硬取，攻城与吸打援敌有机结合

羊山集，位于万福河北岸，南与金乡隔河相望，是一个拥有千户人家的大镇。镇外水壕环绕，镇北有山，山上有日军残留的水泥碉堡和石头工事，可居高临下控制全镇。被围在羊山集镇内的敌人整编第66师系蒋军嫡系部队，装备和训练均较一般部队强，师长宋瑞珂是蒋介石器重的黄埔少壮派。该敌被围后，蒋介石亲自飞到开封召集会议，调兵遣将救援66师，并命令宋坚守待援。镇内守敌日夜赶修工事，据守顽抗，加之连日大雨滂沱，交通沟内水深齐腰，严重影响我军的行动。显然，对羊山集的攻歼已不能套用六营集的方法。刘帅在深入分析"守敌必凭险死守、外敌必冒险来援"的形势后，决心采用攻城与吸打援敌相结合的战法，先打援军，后歼守敌。我阻援部队在大量杀伤敌援军之后，故意在万福河北岸放开一个缺口，以羊山集待援之敌为钓饵，诱敌199旅渡河北上，在距羊山集仅5里之遥的地区，歼灭北援之敌一个旅和由羊山集出城接应之敌一个团，取得了吸打援敌的胜利。此时，蒋介石慑于鲁西南的接连失败和羊山集的不断告急，急令各路援军驰援鲁西南，但各路援军仍在途中和尚未靠拢，就近金乡之敌再无力北援，羊山集之敌已经削弱；同时，我军主力已可全部集中，并有迅速攻歼该敌之可能。鉴此，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立即向大别山行动和羊山集如能迅速攻歼则攻歼之的指示，为了赶在敌援兵尚未到达之前尽快结束战役，刘帅当机立断，决心集结全力，以4个纵队绝对优势的兵力速歼羊山集之敌。总

攻于7月27日18时30分发起，至28日上午，我军占领羊山集，全歼敌66师，打了一个干净、彻底、漂亮的歼灭战。

六营集、羊山集两敌，同为被我分裂包围之敌，但在攻歼的方法上却是截然不同的。六营集之敌，虽有两师之众，但被我追围于狭小的地区内，已成惊弓之鸟。采用围三阙一之术，不仅利用了敌人的逃跑心理，而且亦有利于歼其于突围之中，这是因势利导，顺乎情理的事情。羊山集之敌，固守顽抗，装备良好，工事坚固，地形有利，显然是颗硬核桃，只能是强攻硬取，舍此别无它途。而歼灭该敌，又是解决全战役乃至影响我军南下的关键。加之敌援军将至，时间紧迫，不宜拖延，这就决定了此仗非打不可。为此，我只有倾全部家当，集绝对优势，砸碎这颗硬核桃，拔掉这颗硬钉子。可见刘帅用兵的高明之处及其机动灵活、不拘一格的独特风格。正如刘帅在总结鲁西南战役时所说，敌人的主力是"在错觉与不意而失去主动权之中，在我之攻城和野战中，先后被我各个歼灭而所剩无几了。"这就是刘帅对该役中我军胜利原因及敌人失败缘由的精辟概括。

找敌弱点　造敌弱点　打敌弱点

——学习刘伯承谋略思想的体会

蒋文郁大校　沈耀钦中校　骆明灿上尉

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继承发展了我国军事谋略的精华，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用兵方略。“找敌弱点，造敌弱点，打敌弱点”就是刘伯承用兵谋略中很有特色的一条原则。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一原则，对于我们树立信心，在现代战争和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实现以劣胜优、以弱胜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明察虚实，变敌实为虚，避实击虚，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基本法则。作为“博学古今中外军事，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著名战略家和战役指挥员，刘伯承深谙“虚实之势”的要义，源于古人又高于古人，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不断地创新与发展。

“创造或寻找敌人的弱点，并抓住他的弱点，给以有计划地突然地袭击，是把握主动权最好的方法”。①刘伯承认为，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掌握了主动权，军队就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就可能组织和进行胜利的作战；失去了主动权，军队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随时可能遭到失败的厄运。因此，主动权是军队存亡和胜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行动原则，是军队敌对双方所要拼命争夺的。如何争夺主动权呢？刘伯承认为，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主动权暂时和局部丢失是不可避免的事，关键在于指挥员要善于窥破敌我行动的契机，防止和避免敌人突击己方的弱点，抓住敌人

的弱点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这样主动权就能够“从最后的胜利中显示出来”。同时认为，即使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要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权，仍然离不开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在敌错觉与不意中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刘伯承把“找、造、打敌弱点”看成是争夺战场主动权、取得作战胜利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战略上是打强的，在战役、战术上是打弱的”。②刘伯承认为，我军在全局上处在弱小、劣势的情况下，要做到以劣胜优，其中心就是要想办法将军力强大的敌人化为战役、战斗上的弱者，使军力弱小的我军，变为战役、战斗上的强者，通过敌我力量消长，逐步把我军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发展为战略全局上的优势。因此他强调在作战中要善于扬我之长，避敌之长；护我之短，击敌之短；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捕捉敌之弱点，多方造就敌人弱点，不断“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③，使我军在许多局部的战役、战斗中，争取主动，积小胜而求大胜，能动地转化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从而达到在战略全局上的优势和主动。正如他在《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编译后言》一文中指出的：“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的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④

“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⑤刘伯承认为，一切军队无不有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强与弱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绝没有固定不变的强点和固定不变的弱点。“事实上这里兵强就成了重点，那里兵弱就成了弱点。这里打阵地战成了重点，那里打运动战成了弱点，这里阵地有备就成了重点，那里阵地无备就成了弱点。一个部队一个阵地也各有自己的重点和弱点，决没有处处是重点的。即是一个敌人今日成为重点，则因我歼灭其相依相存的弱邻（特别是在运动中的与驻守补给线上的），明日即变为弱点”。⑥因此，他强调各

级指挥员一方面要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以少数兵力钳制其他方面，借此腾出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⑦，做到“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另一方面要及时预见战场强弱的可能转化，大胆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寻歼敌人。并指出：“在作战中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而应在注视战机进展中，以自己积极行动的因素去开展战局，走向歼敌，即如何创造敌人的弱点，如何诱敌前进，如何追求敌人，如何兜击敌人之类”，⑧始终把握战场上的强弱矛盾转化。

上述刘伯承同志关于“弱点”问题的精辟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伯承同志精深的谋略思想，也是他一次次成功地“找敌弱点、造敌弱点、打敌弱点”，创造一个个战争奇迹的重要思想体现。

（二）

“打仗是一件胆大心细的工作，对于敌情要不断地侦察、研究和判断，才能适时定下正确的决心。”⑨敌之弱点是客观存在的，刘伯承作为一个战略指挥员，既有总揽全局的雄才大略，又有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就大势与局部沉思”，就敌我强弱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从战争全局和错综复杂的战场态势中“找敌弱点”，把“找敌弱点”看成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刘伯承善于在战争全局上“找敌弱点”。他认为，正确地分析敌我形势，清醒地看到敌人的弱点，就不会被敌表面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就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争全局上找到了“敌人弱点”，就能够正确地制定符合战争全局的战略战术，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采取“囚笼政策”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连续疯狂的“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我抗日力量，给根据地的斗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对此，刘伯承同志通观全国形势，明确指出，敌人虽然其势汹汹，但处于异国作战，丧失人

心，而且资源缺乏，地广兵少，士气低落；武器精良，但协同要求高，动作呆板，作战消耗大；长于扼守要点，沿交通干线实施战役上的直撞攻击，但最怕机敏灵动、出没无常的游击战。指出了侵华日军的本质“弱点”，激励抗日军民的士气和战胜敌人的信念。他还认为，敌人抽调人马“扫荡”一地，其它地区就兵力空虚，使我有机可乘。指出“敌人这样的外强中干，前硬后软的弱点，我们一定不要作近视眼，而要透视到敌占区，乘虚打开场面，以使敌人顾此失彼，而不要被敌人麻痹，放过良机”。⑩针对敌人的这些弱点，制定和提出了“敌进我进”、“抽薪止沸”等一系列具体的斗争方针，率领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寻敌弱点，打敌弱点，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巩固和壮大了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蒋军，刘伯承同志深刻地指出了蒋军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和脆弱性：“蒋介石的致命弱点是在于他所进行的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针对蒋军全面进攻的态势指出：“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其结果必然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⑪在敌人全面攻势失败而转入所谓“重点进攻”时，刘伯承同志再次精辟地指出：“这是敌人在全面进攻不断被歼灭之后，从其次要方向拼命抽出兵力和兵器结成重点，用来互相支援，以直撞对方或坐镇一地而避免歼灭的”。⑫因此，“一般说来，国土之大而与民为敌之独夫蒋介石，仅仅以未被击破的几支军队凑成几个重点，间隙地何其宽，弱点何其多，人民解放军何其自由机动”。⑬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刘伯承都能洞察蒋军的致命弱点，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作大踏步的进退”，广泛采取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击敌一翼，分割包围，围点打援，击溃追歼等战法，“捕捉弱点，突然出现，攻其不备，歼灭一点再及其他，实现各个击

破”⑭。

刘伯承不仅善于在战略全局上“找敌弱点”，同样善于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找敌弱点”。他说：弱点“一般是部队的接合部，阵地的侧背或突出部，特别注意寻找其指挥机关，打碎反动派的首脑，收效特大”。⑮这里指的弱点，就是分散孤立之敌，突出冒进之敌，敌之翼侧、侧背、接合部、指挥部等等。并说：“如敌正在行军，并未准备打仗，此时无堡垒罩着，使我得着这个好机会来伏击，这就是寻找了敌人的弱点”。在每一次战役、战斗时，刘伯承都要对敌情进行细致缜密的分析，从而准确地“找敌弱点”，制定出合符实际的“打敌弱点”方案。1946 年 9 月的定陶战役就是一个范例。当时，敌军从徐州和郑州集中了 30 余万人的兵力，由东西两个方向钳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敌众我寡，要粉碎敌人的合围，不找其弱点是不行的。刘伯承指出：郑州之敌与徐州之敌相比，后者人虽少于前者，却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拥有美式装备，战斗力强。前者人数虽多，战斗力却不强，是两敌中的弱敌。因此，他把郑州之敌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同时，他又对郑州之敌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整编第 3 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但又有许多内在的弱点。一是骄傲轻敌，行动易发生过失；二是与其它“杂牌军”矛盾较深，如打击之，“杂牌军”不会积极增援；三是该师刚从中原调来，情况不明，地形不熟，仓促投入战斗，造成部队疲惫。因此，这支强敌反而成为郑州之敌中的弱点。由于该师是郑州之敌中的主力，故歼灭这一师，即可打破敌人合击之目的。刘伯承经过仔细分析判断，正确地找出了敌人存在着的各种弱点，从而定下了先打郑州之敌，又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整编第 3 师的正确决心，并据此制定了周密、正确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定陶战役的胜利结果，完全证明了刘伯承的推论。

（三）

在战场上，敌我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敌人的弱点常常不是自动地暴露在面前，因而必经通过造势制造敌人的弱点。从刘伯承军事著作内若干战役指示和总结中都可以看出，在指挥每一个战役战斗时，刘伯承在全面细致地分析掌握了敌情、我情的基础上，总要千方百计着力于调动敌人，从中发现并制造敌人的弱点，以利于我充分发挥战术。他说："消极的隐蔽自己的真实行动，使敌人误解我们的行动，使它在布置兵力时对付我们的刀尖不能向着我们，而是把松懈的弱点向着我们，给我们好去袭击它，这就是创造了敌人的弱点"。⑯并强调要注意从敌人的"翼侧、接合部、突出部、后方，特别在其移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充分中"⑰去创造和捕捉战机。他的著名的"敌进我进"原则就是造敌弱点的好办法。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实行的"铁壁合围"、"辗转清剿"、"反转电击"战略，刘伯承同志提出要抓住敌合围的利害变换线，即当敌合围将拢未拢之时，除留一部分兵力坚持内线作战外，主力歼敌弱的一路，转出外线，打敌侧背。并大量派出游击武装，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到敌人后方，白天荫蔽，夜间炸据点、炸仓库，使敌后方乱作一团，不得不匆忙调回扫荡部队，使敌合围态势不打自消。又在敌撤回的路上，适时进行伏击，大量消灭敌人。搞得日军顾此失彼，惊呼"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⑱深动地体现了刘伯承高超的"造敌弱点"艺术。

对于如何"造敌弱点"，刘伯承指出"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只有灵活的机动，才能攻敌不备，捕捉战机"，⑲只有大踏步地进退，才能调动和消耗敌人，迫使敌人暴露弱点，便于人民军队乘隙予以突击，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说：我们的作战机动必须：一、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

点。二、集结绝对优势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三、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援救其被突击的弱点。简言之就是：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人的弱点而消灭之(这是主要的)，或者大踏步地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通过实行宽大的机动，多方调动敌人，达到：调驻止之敌于运动中，迫集中强大之敌分散，使谨慎推进之敌冒进，使队势严整之敌出现破绽。从而使集中之敌变成分散之敌，强敌变为弱敌，不好打之敌变成好打之敌。1945 年 10 月进行的邯郸战役就是一个通过机动造敌弱点的成功战例。此役，刘伯承根据敌人由新乡北上的行动路线，选定磁县至邯郸间的滏河、滏阳河河套的沙漠地带，预选设伏，形成口袋，尔后示敌以弱，诱敌深入，将敌围困于河套地区。敌人想跑，结果前有滏阳河之阻，后退有滏河之隔，东有我冀南、冀鲁豫根据地，敌人成了瓮中之鳖。在此情势下，刘伯承同志指挥部队采取“猫盘老鼠”的战术，逐步消耗、歼灭敌人，取得了歼敌两个军和一个军起义的胜利。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刘伯承指挥的许多战役，都是这样以实行宽大机动来造敌弱点进而达成歼灭战的。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就是高度机动，从战略上“造敌弱点”的最集中最精彩的体现。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同志以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为我们总结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造敌弱点”经验，主要有：(1) 变强敌为弱敌，尔后加以歼灭。强敌进攻时，我要使用一部兵力，伪装主力，与敌纠缠，并不断给敌以杀伤、消耗、疲惫，松懈其指挥，削弱其战斗力，时机成熟加以歼灭。定陶战役等就是这样进行的。(2) 攻敌所必救，调敌来援，歼其于运动中。运动之敌好打，有利于我乘敌之隙，同时便于我选择有利的歼敌地区，便于灵活运用战法，便于发挥我军野战之特长，迅速将敌分割，各个歼灭。巨金鱼战役就是其中一例。(3) 能战示之不能战，强而示之弱，节节阻敌，骄纵敌人，诱敌深入。这样可以破坏敌人进攻态势，造成敌孤军深入。我则可预设战场，布置阵地。一俟将敌

诱至，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敌人，边围边割边歼，各个击破。平汉战役、高山铺战役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点。(4) 隐真示假，声东击西，用各种方法造成假象。制造敌人错觉，一旦敌人被调动，或出现翼侧暴露，或后方空虚，或队势被拉开，则运用敌进我进，超越作战的打法，打敌一个措手不及。鄄城战役就属此类。(5) 欲擒故纵，纵敌突围，乘其脱离阵地，失去依托，歼其于撤退、突围中。这些高超的“造敌弱点”艺术，无不闪烁着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四)

“找敌弱点”、“造敌弱点”的目的就是为了“打敌弱点”。“先打弱的，后打强的”，这是“避实就虚”、“批亢捣虚”等古老作战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刘伯承在多年的战争实践中成功运用并发展了这一原则。

在“打敌弱点”上，刘伯承强调行动的迅速与坚定性。古代军事家吴起说过：“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时调整战役计划十分必要。但是，改变决心计划又必须十分审慎。因为原先的战役决心不是随意的，而是充分考虑了作战的各种因素，是基本作战企图的反映。同时，战役准备工作极复杂，频繁改变战役计划，很难保持战役的协调动作和各种保障的顺利实施。所以，在情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决不要为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为一些暂时的困难所动摇。刘伯承总是告诫部属“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因此“一旦发现了敌人的弱点，就要毫不犹豫地抓住它，并及时地制定和修改作战计划，努力付诸实施。”

“集中优势兵力，以强击弱”，是刘伯承一贯的观点。他认为，战法无非奇正虚实，主要的是要注意“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使之在次要方向

上以一个人扭住敌三个，在主要方向上以三个打一个敌人。在《襄樊战役总结》中，刘伯承指出："攻城指导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成钳形突击。13日后，我鉴于虎头山、羊祜山坚固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以郧白独立团佯攻两山之敌，以六纵全力攻襄阳城西门，孔庆德全力攻城东南，刘金轩五个营攻城东北，而将三军突击队会合于城内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通俗而又清楚地阐明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敌弱点的重要意义。

"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敌情、不同地形等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打敌弱点"，是刘伯承指挥的又一特色。刘伯承指挥作战向来是敌变我变，灵活用兵。对此，他有个通俗形象的比喻："战术是用来消灭敌人的，不管黄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精辟地表述了战术上的灵活应变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指挥鲁西南战役时，打郓城"围而不阙"，是因为郓城城墙不坚固，又是掉在我军后面的一个孤点，我兵力占优势，围而不阙有把握全歼敌人，"阙"了反而容易让敌人逃掉；打六营集则"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因为六营集敌人较多（两个师），把它调出来容易歼灭，如不"阙"，敌作困兽之斗，则于我速决不利。渡江战役中，由于第三野战军顺利解放南京，敌军向杭州、上海方向溃退。刘伯承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情况正在急剧变化，原定由二野与三野交叉掩护去南京的作战计划已不适应新的情况，因而果断改变原定任务和行动方向，挥师南进，直下浙赣线。这些战例都深动体现了刘伯承指挥灵活的特点。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吸取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战术上灵活多变，指挥时得心应手，创造了一个个"找敌弱点、造敌弱点、打敌弱点"的光辉范例，所展示的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后人好好学习和悉

心领会。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⑬⑯⑰⑱⑲《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122、第 547、第 216、第 558、第 404、第 506、第 404、第 481、第 335、第 256、第 473、第 506、第 507、第 508、第 404、第 122、第 508、第 375、第 508 页。

因敌制胜谓之神

——学习刘伯承元帅重视敌军研究的思想

徐兆林　上校

孙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众所周知，我党我军的大军事家刘伯承元帅，在军事指挥上以神机妙算著称，是公认的常胜将军。他之所以获得如此殊荣，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军事实践中极端重视对于敌军的研究。他曾精辟地指出："我们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才会有依据。"①他重视敌军研究的思想，始终贯彻于他的军事实践与理论之中，尤其是在集中反映他的军事理论的《刘伯承军事文选》中，更是处处体现了这一极其重要的思想。

一、胸怀全局，从总体上把握作战对象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被数千年战争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因此，准确地把握作战对象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是战争指导者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从而提挈全军，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

刘伯承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他在南昌起义中就担任军事参谋团的参谋长，并且从那时开始，长期担任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这种客观条件，使他既有必要，又有可能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从总体上去研究和把握作战对象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将其作为基本依据，确定自己的战争指导方法。

刘伯承从总体上把握作战对象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就已开始产生。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受挫后不久，他撰写了《南昌暴动始末》一文，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这种思想就有相当明确的体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我军一个重要战略区的最高指挥员，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胸怀战争全局，始终注重从总体上把握作战对象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

抗日战争中，他用极大的注意力广泛搜集、潜心研究日军的基本情况，从中抽象出本质的特征，用以确定对付日军的作战方法。1938 年 3 月，刘伯承发表了题为《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重要论文，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日军作战的十大特点：

（一）由于敌寇的暴行，加速扩大了民众团结救亡的运动。

（二）屠杀、诱惑、恐吓、离间同时并用。

（三）害怕游击战争，特别害怕游击队做瓦解日本满蒙军队的运动。

（四）要求速战速决。

（五）掠夺资材。……日本强盗战争资源缺乏，难以支持长期的侵略战争。

（六）夺占交通线，逐次转移作战重点，企图各个击破我军。

（七）战役上的突贯攻击。……不管如何困难，总是沿交通线为轴心的作战目标努力直钻。……这是给我军突击其侧背的好机会。

（八）占据要点——日本军队因恐兵力耗散，只把占领的广大区域内军事之要点派兵据守，空出广大地域，则想发展汉奸伪政权，组织以华制华。……这已成为发展游击战争，组织民众，遂行运动战的好场所。

（九）战略重点放在华北。

（十）武器精良，其常备军长于协同动作，但其步兵攻击精神并不很旺。如果我们作战审计了敌我的长短，玩一点出乎它们典

范令之外的新的花样——主动袭击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它们就要感觉难于应付。

这十大特点，不是日军某一时间或某一局部的特点，而是带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基本特点。把握这些基本特点，对于正确指挥作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是我军有针对性地制定基本作战方法的依据。刘伯承就是在系统地分析了日军上述作战特点之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论述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含义、任务、原则及相互配合的方法等。这些重要的原则，对于我军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其次，它又是我军在作战中分析判断当面具体敌情的基础。虽然，每次作战所遇到的具体作战对象各方面的情况有所不同，都需要进行周密的侦察和准确地判断。但是，各个具体作战对象的具体情况不同，是建立在基本特点大体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刘伯承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十大特点，对于我军正确分析、判断具体作战对象的具体情况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

这篇重要论文以其强烈的实践性和深刻的理论价值，成为指导八路军第129师的发展壮大和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全面内战爆发前，刘伯承通过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的作战实践，初步掌握了国民党军在内战中的主要作战特点。全面内战爆发后，又通过陇海、定陶等战役的实践，对敌人的基本作战特点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1946年11月4日，当全面内战进行到第5个月的时候，刘伯承《在濮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把国民党军作战的基本特点总结为以下五条：

（一）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

（二）装备好的部队，……因为它们有现代装备，有摩托机械，所以就一定要有顺畅的补给钱，以供应汽油、弹药、粮食等。

（三）以守备兵团固守已经占领的城镇，并就地抓壮丁，掠夺

粮食、财物。但由于蒋军的兵力不足，虽然在和我交界区的兵力较强大，而其后方就很空虚。

（四）采取美国的战术，无论行军、宿营、作战，都派出强大的搜索部队。

（五）黄河问题，国民党已决心于最近（10月20日以后的50天内）将黄河合拢，使黄水归故。它们所以这样，除了蓄意用水淹我解放区军民外，在军事上企图把我们的主力赶过黄河以北，然后它把黄河南岸的渡口、要点控制起来，把黄河作为一条天然的外壕。这不是一件小事，是蒋介石国防部的战略，也是美国国防部的战略，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依据对敌人作战的基本特点的认识，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军作战方法六条，主要内容有：坚决执行毛主席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夺取或保守地方为主的指示；在作战形式上应当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辅以游击战；战斗队形；侦察与防谍；通信联络；战斗互助，战斗作风，战斗纪律。

二、率先垂范，亲临前线了解敌情

刘伯承在他的军事活动中，历来十分重视每战都须下大力察明敌情。还在红军时期，他就要求每一军人都应该把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察明敌情“当作人民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看待”②。并且提出了许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获得敌情的手段，例如：“审问敌人俘虏、逃兵，探问战地逃出的居民，搜集并研究邮电信件刊物，以及在敌人被俘及被打死者的身上取出的文件及军用品，偷听电话，观察敌人飞机的活动，使用间谍暗探，特别是使用步兵侦察队，骑兵侦察队，一般指挥员以及特种兵的专门人员实地侦察等。”③刘伯承不仅这样要求部队，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他在各次大的军事行动之前，都以各种手段察明直接作战对象的特点，并针对当面敌人的特点，采取正确的战役战术指导方法。

在1939年8月22日的《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中，刘伯承根据抗日战争两年来对日军作战的实践经验，对于当时日军对华北作战的特点和规律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敌作战部署和战斗动作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通过会议报告、讲演等多种形式对部队进行教育，使部队对当面之敌的现状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刘伯承在1941年10月16日《反对敌人大“扫荡”的战术指示》、1942年9月5日《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1945年10月17日《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等篇文章中，围绕特定的战役企图，对具体的战役作战对象的有关各方面的情况作出了中肯的分析与判断，为确定正确的战役指导方法和最终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依据。

刘伯承还积极提倡指挥员在战场上要亲临前线，亲察敌情。他指出：“侦察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观察，一种是战斗侦察。只有亲身的观察，才能真切地了解敌情之变化。”④

首先，他自己身体力行。在南昌起义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身为起义军军事参谋团参谋长的刘伯承，曾与贺龙一起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亲临距敌仅200米的前沿，观察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情况，找出敌人防御的弱点，指挥起义军采取正面压制，两侧迂回的战术，攻歼了抵抗最顽强的朱培德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为起义的胜利赢得了决定性的一仗。抗日战争中，他指挥过许多著名的战斗，为了战斗的胜利，他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观察敌情。解放战争时期，他已是数十万大军的主帅。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征途十分艰险。强渡汝河时，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河边观察敌情，指挥渡河战斗。

其次，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教育各级指挥员加强亲身对敌情的侦察。1939年，他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侦察敌情工作时说，“这是袭击以前第一个工作”，“在可能时派出指挥员”，“化装前往”，“秘密察明”敌情、地形、居民情形等。1949年渡江

战役前，他在侦察工作指示中强调："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以望远镜（夜间则听音响）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之基础。"⑤他不仅反复在理论上进行阐述，而且善于运用实战中的典型事例对干部进行生动直观的教育。中原野战军第 4 纵队第 10 旅、第 20 旅在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担负对沈庄、李围子攻击的任务，由于攻击前未察明敌情，致使第一次攻击失利。第二次攻击之前，两个旅的指挥员率所属各兵种、各部队指挥员，对地形、敌军阵地等实行三面近迫观察，并通过其它各种途径广泛了解敌情，制订了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计划，从而使第二次攻击获得了成功。刘伯承紧紧抓住这一典型战例教育各级指挥员，使他们从活生生的事实中认识到加强亲身对敌情侦察的极端重要性。

三、着眼发展，从不断变化的当前敌情中预测敌人的未来趋向

研究敌人，既要研究敌人的过去，更要研究敌人的现在。尤其要通过研究敌人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测敌人的未来。这是任何有作为的军事家实现正确的作战指挥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刘伯承对敌军的研究，善于见微知著，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深刻地研究敌人各方面的情况，把握其基本规律，科学地预测敌人未来的趋向和可能的行动。他在作战指挥上总是高出敌人一筹，皆因得益于此。

首先，从战略全局预测敌人的发展趋向，为我军的全局性作战指导提供依据。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刘伯承透过"日军战斗力的减弱，自杀的增多，反战的骚乱不绝，日军拖枪来投我军的发生"等一系列现象，预测日本国内、军中的反战运动必将日益发展，不断扩大，从而提供了"有利于我进行瓦解敌军

的客观条件”，并能“更顺利地保障我们遂行攻无不克、天下无敌的战术。”⑥还在解放战争刚进行到第二年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在总兵力上还占有相当优势，其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尚未停止。他根据1947年7月鲁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军官兵“不仅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动缴械者日益普遍，甚至七十师的正副师长，五十五师的副师长，乃至陈诚亲信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高级将领，都不待我军查问，就自动说出他们的真实职务”⑦的状况，预见国民党军往后必是江河日下，“愈战愈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可见蒋介石的叫嚣和哀鸣，已经日益没有效力了。”⑧其次，科学地预测敌人的战役战斗行动企图，为定下正确的战役战斗决心提供可靠的依据。对于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来说，仅仅能察明敌人当前的状况是不够的，仅依据当前敌情决定自己的行动，极易陷入被动应付状态。只有在科学预测敌人未来行动企图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出高敌一筹、克敌制胜的妙计良策。刘伯承以其丰富的用兵经验和精深的兵法谋略，洞察敌情的发展变化规律，运用于自己部队的行动，在战争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叹为观止的活剧。1937年10月26日、28日七亘村的两次伏击作战，就是他科学地预测敌人行动企图，连续取得胜利的典型范例。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刘伯承深刻剖析了国民党军在战略决战惨败之后的军事形势，认为：敌人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前进配备”和“后退配备”三种样式；江防漫长，防守兵力严重不足是敌人面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据此，刘伯承预测敌人“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⑨刘伯承对敌情的准确预测，对于正确指导渡江战役，取得战役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他料敌如神的科学预测能力，再一次被战争实践所证实。

四、料敌用兵，依据敌情变化制定决胜方略

研究敌军的目的，在于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刘伯承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不断地从动态中把握敌情变化，活用兵法，创造性地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方略。

一是针对不同敌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在由战略进攻转为巩固占领地之后，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我抗日根据地军民，日军为集中兵力进攻抗日根据地，不得不抽调其后方原本不足的兵力。因此，它兵力不足与占领地广阔的矛盾更加突出，后方空虚的弱点更充分地暴露出来。刘伯承针对日军的这一具体特点，首先提出了“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即在根据地内如无消灭敌人的机会时，则以小部队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主力转至敌后打击敌人，并提出组织和派遣大量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这一正确的方针，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八路军第129师的敌后斗争，而且得到八路军总部的肯定，很快被推广到整个华北战场。平汉战役中，刘伯承紧紧抓住敌人“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的特点，判断敌人的企图是打通平汉线，走西边，是山地，不便走，走东边是沙漠，困难，非沿铁道北进不可。因此，他在战役前，就组织军民在漳河与滏阳河的河套地带破路、平沟，拆毁日伪时期留下的工事、障碍，创造有利于我军进行运动战的战场条件，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二是择弱击虚，胜于易胜。孙子曰：“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刘伯承之所以在战争实践中百战百胜，是因为他善于找敌弱点，打敌弱点，故能“胜于易胜”。强点与弱点，相比较而存在。找出敌人的强点与弱点，是研究敌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诸路敌人中找出弱的一路，在弱的一路中找出弱的一部，对于敌人弱的一部，还要找出其内在的弱点，以保证我军以强击弱，以

实击虚，战则必胜。刘伯承在战争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找敌弱点”的原则，他在实际“找敌弱点”、“打敌弱点”的艺术方面，达到了堪称炉火纯青的境界。在他指挥的各次战役战斗中，都突出地体现了这一鲜明的特色。定陶战役，就是刘伯承准确地找敌弱点、打敌弱点的典型战例。

三是敌变我变，以我变制敌变。战争双方都以战场为舞台，斗智斗勇。所以，战场形势总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刘伯承善于从战场的实际出发，依据不断变化的敌情，适时采取恰当的对策，并以自己的有效措施限制敌人的反措施，充分展示了他指挥艺术的高度灵活性。1947 年元旦前后进行的巨金鱼战役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为粉碎国民党军 6 万余人向我豫北解放区的进犯，刘伯承、邓小平依据不断变化的战场情况，先后三次调整作战方案，变换战法。一变内线破敌为外线出击，甩开了向豫北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敌人主力，集中力量向敌人后方鲁西南出击，给进攻豫北解放区的敌人来了一个“釜底抽薪”；二变夺占成武为攻取金乡，大大震撼了敌人，为迅速调动敌人来援，消灭援敌，创造了条件；三变强攻金乡为围城打援，当敌为解金乡之围，从徐州、定陶、荷泽分三路来援时，刘伯承、邓小平以 1 个旅继续围攻金乡，以主力打援。三次改变战法，不仅使自己的主观指导完全符合了战场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且把敌人一步步逼到了被动挨打的境地。此后，我军在半个月内连续打了三个漂亮的歼灭战，逐一歼灭了三路援敌，胜利地结束了巨金鱼战役。

四是变换“角色”料敌，诱敌就范。战场上的敌我双方，无时不在互相侦察对方的行动，揣摸对方的企图，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刘伯承在作战指挥中，非常注重变换“角色”分析问题，即站在敌人的角度，推测敌人的企图和行动。抗日战争初期的 1937 年 10 月 29 日，129 师骑兵营破坏了河北省高邑至庄果间的铁路，估计敌人必然跟踪报复，就先到南邢郭村公审汉奸以诱敌人。下午，到达北马村，留下一个班的兵力吸引敌人，主力则转移到嘉

应寺待机。敌人果然不出所料，从高邑派出快速部队，乘8辆汽车经南邢郭村追来。敌人赶到北马村，我留下诱敌的一个骑兵班完成诱敌任务后迅速撤离，敌即在该村就地宿营。我预先隐蔽配置在嘉应寺的骑兵团主力当晚出击，以突然勇猛的动作夜袭该敌，将敌8辆汽车全部烧毁，毙敌130余人。取得这次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变换"角色"，周密地分析我的每一行动可能引起敌人的何种反行动，敌人的反行动又对我的下一步行动有何影响，整个计划环环相扣，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处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

五是"反推"料敌，出奇制胜。"反推"是一种逆向认识。"反推"料敌，即通过逆向认识推理出敌人如何认识我方的行动和企图。"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刘伯承在作战指挥上高敌一筹、出奇制胜的拿手好戏。抗日战争中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的伏击地点，是刘伯承亲自勘察选定的。该地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我兵力展开，有些同志认为不宜选作伏击战场。但是，刘伯承分析认为，敌人也会认为这里的地形对我不利，估计我不会在此设伏，而对这一地点麻痹大意。我偏偏一反常规，在敌人认为我不会设伏的地点设伏，出敌意外地打击敌人。后来实际情况表明，刘伯承的"反推"料敌十分准确，敌人果然一丝不苟地按照他的安排行动。神头岭的伏击战打得增援黎城的敌人措手不及，全军覆没。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457、第63、第64、第463、第580、第109、第516、第516、第585页。

略论刘伯承军事谋略的辩证思维艺术

耿福荣　少校

刘伯承军事谋略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闪耀着强烈的辩证思维的光彩。研究刘伯承军事谋略的辩证思维艺术，对于我们学习他的军事谋略思想，把握其谋略用兵精神，提高我军未来作战的指挥艺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刘伯承同志军事谋略辩证思维的突出特征是：宏观全局，联系思维。

在军事谋略思维中，所谓联系思维，就是把握军事活动的全局与局部的内在联系，并根据这种联系所进行的积极的谋略思维。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与局部，就有全局与局部的辩证联系。认识和把握战争全局与局部的联系，是争取战争主动权，驾驭战争、争取胜利的必要基础。刘伯承非常注重和善于辩证地处理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表现出高超的谋略思维艺术。

1、在运筹作战上，刘伯承极为注意从战略全局和战略整体利益出发，根据战略目的寻找作战契机，确定作战任务。

刘伯承长期作为我军独当一面的战区指挥员，具有极为强烈的战略全局意识。他经常强调：我们的战略行动，我们的战术思想，我们的军队建设，都要服从党中央这个全局。党中央如同乐队打鼓的，我们各地就象拉胡琴打锣的，中央的鼓点子怎样打，我们就一定怎样拉，一定要听中央的指挥，这样才能奏成一曲很好听的音乐。否则，不但合不上板眼，还会造成损失和失败。因此，

每逢作战，他总是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分析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和战略企图，认真研究中央赋予本战区的战略任务，准确把握本战区与战略全局的内在联系，并根据这种联系寻找有利于战略全局发展的作战契机，选定作战方向，奇谋胜敌。例如：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当中原我军突围、山东我军吃紧之际，晋冀鲁豫部队受命到南线作战。到南线是向豫西打，还是向豫北、豫东打？刘伯承同志把握晋冀鲁豫解放区“四战之地”、晋冀鲁豫部队“四战之军”与全国战局的联系，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出兵豫西、豫北或豫东，对全局影响不急迫。而挥师南向，透入敌人防御纵深，打击敌人战略布势中既是薄弱部位又是要害处的陇海铁路徐汴段，是牵一发而动敌人全局的妙棋。于是毅然发起陇海路战役，斩断了敌人进攻解放区的两大战略支点——徐州与郑州间的交通，威胁其战略要地徐州、开封，在其战略布势的中央部位扯开了缺口，出敌意外，使之不得不匆忙从中原和华东战场抽调重兵驰援。这一仗大量调动了敌人，有力支援了中原我军突围和华东战场我军的作战，推动了我军战略全局的发展。

2、刘伯承同志不仅能够得心应手地把握战略全局与局部的联系，积极谋取胜局，而且也极善于根据中央总的战略意图和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洞察分析每一次具体战役，通过战役全局与各层次局部的联系，透析战役作战重心，并迅速抓住这一影响战役全局的作战重心，全力加以解决，争取战役全局的胜利。

例如：定陶战役中，敌人以30万人的优势兵力，从徐州和郑州分两路向我军分进合击。敌强我弱，怎样才能打破敌人的进攻？刘伯承同志胸怀全局，高屋建瓴，在东西两路敌军中紧紧抓住西路敌军蒋军嫡系整编第3师，作为打退敌人进攻的关键部署战役，在打敌整编第3师时，又抓住其所属的战斗力较弱的第20旅作为战役突破，在打敌第20旅时，又首先打其所属战斗力较强的第59团作为战斗突破口。可以说，整个战役筹划，刘伯承同志始

终是从战役的整体性出发，深刻透视战役体系中敌我之间、敌人内部之间的各种利害关系，精确地寻找战役各层次战斗的关键局部，准确地把打击矛头对准敌人的弱点和关键，从而层层突破，赢得了战役全局的胜利。

(二)

刘伯承同志军事谋略辩证思维的又一突出特征是:趋利避害，矛盾思维。

在军事谋略思维中，所谓矛盾思维，就是把握军事活动中敌我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积极促使敌我双方矛盾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最终以敌败我胜达到矛盾解决的积极谋略思维。矛盾思维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矛盾原理在思维领域的运用。在数十年的战争生涯中，刘伯承同志运筹帷幄，战则必胜，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的矛盾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在革命战争的每一历史阶段，他总是认真分析革命战争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矛盾斗争，实事求是地确定斗争方略，并不断总结经验，运用于战争实践。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刘伯承同志形成了他独特的以弱胜强的矛盾思维原则:

1、找弱、造弱、打弱原则。有战争就有战争力量及各方战争力量在不同时空的强弱对比。指导战争的一个重要法则是趋利避害。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战争环境中，我军怎样趋利避害，运筹谋略，战胜强敌?刘伯承同志认为:必须:“(1)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2)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的这一弱点;(3)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救援其被突击的弱点。”①刘伯承同志总结的这一整套找敌弱点、造敌弱点、打敌弱点的原则，既是他机动作战的指挥原则，更是他作战运筹的谋略思维原则;是他

在战争实践中面对强大的敌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地分析敌我严重对立的矛盾，对敌强我弱矛盾的消长转化科学认识的成果；是他智慧用兵的谋略思维轨迹的直接显现。

2、“敌进我进”原则。这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面对敌人的进攻，关于军队机动行动的谋略思维原则，也是刘伯承在革命战争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法。“敌进我进”原则在谋略思维上有着十分突出的贡献：(1) 它摒弃了战争指导上“防御就是防御”、“内线就是内线”的机械的观点，扩大了进攻与防御的思维视野；(2) 它也从根本上抓住了促使敌强我弱矛盾向有利于我方向转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以积极的进攻打破敌人的进攻，从而为我军在劣势中求优势、被动中求主动，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3、“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原则。这是趋利避害“找敌弱点、造敌弱点、打敌弱点”思想，在兵力使用上的谋略思想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是，紧紧抓住敌强我弱的矛盾，在兵力使用的集与散上认真运筹，以达到耗敌之强与集，灭敌弱与散的作战目的。对于这一原则，刘伯承曾作过多次精辟论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小的部队消耗敌大的部队，以大的部队歼灭敌弱的部队。对于强大集中之敌，不要采取“牛抵角”的战术，在阵势对我不利时，不要消极防御、拼消耗，要先拖后打、拖打结合，采取盘软了再吃的办法。对于薄弱分散之敌，要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迅速集中优势兵力，突击其指挥中枢，割破其防御配备，以求各个歼灭。如解放战争初期的平汉战役，定陶战役，鄄城战役，都是刘伯承运用这一兵力使用谋略思维原则的成功战例。战争实践表明：“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原则，完全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它抓住了革命战争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严重对立的基本矛盾，是我军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三）

刘伯承同志军事谋略辩证思维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机动灵活，通变思维。

所谓通变思维，就是辩证地看待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积极思维。通变思维的关键是变，是创新，这表现于军事谋略思维中，就是对旧有的军事理论、兵法战理，采取不拘泥、不照搬的态度，而是立足于战争实际，既继承又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创新，灵活谋胜。当然，历史上任何严肃的军事理论、兵法战理，都经过战争血与火的锻造，具有一定的真理性，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并继承吸取其精华，运用于今天的战争。但是，尊重不等于拘泥，继承也不等于一成不变，墨守成规。变是用兵的灵魂。在战争的角斗场上，善于治变者才善于制胜，是被战争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刘伯承作为我军优秀的军事家，是一位饱读兵书，军事理论造诣极深的帅才，但是他用兵一贯反对死读兵书，墨守成规，而总是提倡视情而定，见机而作，灵活运用兵法战理，因机立胜。

1、根据敌人的行动而变。刘伯承同志指挥作战，极为善于分析敌情，洞察敌人的动向，抓住敌人行动的具体情况，不拘常法，机断胜取。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七亘村"重叠设伏"，就是刘伯承同志根据敌人的具体行动通变思维、灵活用兵的突出一例。刘伯承敢于在三天之内，在同一地点连续伏击同一敌人，并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他紧紧抓住了敌人前方需要军火、粮食急如星火的敌情和日军熟悉中国古代兵法迷信教条的心理，见利不失，敢于因敌而动；第二，他没有被用兵的常法常理所局限，敢于从实际敌情出发，违反用兵的常法常理，求变思维，反常用兵，于是出奇制胜。

2、根据敌人的驻止配备而变。刘伯承同志常说："战场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②因此，他用兵十分注意对敌

人的驻止地形与配备的研究，并根据敌人的驻止配备灵活确定打法。例如襄阳战役中，刘伯承一反历来攻城先攻山的战法，决定从襄阳城西濒临汉水的狭窄地区，“刀劈三关”，拿下城西通道敌人的火力死角，直接人城。战役实践证明：我军一反历史上攻城先攻山的用兵常法，撇山攻城，“刀劈三关”、从西门突破的打法是完全正确的。它使我军从地形上避开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发挥了我军的兵力优势，使南山之敌陷于孤立。最后南山守敌不得不弃山守城，在城中被我全歼。

3、根据敌人所处战场的形势而变。战场形势变化万千，指挥员的谋略思维也要不拘常法，敌变我变，因变谋胜。刘伯承同志不仅善于不拘常法，根据敌人的具体行动，驻止配备谋局取胜，而且也善于根据敌人在战场上所处的各种变化不同的形势，不拘一格、灵活制胜。如淮海战役期间，我刘邓大军将敌黄维兵团诱至宿县以西长不足二十里，宽不足十里的双堆集地域。怎样围歼黄维兵团？一种办法是遵照古兵法“围师必阙”，网开一面，用口袋阵法诱敌于逃跑运动之中，加以歼灭。刘伯承同志在鲁西南，在大别山曾多次采用“围师必阙”的战法，获得成功。但这次刘伯承同志却认为，此时敌人的败局虽然已定，但还要垂死挣扎，积极待援。而且，由于我大兵压境，敌人必会小心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一旦放开口子，敌人就会进占一村巩固一村，不但会获得粮食，还可以加强防御。因此，刘伯承同志审时度势，决定一反常态，改变“围师必阙”的常法，采用“围师不阙”的变法，紧缩敌人于包围圈内，在饥饿消耗敌人的同时，实施阵地攻击，一口一口将敌人吃掉。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③刘伯承用兵之灵活已臻至孙子所谓的“神”的境界。

（四）

刘伯承同志军事谋略辩证思维的又一重要特征是：立足于胜，造势思维。

在军事谋略思维中，所谓造势思维，是指军事指挥员在军事斗争中调动各种战争因素，为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所进行的谋略思维。在战场上，能创造并把握有利态势者胜，不能创造或丧失有利态势者败，这是战争史的铁的规律。所以，我国古代军事家历来十分重视军队在战场的态势问题。在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极为重视军队在战场上的态势的研究。在战场上，他善于抓住每一个有利环节，认真思索，精心运筹，不断争取和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壮大发展自己，打击消灭敌人，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

1、战略造势，以“稳”求胜。在革命战争中，刘伯承表现出了杰出的战略造势才能。刘伯承同志战略造势的突出特点是：从“稳”出发，稳中求胜。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开创，就是著名的例证。1937年10月，日寇节节进犯，华北形势危机。刘伯承率部挺进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斗争。挺进敌后怎样打开局面，造成有利抗日的战略态势？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从“稳”出发，继续做了几项工作：（1）用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武装广大指战员的头脑，提高干部战士对游击战战略地位的思想认识，为立足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2）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退敌人的围攻，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打下可靠的军事斗争基础；（3）适时实行战略展开，扎根广大敌后，为形成敌后抗战的有利态势奠定根据地基础；（4）全力发动群众，组织广泛的抗日武装，为坚持敌后抗战打下了稳固的人心、人力和兵力基础。由于上述工作的顺利开展，使抗日武装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造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有利抗日的战略态势，开创了华北抗日斗争的崭新局面。

2、战术行动，“势险节短”。孙子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势也”，④认为军队作战一定要造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险节短”的有利布势。无数战争实践表明，战术行动的打击力与军队的具体作战布势有利与否成正比。因此，在战争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们在战场上，总力图造成战术行动的“势险节短”的有利布势，战胜敌人。刘伯承在指挥作战时，极为善于制造“势险节短”的有利布势，出奇胜敌。抗日战争著名的神头岭战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次战斗，刘伯承用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以一个营的兵力作箝制部队，奇袭日军的重要兵站集结地黎城，吸引潞城守敌来援，而以三个团的兵力作主攻部队，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而设伏，伏击援敌。为保证战斗的战术布势“势险节短”，这次战斗所选择的设伏地区的地形非常复杂，敌技术兵器难以施展，骑兵难以机动，步兵不易展开。而我伏击部队就利用公路边敌人见惯了的国民党军遗弃的旧工事，隐蔽配置在距公路最近20米，最远百来米的公路两侧。这样的地形选择与兵力布势都十分险恶，有利于部队的强力快速攻击，保证了战斗过程的短促干脆。整个战斗，其势之险、其节之短，令人叹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伯承所指挥的众多战役、战斗，都表现出“势险节短”的鲜明特色。如抗日战争的七亘村、香城固等战斗，解放战争的定陶、鄄城、高山堡、洛阳等战役，都是刘伯承同志精心运筹的“势险节短”的成功之作，是他用兵如神的真实写照。

注　释

①②《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第306、第200页。

③《孙子兵法·计篇》。

④《孙子兵法·势篇》。



杰出的指挥　辉煌的战绩
——忆刘伯承司令员在上党战役中的指挥艺术

陈再道

刘伯承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他戎马征战大半个世纪，闻名于世，战绩累累。他文韬武略，智谋过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东征西战，威震敌胆，被誉为中国近代的"孙吴"、"常胜将军"，名副其实。我有幸在刘帅领导和指挥下战斗过多年，受益颇丰，感受深切。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上党战役，是刘伯承同志军事指挥艺术的缩影。在纪念刘司令员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作为参加上党战役的亲历者，把这段历史追忆下来，一是表达对老司令员刘帅的缅怀，二供从事军事方面工作的同志学习和研究刘帅的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指导和探讨未来战争有所借鉴。

延安请战，重返太行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掠夺人民抗日胜利果实，采取反革命欺骗的手段，一面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一面派兵向我解放区进犯，抢占战略要地。8月15日，阎锡山命令19军军长史泽波率19军和61军等5个师及杂牌武装17000多人，从临汾、浮山、翼城向我晋东南上党地区进犯，先后抢占了长治及周围的襄垣、潞城、长子、屯留、壶关等县城。当时我们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气坏了。我和陈赓、陈锡联等同志找到奉军委、毛主席召集来延安商讨对策的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要求尽快回去，打击

这些强盗。二位首长说军委正在开会，让我们作好回太行的准备。8 月 15 日，我们接到通知后，随刘邓首长乘飞机返回太行。

明确任务，准备迎战

刘司令员打仗，重视调查研究，知情有数，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每战之前，他都要认真领会上级意图，对本级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进行全面了解，反复研究，准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并把这五要素称为"五行"，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自己做得好，也要求下级指挥员做到。回到太行，刘司令员、邓政委不顾途中劳顿，即来到司令部了解情况，召集我们开会，研究部署作战问题。当时的情况比较严重。从整个战局看，蒋介石令第 10 战区李品仙部 3 个军正向徐州开进，准备沿津蒲路北犯；令第 11 战区孙连仲部 3 个军正向郑州、新乡集结，准备沿平汉线北进；令第 12 战区傅作义部占我归绥、集宁两城后，又向察哈尔进犯；令第 1 战区胡宗南部发兵北渡黄河，沿同蒲路、正太路向石家庄开进；阎锡山部队乘机占我上党地区。蒋介石这样调兵抢占解放区和战略要地，显然是在为制造内战作准备，并以此迫使我党中央、毛主席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从局部看，阎锡山妄想以一把刀子插入上党，分割我太行、太岳、冀南根据地，然后把主力逼到山区消灭。

刘司令员指示说：我们的任务是阻止同蒲、平汉两线敌人向北开进，特别是平汉线。因为安阳以北的广大地区大部分是我们的解放区。但上党敌人不消灭，在平汉线打起来，就会腹背受敌。故决心先打侵犯我上党地区之敌，解除后顾之忧。决定集中太岳、太行和冀南部队的主力打好这一仗。你们"三陈"都在这里；陈赓为太岳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为太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为冀南纵队司令员，你们马上回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接着，邓小平政

委又强调了打好此役的重大意义。邓政委说：为戳穿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阴谋，配合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我们必须坚决打胜这一仗，对进犯之敌要狠狠地打，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他们，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受领任务后，我们当即返回部队，根据刘邓首长的决定和部署，开始着手筹划攻打上党战役的准备工作。

先扫外围，孤敌长治

刘邓首长在对上党地区之敌全面了解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作出先扫清长治外围分散之敌，然后再攻打长治敌主力的决定和部署。9月7日，刘邓首长下达了关于上党战役的第1号命令。接着，又召集我们进行详细部署。刘司令员说：根据上党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我们先打长治外围的各个敌占城镇，待长治之敌出援时，于野外歼灭之；敌不出援，我们打掉外围各个大小据点后，再全力攻长治城。

会后，攻打屯（留）、壶（关）、长（子）、潞（城）战斗开始。太行纵队攻克襄垣之后，挥师南下，于9月9日将屯留城团团包围。9月10日凌晨，太行纵队主力向屯留城发起攻击，另以两个团的兵力攻打壶关。刘邓首长令我冀南纵队部署在屯留、长治公路之间的崔邵村、禄村一带，准备打击由长治增援屯留之敌。11日上午，长治之敌6千余人两次向屯留增援，均被我击退。夜里，屯留、壶关城被我太行纵队攻占，全歼守敌。出援之敌闻风向长治逃窜，被我截歼一部。13日，太岳纵队攻击长子，我冀南纵队和太行纵队奉命打援。我率部进抵长治、长子之间的师庄、张祖村地区，准备打击由长治增援长子之敌。我告诉部队发现援敌后不要开枪，待其进至我预伏地带，断其退路后再实施攻击。等了两天两夜，也不见长治之敌出援。我心里想，史泽波真是学乖了。敌人不出来，打不上仗，指战员们很着急。有的团长向我说：陈

司令，人家打得挺热火，我们在这里等到何时，要向上级反映一下。我说：少罗嗦，听指挥。其实我当时比他们还着急。我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5日，刘邓首长令我冀南纵队攻击潞城县城，防止敌人向长治逃跑。我率部迅速进至潞城城外。我与其他几位领导研究部署了攻城方案，明确了各团的任务，经准备，于16日凌晨向潞城之敌发起进攻。经激战，于17日晨将守城之敌全歼。

我们攻克潞城后，刘伯承司令员来到潞城，在东关小有休息后，就要看望冀南攻城部队，我把部队集合起来。刘司令员来到集合场上，此时人山人海，欢声雷动。刘司令大声喊道：同志们打得好，辛苦了！他又走近部队，看看战士们的枪、手榴弹，摸摸战士身上穿的土布军装，和战士们亲切交谈，最后又说了些鼓励的话。离开时，刘司令员对我们几个纵队领导说：战士们身穿土布军衣，手拿简单武器，能迅速登上城墙，攻下守城，真令人感动。有这样的战士，不论什么样的敌人我们都能战胜它。刘司令员在繁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部队，使冀南部队全体官兵很受感动，深受鼓舞。

至9月19日，长治外围据点全部被我参战部队占领，共歼敌7千多人，阎军2纵队司令员白映蟾、壶关县县长李洲、潞城县县长刘元，日伪屯留县警备队长常建有等均被我活捉。到此，长治守敌完全陷入孤立待歼之下。此战证明，刘司令员放着长治敌主力不打，先消灭长治外围分散弱小之敌，尔后再围打固守长治集中强大之敌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围攻长治，北上打援

在长治外围之敌即将扫清的同时，刘邓首长围打长治敌主力的部署又已成竹在胸了。长治外围城市攻克后，刘邓首长发布了作战第5号命令，指出我已完成上党战役的初步任务，攻占长治

外围附近所有据点，消灭上党地区敌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我决心以勇猛顽强的作战行动夺取长治城，最后消灭侵入上党地区之敌。

刘邓首长攻打长治守敌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任务是：太行纵队从西南方向攻击；太岳纵队主力从西北方向攻击；我们冀南纵队从东南方向攻击，东北面虚留一个缺口，守敌突围只能向北突，待其突出城垣时，于野外歼灭之。刘邓首长命令我们要先夺关，后攻城。

长治，是古代上党郡的首府。日军占领时成为设防的重点城镇之一。城墙高三丈多，护城河较深，街巷纵横，工事坚固。史泽波率万余人驻守后，又加修了原来的工事，易守难攻。9月20日，各路大军向长治发起攻击，经数日激战，太行、太岳部队分别攻占西关和北关，我们冀南部队攻占五马村和东关一部分。敌我形成僵持状态，用刘司令员的话说叫“牛抵角”。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季节，战士们修筑工事都很吃力。敌人又不断反扑，看来，史泽波是要死守长治了。为此，攻城部队只能冒雨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用炸药爆破。

9月27日，得到指挥部敌情通报：阎锡山3个师7千余人为增援长治，今天到达沁州，正沿白晋路前进。于是，刘邓首长当即改变决心，变攻城为打援。命令陈赓、陈锡联率太岳、太行主力北上打援。令我指挥冀南部队和太行、太岳其它围城部队继续佯攻长治城。我命令冀南部队的1团、25团和潞城独立团继续从东南和东北方向向长治攻击；太岳李成芳指挥的决1旅从西北方向向长治攻击；石志本等支队从西南面向长治攻击。并令11团、22团、23团进抵长治北鹿家庄、大辛庄、化家庄一带，准备打击由长治出城接应之敌。

我围城部队继续向长治展开猛烈攻击。守敌史泽波怕我们攻进城里，将他的部队全歼，反复电催援兵尽快南下。由于刘邓首长变更部署进行的隐秘、巧妙，史泽波没有看出一点破绽。史泽

波中计了。他得知援兵快到，固守的劲头更足了。我们围城各部队均伪装成主力，向“四关”展开轮番攻击，同时，也希望长治的敌人能出来接应援敌，以利我们在野外歼灭它。有时我们停止攻击，诱敌外出，但史泽波就是不出来。10月2日，南援之敌被我太行、太岳主力和17师等部队包围于老爷岭、磨盘垴至榆林地区。敌扼守在磨盘山、五赞山和老爷山等制高点，企图利用险要地形与我军决战，将我军歼灭后，再圆南援长治之美梦。这时，我们才弄清楚援敌不是3个师7千余人，而是由阎锡山的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23军、83军和省防军等8个师，附炮兵两个团，共两万多人。我们参战部队人数和敌人差不多。为全歼援敌，刘邓首长再次变更部署，又令我们冀南纵队和太岳决1旅迅速北上，参加打援。并让我们白天行军。我让留下的部队继续监视长治之敌，就率冀南纵队和决1旅一起离开长治城外，浩浩荡荡向北开进。敌人在城墙上都能看清我们的行军行列。

出发时，李成芳同志问我，为什么白天行军，不怕暴露目标吗？我当时无法解释清楚。我们几个人分析，刘邓首长要求我们白天行军这个“示形”动作，可能意义重大，不然不会下这个决心。一是故意做给史泽波看，史泽波看到我们撤退了，可能以为我们怕援兵到后遭受夹击，这样他固守长治的劲头会更足；二是加速北面援敌的动摇，敌人看到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会心惊肉跳，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再者，我们白天行军路好走，看得清，不会有掉队的，可全部尽快投入战场。当时和后来虽然没有更详细更深入地去考证和探究它，但刘司令员要我们白天行军这个“示形”动作，确实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

我率部按刘邓首长的指示进至磨盘垴东南上莲、贺家岭一带。立即向刘司令员报告了长治方面的情况，并请求明确任务，尽快投入战斗。刘司令员在电话里对我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垴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

人的卵子。并说，援敌已陷入我四面包围，总攻时机要到了，你们尽快准备好出击。

受领任务后，我和杜义德、孙庆德同志进行了研究，决定5个团同时向北猛攻。其中22团、25团各一部协同太行纵队一部从磨盘垴往下打，其它各团沿山沟向北插。5日黄昏，我总攻开始，顿时枪炮声震撼山谷，杜义德、孔庆德率先头团从老爷岭、磨盘垴之间向北冲去。在我各路大军的强大攻势下，老爷岭敌人不得不放弃主峰，向北逃窜，老爷岭即被太岳部队占领。与此同时，太行部队在磨盘垴也挫败了敌人。冀南部队也达到了掏敌卵子的目的。敌援军见势不妙，即决定放弃打援计划，企图北逃。刘邓首长指挥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各路大军，从左、右、后围拢敌人，将敌人装进口袋，然后一鼓作气，将援敌全歼。这次战斗，除两千多敌人逃往沁县外，其余两万多人全部被歼。敌援军总指挥彭毓斌被我击毙；副总指挥兼炮兵司令胡三余、46师师长郭溶、49师师长张宏、66师师长李佩膺被我军活捉。

这时，我们才深深地感到刘邓首长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灵活果断地变攻城为打援，实在是高明漂亮的一步好棋。如果刘邓首长不洞察全局，权衡利弊，置南援之敌于不顾，仍按既定决心指挥部队攻打长治守敌，待援敌一到，我攻城部队就会前后受到夹击，被迫撤出战斗，上党战役难有如此好的结局，整个形势也将对我不利。

解放长治，歼敌桃川

增援长治之敌被歼后，史泽波固守待援的美梦完全破灭了。10月8日黄昏，他趁大雨浓雾，率万余部队偷偷弃城向西逃窜，企图逃回临汾。12日，当逃至桃川地区，被我太岳部队主力和太行部队一部全歼。19军军长史泽波、68师师长郭天辛、37师师长杨文彩等被我军活捉。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

灭阎军13个师38000多人，俘敌副指挥胡三余以下将级军官27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正当上党战役接近尾声，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发表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毛主席安然回到延安。毛主席回到延安后，于10月17日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报告中谈到了上党战役，给予精辟论述和高度评价。毛主席说："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特别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盘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部队共计3万8千人，我们出动3万1千人，他们3万8千人被消灭了3万5千，逃掉两千，散掉1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一次著名的歼灭战。它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于，给玩弄假和谈真内战阴谋，妄图掠夺人民抗日胜利果实的蒋介石以迎头痛击，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密切配合了重庆谈判的顺利进行，保证了毛主席和其他谈判成员的安全。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战役加速了蒋介石军事集团的动摇和分化，为我人民解放军打击和瓦解蒋军，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伯承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论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主要特色

邢世忠　少将

指挥艺术是建立在科学与经验基础之上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指挥方式和方法。它集科学性和经验性于一身，具有超常性、灵活性、多变性等特点。刘帅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充分地展现了他独特的指挥艺术和风格。认真探求其指挥艺术的特色，对于认真贯彻十四大提出的军队建设方针、原则，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军作战指挥理论，深入研究现代作战指挥规律，全面提高各级领率机关和高级干部的战略决策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认为，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着眼关节点，精心的关照战略全局

战略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战争胜败的重大问题，因而历来被军事家所重视。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刘帅不仅善于关照战略全局，而且把关照战略全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能左右整个战局的"命门"穴位，亦即对战略、战役和战斗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节点上。他认为：关照全局是在于驾驭战争，而把握关节点则是抓住主要矛盾，加速和推进作战进程，实现预定目的。二者既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全局关照好了，就能把战争的"一盘棋"走活；抓住了全局中的关节点，就能够形成作战指挥的重心，走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他常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古语教育各级指挥员要学会抓住对全局有决定作用或有重大影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真

正把指挥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问题上。由于每次作战的目的、时机、地点、对象不同，其关节点不尽相同。并且，由于行动的规模、性质和所处的地位不同，战略、战役、战术之间的关节点也可能各不相同，甚至一次战役的不同阶段也可能有不同的关节点。刘帅对这些方面都把握得很好，能在纷繁复杂的军事行动中，根据不同情况，抓住影响全局的关节点，迅速作出抉择。

首先，在战略全局上，他作为战区指挥员，总能结合战区实际坚定不移地贯彻军委意图，并就一些事关战争全局的关键问题适时向军委献计献策，为扭转战争形势乃至夺取战争胜利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抗日战争初期，刘帅组织太行军民战略思想转变就是一例。1937 年底，面对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占主要地位的情况，刘帅敏锐地看到，用战略方针武装广大指战员的头脑，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上来，不仅关系到战略思想的统一和军事素质的提高，而且关系到对敌斗争的成败。于是，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广泛开展游击战的同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了部队战略战术思想上的转变。并及时总结和推广了袭击、破路、劫车、断敌交通、麻雀战等极为丰富的游击战作战经验，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最为典型的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胜利实施战略上中央突破的伟大壮举。解放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之后，他和邓小平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战略全局的利益出发，不辞艰辛，率部于 1947 年 6 月底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经过激烈战斗和千里跋涉，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歼灭了大量敌人，胜利地跃进到大别山，在远离后方条件下，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使部队站住了脚根，争取了毛泽东同志估计的三种前途中最好的一种前途的实现，在蒋介石卧榻之侧开辟了前进战场，

牵制了国民党军向我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力量，威胁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腹地安全，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党中央“逐鹿中原”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地扭转了整个战局。

其次，他善于抓住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役的关节点。刘帅在军事指挥生涯中，亲自组织指挥的重大战役有50多例，可以说每例都体现着他关照战略全局，着眼关节点的光辉思想。上党战役中，面对蒋介石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一面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面密令阎锡山向我上党地区大举进犯，同时暗中调集大军北进，妄图把我军消灭于上党地区的严峻形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把作战指挥的关节点选择在活用战法上，经过夺城打援、围城打援、消灭突围逃窜之敌三个步骤，全歼侵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队13个师。接着，又在邯郸以南地区进行了平汉战役，此次战役的关节点，主要是利用国民党军队嫡系与“杂牌”之间的矛盾，始终对准敌“杂牌”第40军第106师实施重点打击，并由此打开缺口，为我军大量歼敌创造了条件，使整个战役全歼了北犯的国民党两个军，争取了一个军起义。这两次战役的辉煌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北进计划，完成了战略掩护任务，开创了我军由分散的游击战向大规模运动战转变的新局面，有力地配合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迫使国民党签定了《双十协定》。事后，毛泽东同志对上党、平汉战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刘帅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还适时地向军委提出了切断徐蚌铁路的建议，并抓住了以中野部队攻占宿县这一关节点，在战役第二阶段又采取了不打徐州东援之敌而打黄维兵团之举，对整个战役的顺利实施和获得全胜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再次，他在战术运用方面也充分体现了着眼全局，抓住关节点的思想。刘帅曾经指出：“大的方向有大的重点，次要方向有次要重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不仅善于抓战略和战役的关节点，而且也十分关注战术关节点的把握。抗日战争初期，刘帅亲自组织的阳明堡袭击战、神头岭伏击战、长乐村急袭战等一系列著名

战斗都有不同的战术关节点。如，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战术关节点就在于巧妙地利用了地形，打了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歼灭战。日军步兵还未及展开，骑兵还没有上马，炮也没有架起，就被我全歼。又如，阳明堡袭击战，它的战术关节点，主要在战法上采取了夜间袭击战，乘敌疏于戒备，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二、注重机动作战，实现强弱转换

机动作战是我军为争取主动或形成对敌有利的态势，有组织地迅速移动兵力创造和捕捉战机的有效形式。刘帅身经百战，屡克强敌，重要一着就是依靠出色的机动，扬我之长，避敌之长；护我之短，击敌之短；趋利避害。他认为："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是弱军战胜强军之道，争取主动和自由的重要途径，以劣胜优的必由之路。脚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机动的本质是歼灭敌人，机动的主要形式是大踏步的进退"。他还说："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

从这个总的战术思想出发，刘帅对我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法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因此，游击战是"大游大击，中游中击，小游小击。"运动战也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他在分析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强点与弱点之后指出："游击队要发扬宽大的灵活性，以突然的袭击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捕捉为避害。正规部队则以发扬其运动的威力，主动进攻与消灭敌人为趋利避害的机动，来改变敌我态势，掌握战役战斗的主动权。"所以，刘帅经常要求部队"不要怕行军，行军也是战术"。他机动作战的基本思想就是：大踏步前进与后退，把敌人调动起来打，反对打死仗，打笨仗，反对"牛抵角"战术，主张把战争一盘棋走活。通过大踏步进退，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迫使敌

人仓促改变自己的部署，或来不及改变部署，从而改变敌我之间的态势，以便在运动中寻求歼敌的战机；善于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以勇猛、果敢的行动，突入敌人纵深，插向敌人后方，进行大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达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目的；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怕打破家里的坛坛罐罐，“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乃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他还认为，退却不是消极被动的撤退，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前进，另一个方向上的前进，是为了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的一种机动形式。

刘帅以其注重机动作战，实现弱强转换的重要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创造了一个个以弱胜强的奇迹。这方面的典型战例很多。其中，打破“邯郸梦”、三出陇海线作战，刘帅认为基本上是机动作战，都是在机动中歼灭敌人的。一破邯郸梦之后，中野大踏步前进，一出陇海线，取得了陇海战役的胜利，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在内线作战，取得了定陶战役、鄄南战役、滑县战役的胜利；二破邯郸梦后，中野转入待机位置休整，接着又向徐州西北部大踏步前进，与华东野战军配合造成钳击徐州的战略态势，调动了敌人，取得了巨金野战役的胜利，打破蒋介石的邯郸梦。最后由豫北向鲁西南地区大踏步前进，突破黄河天险，取得了鲁西南战役胜利。从此我军由内线作战转入了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他就是用这样的机动作战，大踏步地进退，成功地粉碎了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成批轮番地向我进攻的阴谋。

三、把握“五行”要素，灵活确定战法

战法是组织指挥作战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情况下作战，重视对战法的研究和运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刘帅创造战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巧用“五行术”，把对作战行动最有影响的五个要素，即任务、敌情、我

情、地形、时间作全盘考察。他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只有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这五个方面的情况，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才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刘帅认为："五行"中任务是中心，只有围绕着总的决心意图，来考虑研究其它四个因素，才是生动具体而有实际意义的。敌情是重点，是前提。"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我情是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观条件，熟知所属部队的长处和短处，才能正确地使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地形和时间，是敌我双方交战的特定客观环境和赖以制胜的重要条件。这五个基本要素，有动有静，有主有次，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且是发展变化的。他要求各级指挥员，对"五行"不仅要一般地知道，而且要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全面辩证地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进而实施有效的指挥。

刘帅特别强调要注重了解和掌握敌情。他常说，打仗弄不清敌情，就是"狗戴砂锅乱碰"。在刘帅军事著作中，不论那一次作战的指示、报告和总结，开头都是讲敌情，而且分析得非常详细，非常精粹，对敌人的众寡虚实、动静态势，研究得很透彻。主要体现在四个环节：一曰势，即从整个战略战役态势上进行分析。因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情况下，为某种战略战役目的而形成的布势，反映着敌人作战企图和下步作战行动。透过敌人在战场上的态势，可揭示敌人行动企图和目的，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行动，计划我军的作战。二曰量，即从数量和质量上进行分析。通过量与质的分析，考察敌之作战能力，计算敌我力量对比；预见战场可能出现的形势。三曰术，即从战术上进行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要求我军干部把日本作战条令当作第二种教材，从中研究出战胜敌人的方略。四曰变，即分析敌人态势和战场形势的可能变化，加强预见性。由于刘帅对敌情分析透彻，所以，他对付敌人的那些妙计，总是连连得手。如抗日战争反摩擦斗争中，为了摸清顽军

的情况，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走访了国民党将领朱怀冰、鹿钟麟、张东凯、路厚斋等人，进行了广泛地交往和调查，了解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背景。特别重视对敌主官出身、地位、个性、派系和作战特点，以及当面敌企图、兵力、部署、装备和行动规律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对象，制定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使反摩擦斗争取得了对我更加有利的形势。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纵横于敌重兵集团之间，行动自如，打这个军时那个军援救不及，消灭那个兵团时这个兵团不肯来救，其中奥妙，就是刘帅摸透了敌人的脾气，掌握了他们的作战规律，巧妙地利用了敌之派系矛盾的结果。

刘帅还非常重视研究地形，巧妙地利用地形。他严格要求各级指挥员，战前一定要认真侦察地形，不能单纯看历史文字记载。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每战之前，都要亲自勘察地形，精心选择战场，对每条道路，每条河流，甚至每个山头，都要仔细研究，其周密程度，为一般人所不及。因而常常能借助地形这个客观条件扬长避短，以弱胜强。在刘帅的指挥生涯中，不乏巧妙利用地形，出奇制胜的故事。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就是一例。那个地方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从岭上通过。当时有的同志认为不便于部队展开，而刘帅却认为这是个好战场。他指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上的利弊，有时成为反比，因为我们的兵力尚且不便机动，敌人的技术兵种就更难施展其长。"经过刘帅的巧妙设伏和部队的勇敢作战，日军1500多人被我消灭。解放战争时期的平汉战役，是抓住了国民党正规军大规模行动离不开铁路的弱点，事先在漳河与滏阳河的河套地带，组织军民大举破路、平沟和拆毁日伪遗留的城墙、围寨、碉堡，以肃清障碍，便于我军进行运动战，同时派遣干部布置情报点线和侦察地形，准备了有利的战场条件，从而保障了战役的胜利。尤为难得的是，刘帅善于通观整个战区的地理态势，对战略态势作出正确判断，真可谓袖里乾坤，胸有成竹。解放战争中，他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粟野

战军会师后的战略企图，曾描绘为依托三山，控制四河，逐鹿中原。寥寥数语，就使人们对一个战区广大战场的地形和作战任务，了然在目。这些都充分说明刘帅通晓地理，熟悉战场，驾驭战争的深厚功力，并成为他指挥风格中的一大特色。

总之，刘帅认为："战争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不能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观察、处理复杂的战争现象"。他说："战争的实际是有联系的，运动的，可以判断和预见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永恒不变的，不可以判断和预见的。但是战争或战斗的双方使用成群的武装着的人互相推移，而且互相保守秘密的缘故，这就与处置静物和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作战指挥上，要反对一成不变，墨守陈规，提倡视情而定，见机而作，灵活应变。刘帅针对不同的敌情，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地形，甚至在一个战役或战斗过程中，也有因情况变化而改变战法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七亘村战斗，采用的"重叠待伏"；上党战役和巨（野）金（乡）鱼（台）战役，是"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平汉战役首先采用了"猫盘老鼠"的战法，先把它盘软，然后再把它吃掉；定陶战役则采取攻其一点，再及其余，把进攻发展为追击，把战斗的胜利发展为战役的胜利。鄄南战役和高山铺战役都是"先施拖刀计，后来回马枪"；滑县战役用的是"猛虎掏心"，对鲁西南战役采用"攻其一点，吸其全来，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对敌人力图首尾照应的蛇阵，则采取"挟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的战法。战法的又一个特点是：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其目的是拿我们弱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强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强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弱的部队；拿我们分散的部队去消灭敌人集结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集结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分散的部队。他把这个原则做了一个极形象的比喻："在次等方向上用一个人去扭打三个敌人，同时就能在主要方向上抽得三个人来痛打一个敌人，求得在总体上胜利的展

开。”刘帅指挥作战的灵活性，是建立在对敌情和战场情况的透彻了解基础之上的、作战指挥向来是随机应变，敌变我变，不拘原案。

四、运用“综合群力”，奠定指挥基础

指挥是军队指挥员及其机关，对所属部队的作战和其他军事行动进行的特殊的组织活动，是战斗力诸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种因素，没有它，其它战斗力的作用就难以发挥。所以它是作战潜力转变为实际作战能力的关键，然而，正如刘帅所说的那样：“指挥是有条件的，指挥没有可靠的支助是无法打仗的，同样没有一个好的司令部和科学的编制体制将会失去指挥的意义和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视把指挥建立在“综合群力”基础之上。

其一，重视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训练有素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刘帅最相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伟大真理。他无论何时作战都把组织民兵、地方军、野战军三种武装力量，在统一指挥下发挥各自的作用，作为指挥的重要内容来解决。从而使我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即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及民兵、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得到了有机结合，互相配合，形成了整体威力，形成了对敌作战的主动性和高度灵活性。其二，重视组织对敌的全力战。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讲到我军的作战问题时指出：要使劳动力与战斗力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战，以使敌人顾此失彼。全力战即以军事为轴心，配合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战。详细说来，我们在武装斗争中，要同时在政治上瓦解敌人，先使敌人从伪军中孤立起来。要同时实行抗日的经济政策，摧毁敌人“以战养战”的设施，并使抗战军民的经济富裕起来，还要在文化建设上，提高抗战军民的自信心、自

尊心，尤其是斗争性与顽强性，并揭穿敌人的奴化欺骗。这样的全力战，不仅军队本身要结合一体进行，而且要结合党、政、民有机地配合进行。单纯的军事观点与轻视武装斗争的作用，都是不容许的。只有组织一切生动力量，进行全面战与全力战，才能打破敌人的总力战，使敌人孤立与僵卧于点线上，如其出来扫荡，将到处碰壁扑空；如其驻止守备，则受到广大抗战军民的严密封锁与交通破毁的打击。实践证明，这样做，在政治上，就使敌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军事上，就使敌军处处遇到抵抗，处处分散和消耗兵力，便于我军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在经济上，就可以破坏敌方经济的发展，造成我军物质供应的可靠来源；在文化上，就可以暴露敌人，教育和团结人民。一句话，就使敌人陷入我全面打击之中，这就形成了"陷敌于灭项之灾的汪洋大海"。尤其是刘帅指挥的一系列交通斗争，非常有效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斩断了敌人大小运兵线、兵站，摧毁其"扫荡"基地，在政治上砸烂了日军的"柱子（铁路）、链子（公路）、锁子（据点）"，粉碎了其"囚笼政策"，在经济上切断了日军的大小"血管"和"淋巴腺"，打击了其殖民主义的经济命脉，在文化思想方面斩断了日军大小"毒水管"、"放毒器"，消除了日军的奴化教育，进而达到了以各种形式、手段打击和消灭敌人之目的。其三，注重建立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和具有头脑作用的领率机关。刘帅认为："编制是军队指挥的基础，根据不同的战争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是从根本上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同时，建立一个精明强干的指挥机关——司令部，对部队的建设和作战有着重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指挥效能的充分发挥。"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始终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随时把握指挥要素的每一关节，建立相应体制，不断打牢指挥基础。如，抗日战争时期，刘帅根据中央的作战意图，为使部队适应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需要，适时地进行了本战区的编制调整，进而从体制上解决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问题。又如，解放战争时期，刘帅针

对我军的作战任务，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到以运动战为主的客观实际，结合我军武器装备不断发展的情况，将各军区整编组成了野战兵团，使我军的编制体制更加科学，并逐步趋于正规，从而保证了我军作战的胜利。刘帅认为，"建立一个精明强干的司令机关，对部队的建设和作战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无论是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还是129师师长，都十分重视司令部的建设。他的有关司令部建设的论述，对我军建立与战争相适应的司令部机关，保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和统一的纪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善于发挥参谋长在训练和作战中的领导作用。他说，一个部队战斗力的高低，有没有一个精明的参谋长是重要因素，要求参谋长要善于以主要精力抓好部队战斗力的建设，不断提高组织指挥能力和工作效率。他还十分重视参谋人员的培养和使用，并十分注重全面提高司令机关人员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水平。

刘伯承指挥艺术与现代作战

王厚卿　少将

一代战将百世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刘伯承元帅戎马一生，历经百战，在中国革命战争舞台上导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展示了高超而又独具特色的指挥艺术，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今天，我们悉心学习研究刘帅的指挥艺术，对于提高各级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和组织指挥现代作战的能力，更好地完成党的十四大赋予我军的历史使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帅的指挥艺术恢弘精深，这里，我仅就其中的几个要点，并联系现代作战的实际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善察"五行"　知彼知己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能驾驭战争进程发展变化并使之到达胜利彼岸的军事家，无不重视对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的掌握和分析。孙子有句千古名言，叫作"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泽东高度评价此乃"科学的真理"，并指出，要成为智勇双全的将军，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①刘伯承就是透彻地掌握了这一科学方法，并将其艺术地展现于自己指挥实践中的一代典范。他举历代兵法之要，并结合自身丰富的战争经验，把对作战最有影响的5个要素，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作"五行"。他说，这是打仗下决心的基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5个基本要素，有动有静，有主有次，是一个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有机整体。"五行"中，任务，是中心，是目的；敌情，

是重点，是前提；我情，是同敌人作战的主观条件；地形和时间，是敌我双方交战的特定客观环境和重要因素。熟知“五行”，就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上知下，把战争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很好地符合起来。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指挥领域的生动体现，也是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精要所在。

刘伯承的“五行术”，最讲究的基本功是侦察。他指出：“侦察是战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侦察或侦察不详，就象：狗戴砂锅乱碰一阵”。②在几十年战争生涯中，刘伯承之所以能料敌如神，指挥若定，用兵自如，高招迭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注重侦察，精于“先知”（即预先知晓与战事有关的各方面情况）之道。

刘伯承强调指挥员要尽可能地亲临第一线，身体力行，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作为指挥作战的直接依据。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率部转战太行，在行军途中或宿营之后，他常同村干部、农民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积累有关当地社会、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民俗等资料。说起太行山的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河流、每一个较大的村庄，他都如数家珍，非常熟悉。1938 年 3 月打神头岭伏击战之前，他为验证国民党军队绘制的地图的精确性，亲自到神头岭实地勘察，发现由潞城到黎城的公路是蜿蜒地爬到岭上通过的，而地图上却标着从岭下而过。他纠正了地图上的错误，按实地勘察的结果选择最有利的伏击地形，保证了战斗的胜利。1947 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通过数十里黄泛区时，刘伯承指派参谋长李达带情报处长亲自在前面侦察，为部队开路。过淮河时，他亲乘小船到河面上用竹竿探测水深，掌握了河水昼夜涨落的规律，决定除少数部队乘仅有的少量竹筏渡河外，大部队趁河水下落时徒涉过河，从而克服了缺少渡河工具的困难，很快渡过了淮河，为甩掉敌人尾追赢得了宝贵时间。

刘伯承还十分重视广泛地运用多样化的手段，全面地掌握敌情及其他与作战有关的情况。不论是“土手段”，还是“洋手段”，

在他手中都得到充分的运用，发挥出很大的功效。他在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时，其所属部队、军区、军分区各级均建立了情报系统，包括便衣和打入敌内部的地下侦察员。敌军一有异动，情报便很快传送到他的司令部。他指示部队要将缴获的敌军文件、资料、报刊，片纸只字，一概及时上交，供他本人和参谋长及有关人员分析研究。解放战争初期，他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情报部门，利用美军观察组留在太行军区的电台，截获了周围国民党军几乎所有的往来电报。由于国民党军不知我军有此先进的电台，大都使用明码，甚至直接用口语对讲。刘伯承每天都研究这些电报，准确地掌握了国民党军旅以上部队的番号、驻地、兵力、装备、主官姓名、调动路线和时间，为制定平汉、定陶、鲁西南等战役的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准备渡江战役时，他派人到上海搜集长江水文、地貌、码头和江防工事的资料。恰在此时，南京地下党送来一份长江水文地质图，但上面都是专业符号，刘伯承即派人奔赴开封，找水文工程师把符号改成文字，然后用石印机复制数十份，发给部队指挥员参阅。他还指示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以望远镜（夜间则听音响）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之基础。这种观察的侦察与战斗的侦察结合起来，作用更大。渡江的步、炮、工兵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③由于采取各种手段，透彻地掌握了情况，渡江战役发起后，仅一天一夜就顺利地突破了长江天险。

刘伯承不仅在组织侦察、搜集情报方面花费了超乎寻常的功夫，而且在对情报作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判断方面，也表现出超乎寻常、慧眼独具的深厚功力。1942 年夏，日军以数万精兵，对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发动大"扫荡"。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的电台都截获了日军的一些明码电报，呼叫要打东打西，打南打北，就是不说要

打我总部驻地麻田和师部驻地赤岸。这便引起了刘伯承的怀疑：日军是不是在搞声东击西的把戏？这时，一名战士在庄稼地里拾到日军飞机投下的一支通信筒，里面装着一份日文作战命令，附图上标绘着 16 路进攻箭头，都指向麻田、赤岸一带。刘伯承和司令部的同志反复研究，初步判定日军飞机是误投，通信筒里的内容是真实的，而明码电报的内容则是假的。为了证实这个判断，刘伯承指示部队尽快在交通要道上捕捉日军通信兵。果然，在一名被俘的敌通信兵身上搜出了一份和日机投下的内容完全一致的命令。尔后，刘伯承又根据各情报站送来的情报，准确地掌握了各路日军出动的时间，并精确地计算出其到达麻田、赤岸的时间，据此确定了我突围的时间和方向。由于刘伯承算度精确，一二九师师部直属队千余人及时趁夜暗从距敌仅数十米的山间小路安全跳出了日军的合围圈。接着，刘伯承指挥部队伏击、追击扑空后返回的疲惫之敌，袭击敌后方，迫敌退兵回援，从而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攻势。毛泽东说过："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④这正是刘伯承一部部作战指挥杰作的生动写照。

刘伯承的善察"五行"，知彼知己，揭示了战争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制胜之道，也为我们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作战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遵循。虽然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环境、对象、方式和手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战指挥的基本要素，仍没有离开刘伯承所概括的"五行"，知彼知己仍然是一切作战行动的前提和依据。现代作战具有突发性、立体性、快速性、多变性和技术性等特点，战场上的情报信息量急剧增长并高度密集，加之作战双方均采用现代化手段展开激烈的侦察与反侦察、干扰与反干扰、摧毁与反摧毁，以及破密与保密的斗争，对指挥员了解和掌握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之，各级指挥员更应在学习、掌握刘伯承的"五行术"和"先知"之道上下一

番硬功夫。要象刘伯承那样，把对敌我情况的透彻了解放在作战指挥的首要位置上。平时就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根据未来作战的任务、可能面临的对手，以及可能展开作战行动的地域（包括海域、空域），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文化、地理、气象等方面，全方位地搜集、积累、储存和分析与未来作战有关的信息资料，并不间断地跟踪、捕捉最新的动态，为未来作战提供情报保障。在侦察手段的运用上，应象刘伯承那样，无所不用，广开情报信息的来源渠道。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发展和利用先进的技术侦察手段，包括电子侦察、雷达侦察、海上侦察、空中侦察、航天侦察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发挥过去作战中用过而现在仍然有效的传统侦察手段的作用，特别是人民群众的作用。由于任何一种侦察手段，包括先进的技术手段，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实行土洋结合，军民结合，多种手段互相补充和验证，才能保证情报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在对情报的分析、研究上，也应象刘伯承那样，精于思索，善于鉴别，务必求真求实，真正把握住现象的本质及相互联系，使指挥员作出的判断、定下的决心，始终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

二、胆大包天　心细如缕

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与意志的殊死较量，是充满危险的特殊社会活动领域。刘伯承作为一名沙场老兵和大军统帅，具有一种刚强无畏的英雄气概。这种革命的胆略与勇气表现在指挥艺术上，便是敢于并善于打硬仗、打恶仗、打大仗，敢于并善于超越常规用兵，下险棋、走新着，因而被人称为“胆大包天”。而另一方面，刘伯承在进行调查研究和制定作战计划时，又具有心细如缕、缜密周全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指挥员“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的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⑤把“胆大包天”与“心细如缕”这

对反差极大的矛盾现象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是刘伯承指挥艺术的一大独特风格。

刘伯承的“胆大包天”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他常说，一个指挥员只有胆大包天、刚胆精明，才能带得出英勇无畏的队伍，才能在千难万险中战胜敌人。每当面临强敌或作战中出现险恶环境时，他总是以临危不惧的坚强意志影响和带领部队奋勇作战。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渡汝河，前有敌军堵住渡口，后有敌军紧紧尾追。在此紧急关头，刘伯承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一起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极大地振奋了部队士气，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渡过汝河。这一脍炙人口的战例，充分显示了一军统帅的勇气在危急关头的决定性作用。

刘伯承的“胆大包天”，是把勇气和谋略融为一体的，大勇中包含着大智。1946年8月，他率部出击陇海路，大胆采取撇开敌前沿据点、置侧背之敌于不顾的超常规战法，以主力渗入敌纵深约六十华里，突然对铁路沿线敌人发起攻击，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里就既有胆略，也有智谋。如果按一般打法，先扫清敌前沿据点，然后向敌纵深攻击，固然可以解侧背受敌袭扰之忧，但会失掉整个战役的突然性。而采取大胆的超常规行动，状似冒险，实则为出奇，必然造成敌防不胜防之势，有利于我快速达成战役目的。

刘伯承的“胆大包天”，还在于他在全局需要时勇于承受风险，担当责任。解放战争第二年，他和邓小平率十几万部队远离解放区，向敌战略纵深作无后方的千里跃进，其风险之大是不难想见的。但为了转换整个战争的战局，他毅然以包天的胆略勇当此任，并指示部队勇往直前，决心不向后看。淮海战役中打黄维兵团是一场硬仗。该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其中一个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而中野在挺进和转战大别山时已付出很大代价，重装备所剩无几。但如中野不打黄维，势必给华野造成极大压力。刘伯承和邓小平从全局出发，以宁可拚光中

野的破釜沉舟的气慨，主动向中央军委请战，坚决挑起打黄维的重担。这样一种包天的胆略，体现了一个战役指挥员所应具备的战略意识和对革命战争负责的强烈的使命感。

刘伯承指挥作战既以大胆著称，又以细心见长。他常讲，兵者，死生之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切不可因为指挥员的失误而造成士兵的无谓牺牲。他反对作战指挥上的粗枝大叶作风，更反对以士兵的勇敢来代替自己指挥上无能的做法。主张无论在制定作战计划和实施作战时，都要力求万无一失。每战之前，他都要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汇报，与政委邓小平仔细切磋，悉心筹划。对于战术指示、指令和作战命令，他都要亲自动笔，或详细阅改由司令部起草的预案，字字斟酌，力求简练准确，决不贸然下笔，常常是一连几天昼不出屋，夜不成寐。有时他已上了床，还在考虑刚写的电文，一旦觉察有不妥之处，立即翻身起来，叫值班参谋取回，重新修改。他说，打仗这玩意儿，可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

刘伯承的细心，不仅表现在他对战役作战的各个重要行动、各个重要事项的精心照顾、精心安排上，而且表现在他对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细小的战术、技术问题的细致观察、具体关照上。并能由小见大，从细节问题中发现对作战有重要影响的东西。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部队弹药极度匮乏。为了提高部队和民兵的射击技术，他常常亲自用算盘一个团一个团、一个县一个县地计算射击命中率。他还从部队上报的材料中，对几种作战形式的敌我伤亡比例进行计算，得出伏击战我军伤亡最小，是游击战中最好的作战形式的结论。在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准备阶段，他对渡江作战的方方面面都有过祥尽的指示，为确保渡江的安全，他还专门研究和推广了各种救生设备。当发现有的部队发明了稻草救生圈时，他即与野战军其他首长联名电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我十二军渡江演习以二十斤稻草捆绑成圈试渡成功。因其面积较小，又能露出胸部，战士在渡江时，尚可射击。稻草圈浸水后十二小

时仍可使用。现正试以三个草圈连成品字形，以便组成小组，协同前进。试验结果续报。此圈亦可作救生用。”作为一军之统帅，把战前的准备工作想得如此周到，其心细确实到了如缕、如发的程度。

“胆大包天、心细如缕”，形象生动地体现了刘伯承的指挥风格，也典型地代表了一名优秀指挥员所应当具备的气质素养。作为指挥员，如果在作战中一遇强敌就畏葸不前，一到危急关头就手软心颤，那就根本谈不上指挥才能的施展。作战上的成功总是与指挥员的勇气和胆略结伴而行的。尤其是现代作战，更具有残酷性、激烈性的特点，也就更需要有刘伯承那种包天的胆略，坚定地树立起以劣胜优、敢打必胜的信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未来作战中，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从武器装备上讲仍然占据优势。这种装备上，特别是高新技术装备上的质量差，将使我军作战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但是，应当看到，我们所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有人民战争的优势，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必定能打败武器装备先进的敌人。因此，我们既要重视高技术又不要为敌人的高技术所吓倒，敢于运用我们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去争取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胜利。

现代作战要强调勇气和胆略，也要重视精细、缜密，要象刘伯承那样，做到胆大包天与心细如缕的有机统一。现代作战是诸军兵种参加的合同战役，作战力量构成复杂，战场空间更为广阔，指挥员更需要统筹计划，恰当部署，合理使用各种力量，如果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就会一盘散沙，形不成整体合力。现代作战又是全纵深立体战。作战范围很广，作战样式多样。作战行动将波及地面、空中和海上，正面纵深和翼侧，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以及电子战、火力战等，将同时或交替展开。指挥员需要关照的点多、线长、面广，如果哪一方面考虑不周，组织不细，不仅会影响各种作战行动的相互配合，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全局的失利。此外，在现代作战中，我军武器装备较之过去有了很大发展，

这不仅要求指挥员要熟悉先进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和运用原则，而且在作战实践中要周密地组织好各种保障，否则就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甚至影响战局。例如，组织机械化部队机动，对空防御、道路保障、油料和物资器材保障等哪一个环节关照不好，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部队的行动，乃至作战的胜利。这方面我们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是有过教训的。因此，在未来作战中，我们要以刘帅为榜样，精心组织计划每一次战役、战斗，能动地夺取作战的胜利。

三、因敌而变　活用战法

战争是两股活力之间的对抗，情况千变万化。作战指导者能否做到敌变我变，巧妙地运筹战势，灵活地运用战法，是胜败的重要因素。大凡军事家，历来都强调在作战指挥上要灵活机动。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毛泽东指出："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⑥刘伯承在作战指挥中，就熟谙战法的运用之妙，表现出极深的造诣。他指出，战争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因而要研究敌人的"常态应如何，它的变态应如何，以作我们机动的根据"；"要经常思索可能的敌情变化，绝不能总是用一个战术来对付敌人。"他虽然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并博览古今中外的兵家著述，有着很高的军事理论水平，但是从不被理论条文和过去的经验所束缚，不拘泥于常法，而是坚持从战场实际出发，灵活施变。用他自己在战争年代的口头禅来说，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⑦刘伯承因敌而变、活用战法的指挥艺术，首先表现在他每次作战，都能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战法。如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鄄城战役和高山铺战役是"先施拖刀计，后

杀回马枪”，鲁西南战役是“攻其一点，吸其全来，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等等。再如定陶战役和滑县战役，打的都是运动战，前后相隔仅两个月，但由于作战对象不同，敌人的部署态势不同，刘伯承采取的打法也不同。打定陶战役时，刘伯承针对敌优势兵力多路进攻，但每路只有一两个师，指挥上也不统一的特点，采取集中兵力打敌突出的一路，“攻其一点，再击其余”的战法，实施中央突破，打开了局面，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而打滑县战役时，刘伯承则针对敌以纵深地区 3 个大据点为依托向外伸展“触角”的配备特点，采取“猛虎掏心”式的远距离奔袭战法，以突然、神奇的动作，从敌接合部楔入敌纵深，首先打掉敌指挥中枢，接着乘敌混乱，扩张战果，同样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刘伯承指挥作战，不仅每次的打法各不相同，而且在同一次作战中，也能根据各路、各部敌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打法。这是他因敌而变、活用战法的指挥艺术又一突出表现。鲁西南战役中打郓城、打六营集、打羊山集各部之敌，他在具体打法的设计上都各具特点。郓城之敌孤立无援，防守薄弱，且城墙不坚固，而我兵力又占优势，因而采取“围而不阙”的打法；六营集之敌兵力较大，如我军围困过紧，可能逼敌作困兽之斗，便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羊山集之敌为蒋介石嫡系，战斗力较强，一直在准备死守待援，刘伯承则采取先打驰援之敌，后集中兵力从容围攻的打法。由于在打法的设计上能因敌而变，因而均取得了重大战果。

刘伯承还善于审时度势，随时掌握战场情况的变化，适时修改和变换原来的计划和部署，在指挥上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他曾指出，一个指挥员“懂得战术是容易的，适应新的情况，灵活运用战术甚至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⑧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就是他和邓小平根据战场变化，三易作战决心和行动而取胜的。一是变内线破敌为外

线出击。战役前，刘邓原拟集中主力于腹地，寻机运动歼敌，但与敌周旋20余天，数次准备好战场，皆因敌队势密集或地形不利而未能打成。刘邓认真分析战场情况，发现敌在鲁西南地区兵力空虚，有隙可乘，便重新定下与其在正面战场“锅上加水”，不如到敌后战场“炉底抽薪”的决心，果断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向鲁西南实施外线出击，从而掌握了主动权。二是变夺占成武为攻取金乡。我军出击至外线后，刘邓始令夺取成武，打破敌布势。在远距离奔赴成武途中，侦察得悉金乡城内之敌仅一个团守备，为创造更有利的战势，刘邓即指示部队不打成武而改打金乡。这一调整，对赢得战役全胜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变强攻金乡为围城打援。我军强攻金乡，吸引了各部敌人前往增援。刘邓遂当机立断，改变强攻计划，以围城打援手段，在半个月内连打3个歼灭战，终于迫使敌放弃了对我豫北腹地的进攻。

淮海战役中在双堆集打黄维兵团，是刘伯承根据战场情况变化，灵活运用和变换战法的又一生动战例。黄维兵团是刘伯承一生中遇到的防守最顽强的对手，因而打法上也格外考究。首先，他指示部队以追击、侧击、迎击等战法，在预置的囊形阵地上形成对敌合围。接着，以猛烈顽强的拦击对付敌人大规模突围。随后，他根据敌大兵团顽强固守和我军炮火不足的特点，提出“坚决持久围困敌人”的方针，采取稳扎稳打，逐点攻坚的战法，紧逼敌人于狭小范围，使其困饿，一点一点地加以削弱。最后以有重点、多方向连续突击形式发起总攻，全歼该敌10万余人。刘伯承在进行战役总结时说：“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⑨

刘伯承因敌而变、活用战法的指挥艺术，表现了一代名将的大家风范，也为我们探讨现代作战中战法的运用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大量高新技术运用于作战领域，军队的指挥能力、侦察能力、电子对抗能力、远程打击能力、立体打击

能力、快速机动能力都有很大提高，不仅使一些传统的战法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而且不断产生了一些新的战法，使人耳目一新。作为指挥员，必须敏感地根据现代作战的特点及其发展，努力在战法的探讨和运用上上一个新的台阶。首先，要充分估计和认识高技术兵器在作战中的运用对战法的影响。近年来发生了几场广泛使用高技术兵器的局部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不可避免地将对未来战法的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并预示着某些传统的战法已不能完全移用于高技术战争的战场。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惨败，除其他方面的因素外，在作战指挥上完全袭用过去那种典型的阵地防御战法，不知灵活应变，也是一条原因。对此，我们一定要给以必要的重视，真正把对付高技术战争新战法的探讨及其在未来作战中的灵活运用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其次，要加强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作战对象战法的研究。我国周边情况十分复杂，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我军未来的作战对象，可能是大国强敌，也可能是某些实力与我相当或不如我的对手，作战样式可能是一般的攻防作战，也可能是空袭与反空袭、封锁与反封锁、登陆与抗登陆、空降与反空降、破袭与反破袭，以及各种复杂地形、气候条件下的特种作战。作战的地区与对象不同，采取的战法也应不一样。这种特点，对我们在战法的研究和运用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方面，通过认真学习刘伯承因情、因敌灵活运用战法的指挥艺术，是能够得到深刻教益的。

四、趋利避害　机动歼敌

战争实际上是最激烈、最残酷的利害之争。刘伯承指挥作战，总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趋利避害，并善于运用巧妙的机动，在敌我之间激烈的利害之争中，能动地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大量消耗与歼灭敌人，使敌人不断丧失优势和主动，直至

最后在战略上、全局上完全陷于被动的困境。这是刘伯承指挥艺术的又一鲜明特点。

刘伯承通过总结古今中外战争过程中利害转化的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利害变换线”这个新颖的概念。所谓“利害变换线”，就是指挥员在作战中需要把握的敌我双方利害相互对立因素各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关节点。刘伯承又把它称之为“火色”、“火候”。不论从时间、空间上讲，还是从战略、战役、战斗行动上讲，指挥员对利害变换“火候”掌握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作战的主动与被动、胜利与失败。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任何事物的转化都要通过中介来实现，战争中的利害转化也是如此。刘伯承认为，利害转化的中介就是机动，机动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是争取主动、歼灭敌人的有效途径。他指出：“毛主席的人民的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更需要特别机动”。⑩因此，他一贯反对打“死”仗，反对“牛抵角”战术，主张把战场这盘棋走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机动方法，调动敌人，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的弱点，在机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实现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的转化。

当敌人实施大规模并进长驱进攻，或多路多方向对我进行合围时，刘伯承采取“敌进我进”的机动方式，避开敌人锋芒，集中主力，快速机动，直捣敌人心腹或后方。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捣我的鸡窝，我砸你的饭锅”。抗日战争时期敌军每次发动大“扫荡”，往往是集中精锐部队，几乎倾巢出动，分几路或十几路甚至二十几路，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后方只留少数部队和伪军守备。针对这种情况，刘伯承不与敌人“牛抵角”，而是集中力量进攻敌后方，袭击敌首脑机关、武器弹药库、机场等要害部位，从而不仅避免了我军遭敌合围，取得了作战主动权，而且给敌以大量杀伤、消耗，赢得了一次又一次作战的胜利。毛泽东对这种方法非常赞赏，当 1945 年 9 月刘伯承去延安时，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伯承同志，你那个'敌进我进'的办法好啊，搞得日本人没办法"。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更是战略上对"敌进我进"这种机动方式更大规模的运用。它是在敌人仍在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的形势下我主动采取的战略进攻行动，结果是一举砸碎了敌人整个战略布局上的"哑铃"把子和"钳铰"，从此使敌人在战争全局上处于被动地位。

当敌人以密集队形向我进攻，态势和地形条件不利于我歼灭时，刘伯承采取声东击西、隐真示假、隐强示弱等手段，欺骗迷惑敌人，引诱敌人进入我预设战场或有利于我歼敌的地区予以歼灭。他精于诱敌深入战法的运用，认为诱敌深入是把敌人诱引到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而不是把敌人放在"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定陶战役打敌整编第三师，他就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先主动放弃一些城镇，把整三师从敌多路齐头并进的队势里调出拉开，造成突出冒进，并诱其钻进我张开的口袋阵里，然后集中兵力对其发起攻击，取得了全歼该敌的胜利。

当敌人猥集一团，固守坚城，我直接攻坚难以奏效时，刘伯承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把敌人调出在运动中予以歼灭。选择敌人最为关注、十分爱护、我攻敌必救的要害部位作为围攻目标，"设饵钓鱼"，通过佯攻，调敌来援，造成我在机动中歼灭援敌的有利条件。抗日战争初期的神头岭作战，就是采取围城打援的方法而取胜的。针对日军在晋东南的点、线式布势特点和敌一处受袭、它处必出援的规律，先以部分兵力围攻敌重要兵站基地黎城，主力则荫蔽机动至去黎城的必经道路之侧设伏，将敌援救黎城的步、骑兵1500余人全歼于神头岭地区。正如刘伯承所说，"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是我军求得机动歼敌的好办法。

在反合围、反围攻作战中，往往出现敌我犬牙交错的形势，甚至出现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条路敌我相混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又善于乘敌之隙，钻敌空子，在两敌接合部机动歼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扫荡"斗争中，他常常组织精干

的小部队或民兵游击队，秘密迅速地插入敌人接合部、间隙地，以急袭、伏击、麻雀战等手段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并造成敌之内部混乱，使其相互残杀，我便从中渔利。战争实践证明，这种机动方法，不仅能使我军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在被动中争取主动，而且能给敌以精神上的震撼，造成其恐怖心理，真可谓一举两得。

刘伯承在作战指挥上趋利避害，机动歼敌，方法多样，变幻无穷，真可谓运用之妙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他的这一指挥艺术不仅在过去的战争实践中大放光彩，而且为我军未来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机动，仍然是我军未来作战的重要样式，是消灭敌人的基本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战场空间扩大，纵深性、立体性不断增强，对战役战斗的整体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战役战术机动将更为频繁。刘伯承的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方法，仍可以从多方面给我们以启发。例如，未来作战，特别是边境局部战争，敌人将可能集中精兵锐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我进攻。我为了挫敌进攻锐势，为尔后的反击歼敌创造条件，在有的方向和地区，首先将尽量避免以主力与敌正面交锋，采取敌进我进的方式，以快速机动集团或特种部队等插入敌纵深，打击敌后方，破坏其战役的整体结构，造成我尔后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当然，未来战争同过去的情况相比，将有很大的不同。机动问题将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一是机动的样式更多，不仅有地面机动，还有空中、水上、水下机动，以及火力机动、电子机动等；二是机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战役机动更为广泛；三是机动歼敌对防守作战的依赖性增大，机动与防守作战配合更加紧密；四是机动与反机动的斗争将异常激烈，对组织机动的各项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要在学习继承老一辈军事家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未来战争的新特点，研究探讨新的方法。比如，敌人拥有先进的侦察器材和手段，我如何隐蔽机动的企图，达成突然性；敌人拥有远程导弹、火炮和空中

优势，我在机动中如何保存有生力量；随着我军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如何组织好包括道路保障、油料保障在内的各项保障工作等。这些都要求我们把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地研究探讨，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军机动作战理论，使刘伯承机动歼敌的指挥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出新的光彩。

刘伯承高超的指挥艺术，是我军作战指挥理论中的瑰宝。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老一辈军事家指挥作战的宝贵经验，并紧密结合未来作战的实际，研究指挥上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我军作战指挥理论，努力提高指挥员组织指挥作战的能力，是我们重要的历史使命。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8页。

②⑩《刘伯承用兵要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第29页。

③《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580—58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79页。

⑤《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4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94页。

⑦⑧⑨《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132、第509、第597页。

我军战役指挥的楷模

张　民少将　张世平上校

刘伯承是我军老一辈军事家的杰出代表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他先后指挥过数十次各种类型、样式和规模的战役。长期的战役指挥实践，使他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喻为“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建立和完善我军战役指挥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就刘伯承战役指挥的主要特点，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胸怀全局，坚定而富有创造性地实现战略意图

坚决贯彻战略意图，正确处理自己所处的局部与战略全局的关系，是战役指挥员的基本职责之一，也是正确地组织指挥战役的基本要求。刘伯承贯彻落实战略意图、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关系实施战役指挥，集中地表现为胸有“一盘棋”的思想，在深刻领会战略意图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战场实际，坚定地、灵活地、创造性地实现战略意图。

刘伯承认为，作为战役指挥员，只有吃透上级指示精神，全局在胸，才能走出一着对全局有益的好棋。因此，在筹划战役时，他总是把领会上级战略意图摆在第一位。1945 年 10 月中旬，中央军委要求晋冀鲁豫军区，把阻滞和扼止国民党军北进作为“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刘伯承与邓小平立即意识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国民党军北上的大门，平汉路是其必经之路，能否卡住平汉路、堵住大门，将直接关系到一旦内战爆发我军所处的战略态势。通

过“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就可粉碎蒋介石运兵北上、抢占东北的企图，并掩护我军向北展开。因此，上党战役尚未结束，刘伯承即赶赴平汉路方向，全神贯注、精心筹划和组织邯郸战役。其胸怀全局，走好每一步棋筹划战役行动的基本做法是：首先，遵循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统观全国战局和战场态势、按照中央军委对本部行动的指示，思考上一战略阶段与下一战略阶段、这次作战与下一次作战、本部与全局的关系，从中把握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基本着眼点，明确本部在全局中的地位、作用和所担负任务的性质、目的与要求。同时，深刻分析战场形势，找出实现上级意图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和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以实现战略意图为目的，着眼全局的根本利益需要，从战场实际出发，确定战役任务．选择有利于实现上级意图的作战时机、地区和目标。在作战时机选择上，“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面是“在注视战机进展中，以自己积极行动的因素去开展战局，走向歼敌”。①即制造敌人疑虑、错觉和弱点，从中捕捉战机。在作战地区选择上，他通常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实现战略和作战意图，是否有利于我军作战的战场条件，是否有利于达成预定目的的作战目标等因素，其核心是能否大量歼灭敌人并不断发展胜利。在作战目标选择上，他强调要打敌弱点、打敌要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的这些做法，都生动地反映了强烈的战略意识。

刘伯承常讲，打仗有的“吃肉”，有的啃“硬骨头”，这是战争的客观规律。能否以全局利益为重，主动承担重要任务，既是战争对战役指挥员的客观要求，也是衡量战役指挥员战略意识强弱的尺度之一。他历来强调战役指挥员要有担重担子、啃“硬骨头”的精神。他所指挥的战役，无论是独立作战还是与友邻协同作战，无论是担任主要作战任务还是担任配合作战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出色。他向来是积极克服困难，尽一切努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刘帅认为，我军如同一支乐队，各个战略区或

作战方向如同乐手，中央军委则是乐队的指挥。只有每一个乐手都按照指挥的号令行动，才能演奏出优美动人的乐曲。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是各级指挥员的根本职责。筹划定陶战役时，他清楚地知道，连续作战将“面临损伤元气和骨干的危险”，但为了配合我中原突围部队站稳脚跟和华中、山东我军的作战行动，逐步扭转南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保守鲁西南战略要地，他与邓小平不怕困难，果断地发起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1947 年 6 月，中央军委指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担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任务，刘伯承深知率领十几万大军长驱直入敌人战略纵深，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作战和建立根据地，绝非轻面易举，但他与邓小平毅然担负起这一重担。他一贯主动协同、积极配合相邻战区行动，为友军夺取胜利创造条件。认为，在战争这个大球场上，每一个队员投蓝得分都是整体配合的结果，每一场胜利既离不开队长的指挥和调度，也离不开队员们的主动配合和积极协作。这是我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重要条件。因此，在战役指挥中，刘帅总是留心相邻战区战局的发展，寻找机会，为友邻创造“投蓝得分”的条件。1947 年 3 月，他抓住敌人在豫北和晋南战场收缩兵力、转入防御的时机，集中 60 个团 10 万余人的兵力，在 10 万民兵配合下，举行豫北反攻战役，一举歼敌 4 万余人，解放 9 座县城和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山东、陕北我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1948 年 6 月，他看到中原战场襄樊地区仅有敌第 15 绥区 3 个多旅的兵力防守，势孤力薄，又系西安胡宗南、华中白崇禧等部的接合部，若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夺取川陕鄂三省要冲，既可以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战场的行动，又可以为今后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为此，他适时地发起了襄樊战役，并一举歼敌 2.1 万余人。

在情况复杂多变的战场上，把战略意图变成胜利的现实，离不开战役指挥员主观能动作用地发挥。刘伯承在战役指挥中十分注意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他指出，指挥员在总的作战意图下，“必

须预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成歼敌任务”。②在把握上级总的意图的基础上，根据战场情况变化和全局利益的需要实施指挥。对此，他一方面勇于对上级的战略构想和作战计划积极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使之更加完善。例如，在解放战争中，他于 1946 年 8 月提出的关于停止陇海路作战转入内线发起定陶战役的建议；淮海战役中提出的关于以中野部队夺占宿县、割断徐蚌之敌联系和第二阶段不打徐州东援之敌而打黄维兵团的建议等，就是很好的证明。另一方面，勇于机断行事，“独立自主，刚胆沉着”地实施指挥，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局利益的需要。坚决反对那种“消极不做”、“犹豫不做”、“等待上级指示才做”的行为。他常根据战场实际和全局利益的需要，主动寻机歼敌，以积极的行动改变战场形势。1947 年 10 月，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国民党军的 7 个整编师，企图将刘邓部主力合围于光山、新县地区。刘伯承、邓小平则以一部兵力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乘虚出鄂东、皖西，寻机歼敌。首先在柳子港、李家集等地歼敌一个旅的大部，同时又在六安东南地区的张家店歼敌一个旅，随后乘敌整编第 40 师及整编第 52 师的 82 旅孤军追截我军之际，在高山铺地区一举将其全歼，取得了进军大别山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为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渡江战役中，我军突破长江后，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超出了总前委原定作战计划的预料。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机会，尽早截断浙赣线，割断汤恩伯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刘伯承果断决定改变第 2 野战军原定任务和行动方向，报请上级批准后，指挥所部迅速南出，直下浙赣线。此举，断绝了京沪线地区之敌由陆路南逃的一切可能，控制了尔后西进、南下的有利位置，大量歼灭了敌人。

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战役指挥员指挥作战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刘伯承不仅较好地运用这一思想于自己的战役指挥的实践，而且以其理论

与实践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二、从“五行”入手，全面、综合分析判断情况

刘伯承“用兵如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作战指挥中始终把搞清楚战场情况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把对作战行动最有影响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等因素称之为“五行”。强调要在了解和掌握这五个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实施指挥决策。他认为，“五行”是正确认识战场情况的基本因素，组织指挥战役，“五行”缺一不可。“五行”明，仗仗赢，“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其中，任务是战役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决定着部队作战行动的样式、时间、战场等，是“五行”的中心；敌情是作战对象的企图、动向和兵力部署、队势、火力配系、阵地编成等，影响着己方作战部署和方法，是分析研究的重点；我情反映着我军行动的能力和条件，决定着我军能够采取的作战行动，不可或无；时间和地形则是战场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五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只有全面综合的分析研究，才能找出战场情况的本质和特点。

为使分析判断情况占有充足的第一手资料，刘伯承十分重视组织战役侦察和进行现地观察。他说，每一个指挥员“都应该把侦察勤务当作人民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看待”。③他除了严密部署谍报工作外，每次战役发起前，都要建立以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为主组成的地域侦察网、以部队侦察分队为主组成的机动侦察网，进行战场情况的侦察。他不仅十分注意在战役发起前组织部队进行周密的侦察，而且在战役过程中也组织部队进行不间断的侦察，把摸清情况贯穿于战役的始终。同时，他还十分强调指挥员要亲临前线观察，认为“只有亲自的观察，才能真切地了解敌情变化”。④在他的战役指挥实践中，亲临前线进行实地观察的事

例数不胜数。

刘伯承认为，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在全面、综合分析敌情的基础上，找出敌人的弱点和要害。他强调，在组织部署战役侦察时，要把察明敌人布势、队势中的弱点、要害和地形情况作为重点，察明敌军编成和内部关系，战役布势中的侧翼、接合部、突出部、后方、指挥机构位置，作战准备的情况，移动的时间和路线，指挥官的脾气、嗜好、指挥水平和特点、派系矛盾，等等；同时要察明地形特征、战场容量、道路等及对敌我双方作战行动的影响，以及群众对我军的态度和支援我军作战的能力。对于所获情报，要如实报告，绝不能夸大或者缩小甚至隐瞒某种情况。在分析研究情况时，他总是把分析研究敌之战场态势、队势及变化规律，敌我力量对比，敌人的战术特点，地形、道路及对双方作战行动的影响作为重点，从中找出敌人的弱点和要害所在，找出强弱转化的条件，确定好打之敌、好打之地、好打之时。在战役中，他所选择的敌之弱点和要害，通常是敌人部署、队势中的突出部、接合部、翼侧、后方、指挥机构所在地，以及内部矛盾大、战术呆板和不意、不备、备而尚不充分，或撤退、转移之敌，等等。刘伯承所以能够常打胜仗，与他重视寻找和捕捉敌人的弱点与要害是分不开的。象滑县战役中准确地掌握三股敌人的接合部及配系纵深，豫北战役中准确地把握新乡以北之敌布防特点，鲁西南战役中准确地掌握敌人战役布势中的间隙，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预见战局发展，是刘伯承的习惯作法之一，也是他集战略意识和战术素养于一体的集中反映。他认为，分析和预测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既要看大的形势，又不能忽略细微的变化。所谓“大势”，就战役范畴而言，是指战局发展的基本形势，如战场上敌兵力、态势、企图、动向、战区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作战的其他重要情况等；所谓蛛丝马迹，则是指战场上敌人重大行动的细微征兆、端倪。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

总是把分析研究敌我“大势”的现状和反映敌人行动重大动向的细微变化，作为预知未来的起点，从中把握因果联系，把握战局发展和敌人行动的基本脉络，并据此预筹对策。淮海战役中“夺占宿县，截断徐蚌路”的建议，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中“乘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突然南进，提前跃进大别山”的决心，都是科学预见的结果。

三、定下战役决心胆大包天，组织准备战役心细如发

“胆大包天”、“心细如发”，是刘伯承战役指挥的重要特色。他曾说，部署作战要象“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致，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定下决心要刚胆果断，才能不失时机。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作战中严密周到，当机立断。

充分估计各种困难和复杂情况，确保战役准备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形势和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是刘伯承精心筹划战役的特点之一。他认为，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作为战役指挥员，只有对战场上各方面情况都想到了，深思熟虑，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战役发起之前，才有可能在作战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了如指掌，措置裕如。因此，他在组织准备战役时，总是在全面、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对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的选择、兵力的使用，后方的支援，战役发起的时间，战役实施的步骤，战术的运用，等等，进行反复思考，精心筹划。尤其对于我之行动可能引起敌人的反行动，想得更深、更细。既想到可能出现的有利情况，又想到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既考虑到战役发起后立即可能出现的情况，又预想到战役中、后期可能发生的情况；既考虑到战役发展顺利的一面，又预计到可能的挫折和伤亡损耗；既考虑到最好的情况，又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总是在反复权衡的基础上，确定战役行动的基本方案，明确任务、区分

兵力、组织协同和各种战役保障。

指导部队改进战术和提高战术水平，是刘伯承组织准备战役的重点。他认为，战役目的必须通过具体的战斗来实现，因此，作为战役指挥员必须重视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在这方面，他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好落实。几乎每次战役发起前，他都要带着对敌情研究的结论，深入部队了解在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下达指示，使部队能够针对敌情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战术准备。他经常强调，作战准备不充分特别是战术准备不充分，宁肯推迟作战时间甚至不打。上党战役中，针对阎锡山所部长于依托城镇严密布防、怯于野战和近战的特点，以及我军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经验不足的实际情况，他于战役发起前一周下达了战术指导方面的具体指示，明确指出：对阎部作战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形一冲了事”。并从攻击准备、攻击实施（包括接敌运动、登城行动、城镇内作战）、运动歼敌、协同与指挥、各阶段弹药消耗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要求，从面，使部队的战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赢得此次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役结束后，他总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意见，使部队不断地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如《上党战役的初步总结》、《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等，都是在战役结束后不久做出的。

在有准备和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及时、果断地定下战役决心，是刘伯承“胆大”、“心细”实施战役指挥的集中体现。战役决心是作战计划和行动的基础，刘伯承在战役指挥中总是倾全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其定下决心的主要特点：一是审慎周全。他认为，战役行动不仅万命所悬，而且事关战略全局。因此，做决策、定决心既要勇敢无畏，又要斗志斗谋。绝不能用士兵的勇敢代替和弥补自己的无能和盲目、草率，绝不能主观臆断、一厢情愿、刚愎自用。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正确分析判断，反复权衡、酝酿，凭实决断。邯郸战役中，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

他大量翻阅敌情、地形资料，反复听取有关汇报，同邓小平一起反复思考、切磋，最终抓住敌人机械化装备离不开道路的弱点，定下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多沙地区歼敌的正确决心。二是迅速果断。多疑不决、犹柔寡断，历来是兵家大忌。刘伯承十分强调定下决心要迅速果断，认为这是捕捉战机最紧要的一环。每当战役时机成熟，他从不迟疑、犹豫，总是不失时机地定下决心、下达命令。1939 年 12 月，他抓住日军换防后兵力分散、情况不熟的弱点，和顽军部署尚未完成的时机，迅速定下进行邯长战役决心，一举歼灭日伪军 700 余人，改善了太南我军受敌、顽夹击的不利形势。当战场情况发生根本变化而不宜继续贯彻既定决心时，他也总是迅速果断地定下新的决心。并强调，“这是有根据的灵动，并不是随便的妄动”⑤。巨金鱼战役中，面对战场情况接连发生的三次根本性变化，他毫不犹豫，一变内线破敌为外线出击，二变夺占成武为攻取金乡，三变强攻金乡为围城打援，从而达成了预期目的。实践证明，这种“有根据的灵动”，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三是大胆果敢。刘伯承指挥打仗强调以勇敢精神和突然迅速的行动争取主动。解放战争第一次出击陇海路时，国民党军在自开封至徐州长达 150 公里的地段上部署了一条封锁线，纵深达 30 余公里，防守严密。为了确保短时间内切断敌人东西运兵的大动脉，配合苏皖我军作战，刘伯承大胆果敢地定下了“猛虎掏心”的决心，置敌大多数外围据点于不顾，集中兵力直插敌人纵深，一举歼敌 1.8 万余人。事后，他在谈到这次作战时说：如果当时我们顾虑自己的侧背，那么就根本不可能进到陇海路。

四、善于在机动中集中和转用兵力，创造和捕捉战机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军的作战形式应力求采取运动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刘伯承深谙这一思想的实质，并把打运动战、

机动歼敌作为自己战役指导思想的基本内容。他认为，机动是争取和把握主动，摆脱被动，趋利避害，发现敌人弱点，创造战机，大量歼灭敌人的基本途径。在以少对多、以劣对优的情况下更需要机动。在战役实践上，他总是巧妙地把机动与兵力使用、调动敌人和谋势造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大踏步的进退之中集中自己的兵力，分散敌人的力量，创造和捕捉战机。

对于“机动”与“歼敌”的辩证关系，刘伯承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但它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⑥。他处理机动与歼敌关系的做法：一是以歼灭敌人为机动的根本目的。他所组织的战役机动，虽然有时是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割裂、分散敌人；有时是创造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条件；有时则是完成战役集结和展开，争取时间进行战役准备，但一切的机动都直接服务、服从于歼灭敌人，都是为了造成一种有利于歼灭敌人的战场态势。二是以好打或必打之敌为机动的主要方向。刘伯承认为，机动与作战的统一性决定了机动的主要方向必须与作战的主要方向相一致。因此，他所确定的战役机动，通常主要指向敌人突出部、接合部、翼侧、侧背、后方、交通枢纽及干线，等等。三是以有利于达成歼敌目的为标准，选择机动的时机。刘伯承认为，战役机动不同于战术机动，其规模大、距离远、方向多。因此，选择好机动的时机非常重要。他所选择的机动时机通常是敌人还未进到我之利害变换线之前，或退出利害变换线之后，或移动中、撤退中、不备中、备而不充分时、夜间等时节。他特别强调，利用夜暗实施机动是对付敌人的极好办法。此外，刘伯承还十分注意机动的隐蔽和保密。他认为我军的行止，首先就是要让敌人不知道，或虽已知道但为时已晚。特别是在敌人拥有先进的侦察和观察手段、谍报人员密布的情况下，如果行动不秘密、不巧妙，则不可能达成机动的目的。

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刘伯承的一贯思想，也是他在

兵力使用上的基本做法。他常讲，用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只只都会跳跑，一个也捉不到，打仗亦是如此，“到处都要，到处无得”。对待强敌，必须三个打一个，集中优势兵力突击敌人一点，以求各个消灭之，这是我们成功的要诀，机动则是确保三个打一个的最基本的方法。实践中，他一是通过机动，将数个方向上的兵力集中到一个主要作战方向上。无论自己手里有多大兵力，都尽可能地集中使用主力于一个方向上。邯郸战役中，面对国民党军10万重兵分左右两路进攻，他指挥主力6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10万余人迅速从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地区隐蔽机动至平汉线，对敌右路军7个师4.5万人形成了优势。二是通过机动，确保适时转用和连续使用兵力。对弱者来说，许多情况下，往往面临着即使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力量，也难以对敌形成优势的难题。刘伯承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机动，适时转用和连续使用兵力，击破一点，再及其余。定陶战役中，他在仅有4个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共5万余人对敌15个整编旅10万余人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打敌左路，首先歼灭了敌整编第3师之第20旅，继之转用兵力歼灭该师师部和第3旅，最后又连续歼灭了整编第47师等部。这一成功经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通报全军。三是经常保持强大的机动力量。刘伯承认为，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要争得和保持主动地位，关键在于指挥员重兵在握，“部队集中机动，随时可以优势兵力攻击与歼灭其任何一点”。⑦如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战役中，他就是把1个旅另2个团的兵力作为手中的铁拳，当敌人发起围攻尚未达成合围时，迅速机动至敌人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当敌在内线受到严重削弱后，又迅速转人内线寻歼敌第108师团2000余人于长乐村，赢得了战役关键一战的胜利。

为了确保在主要方向做到集中兵力，歼灭分散孤立之敌，必须在其他方向上以少数兵力钳制或阻滞敌人主力，使其不能增援。这是刘伯承用兵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确保主要方向、关键时

节兵力优势的主要做法。他往往是通过广泛的战役机动，调动驻止之敌于运动中，迫使集中强大之敌分散开来，诱使谨慎之敌冒进突出，让敌人严整队势出现破绽。从而，把强敌变成弱敌、难打之敌变成好打之敌。定陶战役中，他选定敌整编第3师为首歼目标，并集中主力于大杨湖将其抓住，同时，又以2个主力团和2个旅的地方武装及民兵9000余人，分别向东明、曹县、成武三个方向机动，或以运动防御阻击迟滞敌人，或以游击战钳制消耗敌人，以致我主力歼敌整3师时，他路敌人始终未能靠近。他以机动调动和扯散敌人的做法主要有：一是以部分兵力向若干个方向实施机动，扯散敌人；二是以部分兵力在若干个方向上辗转游弋，牵制敌人；三是以部分兵力或地方武装、民兵游击队，机动至驰援之敌的必经方向，阻滞敌人；四是以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袭击敌人交通线，开展破袭战，使敌人“血管不通”，难以迅速集中兵力。

五、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战法、创新战法

刘伯承在战法运用、变换上的灵活性，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他认为，战法是用来消灭敌人的手段，不管什么样的战法，只要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就是好战法。他曾经这样说过，“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⑧这是他对战法运用要诀通俗而精辟的概括。从古至今，战法运用“贵在临期应变”、“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刘伯承战法运用的绝妙之处在于，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根本战法，一切依时间、地点、目标、部队为转移，进行灵活的运用与变换，什么打法能够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克敌制胜，就采用什么打法，从不拘泥于常规常法。

由于作战对象、时间、地点、参战部队等条件的不同，每一次战役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刘伯承一贯强调，战法运用必须适应

现实情况。他认为，指挥员的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战法运用的灵活性。灵活，才能出敌不意、出奇制胜。不求应变，拘泥本本或一招一式，必然受到现实的惩罚。他所指挥的数十次战役，几乎没有一次在战法上是雷同的。打运动战，曾采用过“猫盘老鼠”、“纵深闪击”、“猛虎掏心”、“先施拖刀计再杀回马枪”、“钳形合围”、“围城打援”、“夺城打援”、“攻城打援”、“勾头待伏”等战法；打攻坚战，曾采用过“围三阙一，虚留生路”，“围师不阙，关门打狗”等战法，可谓“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他之所以能如此灵活地运用多种战法于战役行动，主要是掌握了以下五个要点：一是因时用法。即根据时间因素，选用适当战法。如进军西南和成都战役中，他就着眼于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果断地运用了大迂回、大包围，突然出击敌侧背，断敌退路的打法，一举取得战役胜利。二是因地用法。刘伯承常讲战法运用要“因地制宜”。他一方面注意战区的政治、经济、民俗、人民群众等条件对战役行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注意地形条件对战术行动的影响。在解放区、敌占区，在山地、平原地、居民地都有不同的战法。三是因敌用法。对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打法，度敌而动。打日军有打日军的方法，打伪军有打伪军的方法，打日伪联军有打日伪联军的方法；打国民党嫡系部队是一种方法，打“杂牌军”是另一种方法，打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混编之敌又是一种方法。四是因势用法。即根据敌人布势和战场态势选用战法。善于乘敌之隙，就敌之虚，以恰当的战法制胜敌人。五是因己用法。即根据自己部队的数量、特点、装备、作战能力等因素选用战法。“正确估量自己”，并根据各个部队战斗力强弱、战术素质状况、持续作战能力大小等方面情况量力而行。

刘伯承指挥作战，不仅灵活运用战法，而且能因时、因地、因敌情变化恰当地变换战法。他曾指出：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指挥的重要任务。每当敌我双方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战役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都

不失时机、恰当地变换自己的打法，从不以一法“包打天下”。上党战役中，初时对长治外围各城采用的是“夺城打援”的战法；在发现太原之敌有出援迹象时，又改为“攻城打援”的打法；当被围之敌兵力较大，工事较强，我强攻难下时，迅速改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鲁西南战役中，一战郓城、定陶，采用的是“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打法；二战六营集，采用的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于死地而后已”的打法；三战羊山集，又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打法。这种高度的灵活性，充分体现了刘伯承在作战指挥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实事求是认识与解决战争问题的科学态度。

刘伯承对战法的运用、变换所以“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极富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创新意识。由于有了这种创新意识，使其能够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南，运用军事辩证法思想，正确处理强与弱、攻与防、打与走、进与退、虚与实、曲与直、奇与正的关系，不但创造性地运用各种传统战法，而且不断创造出众多新战法。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481、第 481、第 63、第 463、第 123、第 537、第 472、第 132 页。

刘伯承在千里跃进中的军事指挥艺术

朱　超少将　吴光贤少将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从此，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全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次战略行动的胜利，为配合和支援全国各战场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刘伯承高超军事指挥艺术集中体现的重要一页。本文试就我军跃进大别山中刘伯承作战指挥的高超艺术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总揽全局，精于运筹

毛泽东曾经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刘伯承指挥此次战略行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把握全局，一切着眼全局运筹作战的具体行动。

首先，他善于从战略全局的分析中，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把握本部的根本任务和行动。早在党中央、毛主席正在酝酿这一战略行动的过程中，刘伯承就依照党中央、毛主席有关战争形势的一系列指示，对当时敌我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国民党军队虽在数量上装备上还占着优势，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仍咄咄逼人，但经过一年的解放战争，敌人已受到了很大削弱，成了"强弩之末"，而我军则在战争中不断受到锻炼和发展。由此，他预见到"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临近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基本上成熟

了。”因此，他理解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是：“不等到敌人的重点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完全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一战略转换的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当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实施战略出击行动后，他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和对敌之军事部署的分析认为，蒋介石把主力集中在陕北、山东两翼，中间战线兵力空虚，如同“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是我军战略进攻的主要部位。他还认为，大别山位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的地区，我军如能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占据敌我必争的“四战之地”。由此，蒋介石必然要调动进攻我山东、陕北的主力部队回援，这就利于我收“釜底抽薪”之效，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并实现我军“品”字形的战略进攻布势。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刘伯承的这些分析，不仅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而且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完全一致。由于刘伯承善于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上洞悉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因而他透彻地明了了战略进攻的根本目的和深远意义，更加准确地把握了战略行动的具体步骤和重要关节，进而稳操了作战指挥的主动权。

其次，他善于根据战略全局的需要，精当运筹作战行动。在进攻样式的确定上，刘伯承为达成进军大别山这一战略行动的突然性和隐蔽性，面对千里行程和“黄河天险”、陇海路、黄泛区等天然屏障及近十万防守敌军，按照毛主席关于不能逐城逐地推进，下决心不要后方的指示，采取了跃进进攻和长驱直入的样式，直插敌人的战略纵深和深远后方。在我突破“黄河天险”后“打”与“进”的选择上，刘伯承而对当面守敌的围堵，为了隐蔽我南进的战略企图，从根本上打开进军大别山的通道，首先选择了“打”。在渡河前就制定出了鲁西南战役作战计划，并成功地实施了这一战役行动。在我取得战略进攻初战胜利后，部队士气高涨，“好些

指挥员要求再战，扩大战果"，同时蒋介石又纠集30个旅的庞大兵力，迫我背水连续作战时，刘伯承又着眼战略行动的根本任务，权衡整个战局，选择了"进"。在敌合击部署尚未完成之际，乘其不备，甩掉了敌人，疾速南进，直入大别山。起初的"打"，是为了"进"，达成了顺利、快速的"进"；后来的"进"，是为了"打"，达成了战略出击的根本目的，二者都统一于进军大别山这一根本的战略任务。在这两种方法的选择上，又一次体现了刘伯承全局在胸，运筹帷幄，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善于把握战机的指挥艺术。在我军渡过沙河后"行"与"装"的取舍上，刘伯承针对蒋介石已察觉我战略企图，慌忙调兵追堵的形势，从战略全局出发，着眼摆脱敌人的追、堵、截、拦和侧击，以最快的速度先敌到达大别山，实现千里跃进的最终目的，坚定地以"行"为主，果断地实行轻装减行，命令部队将已随行千里的笨重武器、车辆就地埋藏或炸毁，并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使我军在情况十分紧急的形势下，又一次把握住了进军大别山的契机。由于刘伯承高屋建瓴，着眼战略全局的根本目的指挥作战的具体行动，使千里跃进中的各阶段和各局部行动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互为因果、步步紧扣的棋局，胜利地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

二、巧用奇兵，攻敌不备

兵以奇胜。在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以敌人意想不到的手段和方法突然打击敌人，是孙子"权诈之兵"的精髓，也是进攻作战发起阶段谋略的要旨和基本原则。实施千里跃进，挺进大别山，首先面临的是国民党军队长期经营的黄河防线，加之当时正值夏汛期的水势，可以说，我军如不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势实施强渡，很难顺利通过。为此，刘伯承在部署渡河准备至指挥渡河作战的全过程中，都贯穿着以"奇"制胜、攻敌不备的作

战思想。

一是在渡河战术指导上，他十分强调秘密性和突然性。他在《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中指出，部队在渡河行动上，必须“秘密而周到地准备，突然而果断地实施”；在渡河指挥上，必须乘夜间黑暗，突然进行宽大正面的强渡，务期抓住敌人弱点，突破其纵深。与此同时，刘伯承为实现这一作战思想，认真侦察了敌河防体系、河岸地形，具体计算了各渡口的船只及容量，认真组织了部队的指挥协同，秘密进行了渡河物资器材准备，详细制定了渡河规则，使渡河准备工作在敌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已如箭在弦。

二是在渡河地点选择上，选定在敌人认为万无一失的不意之处。渡河前夕，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及敌河防部署，经反复权衡，最后确定在夏汛期河水湍急、河床宽阔的鲁西南东阿至濮县之间强渡。敌人自恃这一天险可抵“四十万大军”，仅有 55 师、68 师奉命在南岸构筑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扼守，纵深也只有 1 个师（70 师）在嘉祥机动。以此为渡河地点，正是敌黄河防线的薄弱部位，利于我实施有重点的强渡。

三是在渡河行动上，他采取了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主作战相配合的打法。刘伯承为了迷惑敌人，先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进攻，又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攻，自己则亲率主力乘夜暗隐蔽迅速地从豫北开赴渡河地点，在东阿至濮县的 300 里正面，分 8 个地段，突然发起了渡河作战，最快的仅 5 分钟就完成了强渡，使敌黄河防线即刻土崩瓦解。紧接着，他又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机直插敌纵深百余里，并从南向北，兜击敌人河防部队，使敌来不及救援其被突击的弱点，以至援救部队来到，当面的河防部队已被我全部歼灭。刘伯承指挥我军如此神速地突破黄河防线，连敌人也感到莫名其妙。后来敌 70 师师长陈颐鼎说：“刘伯承将军真是天下奇才！他的一些打法，自古以来兵书战策上从未有过！”

三、善打弱点，机断歼敌

刘伯承曾精辟地指出："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他又指出，我军作战要"以弱耗强，以强灭弱"，只有这样，才能在我打击敌之弱点时，不容其救援，使之既无招驾之功，又无还手之力。我军突破"黄河天险"后，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仓惶从豫北战场和豫皖苏战场调集 3 个整编师和 1 个旅赶来增援，分左右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敌人的企图是坚守郓城，吸我屯兵于城下，然后以其右路主力拊我侧背，迫我背水作战，或将我重新逼过黄河。刘伯承针对敌人的企图，首先是将计就计，择其弱点打。他抓住敌人钳形攻势的跛足之处及我军处于"兵家所忌"的"背水作战"态势对敌人的强大吸引力，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一面坚决围攻郓城，诱敌北上；一面直插敌人纵深，攻取定陶、曹县；另一面以一部兵力向正南猛插到冉固集、汶上集地区，拊击敌人的侧背。经过几天的战斗，我军不仅攻克了郓城，同时全歼了定陶守敌和敌左路军的 1 个旅，打掉了敌人左路这个薄弱的钳头，并使敌右路 3 个整编师成了一条孤立的长蛇阵，摆在巨野东南、金乡西北地区，其侧背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成了便于我分割合围的弱敌。其次是巧施攻势，创造弱点打。在敌右路军完全孤立之后，为防止敌军结成"核桃"顽抗，刘伯承即刻指挥部队以远距离奔袭的行动，迅速将摆成长蛇阵的敌 3 个师分割包围，并断敌东逃济宁的退路，迫敌不攻自乱。接着，乘敌慌逃之机，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迫使敌在我强大攻势和利诱下，向东突围，进人"口袋"，使我军在运动中将敌 3 个旅及两个师部全部歼灭。继而，刘伯承又趁敌援兵尚未靠拢之机，首先诱歼了金乡来援之敌，接着乘势发起总攻，全歼了羊山集敌 1 个整编师。至此，刘伯承凭借其高超指挥艺术，逐次歼灭了敌 9 个半旅和 4 个

师部共 5.6 万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取得了战略进攻的初战胜利，为我军跃进大别山彻底扫清了路障。

四、虚虚实实，神速机动

虚虚实实，隐真示假，迷惑敌人，造成敌对我作战行动判断失误，在作战指挥上十分重要，它是军事指挥员创造战机的一个重要手段。毛泽东曾就此指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随即又纠集其在鲁西南的和新调来的 5 个军共 30 个旅的庞大兵力，分 5 路向我军实施分进合击，企图歼灭我军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我军逐回黄河以北。当时我军因连战疲惫，短期内南下实施战略进攻，在思想、组织和物资等方面都有不少困难，且从鲁西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河流纵横，加之西有平汉路，东有津浦路，易于敌沿两侧铁路干线向南集结，截断我前进道路。在此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刘伯承胸怀全局，果断地定下了南进机动的决心。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隐蔽突然地实施跃进，首先，指挥 11 纵队和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的声势，诱敌继续向郓城、巨野合围。又用暂归其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 5 个纵队的少数兵力钳制蒋军，主力则积极寻机打击敌人，扰乱敌人的注意力。同时，指挥中原独立旅，在我主力跨过陇海路后，西越平汉路，直出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之敌。为了隐蔽我军进军方向和目的，他还精心地部署了跃进的进军路线，将野战军主力分为 3 路：以 1 纵队与中原旅为西路向豫南进发，以 3 纵队为东路向皖西挺进，以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 2、6 纵队为中路直捣大别山。尔后，乘敌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未拢，陇海路两侧空虚之机，迅速合击穿越敌之阵线，突

然甩开敌人，向南疾驰。由于我军行动快速隐蔽，加之连日暴雨，河水猛涨，以致敌人错误地判断我军是在其大军压境之下，“北渡不成而南窜”，当蒋介石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随追击时，我军已先敌两天跨过陇海路，进入黄泛区，把敌人远远抛在了后边。直到我军胜利渡过沙河，矛头直指大别山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我军经连续行军作战，很快进入了大别山，并顺利地实施了战略展开，开创了大别山根据地。纵览刘伯承指挥跃进过程的始末，其之所以能在处境十分险恶，困难重重之下，神速完成战略机动，关键是抓住了三条：一是巧佯动，迷惑敌人，造成敌人对我行动企图一连串的错误判断；二是机动方向和路线多，敌难以弄清我机动的真正去向和目的；三是“打”与“进”转换快速，机动展开隐蔽突然，敌来不及摸清我真实企图，以至我军跃进行动胜利在即，敌军才慌忙阻截。刘伯承如此魔术般地用兵，巧妙地与敌周旋，充分展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

刘伯承作为一代著名军事家，其在千里跃进中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多方面的。上述四个方面仅是我们学习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一点粗浅认识。我们要着眼未来，进行更深刻的学习研究，为取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

“五行术”中的辩证思想

刘建刚中校　刘晓林中校　李继红少校

“五行”源出我国古代自然观，指的是“水、木、金、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古人云“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以“常胜将军”、“军事奇才”享誉中外的刘伯承元帅，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悉心探索、“深思断行”，借用古人“五行”这一称谓，把与作战指挥直接关联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五个基本要素，概括归结为克敌制胜的“五项法门”，创立了著名的“五行术”。这是刘伯承元帅军事指挥艺术中的一块瑰宝，是古今兵学的杰出之作。本文试结合刘帅丰富的战争实践，从“五行术”的内涵、相互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对军事辩证法思想发展的贡献，掷一浅见，以期对刘伯承军事理论研究的深化。

一、“五行术”是作战指导必须把握的基本要素

作战指导，是作战指导者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战争实践活动。由于战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运动现象，较之其它社会现象更少准确性，更带盖然性。因而，透过其现象，抓住其本质，就成为实施正确作战指导的关键。为此，刘伯承以“知彼知已”为戒，从与作战指导相关联的诸因素中，提炼出以“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为内容的“五行”要素，他指出：“研究情况要从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而定下决心，”①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一) 任务是“五行”之首，是作战的基本目的和行动基础

在“五行”中，“任务”首当其冲，因为它是分析敌情、我情，

研究地形和计算时间的前提条件，又是达成作战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务不明确，敌情就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的概念，既无法对特定的作战对象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也无法得出正确的敌情判断；对我情也难以作出恰当的估价；地形和时间也就成了很平常的因素。

"任务"通常是以计划、命令的形式出现，它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上级任务的理解领会；二是对下级任务的明确下达。刘伯承指出，对于上级任务，"首先要了解上级首长总的企图，了解上级首长给予自己的局部任务对整体任务的作用，才能在实际战斗中充分发挥这一作用，以保证整体任务的完成。"②对于下级任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③"必须根据当前具体的实际情况，发出适应情况的具体指示。"④为了使部属准确、明了地明确任务，他对发出的每一个战斗命令，总是逐字逐句地推敲琢磨。他常说："打仗这玩意，可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⑤他还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范围所及，专门规定了基本命令与战斗命令、训令与命令的不同形式，以便于各级指挥员分类掌握和使用。他反对只凭想当然就投入战斗的草率行为。他曾尖锐地指出："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行为"。当年与刘伯承共操帅印的邓小平政委曾这样称赞他："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们的口语"。⑥可见，刘伯承对任务要素的把握是相当重视的。

（二）敌情是"五行"的重点，是制订作战计划的主要依据之一

弄清什么样的敌情，才能有什么样的对策。刘伯承反复强调："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才会有依据"。⑦虽然敌情往往是一种"模糊"的面孔，加重了掌握的困难，但是

辨别真伪，判定虚实，却是实施正确作战指导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了掌握敌情，刘伯承告诫部属："一切材料的取得与整理，特别在判断情况时，须考察来源与实战参证，勿为敌人佯动、伪装、谣言所欺骗"。⑧"看问题必须抓紧本质而不受现象的影响，侦察研究而后加以判断其可能性，在几个可能当中找主要的环节。"⑨他进一步指出，研究敌情，"就是：毫不急躁地寻求与创造敌人的弱点，以及避开敌人长处，"⑩"要仔细侦察，冷静估计，踏实报告，精密处理，切不可因对我有利而放大良好情况，因对我有害而缩小有利的情况，更不可事前轻视敌人，疏于戒备，临事仓惶失措，受制于敌"。⑪细读刘伯承的军事论著，深为他对敌情透辟地分析，对敌之特点维妙维肖地描述所叹服。60年代刘帅曾幽默地谈到，"打仗嘛，你摸过来摸过去，无非是要把敌人的脾气摸透，最后吃掉它！"⑫一句话，形象而又生动地道出了掌握敌情要素的重要性和真谛。

（三）我情是"五行"中的物质本体，是能动作用的关节点

真切地掌握自己的情况，是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刘伯承把我情即自己部队的情况列为作战指挥的三个关节之一。指出：不得于部队的情况，就不能取胜。并具体解释说："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以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⑬他在《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中对我情有过这样一段分析："我利于夜战、近战、野战"，"无现代技术装备，火力与破坏力弱，不利于火战与攻坚"，因此，"在战术动作上，力求出敌不意，施行奇袭；在兵力使用上，则于估计情况变化时，适时抽集后备力量，以求自己有用之不竭的兵力"。为了解和掌握自己的部队，他要求各级必须深入所属部队，不要自以为熟悉而给疏忽了。对部队各方面的情况都应烂熟于胸中，能够随口说出。作战中，刘伯承对部队情况地掌握更加具体，他规定各级司令部必须逐日绘出所属部队的"标示图"，让指挥员对所

属部队的情况一目了然。他要求与所属各部队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以切实掌握我情，实施正确及时地指挥。

（四）地形是“五行”中其它要素存在的空间形式，是作战指导的关节要素之一

地形以点、线、面的形式与敌情、我情相结合，成为影响任务的客观要素。对于地形的价值，刘伯承这样写道：“河川、山地、道路、城寨与地形的平坦、起伏、开阔、隐蔽等之影响于敌我的行动者，就不外乎是观测或是遮蔽，是射界或是掩护，是交通或是障碍；从作战方向去看河流、山脉、公路、森林等态势延长的地带是直幅的或是横幅的。若是直幅地带（或叫直走廊）则多利于进攻，若是横幅地带（或叫横走廊）则多利于防御。当然这要从敌我现有装备的优劣与进攻防御的不同去判断。”⑭他提倡指挥员亲自侦察地形，“以期明了真实的地形”，认为，“事先实地侦察地形重要的很”，“如果不先去看，可能演成部署上的错误”。⑮他表扬抗战初期打得几次漂亮的歼灭战，“都是高级干部先于部队潜入作战地侦察地形，决定部署”的结果。由于地形对敌我双方作战行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同一地形，对敌方的有利，势必制约我方的行动；相反，我方的地势占先则就成为敌方的行动障碍。因此，刘伯承还十分重视对地形的改造。从构筑攻防合一的“掩袭洞”，到“地平线下前进”的近迫作业；从根据地内的地形改造，到破击敌人的交通线，招招式式都体现着对地形的利用。1962 年，担负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指挥重任的刘伯承元帅再次重申：“兵要地理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⑯

（五）时间是“五行”中其它要素相互联接的纽带，也是作战指导的关节要素

时间体现的是作战的运动过程。它以其不可逆转的特性作用于战机，调节着作战的进程。对于时间的意义，刘伯承指出：“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在于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

时间一定要准确，”⑰一定要把握好。为了争取时间，他在“预”字上狠下功夫，对战局的发展加以预见，对作战的“重心”转换预作部署，对伺机歼敌的战场加以预设，对部队的行动给以预先号令、预备方案并建立预备队，所有这些，都为赢得时间，争取主动，抓住战机创造了条件。在时间的把握上，刘伯承很重视“度”的问题。他解释说：“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对于时间的战术运用，他总是结合天候一起考察。如对怎样选择进攻敌人的时间，他这样分析道：“倘主攻方向上我火力有压制优势时，于黎明前从东方主攻，一则收朝阳照明目标之助；二则便于白天决战。如系奇袭，则以深夜为宜。战斗对峙后，如实行黄昏攻击，特别是从西方进攻，一则可收夕阳照明之助；二则我火力掩护与开始的指挥协同，较夜间确实；三则可破坏敌人由白天部署转人夜间部署的实施，使敌在不利于夜间战斗的态势下进人夜间战斗，不易实行反扑。但是，当我已转人纵深战斗，特别是在敌人失去优势而我急需扩张战果时，则利于白天攻击，但也必须日以继夜地猛烈攻击。”⑱刘伯承经常告诫部属“做事要有计划”，并明确指出：“计，就是计算时间”，只有时间才能把作战的诸因素协调起来，发挥作用。因此，他不论是在理解上级给予的任务或是给所属下达命令、指示，总是把时间作为重要的环节加以明确。由于时间这一作战要素，对敌我双方都是不偏不倚的。所以，要想夺取和保持作战的主动权，倾注在时间的注意力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二、“五行术”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军事辩证法的原理告诉我们：战争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运动过程，不能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观察、处理

复杂的战争问题。刘伯承丰富的战争实践，使他深知其中之奥妙。他的“五行术”，就是一个辩证认识与把握战争和战斗实际的“方法之宝”。他经常提醒各级：“情况是辩证的，我们的指挥也是辩证的”。⑲

其一，“五行术”的各要素是相互联系的。

刘伯承总是用联系的观点考察与把握“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大要素，认为要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上“综合估计考虑而定下决心”。他指出：对敌情“必须细心思考清楚，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对比着看相互的关系，构成正确地判断。”同时，对所处的地形，“必须结合敌我态势及互相影响的行动，一并加以研究而判断之。”并进一步说：“但是我们却不要只限于这样一般的军事观点去判断，就是要从我们的任务，在此时此地围歼某一具体的敌人，如何便于使用现有的兵力、火力的观点去判断，就要从被围的敌人将如何利用这一带地形来抵抗我之围歼去判断，”⑳1946 年 9 月，刘伯承在晋冀鲁豫战场指挥的定陶战役中，其对选择首歼目标敌整编第 3 师的分析判断，就是一个将“五行”要素联系运用的范例。从任务讲，首歼该师体现了军委“先歼敌一路”的总意图；从敌情讲，该师为蒋之嫡系，打掉他，可使敌全线溃退；且该师骄纵轻敌，虽为嫡系但不易得到友邻支援；从地形讲，该师刚从中原调来，地形不熟、情况不明；从时间讲，该师连战疲惫，又仓促投入战斗，准备时间不足。正是从“五行”的相互联系中，刘伯承抓住了敌整编第 3 师的弱点，施之以“猛虎掏心”，实现了既定的作战目的。

其二、“五行术”的各要素是相互制约的。

刘伯承反复强调，“五行”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不是平起平座的，它可因情况的变化而处于不同的位置，且相互制约。因此，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应注视：根据新的情况机断行事，灵活执行其计划，”解决好“五行”中最具有制约性的因素。例如，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最后关口——抢渡淮河的行动中，当时先头部队对淮

河水情调查的结论是“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因而整个部队靠着仅有的十几只木船抢渡。面对尾追之敌“离淮河渡口只有30多里”的严峻形势，能否迅速渡过淮河已成关键。为了迅速渡过淮河，刘伯承司令员将关注的重心，放到了淮河水情上。柱着一根长过身高的竹竿，带着两个手提马灯的警卫员来到渡口，登上一只小舢板，亲自执险探察……调查的结果是“不要架桥了，叫部队迅速徒涉！”至此，刘邓大军终于战胜了最后一道险关，进入了大别山区。又如，1948年初，在我军胜利实施洛阳战役后，刘邓首长本拟乘胜举行阜阳战役，以“吸打敌援”的战法，调动张轸兵团于淮西，争取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尽管部队开始行动了，但当发觉敌企图以阜阳为诱饵，调集强大兵力合击我攻城部队时，刘邓断然放弃了原定计划，调动部队就势向西袭取上蔡、汝南、驻马店、确山、遂平、西平等城镇，拆散了敌人的阵势，为下一阶段作战造成了有利的态势。可见，能否把握“五行”要素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是打胜仗的根本保证。

其三，“五行术”的各要素是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刘伯承指出，“定下决心应在研究任务与研究情况（敌人、我军、地方居民，地形、时间）之后，其意即在打下正确决心的基础。”㉑也就是说：“五行”共同构成决心的基础，缺一不可，缺少那个都会影响决心的下定和已定下的决心的正确性。而全面的把握好“五行”就可较多的占有先机之利，增大取胜的把握。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就是刘帅全面把握“五行”的杰作。他之所以能神机妙算，一而再的伏击成功，就在于他全面弄清了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并在其之间的有机结合上寻找了战机。

其四，“五行术”各要素是客观与主观、静态与动态、可能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刘伯承常常教育全军：“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必须研究敌我两方，必须把学习与之使用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好好地融洽起来。”㉒他指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是

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㉓只有周密的地形、敌情的侦察，与正确的情况判断，才会有正确的决心和处置。贸然从事，乱打一顿，是打不出好仗的”。为使主观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他强调，要重视侦察，尤其是高级干部要亲自侦察，以掌握第一手材料；要正确判断侦察到的材料，不可为某种片断材料所束缚；他要求，干部亟须提高自己的战术素养，要把所属全部力量，有组织而有艺术地适时发扬出来，以取得最大的胜利。对于作战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刘伯承十分重视，潜心研究。他从不静止地看待作战中的各种情况，认为运动是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他指出，要经常思索可能的敌情变化，绝不能总是用一个战术来对付敌人，要在动与静中找出有利于打击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规律；他精辟地阐述游与击的辩证关系，指出，要游要击，并使游与击相互配合。他曾运用动与静的原理，分析敌我态势，讲解我之战术：袭击是敌处静，我处动；伏击是我处静，敌处动，急袭是敌我都处于动的状态；“吸打敌援”是动静结合的战术手段。可见，把握“静”与“动”是刘伯承巧用“五行术”的一大特色。刘伯承对“五行术”的运用，还体现在可能与现实的辩证统一上。他指出：“消灭敌人要勇敢估计与对比敌我力量，地形和时间，而建立之于有胜利的条件上。如果没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性，那就应大胆地抛弃这一目的。”又说：能歼敌时则打，不能歼敌时则不打，这样行动是自由的。他认为：机断行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行为；机断行事，能够弥补情况判断上的不足，以矫正决心部署与作战实际变化发展上的差距；机断行事，是应付作战中的突然情况，力避被动，力争主动的关键。足以见得，在“可能”中把握“现实”，在“现实”中实现“可能”，这是刘伯承善用“五行术”的又一特色。

综上所述，“五行术”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五行术”是辩证之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稳操战争胜利之轮的舵盘。

三、“五行术”从作战指导上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战争的特征，毛泽东指出，战争现象较之其他社会现象更带所谓“盖然性”，然而战争也是一种物质的运动现象，是有规律的，战争规律也是可以认识和驾驭的。他进一步指出，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是进行正确的作战指导的基本方法。刘帅的“五行术”正是正确地解决了作战指导上的基本规律问题，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五行术”从战争认识论上丰富了军事辩证法思想

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从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开始，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在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进行概括，认识诸事物的共同本质。战争的现象是与许多军事的、政治的、自然的、社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最终表现为敌对双方的军事对抗与胜负结局。怎样把握和认识作战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一直是作战指导者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从“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古代兵法，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诀”，都在寻求“致胜”的认识途径。战争的客观的情况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一直成为人们寻求的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刘帅丰富的军事生涯，使他既没有在前人的“经验”面前顿足，也没有拘泥于对军事原则的理论抽象，而是从“致胜”的诸多因素中，提炼出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大要素，形成以围绕指挥员定决心为主题的“五行术”，使作战指导进入了一个求得“真知”的新境地。一则，“五行术”是作战的最基本要素，它既是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的思维过程的衍生，更是对“十六字诀”的具体深化。二则，

“五行术”的诸要素缺一不可，那一要素掌握得不确实，都会对作战产生影响。三则，由于作战是一个具体的完整的动态过程，因而对“五行术”的认识与把握，也只能在具体的动态过程中去实现。可见，以战争客观现实为认识对象的“五行术”，极大地拓展了各级指挥员的视野，为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奠定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二）“五行术”从战争方法论上丰富了军事辩证法思想

战争方法论，从本质上讲就是运用辩证统一的思想指导战争实践。认识战争现象是为了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而抓住本质的目的则在于“有的放矢”，解决“过河”的“桥与船”。刘伯承的“五行术”，向人们提供了指导战争，夺取战争胜利的有效方法。在实践中，他运用“五行术”出神入化地指导了战争。在战略上，他敢于面对强敌寻找敌之弱点，以弱耗强。在战术上，他善于以强灭弱，以集灭散，时之以虚对实，时之以奇对正。同是伏击战，有的伏击救者，有的伏击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是“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是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击”，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凡此种种，都极其精彩地体现着刘帅“五行术”的运用，同时也反映着“五行术”的战争实践指导作用。“五行术”作为军事方法论，无疑是对军事辩证法的极大丰富。

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发现和成就了刘伯承一代军事奇才，留下了许许多多蔚为壮观的战争画卷。在这个画卷中，刘帅的“五行术”可堪称为一支不可多得的“神笔”。我们要在现代战争的峰峦中攀缘，刘帅创立的“五行术”当不失为克敌制胜的“法宝”。

注　释

①②③④《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203、第 648、第 203、第 65 页。

⑤《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第 204 页。

⑥《刘伯承传》（军事学院内部本）第 308 页。

⑦⑧⑨⑩⑪《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457、第 241、第 444、第 415、第 66 页。

⑫《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第 460 页

⑬⑭⑮《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509、第 560、第 183 页。

⑯⑰《刘伯承传》（军事学院内部本）第 730、第 304 页。

⑱⑲⑳㉑㉒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422、第 548、第 560、第 505、第 505、第 387 页。

“五行”取胜　机动歼敌

戴定霖

“五行”,是刘伯承同志对影响作战决心五个要素的精辟概括，也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运筹帷幄，克敌制胜的作战指挥要旨。机动，是刘帅惯用的歼敌战法，也是战场指挥艺术中一着精采的妙棋。

作为刘帅身边的一名参谋人员，我仅仅依据个人耳闻目染与体会，就以下两个问题，谈点粗浅的感受。

神机妙算　“五行”取胜

所谓神机妙算，用刘帅的说法，完全是靠“五行”这五个要素计算来决定的，这是打仗下“决心”的基础。所谓“五行”，刘帅于 1948 年 6 月 15 日，在河南南汤新庄中原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曾经讲过:“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现实情况”是什么呢？刘帅具体提出了五个要素，这就是：“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并将其概括为“五行”。“五行”本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所指的金、木、水、火、土，刘帅借用此概念于军事指挥上，可谓一大创造，是前无古人的。

刘帅在指挥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就是他十分重视各级指挥员对“五行”必须真正的了解，要做到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在作战指挥上，他之所以神机妙算，以“五行”取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准确地掌握“五行”，灵活地运用“五行”。下边，我依据“五行”的次序，简要谈谈个人的看法。

“五行”之一，就是任务。刘帅十分强调任务在作战中的重要性，认为明确任务是完成任务的重要前提，因而他把任务列于“五行”之首，作为五要素的中心。他说：“指挥员给予部属的任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的行为”。给任务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自已去执行任务，是否有可能完成？如果你也不明确，切不可要下级或战士去硬拚，“不能随便多死一个人！”正由于这样，为了让部属真正明确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凡是他动手起草的作战命令或指示，总是深思熟虑，认真思考，逐字逐句的推敲琢磨。有时，对刚刚写过的文电，还要反复地进行斟酌，看看是否还有不够确切的地方，一旦觉察有不妥之处，便立即重新修正。他说：打仗“不比唱戏，真刀真枪的要死人哇！”，“一点也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的，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布置任务与完成任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布置任务，是明确任务的一个方面；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则是弄清任务的另一个方面。为此，刘帅对参谋人员的要求特别严格，他说：参谋，要有参有谋，要动脑子。当任务下达之后，要做到及时检查了解有关部队接到命令或指示的时间，以及对任务的理解与执行情况，甚至一份作战计划，从拟制、下发到部队执行的全过程，都要能够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落实，有报告，一旦发现问题可以立即纠正。刘帅认为，明确任务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只是取胜的一个首要因素，要更好地完成任务，还必须将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诸因素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是打仗下决心不可缺少的五个要素，切不可顾此失彼或相互割裂。

“五行”之二，是敌情问题。刘帅非常重视敌情，并把它看作是“五行”中最重要的要素。他说：“我过去常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打仗嘛，你摸过来摸过去，无非是要把敌人的脾气摸透，最后吃掉它！”。对敌情的研究包括各个方面，如敌人将领的指挥能力、个性、部队士气、装备、内部矛盾等等，都

要详细调查研究，了如指掌。他不但自己精心地研究分析，而且要求参谋人员也要善于识别和掌握敌情的变化特征与规律。刘帅在指挥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缜密细致，深思机断，因敌变化。抗战初期，因为我军对日军的作战特点还不甚了解，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情况，他经常是亲临前线观察敌情。如马山之战，他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在山坡上的树丛中观察，最近时仅距敌人 30 多公尺，连敌人脸上的胡子都能看得清楚。刘帅常用“烧香找错了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告诫那些忽视敌情打莽撞仗的同志。由于刘帅正确地掌握敌情而取胜的战例是很多的，例如：1939 年 7 月，敌酋梅津指挥几个师团“扫荡”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妄图一举摧毁我 129 师首脑机关。当时师部驻辽县东南山区，那里有一条羊肠小道直通武安，我方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没有标出这条小道，但在缴获的日军地图上却标出来了。刘帅判断分析敌人很有可能从这条小路来偷袭我们，他预先命令加强对这个方向敌情的侦察。到了半夜 23 点钟，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果真地从这条小道偷偷的来袭了。刘帅指示师部提前 3 个小时转移，结果使敌人扑了个空。又如：1938 年 2 月长生口之战，我军袭进了旧关，包围了日军的据点，并趁敌人出动 200 余人，乘汽车 8 辆赶来增援，由于准确的掌握了敌情，增援之敌大部被我歼灭，计击毙敌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 130 余人，缴获迫击炮 3 门，重机枪 2 挺，步枪 50 余支。

“五行”之三，是我情。刘帅对我情的了解，从来都是身体力行的，堪称表率。他认为，了解我情，是“五行”中战胜敌人绝不可忽视的要素。既要“知彼”，又要“知己”，两者决不可少。“知彼”意义重大，容易被重视，而“知己”则不然，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了解与掌握自己部队的情况他是非常重视的，经常率领机关干部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并以此作为“知己”的重要手段。凡到部队，他总是一再叮嘱大家要注意态度，说话要和气，工作要扎实，要严谨细致，不浮漂，不摆架子。对部队官兵关系，士气，

管理教育，训练素质，伤病员情况，以及武器装备保养，损耗和补充情况等等，都要了解清楚，心中有数，不可粗枝大叶，敷衍了事。他常告诫大家说："粗枝大叶会死人的！"对自己，他总是身体力行，毫不例外，无论走到哪里，他随身总要携带地图，笔记本和放大镜。在向部队了解情况时，他常常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学习、训练、生活、吃饭、睡眠、穿鞋、走路，都要询问清楚，不仅亲自听而且亲手记。在了解情况倾听反映时，总是谈笑风生和气可亲，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把心里的话讲完。对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凡有条件的立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他都是不厌其烦的、耐心的进行说服教育，使大家感到十分亲切温暖，印象深，效果好，教育大。刘帅为了更好地掌握部队有利于指挥，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都要求掌握好部队的行动，尤其是在战斗频繁的情况下，对部队的一举一动都要清清楚楚，如部队的行军路线，进展速度，具体位置，驻地的变动，以及周围的环境等等，都要通过各种手段，始终掌握，重要情节要及时标在图上，以便随时进入情况，实施指挥。刘帅深入部队掌握我情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对部队素质、武器装备、人员伤亡、作战特点、指挥员的性格，甚至对部队哪个善长游击战，那个善长阵地战，那个善攻，那个善守，都了如指掌。在用兵指挥打仗上，他不愧为"知彼知己"，"得心应手"，威震敌胆的常胜将军。

"五行"之四，为地形。刘帅在对战场地形判断与选择上，是十分强调的。他说：对战役所在的地形，必须结合敌我态势及互相影响的行动，一并加以研究而判断之。河川、山地、道路、城寨与地形的平坦、起伏、开阔、隐蔽等之影响于敌我的行动者，就不外乎是观测或是遮蔽，是射界或是掩护，是交通或是障碍。从作战方向去看河流、山脉、公路、森林等态势延长的地带是直幅的或是横幅的。若是直幅地带（或叫直走廊），则多利于进攻，若是横幅地（或叫横走廊）则多利于防御。当然这要从敌我现有装备的优劣与进攻防御不同去判断。但是，我们也不要只限于这样

一般的军事观点去判断，而要从我们的任务，在此时此地围歼某一具体的敌人，如何便于使用现有的兵力、火力的观点去判断，要从被围的敌人将如何利用这一带地形来抵抗去判断。其次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敌人在不断地被围歼而有了失败经验之后，处在各种地形如何行动。假如我们对敌情、地形判断正确，善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又善于利用地形、隐蔽合围，对准敌人之弱点，实施突然的钳形突击，就容易收到歼敌的效果。刘帅一贯主张指挥员在组织战役或战斗时，要亲自勘察战场，选择阵地。他说："战场乃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足以说明地形在"五行"取胜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刘帅借助有利地形歼灭敌人的战例是很多的，神头岭之战就是一个范例。1938 年 3 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打击晋南之敌，刘帅运用"攻其所必救，歼灭其救者"的战法，把歼敌地正确选择在神头岭，他先以一个营的兵力作钳制部队，奇袭日军的重要补给线——邯（郸）长（治）大道上的兵员、物资集结地黎城，以此来吸引驻守潞城之敌来援；同时，秘密将主力三个团部署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16 日拂晓，我钳制部队猛袭黎城，潞城之敌急驰增援。14 时，当援敌越过神头岭时，我伏击部队居高临下，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然出击，经过激战，日军 108 师团钳尾部队，16 师团林清部队，以及骑兵等计 1500 余人，均被我军歼灭。这次神头岭之战，刘帅为了利用有利地形达到短兵相接、出奇制胜的目的，选定的设伏地区地形非常复杂，敌人陆空技术难以施展，骑兵难以机动，步兵难以展开，利用敌人司空见惯的原有工事，将部队隐蔽配置在公路两侧。由于地形适宜，布势得当，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被我打得茫然不知所措，首尾不能相顾。仅两小时 1500 余敌人均被歼灭，真正达到势险、节短之妙。这一仗，就连侵华日军也不得不称之为"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难以对付！"。又如：襄樊战役也是正确选定战场的又一典型。1948 年 6 月，在襄樊战役之前，刘帅根据党中央

赋予的任务，在各纵队领导同志的会议上，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战场形势，他说：从襄樊的战略位置看，中原地区汉水流域是古战场，而襄樊地区则位于汉水流域的中段，地处川陕鄂的要冲，夺取此地，则直接威逼武汉重镇，进而可南渡长江，西进四川；从敌情上看，在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集团的联合战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的弱点，在襄樊地区开辟战场，不仅可以遮断敌华中白崇禧集团与西北张治中集团的联系，而且可有力地配合我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战场的行动，同时还可以进而开辟汉水两岸流域，变汉水为我们的内河，为建立渡江入川的战略进攻基地奠定基础。他既着眼于当时的敌我态势，又高瞻远瞩的照应了我军尔后战略行动的发展，定下了战役决心，取得了毙、伤敌人3500余名，生俘绥区司令康泽，副司令郭勋祺以下官兵17000余名，收复老河口、光化、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东津湾等城镇八处的辉煌战果。

“五行”之五，就是时间。刘帅认为，时间在部队战斗行动中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是重要的，有时胜败在于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时间一定要准确，腰来腿不来是无法取胜的！”。对如何珍惜时间与精确运用时间，他对机关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办事必须及时认真，要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切不可拖拖拉拉，尤其在作战期间，面对武器装备较先进的日军作战，精确计算时间和准确地掌握时间，就更加显得重要了。无论是理解任务抑或是给部队下达任务，他总是把时间作为“五行”中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虑。他常说：指挥员在明确任务时，对时间要精密地计算，对战机要准确地掌握。对部队开进的时间，驻止与集结的时间，以及出击和撤收的时间等等，都要作为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弄得一清二楚，只有这样，才便于捕捉战机，歼灭敌人。在对付敌人“扫荡”上，刘帅掌握时间与战机方面都非常出色，真正做到了恰到好处。例如：1942年5月，日军对我根据地“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抗日军民，摧毁我根据地。当时，刘帅

对敌人战术特点作了深刻的分析，把敌人各路兵力构成的合击圈，称之为“利害变换线”。他说：当敌人到达这个线的时候，我军必然要受到威胁。为了趋利避害的打击敌人，他要求指挥员必须果断，在敌人合围将拢而未拢时，选择打击敌人薄弱的一路，部队应迅速转移到外线，这是至关重要的。为此，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随时随地准确地计算时间，掌握敌我的行动时间和战机，如果迟了就要陷入敌人的合击圈，早了将误入敌人的纵深。一次，他根据敌人的进展速度，在精确地计算了时间之后，命令部队必须于午夜12时之前转移，凡坚决执行命令按时行动的部队，都安然突了围，破坏了敌人合围计划，取得了突围的胜利，真是“神机妙算”啊！

趋利避害　机动歼敌

刘帅深谋远虑，指挥果断，在用兵谋略中，十分强调机动，他解释机动就叫做“趋利避害”。他说打仗就是“趋利避害，趋胜避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他要求部队打仗时，应集中机动打击敌人一点，切“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只只跑掉”。在《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一书的编辑后言中他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实有它特出之点，即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他还对我军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法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在他指挥的许许多多的战役中，所充分表现出的卓越的大军事家的风度和才能，往往都是通过“趋利避害，趋胜避败”，“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机动歼敌的战法，来改变敌我态势、牢牢掌握战役的主动权的。1946年11月21日，刘帅对新华社前线记者发表谈话

时，还专门谈到“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打法也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我们从他们的手边擦过去，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打朱楼、邵耳寨、上官村就是采用了这种打法，一下子就解决掉，消灭了他们的旅部和总队部，俘虏了旅长、副旅长和总队长。刘帅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怪”字，指的就是撇开敌人的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不管，从敌人的结合部进入其纵深配备，分解割裂，先击其首脑部。以“出敌不意开始钳击的强攻”，打碎敌人的指挥机关，迫使失去指挥的敌人迅速瓦解、溃散或投降，达到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的目的。12 月 6 日，在对记者谈话时他又说：蒋介石这回在滑县战役中使用乌龟战术，即所谓步步为营；另外他还有一套，是并进长追，从今年 8 月 10 日以来的 100 天内，在冀鲁豫我跟他打了五仗，消灭他 11 个旅。第一仗是陇海之战，他是步步为营，我干掉他 2 个旅。第二仗是定（陶）曹（县）之战，他改成并进长追，送掉 4 个旅。第三次是张凤集之战，又是并进长追，送一个半旅。所以这次又换成步步为营，采取所谓战略的进攻，战术的防御了。总而言之，这一套吃了亏，换成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两套都带一点。这就是所谓翻过来牛皮楂，翻过去楂牛皮。他又说：蒋介石的致命弱点，是在于他所进行的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无论哪一国的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小于机动兵力。然而，他搞独裁，就要压迫人民，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他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第 5 军、第 11 师这样的完全美械部队，都不得不拿来守备，太不合算。并且他现在规定一营人不打仗，每个地方守备的兵力都在一营以上。他把部队集中到前线之后，后方空虚，民变蜂起，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也就为我们机动歼敌创造了条件。刘帅指挥的巨金鱼战役和高山铺战役两例，堪称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典范：

1947年1月，在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再次显示了刘帅灵活机动的用兵方法和卓越的指挥艺术。这次战役，他所采取的战法就是避开强敌，大踏步向敌占区挺进，连续行军20天，辗转300余公里，取得了歼灭敌人16000余，收复县城9座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主要由于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再就是予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同时采用了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的战法。这是他对古代兵法的运用和发展。《孙子兵法，虚实篇》："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然而刘帅在这里却提出了："攻其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强调了在进攻取得胜利之后，不怕疲劳，继之以追击歼灭其退者，以扩大机动歼敌之战果。

1947年9月底，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北部实施战略展开之后，敌人集中7个师的重兵，妄图合围我主力，而在鄂东、皖西，则只留少量兵力防守。而对强敌分进合击的态势，刘帅决定先施"拖刀计"，分路突围，在分遣、机动中创造战机：以部分兵力留在山北，佯作主力，牵制迷惑敌人；以三纵向皖西机动，"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疾回师，放手歼敌"，他亲自率领主力西出鄂东，把刀锋指向敌人兵力虚弱之九江对岸。我各路部队，经过多日辗转机动，寻机歼敌，于10月20日前控制了长江北岸达300华里，威震大江南北。蹲在庐山的蒋介石深恐我南渡长江，急令其40师及52师82旅由浠水向广济沿公路急进，对我盯梢，妄图击我侧背，以阻我渡江。这样，刘帅的"拖刀计"便拖出一股孤军冒进的敌人。10月25日，他决定杀他一个"回马枪"，在敌必经的河北省浠水县之高山铺地区，以预伏的手段歼灭该敌于运动之中。高山铺位于一条狭长的山谷中，公路由西北向东南穿过，两边是高山，这里地形对我布置"袋"形阵地极为有利。刘帅在部署兵力的同时，派出一支小部队化装成地方游击队，作为"诱饵"，迷惑敌人，边打边退，诱敌入"袋"。10月26日上午，敌人进人我伏击地区，我立即实施分割包围。27日9时，我全军发起

总攻，激战至 14 时，敌一个师和两个半旅，计 12600 余人被我全部歼灭。这次战役，刘帅将机动与伏击巧妙地结合，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他机动歼敌的军事思想。当敌分进合击时，为趋利避害，刘帅巧施"拖刀计"，以分散机动的形式跳出包围圈，在机动中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为伏击创造条件；当敌被我引诱上钩，孤军冒进时，他果断决定杀出"回马枪"，伏击运动之敌。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同志在实践中不但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且形成了他独特的用兵方法，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今天纪念刘伯承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军事理论研讨会上，学习刘帅指挥艺术，作战谋略与用兵方法，并结合现代作战的新特点，好好研究一下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战法，是很有意义的。

浅析刘伯承实事求是的作战指挥艺术

蔡家作 大校

刘伯承在战争实践中,潜心学习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创立了很多蜚声中外的光辉战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指挥风格,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

一、着眼战略全局,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

刘伯承善于从战略全局出发,运筹、计划、组织和指挥战役。他是战区指挥员,但他作战指挥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不是局限于本战区的范围之内,而是全军战略全局,坚持全局"一盘棋"。他深刻领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以自己创造性的战役行动推动战略形势的发展,并根据战区的军事斗争形势和任务提出实现战略意图的建议,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1、深刻领会中央军委战略意图,从全局把握战区行动方向

正确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对于指挥和筹划战区行动具有决定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①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刘伯承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战略方针和战略决策都有深入而独到的理解,悉心领会精神实质,并结合实际,用以指导战区行动。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央军委决心举行全国性反攻,把战略进

攻的重点选定在大别山区，并作出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战略部署。估计到外线作战的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了可能的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刘、邓认真领会军委战略意图实质所在，既不打陇海，也不打新黄河以东和平汉路，乘敌人的重兵集团陷于陕北、山东这两个重点地区而不能自拔之机，率十几万大军，轻装疾进，直趋大别山，实施中央突破。他们6月30日横渡黄河，挺进鲁西南，消灭了敌人9个半旅后，提前于8月上旬开始南下，马不停蹄地穿越黄泛区和沙河、汝河、淮河，先于回援敌人之前进取大别山。当时蒋介石从山东战场抽调7个整编师、从豫北战场抽调4个整编师，对刘邓部队进行“钳形攻势”，妄图在黄河以南，菏泽、巨野公路以北与我决战。但敌军还没有展开，刘邓大军又已秘密南下，使蒋军一时找不到我军去向。及至发现我军南下，仍判断我是不敢与之决战而被迫南窜。直到我军出现在大沙河以南地区，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却为时已晚。实践证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在蒋军心腹地区插上一把利刃，彻底体现了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圆满实现了毛泽东战前提出的三种可能中的最佳方案，不愧为深刻领会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楷模。

纵观刘伯承革命战争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领会中央军委战略意图时，主要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分析战争性质和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形势入手，不但从战区局部而且从全国范围内做到知彼知己，了解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依据和来源；二是从分析这一战略阶段与下一战略阶段、上次作战与下一次作战的关系入手，使战区作战环环紧扣，上下贯连，使之完全符合军委战略意图；三是从分析、对比作战条件的前后变化和敌我统帅部战略指导的演变过程入手，使作战指挥从整体上和局部上都能适应情况变化，做到灵活机动，与军委意图拍拍皆合；四是与其他领导以及下级指挥员共同分析战争形势，广泛听取大

家意见，通过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和才干，加深对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理解。

2、自觉服从全局需要，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

学习和研究刘伯承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用兵特点，人们首先称道的是他全局在胸，有利于全局的仗，坚决打好，做到攻必克，守必固；不利于全局的仗，即使对局部有利也坚决不打。始终把战略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局部放在战略全局之下来考虑，只要战略全局需要，即使牺牲局部，也要坚决执行。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通过黄泛区，脱离大后方，丢弃重装备，跃进大别山，走了一着险棋，也是一着妙棋。刘、邓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实现军委意图，战斗艰苦卓绝，战略利益功垂千古。这就是他们牺牲局部、服从大局的明证，这是人所共知的。

1948 年 7 月，配合华野打的豫东战役以及中野独力打的老襄战役，也是刘伯承坚决贯彻中央军委战略决策的一着好棋。原在 1948 年 6 月 13 日，刘、邓即下达了老襄战役的作战命令，计划 6 月下旬向老河口、襄樊之敌发起攻击。正当此时，华东野战军发起了豫东战役，蒋军急令整编第 18 军兼程北上增援，华中白崇禧机动兵力张轸兵团也有沿平汉线北进的迹象。为配合我军豫东行动，刘、邓以大局为重，决定暂停老襄战役，急调 1、2、3、4 纵和华东野战军的 10 纵队赴平汉线箝制和阻击敌整编第 18 军，阻滞敌军北援。当华野攻克开封，白崇禧判断我将东西会合，向华中进军，下决心将其机动兵团向北集中，致使老襄之敌孤立无援时，刘、邓又与粟裕指挥的睢杞战役相配合，“乘机钻隙”发起原定的老襄战役，一举歼敌。既完成了配合华野豫东战役的任务，又完成了预定的老襄战役。老襄战役被朱德赞誉为“小的模范战役”。

淮海战役初期，刘伯承根据军委战略意图率领部队在豫西一带牵制敌军，使该区敌军不能他顾，为保障华野全歼黄伯韬兵团起了重要的战略牵制作用。这些都是刘帅胸怀大局的大将风范。

3、根据战场实际和总的战略形势，积极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

由于战争指导者与战区指挥员所处的位置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往往存在着一定差异。刘伯承不但是坚决执行战略决策的楷模，而且是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榜样。他本着对战争、对军委、对部队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审慎思考的基础上，多次对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对夺取战争全局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伯韬兵团战役发起前四天，刘伯承等根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役总方针，提出了截断徐蚌段、攻取津浦线的建议。即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夹住了敌人的头；中原野战军在豫西阻敌东援，揪住了敌人的尾巴；攻占宿县，就斩断了敌人的战略中枢，迫邱兵团南顾，使徐州的刘峙集团完全孤立，减轻对华野的压力。建议电告中央后受到了高度重视。军委及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战后，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建议作了高度评价。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最初中央军委计划在第一阶段歼灭黄伯韬兵团后，接着在徐州地区歼击邱清泉、李弥兵团，南线则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刘、陈、邓等认为：华野在徐东作战，历时多日，部队必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在运动中的黄维，远道疲惫，脱离后方。因而建议第二作战阶段重点为以中野在华野配合下，全力歼灭黄维兵团。经过反复酝酿磋商，中央军委最后完全同意这个建议。歼灭黄维兵团的结果表明，这一建议的付诸实施，对淮海战役的全胜有决定性影响，其中就有刘伯承的一分智慧。

二、深谙敌我情况，科学把握作战规律

正确的作战指挥从哪里来？对此，刘伯承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个因素叫做“五行”，指出：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②，“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知战之地，知战之时，才能打胜仗。”③刘伯承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善于全面掌握战场情况，特别是着眼特点、着眼变化和发展，准确把握作战规律，情况不明，宁愿不打，也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1、注重深入战场实际，搞好调查研究

复杂、多变、骤变，是战争不同于其它事物的特点，千百次战役固然有其共性，但很难找到两次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战役。指挥员能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关系到战役胜败的重要问题。刘伯承强调：“我们打仗是一件胆大心细的工作。对于敌情要不断的侦察、研究和判断，才能适时定下正确的决心。”④决不能“雾中取宝”。战争实践中，他对自己部队及指挥员的脾气，摸得熟熟的，哪个部队善于攻坚，哪个部队善于野战，了如指掌。他对敌人情况也摸得透透的，每个战役对要打的对象，战斗力如何，可能增援部队有多少，心中都很有数。对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它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都注重调查了解。

1947 年 8 月 26 日，挺进大别山途中，2 野 7 个旅开进到淮河渡口准备过河时，敌人的 7 个师和 1 个骑兵旅尾追而来，情况非常紧急。一位旅政委报告说：“旅长和旅参谋长调查了很多老乡，说是淮河正在涨水，很深，不能徒涉。”刘伯承问：“是自己侦察的吗？”并亲自拿着竹竿到河中探水，发现河水不深，流速很缓，可以徒涉，当即组织部队迅速渡河。就在我军全部渡过河后，敌军也赶到河边。这时，淮河上游的洪峰滚滚而下，敌人只好望淮兴叹，看着我军远去而无可奈何。事后，刘伯承指出：“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粗枝大叶会害死人的！”⑤试想，当时如不及时查清情况，下决心徒涉，待敌追兵赶到，与我呈胶着状态，必将增加我渡河困难，影响我挺进大别山的进程。

2、善于分析判断，透过现象抓本质

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不仅要善于掌握真实情况，还要善于分析情况，透过现象抓本质。刘伯承对侦察所得来的材料，特别是对所获取敌人的情况，从不轻易放过片纸只字，认真确定其可靠程度和时间，排除敌人的欺骗、佯动，进行综合分析，抓住关键问题，作出正确判断。定陶战役就是一例。

1946年9月，蒋介石在陇海路遭我打击后，集中徐州、郑州两个绥署30万人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仅5万人。能否粉碎敌之进攻，先打哪一路、哪一部？刘、邓对当时情况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敌兵力虽优我数倍，但多由陕南、豫西、淮北等地仓促调来，地形不熟，士气不高，且郑州（刘峙）和徐州（薛岳）两敌，素有矛盾；徐州绥署与郑州绥署两敌比较，徐州之敌兵力较少，战斗力较强，其中有所谓蒋介石“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整编第11师，但郑州各路敌军担任主要进攻任务，徐州之敌只是辅助进攻；从表面上看，郑州诸敌中，整编第3师全部美式装备，是蒋介石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刘伯承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认为整编3师形强实弱。因它骄傲轻敌，与其他杂牌军矛盾较深，我如打它，各杂牌军不会积极增援；一旦整编第3师被歼，郑州绥署各敌的进攻就会被粉碎；粉碎了郑州绥署各敌的进攻，徐州绥署各敌就可能溃退。因而果断地定下了先打郑州之敌，又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整编第3师的决心。实战证明，刘伯承分析得完全正确，当整编第3师被歼之后，敌人就全线溃退，使我乘机又全歼了整编47师，敌人进攻即被瓦解。

3、着眼战争发展，准确把握作战进程

战役以及每一战役的各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它有前后之间的联系，上一战役（阶段）既可以为下一战役（阶段）创造有利的条件，也可能造成尔后行动上的被动。因此，指挥员既要看到眼前，切实把握当前情况，又要科学地预见到可能的发展变化，全般考虑作战行动。刘伯承善于着眼战局发展，准确把握作战进程，

从来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而是走一步看几步，打第一仗为准备打第二仗、第三仗创造条件，从而顺利地把作战从一个阶段导向另一个阶段。平汉战役取得歼敌2万余人的胜利，就是刘伯承正确预见战役进程并予以有效控制和调节的结果。

1945年10月中旬，向华北进攻的敌人沿4条铁路，象四只爪子一齐伸出来（平汉一路是其主力），齐头并进，局势非常严重。为了粉碎敌人沿平汉路进犯，刘伯承指示部队："对强大的敌人，象猫逮老鼠那样，先把它盘软，再把它吃掉。"⑥在运筹作战部署前，他对战役的趋势和步骤进行了大体设想：首先狠打敌人从右路进攻的106师，争取高树勋起义；尔后以猛虎掏心的动作，捣毁马法五的长官部，使其溃变；接着全力追歼突围之敌，打败敌人的进攻企图。由于刘伯承的科学预见和正确指挥，有目的有步骤地创造条件，攻其一点，再及其余，整个战役一环紧扣一环，由战斗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的"黄粱梦"。

三、机动灵活用兵，巧妙地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

刘伯承在作战指挥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善于机动灵活地使用自己的兵力，调动迷惑敌人，使敌人出现判断错误和行动过失，为我创造适合发挥自身优势的战机，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他指出：作战指挥中必须力求"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发扬自己的长处，撇开敌人的特长"⑦。

1、积极主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更是双方指挥员智慧的竞赛。在战场上，谁掌握了主动权，保持了行动的自由权，谁就能取得胜利，"牛抵角只能啃骨头，最多也只能吃到排骨"⑧。在争取主动和保持自由时，最高的艺术，莫过于设计用谋，调动敌人而不为敌人所调

动，左右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左右。刘伯承骁勇闻名，尤其以多谋著称，他在战役、战斗中通过趋利避害，创造并捕捉了一次又一次战机，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

鄄南战役，就是他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争取主动，找弱点、造弱点、打弱点、不容敌救其弱点的结果。当时，蒋介石一面令顾祝同指挥刘汝明从菏泽北进，配合邱清泉之第5军及胡琏之第18军沿巨郓线西进，一面令第41师与第47师由滑县北犯，对我形成夹击之势。为避开与强敌僵持局面，刘伯承分遣小支队在敌人前进的方向上假装败退，籍以助长敌人的骄狂，激其大胆冒进；主力则秘密转移至董口、鄄城、箕山集、潘溪渡以北地区隐蔽待机。刘汝明果然中计，急令119旅向我追击，造成该旅脱离大部队数十公里的态势。刘、邓抓住战机，“回马一枪”，将119旅全歼于鄄城一带。

1949年4月突破黄河防线的作战，也是善于寻找敌人弱点和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敌人弱点，并不容敌人救援其被突击的弱点的战例。刘伯承窥破蒋介石长江防线是一条“死蛇阵”的弱点，同时抓住蒋桂两系接合部的弱点，令2野第4兵团先行在麻城发起对桂系白崇禧部的战斗，使其误认为我将出团风渡江抄武汉；同时又指挥4野第12兵团沿平汉线直迫信阳南下，威胁武汉，进一步造成白的错觉，将其在安庆的夏威军主力西调于九江、武穴。然后集中兵力于九江以东至江阴一线对准“死蛇阵”使出“迎面剪刀”。我先头船队仅十多分钟即冲过长江天险，抢占了滩头阵地，长江守敌全线溃乱。

2、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地使用作战力量

灵活地使用兵力，是作战指挥的中心任务。兵力使用得当，就能“一着之妙，全局皆活”。反之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刘伯承指挥作战之所以攻必克，守必固，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能够根据战场实际，时而合兵作战，时面分兵拒敌，灵活地使用作战力量。他和战区其他领导人一起，紧紧把握兵力使用和作战

指挥的重心，灵活调度和使用作战力量，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的神头岭战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次战斗，他以一个营的兵力作箝制，奇袭日军的重要补给线——邯（郸）长（治）大道上的兵站集结地黎城，吸引潞城之敌越神头岭来援；以三个团的兵力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其中一个营埋伏在距敌行进道路只有 25 米的旧工事内。战斗结果，敌第 108 师团等 1500 余人除小部逃回外，基本被歼。

1947 年 1 月，刘邓大军配合华野鲁南作战的兵力使用也很有艺术。当时，刘、邓分析并提出了几种可能的方案：派两个纵队赶到莱芜附近，参加鲁南会战；派两个纵队赶往邯郸，阻遏敌人进攻平汉线；派几个纵队到陇海路上，牵制住邱清泉；或以上三案全部去办，或选择其中一二。并进一步设想前面三案全部付诸实现，该用多少兵力，才能达到目的？如选其中一项，其它各项又怎么对付？最后决定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分为南北两集团：刘伯承率北集团行动，连下定陶、曹县、单县三城，邓小平率南集团行动，连克亳县、鹿邑。共歼敌近万，牵敌更多，有力地支援了鲁南作战。

定陶战役，在敌我 6：1 的悬殊力量对比下，刘伯承将孤军冒进的整编第 3 师作为首先歼灭的目标，集中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其它方面则以少数兵力箝制。在兵力布势上，以第 6 纵主攻大扬湖之敌，第 7 纵围歼方车王之敌，第 3 纵围歼倪砦之敌，第 2 纵看守可能增援的敌整编第 41 师、第 47 师和防敌突围。彼众而分，我寡而合，从而使我敌兵力对比在局部上形成 5：1 的绝对优势，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

3、不拘一格，巧妙地运用战法

从刘伯承战役指挥的实践和论述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非常注重借鉴前人的作战经验，并依据每次战役、战斗的具体情

况和特点，制定制胜方略。他创造了“围城打援”、“夺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等许多新战法，不囿传统，敢于创新，战法之活，堪称一绝。山西七亘村连续设伏，重创日军就是不拘常规，见机而作的范例。

1937年10月25日，获悉日军20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开进，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后，刘伯承师长判断敌人次日必经七亘村向平定输送军需物资，遂令72团3营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占领阵地，执戈待敌。26日拂晓，敌果然依计中伏。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敌人抱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满以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转移别处。但刘伯承抓住日军迷信教条的心理，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输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于28日在第一次伏击的原地部署第二次伏击，又毙敌百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乍看好象违背了兵法，其实，正是因为刘伯承摸透了敌人的意图，巧妙地运用了兵法。

刘伯承作战指挥的艺术，反映了作战指挥的规律，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本质特征，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作战思想和实践活动，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今天，我们研究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就是要以他为榜样，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继承和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军的传统经验与新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以指导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未来战争的实践。

（参与本文执笔者　洪泽波少校）

注　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93页。

②《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189页。

③《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129 页。
④《军事学术》1982 年第 5 期，第 19 页。
⑤《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第 358 页。
⑥《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版，第 188 页。
⑦《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第 380 页。
⑧《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93 页。

试论刘伯承着眼全局谋划战役的指挥艺术

黄佳伦　少校

刘伯承元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亲自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威震中外的重大的战役、战斗，他的作战指挥艺术脍炙人口。刘帅的指挥艺术内容十分丰富，本文谨就其着眼全局谋划战役的指挥艺术作初步探讨。

一、从实际出发，贯彻中央军委战略意图

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是筹划我军战役行动的依据。作为战区指挥员，刘帅总是孜孜以求地去理解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领会并把握其实质，以正确指导本战区的作战行动。从刘帅的军事论著和作战文电中可以看出，他在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战略意图时，主要把握了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理解各阶段的战略意图。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是依据对战争性质和敌我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基本情况的科学分析而形成的，是战争规律在战争指导上的客观反映，在战争过程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中央军委关于各战区、各阶段的战略意图，则是在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结合各战区、各阶段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是战略方针在一定战争阶段战区作战的具体体现。刘帅在领会中央军委各阶段战略意图时，十分注意结合战区情况，把握军委战略方针，将中央军委各阶段的战略意图同战略方针统一起来，并以此来谋划本战区的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对刘帅所在战区各阶段的行动方向

和基本任务曾有过多次重要指示，刘帅都能依据战略方针深入思考各阶段战略意图的核心问题，并加以全力解决。在战略防御阶段，他始终围绕中央军委关于内线歼敌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指导思想，抓住一切机会歼灭敌人，仅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就歼敌 75000 余人①。在战略进攻阶段，始终抓住了在外线站稳脚跟，逐步扩大歼灭战规模，适时进行战役或战略决战的战略指导核心，实施了突破黄河，千里跃进，在大别山区进行战略展开等一系列战役行动，进而圆满地实现了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战略意图。

第二，联系全国战局、战区态势，贯彻中央军委战略意图。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刘帅对影响全局、牵动全局的问题看得准，抓得狠，具有驾驭战略形势的卓越才能。他善于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在浩瀚纷繁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扬我之长，击敌之短，灵活地运用兵力，巧妙地调动敌人，形成我军战场优势，暴露敌人弱点，打击敌之弱点，争取战役的胜利。譬如，在抗日战争中，他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总方针下，提出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融合，适时调剂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分量”②的思想，首创“游击集团”的人民战争形式，即以战区县、区、村为单位，把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紧密结合起来，就地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久又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争取群众，瓦解敌伪军，开辟和建立根据地，对坚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报告中，对刘帅创造的这些灵活用兵的形式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第三，结合客观实际，能动地遵循和坚持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战争情况千变万化，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战区指挥员必须洞察敌我战略态势，从客观实际出发，能动地遵循和坚持正确的战略意图。刘帅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本着对战争负责，对中央军委负责，对部队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善于根据战局的发展，积极

提出自己的意见，创造性地实现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譬如，淮海战役中，军委的战役方针规定：第一阶段，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挟住敌人的头部。因此，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在碾庄地区围歼黄伯韬兵团作战，就成为第一阶段的重点。为保证我军会战的重点，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夺取郑州，向东横扫陇海路，从西面箝制敌人；刘伯承等指挥的中野一部紧紧揪住白崇禧这条大尾巴，把黄维、张淦两个兵团往西拉向白河、汉水地区，使敌不能东援徐州，首尾无以相应，以保障对黄伯韬兵团的围歼。刘帅在指挥部队执行牵敌任务的同时，对战争全局的发展十分关注。他根据军委的战略意图及敌我变化的态势，在围歼黄伯韬兵团发起前三天，致电中央，提出了“首先截断徐（州）、蚌（埠）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③的建议。中央军委采纳了刘帅的意见。此举，不仅为保证华野主力围歼黄伯韬兵团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前完成了对徐州敌军的战略包围，为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准备了良好的战场，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及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

二、从战略高度出发，运筹战役行动

战争的局部，即战役、战斗问题，同战争的全局，即战略问题，具有辩证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决定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并强调：“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的东西。”刘帅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理解很深刻，他在谋划战役行动时总是着眼于战略全局，确立“一盘棋”的思想，展开战役作战指导。

根据战略意图，选择作战方向。刘帅运筹战区行动，历来注意正确选择作战方向和歼敌目标，从而使每一战役行动的进行，都能直接地、有效地给战略全局以有利的影响，总能促使战略全局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例如，1946 年 6 月，国民党向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在西翼以 30 万兵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在东翼以 46 万兵力，进攻我苏皖和山东解放区。南线战场出现了严重的军事形势。当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山东形势吃紧之际，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受命到南线作战，反击国民党的进攻。到南线是向豫西打，还是向豫北打，或是出击豫东？刘帅根据战略意图和敌我态势，决定以破坏敌人的战略企图、支援我南线的东西两翼作战为枢纽，运用敌进我进，批亢捣虚，直捣敌人战略布势中既是薄弱部位，又是要害处的徐汴线，造成东威胁战略要地徐州，西威胁中原战略重镇开封，迫苏皖之敌西顾，调中原之敌东援之势，破坏敌在南线的战略部署和计划。这一行动，击中了敌人要害，调动了敌人，迫使敌不得不从追堵中原我军的兵力中抽出 3 个师，从向华东进攻的兵力中抽调 3 个师增援陇海路的徐汴段。从而有力的支援了中原和华东我军的作战，使南线的战场形势很快发生了根本变化。

根据战略意图，确定作战时机。刘帅在谋划战役，确定实现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时机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主动性和敏锐性，择机总是恰到好处。选定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机就是其中典型一例。1947 年 7 月，当我军胜利突破黄河防线，取得战略进攻的初战胜利后，是适当进行休整后再南下？还是撇开敌人立即南下？需要适时作出果断、正确的决策。当时我军连续作战，急待休整补充，中央军委已批准休整半个月行动的计划。此时，敌军则乘我疲惫之际，调集重兵妄图迫我主力背水作战；黄河因阴雨连绵，溃堤险情不断。面临天时地利都于我不利的局面，如何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刘邓首长权衡利弊，精心运筹，果断地改变原定计划，提前南下。刘帅指出："从战略全局来说，我军尽早尽快打出去，进一步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这是我们必须优先考虑

的事。应当不失时机地抓住敌人重点进攻陷入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迅速实施战略进攻，扩大战果，这是战略利益的需要。如果我们留恋于内线作战，虽困难较小，胜利把握也大，但这正是上了蒋介石阻我南下的当。尽快打到外线去，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克服。我军立即南下，实施战略进攻，还可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特效果"④。刘邓首长的决心迅速得到批准，这支战略突击大军，来了个金蝉脱壳，兵分三路，以锐不可挡之势，连续行军作战，闯过重重险关，突破层层阻拦，进入大别山区，成为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南线总兵力 160 个旅中的 90 个旅，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的。

根据战略意图，巧用各种战法。刘帅运筹战役作战，非常强调设计用谋，他常说一个指挥员不掌握奇谋方略，就无法克敌制胜。并多次反复阐明谋略制胜的要旨："敌我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斗智"；"实事求是，发展我们的战斗力，尤其是智力"；"打胜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斗智和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⑤。在指挥每一个战役战斗时，刘帅在把握了敌情、我情的基础上，总是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善施谋略，以智取胜，以勇克敌，在战争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精彩的活剧。例如，同样是伏击战，但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协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则"围而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则真围真打，既攻城又打援。同样是歼灭战，有的是"猫盘老鼠，有的则"猛虎掏心"，或"釜底抽薪"。对于刘帅巧妙多变的战法，日军头目感到神出鬼没，闻风丧胆；蒋介石的高级将领更感到莫测高深，无可奈何。

三、从战争的发展趋势出发，把握战役之间、战役阶段之间的联系

战争中，能否全局在胸，投下一着绝妙的棋子，以至想到第二仗第三仗怎样打法，关系着战争的进程和最终胜利。因此，战争指导者必须把握战争全局，深谋远虑，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地驾驭战争。

刘帅是驾驭战争的高手。他运筹战役作战，总是善于通观整个战局的发展趋势，从战略上着眼，科学预见和把握战争和战役的发展趋势及进程，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在还未走出这一步之前，就要预见到下一步或下两步的发展变化。在谋划这一战役计划的时候，同时也考虑到了下一战役的行动，在组织这一战役阶段作战的同时，下一战役阶段的作战方案已成竹在胸。善于用前一个战役阶段推进后一个战役阶段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扩大战果，用前一个战役的基础为后一个战役的胜利创造条件，使战役之间、战役阶段之间各环节紧紧相扣。仅从其上党战役前后的一系列部署看，就可见其将战役指导的原则牢牢建立在有利于推进战争进程的基点上的指挥艺术之妙。1945 年 8 月，刘帅在定下上党战役决心的同时，即命令冀鲁豫军区主力开向平汉线，结合太行、冀南军区各一部，加紧肃清新乡以北的日伪军，为打北上蒋军准备战场。还令太行、太岳军区各一部攻取焦作、沁阳等日伪军主要据点，扫清道路上的敌人，控制黄河北岸广大地区，制止敌人机动。正因为预先作了部署，所以在上党战役期间，我军才得以顺利的完成了围点和打援的艰巨任务。同时，为进行平汉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⑥。

注　释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第 226 页。

②③④《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3、第17、第76页。

⑤《元帅用兵之道》海潮出版社，第92页。

⑥《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68页。

论刘伯承战役指挥艺术

孙继章　研究员［文职］

刘伯承元帅是举世闻名的军事家，被誉为常胜将军。他在戎马一生中，亲自组织指挥或参予指挥的战役数量之多、样式之繁、规模之大、运筹之精彩、指挥之巧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七中全会给他的致敬信中所指出的，他“在一系列的重要战役中，特别是上党、平汉、淮海、渡江战役中，在进军解放西南战役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其“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伯承指挥艺术的内涵非常丰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现就其中几个主要方面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作战指挥的擘画艺术

战役成败的关键，除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外，靠主观指导（指挥）的能力。而主观指导（指挥）正确与否，靠深谋远虑的擘画。擘画的艺术是指挥艺术的集中表现。刘伯承的战役指挥艺术，首先而且主要是通过正确的作战擘画表现出来的。他的擘画艺术是由他深湛的学识、深邃的韬略、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的超群才能决定的。

作战指挥的擘画是对战场布局、战役布势和打法的总体设计。这是智谋的对抗。战役的胜负，首先决定于这一步的谋划。刘伯承在谋划作战方案时注意下列条件的造成：诱使或迫使敌人犯错误，暴露其弱点，创造有利于我的战机；确定打击方向，选定作

战对象和地区；运筹必要的行动和措施，争取战役作战的突然性；创造战场环境，取得有利的作战条件和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设计宏观战场布局，实现在关键地区和时间上集中优势兵力，进而争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达成各个歼灭（击破）敌人。

为了造成这些条件，他在作战擘画上特别注重以战争全局军事、政治形势的需要和战略方针的要求为出发点，自觉地服从全局的需要；纵横相联地分析战场各种要素及其互相关系，寻找和把握战场形势演变的规律，从而用巧妙的战场总体布局和相关措施，造成歼敌或易于达成战役目的的有利态势；遵循战略上打强敌，战役战斗上打弱敌的基本原则，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敌人的要害，以争取战略全局上出现有利的局面；将整个作战行动做到虚实并举、奇正结合，精心缜密地设计主作战与支作战、主攻与佯动、运动战与阵地战、诱敌深入与战场选定、主力部队的使用与地方部队和民兵的使用等等，以求得最佳的擘画效果。

二、灵活机动，趋利避害

刘伯承指挥作战，长于机动歼敌。这既表现了他作战指挥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也是其战略战术灵活性的体现。他指出：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消灭敌人是机动的本质。“我们的爱国自卫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如果不实施宽大机动，就会与敌人“牛抵角”，不能打歼灭战。所以机动是一种战术。运动战和游击战，依赖于广泛的机动，这种机动是指挥员在战役（斗）发起之前、战役（斗）之中和战役（斗）之后的移动。正确地把握住时机、方向、方式，组织与实施机动，是一种指挥艺术，刘伯承称之为“艺术的机动”。他认为，只有“大踏步地进退”，“才能出敌不意，消灭敌人”。1946年巨野战役（亦称张凤集、龙固集战役），由于有的指挥员“对作战地区的水网的危害性估计不足和操之过急，尤其在最后机动不够”，结

果与敌形成了“牛抵角”。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刘伯承、邓小平果断决定提前结束该战役，除留小部兵力与敌周旋外，大部队主动大踏步向纵深机动，调动蒋军一个旅孤军窜入鄄城地区，从而被我一举歼灭。此战结束后，他又运用大踏步前进的方式，突然奔袭滑县地区之敌，胜利进行了滑县战役，随后又向敌进攻集团的侧后机动，挺进到敌入纵深，胜利地进行了巨金鱼战役和豫皖边战役。此后，为配合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又运用广泛机动与敌周旋于民权、开封和鲁西南地区，继之又挥兵西进，以突然的机动，发起豫北攻势。刘伯承用兵的神奇，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善于巧妙地实施这种广泛地机动。他利用机动创造和捕捉战机，利用机动取得有利的战场态势，利用机动出奇不意地运用新的战法和发起战役，同时也利用机动摆脱自己所处的不利态势和处境。

三、灵活用兵

用兵，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兵力的区分使用、激励士气和战法运用等。刘伯承曾指出：“斗志和斗法是用兵的把柄”。他的用兵艺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知兵善用。即根据野战部队、地方部队、自卫队（民兵）的性质、特点、使命和作战能力，赋予他们各自的作战任务，并使他们在作战行动上紧密配合；根据各指挥员和部队特点、擅长、作风恰当地赋予作战任务，以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二）分遣与集结。根据战场形势和作战行动的需要，掌握分遣与集结的时机和程度，巧妙地运用分遣与集结的方式达成“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目的。他曾详细解释分遣与集结，指出，这就是在兵力使用和战术行动上：“拿我们的弱的部队去消耗敌人强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强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弱的部队；拿我们分散的部队去消耗敌人集结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集结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分散的部队”。

（三）“重点主义”。这是刘伯承运用兵力的一条重要原则。其基本精神是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一点，以部分兵力置于次要方向，以保障在决定方向上的胜利。他明确指出：“作战只有一个重点，而不应有两个或几个以上的重点。”在作战指挥上，要“集中兵力、火力对付一点，以次要的兵力放在其他方面，箝制敌人，达到重点方向的胜利”。战役实施中，如果主要方向不利，而“次要方向胜利了”，指挥员就应“改变重点的方向”，向原来的次要方向上转移兵力、火力，形成新的重点。避免在主要方向上形成“牛抵角”，造成被动。

（四）给下级以充分的机断处置权。这是刘伯承用兵艺术的又一侧面。为了适应我军作战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敏性，他灵活运用委托式指挥和集中指挥的两种方式，不过细过死的规定下级的行动，以利于其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能根据战役总企图和战役发展趋势而机断行事。在运用集中指挥的方式时，他也要求“在机动中各级指挥员应在上级总的意图之下，根据具体情况，负责机断行事”，反对机械的执行命令、计划。

四、驾驭战场，左右战局，掌握战场主动权

敌我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是生死存亡的搏斗。双方指挥官都企图左右战场，使战场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刘伯承指挥大兵团与敌人周旋于广阔战场上时，非常注意战场主动权的得失。从对作战行动的筹划、兵力的调遣、战场机动的实施到对战场情况的灵活处置，都着眼于主动权的夺取。

控制战场是他夺取主动权的基本手段之一。他在考察战场态势、分析敌我情况、研究地理概况和筹划作战方案、部署作战力量、选择战役发起的时机和方式时，都着眼于宏观战场并力求在宏观战场上把握战役的发展，从而造成在决定性方向和地区上歼灭敌人的条件，或造成自己在重要行动上的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在精确设计下进行的兵力部署与战役中不断的重新造势、战法运用的适时变换、主作战与支作战的建立与协同、进与退、攻防形式的运用与适时转换、连续作战与掌握适时结束战役等，都是刘伯承赢得战场主动的主要措施。

他在设计和运用争取主动的手段时，从来也不忘考虑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以及摆脱被动的方案与措施。当战役进行中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被动时，他会迅速的、毫不迟疑的采取措施摆脱它。

有计划的调动、支配敌人的行动，使其行动服从我之意志，是其高超的指挥艺术最主要的标志。刘伯承在设计我军的行动时，经常设想（或依据）敌军的行动，在指挥我军的行动时，同时着眼“指挥”（调动）敌人，这是其驾驭战场艺术的核心。

五、精心设计和进行战役造势

善于造势，是刘伯承作战运筹的一大特色。他极为重视“势”的作用，重视“兵势”的研究。1952年军事学院高级系进入学习集团军战役理论前，他亲自安排了对《孙子兵法》“兵势”的介绍和讨论，以帮助学员掌握战役造势理论。

刘帅善于根据不同的战场情况、不同的敌人、不同的战役行动方式来造势。尤其“势险”“节短”，奇正相生，以求在广阔战场上迷惑敌人，争取时间，对敌突施不意地快速打击。1947年鲁西南战役之后，蒋介石集重兵企图对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合围，迫我与之决战，或逼我退黄河以北。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在敌合围圈封闭之前提前向大别山挺进。为了牵制、迷惑敌人，保障主力挺进，刘伯承、邓小平布成了一个声东击西之势，他们以第11纵队在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江北返的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合围；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令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在陇海路北布成一个“和牌”的态势，即用四分之一的兵力

钳制迷惑敌人，用四分之二的兵力寻机集中歼灭敌人，以此掩护挺进部队南进；同时决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以中原独立旅西越平汉路，直出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之敌；在此掩护之下，主力分为三个纵队并列向大别山挺进。这是一个十分精心的运筹，成功地迷惑、钳制了敌人。

六、寻找、创造和捕捉战机

善于寻找、创造、捕捉战机，是刘伯承指挥艺术中的得意之作。他十分重视战机对克敌制胜的重要性。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反复强调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以创造战机。他指出：作战指挥，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寻找、创造、利用敌之弱点，就是发现、创造、捕捉、利用战机。他认为，抓住敌之弱点，给以突然、猛烈地突击，就能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获得奇效。

刘伯承寻找、创造、捕捉战机的艺术，在他的指挥实践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他善于发现战机。善于发现战机，是捕捉战机的关键。在这一方面他表现了惊人的洞察力。极善于通过战场情况特别是对敌情可能演变的辩证分析，预见战机在何种情况下出现，从而预作捕捉战机的准备和行动的谋划。1948 年 6 月，华野外线兵团发起豫东战役时，刘伯承即预见到留守汉水流域之敌必定呈现出孤立状态，使我有机可乘，因而，他将第 6 纵队隐蔽集结于唐河地区，当敌军主力北进时，果断地捕捉了这一战机，发起了老河口——襄樊战役。其次，他善于以多种方法创造战机。如"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之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援救其被突击的弱点"；"积极的声东击西，利诱威胁敌人；消极的隐蔽自己的真实行动，使敌人误解我们的行动，使它在布置兵力时对付我们的刀尖不能向着我们，而是把松

懈的弱点向着我们，给我们好去袭击它”等。再次是实施利于抓住战机的指挥。为了不失时机地捕捉战机，他强调："必须发挥指挥员捕捉战机的灵敏性与责任感，而上级指挥员的指挥，宜以训令方式示之（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以便于下级机断行事”。

七、战役合围艺术

战役合围艺术是刘伯承战役指挥艺术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军事著述中的重要内容。在战争年代他潜心研究合围作战的指挥和行动理论，并得心应手的运用于指挥实践，创造了许多精彩的合围艺术范例。

刘伯承战役合围艺术的主要特征一是合围，二是割裂。合围以防敌逃跑，割裂以实现全歼。为此，他在指挥上主要着眼于集中力量，对准敌人的弱点，实施向心钳形突击，将敌割裂成块，直透其纵深，各个歼灭。他说："运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实施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击方向会合于一点。如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合围是一种作战方式，它反映着作战指挥者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指挥者的坚定性及彻底歼灭敌人的强烈意识。刘伯承说："我们作战的基本方式是钳形攻势，分割包围”，“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在上党战役、平汉战役能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攻势是钳形的，袋形的”。但“围歼敌人的关键第一是合围，防敌逃走；第二是割裂被围之敌，以便各个歼灭。”所以，在战役合围的同时应着眼战术合围，在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开始，就必须从突破口透入敌人纵深的同时向突破口两翼卷击，以便将敌割裂成块，达成战术合围，各个歼灭。

他认为，合围有对运动之敌（进攻或退却）的合围，有对驻止之敌（临时驻止或守备）的合围，根据不同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战法和合围行动，但在他的战役合围艺术中，运用围三缺一的

再合围，占有重要地位。为避免迫使敌人“困兽犹斗”或使自己“啃鳖核桃”，他几乎每次战役作战都成功的运用了这种合围的方法。他认为，敌人在被合围后，往往利用其有利的技术条件，迅速构筑工事，转入防御，原来坚守城镇据点之敌被围更会凭险据守，所以，指挥员应根据情况，采取网开一面，虚留生路的办法纵敌突围，乘其脱离阵地，实行再合围，以迅速歼敌。对于如何才能诱使或迫使被围之敌突围，他指出：“造成敌人动摇其固守决心的主要办法：一是围困，使其粮弹不济，但这要拖延时日，而且在敌人粮弹困难条件下才行；再就是一面以坚决突破相威胁，另一方面故示以逃跑的生路，并伏兵于其退路上而解决之”。

八、灵活的战法运用艺术

刘伯承元帅的战法运用艺术，可以说是真正达到神奇莫测，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在长期的作战指挥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创造了从游击战到正规战，从反“扫荡”、反围攻、交通斗争到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的一套独到战法。这方面的内容，充分地反映在他的军事著作和作战经验总结中，是其指挥艺术的结晶。

刘伯承元帅运用战法贵在从实际出发并多变、创新。其主要特点是：根据战场客观实际，不拘泥于一定原则，不循一定模式，而善于创造新格式和新格局，使战法运用变幻诡谲，神秘莫测。比如，从 1946 年 8 月至 1947 年 5 月，在 10 个月内，他组织实施了 8 个战役，每一个战役都有不同的打法，而在战役中的具体打法上则更加不同。一出陇海战役（徐汴战役）采取的是从宽大正面、透入敌之纵深，实行有重点的多点攻击；定陶战役是运用机动作战，逐渐消耗敌人，预设战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巨野战役是攻点与打援；鄄城战役是用撇开与强敌僵持局面，在纵深内实行大踏步宽大机动，捕捉战机，杀回马枪，急袭歼敌；滑县战役以一部兵力多方迷惑敌人，主力奔袭住址之敌，实行掏心战；巨

金鱼战役运用敌进我进，批坑捣虚，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的打法；豫皖苏边战役采取大踏步前进，袭击敌后方，捕歼分散、孤立之敌；豫北攻势运用深入敌纵深，辗转机动，攻点打援，强攻守备薄弱之敌。总之，刘伯承运用战法非常灵活。

刘伯承极为重视战法及其运用，1946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曾说过：说到打胜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1948年，他在一封致下级的信中又指出："斗志和斗法是用兵的把柄"。在实战指挥上，刘伯承强调战法运用的灵活性，他说："懂得战术是容易的，适应新的情况，灵活运用战术甚至变换战术就不容易了"。"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的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

九、三种作战形式的结合运用

灵活运用，并在战役中根据情况适时转换作战形式，是战役指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三种作战形式（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可以在战略范围上结合运用，也可以在战役范围上结合运用，刘伯承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在作战指挥上更多的重视三种作战形式的直接配合运用。早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些战役中就显示出了他对此运用的艺术，并在《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考察》一文中做了系统的总结。

他指出："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套办法，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游击战既可以由地方部队、民兵担任，也可以由野战军派出小部队担任，"小部队在敌人的前后左右神出鬼没地独立活动，其作用很大，既可以帮助游击战争的开展，又可以迷惑敌人，掩护大部队的机动。如此，就构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一元化"。

在战役行动中，他将三战紧密结合运用的主要特点是：在进

行战役布势时，围绕运动战的主作战，部署游击行动的支作战。使运动战与游击战紧密配合，以后者服从、服务于前者，使游击战的成功行动成为运动战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进行主作战的运动战时，以某些方面、地区上的阵地防御战相配合，把阵地防御战作为保障主作战的运动战成功的必要条件。战役中用急袭、奔袭、伏击等，突然猛烈打击敌人，力求一举将敌歼灭，当敌人转入防御、构筑工事固守时，不适时机地由打运动之敌转入强攻，且在强攻时，抓住时机网开一面，纵敌突围，随即转入打运动之敌，直至彻底歼敌。

十、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结合运用

刘伯承指出，“战术被运用的范围，不应只局限于武装斗争，而应普及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斗争。军事战术与政治策略的含义本来是一样的”。因此，高级指挥员必须灵活运用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既要能打军事仗，也要能打政治仗，还要能打军事与政治结合的仗。要有使用军事手段实行军事打击与使用政治手段进行政治攻势的双重能力。这样才是文武双全、军政全才的指挥员，才能发挥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相得益彰的指挥艺术。刘伯承的指挥实践充分地显示了这种艺术性。

在保持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从政治上瓦解敌军，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以其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战胜敌人的一着。在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坚持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下，从政治上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他与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策动水冶“皇协军”反正，以及在平汉战役、双堆集作战和进军西南作战中之所为，就是典型之例。这种把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紧密结合运用，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的力量的运用，是刘伯承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一、协同作战，凝聚力量，发挥整体优势

刘伯承 1946 年在《战术问题》的报告中说：“协同动作，这是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在战争实践中，他非常重视作战的协同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役总结中，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有关协同作战的问题，以引起各级指挥员的注意。

组织协同动作，特别是在高层次上的协同作战，是对每一个指挥员战略、战役全局观点、一盘棋的整体意识和运筹、协调能力的全面考验。刘伯承在这一方面同样展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每次战役和战斗，他都周密的计划行动方案，根据作战行动方案严密组织各部队协同作战。他的协同作战指挥艺术包括三个层次上的内容，一是战役与战役之间的协同，这主要是战区间在战略上的配合；二是战役内主作战与支作战和主作战与支作战中各个集团间的战役协同；三是各个作战集团内部具体行动上的协同，这属于战术协同。他在作战指挥中非常关注这三个方面的协同行动。其协同艺术的表现主要是：在战略上全局一盘棋，使本战区的行动与友邻的行动遥相呼应，互相策应。在战役上通常编成几个作战集团，使佯动、游击行动、接敌阻击、诱敌深入、合围攻击等各种行动有机协调起来，力求达到声东击西、分散敌人整体力量、凝聚自已整体力量面达成歼敌之目的。在战术上，他认为，“只有熟悉敌我两方部队的性能，尤其各兵种的性能，组织协同动作，才能有把握地对敌人打胜仗”。

结　束　语

刘伯承在回顾解放战争自己在作战指挥中获得胜利的原因时说：“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一是靠党的领导……。第二是靠人民战争……。第三是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实

践论》、《矛盾论》，讲的就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实际斗争与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处理得好或不好，从根本上说，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在实际中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去指挥作战，取得了胜利"。(《二野在解放战争中》) 这就是说，运用毛泽东的方法论指导作战，是他得以充分发挥指挥艺术的思想基础。他所遵循的基本思想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战场实际情况的发展实施指挥，努力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他的"五行术"理论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高超的战役指挥艺术，才奏出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人民战争的战役作战的胜利凯歌。

论兵新孙吴　守土古范韩

——刘帅指导作战的几个重要特色

张天富　大校

刘帅驰骋疆场，身经百战，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导演出了一幕幕用兵如神熠熠生辉的战争活剧。他指挥作战，形行云流水之表，蕴惊涛裂岸之势。究其根本原因，是他善于把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全局与局部、领导与群众有机地溶于一体，铸就了极其高超的论兵、带兵和用兵艺术，形成了闪烁着人类智慧之光并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陈毅元帅曾以“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来称赞他，实非过誉。

特色之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的高度统一，把指挥运筹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客观基础之上

理论与实际，是贯穿于军事领域全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理论和实际相统一还是相脱离，历来是军事领域里两条对立的思想认识路线。刘帅一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高度统一、讲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活用原则。他常用列宁的：不以实践为基础，不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理论；不以理论作指导，不和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是瞎实践的两句名言，来告诫大家，反对空头理论和盲目实践。这一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刘帅的全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活动之中。

一方面，他重视军事理论，反对盲目实践。刘帅认为，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的行动，就是蛮干、“瞎实践”，是注定要碰壁的。对这种人，他曾毫不客气地称之为“武盲”，他说：“经验好比是一堆零散的铜钱，理论好比是一根钱串子，把各个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

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为此，他做了许多发展军事理论的工作。战争年代，他针对各级指挥员军事理论比较匮乏的情况，亲自做了大量的理论传授工作。红军时期，刘帅主持翻译了苏军军事教材，编写了《步兵教程》等9种军事教材。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军事教材整理为三类：第一类教材是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我军战史，并强调指出，要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以正其本”，要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运用中的战例来读现代战术著作“以清其流”，否则即使不流于教条主义，亦将流为经验主义；第二类教材是日军的军事条令、教令，用以分析研究作战对象的特点和战术；第三类教材是苏军的一些条令和军事理论著作，用以开阔眼界。他认为，对于这三种教材，如能以战胜日本侵华军为目标而善于分析与运用，从实际出发打胜仗，那就可以成为我军的战术内行了。解放战争时期，刘帅又在戎马倥偬之中编译了《合同战术》第二部等一批具有参考价值的苏军军事论著，还亲自撰写了《渡江作战之研究》、《敌前渡河战术指导》等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论著。解放后，刘帅在创办军事学院期间，对军事理论及教学更是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为了加强军事理论工作，他特别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战必总结得失教训，通报部队，以供学习，以利再战。从《南昌暴动始末记》起，他写下了数十篇宝贵的作战经验总结材料。其中，抗日战争两周年前后写的《对目前战术考察》一文，成了部队长期使用的战术教材。1942年撰写的太行军区2月和5月两次反扫荡总结，有人将它称之为“太行山区的‘论持久战’”。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他提出：“我们要身经百战的学员尽一切力量把自己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整理介绍出来，提高成为理论，再用之于保卫祖国、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的事业。”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刘帅对理论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他重视作战实践，反对教条主义。他认为学习军事理论，不仅要学现成的或带有结论性的具体原则，更重要的是学习这些原则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把具体原则奉为“圣

条”，就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刘帅历来既重视理论原则，又绝不唯理论原则是从，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在1957年“八一”建军节前，刘帅曾对解放军报记者谈了一段十分精辟而透彻的话，他说：“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滨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泽东同志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刘帅强调理论原则必须和实际结合。他要求各级指挥员在作战实践中运用理论原则必须“合于任务要求，合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他把作战的客观条件形象地喻之为“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认为各级指挥员对“五行”必须了如指掌；要对五要素作综合的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否则，“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还认为，“五行”中任务是中心，只有围绕总体作战任务来考虑研究其它四个因素，才具有实际价值。他要求上级指挥员给下级下达或部署战斗任务时要有重点而十分明确。并强调指出：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的行为。“五行”中敌情是重点，“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要把敌情作为指挥员定下决心、拟定计划、变更部署等的主要依据之一。“五行”中我情是应有之义，是战争力量角斗中的主观条件，不得于部队的情况，就不能取胜，只有熟知所属部队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发挥出最充分的效益。地形和时间，是敌我双方交战的特定的客观环境，赖以制胜对方的重要因素，不得其时，不得其地，就不能取胜。这五个要素有动有静，有主有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只有悉心摸索准确把握，才能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战无不胜。

特色之二，坚持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把指挥运筹建立在准确把握战争规律的基础之上

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律。人们争取战争胜利的奥妙就在于坚持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准确把握战争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实施作战指导。刘帅始终坚持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按照战争的规律指导战争。这方面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辩证的对待强弱

强与弱，是作战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刘帅非常重视敌我强弱对比。他客观地面对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敌强，并非方方面面的绝对强大；我弱，也不是不堪一击的绝对弱小。他认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从战略上看，敌人占据了数量上和装备上的优势，但在本质上是虚弱和孤立的；我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劣势，但我们有民心、军心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我军能够最终战胜敌人。他认为从战术上看，敌我双方的强与弱也是各有侧重。敌人炮兵强，火力强；我们是步兵强，善于准确投掷手榴弹，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刘帅还认为军事上的强与弱是动态的，并非静止的和一成不变的。正是刘帅正确的认识了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及变化关系，因而才创造了一系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

第二，灵活采用作战形式

刘帅善于洞察作战发展趋势，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这在他灵活运用和适时转换作战样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三种基本作战样式。刘帅认为，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样式的分量，哪一种占多少，必须严格综合、估计和对比敌我当时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军队数量、质量及其技术条件的优劣，以至地理、经济条件，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条件来决定。必须就战役战斗情况来选定和调剂二者的分量。在敌强我弱悬殊较大的情况下，主要是坚持游击战，辅之以运动战；当我力变强敌力变弱时，则主要采用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必要时也可进行阵地战。刘帅曾对二野协同华野经略中原这一过程作战样式运用上的划分作过这样的总结：1947

年9月至1948年3月，主要是繁殖游击战争，扩大战地面积，而配合以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4月至7月，主要是宽大机动，实施分遣与集结的运动战，而配合以阵地战，不断地歼灭敌人，而以开封、睢杞之捷为甚；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主要是阵地战而配合以运动战，从秋季攻势攻克济南、郑州直到完成整个淮海战役的大歼灭战，遂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黄河、长江之间的战略防御。这是刘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作战形式灵活运用的一个极为精彩的论述。

第三，敌进我进，以集灭散，奇正并举

刘帅指挥作战随心所欲，出神入化。这种得心应用的功夫是基于他对作战规律的深刻洞察，对强弱转化规律的准确把握。他提出"敌进我进"、"以集灭散"、奇正并举的作战原则，就是准确把握作战规律的生动体现。

敌进我进，在时空转换上耗强灭弱。抗战时期，针对一味坚持敌进我退、诱敌深入已不适应抗日民族战争新形势的特点，刘帅及时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新方针。并指出：敌进我进是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以小部分部队留在内线积极打击敌人，主力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其实质，就是通过时空的转换，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形成局部空间上的优势，达到"拿我们的弱的部队去消耗敌人强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强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弱的部队"的目的。夜袭阳明堡、七亘村重叠设伏以及神头岭、响堂铺、香城固、长乐村等战斗，就是体现这一方针的一系列典型战例。解放战争时期，敌进我进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巨金鱼战役就是一例。1947年初，敌以10个旅6万余人之众并肩向冀鲁豫进犯，因敌队形密集，与之周旋数日正面仍无隙可乘。刘帅遂施行敌进我进方针，甩开当面之敌，主力奔袭二百里，直插敌人后方，乘虚向守备在巨野、金乡、鱼台之敌发起进攻，调动了3股敌人来救援，从而拉开了一系列歼灭战的序幕。

刘帅认为，“分遣与集结重在发挥固有的能力”，以求实现“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目的。面对在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一方面，我们要伺机分兵发动群众，强化以“游击集团”为组织形式的武装力量，时面偷袭敌人驻地，时而伏击小群运动之敌，时而破坏敌人军事设施，使敌正规军的协同作战，不断的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遭到无规律面又准确的袭击，从面分散、牵制、消耗和削弱敌人，为我集中歼敌创造有利的条件。另一面，要在耗敌的基础上，适时集中兵力，抓住敌人弱点，在某一点上干脆利索地歼灭敌人。抗日战争中，日军在太行山区“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的哀叹，就是对刘帅时散时集灵活用兵的极好赞赏。

奇正并举，是刘帅指挥作战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巧妙地把握了奇与正的辩证关系，做到了运用战法不拘一格。例如，同是吸打援敌，就有“围城打援”、“夺城打援”和“攻城打援”三种之多；同是设伏，就敢违“用兵不复”之古训，取得了七亘村重叠设伏的胜利。追溯刘帅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的一系列主要战役，其中不难发现其战法运用的精彩绝妙之处。上党战役先是“围城吸援”，后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打援；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釜底抽薪”；定陶战役是“攻其一点，再及其余”；鄄城战役是“先施拖刀计，后杀回马枪”；巨金鱼战役则是“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鲁西南战役则采用了“攻其一点，吸其全来，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是刘帅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高度统一，熟识作战规律，并用之于指导作战的生动写照。

特色之三，坚持全局与局部的高度统一，把指挥运筹始终置于服从全局利益的需要之上

刘帅指挥作战总是全局在胸，辩证地把握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善于站在全局高度“就大势与局部沉思”。他曾反复阐述“一盘

棋”思想的重要性，认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很重要”，“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一野、四野部队和二野、三野是配合作战的。”

1、了解全局，服从全局，服务全局，走好全局中的每“一着棋”

刘帅作为战役、战略区指挥员，始终坚持置身于战略全局之中，把了解全局作为自己筹划作战的一条基本准则。如解放战争第二年，蒋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刘帅把这种战争态势，形象地比做是一只两头大、中间细的大哑铃。认为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正处于哑铃中间，只要我军占据大别山，砍断敌人的哑铃把子，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因此在诸多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执行军委指示，带领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走出了与时局密切吻合的一着好棋。

刘帅指挥作战，始终坚持从全局需要出发确定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把执行贯彻中央军委指示作为自己筹划作战的首要因素。解放战争时期，他所指挥的“三出陇海线”作战，就是典型的一例。一出陇海线，是为了配合中原军区突围和华东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将敌6个整编师14个旅吸引过来；二出陇海线，是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关于阻止敌人增援山东的任务，配合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为此，他率部南下豫皖边，攻击民权附近敌85师，将敌王敬久集团拖向鲁西南地区，打乱了敌人战略行动计划；三出陇海线，是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的外线出击，为此，他强渡黄河进行鲁西南战役，粉碎了敌人对山东和陕北两处的重点进攻企图。“三出陇海线”，充分反映了刘帅一切从战略全局出发，服从并服务于全局的思想。

2、抓住要害，把握关节，不断推动和促进全局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改变敌优我劣的力量对比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对全局有

决定性影响的战役以及对战役有决定性影响的战斗，即是这个过程中的要害、关节。胜了，就可推动战争或战役的发展；败了，则将延缓战争或战役的进程。刘帅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把握关节。

全力以赴获取对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胜利。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一方面抓紧调集部队，完成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布署，另一方面又邀请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刘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组织了上党、邯郸两战役，并取得了伟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对促成停战协议，为我军争取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起到重大的战略作用。

始终把关注焦点放在对全局安危相关的关节点上。刘帅筹划作战注意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淮海战役发起前4天，刘帅依据其对敌我态势的总体分析和军委的战役总方针，提出了攻取津浦线上重镇宿县，截断徐蚌段的建议。这一行动的实施，斩断了敌人中枢，协同华野完成了对徐州之敌的战略合围，扩大了原来淮海战役计划的范围，从而确保实现了就地全歼敌徐州集团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同志在后来的电报中说："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为使中野主力顺利进行郑州战役，刘帅毅然决定2纵、6纵及桐柏、江汉两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分别吸引向豫西南和鄂北大洪山区，使其远离陇海路和淮海战场，这一行动对于推迟黄维兵团向徐州地区的增援，保证淮海战役初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3、"走一步看三步"，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

刘帅坚持局部与全局的高度统一，还表现在对敌情高层次的分析及把握上，能准确地预见作战的发展趋势和进程，"走一步棋，看三步棋"，因而，他总能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胜敌一筹。1948年6月，粟裕同志率华东野战军一部围攻开封，敌华中机动兵力

兼程北上，刘伯承同志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赴平汉线箝制、阻止敌北援，唯独将6纵队放在东可驰援平汉、南可奔袭老河口、襄阳的唐河地区待命，并电令部队“好好休息”。当粟兵团攻克开封，继而发起睢杞战役，敌华中机动兵团被箝制在平汉线上时，刘伯承同志及时命令6纵队及地方部队一部发起老襄战役，不仅在全局上形成南北配合，互相呼应之势，使敌机动兵团南瞻北顾，无力回援，而且使老、襄守敌完全处于坐以待歼境地。这样一环紧扣一环的作战，在刘帅的军事生涯中屡见不鲜，就连战败被俘的对手也称“神机莫测”。

特色之四，坚持领导与群众的高度统一，把指挥运筹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独创性贡献。刘帅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与领导相结合、相统一。如果只有领导的骨干性，而无群众的积极性，指挥员的指挥运筹就将成为毫无意义的纸上谈兵。这是我军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作战指挥上的具体体现。刘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干部是骨干，一定要与群众相结合，不然就是骷髅，骷髅是死的，没法与血肉相结合。我们究竟愿意当骨干，还是当骷髅？他把坚持领导与群众高度统一，提到了影响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高度。刘帅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博采众长，努力使指挥决策民主化

古人语，“智不备于人，谋必参诸群士。”在战争领域里，指挥决策是制约与反制约、控制与反控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客观上需要不同层次“诸群士”的积极参与。刘帅深奇的军事谋略，出神入化的用兵艺术，与他坚持领导与群众的高度统一，善于汲取群众的智慧，集思广益，博采众谋之长，广泛推行指挥决策民主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刘帅善于集中领导集体

层的智慧。一方面，刘帅坚决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针，号召军队"以党为核心团结奋斗。"每逢重大决策，必先提交前委讨论定夺，充分发挥领导集体层的整体效应。刘帅从不居功自傲、以才自傲，不耍"长官意志"、个人说了算。他说：作为革命军人，不管你是好大的官，权威有多大，一个口令能使成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如果你因此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道路，那你就会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另一方面，刘帅具有长者风度，为人谦虚，善于倾听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每次决策酝酿过程中，必与其他领导同志反复切磋、反复琢磨、反复推敲、反复研究。其次，刘帅善于发挥参谋层的智慧。刘帅是南昌起义和长征时期的红军总参谋长，对参谋工作极为重视，尤其注重并善于发挥参谋人员的智囊作用。在每次指挥决策过程中，除了经常咨询有关问题外，还认真倾听职能部门的决心建议，并风趣地指出："参谋嘛，就是要参与谋划，多谋善断嘛！"例如，刘帅在定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心前，就召集野战军首长及司令部有关人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研究。会上，刘帅首先指出：今天开会打破点常规，到会的人多点。……，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是带有战略的行动，需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慎重对待，正确处理。所以开个范围稍大点的会议，以求处理得更好些。由此可见，刘帅对于发挥司令部职能作用的重视程度。再是，刘帅善于汲取群众层的智慧。刘帅在《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来形势的报告》中曾说："群众有许多的创造，如开诸葛亮会议等。有一次战斗，一个战士主动想办法引诱阵地内的敌人出来，抓俘虏侦察了解情况。这说明群众力量伟大，群众路线是个很好的办法。"因而，每次部署作战，刘帅都要交待战术、战法，启发各级换位思考、参与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及时反馈信息；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要广泛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战后总结。同时，刘帅还善于汲取当地居民群众的智慧。红军长征时期，作为军委参谋长，每次大小战斗总是亲临前线，向当地

群众了解情况，并亲切地把他们称之为“土参谋”。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扼制日军机械化部队在平原地区横冲直撞的势头，粉碎日军对冀南平原地区的频繁“扫荡”，刘帅借鉴了农民用挖直沟阻挡大车轧地头的作法，并把军事上的需要和群众的需要结合起来，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挖路分割平原的交通战的战略战术。这一战法，既阻止了敌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机动，又使我军民利用了交通沟不断地袭击和消灭敌人，并在后来发展成了著名的地道战。

2、相信部属，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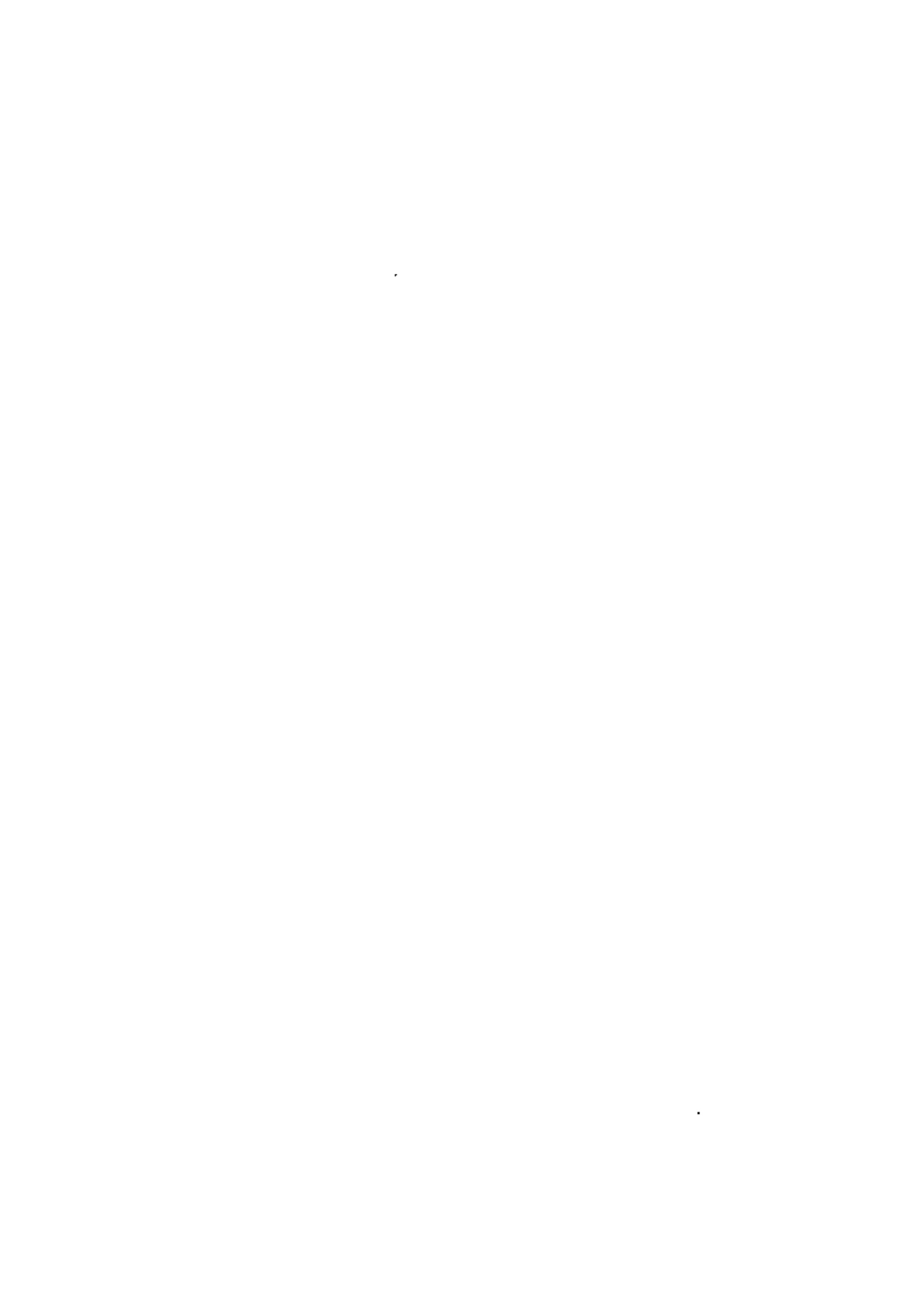
在作战过程中，相信部属，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主观能动性，是刘帅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统一的一大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讲究辩证指挥。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的交锋，在战争领地里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指挥战争就必须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刘帅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接受命令后，既要充分研究，坚决执行，又不能囿于命令，机械行动，而应时刻把握战场发展态势，适时修正自己的决心和计划，使之更符合于客观现实。二是提倡机断行事。刘帅认为，机断行事是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他提倡执行任务中的积极机断作风，发现情况变化时要果断采取应变措施，达成预定的目标。他指出：凡独立行动的指挥员“应是在上级总的意旨之下，从政治上积极负责，独立自主，刚胆沉着，机断行事，没有消极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犹豫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等待上级指示才做的事情。”

3、深入浅出，善于化深奥原则为通俗语言

坚持领导与群众的高度统一，一靠领导身体力行的行动，二靠相互交流的语言。领导语言的通俗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军事民主化的进程。作战原则是对作战规律的总结和提炼，寓有深奥的原理，如果照本宣科，则群众就可能望面生畏，那么在军事指挥上走群众路线就会化为泡影。刘帅深知这一道理，因而他总

能深入浅出地把一些深奥原则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而且简单明了，生动形象。例如，他把战术这一范畴宽广的课题归为三类，说：作战有三种战术：一、牛抵角。二、马的战术，用后蹄踢。三、狼的战术。他反对和批评牛抵角战术，也不赞成马的战术，不管蹄子甩得怎样厉害，黔驴之技，终免不了要被老虎吃掉。他要求大家要学习狼的战术，并讲了一个寓意极为深刻的“狼的战术”的故事，仅用寥寥数十字，就形象生动又非常准确地表述了战术及其运用要旨。刘帅这种大众化而且带有诙谐魅力的语言，是他渊博的知识和修养的表现，更是他融会贯通毛泽东军事思想，扎根于浑厚的群众基础之上的坚固桥梁。

刘帅军事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实践并用之于中国革命实践。岁月的流逝，并没有也不可能磨灭其夺目耀人的光彩。今天，在长期的和平环境熏染下，指挥员的带兵、用兵之道大多从书本上和训练场上获取，理论多而实战少。我们再度回首刘帅戎马生涯，研究其军事思想特色，对于推动和发展我军作战理论，培养我军新一代指挥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学习刘伯承关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思想
全面加强我军质量建设

李九龙　中将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针对国际、国内和军队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深谋远虑地提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尽快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力量的重要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作出了新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认真学习研究刘伯承关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思想，掌握其精髓和实质，对于贯彻落实军委制定的注重质量建设方针，实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全面提高我军战斗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刘伯承关于提高战斗力思想似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定政治信念，加强政治建设，以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军队战斗力的生成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加强政治建设，发挥政治优势，做好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实践中，刘伯承同志十分重视军队的政治建设，始终把坚持我军性质、保证政治合格摆在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上。

1、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刘伯承认为，军队战斗力主要由政治质量，军事素养．物质保障，纪律、作风等方面组成。政治质量是先决条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的核心。

早在1927年，刘伯承就指出："我们要知道，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①在淡到军人与党的领导关系时，他严肃指出："我们每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②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在回顾我军诞生和发展壮大历程时，又深刻地指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如此的英勇无敌，是因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诞生的，从此即未脱离党的领导"。③他还说：军队是"执行和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军队的每个成员尤其是高中级干部，应当"成为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工具"。④刘伯承以对党的坚定信念，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提高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坚持用党的方针政策统一部队的思想，从而保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部队战斗力有了旺盛的源泉。

2、加强党组织、政治机关、政工干部队伍的建设

生成部队战斗力必须抓住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政工干部队伍建设这个关键环节。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刘伯承十分重视加强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建设。在1948年开展的整党整军活动中，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党委的领导作用，就必须健全党委会的组织，搞好政治机关的建设，并把党委会的建设，当作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内容。在加强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建设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加强政治干部队伍的建设，要求建立政治干部的培训制度。1926年12月，刘伯承在领导"顺泸起义"时就曾明确规定：各路部队都设立政治部，团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和政治训练员。为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他还创办了"泸（州）纳（溪）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并亲自任校长，调集各部队军官和有志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建国后、刘

伯承都十分重视政治干部的培训工作，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3、坚持人民军队的宗旨

刘伯承认为，关心和爱护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既是带兵打仗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军队战斗力的源泉和根本所在。他经常教育部队说："军队的生命在于群众的支持"，"人民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爱护人民，而不应损害群众的利益"。⑤他还强调："总括一句话：我们要明确树立'人民的军队'的思想，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到底"。⑥1952年7月，刘伯承又深刻地指出："我们做军事工作的人，有忘我精神去为人民事业奋斗，人民因此优待我们。有些人不从人民优待中来勉励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反而趾高气扬，这是会失败的"。⑦

二、突出重点，以严格正规的教育训练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

刘伯承深知教育训练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作用，认为通过严格、正规、扎实的教育训练，强化部队的军事素质，使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的广大官兵与现代武器装备处于最佳有机结合状态，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这个重要思想是刘伯承治军经验的科学结晶，它深刻揭示了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

1、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不断提高教育训练质量。

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所处位置，是由军队的本质属性和其担负的基本任务决定的。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刘伯承始终把教育训练放在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上。他指出：军队教育训练"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思考我军未来的建设问题。1946年下半年，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他仍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构想用合同

战术的训练来提高指挥员协同作战能力。所以，邓小平同志高度赞赏他是我军“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⑧

刘伯承历来认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训练要有素。他指出：“现在我们的战术、技术就是要研究，要发展，要创造，然而不专就不能精通，不熟练就不能生巧。”⑨他还说：“无论新旧武器，有了以后还要熟练才行。将技术练成如用筷子吃饭的样子。……因此，大家要好好练习，提高技术”。⑩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必须担负起练兵责任，鼓起练兵热情。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又谆谆告诫：“我们不但要负责学习，而且还要负责指挥打仗；不但能负责直接指挥打仗，而且还能负责作参谋工作；不但要负责指挥军队，而且还要负责训练军队”。⑪他还强调：“训练问题是建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训练是战争的准备……要抓紧一切时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练兵”。⑫这些精辟的论述，充分揭示了军队战斗力生成的规律，抓住了战斗力提高的主要矛盾。

2、以合成训练和干部训练为重点，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

刘伯承重视部队的合成训练，把提高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作为训练的重要内容。他明确提出：“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⑬“组织协同动作，才能有把握地对敌人打胜仗”。⑭因此，“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学习组织和指挥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协同作战，是我们的责任”。建国后，为了改进和完善合成训练的内容与方法，提高干部的协同指挥能力，他又亲自组织了临淮关步兵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充分肯定了合成训练的地位和作用。刘伯承关于合成训练的思想，反映了现代战争对军队训练的客观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战争对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要求越来越高，靠单一的军种或兵种作战，是难以赢得战争胜利的。现在，我军已由过去的单一兵种发展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合成军队，

只有下大力抓好合成训练，才能实现诸军兵种的协调一致，提高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干部是军队建设和作战的组织者与指挥者，其军政素质和专业水平的高低，是衡量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也是能否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就平时而言，干部既是受训者，又是训练的组织者，要提高教育训练水平，最关键的是要抓住干部训练这个“龙头”。刘伯承指出：“干部决定一切，故教育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面。无论在军事上或在政治上，都应经常注意培养其战斗的组织性、主动性、泼辣性与顽强，发扬党军的良好的作风”。⑮“只有军政素质强的干部，才能领导部队的发展”。⑯因此，“要采用多种多样的办法训练干部”。在庆祝建国后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时，刘伯承在题为《庆祝英勇无敌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周年》的文章中，又提出必须加强干部训练这一重大课题。他说：“我们要保持与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要从陆军、海军、空军各方面把自己的战斗力再提高一步”，⑰以保卫国防，保卫国内和平建设。

刘伯承认为，院校是造就人才的基地，要造就大批训练有素、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军事指挥人才，在和平时期主要靠军事院校。加强了院校建设，就抓住了人才培养的源头；抓住了人才培养，就抓住了部队建设的重点。建国以后，作为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更是把“训练也培养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的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学院的根本任务承担起来。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专门人才，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刘伯承向军委提出了在军事学院各系的基础上分建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和装甲兵学院等6个学院的建议。这一重要建议的实现，把我军培养中、高级指挥人才的军事教育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从而加快了我军军兵种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对提高我军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的军事素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从严治军，以严格的纪律、作风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

刘伯承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军具体实际相结合，吸取前人的优秀思想，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始终坚持从严治军，为培养部队严格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倾注了大量心血。解放战争初期，他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就曾以管理严格、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著称。朱德同志赞誉刘邓大军为“铁的兵团”。

1、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以严格的纪律、优良的作风作保证

严格的纪律是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刘伯承十分重视加强部队的纪律建设。早在1942年他就指出：“要强化制度纪律。如无制度纪律，那是削弱军队最好的办法。……如无纪律，军队就无法战胜敌人”。⑱他强调说：“一个部队，没有纪律，是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⑲“纪律问题是军队战斗力组成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⑳刘伯承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加强纪律建设，对于提高和保持军队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实践告诉我们，紧紧抓住纪律和作风，才能解决好部队中纪律松驰，治理好作风松散和管理松懈的问题，保证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只有按照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加强部队整个工作和指挥上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与纪律性，才能确保部队经得起各种考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

2、严格执行条令条例，是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与作风培养的重要内容

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与作风培养，必须严格执行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1941年2月，刘伯承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制度是不能领导广大的武装斗争

的”。㉑当我军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以后，刘伯承反复强调严格执行条令条例，加强正规化建设对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于现代诸兵种装备如是不同，人数如是众多，必须协同动作，就必须有这些条令。所以这些条令，我认为就是组织性与准确性的具体体现。军队生活秩序能依照条令办事，像一部大机器，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这就是正规化。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因此审慎制订与严格执行各种条令，也就成为我们部队训练的要项之一”。㉒他还说：“最具体的正规军队的生活秩序，就是各种条令。”㉓刘伯承这些精辟的见解，对我军现在的正规化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严格执行条令条例，必须首先抓住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这个关键。1952 年 8 月，刘伯承在《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训练总结》中，针对少数干部恃功高，要重赏，懒散不振，政治疲沓和不守纪律，骄横用事等现象，严肃指出“这种党内小资产者的个人主义、无组织无政府状态，……必须时刻抓紧”。㉔他还说：“高、上级干部学员党的观念与自觉性虽强，但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并不等于已经解决了问题。工作经验证明，对他们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则是一时一刻不能放松而必须予以重视的。”㉕刘伯承认为，贯彻执行条令条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因为“说服了高级干部和动员起了积极分子，事情就好办。”㉖当前，加强我军的作风纪律建设，仍要认真学习刘伯承治军先治官的思想，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按条令条例办事。只有这样，才能把从严治军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提高部队战斗力。

3、严格管理，培养过硬的战斗作风

严格管理出战斗力。“慈不掌兵”是刘帅在带兵打仗中始终坚持的思想。1942 年 10 月，刘伯承就曾经指出：加强部队建设必须

“强化管理教育”，“要将教育工作加深，管理工作更加严密，组织工作更加强化”。㉗建国后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他又强调指出：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建立正规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是现代化军队建设的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管理工作增强军队战斗力，必须有正确而科学的方法。刘伯承认为：“纪律条令与刑法—两者对正规军建设非常重要，它们虽有区别，但中心都在于教育，特别着重于纪律条令中的奖励，防止赏罚不明，否则将使纪律废弛，减弱战斗力”。㉘他还说：“要耐烦地教育培养，赏罚严明，特别注重在教育，不要打击”。㉙“奖罚严明，是军队的命脉，不可丝毫忽视，忽视就会削弱军队。”㉚这些精辟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严格管理与提高战斗力的关系，揭示了带兵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军队管理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自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管理工作中只有坚持政治平等、官兵一致，严格管理、严格要求，说服教育、启发自觉，相信士兵、发扬民主，训管结合、教养一致，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和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提高管理教育水平，不断增强军队战斗力。

四、注重质量，不断增强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的实战能力

“兵贵精，不贵多”。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刘伯承都把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精兵合成之路放在首位，并将其视为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实战能力的必由之路。他指出：“无论现代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兵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与纪律的训练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只有为对方作武器的运输队”。㉛这一论述，揭示了走精兵之路，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1、精简编制，优化军队的组织结构

刘伯承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善于从世界军队建设的共同规律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提高现代条件下实战能力的道路。他认为：军队臃肿，机构重叠，既耗费有限的经费，也影响军队自身质量的提高。早在1934年5月，刘伯承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游击队的编制应将非战斗人员尽量减少，以免演成浮肿不灵的现象，妨碍到战斗和运动"。㉜1941年，他又说："无论地方军队和野战军队，指挥机关的组织务求减小，人员务求精干"。㉝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结合当时军队建设和军事学院工作实际，深刻指出："要使工作做得好，并不在乎机构的庞大，而在乎组织的合理精干"。㉞他说："不管怎样，一切组织只要精干有力，不要庞大臃肿，以免浪费人力。"㉟"组织机构层次愈少，则工作愈能贯彻而效率也愈高，否则必致钝滞甚至差误。"㊱在干部的培养、使用和配备问题上，刘伯承认为："干部使用上的'以量抵质'是迫不得已，也是不好的办法。培养干部一定要让他们在正式的工作岗位上负起一定的责任，做到'执事者各职其事'，充分锻炼与发挥其才能，否则，放了格外多的人挤入一个机关而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意在'培养干部'实则浪费人力，甚至碍于人事关系的调整，束手束足，反而减弱工作效率。"㊲学习刘伯承的这些思想，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军委提出注重质量建设方针的战略意义。实践证明，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主要决定于质量的高低。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现代战争的必然要求，是军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切合我国国情和我军实际，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提高我军质量水平的必由之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军委的战略决策，才能把我军建设成为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之师。

2、加强司令部建设，提高干部组织指挥能力

刘伯承历来十分重视司令部的建设，并将其看作是加强军队

质量建设，提高军队协同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35年，他就指出：军队指挥，已由非常简单的司令时期（指挥机关由首长、文书员及乘马通信组成，有时由首长亲自发口令指挥战斗）、指挥时期（有了指挥作战之机关的司令部，有了参谋人员帮助指挥事宜）演进到现在的组织战斗时期，“司令部的本身及与诸后方勤务部诸技术指导部的分工合作都越发科学化了。”㊳他说：“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㊴1948年12月，他在《关于今后作战准备和军队建设的意见》中又指出：“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从何着手，想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㊵到了60年代初期，刘伯承对我军各级司令部如何发挥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61年11月，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司令部组织训练要以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为依据，要正确体现战略方针精神和首长意图。为此，他竭力主张尽早编写出我军的《司令部工作条例》，使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在工作中有所遵循。刘伯承关于司令部工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军培养出了一批有丰富司令部工作经验的参谋人员，对于提高我军协同作战能力，全面加强军队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深入研究军事学术，发展先进的军事理论

先进的军事理论，是战胜敌人，加强军队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繁忙紧张的作战中，刘伯承不仅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带头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而且还号召干部用军事理论武装自己。他指出：“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㊶“我们必须经常兢兢业业地根据中央的方针，实事求是，发扬我们的战斗力，尤其是智力”。㊷而要在智慧和谋略上胜敌一筹，把握战争和军队建设的主动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和借鉴有益的经验，发展先

进的军事理论。刘伯承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是先进的、新兴的、发展的；我们要能够学会这个科学并能够很好地掌握它。"㊸就必须重视学术研究，并将其作为"训练工作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现代化诸兵种，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比旧式的'步、骑、炮、工、辎'时代强大复杂多了，"㊹"现代战争在主要战场上的正规战，是诸兵种的合同战斗。"㊺因此，"应着重研究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㊻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的成就，加强我军军事理论建设。

刘伯承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指出："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㊼他认为："在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时，必须结合我军原有的经验，更要结合朝鲜战场的经验，而且还要预见到将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显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的无限的生动的威力。"㊽在继承发扬我军传统和学习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上，刘伯承指出："在这个学习中，我们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脱离我军建军传统、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现代化'；另一种是满足于旧的一套，拒绝正规化现代化的学术的保守倾向。这两种倾向均妨碍我们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我们要根据具体的对象，认真地加以防止，加以批判。"㊾他还说："一种倾向是认为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就不需要很好学习外国经验，不重视研究敌情、我情，拒绝接受新的东西；另一种倾向是在强调将来战争需要的时候，而又不重视我军的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一切外国经验，都不加分析地全盘端过来"。㊿刘伯承这些论述，科学地回答了继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学习借鉴外国经验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发展我军军事理论的正确道路，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

军队建设实践表明，军事理论是和平时期军事抗争的重要形式。拥有先进军事理论的军队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弥补武器装备之不足。我军的现代化，是先进军事思想、现代化武器装

备和优秀人才的有机结合。因此，认真学习刘伯承关于发展我军军事科学理论的论述，进--步繁荣军事学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　释

①③⑥⑨⑩⑪⑫⑮⑰⑱⑲⑳《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43、第 608、第 440、第 284、第 354、第 651、第 519、第 227、第 608、第 363、第 519、第 520 页。

②④⑬⑭《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版，第 172、第 172、第 213、第 213 页。

⑤㊶㊷《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二) 第 128、(三) 第 91、(三) 第 92 页。

⑦⑯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成都军区档案馆编 1992 年 3 月印，第 6、第 53、第 38 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㉜㉝㉞㉟㊱《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224、第 634、第 633、第 664、第 664、第 666、第 363、第 99、第 226、第 347、第 46、第 239、第 655、第 702、第 653 页。

⑧《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第 5 页。

㊲㊳㊴㊵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655、第 52、第 54、第 577、第 613、第 632、第 633、第 709、第 644、第 647、第 635、第 716 页。

论刘伯承元帅
建军作战中的政治艺术

姜思毅　中将

不同性质、不同特点的军队和战争，必然需要并造就出不同品格、不同特点的统帅和将领。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新型武装集团。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是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条战线斗争于一体的人民战争。各个根据地或战略区长期处于被敌分割封锁的环境，往往只能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筹指导下，相对独立地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各项斗争。这些，决定了我党的老一辈军事家们，迥然不同于古今中外常见的那种只会领兵打仗的所谓“职业将领”，而是一批文武兼备、军政双能的全面领导指挥人才。其中，刘伯承元帅就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刘帅不仅表现出他的军事指挥艺术精妙绝伦，建军中的政治艺术也运用裕如，军事艺术和政治艺术在他身上水乳交融，相映成辉，构成了我党一位无产阶级大军事家的完整形象。战争年代，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部队里工作、战斗了十多年；多年来一直很想把刘帅在建军作战中的政治艺术这笔珍贵遗产做一番研究和整理。惟水平所限，始终未能竟愿。现在纪念刘帅诞辰100周年，我只能谈几点感受尤深的体会，以表达对刘帅的缅怀。

一、人民军事学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的战争学

从孙子到克劳塞维茨，中外军事理论家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曾有过不少著名的论断。毛泽东洞察战争的本质并进一步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军事斗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军事家胸怀大略，有政治眼光，是指导战争和用兵作战的首要之道。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这一观点，刘帅有许多精辟的阐发。

他说："我们人民的战略，不象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而是从人民的本质上发挥一切力量的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的打胜仗的科学"。刘帅参与创造并熟练掌握的这种人民军事学，其最大特色就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刘帅常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我们作战不但要军事，而且特别要政治"。

1943 年夏，华北国民党军庞炳勋部被日军击破降敌。当时谈及此事，军区机关有的同志说国民党军队所以不中用，是因为战术上死挨打，不会打游击战。刘帅则说：最主要还是失败在政治上。政治上反共倒退，军事上怎么能不失败投降？上党战役后，在为被俘蒋军将领们"压惊"的招待会席间，这些将领多从军事指挥上谈论两军胜败原因。刘帅告诉他们：战场上胜败问题的钥匙，应当从战争本身的政治性质上寻找；共产党军队胜利的秘诀，就在于进行的是为人民、得民心的战争。像这样三言两语便点明了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言论，在当时部队特别是机关中流传的和刘帅平素谈吐中，还能举出许多许多。纵观刘帅在党的旗帜下数十年戎马生涯，可以说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革命政治作为用兵作战之本。我想把刘帅在作战指挥中政治艺术的主要观点，列为十条做一阐述。

第一，军事战略受着战争主体的政治本性的根本制约。刘帅在解放战争时期对蒋军战略致命弱点所做的分析，深刻阐明了这一道理。他指出，守备兵力过多而机动作战兵力日益不足，是蒋介石集团的致命战略弱点；就在其阶级本性是压迫人民，每占领

一块地方，不得不抽出一部分机动兵力用于守备，镇压民众；占地越多，机动兵力越少越分散。这就使我军得以在积极防御的战略下，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直至战争胜利。

第二，政治因素是战术的基础和保证。刘帅在1939年夏《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文中明确指出："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他把发动部队良好的政治情绪与饱满的战斗热情、发动民众参战和分化瓦解敌军，作为我军遂行打胜仗的战术的三个前提条件；认为有了这三个条件，"才算有了讲求战术的根据"。1948年，他在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第20旅旅长吴忠的信中指出：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而"斗志"靠的就是政治工作。

第三，"政治战"在战争的诸多斗争内容中具有重要意义。刘帅多次论述，革命战争是"全力的全面斗争"，是"综合群力"的"总力战"；革命战争的"真正内容，是全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多种斗争"。其中，"政治战"可使敌人民心丧尽，内部离析，兵无斗志，使我军获得民众拥戴，队伍坚强纯洁，作战以一当十。1942年，他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怎样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的力量》的文章，指出"只要我们用所已掌握的真理"对日寇"进行政治战"，并且掌握各种有利条件，善于组织运用力量，那么，胜利是有完全把握的。"此外，还曾用"一条标语和传单等于一粒子弹"的生动比喻，说明"人心战"即政治战的威力。

第四，在组织作战的指导思想上，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密切配合。刘帅认为，对敌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战争整体上作战略配合，战役战斗上也不能光有军事打击一手，战役战斗上也应着力"攻心"，也要打"政治战"，"政治战"与"军事战"相结合。前者配合，保证后者，后者又促进前者，为前者创造有利条件。抗战初期，刘帅在太行根据地讲授敌后游击战要领时规定，组织开展对日伪军的"政治攻势"，是各级游击战指挥部的基本职责之一。并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不懂得政治，不

懂得搞政治攻势，那就不会当好指挥员。他本人的作战指导艺术，就堪称“军事战”与“政治战”巧妙结合的典范。他用兵打仗，一贯重视对敌军的调查研究，重视利用敌军内部矛盾，施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每组织指挥一次重要战役，都注重在部署军事打击的同时，部署对敌军的政治攻势。有力的军事打击辅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在许多次战役中都奏了效。解放战争时期比较著名的，如平汉战役中促成敌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1个军举行战场起义，淮海战役中促成敌整编师师长廖运周率部举行战场起义，进军西南中促使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起义，并在成都附近以强大军事压力迫使蒋军5个兵团起义，等等。至于战争过程中向我军投诚的蒋军部队、历次战役中带枪过来的蒋军士兵，那就更不计其数了。

第五，在确定攻歼目标时，把当面敌军各部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别，作为作战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刘帅具体筹划每一仗的打击对象和打击顺序时，固然主要都是先从军事上考虑的，不过，也总是充分考虑敌军各部的政治态度因素，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置。凡属政治上顽固到底、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的，不论早打晚打，一律务求全歼，彻底打击；对于那些政治上已发生动摇，尚在游移不定、有可能转变政治立场的，一般情况下只打击到一定程度，以便进一步通过政治攻势促其最终作出政治选择；至于其指挥官业已决定弃暗投明，只是等待反戈时机的蒋军部队，则与之达成秘密谅解，对其整体一般不部署进行军事打击。如平汉战役中，对敌军马法五所部和高树勋所部就区分情况，做了不同的处置部署。实践证明，根据敌军各部的政治态度状况作不同的处理，能使我方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打击对我威胁最大的一路或一股敌人，保证作战胜利。

第六，通过政治动员，造成“骨”、“筋”、“肉”结合一体的作战力量，陷敌于四面楚歌。刘帅谈到抗日游击战争时，指出：正规军、游击队和自卫队（普通的群众组织），这三个因素要形成象

一个人的拳头一样，正规军就是这个拳头的骨，游击队就是它的“筋”，自卫队就是它的“肉”，“形成一个一致的有机体的动作。”他多次强调，要造成这样的“有机体”，关键是要依靠广泛的政治动员。自卫队和游击队“象正规军的无数的眼睛，敌人在周围一有分进合击的动作，我们的正规军就可以很快地运动到它不及防的一边去袭击敌人，结果敌人到了，一扑一个空，而敌人的另一边，却受到我正规军的袭击。”他还说：“我军战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把战术与民众对敌人的一切斗争结合运用，以发扬全面战与全力战；就在于敌我技术不平衡的条件下，不断地窥破与创造敌之弱点，经常保持主动权，给敌人突然的袭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正因为这样，抗日战争中，尽管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多次变换战术，使用了例如什么“捕捉奇袭”、“反转电击”、“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许多手段，然而象一头野牛，闯入人民战争的火海，东冲西撞，处处挨打，无法施展其长，最终遭到失败。许多日军官兵哀叹：“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

第七，创造战场靠军事手段也靠政治措施。刘帅一贯强调，人民军队所以能以弱胜强，很重要的一条是每战有良好的战场；而良好战场的创造，主要依靠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土地政策以及知识分子政策、工商业政策，开明士绅和民主人士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等等的政治感召力。如此，才能赢得战区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支援，造成我军如鱼得水、敌军则如履深渊的战场条件。

第八，政治质量是军队战斗力构成中的先决因素。他指出：军队战斗力由政治质量、军事素养、物质保证和严格纪律等四个条件组成，其中，官兵的政治质量是“先决的条件”。无论现代新式武器怎样精良，总要靠活的人使用；如果官兵的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不行，那就只能打败仗，为对方充当武器运输队。刘帅说：“打胜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解放战争中打

完鲁西南战役，刘帅在一次团以上干部会上，教大家都来认识一个“勇”字。他说，男子汉戴英雄巾，才是个“勇”字，只有大智大勇，我们才所向无敌。

第九，军事指挥与政治思想工作一道进行。刘帅是一位善于把政治领导贯穿到作战指挥全过程的大军统帅。一是战前准备上，首先搞好政治动员，使广大指战员做好充分的思想、精神准备。每逢重大作战行动之前，他都要求认真研究当前敌人对我施行政治战、文化战的特点和手段，拿出战胜它们的对策和办法，通过政治动员教育工作，使全体干部战士明了形势，振奋斗志，抵制敌人思想毒菌的侵袭，做好遂行作战任务的精神准备。二是在作战行动展开过程中，把不间断的军事指挥与不间断的政治动员结合起来一道进行，使部队随时保持良好的政治情绪与饱满的战斗热情。他所下达的命令或发出的号召，往往既是军事命令，又是政治动员令。当年部队向大别山跃进途中在汝河岸边处于紧要关头时，刘帅那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名言，便极大地激励了指战员的士气。如定陶战役中的大杨湖战斗，双方打得都很激烈顽强。我方主攻部队伤亡甚大，有的营甚至连排干部几乎全打光了。当部队感到最多再能坚持上 15 分钟，请示是否暂停攻击时，刘帅在电话上大声说：“敌人现在肯定比我们更困难，至多能再坚持 5 分钟！”司令员的命令给主攻部队所剩的干部战士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一次最后的猛攻，终于啃掉了当面的硬骨头。三是在进行战役战斗总结时，把战术上的讲评总结与部队战中政治思想表现上的讲评总结结合起来一道搞。这样，部队每打一仗，不仅在作战方法上有提高，在思想、作风等方面也能有收益，达到军政双进步。

第十，军队教育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刘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期间，经常强调我军要提高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就必须加强教育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而要真正搞好教育训练和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他

曾以旧中国两位知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一生和杨杰将军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期间终无所成的教训为例，阐明研究军事科学如不首先解决政治方向问题，势必是“无的放矢”、“无所作为”的道理。指出：“我们今天来研究军事科学，目标显明，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服务的。”还指出：“研究军事科学的方法要博而约”，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毛泽东的军事学说。他坚持把培养又红又专的军事人才作为院校教育训练工作的目标，指出：现在培养胜任业务的干部，提倡钻研业务，精通一门，向“专门家”方向发展，但在总的方面不管是军事、政治、行政、技术等任何一个干部，都应强调政治学习，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其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为人民工作与学习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他强调，我军院校培养的指挥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忠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新英雄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二、永远做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人民子弟兵是解放军与军阀军的根本区别

刘帅十分关注我军政治本色的保持和发扬。这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军队与党的关系，一是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数十年间，部队中凡属涉及这两个问题的事情，他都极端重视，抓住不放；即便是看来平常的“小事”，也都小中见大，毫不含糊。

刘帅在《二野在解放战争中》一文中，开宗明义讲的就是：“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一是靠党的领导。整个战争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认真执行和反复实践。记者曾克曾请刘帅谈怎样写战争的问题。她回忆说：刘将军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嘱告我，首先要贯穿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一切胜利的基本关键。党中央就如同唱戏时打鼓的，我们各地就象

拉胡琴打锣的，中央怎样打，我们就一定怎样拉，一切要听他的指挥，这样才能奏成一套很好的音乐。否则，不但合不上板眼，还会造成损失或失败。”

在军队与党的关系问题上，刘帅有几个“一贯坚持”：

一贯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革命战争胜利的保证，我军战斗力的源泉。他在纪念建军23周年时讲到：“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如此的英勇无敌，是因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的，从此即未脱离党的领导”；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式的军事制度，进行了胜利的革命战争”。他历来要求，部队全体人员和一切行动都必须“团结于党和党的路线”，决不允许各行其是；要求部队上下坚决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号令办事，决不允许打折扣，更不允许令不行，禁不止；要求打了胜仗首先要记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央的英明指挥上，决不允许任何人贪“天功”为己有；要求在对敌作战中和部队工作上，厉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决不允许哪个人在所带部队中搞个人统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置于党组织的管理监督之下，决不允许谁享有超越党规党法的“治外法权”。拿执行中央的军事号令来说，解放战争过程中，从战争初期一出陇海，到后来豫北反攻、千里跃进、中原机动、决战淮海，直到渡江南下、进军西南，他都是中央指到哪里就率领部队打到那里，“啃骨头”不讲价钱，代价再大也不叫难，竭尽全力去实现中央的意图。

一贯强调兵权只能归于党，决不能归于个人。他经常用张国焘向党闹分裂、争兵权、搞宗派的反面例子告诫各级干部，指出“张国焘是要团结于他一个人而不团结于党”。1952年在军事学院高级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结业大会上，刘帅向到会的军队高级指挥员们赠送了毛主席讲过的三句话，其中一句就是要求大家成为“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与此相联系，他在干部政策上历来强调以忠于党和党的路线为标准，搞五湖四海；而决不允许以忠于某个领导者个人为标准，搞任人唯亲、团团伙伙。钟

期光同志曾经把刘帅在军事学院工作时期的用人之道，概括为“选贤任能，五湖四海”，“圈子大，班子精，骨干强，能者师”。

一贯坚持重点抓好部队高级干部的党性教育。他曾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高级干部“党的观念与自觉性虽强，但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并不等于已经解决了问题。……对他们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则是一时一刻不能放松而必须予以重视的”。当时，刘帅针对少数高级、上级学员中对中央确定的军队精简整编方针讲二话、发牢骚的现象，要求大家把问题提到“党要统一集中，他要分散独立；军队要正规化，他要游击化；军队要现代化，他要保守古代化”的高度加以认识，使人们深受触动。刘帅素以治军严格著称，他的严，首先严在各级首长身上，尤其是严在各级领导干部的党的观念问题上。每次作战之后搞总结，他都把讲评所属各部首长的思想表现，作为重要的内容。部队在执行政策、作风纪律上出现了问题，他总是注重从领导平素管理教育的指导思想上查根子、找教训。考察使用干部，他历来坚持把实际斗争中是否表现出自觉的党性，作为首要条件。他坚决反对像张国焘那样，对部队高级干部搞“捧、弓、轰”，一向坚持寓爱护于严格，干部中凡属发生摆不正个人同党的关系性质的问题，他都一抓到底，从不姑息迁就。1949 年春我军解放南京后，经刘帅提议，市委专门做出一个规定：凡是过宁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到雨花台祭扫烈士之后，再转赴外地，藉以教育干部牢记并发扬先烈对党的事业忠诚忘我的品质。

一贯强调部队党组织的建设。早在抗战初期，刘帅就指出“部队在抗战中的训练，特别要加强其中党的领导”。当部队“新的成份猛烈增加”的时期，尤其要“拚命发展党的组织并起实际领导作用”，如此，才能增强部队的“胶力与活力”。

一贯强调人民军队的成员要抵制和摈弃旧军队习气的侵蚀影响，自觉树立无产阶级意识。以我军参谋队伍的思想建设问题为例。1941 年，他在《参谋长会议的报告提纲》里指出：“个别工作

人员的观点意识，异常不正确，或存在军阀主义的实权思想，不安心于参谋工作（要当带兵官）；或骄傲跋扈，不遵重兵团首长并僭越职权；或政治责任心薄弱，不能以身作则以轻视政治领导。”刘帅还指出：特别严重的是某些参谋人员思想意识不健康，个人主义严重。有些参谋依仗靠近首长之便，蒙蔽领导，滥用部队对司令部、对首长的爱戴，对部队和下级机关耍威风，指手划脚，甚至私自要枪要马，谋取个人好处；遇到个别作风不正的领导干部，他逢迎、拍马，投其所好，投其所爱，出馊主意，给领导干部帮倒忙，败坏党的作风。尤有甚者，为投首长人员之所爱听，竟不顾客观实际地报告假情况，其危害就更大了。”刘伯承非常厌恶这种唯唯诺诺、看脸色行事、顺杆爬的习气，讥之为“马弁作风”。他多次大讲我军与旧军队的区别，说明我们的参谋人员同其他相等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完全一样，绝非旧军队那样把参谋工作当作军队的附属品，把参谋人员当作“主官”的忠实仆役等等可比。他经常对参谋人员进行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事业的教育，要求参谋人员不容有个人打算，把个人完全溶化在党和民族的事业之中，争当无名英雄。

关于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刘帅当年有两句名言，在我的思想中烙印尤深。一句是抗日战争期间，提出的“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与人民群众有血缘关系”。再一句是解放战争末期我军攻占南京、革命在全国宣告胜利之际他所大声疾呼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的母亲是谁！”他这里说的“母亲”，指的就是人民群众。

刘帅经常讲，我们所以把自己看做老百姓的子弟兵，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军建立和存在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人民打仗”，“为人民服务”，否则，跟军阀军就没有区别了。进行革命战争，军队是“拳头”，人民群众是“骨肉”，军队打仗脱离了“骨肉”，等于“裸体跳舞”，不可能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我军克敌制胜的战术，只有在广大群众力量的基础上才能遂行。他一贯强调，在战

争条件下，部队不仅要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解放事业而忘我奋战，同时也必须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群众的各项眼前切身利益。他要求部队在敌人来“扫荡”、进犯时，要尽量掩护群众撤退转移，留置敌后的部队（分队）要着重打击对当地群众危害尤甚的汉奸、恶霸。要求在组织军民修筑工事时，要尽量贯彻既便于部队打仗、又利于群众生产的原则。记得当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时，刘帅特意指示挖交通沟要既能用作部队作战的活动通道，又能用作群众平时生产所需要的水利设施。我们冀鲁豫军区部队照这个指示做了，人民群众很受感动。他要求在组织支前队伍时，一定要珍惜民力，计算好部队行动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能不动员的民工、担架、马车等等就不要动用。为此，刘帅还时常亲自检查，监督落实。记得进军大别山途中，他发现野直机关分队有一次征用群众的马车有 30 辆之多，当即把负责干部找来商议，只留下最必需的，退回去十多辆。他要求部队每次作战后，都要把借用老乡的门板、麦秸、稻草等物品，凡是战斗中未损坏的，一律退还给老乡。要求部队每次途经、进驻或攻克一地时，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军的群众纪律。记得平汉战役大捷后，刘帅在邯郸给政治部民运部门负责人亲笔写了一件特命全权委任书，命令他带领纠察分队在全城检查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遇有违犯抗拒者，有当场处置的一切权力。在刘邓首长长期教导下，部队纪律严明，每次攻克城镇时，常常是宁肯露宿街头，也不去惊扰市民。刘帅还要求，部队在驻训或休整期间，要尽力参加当地群众生产，为老百姓分忧解难。抗日战争期间，在刘帅的亲自带动下，129 师机关和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投工几万个，帮助驻地涉县赤岸村老乡修筑了一条引水渠。当地群众感动地称之为“将军渠”。由于部队时时处处以实际行动体现“子弟兵”的政治本色，人民群众也就像爱护亲人一样爱护部队。1948 年，当太行等老解放区群众听说要组织南下远征民工队前往支援远在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时，村村老乡踊跃报名。三万民工不计路遥千里，途中敌情

险阻，随军从黄河以北赶到长江沿岸。直到我军渡江、对江南蒋军展开战略追击时，随部队行动的支前队伍中还有大批来自华北和中原老解放区的民兵民工。战争年代军民之间的这种血肉亲情，今天回想起来仍令人怀念不已，感动不已。

刘帅不仅在革命战争艰难困苦时期要求部队依靠群众，在顺利特别是胜利的时候，更是时时告诫全体指战员严格保持子弟兵的本色。解放战争开始后，晋冀鲁豫部队连打了几场大胜仗，少数干部战士中出现了一种对地方政府和群众摆功劳、"翘尾巴"的苗头。为教育部队及时纠正，刘帅利用总结军区工作团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体会的机会，亲自写了一篇报道，在军区报纸上发表，提醒全区部队特别是领导干部谨记：革命战争得到发展，并非只是军队之功。指出：群众不参军，你哪来的军队？农民不送给粮食，你哪儿来的饭吃！……群众不组织团体，不选举政权，你那个地区怎么能开辟成功？"随着全国胜利越来越近，刘帅对保持人民军队本色，防止居功自傲、脱离人民的危险，也越来越重视和警惕。淮海战役后，刘帅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讲李自成和洪秀全起义军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渡江战役准备阶段，华野派文工团来慰问演出，其中有个节目是一出反映李闯王部将进入北京后蜕化变质、欺凌百姓的京戏《费贞娥刺虎》。戏演完后，刘帅很激动地说：应当把那个忘本变质、欺压群众的起义军将领改为刺死，以便让我们今天更好地引以为戒。他对观看演出的机关人员和部队大声讲："我们快要最后胜利了，胜利后千万不要学李闯王！"解放南京后，他更是经常在各种场合，教育部队牢记太平天国的前鉴。他告诫各级干部："南京是洪秀全失败之地，要接受这个历史教训，与堕落腐化倾向坚决展开斗争，保持与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提醒大家："不要使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成为恭敬的偶像，就之乎玉皇大帝之于农民"，"就是玉皇大帝，如果三天不下雨，农民也要把它从库里搬出来晒太阳！"他转到我军教育训练和军事理论研究战线的领导岗位以后，曾经反复指出：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的军事学说所以是反动的没落的，就是因为这些学说是为压迫剥削人民服务的；马列主义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以是先进的战无不胜的，就是因为它们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

刘帅历来认为，树立和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本色的重大政治问题。1947 年 11 月，野战军的刊物《军政往来》上刊载了《刘邓首长号召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风气》的报道。报道说：最近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多次会议上着重指出，必须树立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给群众做好事的作风和风气，反对浮夸、浪费、奢侈、铺张的作风和风气。如果能这样做，我们就为党为人民造福万代，否则对党对人民贻害无穷。他们指出：我们的部队是一种军事力量，同时也是政治力量。由于人民对于人民解放军有高度的信仰，部队所到之处，地方及人民常常以部队的习尚为习尚，随着部队的作风而转移。一个解放区、一个人民民主根据地，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但贯穿到全部任务、全部工作中去和感人最深的东西，就是作风和风气问题。作风和风气不好，即令是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也是很难实现、甚至不能实现的。作风和风气是关系于解放区百年大计的问题。解放区是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缩影，具有他独特的艰苦朴素、振作、创造、进步，前途远大，欣欣向荣的新的作风和风气，而与蒋介石独裁统治下的旧中国的贪污、奢侈、虚伪、骄纵、淫逸、浮夸、专横等没落的作风和风气，是完全相反的对照。我们应该坚决地不断地同浮夸、奢侈等肮脏作风和风气作斗争。

例如，有一个关于刘帅用“三发子弹打思想敌人”的故事。那是 1946 年初，国民党加紧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中央军委要求全军迅速作好包括开展练兵运动在内的各项应变准备。当时，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也还在施放“和谈”烟幕，部队中相当一部分同志中存在有“该歇口气了”的松懈情绪和和平麻痹思想。一天，刘帅把各纵队和旅的首长带到靶场，什么话也没说，头一个

趴到靶位连打三枪。然后才起身对大家讲：我眼睛不好，今天并不是作射击示范，而是要用这三枪，打掉我们头脑里麻痹松懈这个思想敌人！老司令员亲自打靶的事情传遍边区，和平松懈的思想为之一扫，全区部队的练兵备战运动迅速掀起热潮。解放战争开始阶段，晋冀鲁豫军民之所以能够接连取得上党、平汉、定陶、鄄城等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野战军首长通过适时有力的思想教育，把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敢战方能言和的指示，深人贯彻到了广大军民之中，从而保证了部队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渡江战役前后，直到全国解放之初，刘伯承司令和邓小平政委以相当大的精力，在二野部队中大力开展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反对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教育，要求部队上下树立胜利之师必须警惕骄傲变质的思想，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普及到各级干部和全体指战员。

他善于联系全局讲局部，用大道理说服小道理，高屋建瓴地把部队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上来。例如，1947 年冬到 1948 年初，正是我们挺进大别山部队斗争最艰苦的阶段。那时，由于是千里跃进，持续地无后方作战，根据地刚刚开辟，部队减员多，生活苦，干部战士中对执行中央关于跳入外线实施战略进攻的决策究竟划不划得来的问题，出现了一些议论，甚至有点牢骚。为此，野战军连续召开会议。刘帅和邓小平政委结合全国其它各解放区捷报频传、蒋军在全国战场上日益被动挨打的总形势，讲解我们晋冀鲁豫主力这个“过河卒子”拱到蒋介石“卧榻之旁”后对改变战争全局面貌所造成的意义，讲解我们这路大军在大别山“啃骨头”对帮助兄弟野战军在别的战场上“吃肉”所起的作用，从而精辟地阐明了中央决策的英明伟大。刘帅特别指出，如果不善于从全局整体上看问题，只因我们自己在大别山对蒋介石搞“釜底抽薪”伤了一点皮就动摇起来，那就太不够资格作毛主席的学生了！首长把道理讲得那么透彻明晰，全军上下的思想认识完全统一到了坚决彻底地执行中央的英明决策上来，为出色完成战

略进攻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

他善于抓住问题要害，点破思想实质，从根本上转换人的脑筋。刘帅做部队思想教育工作，从不只是就事论事，“雨过地皮湿”，而是既耐心引导，以理服人，同时又对问题一针见血，乱麻快刀，使人受教一次，终生难忘。解放后我军成立了军事学院，一大批高级干部入院深造。开始，有些同志对师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是原国民党军队将领、还有一部分人是年轻知识分子一事想不通，认为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没打过仗的教打过仗的”，并因此影响了学习热情。刘帅发现这种现象后，在全院大会上给予严肃批评，指出这种看法和态度实际上是经验主义作怪，与党中央关于军队要现代化的方针格格不入，是党性不纯正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他身为表率，带头钻研现代军事科学，亲自上课堂听课学习。“经验主义”四个字一语击中要害，学员们用党性要求自己，进一步端正了学习态度。从而使中央军委关于提高我军高中级指挥员现代军事素养的要求，在教学中得到了落实。

他善于用生动活泼的方式，特别是文艺手段实施思想教育。据说他任红军总参谋长后，发现部队当时使用的号谱调子软绵绵的，于是亲自主持修写出能起激励斗志作用的新号谱颁发全军。抗战初期，他在太行区看到有的游击队休息时哼的是《王大娘补缸》等无聊小调，少数年轻人甚至唱的是《何日君再来》，便专门交代部队音乐工作者尽快创作出气势雄武的抗日战歌来。1946 年初，部队的一个排长与地方的一个民兵队长发生纠纷，以至动起武来，后经工作，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刘帅听了汇报后说：“好！还是‘将相和’好！”他指示“要写一篇《蔺相如与廉颇》的通俗故事，发给部队阅读，要演好《将相和》这出戏，促进军与军、军与政、军与民的团结。”在刘帅倡导下，邯郸市当时兴起了一段演《将相和》的戏、说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的热潮，有力增进了根据地军政、军民之间以及部队内部的坚强团结。另外，刘帅还曾指示军区的《战友报》刊登苏联作家西劳诺夫的小说《恐惧与无

畏》中的“不是要死，而是要活”等两节，号召部队阅读，籍以教育指战员树立要战胜现代化装备敌人，光靠勇敢还不够，必须是“勇敢与技术相结合”的观念。在这之前，刘帅还提倡过文工团上演苏联话剧《前线》。借用剧中讽刺的思想保守、不适于指挥现代作战的戈尔洛夫将军的形象，告诫领导干部不要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犯经验主义；又借剧中讽刺的另一个人物记者克里空的作风，教育机关同志特别是参谋人员，杜绝在处理军务中凭想当然办事、粗枝大叶“差不多”的现象，养成细、实、准的作风；教育宣传部门和办报的同志深入实际，反对夸夸其谈。我所在的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民看了军区战友剧社演出的《前线》后，大家都警诫：不要做保守的戈尔洛夫，不要做空谈家客里空，要接受新思想，努力办实事。

刘帅做政治工作，所用的语言丰富生动，通俗形象，大量的成语、俚语、典故、古训、中外寓言、诗词名句信手拈来，并针对实际赋予新的涵义，不带书卷气，毫无八股腔，既生动活泼，又令人回味不尽，为广大干部战士所喜闻乐传，深入人心。刘帅就是这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央的各项决策和部署，一经他的传达讲解，便很易于为广大干部战士领会掌握，很易于为部队所理解与贯彻。

第二，倡导政治工作的群众路线

1947 年 5 月，刘帅于战争的空隙，从冀鲁豫战场回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 10 个月自卫战争形势的报告。他指出，我军正处在大反攻的前夜，部队要从多方面加强建设以适应新的形势。其中，特别谈到“政治工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群众路线的问题”。他强调：“群众有许多创造，群众的力量伟大。群众路线是根本路线。今后政治工作沿着群众路线发展下去，以战教战，以战养战，就一定能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局指示、希望下获得成功！”这里，刘帅抓住了发展部队政治工作的关键，推动政治工作的群众路线向新的广度深度发展。当时部队中出现的

“诉苦运动”、“勇敢与技术结合”、“诸葛亮会”、“立功运动”、“互助组”、“门板报”等等，都是群众路线的产物，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工作的群众路线。

解放战争中影响很大的王克勤运动，就是刘邓首长所倡导的。王克勤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的一个班长，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后任排长。为搞好班排工作，他提出了“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的口号，通过组织大家开展思想、技术、体力（生活）等多方面的互助活动，把本班本排并且带动所在连队搞得生龙活虎一般。这个典型在部队宣传推广后，取得很大成效。1946年12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开展王克勤运动。王克勤牺牲后，刘帅亲自写了悼文，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名义，刊于当时的报纸。

刘帅在建军作战中的政治领导艺术，我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特色，那就是凡要求于部属的，他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用自身的榜样力量实施领导。1942年，刘帅在50岁寿辰时自勉：“如果我去世了的时候，能在我的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总观刘帅一生的高尚风范，可以说光辉地实践了他自己的这句名言。他以无数至深的楷模行动，谱写了一曲真正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正如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所说：“回顾伯承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坚强党性，中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他是受之无愧的。”群众是既通过领导者们的言论，但往往更多地是通过他们自身的行为，来看待党的政治和党的领导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刘帅在这方面的典范事迹很多，当年在根据地和二野部队中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富有感召力、说服力、凝聚力的领导，最有效地带领部队去实践党的主义和革命主张。我想，刘帅以其一生楷模行为谱写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连同前述几个方面的政治领导艺术特色，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

我们党和军队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应当十分珍视，发扬光大，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努力奋斗。

追踪军事科技　注重合同作战

林　虎　中将

刘伯承元帅一生的不朽功勋、重大贡献和留给我军宝贵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在领导建军、作战、办校和理论创造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站在军事领域前沿和制高点上，敏锐察知和追踪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入研究和严密组织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理论与实践。邓小平称赞他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家”，“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①。刘伯承“论兵新孙吴”、“合同战术家”的美誉，已名扬中外。

军事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武器和技术装备问世，促使军队组织结构、作战样式和战略战术发生重大变革。及时地认识新的军事科技对军队发展和战争的影响，适时建立新的军兵种，严密组织协同动作，以形成整体作战力量，成为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和制胜的关键。“常胜将军”刘伯承，不仅骁勇善战，精通兵法，从严治军，有古名将风范；而且素具“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勇于接受新事物”的进取精神和“深入海底”的求实作风。他的高超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蕴含着强烈的“时代”意识、“科技”意识和“创新”意识，对创立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追踪军事科技，注重合同作战的思想，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一）

刘伯承追踪军事科学技术、注重合同作战的思想，具有一贯性和体系性的鲜明特点：

一、积极发展新技术手段和新军兵种

刘帅在各个历史时期，为我军拥有新技术装备及新军兵种、缩短从“敌有我无”到“敌有我有”的过程，并向合成化方向发展，进行了巨大的创造性的工作。

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与毛泽东同志发展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张相呼应，强调必须“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②，并热望“上井岗山，和朱德、毛泽东一起去战斗”③。

在红军和根据地创建时期，刘伯承作为中央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的校长，为我军培养懂技术、懂战术的人才，精心组织，译著教材，亲自施教，并参与创立和发展游击战争理论；后任红军总参谋长，参与领导我军的发展建设，加强司令部指挥职能，有计划地建立侦察网、通信网及各勤务保障部门，使红军由游击队壮大为“具有各兵种的名闻世界的军队”。

抗日战争时期，刘邓统率八路军129师，在游击敌后、威镇幽燕、大力发展抗日军队和根据地的同时，针对日军使用新兵器、新战术等特点，系统地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创造了现代化的正规兵团。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在指挥大军连续完成逐鹿中原、决战淮海、强渡长江、进击西南等急难险重的战略性任务的同时，针对敌人“有空军、坦克、化学兵、装甲兵”的情况，抓紧特种兵建设，强调学习技术战术和搞好“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与通信联络”，多次提出建立新技术兵种的建议。还详细论述了各兵种在攻城、突破敌人防御、渡江等作战样式中的协同动作，发展了诸兵种大兵团运动战和攻坚战中协同动作的理论。

建国时期，中央军委根据大陆解放、政权建立、防务空间扩大的情况，决定大力加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适应战略转变新阶段的要求，中央军委批准由刘伯承筹办我军的最高学府。刘伯承在向军委呈送的报告中，建议将“陆军大学”改名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军事学院”。以后又报请军委批准，在学院设立海军系、空军系、装甲兵系、防化兵系、情报系。打下基础之后，军委又根据他的建议分别扩大为独立的军兵种院校。最高学府名称之更改，技术军兵种系和独立院校的创立，反映了刘伯承对新的军事科学技术重要地位和现代战争是合同作战的深刻认识，以及把我军建设成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宏伟抱负。刘帅在领导学院期间，反复强调和引导大家重视新技术及其兵种建设和合同作战，他指出：“现代化合同战斗的诸兵种：步兵、炮兵、装甲兵、空军和海军，此外尚有工兵、通信兵、化学兵、交通兵、输送兵等，这就组成现代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合同战斗”④。“以答复毛泽东同志所期望的，‘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⑤。刘帅不仅使陆军及其学术得到发展，而且为海军、空军及合同作战学术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为促进我军成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为深化合同作战的指挥艺术，使我军跻身于世界强军之林，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二、重视新技术兵种合同训练和实战运用

刘帅认为：“协同动作，这是指挥员的指挥艺术”⑥。“各部队各兵种，假使他们……不协同动作各打各的，时间、地点都不协调，那只是有利于敌军，便于它各个击破我军，我军将遭到不应有的损害，甚至遭到失败”；“协同动作得好，就可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⑦。有鉴于此，他一直强调新技术兵种的合同训练和正确运用，使之成为合同作战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要善于使用一切兵力与兵器，包括飞机、坦克、大炮，以争取胜利。他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强调“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的结合，

学习组织和指挥诸兵种合成部队的协同作战”；1951年夏，他亲自组织了我军第一次有步兵、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空降兵等兵种参加的河川进攻实兵战斗演习，重点演练了空地之间和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以适应在原子化学条件下合同战役战斗的需要。

三、积极探索“以劣胜优”的战法

刘帅高超指挥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做到避敌锋锐，伺机打击，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使我军行动与敌之技术装备的使用形成时空差，“使敌人陆、空技术兵种不易施展其长”或“失其效能”。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指出：我们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创造敌人的弱点”⑧；1946年又说：“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种的弱点当中，寻求所以防御的办法”⑨。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又指出：“一定要精细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⑩。刘帅的这些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他在长期指挥作战中“以劣胜优”战法的总结。比如，在战争年代我们长期没有空军，敌之空袭常给我军造成极大困难和损失。刘伯承一直重视与敌空袭、空降作斗争。早在他任红军总参谋长时，就任命了防空科长，组建了防空训练队和军委防空队。他曾提出并且组织部队采取过许多有效的防空袭、防空降的办法与措施，例如：加强对空警戒，设置防空哨和防空警报，注重隐蔽伪装，修建防空壕和隐蔽部，夜间行动，地面作战速战速决，组织对空射击，破袭敌飞机场等。在抗日战争中，指挥部队发扬“夜老虎”光荣传统和“善于‘机动’与‘坚决’的特点”，每战“突然、迅速、猛烈、干脆”，使敌人的空军难以发挥作用，并且通过诸如夜袭阳明堡和长治机场等战斗，烧毁敌机数十架，给日军的嚣张气焰和“立体的合击”战术以沉重打击。

四、认真研究借鉴外军技术军兵种建设和合同作战经验

刘帅作为我党的军事理论家，对古今中外军事理论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一生就是“读书工作”。学人之长为己之长，欲制

敌而先师敌，可以说是刘帅治军、作战的重要思路。他在研究借鉴外军先进经验方面，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

一是，谁先进就向谁学。在三、四十年代，苏联的军事学术有很大发展，是当时作战经验的“精粹”和“结晶品”，反映了“世界军事学进度与趋势”。刘伯承先后翻译、出版了苏军的多种条令和学术著作，要求部队结合我军的经验和作战实际，“融通研究”。在解放战争中，他针对大兵团作战必须提高军事学术的客观要求，号召部队学习苏联《合同战术》、美国《战斗纲要》，并要“对蒋军专科军官加以利用”。在军事学院时期，明确提出，除了向“顾问”、“专家”学习外，“我们还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的成就，主要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技术和军事学术，以及战争潜力及其备战措施等方面的特点，必须很好地进行研究”⑪。

二是，追踪军事科学发展的实际进行学习。刘帅曾精辟地指出：“实际是运动的”；“实际有过去的实际，有现在的实际，有将来的实际”，“以前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就不一定正确了”，因此“我们的战术、技术就是要研究，要发展，要创造”，“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必须适应敌情变化”，“不断学习，克服某些保守观念，不断前进”⑫。他曾指示军事学院的军事科学研究部，把世界最新科学技术材料，“经常用报告、展览告诉大家”，使大家知道，“究竟世界水平每年到了何种高度”⑬。他要求编辑反映军事发展最新水平的“普通科学常识”的“小册子”，介绍诸如“原子弹、氢弹、导引飞弹、无线电操纵法和半导体作用之类”⑭的常识进行学习。

三是，把学习研究外军新技术、新战术，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措施。刘帅经常启发大家学习研究外军技术、战术的自觉性。他常说：“学习现代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学习组织和指挥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协同作战，是我们的责任。”⑮在刘帅治军、作战智慧的海洋里，是勤学与实践的良性循环，是“领导”与“亲自”的高度统一。因此，他也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学习”，不要做

"思想懒汉"。他指出："在我们对技术兵种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强调亲身学习，学习是非亲身不可的"⑯。刘帅还特别强调干部要虚心学习，曾批评一些单位由于"骄傲自大的神气从中作梗"而不认真学习和研究外军技术和军事学术的倾向。

四是，在学习研究外军时，防止重战术、轻技术。刘帅非常重视技术对战术的基础作用，认为"离开技术的战术就等于零"。他把"技术"比作部队的"筋"，认为"部队开不动，打不准，联不上，指挥不灵，就是抽筋（忽略了技术）的结果"⑰。因此他十分强调对技术和战术都要认真学习；批评了一些人"重战术，轻技术；只会'单打一'，不愿学'弹钢琴'的倾向"。他还要求组织学员对新兵器、新技术"见学"，以增强感性知识。

五是，追赶外军新科技和军事学术"要走捷路"。刘帅对我军在技术和军事学术方面缩短与外军的差距，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并提出了"走捷路"的科学方法。他指出："一定要走捷路，才能赶得上先行的人……并不是一切都是从头学起去赶，而是从自己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去赶，从学到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已有的成就出发去赶，从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就出发去赶，一切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出发去赶，特别要我们学有成绩的科学教师领头当先去赶。只有这样才是走捷路，省时间，可以迎头赶上。这就是乘国内的和国外的现代科学成就之势而利导之，以为国防服务"⑱。

五、通过加强司令部建设促进新技术兵种的发展和诸军兵种合同作战

刘帅从理论和实践的多方面注意加强司令部建设。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就翻译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条令》，供各级司令部参考；在我军正规化建设时期，刘帅感到，军队"所处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诸兵种复杂的多了"，"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千军万马上战场，组织工作很复杂、很重要。司令部要做好这个组织工作，要很好地把各军兵种协调起来……司令部

应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因此他强调，“要加强司令部工作”，“要搞个司令部工作条例”⑲，并十分注重指挥、通信、情报系统的建设。

（二）

刘伯承追踪军事科技，注重合同作战的学术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当前思考、谋划我军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有重要启迪和指导作用。通过学习十四大精神和学习研究刘伯承追踪军事科技，注重合同作战的学术思想，有以下几点启发。

一、坚持科技强军

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⑳。战争和建军实践说明，先进科学技术及其相应的武器装备，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军队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与敌人抗衡以及决定军队编组、作战方式、战略战术乃至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毛泽东1960年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为此，当时的邓小平总书记专门召开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自力更生地研究原子弹和导弹，终于在4年之后就爆炸了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颗原子弹，使我国的战略力量开始发生质的飞跃，迫使敌人修改自己的战略。

近期局部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说明，高技术武器和现代化整体作战系统，使军队作战效能和效益大幅度提高，在战斗力构成中上升到突出地位。发展高新军事科技，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已经成为摆在我军面前的严重任务。军委刘华清副主席指出：“一定要争取时间把武器装备搞上去”㉑。在此情况下，十分需要学习刘帅从追踪发展着的科学技术现实中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并使国防现代化与其它三化同步协调发展，在武器装备和人才科技素

质方面，加快缩短与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

二、诸军兵种力量协调发展

现代作战是双方作战系统的对抗。诸军兵种合同作战成为基本的作战样式。在合同作战中，每一种武器和相应的军兵种，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是大规模的作战，通常需有各军兵种的军团、兵团参加，分别在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进行协调一致的作战，才可能更快、更圆满达成作战目的。如果在军兵种和技术手段编成方面缺胳膊短腿或者效能差距过大；如果在作战中系统结构破坏，程序混乱，某些环节效能不济，将直接影响作战系统整体的运转，甚至丧失功能。因此，刘帅一贯注重诸军兵种力量协调发展和合同作战的思想，既揭示了制胜的基本规律，又指明了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

随着军事航空科技的迅猛发展，空中力量的作战效能和破坏威力明显提高，在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实施威慑战略和实战战略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世界局部战争中，优先和大规模使用空中力量，实施超远程、全纵深、高立体的作战，成为现代作战样式的重要特征和突出内容。就空中战场来说，一是，战争初期通常有一个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的相对独立的空中作战阶段，以夺取制空权，瘫痪敌方指挥控制，削弱敌方战争潜力，并为陆、海军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这对防御一方来说，作战运筹首要而又困难的重心，将是大规模的防空作战。这个阶段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战争的主动权，影响战役乃至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二是，空中作战活动贯穿于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次合同作战的全过程、各阶段，渗透于各领域、各环节。现代合同作战，不仅是陆、海、空军内部各兵种的合同，更重要的是陆、海、空三个军种和三个战场的合同。制空权和多种方式的空中支援，能使陆、海军部队及其阵地、技术设施充分发挥作用，取得最大作战效益。没有空中力量的参加和充分发挥作用，就难以有真正的现代合同作战。没有制空权，就没有陆、海、空军部

队行动的自由权，也难以争得和保持制海权。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领袖的求援电中，突出说明了“敌空军”“肆意轰炸”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考虑志愿军出国问题的焦点，都是制空权问题。刘帅当年十分重视对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大特点是，我无战场制空权，地面军队在敌空中力量的巨大压力下作战；而敌方的空中力量则与其地面军队保持着密切的协同。我军虽然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战役目的、一次战役战斗歼敌数量都受到很大限制，部队付出了巨大代价。仅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和兵团机关就多次被炸，直接威胁着指挥的稳定性。只是在我空军航空兵和高射炮兵在其它部队协同下，粉碎了敌人的所谓“绞杀战”，夺得了清川江以北局部地区制空权后，才改善了交通运输和前线的斗争形势；三是，主要或单独使用空中力量，通过外科手术式空袭方式，达成一定的战役战略目的，成为技术先进军队常用的作战方式。这在中东地区的局部战争中已多次采用。

八十年代以来，核威慑效应下降，隐形飞机和精确制导武器相结合的效能突出，霸权主义国家使用空军进行常规条件下外科手术式突袭的理论在发展。比如美国，由于科技发达，经济力量强，海、空军武器装备先进，具有快速部署和突然袭击能力，因此海、空军是其经常使用的强项。海湾战争中，美国除使用在中东地区的航空兵外，还出动以本土为基地的B—52战略轰炸机，往返24000余公里，用空射巡航导弹在防区外对伊拉克进行了攻击。海湾战争后，他们提出了“超速战争”概念和“全球到达”、“全球作战”的战略运用理论，拟组成各种使命的混合战术联队和包括B—2、B—1和B—52H三种机型的远程混合轰炸机部队，能在接令后数小时内从美本土起飞，攻击地球上任何地区的目标。这样，远程航空突击兵力的平时部署可能就是临战部署，空袭的突然性和速决性比以前更为突出。美国还认为，将来“空中力量仍然会提供一种特有的优势”，它宣称自己“必须保持”而又“阻

止”别人拥有这种“特有优势”㉒，为此，他们在军费有所压缩的情况下，仍在加紧研制第四代先进战斗机。可以预见，由于国家性质和战略运用理论决定，今后美国仍将倚重使用空、海军力量。近两年来，西方强国又在推行以空中力量实施战略威慑的制空权新形式——“禁飞区”。他们对一国施加军事压力，不在地面兴师动众、兵临城下，而依恃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用一纸声明或“和平”巡逻，就一举剥夺了他国的部分领空主权，进而促使他国政治形势的演变。在我军力量编成中，空军是弱项，与美国空军相比，差距很大。空袭和空降成为对我国安全和军队行动自由首先的、重大的和防范困难的威胁。为了完成十四大提出的“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必须高度重视空中战场的斗争，加强空中力量建设。

党中央、中央军委历来重视空军的建设。在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使我国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代化程度和作战能力不断提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将来打起仗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支援、掩护，海军没有空军掩护也不行”。㉓近几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拿出巨款，进口并自行研制先进航空和防空武器装备。重点发展和正确运用空军，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建军方针的重要内容。我们空军一定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军委关于重视空军建设以及刘帅关于发展“空军和空军学术”的思想，把空军进一步建设好，为提高我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而奋斗。

三、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我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刘帅当年不仅重视新的技术兵种及其学术的发展，而且一贯强调合同作战的学术研究与训练。他指出：“军事学院的任务，就是训练与培养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的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

员”㉔。邓小平同志也早就告诫全军，现在“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就行了”的“小米加步枪”的年代，而是“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时代，他要求全军“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㉕。军委刘华清副主席也指示：“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㉖

现代战争说明，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组织十分复杂。我军近几年曾广泛进行了合同作战的学术研究，但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和训练演习的实践较少；已经进行的合同演习，就空军来说，显示参与和体现程序的多，按照“三从”原则设置情况和逼真演练的少；现有的合同作战理论和协同规定，有的显得过时，有的不够完善。特别是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在合同作战中产生了一些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全新的领域和全新的概念。例如在战略战役层次，陆、海、空、天、电多维空间作战的协同和电子战问题；在战役战术层次，如何在空地密切协同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战、阵地战和突围战；如何组织三军的空中力量和防空力量实施空袭和反空袭作战，以及如何反隐形飞机、防精确制导的钻地弹药问题等。因此，除了对高新军事科技和合同作战学术进一步学习、研究外，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从具体组织上和实际行动上，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一是，要把陆（海）空协同作战从学术探讨和一般认识上提高到作战基本原则的高度；二是，要从单向派作战小组、目标引导组的协同方式，发展到双向的、严密的整体协同体制。陆、海军从军团到分队都应编制专职或兼职经过训练的陆（海）空协同机构或人员，配备协同通信设备和信号器材；三是，要从象征性的协同演示，发展到从实战情况出发严格训练。特别是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合同作战中，担负组织指挥任务的陆、海、空军的军团指挥员和司令部，要按照军委张震副主席要求的，“学会组织指挥，懂合同作战的几种战法，要把海陆空捏起来，司政后、军政后都捏起来”㉗。

（参与本文执笔者　董文先大校）

注　释

①《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第 3、4 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⑱㉔《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42、第 629、第 632、第 645、第 448、第 632、第 90、第 475、第 625、第 685、第 659、第 692、第 711、第 651、第 636、第 685、第 632 页。

③《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版，第 55 页。

⑰⑲《参谋工作文献选编》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1 月版，第 330、第 327 页。

⑳《军事学术》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年专刊，第 5 页。

㉑㉖引自 1992 年 4 月、10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㉒《海湾战争》（上）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8 版，第 14 页。

㉓《空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版，第 288 页。

㉕《邓小平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版，第 59 页。

㉗引自总参办公厅 1992 年《军事工作通讯》第 21 期，第 16 页。

学习刘帅重视军事技术的思想，开创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赵起增　少将

刘帅在军事斗争中高度重视军事技术的作用，并从理论上作了深刻阐述。今天，在科学技术对军队建设和作战行动的影响愈来愈大的情况下，重温刘帅这方面的教诲，更有其现实指导意义。

一、技术是战术的物质基础

刘帅在指挥我军作战中，高度重视技术对战术的决定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指出："不管什么战术，第一便是武器问题，有了武器就要看技术如何"①，"战术是建筑在善于使用武器之上，不善于使用武器，就什么都没有办法"②。五十年代，他进一步指出："技术是战术的物质基础，战术是技术的合理运用"③。刘帅的这些论述，从理论上集中阐述了技术与战术的关系，指明了战术赖以产生的基础。

刘帅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技术对战术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付诸于实践。在战争年代，他将落后武器与机动灵活的战法相结合，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

我军初创时期，主要使用步兵轻武器，甚至原始的大刀、长矛，几乎没有火炮一类的重武器。这种装备悬殊、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定了我军必须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游击战。抗战时期，我军除步兵武器外，虽缴获了少量小口径火炮，但与装备精良的日军相比，劣势仍很明显。刘帅由此提出，我军在战术上应实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他并且非常重视发挥炮兵、工

兵等技术兵种的作用，专门为单炮的使用和工兵的任务作了详尽规定。解放战争后期，随着缴获武器的增多，特别是缴获了部分重武器，使我军装备有了较大改善，不但有了炮兵、工兵、通信兵、铁道兵，而且有了部分坦克，我军的战术开始向合同作战发展。刘帅在这个阶段着重强调加强合同兵种作战，加强协同动作。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军队进行的一次较量。我军的武器装备比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了较大改善，基本装备来自缴获国民党军队，同时开始试制生产某些轻武器，并得到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但仍以步兵武器为主，大口径火炮较少，空军和坦克部队尚处在初建阶段，至于防空和防坦克武器则严重缺乏。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军的战术。对此，刘帅指出："如果他们（注：指中朝军队）已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则困难必少，代价必小，而胜利的日期也必早"④。他还要求我军加强研究在防空、防空降、防坦克、防炮火、防原子化学武器等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方法。这说明，刘帅在这时期已经关注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代条件下的作战带来许多新特点。

在本世纪后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刘帅所说的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方法，的的确确已经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变化。由于现代化的武器和技术装备日益朝着反应速度快、投掷距离远、命中精度高、破坏力大、多功能的方向发展，从而引起战术的重大变化。海湾战争中，美军之所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一举重创伊拉克军队主力，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高度重视发展隐形飞机、"爱国者"导弹、精确制导武器、电子对抗、侦察预警等高新技术，并积极研究推行与高技术兵器相适应的"空地一体"战等新战术，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反观伊军，虽然也有一些先进的飞机、坦克，但在精确制导技术、自动化指挥、电子对抗等现代技术方面，与美军相比处于较大劣势，且军事思想保守，战术呆板，消极防御，其结果只能是被动挨打。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⑤。恩格斯的论述和我军在不同时期作战方式的改变，以及现代局部战争均证明，刘帅关于技术是战术的物质基础的论断，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技术与战术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战术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向军事技术提出发展要求，正象刘帅曾经说过的，战术与技术，好比经与纬的关系，两者交织，螺旋上升，是它们的发展规律。我们在强调技术决定战术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战术的反作用。

二、重视改善武器装备

人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而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战争中人与武器的关系提出的科学论断。刘帅在长期军事斗争中将上述论断运用于军事实践，他不但强调我军应发挥人民的支持、旺盛的士气等政治优势，而且也从战术的需要出发，重视和强调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

战争年代，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主要靠战场上从敌人手中缴获。毛泽东在当时曾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⑥。刘帅也提出，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威力，夺取敌人的武器。他在许多战斗总结报告中都专门提到武器装备问题，强调收集一切可以打击敌人的武器，不管是土的、原始的，还是洋的、先进的，只要能利用来夺取敌人的现代化武器，就坚决地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逐渐改善我军的装备状况。

他特别重视建立新技术兵种。在战争年代，尽管我军尚不具备建立现代化诸兵种的条件，他仍立足现有装备，强调发挥炮兵、通信兵和工兵的作用，指出:“今天要注意炮兵和工兵的建设，这

是环境的需要”，是“军队中的大问题”⑦。建国后，我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改善，他更把建设新兵种及其学术作为军事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我军要向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其主要内容就是在步兵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合同战斗的诸兵种及其学术，而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战斗力。他指出：“现代化的诸兵种已在具有良好传统的步兵的基础上装备起来了。这是对现代化敌人作战的好条件”⑧。

刘帅重视改善我军武器装备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对指导今天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军现代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仍然是武器装备问题，而改善武器装备的办法与战争年代已迥然不同。我军不可能再依赖从战场上缴获敌人武器来改善自己的装备。从目前来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武器，象我国周边某些国家那样；二是立足国内，进一步发展我们自己的国防科技工业。前者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政治上可能性很小，经济上无法承受。唯一可行的是第二条路。当前，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势，积极研究以现有装备完成作战任务的办法；另一方面，也要正视现实，加紧研制适应现代战争所必需的新型武器装备。建国四十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生产了160余种常规武器装备，基本满足了各军兵种的需要。在尖端武器方面，成功地掌握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和核潜艇技术，成为世界上五个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功地发射了不同类型的人造地球卫星30多颗，其中有一部分是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率达100%，还进行了多次核爆炸试验，初步建立起有限的核反击力量。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我军已拥有一定规模的海军、空军和陆军特种兵，由单一步兵发展成为诸军兵种组成的合成军队。新中国成立后，我军能够胜利完成历次自卫反击作战和捍卫领海、领空的斗争任务，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善是

一个重要因素。

武器装备以及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增强了我军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而且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的能力，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三、必须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刘帅在我军建设中，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特别是我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得不以劣势武器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给刘帅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此，他曾提出，敌人是发展的，志愿军也要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在军事上大大提高一步，不这样做，就不容易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

在论述关于我军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发展，在军事上大大提高一步时，刘帅认为，我军应当向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方向转变。他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革命军人也就负起了新的使命——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⑨。而完成这样一个伟大转变则需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此，他要求我军：在原子武器、喷气武器时代，必须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特别需要的科学技术要尽快接近世界水平。

刘帅提出的实现军队向现代化的转变必须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事实证明，科学技术用于军事领域，就能转化为战斗力。

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战斗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于它促进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表现为武器威力、速度、精度和机动性大大提高。其次，武器装备的发展又改变了军队的体制编制，许多国家在更新武器装备的同时，适时调整军兵种结构比例，精简指挥层次，健全合成体系，增强电子对抗力量，以及

组建快速反应部队，等等。第三，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远距离空中打击武器和水下战略武器的发展，以及电子装备在作战中的广泛使用，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战争的时空观，大大修改了传统的作战原则。第四，军队指挥正越来越多地采用高新科学技术，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已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战场信息的接受、传递、分析和处理能力。

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军队战斗力，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特别是发达国家，近十年来，纷纷推出高科技发展计划，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力图将高新科技应用于军事领域，提高军队战斗力，从而占领下个世纪的战略主动地位。

刘帅关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论述和今天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是对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鞭策。我军历史上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军作战，困难主要来自技术方面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在发展国防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某些武器装备的水平已经或正在缩小同发达国家军队的差距，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在新型武器的发展上，仍面临一个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科学技术用于军事领域，就会促进军事技术的发展，进而转化成为战斗力。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提高科学水平，具体来说，就是要重视发展国防科学技术。

四、对当前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的几点思考

刘帅提出的我军必须“提高科学水平”的思想，距今已有四十多年。现代科学技术带动军事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周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武器装备水平在不断提高，与其相比较，我军现有的某些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尚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当然，我军在政治、传统、士气以及战场选

择方面仍占有优势，但如何发展国防科学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更有效的担负起保卫国家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仍然是我军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依照刘帅重视军事技术的思想，我们对发展国防科学技术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着眼未来，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刘帅关于军事技术随生产技术发展而发展的论述，对今天我们发展国防科学技术仍有重要意义。和平时期，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当然也有利于将最新科学技术成果转移到军事领域。当前，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许多国家都抓紧时机，积极调整战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施一系列重大科技发展计划，力图抢占下个世纪高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反映在军事技术上的突出特点，是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越来越多地采用高新技术。而对这种形势，我们要发扬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精心规划，慎重决策，制定国防科技长期发展战略，在加速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立面向未来战争需要、而向部队装备需要的国防科研生产体系。吸取四十多年来国防科研、试验和国防工业管理的经验，选准发展方向和重点，力争在几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跟上世界军事技术发展的步伐。

（二）国防科技要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服务

现代战争，由于高技术武器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火力强度增大，目标摧毁率提高，战斗可能在外空间、天空、陆地、海洋同时展开。这些特点，要求我军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加紧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增强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的自卫能力，我们的国防科学技术必须围绕这个目标进行。

应当承认，我军武器装备的现状，尚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不仅与世界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落后于相邻的某些国家。现代战争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落后就要挨打。种种迹象表明，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国外在军事技术

方面还可能出现重大突破。由于受经济实力限制，我军的武器装备与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不应再拉大，某些关键武器还应当尽量接近国外先进水平。刘帅认为，科学研究要从“敌有我无”到“敌有我有”去研究，才不会落空。由此推论，我军在研制某些重要的关键性武器方面，也应力争做到“敌有我有”。

（三）正确处理国防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刘帅认为，国家工业化是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国防现代化又是国家工业化的保障，忽视任何一面，都会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清楚的告诉我们，国防科技发展首先必须服从和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基础，国防科技是搞不好的。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将首先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可能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更新我军武器装备。这种情况决定了国防科技工作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科研，积蓄力量，打好基础，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渐提高国防科技发展水平。同时，积极研究在现有条件下发展新型武器装备的办法，加强决策的科学性，集中有限的经费打歼灭战，力争先搞出几件我军急需装备的水平比较高的新型武器。

（四）深化改革，强化科学管理

党中央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是指导国防科技工业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们要大力开展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和开发民品，为发展国民经济作出贡献，为国防科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同时，注意吸收先进的民用技术用于国防科技，以缩短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提高质量。

必须实行军品优先的原则。国防工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启动和转向都需要一定过程。为此，要研究和制定有效措施，切实保证完成军品任务，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国防科研合同和订货合同。要提高军品科研水平，加强科研试验、测试设施的建设，为

新一代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作好技术准备。

要加强对国防科技的领导，理顺现有管理体制，积极探索新的科研管理办法。要使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家相结合，加强战略研究，提出国防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重点、目标和途径，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总的原则是通过深化国防科技管理体系的改革，逐步建立起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又符合国防科技工业特点的新秩序。

总之，刘帅重视军事技术的思想是对我军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要求我军建设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在这个时候重新学习刘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建军思想和理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努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对促进我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与本文执笔者　王满平少校）

注　释

①②③④⑦⑧⑨《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355、383、716、647、489、632、62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摘》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286页。

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21页。

刘伯承对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思想的贡献

任应来　少将

刘伯承元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借鉴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对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丰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刘伯承对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没有正式红军，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因而主张建立和发展包括主力红军、赤卫队、工农暴动队等地方武装在内的一切人民武装。刘伯承依据毛泽东的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在红军兵团以外，建立“小游击队”和“基干游击队”的主张。他在 1934 年 5 月苏区出版的《革命与战争》杂志第三期上撰文指出：“一般说来，最好是以一个百支枪编成的基干游击队，领导三个由三十枝枪编成的小游击队活动。各小游击队各在指定地域不停滞地活动，而这一基干游击队则在他们各个活动的便利条件之下，辗转联合某个或某些小游击队，去奔袭敌人，以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可以使敌人感觉我们有很多很大的游击队，并且很容易把这一块地方赤化起来。如这种游击集团有几个时，并应准照上述意旨，组成一个约五百枝枪大的基干游击队，领导并配合几个集团的活动。”他还进一步强调：“诸游击队应受附近红军兵团司令部的指

挥，而活动于敌人后方翼侧，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兵团司令部应在一切作战计划上定出他们可能担任的动作，并随时指导和帮助他们。"①刘伯承同志在这里提出了小游击队、基干游击队和红军兵团等三种军事组织形式。可以看出，这里所指的"小游击队"就是"民兵"，"基干游击队"是"地方军"的雏型，而"红军兵团"则是野战军的前身。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关于三种武装力量结合的思想更为明确，提出："我们的游击战争原是游击队、自卫军和基干军队三个成分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②这里他虽然没有沿用原来小游击队、基干游击队、红军兵团的提法，然而就其实质来说，仍是其前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三种武装力量的性质，他说：基干军团是我们的正规军，而各县区游击集团中的干队是正规军的雏型，军分区的基干支队也就是从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正规军。民兵（游击队）自然不是野战军，也不是地方军基干兵团，而是老百姓半武装性质的队伍。他在论述三种武装力量的地位、作用和整体运用时，形象地比喻：基干军队是骨，自卫队是肉，游击队是筋，三种力量结合成我们打击敌人的"手"。"我们各级干部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因素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有机地配合作战。这样才算得全面的有组织的抗战，并使这样的抗战成为世界被压迫者创造的精彩的作品。"③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抗战经验时，对于"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④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的"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十分重视三种武装力量结合建设和运用，指示所属各军区：必须有计划地健全县、区、村指挥部，及其所属的县区干队、自卫队、民兵，以确保军分区以上的野战军能及时集结遂行宽大机动，求得抓住与突击敌人的弱点。他指出：如游击集

团不健全，反尔将军分区以上基干部队平均分配于各县，以行分散游击，指挥不一致，策应不灵，甚至胶着于狭小地区，则无所谓机动，将暴露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严重弱点。他要求各游击集团以破坏交通、断敌补给、空舍清野等作战行动，限制敌人现代装备的大军辗转作战，消磨、摧毁其活动能力，再加上政治上的瓦解争取，以配合野战军队的作战。刘伯承在指挥大军连续取得几个战役胜利后总结战役经验时，对“三结合”武装力量的整体威力和效用作了详细的阐述：“游击战和运动战这两套办法，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游击战既可以由地方部队、民兵担任，也可以由野战军派出小部队担任。“小部队在敌人前后左右神出鬼没地独立活动，其作用很大，既可以帮助游击战争的开展，又可以迷惑敌人，掩护大部队的机动。如此，就构成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一元化。”

综上所述，刘伯承“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是在毛泽东关于武装力量建设总体思想的指导下，随着革命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与创造，又为完善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思想作出了贡献。

二、刘伯承关于建设“三结合”武装力量的主要观点

刘伯承在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创立与形成过程中，对这一适应中国国情和人民战争需要的武装力量体制做了深刻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撮其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三结合”武装力量的组织结构

武装力量体制的核心，是组织结构问题。组织结构决定这种体制的功能。

刘伯承在武装力量建设中，十分重视其组织结构问题。他在《关于人民武装建设问题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讲：“人民武装建

设首先表现在数量大而力量即大。……反动派的进攻，是与人民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是主要形式，因此我们要武装人民，实行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农民为保卫土地而战。这就是人民武装建设的重要性。”⑤在这里，他把武装人民、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做为革命斗争的“基石”。他在《对敌斗争与武装建设中最大的经验教训》一文中，对于只注重正规军建设，忽视其它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倾向作为一条深刻的教训告诫全体同志：“过去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曾一时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建设的错误，削弱了对敌斗争力量，吃了亏。”⑥他进一步强调：必须“发展地方武装，实现全面游击战争，使打仗与生产相结合，以村级为尤然，使干队不至于裸体跳舞，顾此失彼。”⑦基此思想，刘伯承对人民武装建设的组织结构，确定为三个组成部分。土地革命时期，分别为红军兵团、基干游击队、小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为自卫队、游击队、基干军队，并把这三种武装力量做为抗日战争的三个因素。他在《对目前战术的考察》一文中讲到：“我们有普遍建立的自卫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一因素；在自卫队中成立的村游击组，区和县游击干队以及其它游击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二个因素；除诸自卫队诸游击队，又有地方性的军区基干的纵队与支队，特别又有全国性的野战军队，这些统称为‘基干军队’或‘正规军队’，是抗日作战的第三个因素。我们各级干部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因素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有机地配合作战。这样才算得全面的有组织的抗战”。⑧这里，刘伯承把三种武装力量依据抗日战争的特殊需要重新做了层次划分，并强调三种武装力量要有机结合，形成整体力量。为了实现三者的结合，刘伯承主张武装力量应“合于行政系统的经常组织”，按行政组织级别分为“分队”和“干队”两个拳头。1941年他在《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中规定：“在村级者，自卫队、民兵为其分队，而游击小组或模范班为其干队；在区级者，各村游击集团为其分队，而区干队为其干队；在县级者，各区游击集团为其分队，而县独立营或大

队为其干队。……军分区以上则类推。”⑨刘伯承还指出上述编组形式的好处：一是便于党政军民领导作全力斗争；二是能保证遂行经常和普遍地游击战争，使基干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而不致把正规军分散游击而致失去拳头，使正规军能腾出精力，加强整训，抓住机会，消灭敌人。

关于三种武装力量的转换与升级问题，刘伯承提出：地方武装“是部队的源泉，是我军的强大后备力量，它可源源不断地从翻身农民投入部队，扩大主力”。⑩他还说：“对野战军和军分区基干团，也要定出补充数目，这样才能使民兵、游击队、基干团与野战军的发展，达到适当的比例，才便于遂行今后更重要的任务。其次就要注意经常使营兵的数量质量，由小游击队逐渐升级，不断地升为正规军使之能担任解决战略的任务。”⑪

（二）关于“三结合”武装力量的任务区分

建立“三结合”武装力量的目的是为了用于革命战争。对三种武装力量的正确运用，首先要进行正确的战略分工。刘伯承主张：基干军队（正规军、野战军）是对敌作战诸武装力量的“核心”，是对敌作战的骨干力量，主要完成“战略任务”。“一般是以集结使用突击敌人为经常，因为要发扬其消灭敌军的威力才能制止敌人进攻，这也是正规军的任务，这也是手工业向机器工业发展的进程”。⑫他还说：“正规军队的兵力大，军实充足，隐蔽较难，突击力与顽强性都大。因此它通常发扬运动战的威力，以主动的进攻与追击消灭敌军为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以至变成防御退却为避害。”⑬因此，“基干军队应在游击集团协助掩护之下，担任起消灭敌人的任务，当然基干军队同时又担任着消耗敌人的任务”。⑭他特别强调：“正规军的作用必须重视，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军区应负起责任，适时满足要求”。抗日战争中，各地组建游击兵团时，他特别强调指出：“不是把正规军分散游击而致失去拳头，让敌人一个大队乃至一个中队的兵力可以在根据地内横冲直闯，这样是不能巩固根据地的。……正规军的作用是加

强整训，抓住机会，消灭敌人。”⑮他还指明正规军在敌人大“扫荡”开始时，应以一部兵力（加强营以上）在外线活动与本队呼应动作，大“扫荡”开始后，则转入内线活动，及敌人到达利害变换线（被合击的危险圈）时，最好寻求敌人梳子队形的结合部，以转出外线作战。他还要求所有正规军，必须负责组织指导帮助地方武装建设，必要时还要派出一定数量干部、骨干直接组织地方武装建设。

对于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刘伯承指出其主要职能是配合正规军作战，或独立进行小规模、战术意义上的游击战。小游击队在指定地域不停滞地活动，而各游击队集团，地方部队则辗转联合某个或某些小游击队，去奔袭敌人以开展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为抗日自卫队规定的三个基本任务是："第一，警卫战地民众生活的安定，以巩固后方；第二，积蓄和发扬抗日力量；第三，配合基干军队消灭敌人”。他为抗日游击队规定的四个基本任务是："第一，组织全民族的抗战；第二，配合基干军队打胜仗；第三，壮大本身成为基干的军队；第四，消耗日本强盗的力量。”⑯他还具体规定，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一是从敌人后方伏击敌人，袭击敌人，使它腹背受敌，……借此制造敌人的弱点，配合正规军队突击之。二是破坏敌人的交通，使敌各部孤立起来。三是截毁敌人停留的或运送中的武器、军用品及其它资材和各种辎重，从物质方面加速消灭敌人的侵略战争。

综上所述，刘伯承在武装力量建设中，不仅重视三种武装的组织结构，更重视对它们的运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这也是刘伯承出神入化的用兵艺术重要体现。

（三）关于“三结合”武装力量的领导体制和相互关系

刘伯承指出，三种武装力量在职能和具体任务上有所分工、有所区别，但它们是一个整体，必须统一领导、集中指挥，相互之间既分工又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刘伯承强调，正规军和地方武装都是党的武装，应置于共产党的绝对统一领导之下。他要求

“野战军与地方军各级指挥机关，应有党、政、民、随军代表，指导民众遂行军事勤务，保持军民间的协同动作”。⑰他主张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建立各级指挥部，统一协调三种武装力量的配合作战。例如县一级有县长（独立营长）政委、武委会主任共同组建指挥部，负责统一县区干队、民兵、自卫队的领导。各县、区、村的指挥部，在军事上直接隶属于军分区领导，负责组织指挥所属地方部队、民兵进行民众性游击战争。各地区的武委会，“一定要接受相等军事机关的领导，而各军事机关的指挥要经过武委会系统。”他还强调：“每军分区、县和区等地域内任何武装组织（武委会、公安局及其他部队在该地区的后方机关都在内）的作战事项，都归军分区首长、县长、区村长统一指挥。……如正规军较大部队在某一地域活动时，为便利作战配合起见，则由军区、军分区指定正规军相当首长统一指挥之。但上述各级的指挥组织不得变更，并且依托它进行指挥。”⑱他要求凡分遣到各县略等于一连以下的部队和机关，都要接受县指挥部门的统一指挥。

关于地方武装和正规军、野战军的指挥关系，刘伯承强调：“作战地域如有基干军队行动时，要以基干军队为核心，受它指挥。”“诸游击队应受附近红军兵团司令部的指挥，而活动于敌人后方翼侧，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兵团司令部应在一切作战计划上定出他们可能担任的动作，并随时指导和帮助他们。”⑲“基干军队应随时指导游击集团，……进行配合作战的工作，务使其在自已的统一作战意旨之下活动；但要为他们设想周到，不可给以不能胜任的任务，有时并派小部队领导他们游击。”

对于地方武装的指挥方式，刘伯承多次强调，务使他们能够发扬机断行事的特长，多用“训令”指导。他说：“如其与野战军队必须协同动作者，则野战军以训令指挥之。”⑳

他还要求正规军要派出“必要的兵力和干部，散布注入到地方的营兵和民兵中去，与民众血肉结合，共同生死，以强化全面的、全力的（以军事为核心，结合政治、经济、文化、防谍的）游

击集团的顽强斗争。……．以此创造正规军机动自如的局面。”㉑他说："我们的各级干部要尽一切力量把三个因素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有机配合作战，这样才算得更全面、有组织的抗战"。才算发扬了我们传统的"综合群力"战术。

（四）关于"三结合"武装力量的训练与管理

刘伯承素以从严治军面闻名于世。在训练问题上，他明确提出"训练问题是建军的一个重要部分。训练是战争的准备"。㉒号召所有正规军、地方武装要有计划地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要抓紧一切时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练兵。他要求干部与战士一样学习，要有什么学什么，一面战斗，一面教育，求得战教合一，学用一致。

抗战结束后，他针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号召所属部队"发愤整军练兵"，并规定练兵的课目内容"必须使野战军步骑炮工兵、地方部队、人民武装等各种不同的部队，有的放矢，力求适合于在今后保卫边区群众性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各种不同任务的需要。"他还特别强调："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必须担起练兵责任，鼓起练兵热情，亲自订出练兵进度表，研究课目内容、教材、教授法，尤其是亲自带头到轮训队与部队中去，结合实物、实地去教授、学习、检查，以及总结经验教训。"㉓

对于地方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的军事训练，刘伯承尤为关注，他要求各军分区、各县训练部门，应按时搜集整理训练经验，编成教材实地演习，"要教地方部队爱护武器，要培养特等射手，造就一枪一敌的神枪手"。他还要求对民兵训练，不能教条主义的照本宣科，要多安排侦察、警戒、麻雀战及技术的训练与实习。在教材中，"要抓紧敌人的规律和我们作战中的好例子，以及地形的利用与改造问题。"他还要求正规军的"要联系地方人民武装进行演习。要教他们投手榴弹，安放地雷，以及配合作战的一切办法，如送情报、救护伤病员、采集粮草之类等㉔。

在"三结合"武装力量的管理上，他十分注重严格纪律，以

法治军。他说："一个部队没有纪律，是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他把"严格纪律"作为军队战斗力组成的四个条件（政治质量、军事素养、物质保证、严格纪律）之一，要求正规军必须明确树立"人民军队"的思想，"真正做到成为执行政府政策、法令的模范，尊重政府人员，切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针对人民军队的特点，提出执行纪律应建立在自觉自遵的基础上，不是惩办纪律。"人民武装的军事纪律应该是平时多讨论、多研究。"对地方武装、民兵的管理，他针对"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最容易违犯纪律"的情况，强调更应该注意纪律的维持。他认为民兵的军事纪律，起码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服从命令，这里包括一切政策，平时都应教育民兵遵守，特别在战斗行动中，要在一个统一的命令下行动。没有这一起码条件，是不能办事的。2、听指挥守时间，做到随叫随到，说走就走。3、保守秘密。4、不违犯人民丝毫利益。

三、刘伯承"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思想和实践在新时期的指导意义

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建设思想，是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概括逐步形成的。刘伯承创造性地发展运用这一理论所产生、形成的许多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武装力量建设，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大量新型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电子和核化生物武器、精确制导武器、人工智能武器、太空武器的出现和投入战场，使得战争的样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无论现代战争使用的武器装备如何先进，作战方式发生怎么样的变革，"人民战争"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这是为古今中外战争实

践证明了的真理。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更需要各种武装力量的相互配合，广泛地组织协同作战。刘伯承关于“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的许多思想、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充分挖掘蕴藏在人民之中的战争潜力。未来战争，不管敌人使用的武器如何先进，一旦我们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战，就会发挥出一切技术力量，使其受到全方位的立体攻击。

其次，刘伯承的思想产生于中国这块土地，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因此也符合中国的需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建立并完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有利于完成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任务。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和漫长的边境线，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单靠正规军，难以满足应付战争的需要。只有得到地方军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才会有充足的补给，才能在全方位、全纵深展开顺利的作战行动。

再从我国武装力量建设发展情况来看，建国以后，我国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一直得到坚持和发展，其内部组织有所调整，如建立了人民武装警察、预备役部队等，各种武装力量同步发展，目前不仅野战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更新、提高，地方军、民兵的武器装备也同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按照战略分工，发挥各自的作用，以其不同的作战形式在广阔战场空间密切配合打击敌人，夺取战争胜利。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我们传统的人民战争模式，从内容、范围到方法，还应有所发展。我们必须加强对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及与此相适应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建设的研究。在研究中，要象刘帅那样，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敌我力量、环境条件的变化，适时创造性地提出真知灼见，发展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建设思想。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刘伯承军事文

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47　49、第 77、第 127、第 517、第 389、第 232、第 127、第 231、第 517、第 233、第 125、第 123、第 133、第 233、第 69—70、第 239、第 238、第 49、第 243、第 237、第 519、第 443、第 346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 7 月版，第 941 页。

刘伯承与人民武装建设

崔培民

为纪念刘伯承诞辰100周年，现结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帅对人民武装建设的理论、实践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做一探讨。

一、人民武装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率领八路军129师出征抗日，连续获得了阳明堡对敌机场袭击战、重复设伏七亘村伏击战、吸打敌援的神头岭之战（袭击和伏击），以及长乐村急袭战的胜利后，便在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中旬，129师召开了全师党员和干部大会，对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当时刘帅指出，在华北敌后，基本上是以游击队开始建设正规军，从游击区开始建设根据地，因而开辟根据地第一步是开辟游击区，在此基础上建立军分区，然后建立军区；只有建立军区，才能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军区一方面要依照自愿的原则组织自卫队、游击队，补充兵员，征集资财，安置伤病员，成为积蓄武装力量的机关；另一方面还要指挥军区的基干纵队、支队、游击队、自卫队等独立作战或者配合正规军作战，可成为使用武力的机关。正是按照这一认识和设想，他拟定了在太行山建立军区和军分区的方案，作为创建根据地的蓝图。全师立即实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展开，各旅以团、营、连为单位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抽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到各县开展发动群众抗日的

工作，同时派出小型的游击支队到各地进行活动，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群众参军，建立和发展游击队，组织抗日武装和团体。从1937年秋到1940年的百团大战时，太行山区的自卫队员即达30多万人。

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党中央关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得到贯彻和实施。刘帅在师司令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举办了游击训练班，争取一年内把师属的排以上干部轮训一遍，还对地方干部进行培训，着重学习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军，以及如何组织支前工作。他亲自讲课，亲自作报告，对普遍建立游击队和自卫队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1937年12月，他在干部会议上以“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观察”为题的讲演中精辟地指出：“我们的游击战争原是游击队、自卫队和基干军队三个成份有组织而艺术的配合行动。……就这三个成份配合作用来说，好像组成了我们打击敌人的手一样，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1938年3月，他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特别是在抗战的广大民众中繁殖游击战争条件之下，我们组织和进行游击战、运动战，以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适当配合，这在长期抗战的战略上，更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报告和文章，不仅是抗日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抗日战争实际相结合的宝贵财富。当时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和救亡活动，太行、太岳山区，冀南、冀鲁豫平原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我们不仅在山地站稳了脚根，还逐步向平原地区发展，坚持多给予人民少取之于人民的原则，坚守在人民既得的抗日民主阵地，进一步壮大八路军，扩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通过各方面的建设，加强了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刘帅一贯坚持人民群众是军队的母体的思想，是进行革命战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他

常对部队同志说："一切功劳都应归功于劳动群众，我们自己不过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军队不断地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就可以使我们的军队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

二、人民武装机构的组成及其任务

太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武装，是在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完善。1940年6月，第129师太行军区司令部建立人民武装科，并建立起军分区、县、区人民武装部门。1940年8月1日，军区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建立坚强的民兵、保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的口号，决定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从军区到县都成立了武装工作科，各地都以自愿报名的原则，开始普遍建立民兵组织，到年底即发展到1000余人。1941年1月，民兵很快发展到3万余人，到9月（选举产生了晋冀豫区武委会）发展到4万余人。1942年，全区召开民兵政治工作会议，确定民兵政治工作的五项任务：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战斗力的提高；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提高政治觉悟，树立参军光荣的思想；做敌伪军工作。此时，全区民兵已达5．6万余人，轮训村以上武委会干部5000余人。1942年10月，刘伯承在人民武装干部测验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阐述了五个问题：一、对群众游击战争的认识与组织问题——我们的游击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只有充分发动群众，革命的游击战争才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组织机构，即是县、区、村各级指挥部，统一县区干队、民兵、自卫队的领导，各区武委会除是人民武装自己的领导机关外，又要以各级指挥部负责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二、政治工作——如果说人民武装是一面打仗一面生产，政治工作应当适应游击战的特点。三、装备问题——现在有枪、有手榴弹、有地雷，但是不完备，还应当有大刀、长矛、土炮来打敌人。但无论新旧武器，有了以后还要熟练才行。将技术练成如用筷子

吃饭的样子。咱们用筷子吃饭是“百发百中”的，要吃那一块就夹那一块。“与其有百发一中的枪百枝，倒不如有一发一中的枪一枝”。四、情报与抗日戒严——情报就是侦察工作，戒严就是警戒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情报警戒工作，才不会吃亏。五、战术问题，打法只有三个：一个是袭击、一个是伏击、一个是急袭。……游击战争就是：游，要拖垮敌人；击，要打垮敌人。刘帅提出的这五个问题既通俗又透彻，阐述了人民武装应该怎样建立和怎样作战。为贯彻刘帅的指示和民兵政工会议精神，民兵进行了整顿，选择政治可靠、斗争坚决、能密切联系群众的骨干分子，充实基层武委会和民兵的领导，同时加强党支部对民兵的领导，动员党员带头参加民兵，掌握枪杆子；并由副支部书记兼任民兵指导员，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到1942年底，仅太行区民兵已有5万余人，整个晋冀鲁豫区民兵达9万余人，质量大为提高，成为反“扫荡”和政治攻势中的生力军。

三、人民武装的战斗及其配合正规军作战

1、游击集团的创立和发展及其作用

游击队如没有人民武装的配合，正规军如没有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必然形成“裸体跳舞”。1941年2月，刘伯承在太行军区扩大会议上“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中，针对日军实施总力战而指出：“党军战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把战术与民众对敌人的一切斗争结合运用，以发扬全面战与全力战……游击集团依然使用并已发展……，我们在游击集团网中的基干部队，区有游击队，县有独立营，分区有步兵团，军区并有野战部队。”6月30日，刘帅为129师起草的“关于游击集团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游击集团是以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相结合而组成的广泛经常的游击战争组织形式。在村级者，自卫队、民兵为其分队，而游击小组或模范班为其干队；在区级者，各村游击集团为其分队，而区

干队为其干队；在县级者，各区游击集团为其分队，而县独立营或大队为其干队。此为合于行政系统的经常组织，便于党政军民领导作全力斗争者，军分区以上则类推。游击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斗争起着重大作用，而发展地方武装，实现全面游击战争，使打仗与生产相结合，以村级为尤然，使干队不至于“裸体跳舞”，顾此失彼。其好处，在于它能保证遂行经常和普遍的游击战争，保证基干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的密切结合。他在“组织游击集团要诀”中又强调指出：“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者结合，才能形成游击集团”，游击集团要把党政军民结合起来进行全力战，统一于军区指挥和党的领导之下。游击集团实际上起到了侦察、警戒、疲敌、耗敌的作用，也起到了配合主力兵团作战，掩护主力兵团休整的作用。根据历年来反“扫荡”的作战经验，刘伯承提出：当敌合围时，统率机关与基干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转向外线打击敌人；以游击集团展开地雷战、麻雀战，坚持内线斗争，内外密切配合，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健全强化游击集团，配合正规军作战，发展游击战争，对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从1941年到1943年，是太行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敌人把对根据地腹心区的频繁“扫荡”，对边沿区的加紧“蚕食”，与对占领区的“清乡”结合进行，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刘伯承在1941年2月太行军区扩大会议上“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发展与锻炼所属营兵与民兵的组织”，民兵很快得到发展。从军区到县、区、村成立武委会，进行对民兵的领导；在组成不同层次的游击大小集团，由县区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执行武装斗争任务；平时帮助地方工作和民兵训练，战时带领游击队、民兵作战。游击集团在反“扫荡”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深入腹地“扫荡”的日伪军坠人群众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组成游击集团，是刘伯承的创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的思想。

2、人民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

（1）百团大战中人民武装的配合

百团大战，是一次大规模的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日军利用平汉线割断了我山区和平原的联系，利用正太线割断了太行根据地和晋察冀根据地的联系。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打击其“囚笼政策”，刘伯承在百团大战之前曾对交通战的意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透彻地说：“敌人以战养战政策的推行，必须依靠交通，在这一点上，铁路公路之于日寇，有如身体上之大小血管，据点则好比淋巴腺。”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切断和破击敌人的交通线。为了把这次破击战打得更好，刘帅曾把各部队历次破路作战的经验整理成文件，发给部队，让部队提前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1940 年 8 月 22 日，正太战役全面发起之后，随着敌军据点的先后被拔除，各路破击队、步兵、工兵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组成的强大破路队，对铁路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使整个正太铁路陷于瘫痪。9 月 10 日结束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作战，129 师在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将正太铁路西段摧毁三分之二以上，敌人遭到空前的惨败。在第一阶段仅太行第 2 军分区，便有自卫队 1．5 万余人随军参战，有的随军远征配合作战两个半月之久。晋中地区参加破路的自卫队和群众就有 7 万多人。整个百团大战三个阶段敌人伤亡惨重，损失巨大。这是人民武装开始有组织地配合正规军作战和部分骨干直接对敌作战，克服了军队缺少人民武装和游击队配合的“裸体跳舞”现象，初步建立了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结合的作战体制。到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结束时，仅太行区民兵配合正规军作战与单独作战就达 536 次。

（2）在执行“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中人民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

百团大战后，日军更加疯狂地推行“囚笼政策”，实行“三光政策”，斗争非常残酷。刘伯承在对太行第 1 军分区指示中说：在

对敌斗争方面，不能采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一定要积极作战，主动出击，实行“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抓紧有利时机，集中打击敌人。这不仅可以阻止敌人的“蚕食”，还能胜利地开展敌占区的工作。他说：“为了粉碎敌人的‘总力战’的‘格子网’阴谋，我们必须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创造性的新战法，不仅巩固了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发展壮大。我军对敌占区组织了武装工作队。刘帅在1942年3月17日发出指示：“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应着重于简单的政治宣传兼侦察。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摧毁敌伪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的保护群众利益的斗争，粉碎敌人所谓‘华北参战体制’和‘以战养战’的方针。创造发展游击战争。”他说：“敌人来根据地‘扫荡’，我们就派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敌进我进’的办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完全主动了”。根据刘伯承提出的“敌进我进”和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的方针和口号，各地都先后组织和派遣了由军队和地方干部和民兵组织的武工队和精干的中型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多次反“扫荡”均证明，“敌进我进”的战术是我军保持主动权，粉碎敌人“扫荡”的有效战法。他还根据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岗村宁次对我抗日军民搞什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企图，来个针锋相对的方针：“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他在1942年8月撰写的《怎样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力量》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与人民有血缘关系的子弟兵……，它不但能够以窳败的武器，数量较少的兵力，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且它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战！也只有当它懂得了为什么而战——掌握了真理，它才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就是说，它善于以政治来战胜敌人。……还要善于去推动和协助党政民共同参加攻势，……使我们这一次政治攻势，变为物质的力量。”我军的政治攻势，对加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在反“扫荡”和反“蚕食”作战、巩固根据地和开展敌占区斗争中人民武装的密切配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全世界法西斯侵略阵线和反法西斯民主阵线明朗化了，这对我抗日战争有利。日军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对我根据地“扫荡”更加频繁，更加残酷。刘伯承指出：“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敌后每一个士兵和群众都要在上级的指挥和部署下，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组织军民在反“扫荡”中对敌进行全面的斗争，成为反“扫荡”战役的基本任务。军民结合斗争，即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并吸取了春季反“扫荡”的经验，加强了空室清野和其他反“扫荡”准备工作（如设置秘密情报传递哨，轻装和派出干部协助地方党政机关指挥民兵作战等），并说：别看敌人现在很猖狂，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质，我们一方面积极反“扫荡”，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敌人抽兵的情况，把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密切协同起来，把内线作战和外线出击结合起来，力争主动，机动歼敌，使敌人顾此失彼，顾前失后。针对敌人“扫荡”时的兵力是“腹地密、边地稀、敌占区空虚”的特点，对我军基干兵团、游击队、民兵配合作战提出：诸基干军队应保持在边地与敌之合击的间隙地实行机动，不只是消极地脱离敌之压缩合击，而且还要积极主动地转入外线，奇袭敌占区守备薄弱的要点，摧毁敌人补给线，背击尾击敌人。游击集团的活动，主要打击分散之敌，开展麻雀战。在反“扫荡”过程中，应始终不放松敌人之弱点，化被动为主动。游击集团应以“分遣为主，集结为辅”，基干团、野战旅应以“集结为主，分遣为辅”。1942—1943年是太行山最艰苦的两年，由于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战术，把反“扫荡”、反“蚕食”和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三种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以一部分军队分散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形式坚持腹地斗争；另以有力部队（甚至主力）转到敌后去打断敌人补给线，破坏敌人交通，打烂敌人统治机构，粉碎敌人“清乡”和“蚕

食”计划，并配合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工作的同志深入展开工作。他于1945年5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根据地发展的趋势和曲折途径。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前夕，我军发起全面反攻。晋冀鲁豫区10万民兵、40万自卫队总动员，大部分开赴前线，配合地方武装和正规军作战。

(4)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武装积极参战和热烈支前

解放战争初期，在战略防御的内线作战中，党中央制定了“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方针，刘伯承在白衣阁干部会上强调指出：争取胜利的方针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辅以游击战，构成大规模运动战和游击战一元化。刘伯承率部正在与敌作战并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等战役胜利的时候，经党中央、军委批准，由晋冀鲁豫野战军7纵一部和豫东支队从冀鲁豫越陇海路南下，与原第6、第8军分区部队组成豫皖苏军区；成为晋冀鲁豫解放区战略进攻的前哨。战略进攻后，又成为中原地区的中枢，和支援各野战兵团南下作战的基地。解放战争头一年，太行军区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民兵战斗力的提高，民兵武工队的出现，标志着民兵斗志进一步增强，组成了全区的民兵大联防，汇合成天罗地网式的游击集团。整个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连同地方团队近30万人，并收复和新解放县城43座。全区野战军由8万人发展到28万人。民兵除大量补充到部队外，由战争初期的60万人发展到90万人。到1948年3月，豫皖苏区发展成立了8个军分区，解放与控制了豫皖苏地区所有县城和城镇，有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野战军作战。在我军开始战略进攻，突破黄河进行鲁西南战役，以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在淮海战役中，我党动员了中原、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40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200多万民兵、民工执行各种战勤任务，使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无法逃脱其覆灭的命运。淮海战役的大决战，不仅

是军事力量和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而且在其背后决定胜负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人心向背。中原大地上支前的独轮小车民工队，配合作战民兵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正是民心所向，正义之师何以所向披靡的真实写照。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的血肉关系，解放军指战员为人民而战的根本性质，必然导致胜利的光辉结局。

四、民兵、游击队、正规军三结合成为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就宣布要为工农大众而战。历史证明，坚持人民战争思想，建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就能形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整体威力。刘伯承的人民武装建设思想及其实践，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当他进入晚年，仍深思熟虑地提出兵法战策的宝贵建议：居安思危，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他认为：“我们武装力量的组成，包括两个部分：一为军队（常备军），一为民兵，是军队和民兵的混合制。”对于兵员，他认为“要做到召之能来，来之能训，训之能战，战之能胜，胜之能归，归之能安才行。”他主张：部队就是要搞军事训练，就是要“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各省军区、军分区要搞好地方部队和民兵，特别是基干民兵的训练，也要设一副职掌握军事训练工作。”由此看来，刘帅是多么重视人民武装建设以巩固国防。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武器装备的日新月异，军事战略不断演变，都决定了现代战争对国防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性质来看，中国在任何条件下，进行任何规模的战争，都是人民战争。因为中国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战争的力量来自人民；战争获得的胜利果实属于人民。人

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的论断仍然正确无疑。如果说，以往我党是以人民武装、人民战争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当前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人民武装力量不但应成为保卫国防、而且也应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生力军。

刘伯承的治军

谢正浩

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战略家和军事理论家。他在军事上全面的素养，高超的谋略，英明的指挥，精湛的理论，崇高的品德，严谨的作风，已经多有论述，而关于治军方面，尚待系统地研究总结。现据目见耳闻及回忆所得，把几个重要方面，如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带兵练兵、军事学术、将帅品德的体会写出来，冀于军内外年轻同志学习了解刘伯承有所帮助，对当前我军建设有所借鉴。

与民众血肉结合

我军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刘伯承对此身体力行，全力贯注于长期治军实践之中。从戎之初，便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决心寻找救国救民新路，一息尚存，革命不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更进一步明确树立人民军队的治军思想。他说：“民众是革命战争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每一军人应在民众中进行政治工作”，“经常保持军民血肉的结合”，把“鱼水之情”“永远保持下去”。“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①曾组织部队协助太行人民抗旱灭蝗，兴修水利，引漳灌溉，说“这是当前的政治”。我军战略外线出击时，他指示“要节省民力，让他们的力量更有效地用于革命战争”。渡江之前，对后勤工作要求“既要适应大纵深

行动的要求，又要防止一切需要同时要当地人民供应，造成人民负担过重”。对根据地、解放区的创建，一直看作是军队的基本任务，用很大力量去做好。

他用“全面斗争”的人民战争思想教育干部，说明“军事战术与政治策略的含义本来就是一样的”，“我们的战术基本特点，就在于把战术与群众对敌的一切斗争结合运用，以发扬全面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全力战（党政军一元化）的威力”，“这正是我们越战越强，敌人越战越弱的根源”。

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学校，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从这个观点来看，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具有极大的意义”。②刘伯承在各个时期坚持了上述原则，注意不断加强党在军队的工作，并带领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一九二六年的“顺（庆）泸（州）起义”，是党在四川试图直接掌握军队的一次勇敢尝试。占领泸州后，刘伯承任总指挥，着手整顿起义军，建立指挥部，大批起用共产党人，在各路设政治部、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加强党的领导。他在党的六大上的军事报告中提出“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组织”；总结南昌起义的教训是“我们军内大半非同志领导”，部队缺乏“政治认识”，“党员军事人才非常缺乏”，而且十分需要统一集中的纪律严明的党的领导。后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确定下来设立“营政治教导员”这个重要职务。

长征中，他与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明确表示“同意北上”，“中央毛尔盖会议是正确的”，并以此教育红四方面军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晋冀鲁豫全面贯彻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的

战略方针，在虎狼夹击下，极大地发展了抗日大好形势，成为“四战之地，四战之军”。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对中央决策全力以赴，以全局、大局为重，挑重担，啃硬骨头，从无二话。如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战略协同作战，决战淮海，渡江舍南京而直插浙赣实施战略追击，大迂回大包围解放大西南等，都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

他把军队政治工作视为党对军队实施政治领导的保证，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战争胜负的因素，决定于能否把政治力量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政治质量是军队战斗力的“先决条件”；“打胜仗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有了斗志才有战术”。

他特别注意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强调治军先从治心入手，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具体化、行动化。邓小平同志称赞他善于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很有感召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困难重重，干部思想问题成堆，刘邓作了大量工作，扫除怀疑动摇情绪，统一全军思想，振奋部队士气，赢得伟大胜利。军事学院建校后，他亲自解决办学中的思想问题，如老干部要不要学，旧人员敢不敢教、能不能教，甚至找苏联顾问谈心，消除分歧。在京同作家记者谈如何写战争，反复强调贯穿党的领导和抓住思想斗争两条。因病离开军队后，仍以部队战备思想为念，用“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古训谆谆告诫。他领导的军队和学校，正如列宁所说，“在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的地方，……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③

他与政治委员、政工人员的关系是很好的。邓小平回忆与刘伯承一块工作与生活，感情很融洽，工作关系非常协调。

刘伯承一生“绝对服从党”。自述“我自入党那天起，就叫我听（党）招呼”，“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想必一事无成”。只要觉察自己工作上思想上有与党的要求不一致，必作严肃

的自我批评。党的七大上，他主动检讨在宁都会议犯了“单纯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经验主义”的错误。在所谓“反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用高度革命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主动承担领导责任。他对党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纯真感情，曾动情地说：“我去世的时候，能在墓上立一块碑，上书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即感到莫大的安慰”！

干部决定一切

刘伯承把干部问题视为治军的关键，说“干部决定一切”，培养干部好比“母鸡孵小鸡”。

他赞成毛泽东“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的观点，提出“治军必先治校”，把“教育的重心放在干部的教育，教育的干部”。他是我军院校工作的开拓者。“顺泸起义”后曾办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到上海，根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提议，办起高干短训班，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努力把红校办成“红埔”。长征路上办红军大学，兼任校长。抗战期间在一二九师办干部轮训队。解放战争后期又兼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后，主动辞去军政领导职务，参与筹建陆军大学，即以后的军事学院，被任命为院长兼政委。他很重视培养高级将领的重大作用，并倡议把训练工作、特别是干部训练工作作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年届花甲的刘院长鞠躬尽瘁，事必躬亲，多次主持座谈，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亲自审定大型教材六十余种。一九五四年全军高干“集团军防御战役”集训，担任主课教授，吃住就在班上。军事学院向全军输送大批优秀中高级指挥员，受到毛主席赞扬：“延安有座清凉山，南京有座紫金山”。

他重视指挥机关和参谋队伍建设。任红军总参谋长时，即致力研究外军经验，大力建设司令部。长征中为此译成苏军《司令

部野外勤务教令》，前言中强调“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主任　　参谋长就是首长第一助手和代理人”。一九四零年著文指出，“我们发展大量的军队，必须有善于组织作战和善于军队建设的强有力的司令部及其参谋人员，才能从战术、技术与指挥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一九四九年初再次说明，现在是转变关头，正规化只有先从司令部着手，才能组织战争。渡江前向中央的综合报告重申了这一观点。晚年还关心着总参谋部建设，作过具体指示。

他是我军参谋工作的一位奠基人，历来“反对轻视参谋工作的观点”，并在晚年自称是中央军委的“编外参谋”。长征途中和在一二九师，都办过参谋训练班。对身边的参谋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不厌其烦，规定文化低的人一天练一百个字，手把手教。我曾有幸在刘帅身边工作，感念很深。他对参谋又很严格，要求“心细如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应有“描花绣朵的功夫”，粗枝大叶害死人，农民作风不适于现代战争；“深入海底”，向部队和群众学习；向前看，多看几步，有预见性。还规定了下部队的注意事项。生活上要求也很严。

他要求干部又红又专，有实际工作能力，“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兼业务专家”，“精通一门”，“不能满足万金油式的项项都懂一点”；要奋发图强，“头悬梁，锥刺股”。对工农干部，一直关心他们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比喻“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就可成万成千地把铜钱串起来，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我们才能富有起来”。办院校时，把文化视为钥匙，为学员打开求学之门，升堂入室，攀登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高峰。还把普及提高科学知识、科学研究提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日程。也十分爱护知识分子，幽默地称之为“电灯泡”，既能发光又需爱护，生活上关怀备至，思想上严格要求，工作上放手使用，使他们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带兵练兵结合，从严治军

刘伯承认为，军队主要成份是广大士兵和“亲兵之官”，他们才是战争的主人，如列宁所说：“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决定的”；④“无论新式武器……怎样精良，总是死的，都是靠活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纪律的训育与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只有为对方作武器输送队”。所以，治军必须治兵；兵不在众，“以治为胜”。

“要打好仗，首先要带好兵”。带兵要严，“慈不带兵”。周恩来说刘帅“有学问，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特别表现在抓部队的作风和纪律。早期的刘伯承就有号令严明，作战英勇，秋毫无犯的声誉。他把军纪看作“军队战斗力组成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约束部队极严。重大战役行动，必严格检查群众纪律、战场纪律，对违纪者决不手软。一九四六年滑县战役后，曾发手令：“兹介绍穰明德为纪律检查团长。对违反纪律者，营以上干部先扣留后报告，经批准后处理。对连以下人员，有就地处决之权，然后报备”。还指出，严明军纪，改进作风，加强团结，为民除害，是立于不败的根本保证。作战中，提倡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作风。他常常发出“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号召，强调两军作战“狭路相逢勇者胜”，高级干部在成败关头应有冒险犯难、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又说“战斗作风要猛，也要顽强”，“猛然一击不能解决战斗的时候，就需要仔细的侦察，详密的部署，顽强的战斗”，“顽强，但不是顽固”。大范围机动作战，有些人怕走路，便耐心阐明机动必须走路的道理，指出“走路也是战术”，“苏沃洛夫说，脚才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凡在最艰苦的时刻，总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有别的话说”。

当全国胜利在望，他适时把正规化作为治军重要内容，并对

其重要意义作了深刻阐述："有了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解决了协同动作问题，但必须还要有正规化的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没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军队的协同动作"；"最具体的正规军队的生活秩序，就是各种条令"，这应"成为我们部队训练的要项之一"。

他从严治军，出于对党、对人民、对部属、对事业的责任感和对同志的关心爱护。战争中他向来认为"让战士去硬拼是犯罪"，"不能随便多死一个人"。对伤病员关怀备至，战前必作好各种安排。部队生活时刻挂在心上。一九四七年在大别山，部队没有及时穿上冬衣，刘邓作为"战略问题"提出，发动干战自己动手，并亲自教絮棉花、锁扣眼、缝衣袋，用饭碗比着开领口，象慈母一样。在军事学院对教员体贴入微，节假日反复叮咛给每人多发一张影戏票，偕同爱人一起娱乐。凡此种种，难以备述。诚如孙武所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以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俱死"；故"上下同欲者胜"。

要打好仗，还必须练好兵。刘伯承重视和擅长练兵，素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讲究实效、练战一致著称。他反对只打仗不训练，而把训练看作战争的准备："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兵若易，进军就难"；⑤"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没头苍蝇"。朱总司令称赞他"训练一二九师成为铁的兵团"。

这里扼要讲讲他的练兵思想、原则和方法：

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人家的条令教程，要有自己的东西，在训练中把一般的军事理论与我们的实际很好结合。

各级指挥员亲自动手。"以与所造成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广大群众的练兵热潮相结合而行动，才能完成"。

抓好练兵的思想政治工作。"练兵之法，莫先练心"。明确练

兵的任务、目的和意义，激发练兵热情和自觉性。

注意抓好基础和重点课目。“战术是建立在使用武器之上”，“只有技术上打下坚实的基础，战术才会有物质基础”。“要抓紧少而扼要的课目，结合实物，实地苦练，练到熟能生巧的地步”；一般情况下，“重点课目窄而深，非重点课目要宽而浅，不重要的课目索性删掉。这就是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有所损才能有所全，重要的目的则在于有所取和有所全”。

“必须实行以战教战的办法”。“一是向我军自己的实际战例学习，二是向一般的军事理论学习”。“教材就是战争”。平时按实战要求练兵，操练演习力求接近实战条件。提倡战前、阵前练兵，对象明确，针对性强，重点突出，可以直接借鉴最近的实战经验，对部队心理状态有利还可鼓舞士气，易于收效。抗美援朝战争，他在军事学院组织三次赴朝见学，汲取现代战争最新经验，以提高我军教育训练水平。

讲究方法。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方法，深入浅出地把知识讲活。他在红校讲弹道，用“顽童洒尿”作比喻，既有趣，又好懂。讲地形地物，就到现地对照。学习各技术兵种，便组织学员去部队参观见学或实习。合同战术着重现地演习。讲什么，做什么。重视训练准备，重要教材尽可能自己编写审订。训与练，“练多于训，主旨在习”，“学而时习之”，“专才精通，熟能生巧”；学会“反刍”，经过咀嚼消化，把学的知识技能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教与学，“教学相长，彼此互助，取长补短”。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灵活应用方法。

注重质量和实效，经得起检验，反对浮夸。

诸葛亮说“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刘邓大军在革命战争中之所以成为四战之军、常胜之师，实与带兵有方、训练有素直接有关。

重视军事学术理论

几十年戎马倥偬的岁月，刘伯承坚持不懈致力于军事学术理论工作，翻译介绍多种苏军条令教材和学术论著，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教育部队，训练干部，指导作战，专心于提高我军军事科学水平。《刘伯承军事文选》就是一本水平很高的军事学术论文集，既有丰富的实际，又有科学的概括，大多经过实战的检验。还有许多散佚之作，据军事学院初步收集的手稿，就有百万字以上。过去环境艰苦，刘帅健康欠佳，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他在全国胜利前后，大声疾呼“必须造成勤于研究学术的风气”，“今天大兵团作战，必须提高学术”。指出我军应有三种基本教材，即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我军战史战例，敌军对我作战教令，苏军条令教材；对敌我友三方面的东西都要认真研究。

建国后，我军处在一个重大战略转变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历史任务提了出来。他着重阐明“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并引述斯大林的观点：“军事学术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已掌握一切兵种，使它们日臻完善，并且善于把它们的行动配合起来”。⑥

他在军事学院率先成立学术研究会、研究室，规定当时研究方向：研究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收集总结我军经验；研究朝鲜作战经验及对美军作战方法。并大力抓我军战例编写，先从解放战争着手，出版《战例汇编》四集，推动了全军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之风，提高了军事院校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水平。

他提醒在学术工作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脱离我军传统、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现代化；另一种是满足于旧的一套，拒绝正规化现代化的学术的保守倾向”，而“防止第二种又是主要的”。还反对食古不化，生搬硬套，本本主义。他说，

“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直接地明确的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以前的东西,现在就不一定正确了,这说明,实际有过去的实际,有现在的实际,有将来的实际,实际是运动的”;“从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文化等,而求得辩证的学术”;“即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

另外,他还十分重视翻译工作,认为它“处于学术介绍的关键地位,是学术介绍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很赞赏近代翻译家严复关于译文必须“信、达、雅”的标准,就是要准确无误,忠实原著,讲究文章结构语法,文理通顺,行文似流水。要求翻译人员具有外文、中文、军事素养三方面扎实的基本功。他还用许多精力做统一军语工作,因为“翻译错了和用语不当,就会弄错学术含义,曲解学术内容,就不能准确地交流学术思想,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影响军事行动和作战指挥”;亲自审定出版《军语画一》一书,使我军开始有了基本统一的军语。

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后对干部讲过一段话:“带兵的经验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打仗的经验千条万条,但作为初级指挥官,最主要的就是一条:不惜牺牲,身先士卒”。他信守这个准则,终身不渝。

他是一位正直忠勇的军人,朱德称之为“军事奇才”,“具有智、信、仁、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早年在将校学堂,品学兼优,闻名全校。以后身经大小战斗千百次,眇一目,负伤九处,正是英勇作战、身先士卒的见证。“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⑦生性淡泊,没有特殊生活嗜好,作风俭朴,家教严正,是众所周知的。行军打

仗，同战士一起挨饿受冻。年过半百，亲自上小船测水深找架桥点，爬几十里山坡看地形，组织战斗。在军事学院，起床号一响第一个到操场。临淮关、句容、山东半岛演习，冲风冒雨，奔波野外，与工作人员同吃同住，夜以继日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古稀之年，虽已不担任军内具体职务，还去东北各地视察，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和意见。八十高龄，将自己一些意见、资料、素材整理上送军委，“以尽参谋之责”。早年“一息尚存，革命不止”的誓言，完全付诸实践。

他一生勤学不倦，求知若渴，“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年事渐高，依然“三更灯火五更鸡”，潜心学习、研究和著述。对中外古文军事书籍涉猎广泛，知识渊博，而且取精用宏，善于活用，议古论今，妙语如珠，听者很受教益。

他谦虚谨慎，作风民主，从不标榜自己，不居功，不诿过，不搞一言堂。响堂铺成功伏击日军，他身为师长，却表扬徐向前副师长指挥好。看到报上写刘邓大军是“常胜军”，很生气，批评“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和常胜军，我们是人民军队，依靠党和人民，以及正义战争性质，争取多打胜仗是应该的”。亲自翻译的《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指定印上“军事训练部稿”、“军事学院校译出版”，不准用他的名义。平常总是平等待人，亲切和善，为良师，也为益友。一名外国记者胜利前夕在湖南采访后写道，“他是世界上谦逊的人当中最谦逊的人”。

他一生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经得起个人委屈。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起几落，“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都不在意，全神贯注于革命成败。大问题上决不放弃原则，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发生分歧被降职，始终坚持正确观点；冒杀身之祸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坚决斗争，大义凛然。后来被“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波及，所考虑的仍然是国防建设百年大计，于去职后努力当好“编外参谋”，继续为中央出谋划策。不管处顺境或逆境，都把革命事业看得最重，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用高度党性对待一切，高风亮

节，实为全军楷模。周总理表扬他“组织纪律性是非常强的”。

刘伯承关于治军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极为丰富，上面写的，远非全部，水平所限，亦未必恰当。《黄石公三略》有云，“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借作本文结束语。

注　释

①⑦《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第31、30页。

②⑥《斯大林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第118、109页。

③④《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10月出版，第557、650页。

⑤引自《苏沃洛夫十大军事原则》。

试论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的思想

王育华　少将

刘伯承元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仅对我军的作战指挥和军队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而且在炮兵建设上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他关于炮兵建设和作战指导等方面的大量论述，散见于各个时期的著作和文电之中。学习和研究刘伯承的炮兵建设思想，领会其精神实质，对推动我军炮兵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就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和现实指导作用作一探索。

一、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

刘伯承关于我军炮兵建设和作战问题的论述很多，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依据火力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注重发展和建设炮兵

刘伯承身经百战，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和火力在作战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现代战斗的权威就是火力"，"现代化的特点就是优越的火力"。在战斗中，"各种炮兵有组织的而互相联系的射击……作用极大"①。早在1928年7月，刘伯承在党的六大所作的军事问题补充报告中，就指出了使用现代火器的重要性。他说，广州暴动时，"得着敌人三十门大炮，只用了五门"。对此，他特别婉惜。在红军长征中，刘伯承担任先遣队司令员，强渡大渡河时，他和聂荣臻政委亲临红一团，与杨得志团长一起指

挥强渡。他询问神炮手赵章成来了没有？命令赵章成一定要摧毁对岸的碉堡。在17勇士强渡登岸，敌人反冲击的关键时刻，赵章成以仅剩的3发炮弹，第一炮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群里。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我突击队乘势冲锋，强渡成功。

在战争年代，刘伯承十分重视教育部队懂得运用火力的重要性。他针对有些部队不重视运用火力，不重视建设和使用炮兵等问题，曾发人深省地讲过许多生动著名的战例。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大战伊始，即1914年初，德国人把榴弹炮和重机枪装备部队，而法国人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法国将军们则戏谑地把炮兵称为“多余的拖油瓶的孩子”。大战中，德军充分发挥炮火的威力，整个战场被德军速射火器的弹片所覆盖，使仍按部就班地伴着军乐和旌旗前进的法军遭到大量杀伤而惨败。刘伯承提醒大家，法国将军把炮兵称为拖油瓶的孩子，我们也有的同志对新式武器的使用重视不够。长乐村和香城固战斗胜利后，他还对打扫战场马虎，以至把大炮和一批迫击炮弹遗弃在战场附近的情况，多次进行批评。

基于对火力在作战中作用的认识，刘伯承历来强调把建设炮兵摆在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他多次指出，“建设炮兵、工兵，这是军队中的大问题”。“要注意炮兵和工兵的建设”②。在抗战初期的1937年，刘伯承率129师挺进敌后，在代县苏龙口一带滹沱河中，捞出阎锡山部队撤退时丢弃的山炮八门。刘伯承指示把这些火炮送往陕北，为组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准备了物质基础。解放战争后期，第二野战军组建了以炮兵为主体的特种兵纵队，刘伯承亲自找多年从事炮兵工作的孔从洲谈话，就如何组建特纵提出了八条规范，对特纵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培养、内外部关系、技术训练等问题，提出了全而具体的要求。他特别强调：要“提高炮兵射击、工兵爆破能力”，“解决好步炮协同和工程保障问题”③。当时二野先后组建了特纵直属的4个炮

兵团，1个高炮团，1个战防炮团，以及3个兵团的炮兵团，在渡江战役和尔后解放大西南的作战中，摧枯拉朽，充分发挥了威力。

建国之后，刘伯承把炮兵建设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年1月，他在《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文章中指出，“今天我们军事建设的内容就是：建设新兵种及其学术；建设正规化国防军队的生活秩序”。他强调指出：建设新兵种，“首先就是炮兵”。“从炮兵的战斗条令一直到炮兵的应用战术，各种情况中的步炮协同等，都是我们必须熟习的学术”。他的这些论述，对加强炮兵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从作战实际出发，灵活实施炮兵战术指导

刘伯承在炮兵的战术指导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战争年代，他结合我军作战的具体情况，对炮兵的战术行动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指导性原则。

活用战法，近战制敌。灵活地运用战术，是刘伯承作战指导上的一个重要思想。他特别鄙视那种墨守成规，按照教条打堂堂之阵的战法，强调要一切从战争的实际出发，战术上要机动灵活。例如，当时中外军队炮兵通常在离前沿的较远距离上占领阵地，作战中不脱离既设工事。但刘伯承认为，不能囿于以往的陈规。他在1940年9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炮兵不要为工事所限制，‘黄猫黑猫，捕到老鼠就是好猫’。在敌情允许的情况时可尽量接近……进行抵近射击”。他认为，战术不是死的东西，不管是土办法洋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集中使用，夺取火力优势。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炮兵不断发展，武器装备不断得到改善，作战规模不断增大。刘伯承强调，在作战中，炮兵要“集中火力于主要方向和目标，切忌分散火力”④。在渡江战役前，刘伯承编译了《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小册子强调：“我们在突破纵深阵地的战斗中，必须在每一阶段完成每一任务时，尽量造成火力优势”。按照刘伯承的指示，二野渡江

部队强化和调整了炮兵编成。除留少量炮兵对付敌人的舰队和炮兵外，炮兵大部兵力集中在第一线支援步兵强渡，特别是在安庆由三、五兵团组成的主要突击地段，正面不到 30 华里就配置各种火炮 300 余门。战役发起时，数百门大炮经过一个小时的猛烈射击，南岸敌人堡垒大部被摧毁。强渡开始后，各部队先头船，仅以 15—30 分钟，即横渡长江，登上南岸。

着眼全局，协同作战。刘伯承认为，炮兵的战斗行动应树立为作战全局服务的思想，与步兵、工兵等其他兵种搞好协同作战。他在作战指导上历来把组织协同动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在抗战初期，129 师部队进行的响堂铺战斗，是一次漂亮的伏击战，但当时炮兵分队的战术技术素质较差，战斗中步炮协同出现了一些问题。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炮兵误打了自己的步兵，是这次“全胜战斗中的一个缺点”。为了提高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他提出了具体的战术要求，他说：“炮兵观察员应随步兵先头部队前进，在战斗中把步兵要求射击的目标用信号报告炮兵阵地，这是一般的规则”。在刘伯承的指导下，使部队打一仗进一步，步炮协同作战能力不断提高。1947 年 7 月的郓城战斗中，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在 9 个炮兵连的支援下攻击郓城，参战炮兵以一个小时的猛烈射击将郓城西门火力点全部摧毁，旋即随伴步兵突入城内进行巷战，全歼守敌整编 55 师两个旅。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战后写给军委的报告中提到，这次战斗中“步炮协同较好，有较完善的组织分工”。建国之后，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他把组织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作为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多次组织协同作战演习，为培养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的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适应作战需要，改进和发展炮兵武器装备

在战争年代，我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于战场缴获。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刘伯承重视改进现有火炮性能，并设法修造一些火炮，对缓解我军火炮数量少、火力弱的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我军平射火炮很少，攻击敌人碉堡、岗楼时，付出的代价较大。为了解决打敌碉堡的平射火炮极为缺少的困难，刘伯承、邓小平提出要改造迫击炮使其能平射的问题，并责成师炮兵主任赵章成负责研改工作。在赵章成的组织领导下，1942 年 5 月，选调了 20 余名使用迫击炮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和炮手，组成迫击炮平射研究班，在军工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迫击炮平射拉火发射装置。这一迫击炮技术的重大改进，对于摧毁敌碉堡等坚固工事起了重要作用。刘伯承、邓小平为此特颁发了嘉奖令："查师炮兵主任赵章成同志，研究迫击炮平射装置业已成功。将来益助战斗弥补我炮兵不足之弱点，收效必大，此种无产阶级创造性，实值得全师干部学习"⑤。当时为了增强我军炮兵的火力，刘伯承还指示要想办法自己造炮。军工部门根据这个指示，把打坏敌人的火车车轴旋成炮筒，把铁轨加工成炮架和零件，经过很大努力，仿制了几门九二式步兵炮。以后还仿制了大口径重迫击炮，这些炮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威力，战士们高兴地称之为"刘伯承大炮"。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时，为了增强炮兵火力，部队革新创造了用迫击炮送炸药的方法，每次发射可送出 8 公斤炸药。中野 11 旅和 12 旅在战前还试制成功了"飞雷"，即炸药抛射筒，也叫"特大威力炮"，就是把 20 公斤左右的炸药用铁皮制成状如西瓜似的弹体，利用汽油筒进行抛掷射击，射程可达 150 米。这种"特大威力炮"摧毁效果良好，对突击队鼓舞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刘伯承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对我军炮兵武器装备的发展仍然非常关心。1964 年 7 月，刘伯承在齐齐哈尔市视察兵工厂时，当看到试制的火炮、炮弹实物样品后，他对炮兵装备发展给予了具体的指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炮兵装备发展要大小并举，二是要一炮多用。他认为，现代作战机动性很重要，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既有平

原地区，也有高原、山岳丛林地区。因此，“既要生产大口径火炮，同时也要研究和生产轻便的、便于机动的……火炮”。此外，还要使一种火炮能具备多种性能，“既要能打陆地上的坦克和碉堡，也要能打空中飞机、海上的轻型舰艇等”⑥。他结合实战需要和国情特点提出的这些精辟的见解，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加强炮兵专业训练，提高炮兵的军事素质

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这是刘伯承的一句名言。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始终把训练放在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上。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主张采取“以战教战”的方法，利用作战间隙组织炮兵部队训练。对炮兵部分队的训练，他特别强调在射击技术上要精益求精。他常说，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射击技术要练得像吃饭时用筷子夹菜一样，要吃哪块就能夹到哪块，“百发百中”。建国后，刘伯承仍然非常关心我军炮兵等特种兵的训练。他在1972年给叶剑英元帅的信中指出：“特种兵首先要搞好自己的技术（先求杀敌技术准确）、战术训练，然后与合成军队搞协同动作的训练”⑦，对我军炮兵等特种兵的训练提出了系统的要求。

在抓炮兵部队训练的同时，刘伯承还十分重视利用院校培养炮兵干部骨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在瑞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刘伯承担任校长和政委。红校设有培养炮兵干部的连队，有学员120多人，大部分是从部队中选调的优秀班、排长。当时，红军还没有统一的训练教材，用的是中国旧军队和日军的操典，不适合我革命军人的性质和作战要求。为此，刘伯承组织人员编写了一套步兵、炮兵教材，有《炮兵教程》、《迫击炮讲义》、《迫击炮射表》等。这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炮兵教材，当时除供红校学员使用外，并下发各军、师炮兵分队。刘伯承领导的中央红校，开创了炮兵院校教育的先河。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建军作战的需要，刘伯承把炮兵干部骨干的培养当作一项重要

工作来抓。1946 年，晋冀鲁豫军区开办了两期炮工训练队。1947 年初，成立了榴炮训练队和山炮轮训队，由各纵队抽调有一定文化程度及战斗经验的炮班长和炮手组成，进行单炮射击和战术教练，为部队培养了一批炮兵班排干部。

1952 年底，为适应各军兵种建设的需要，经中央军委批准，刘伯承在军事学院领导创建了炮兵系、装甲兵系等军兵种系。后来，当这些军兵种系能够独立完成培训学员任务时，在刘伯承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又批准把它们扩大为独立的院校。在此期间，刘伯承曾亲自找当时在军事学院进修的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谈话，谈了建立炮兵学院的想法和安排。1957 年，以军事学院炮兵系为基础，组建了炮兵学院，陈锡联司令员兼第一任院长。从而使炮兵的院校教育体系趋向完善，促进了炮兵中高级干部的培养。

二、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思想的主要特色

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的思想，反映了军队建设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特点。我们认为，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着眼形成整体合力，把炮兵建设作为合成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说："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军队建设上的"一盘棋"思想，是刘伯承指导炮兵建设的基本着眼点。从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强调炮兵的地位作用，而是主张要形成整体合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就强调炮兵要树立为步兵服务的思想，在作战中要与步兵密切协同。建国后，随着海、空军等军兵种的建立和发展，他更加重视搞好合成。在 1954 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刘伯承指出："炮兵是战争之神，坦克为战地的主宰，空军为斯大林之鹰，都说明各有自己的

功能和特性，都可以写在各个专修室中鼓励学习，这都是对的，但一到战争、战役、战斗时，只有在统一集中指挥之下协同动作，才能相互为助，各自发挥其特性和功能。单打一，各顾各，都是不能打胜仗的。”这里形象地说明了兵种建设和军队建设全局的关系。由此可见，强调合成，既是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思想的显著特点，也反映了军队建设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二）吸取中外炮兵建设作战经验，融各家所长于一炉

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的思想，见解独到，论述深刻，它不仅是对我军炮兵建设和作战经验的总结，也吸取了外军炮兵的经验，凝聚了中外炮兵建设经验的精华。一是批判地吸取了历史上中外炮兵建设和作战的经验。在战争年代，刘伯承在戎马倥偬之中，手不释卷，勤奋学习，认真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陈毅赞扬他“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刘伯承不仅对《孙子兵法》、《六韬》等我国古代兵书很熟悉，也注意研究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外国的战争经验，他对炮兵的产生，炮兵在近代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都有深入的研究。二是批判地吸收了苏联红军炮兵建设和作战的经验。刘伯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红军的经验非常重视。他在考察苏军的作战经验中，对炮兵的射击方法、步炮协同、炮火的组织等尤为重视，对其中一些材料所载的“炮火组织要图”都作过细致地研究。他结合我军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翻译和介绍，用以指导我军作战。三是认真总结我军炮兵建设和作战的经验。在刘伯承有关战前指示和战后总结的文献中，通常都把火力的组织和炮兵运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阐述。他把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部队作战和训练，使炮兵部队战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三）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思想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闪耀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

毛泽东对发展炮兵等技术兵种极为重视，认为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把建设强大的炮兵作为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1939

年，毛泽东曾亲笔给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题词，勉励炮兵官兵“努力政治、军事学科术科之学习，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有力兵团”。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今后军队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⑧。重视发展炮兵等技术兵种，以增强我军的作战能力，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伯承常说：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是身当其时，身当其事的。他作为我军的高级领导成员，经常在一个战略方向和战略区担任主官，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领会很深，并能结合本区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刘伯承教育部队要重视炮兵的作用和建设，在缴获敌人武器装备的基础上，使炮兵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在炮兵作战指导上，刘伯承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思想，提出的单炮机动作战；集中使用，夺取火力优势；搞好炮兵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等战术要求，都贯穿从实际出发，灵活机动的思想。在炮兵部分队训练和干部骨干培养上，刘伯承根据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思想，重视利用作战间隙抓好炮兵部分队的训练，同时注意办院校和集训队培训炮兵干部和骨干，并在建国后进一步完善了炮兵院校教育体系。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的思想既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闪耀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也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三、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思想的现实指导作用

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的一些精辟的论断和见解，对当前以至尔后我军炮兵建设，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学习刘伯承关于炮兵建设的思想，结合我军炮兵建设的实际，我们认为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依据现代战争中火力战地位不断上升的特点，充分认识炮兵的火力骨干作用

随着现代高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火力战在现代作战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局部战争中，火力杀伤贯穿于战役战斗的全过程，持续不断地进行火力较量，已成为现代作战的显著特点。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双方的火力较量十分激烈。在近期发生的海湾战争中，火力战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刘伯承"火力是现代作战的权威"，"现代作战特点就是优势的火力"等论断的正确性。

在现代地面战场的火力战中，炮兵是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从我军合成战役军团火力单位的构成上看，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炮兵和战役战术导弹的火力；二是地面突击力量自身的火力；三是空中支援力量的火力。由于我空军力量有限，而且主要用于夺取制空权，支援地面作战的力量不多，通常只能担负地面战场火力突击任务的10%左右。地面突击力量按其任务和作战能力分析，可在近距离担负火力突击任务的10—20%。而炮兵和战役战术导弹，由于其火力控制纵深大，可打击多种目标，将担负火力突击任务的60—80%，是火力突击的"主角"和骨干。从建国后我军历次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情况看，虽然有时也有空海军参加，但火力打击任务通常是用炮兵完成的。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炮兵不仅支援步兵作战，还遂行火力拔点作战，炮火杀伤占总歼敌数的70%左右，炮战是战斗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现代作战中，必须强化火力手段是制胜的重要因素的观念。各级合成军队指挥员，应积极运用各种火力手段，尤其要熟悉炮兵，善于指挥炮兵，充分发挥炮兵的火力骨干作用。

（二）在诸军兵种参加的现代火力战中，通常应以炮兵为主进行战役火力协调

炮兵要与其他军兵种搞好协同作战，是刘伯承在战争年代就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他这一思想的着眼点就是通过组织协同动

作，使各军兵种在作战行动上合为一体，发挥整体威力，以夺取战斗的胜利。现代火力战是诸军兵种参加的合同作战，不仅要搞好部队行动上的协同，而且要注重搞好战役火力协调。

现代条件下的合同战役，将有众多的火力单位参加，既有陆军的炮兵、防空兵、装甲兵、工程兵、陆军航空兵的武装直升机等火力单位，也有空军航空兵的火力和海军的舰炮火力。各类战役火力单位在作用距离和控制空间上常有重叠和交叉。如果配合不好，就可能出现诸如误伤己方、火力重复、浪费弹药、摧毁能力低等现象，难以实现作战目的。为了适应火力战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军队的战役军团设有“火力协调中心”或相应的指挥机构。而目前我军合成军队在编制上尚无组织火力协调的机构，作战中如何协调各种战役火力，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从我军的实际出发，战役作战的火力协调，应由合成军队首长领导，由炮兵指挥机构具体组织，这是由炮兵在火力战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战时的火力协调机构（中心）可以炮兵指挥部为基础，吸收其他军兵种的代表参加，并增配一定数量的作业器材和指挥分队，作为战役指挥机构的组成部分开展工作。

（三）完善炮兵装备系列，加强专业技术力量

我军炮兵的武器装备，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的军队相比，仍居于劣势地位。例如，与美军军和原苏军集团军相比，我军北方集团军编制的压制火炮数和压制火炮一次齐射的常规弹药重量仍有较大差距。再如，在局部战争战场上，外军已将战役战术导弹多次投入使用，我军在这个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要提高我军炮兵遂行火力战的能力，必须改进武器装备。

从我军炮兵武器装备的状况看，急待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解决地面火力“手短”的问题，加速发展战役战术导弹，形成近、中、远系列，缩短与发达国家军队的差距。二是发展自动化射击指挥系统，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研制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制式射击指挥系统的同时，发展简易射击指挥系统装备部队，逐步提高我军炮兵射击指挥自动化水平。三是配套发展炮兵侦察器材，加速发展侦察校射直升机、无人机、远程炮位侦察校射雷达等高技术、高效能的侦察器材，以保障炮兵作战的需要。

在改善炮兵武器装备的同时，还应加强专业技术力量。炮兵是个技术密集型的战斗兵种，在炮兵营、连分队中，按需要编配一定数量的技术干部，才能保障训练和作战任务的完成。目前，我军炮兵部队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炮兵部队在训练和实弹射击中，由于技术保障问题而造成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搞好炮兵技术人才培养，加强炮兵技术力量建设，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

（参与本文执笔者　阎兆麟）

注　释

①②《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588、631、489 页。

③《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第 398 页。

④《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405 页。

⑤《炮兵大事记》(上册) 总参炮兵部编 1988 年 10 月版，第 155 页。

⑥⑦《刘伯承传》(送审稿) 1983 年 4 月版，第 738、749 页。

⑧《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4 月版，第 111 页。

运用刘伯承军事后勤理论指导我军后勤建设

王太岚　少将

刘伯承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过去对我军后勤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指导新时期我军后勤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把握"战争就是打人力、物力、财力"的实质，把后勤摆到军队作战和建设的重要位置

刘伯承历来重视和关心军队后勤建设。早在1927年，他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时，就深感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军队运动之迟缓，一切设备之无办法（如部队衣被等事），亦受了这种影响，我们都感觉这问题困难。……总觉得须统一计划与力量，……"①。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战争中，他对军队后勤建设问题更加关注。抗日战争时期，他看到由于后勤保障不足使我军作战和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强调把经济工作作为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解放战争中，他身体力行，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作为作战胜利的基础。解放后，他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需要出发，对后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指出"由于现代战争中军队众多，技术兵器复杂，需要兵器物资的大量消耗，因而后勤工作的重要是表现得最明显的。"②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刘伯承对军队后勤建设是高度重视的。刘伯承对后勤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后勤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没有物质基础是难能打胜仗的”。刘伯承认为，军队战斗力的组成：“一是政治质量；二是军事素质；三是物质保证；四是严格纪律，四者缺一不可”。③这种把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和物质保证问题统盘起来考虑的思想，是他军事理论的又一特色。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装备与财物极度匮乏。刘伯承在组织我军作战中，注意积极争取战争物质资源。如，实行“以战养战”，组织边战斗边生产，争取人民群众支援等，使我军作战有了基本的物质来源。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他和邓小平等同志按照军委的命令，统一组织战役保障，动员了华东局、中原局和华北局，共1.4万名地方干部，2543万名民工，30.5万付担架，88万台大小车辆，组织军粮供应站110余处，供应粮食5.7亿斤，从而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战争年代刘伯承重视搞好军队作战物资保障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有益启示：就是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准备必须首先加快发展综合国力，进行充分的物资准备。现代战争具有规模大、破坏性强、物资消耗多等特点。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直接战争费用分别为2080亿美元、11170亿美元，物力消耗分别为3070亿美元、4万亿美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5.37倍。海湾战争美军开创了日消耗5亿美元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纪录。由此可见，在未来战争中，没有牢靠的物质基础，是难以打胜仗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战争就是打钢铁。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来说，应从长计议，支持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增强综合国力，同时努力发展军队武器装备，从而形成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雄厚物质基础。

——供给、卫生、交通（兵站）这些后方勤务是军队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合成军队首长和机关的指挥体系，使之适应作战的要求。刘帅曾告诫部属：“一个好的指挥员要把抓卫生、抓供应、抓兵员补充看成是在抓战斗力，看成是在指挥打仗，不能有半点放松和疏忽大意，否则就等于自己消灭自己。”④他对

军事指挥员和机关的后勤指挥职能，作了明确阐述，指出："关于供给、卫生、交通（兵站）这些后方勤务（就是辅助勤务），照现代各国军队组织系统来说，有直属于首长的，有直属于司令部参谋长的，有直属于司令部的后方勤务科长的。在苏军则以诸后方勤务直属于首长，而参谋长则根据首长的作战企图，依托后方设备股（即是后方勤务股）以调节、监督并指导工作，使之适应作战的要求。"⑤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无论组织什么样的战斗，总是对后勤指挥、供应补给、伤员救护、交通保障、后方防护等亲自作出部署，并监督落实。每打完一仗，都要对军事和后勤等项工作做出总结，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使后勤保障与战役、战术全局有效地衔接起来。把军事后勤作为军队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针对印军动态和高原丛山峻岭、深谷险嶂的地形特点，把后勤物资能否送得上去作为战役准备工作的主要关节，给予高度的重视，他指出"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后勤要有一些兵力防护。"⑥由此可见，在作战指挥中重视后勤是刘伯承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后勤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军队后勤的平时领导和战时指挥，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各级军政领导都要关注后勤建设，把后勤建设放到军队作战和建设全局的重要位置来考虑，在抓好部队政治、军事建设的同时，全面抓好后勤建设，做到平时会领导后勤，战时会运用后勤。司政部门要树立"一盘棋"的观念，协调后勤抓好全面建设。面直接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则要立足全局需要考虑后勤整体建设，防止和克服在后勤建设中"重平时、轻战时，重保障、轻指挥，重技术、轻勤务，重专业、轻合成"的倾向，切实提高综合保障能力，与军队整体建设相适应。

——衣食住行解决得好，部队才会更加巩固，教育才能做出成绩来。刘伯承指出："我们指挥部队动作，必须尽量休养和顾惜人马的体力，以为在紧要关头争取胜利之用。如在战斗前无故使

部队疲劳、欠睡觉或不以饱食，那是直接从物质上削弱了战斗力而应避免的事情。”⑦衣食住行不可小看，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大家无后顾之忧，才能安心教与学。部队才会更加巩固，练兵教育训练才会做出成绩来。这些论述进一步地阐述了后勤保障工作对军队战斗力建设的重要作用。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同样是为此，这既是保持部队稳定的需要，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需要。改革开放十四年来，为保证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尽管军队保障经费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部队正常工作的展开和战斗力的提高，军委提出了“一保生活，二保部队训练和装备维修”的后勤保障原则，多次调整部队生活标准，要求全军各级大力发展部队农副业生产，专项拨款为旅团建设“菜篮子工程”，进而在市场物价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有效地保证了全军官兵实际生活水平的稳中提高。此外，还有计划地进行营以下部队住房整治，改善官兵居住条件，深得部队官兵的欢迎。实践证明，哪个单位生产生活搞得好，哪个单位的官兵思想就比较稳定，以训练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就完成得比较出色；否则，就会影响部队全面建设。我们应该继续贯彻后勤保障原则，搞好生产生活，切实解决好关系到部队建设和稳定的“衣食住行”问题，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战略、战役、战术后勤有机结合，建立科学的后勤保障体制

刘伯承对军队后勤体制有独到的见解，指出：“军队后方犹如大树，战略后方犹如树干，是不动的，战役后方犹如树枝，是半动的，战术后方犹如树叶，是全动的。”⑧他以“大树”结构层次形象比喻了军队后勤体制的系统性、合理性，生动地揭示了军队后方组织各层次的不同功能和作用，为我军有重点、分层次加强后勤建设，以建立精干高效之后勤保障体制，提供了重要理论。科

学的后勤保障体制，对于后勤保障能力的形成与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军队都在重视加快后勤保障体制改革，其主要走向是：由单一系统保障体制向联勤体制发展；从人员密集型体制向技术装备密集型体制发展。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我军后勤体制应彻底打破目前军兵种各自封闭型的逐级保障的单一层次，按照“统分结合、条块结合”的原则，建立起适合我军特点的复合式层次的联勤保障体制。近几年来，全军在这方面已广泛进行了调查论证工作，并对医疗、油料、修理等进行了代医、代供、代修试点，取得了可喜成绩。如全军通过开展三军油料代供，每年联供油料近40万吨，仅此可节约经费3000多万元。实践充分证明：联勤保障体制不仅弥补了单一军兵种保障能力弱的问题，而且利于收缩后勤摊子和增强我军综合保障能力。在当前全军贯彻调整精简战略部署的形势下，我们应继续本着“精简、合成、高效”的原则，加强我军后勤联勤保障体制的研究论证，按照刘帅关于战略、战役、战术后勤结构的构想，形成科学的综合后勤保障体系。主要应把握以下基本点：

——要对重要作战方向、作战地区、作战部队，有重点地搞好后勤配套建设，形成对局部战争强大而又巩固的支援力量，使战略后方象“树杆”一样粗壮有力。在后方战备设施布局上，要改变过去到处撒网设点的做法，集中力量，保证一、二线和重要作战方向的后方基地设施配套建设，对局部战争形成重要的后方支援依托；在物资储备上，要根据军事战略的需要，调整储备项目，能减则减，该增则增，重点抓好战时难以筹措物资的储备。同时要注意对部队平时不急需、战时必要的专用装备物资及一些高新技术搞好“软开发”储备，以适应战时后勤保障的需要。

——要根据战区担负的作战任务，合理调整军兵种后勤力量，科学配置要素，形成对战术后勤全方位机动而又相对稳定的综合保障力量，使战役后勤象“树枝”一样有条理地展开。在联勤体制没有确立之前，可按照“三代”模式，以战区后勤部牵头组织

联勤模拟运转工作，根据各战区的作战任务及其现有的三军后勤保障能力，合理确定战役后勤规模，对重叠的机构、保障实体，实行撤、合、并、改，统一布局，形成梯次和重点方向部署，以适应对部队作战实施综合保障的需要；主要作战方向的集团军和后勤分部应建立战役支援保障协同方案，使后勤保障与部队作战行动相一致。同时，为适应局部战争和战役方向部队独立作战的需要，可考虑在各战区内建立一支快速后勤支援保障部队，增强战区战役方向的机动保障能力。

——要重点解决好自身保障能力弱、机动性差的问题，形成较强而又灵活的快速保障能力，努力实现“树杆”和“树枝”所要达成的目标，使战术后勤象“树叶”一样，既能更好地实现战略战役的最终目的，又能更好地保障部队和为部队服务。当前应重点为师以下作战部队，研制装备越野性能好、功能全的系列集装箱运输车，真正把战术后勤建设成为装在“车轮上的后勤”，增强一线作战部队的快速保障能力。

三、贯彻“平战结合”的基本方针，坚持走军民兼容的后勤发展道路

早在 1963 年，刘伯承就根据东南沿海部队紧急战备中的教训，为抓好国防交通和后方基地建设，提出了“平战结合”的方针，要求军队后勤建设必须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为依据，从现实情况出发，从最困难条件着想，本着需要与可能的原则，做到既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又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实际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民兼容是我军后勤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军队后勤建设和保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贯彻平战结合、军民兼容方针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必须建立和完善国家战时后勤动员体制。刘伯承认为：

“今天战争的真正内容，是全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斗争，不单是军队之功。”⑨要赢得胜利，必须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战争。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和完善国家战时后勤动员体制，以法的形式确保动员工作的落实。为此，他于 1959 年 9 月担任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防建设，从国防建设布局、军工生产到后勤保障，都领导进行了周密细致的研究论证，并积极向军委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为我军走“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道路摸索经验。当前，由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加之部队调整精简后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可以说原有的国家战时后勤动员体制又面临新的问题。如，经济资源与潜力各地区差别较大如何组织分配、三资企业的国防教育和军工生产平转战如何落实、通用物资如何组织筹措等，都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因此，应尽快建立健全符合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时后勤动员体制。一方面，要根据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调整精简后的机构变化，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战时后勤动员体制和高度统一的动员机构及方案。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特点和国家总体战略，制定战略、战役物资保障规划，明确物资的品种、规模、生产、采购、储备、管理、使用，保证军队计划内的物资指标有落实，需要市场采购的物资不缺货。

第二，必须担负起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未来战争服务的双重职能。1946 年我解放区正是抗战之后的恢复时期，刘伯承就强调：“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机关部队的生活，我们不仅要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而且还要自己动手，积极生产，励行节约，增加解放区的财富，并以各种方法帮助人民恢复战争中消耗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向丰衣足食的目标努力，把八年抗战所遭受的创伤完全平复过来”⑩同时，他还“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⑪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员，刘伯承在领导大别山斗争期间，

还亲手为战士做棉衣、编草鞋。“战胜了无后方作战的种种难以设想的困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了群众。”⑫。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又从军队建设“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和能够应付一旦发生的战争”⑬双重职能考虑，建议军队后勤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把军工企业、军事交通等后方设施建成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大动脉，为战后国民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建议军委按照“平战结合”的方针，立足应付未来战争的实际需要，把国防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计划。在党中央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建成了十条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主干线，为落实国家战备工作起到了支柱性作用。当前，学习和运用刘伯承的这一理论，真正担负起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未来战争服务的职能，就必须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今后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同时，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的要求，认真研究军队后勤建设如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使军事热点地区的军队后方布局与国家经济战略布局得以协调发展，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和战争服务。

第三，必须坚持走“寓军于民”的发展道路。刘伯承一贯坚持毛泽东倡导的“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正确思想。他说：“群众不参军，你哪来的军队？农民不给粮食，你哪来的饭吃？工人不做衣服，造枪炮，你不穿衣服、没有枪炮怎么打胜仗？”⑭这一论述，充分说明战争年代，我军的发展、壮大，主要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同时，也告诫我们，和平时期我军建设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作后盾。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军民通用的广泛性，使得军队后勤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后勤保障对国家和民众的依赖性更强。把后勤建设寓于国家经济建设之中，把后勤

保障能力蕴于国家和民众之中，已是当前世界军队后勤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一定要走寓军于民的发展道路，坚持平战结合，搞好军队后勤建设。一是生产能力兼容。民品生产企业战时能生产军品；军工企业平时除生产军品外能生产民品，做到以民养军。二是军民产品兼容。产品设计制造时，就必须考虑到两用的需要，做到通用化、标准化和技术工艺上的同一性。三是科学技术的兼容。军事科技不仅要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还要转向民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吸收地方科研技术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四是基本设施兼容。如交通、医疗和仓库等基本设施，平时军队的设施可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战时地方的设施，如机场、码头、港口可适用于为战争服务。五是人才兼容。就是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既要考虑军队后勤建设需要，也要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尽可能地把人才储备在民众之中。

四、着眼“送得上去”，“用得上去”的根本要求，努力提高后勤综合保障能力

刘伯承同志一贯重视后勤保障这一基本着眼点，提出了衡量后勤保障要“送得上去”，“用得上去”⑮的八字标准，其基本内涵就是要提高后勤“修、救、供、运、管”和“防、打”一体的综合保障能力，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就是要解决好装备、物资和后勤专业技术结合与战役、战术运用结合的问题。我们学习和运用这一思想就是要围绕“八字”标准，做到“保障有力”，当前应注重三个环节：

1、强化后勤训练，增强保障功能。刘伯承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部队才能出战斗力，后勤才能出保障力。他经常讲：“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教而后战，是谓善之。”⑯意思是说，部队没有经受过训练就去作战，是糟蹋生命；训练之后去作战才是爱护兵员。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为学员上课时，曾深刻指出：“兵器

物资要送得上去。……就要求我们大力学习后勤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努力学习……，前送、后送工作如何实施，道路如何构筑，仓库如何设置，等等。……今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后勤课。”⑰。后勤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同时抓，协调发展。当前后勤训练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增强保障功能的现象，需要加以纠正。必须科学组织后勤训练，既要搞好专业及勤务演练，又要搞好后勤合成演练，提高本级后勤内部各要素的整体保障能力；既要组织本级后勤的勤务演练，又要组织好上下级后勤、军兵种后勤、友邻部队后勤、地方支前后勤力量的合同保障演练，练指挥、协同、保障、支援，提高我军后勤的整体保障能力；既要练好后方勤务，又要练好后勤防卫作战。

2、运用科学技术，改善保障手段。运用科学技术改善后勤保障手段，是刘伯承长期致力于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指出：“世界是发展的，战争是发展的，装备技术和战略技术也是发展的，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看过去和现在，不看未来。”⑱他在充分肯定“小米加步枪”时代形成的我军优良传统的同时，提出今后训练和教学要重视研究运用科学技术于后勤保障的途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尽可能赶超世界高科技发展的速度，努力改善我军后勤装备技术差、能力弱的问题。一方面，要本着“多研制、少装备”的原则，加强后勤自身的科学技术建设，重点搞好后勤指挥自动化、交通运输、装备修理、给养保障和医疗救治等方面实用性高技术的开发研究，努力使我军后勤在未来的高技术战争中做到技术保障先行。另一方面，要加强理论科学研究和软技术研究储备，做到后勤理论、技术研究发展先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我军军情的“多、快、好、省”和“高、深、新、尖”的新型发展路子。

3、加强后勤管理，提高保障效益。刘伯承认为加强后勤管理，特别是战场管理问题，对军队建设和作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总结战斗经验时指出：“袭入黎城部队，供给部门也未有收拾战

场胜利品的组织，以致枪支马匹，被外人随便拿去耗散，内部的抛散浪费更不用说。”⑲为此，他经常教育部队要注意节约使用一粒粮食、一颗子弹，充分清理和利用战场缴获物资，把作战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在1942年，我军生活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为了坚持对敌斗争，他与邓小平同志领导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实行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对各级部队规定了一定的生产指标和助耕任务，要求部队每人种地三亩，自给一季粮食。另一方面，他处处强调精打细算，杜绝浪费现象，一张纸做四次用，第一遍用铅笔写，第二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从而使根据地胜利地渡过了难关。目前，我军后勤一方面经费紧缺，一方面又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今天，我们仍要学习刘伯承在革命战争年代那种精打细算节约使用“一张纸、一粒粮、一颗子弹”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强后勤管理，努力提高保障效益。首先，要针对部队调整精简和我军后勤建设的新情况，建立健全新的标准制度体系。其次，要学习运用先进管理知识，改进后勤管理机制，采取教育、行政、经济、法规、技术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办法，促进后勤管理总体水平的提高。再次，要对各项经费的使用与效益进行及时、全面考核评估和监督，保证后勤管理制度的全面落实。

注　释

①②⑤⑦⑩⑪⑫⑮⑰⑲《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20、第649、第53、第67、第439、第775、第775、第646、第648—649、第186页。

③⑨⑱《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32、第6、第206、第193页。

④《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66页。

⑥⑧《无产阶级革命家论后勤》后勤学院汇编，第297、第298页。

⑬刘伯承于1962年5月25日听取总后汇报后所作的指示。

⑭《刘伯承回忆录》第2集，第12页。

刘帅论后勤

总后司令部军训局

在刘帅丰富的军事理论宝库中，后勤方面的论述是一个重要内容。不论是指挥作战，还是组织部队建设，后勤都始终在他考虑之中。今天，在刘帅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温刘帅对后勤的论述，回顾他关注后勤工作的实践，对于我们搞好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保障有力”的要求，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后勤保障的准备，具有重要意义。

一、“后勤在现代规模战争中的重要性，诚不可忽视”

刘帅论及后勤作用，最早是他写于1928年的《南昌暴动始末》。该文在分析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暴动于“军实无源之江西”①是其中之一；之后，从南昌转移，沿途“筹得之款甚微，不敷用度。至瑞金后，越感困难，影响于行军之迟缓。最后是粮秣管理处开始征发地主食品以供军用。”②言语不多，但对后勤之作用，刘帅已清晰地表述出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深谙用兵之道的刘帅深明此理。因此，他在建国前就提出“打仗首先要考虑到用、吃、穿”③，“后勤在现代规模战争中的重要性，诚不可忽视。”④建国后，每论及我军作战和建设，对后勤工作他都有恰如其份的分析。如1962年中印边境作战，刘帅指出：“战役的结局，取决于后方补给的程度。”⑤战争离不开后勤，作为为战争提供物质、技术保障的后勤，既是制定战略方针的物质基础，又是制约

战役战斗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在战争史上，因忽视后勤而大吃苦头，甚至败北的战例不胜枚举。因而每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无不对后勤给予极大的关注。

刘帅重视后勤，在战争年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我军后勤给予始终如一的关注；另一方面打敌后勤，断敌补给。

对我军后勤的关注，刘帅在渡江战役前后的运筹过程，即是生动一例。1948 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后，毛主席电示，请刘伯承俟黄维兵团被歼，即到中央商谈渡江战役的作战方针。刘帅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渡江作战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野战军与后方问题"。他明确指出："这次一百七十万人南下江南作战，没有后勤，没有财政是不行的。"⑥时隔不久，3 月份，刘帅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围绕如何渡江作战，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之一又是后勤问题。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畅通，部队物资拥挤和一切需要当地人民供应，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向毛主席建议："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地进行。"⑦在上述重要的场合，刘帅屡次论及后勤，足见刘帅对后勤的重视。

渡江战役发起后，刘帅在运筹如何发展战役时，又把后勤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当时，二野、三野顺利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溃乱的趋势，刘帅考虑到"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歙县，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⑧又避开了当地后勤保障之困难。

大敌当前，"瞻前"容易做到，"顾后"往往为人所忽视。战争对后勤的依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作战方略的实现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正如刘帅所说："敌我

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⑨，“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⑩。因而，刘帅能全局在胸，瞻“前”顾“后”，对我军后勤给予始终如一的关注。

在重视我军后勤的同时，打敌后勤，断敌补给，也是刘帅的拿手好戏。在刘帅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生涯中，这方面有很多光辉的战例。打敌后勤，主要是“摧击敌人的补给线”。刘帅指出：“抓住敌人背后补给线活动，破坏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军火无法补给，也无法继续‘扫荡’，实属有战役意义的。……锅中加水，不如炉内抽薪。要使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制身的现象。”⑪刘帅还说：“铁路是日寇活动的生命线”，“没有铁路、公路便没有据点，”“敌寇倘使失去‘朝发夕至’的铁路、公路，凭着它的两只泥足行军作战，运输军实，其困难将不堪想象。”⑫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分析，刘帅对摧击敌人的补给线十分重视。八路军129师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中，对平汉、津浦等铁路的大破击即达10余次，而1940年一年就破坏铁路、公路12000余公里，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二、“‘金牛道’不能进行现代化战争”

刘帅不仅重视后勤的作用，而且重视后勤的建设和发展。他认为，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变化，后勤保障也应不断现代化。他在1946年1月同马歇尔会谈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四川人，懂得‘金牛道’不能进行现代化战争。”⑬意思是说，牛道再好，不能跑火车，保障不了现代化战争。此中所蕴含的道理十分明确：现代化战争必须要有现代化的道路保障。刘帅的这一思想在建国前多次表述，建国后论及得更加丰富、具体。

1、“机动是个中心问题”

1962年5月15日，刘帅在对后方基地建设的指示中说：“机

动问题，不仅表现于用兵，而且适用于物资储备，前方后方都要机动。在现代战争中，机动是个中心问题。”⑭机动歼敌，是刘帅指挥艺术中别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作战谋略的精华。军队作战的机动性越大，与之相适应的后勤机动性就应越强。因为后勤保障，不论是输送部队，还是运送物资、抢救伤员，都是在动中实施的，动贯穿于后勤保障的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说，后勤的机动性不仅表现为保障力，而且也是战斗力。

二战以来，历次大规模局部战争充分表明，高机动、快节奏是局部战争的显著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作战理论的出现，未来作战部队将具备更强的机动能力，这对后勤的机动性也就提出了更高、更为迫切的要求。而目前我军通用机动后勤装备的主体是各种后勤车辆，主要包括运输车、救护车、加油车、修理工程车、炊事车和其他后勤技术车辆。这些车辆形成了我军基本的机动保障能力，在历次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军后勤车辆已相当陈旧、落后，与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的要求相比，存在的问题不能不令人担忧：一是后勤车辆越野性能差。我军在用运输车几乎是清一色的非越野车。在实战条件下，集团军以下的运输车肯定要在无道路地带行驶。即使在有道路的情况下，由于纵深攻击兵器的发展，道路也要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美军、前苏军军以下的部队所编的运输车辆几乎都是全轮驱动的越野车。美军师以下部队不但编配一般越野车，还专门编配了高机动轮式车辆。前苏军师以下部队运输车的主力是乌拉尔越野车，现在又正在更新为第四代乌拉尔。我军越野运输车的空缺无疑会给战时机动带来不便。就后勤技术车辆而言，其性能本来就落后，再加上往往是超重改装，因此，越野能力很差，在行军中往往拉部队的后腿。二是机动后勤装备机动方式单调。我军通用机动后勤装备的机动方式基本上是固定车载式。这种单一的机动方式不能适应现代战场快速多变和空地一体化保障的要求。近年来，发达国家军队为了适应快速部署部队的作战需求，采用了

多种多样的机动方式，其中除固定车载式外，还有机动单元、方舱、后勤直升机等。多样的机动方式是提高机动保障能力的有力手段。而方式单调，可选性差，机动保障能力就受到很大削弱。三是机动后勤装备的可靠性差。可靠性是机动性的基本保证。故障频繁，就无机动可言。可靠性差是我军机动后勤装备落后于国际水平的主要因素。我军车辆平均故障间隔里程为200——900公里，而代表国际80年代初水平的西德奔驰2026车达到12000公里。

上述问题的存在，说明我们贯彻落实刘帅的指示还要下一番功夫。不解决好机动这个中心问题，未来战争的后勤保障就难免要吃苦头。

2、后勤体制要健全

怎样才是健全的后勤体制？刘帅有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军队的后方有如大树；战略后方如同树干，是不动的；战役后方有如树枝，是半动的；战术后方有如树叶，是全动的。只有把他们的关系解决好，才能保障军队的作战胜利。"⑮

这个比方，刘帅不是随心所欲提出的，而是有着科学的道理。刘帅把我军后勤区分为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这是我军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建国前的革命战争年代，各革命根据地的军队编制、装备不统一，后勤组织不健全，后勤保障主要是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组织机构又有所不同，因而，那时就整体而言，我军后勤保障层次的区分是很不明确的，也无法区分明确。建国以后，全军后勤统一了编制，并由单一兵种后勤发展成为陆海空二炮组成的诸军兵种后勤，从总部到各级部队都建立了后勤机构。保障方式由过去以就地取给、取之于敌为主，转变为以后方供应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与作战任务相适应的后勤保障层次，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缺少任何一个层次，都会造成与战略、战役、战术作战任务的区分不协调，这样的后勤体制也是不科学、不健全的。

刘帅的这个比喻，还说明了战略、战役、战术后勤三个层次履行后勤保障职能和形式的不同。战略后勤是武装力量的最高后勤环节，它是军事领域与国民经济、社会领域直接衔接的主要部位，也是战争后勤的筹划者和指导者。其基本职责是协助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做好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中的后勤筹划指导工作，并组织实施战略后方建设和战略支援活动。正是这种“如同树干”的职能，使战略后方实施保障的形式，一般情况下是“不动的”。作为中间层次的战役后勤，它在战略后勤与战术后勤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它建有一定数量的后方基地，同时，作为某个战役方向或地区的保障机构又要在一定范围内开设兵站或派出机动保障部（分）队，实施机动保障，因而刘帅对战役后勤“半动”的比喻十分贴切。战术后勤随部队机动，主要实施伴随保障，因而“全动”是其保障形式的主要特征。

理解刘帅的比喻，认识战略、战役、战术后勤三者保障职能和形式的区别，对于我们平时确定各层次建设的重点，战时发挥各层次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就目前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忽视：一是战略后勤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战略物资储备和后勤保障力量。战略物资的储备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所谓加强，不是指量的增加，而是指储备的结构和布局更加合理。特别是随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全军物资储备总量要减少，在物资储备总量减少的情况下，要做到全方位的保障，只有战略物资储备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一旦有事，就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战略支援拳头，保证军委战略意图的实现。否则，“树干”干枯，“树枝”、“树叶”也就都成了无本之木。二是重视发挥战役后勤保障实体——后勤分部的作用。分部按照战役方向设置，是部队平战时后勤保障的直接依托。它对上接受战略后勤的支援，对下支援战术后勤，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实践证明，由分部统一领导战役后方的后勤部（分）队，既有利于加强仓库、医院和运输、修理部（分）队的建设，也有利于把供、救、运、修联为一体，形

成综合保障能力。因此，考虑战役后勤的建设，分部应是主要对象。三是战术后勤力量要精干、轻便，摊子不能太大。

总之，我们要用系统论的观点处理好战略、战役、战术后勤层次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上下顺畅的补给渠道，使我军后勤这棵“大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

3、后方防卫要加强

刘帅在建国前，对部下的一次谈话中曾说到：“现在的战争，前头也是后头。后头也是前头。”⑯几十年前，刘帅就持有“后方不是安定的绿洲”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建国后，他又告诫后勤人员：“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战争就是打人力、物力、财力，……敌人很注意战争初期首先搞掉我们的后方，所以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要隐蔽，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包括原子、化学、细菌以及直接空降袭击破坏，所以后勤要注意自卫问题。”⑰

后方的安危，关系到对前方的支援、部队的生存。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军在没有全国性统一政权的情况下，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军队没有相对稳定的后方，因而后方防卫任务显得不十分突出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后方防卫则经受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美军依仗其空中优势，一方面以大编队的 B29 和 B26 轰炸机对我后方的城镇、村庄、铁路、公路、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的大轰炸；另一方面，以 P51 和 F84 歼击机群，采取多批次、超低空活动，窜山沟，搜公路，寻找我后勤人员、车辆、物资仓库、兵站、医院等目标，进行轰炸扫射。此去彼来，终日不绝，即使是一人一马、一缕炊烟，也从不放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后勤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正如刘帅在《朝鲜战场透视》一文中所述：由于前送后送受限，战斗必需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发生了困难。一个战士在肉搏中一刀戳到美国兵的胸膛上戳不进去，因为没有吃馍没有力量。当时有的战士说：“一不想家，二不想婆，只想吃个热馍馍。”后勤供应之艰难可见

一斑。可以想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远战兵器的运用，未来战争，后勤面临的威胁将要更加严重。因而，落实刘帅提出的要求，搞好后勤防卫，有着更加迫切的意义。

刘帅提出的钻沟、挖洞、伪装、隐蔽在今天仍不失为防护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出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伪装技术、方法和器材；同时，运用传统经验，应注意知识更新。海湾战争中，伊军掘壕自守，将大批坦克隐蔽于沙漠之中，虽然伪装巧妙，迷彩逼真，但由于暴露在地表的炮管或炮塔仍会吸收太阳的热量，入夜后，金属散发的红外线幅射和沙漠的辐射频率不同，因而，在美军使用的精密红外夜视仪器上，藏在地下的坦克“如红肿的大姆指般清晰可辨”，以致美军深夜打点，连连得手，使伊军夜间被摧毁的装甲目标数量大大超过白昼。这说明，军事伪装，不能停留在对付目视加望远镜的阶段。如果仍认为“肉眼看不见，隐蔽就安全”，那么在现代化战争中就要大吃苦头。这是我们今天做好后方防卫时要切记的。

三、后勤工作要严要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刘帅不论是对战时的后勤保障，还是对平时的后勤建设，都要求甚严，过问仔细。这种严、细作风，对做好后勤工作殊不可少。

严，是对战争高度负责的表现。刘帅曾说：“打仗这玩艺，可不能马虎。”后勤保障，哪一个环节跟不上，都会影响战斗。我们从刘帅大量的文电中可以得知，解放战争时期的巨金鱼战役，由于兵员及弹药供应之不足，我火力太弱未能攻下金乡，影响到连续作战与解决战斗。巨金鱼战役后，刘帅在给军委的报告中称弹药供应不足“是大军大踏步机动作战的极大苦事。”⑱淮海战役中，我本拟乘黄维兵团立足未稳之机开始攻击，但因弹药未能及时大

量前送，故只好延迟。朝鲜战争中，第三、四次战役，我均因粮食、弹药补给不足，使两个军推迟出发；第五次战役的一、二两个阶段，粮食、弹药供应不足，是造成我不得不停止进攻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刘帅的文电中，有一则电文使人读后久久不能遗忘。那是1949年，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二野进军西南。11月1日，发起进军川黔的作战。11月11日，刘、邓电令南路五兵团和十军加速迂回行动。刘邓虑及部队连日冒雨行军，艰苦跋涉于丛山峻岭之间，特意嘱告："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⑲刘帅对搞好后勤保障反复提醒，千叮咛万嘱咐。菲薄的标准内生活供应"绝不可少"，一个"绝"字，不仅表达了刘帅对战士生活关心的殷殷之情，而且显示了他对搞好后勤保障的严格要求。今天，牢记刘帅"不要因小失大"的教诲，把搞好后勤保障当做"至要至要"的工作去严肃认真地完成，对于我们夺取战争胜利是绝不可少的。

细，是完成后勤保障的必然要求。后勤保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离不开精密的计算，缜密的组织，大到战略战役后勤的规划，小到衣食住行的细节，都不容许因疏忽而出现疵漏。诚如刘帅所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1947年，高山铺战役之后，已是秋老冬至、露寒霜重的时候了，刘、邓大军的十余万健儿，都还不曾解决御寒的冬衣。无论行军、作战、站岗、放哨，人人还是单衣、草鞋。此刻，刘帅找来后勤部的负责人，商量打好"棉衣战"的问题。刘帅听完汇报，明确提出"我们下决心，不要中央和兄弟部队支援，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⑳刘帅不仅规定了筹集原料的政策，而且不停地从这个连队到那个连队，从这个"作坊"到那个"作坊"，亲自看望、检查战士们缝制棉衣的情况。当发现有人因没有染料而用花布剪裁棉衣时，他一面开导说："我们人民解放军要穿一色的衣服，不能穿得花花绿绿的"㉑，一面告诉他们把稻草、芝麻杆烧成灰，用水调一调，就

是最好的染料。有的不会"弹棉花"，絮的棉衣疙疙瘩瘩；有的不会开领口，有的不会锁扣眼。心细如发的刘帅靠自己摸索的经验一一指点。半个月的时间，十几万指战员都穿上了自己亲手做成的棉衣。刘帅对后勤工作关照之细，不能不令人叹服。建国后，刘帅曾多次谈起单兵负荷、战场饮食保障等问题。他说："战士的负荷量要研究，究竟战士要背多少东西，背些什么？看到广东的战士本来就小，背那么多东西，就显得更小了。战时吃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南方人吃大米，吃烧饼，北方人吃小米，吃大饼，但是不能光吃那些东西，至少每天还要吃一餐热食，吃点热的有力气，光吃冷的不行。"㉒战士的衣食住行都挂在了刘帅的心中。细微之处显精神！刘帅之所以在全军指战员心目中德高望重，他严密细致的后勤保障，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部属，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作为高级指挥员，不可能时时过问每一件具体的后勤工作，但必须而且可能根据情势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抓住后勤工作的重心和主要关节。寒冬来临，赶制棉衣就是当务之急。1949年，刘帅进军大西南时，发给部队的电报中专写一条："各部队当前最大困难是鞋子问题。"㉓此时，刘帅又把鞋子当作大事来抓，也正是抓住了关节。西南山区，悬崖峭壁，泥深路滑，没有鞋子，焉能追击？遵照刘帅的指示，供应部门给每位战士发了四双胶鞋，从而保证了战略追歼任务的完成。大处着眼，关节处着手，这是刘帅重视后勤的一个特色。

后勤工作要严要细，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海湾战争中，美军后勤为了适应在炎热沙漠地区作战的要求，不仅筹措了大量的吃、穿、住、休息、交通等所需物品，而且给每人配发了擦脚粉、涂唇膏、抗热油等许多保健的东西，连迷彩服也用三色的代替了原来六色的，使之更符合海湾沙漠地区的伪装要求。应该承认，这样的后勤供应，为构成战场上士兵的战斗力因素，作出了重要的和直接的贡献。如果没有上述许许多多细微的东西，美国士兵在

炎热的沙漠地区作战，其战斗力无论如何是要大大减弱的。

刘帅论后勤，内容丰富，是他军事理论中的一块瑰宝。他的光辉理论和伟大实践，永远是激励我们做好后勤工作的无穷动力。

（本文执笔者　王凤举中校）

注　释

①②⑱《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第 19、第 11、第 350 页。

③《元帅用兵之道》海潮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版，第 91 页。

④⑥⑦⑧⑲⑳《刘伯承中原逐鹿》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第 142、第 150、第 152、第 164、第 189、第 94 页。

⑤《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5 页。

⑨⑪⑫㉓《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第 338、第 254、第 255、第 105 页。

⑩⑯《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第 38、第 338 页。

⑮⑰㉒刘帅 1962 年 5 月 15 日对后方基地建设的指示。

⑬⑭《后勤学术》外军后勤版，1992 年第 2 期第 3 页。

㉑《刘伯承的故事》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5 页。

刘帅谈军队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

——忆刘帅 1960 年以后历次谈话要点

王济民

刘帅百岁诞辰，欣逢举国上下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中央军委批准召开“刘伯承军事理论研讨会”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当前，国际风云变化多端，热点地区战火未熄；国内改革开放大潮高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跨上新台阶。在这样新的形势下召开刘帅军事理论研讨会也是很适时的。

刘帅打仗多，作战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我是刘帅多年的兼职工作秘书，经常当面向他汇报，听他指示。1960 年以后，刘帅谈到的（有的是在不同场合反复谈到的问题），给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是关于军队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现就记忆所及将谈话要点整理出来，献给会议，供大家研讨时参考。

一、部队要加强管理教育，进行严格训练

在我汇报当时部队中发生一些事故时，刘帅说：部队要从思想工作入手抓好部队管理教育。我们军队首位任务是战斗队，是准备作战的集体，必须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准绳为法规，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教育，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必须强调集中统一，令行禁止，整齐划一；思想行为均须纳入规范轨道。使之成为传统、作风，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有战斗力。要是不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我军优良传统丢在脑后，或只挂在嘴上，部队会是什么样子？那就不像人民军队了。因此，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就是要经常讲，经常抓，还要讲透、抓紧。要通过经常、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严格的管理教育，使全体成员自觉的执行纪律，维护纪律，完成任务。政治思想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工作做了要使人心情舒畅，振奋精神；不要"干剃头"，头发理了，让人心情不舒畅，感觉没劲。行政管理教育要以说服为先为主，启发自觉，遵守纪律，服从领导。不教而诛，效果是很不好的。但也不要"说服说服，说而不服，阿弥陀佛"，不维护纪律的严肃性。认真执行纪律，处罚越规违法行为，以警效尤，正是为了教育目的。刘帅强调：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关键，是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干部就是骨干，和周围的群众要有骨肉相连之情。人民把子女送到部队当兵，我们部队干部就要对人民负责，对士兵负责；要关心、爱护、帮助教育士兵，做到将心比心，将心换心，官兵关系才能融洽。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把大家凝聚起来，才能发挥集体的威力。思想一致，气息相通，干群团结就有了基础。一个连长做到一呼百应，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没有思想感情的凝聚力是难以办到的。干部和群众，军官和士兵要骨肉相连，不要骨肉分离。一分离问题就多了。过去，部队中发生的事故，检查结果，多有这个原因。干部要以身示教，以身作则，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说一箩筐空话，不如办一件实事。战时带领部队千条万条，身先士卒是第一条；平时带领部队千条万条，以身作则是第一条。干部应具有无私无畏、爱憎分明的品德。要追求革命事业成功，不追逐个人名利；有权为党为人民办好事，不以权谋私；工作服从组织分配，职位不论高低。没有大德大才不要当大官，否则，对革命事业没有好处。实际生活中，没有钱不行，但不可贪钱，贪钱会害死人的。革命队伍中的叛逃分子，违法乱纪腐败分子，除了贪生怕死、怕艰苦以外，就是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古人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国家民族兴盛。我们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军队的干部要身体力行，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德。

在我汇报“文革”中有的部队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况时，刘帅说：讲民主，官兵政治平等，是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光荣传统，但绝不能搞那些“左”的东西、过火的东西，乱来不行，乱来不能允许。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军队必须稳定。

“9．13”事件后，在我向刘帅汇报各军区反映部队存在一些问题时，刘帅说：部队当前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少训练。部队一定要进行严格的训练，缺少训练的部队，就缺少战斗力。部队平时训练要按计划循序渐进，有敌情时要进行临战突击训练。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才能熟练地使用手中武器，运用好战略战术，克敌制胜。各种类型训练的基本目的是杀敌准确。我将刘帅的意见报告叶帅后，叶帅指示：立即将刘帅这次谈话要点电告全军，遵照执行。发电前，刘帅亲自在电话上指示我，在电稿中“杀敌准确”四个字下加着重号。

二、关于军队编制装备

在我汇报有关军队编制装备方面的情况时，刘帅说：研究确定编制以我军为主，适当借鉴外军编制。军队编制是为作战需要设置的，层次不宜过多，多则有碍时效；指挥单位不宜过多，多则难于合拢，也碍时效。好比战斗队形，纵横展开，其深度宽度均应便于作战指挥。诸军兵种比例要适当，根据国家决定的总定额，以现有装备为主确定诸军兵种的编制定额。要着眼合同作战和整体作用。夸大一个军兵种的作用和争一个军兵种的地位是不对的，既不顾全大局，又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刘帅又说：兵贵精，古今认可、通用。军队指挥机构尤要精干，精则灵活、效率高。要因事设人，不要因人设事。要研究军制学。古人云，“幕僚多上劳下安、幕僚少下劳上安”。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是应当避免的。可有的同志实际上如俗

话所说是韩信用兵多多亦善，这就不好。

在我汇报武器装备研究改进情况和有不同意见时，刘帅说：研究改进武器装备要全面考虑。现代武器装备向简化、快速方向发展，如坦克自行火炮，有的可以水陆两用，使火力、兵力、防护力和运动能力结合起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对地面火炮、运输车辆发生影响。有的作用被代替，有的作用不能代替；枪炮发射速度高了，弹药供应保障就加大了难度；有了原子弹，还要研究改进白刃格斗武器，使刺刀更锐利坚韧，三棱形有血槽刺刀就比扁平刺刀强，等等。研究改进武器装备的基本目的是提高火力、兵力突击能力，使火力兵力的作用更有效地衔接配合，并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在研究改进武器装备时，全面考虑论证新旧、轻重、近远、慢快等各类武器装备性能作用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三、关于战备工作

刘帅一贯重视关心战备工作，有时考虑打仗的事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因此，在刘帅的谈话纪要中有关战备工作的比重最大。

在我向刘帅汇报敌情动态和我军战备工作情况时，刘帅说：军队要常备不懈，做到有备无患。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了“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规模较大的作战外，就是边境上自卫反击作战，国家基本处于和平建设时期。但是，我们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还存在，战争根源和危险还存在，天下并不太平，大战之后，小战时有发生，此伏彼起；根本矛盾解决不了，途穷匕首见；国内外敌人亡我之心是不死的，这是敌人的本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就不是敌人了。

刘帅又说：我们军队，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定要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外防侵略，内卫国家安全，保证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是我们军队长期的任务。我们要争取国际和平，保证国内安定团结，把经济建设搞好，但我们要居安思危，尤其是军队不要有和平麻痹思想。行成于思，没有敌情观念，战备工作不落实，一旦情况到来，仓促临战，手忙脚乱，部队也不会有战斗力，就要吃亏。战争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为什么临到"春蛰"，百虫萌动，因为气候土壤适宜，它就要出动；犬吠四方，总有一方有点动静，大小虚实，蛛丝马迹要搞清楚，弄清真相，战时尤其重要，情况明就主动、好办。历史证明内忧外患常常是联系着的，国无内忧不怕外患，国有内忧诱发外患。我们军队一定要有敏锐的警觉。

在我汇报边防情况时刘帅说：要有巩固的国防必须有切实的战备工作。国境线与国家实力地位密切相关。帝国主义奉行强权政治，把国境线视为实力线，图谋扩张，弱国总是挨欺侮。实力至关重要，历来如此。因此，从根本上说，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国家建设上去了，军队建设才能上得去，跟敌人斗志斗法才能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刘帅又说：我从东北地区勘察回来后，跟罗瑞卿总长当面说过，驻防戍边部队需要做好团结少数民族工作。我国历史形成边境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驻防戍边部队一定要贯彻好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切实克服不良倾向，做好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巩固边防才能有群众基础。须知，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多民族组成的，旧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遗留下一些民族隔阂问题。因此，我们强调各民族同志要主动做团结工作，和睦相处，同心协力，把国家边防建设好。边防要有群众基础，需要群众支持、援助。

在我向刘帅汇报战备工作规划情况时，刘帅说：现代战争是运用高尖精新技术成果的立体战争，交战双方都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最大限度地应用到战争中来，海陆空配合一齐来，进攻是立体的，防御是立体的。同时，战端一开，战火就不分前后方了，或从前方开始，或从后方开始，或前方后方同时袭击，前方后方

都先后或同时处于战火的威胁、破坏之下。导弹、原子弹、生物化学武器的应用，大大强化了战争的突然性和破坏性。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我们不需要战争，也不和外国人搞军备竞赛，我们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但是战争不是一厢情愿的，要防备帝国主义战争疯子把战争强加于人。对付这样的战争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才能在倾注全力的战争较量中获胜。

刘帅又说：战略战术具有时代性，是随时代步伐向前发展变化的。对付现代战争有许多新课题需要加以研究，探索解决途经。我们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还是奉行毛主席倡导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正义的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灵活机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一整套战法。战略战术运用的核心问题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战法。作战对象不同，兵力对比不同，时间地点不同，气象条件不同，就应有不同的打法。靠书本，死搬硬套仗是打不好的。对付敌人要"牵牛"、"宰牛"，不要"顶牛"，"顶牛"是划不来的。我们在过去战争中有这方面的教训。

刘帅还说：攻击敌人，要从弱处开刀，易于奏效，或击其要害，置敌于死地。打仗好比拳击、格斗、斗志、斗技法，斗体力，条件相当勇者胜。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时，我跟张国华同志（按：原西藏军区司令员）说过，印军的阵势好比横在你们面前的一头牛，是铜头铁尾锡肚皮，你们应采取斩头断尾剖肚子的打法，以最小的代价夺取作战的胜利（按：罗瑞卿总长曾在这次反击作战后说，中印边境反击作战是按刘帅指示的战法打的，是刘帅指挥的），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我向刘帅汇报战备工作和部队作战行动得到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有力配合和支援时，刘帅说：对付各种情况，都应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用。

在我向刘帅汇报因战备需要部队调动情况时，刘帅说：军队作战行动要"守口如瓶"，确保机密；要搞好伪装，特别是战略伪

装，授敌以假象，让敌人成为瞎子、聋子。

在我向刘帅汇报战备专向会议和战备工作规划情况时，刘帅说：凡事预则立，做好战备工作和做好其他工作一样，要有一个总的规划，尔后酌情修改补充，以适应新的情况。要根据总的形势分析、敌情判断、作战方向、战局可能发展趋势等因素规划部署兵力，区分任务，进行战场准备工作，同时也要有国家进行战争动员的范围程度和相应的措施。

刘帅很重视重点设防和工事构筑，强调要注意把钱花在刀刃上，工事搞不好用不上会造成很大浪费。在我向刘帅汇报设防工程情况时，刘帅又说：要重点设防，不要分兵把口。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住。要在沿海沿边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冲、要点上设置环形防御阵地，构筑集团工事，使之成为抗击和消耗敌人的牙座子、磨盘子。坑道工事要隐蔽，适当地多留“气眼”、出入口，以便空气流通和人员机动出入。城市地下防空工事，要构筑蛇形或“之字”形坑道，不要在高大建筑物附近构筑，以防止它倒塌覆盖下来，人在里边出不来。日本关东军在黑河地区坑道内的有生力量大部分被苏军灌水淹死，因而失去战斗力，未起到迟滞苏军进攻速度的战略作用；国民党统治时期，日机轰炸重庆，一万多人闷死在防空坑道内，当时震动极大。

刘帅又说：要构筑防御工事，但不要依赖工事。躲进工事挨打，是不能持久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证明没有攻不破的工事。构筑工事是为了保存力量，争取时间，调整部署，机动兵力，决战是在工事外进行的。

刘帅还说：军事交通，物资供应，要形成网络，成扇形分布，以利适应战况发展，作多点向心支援。

刘伯承早期革命思想和军事斗争实践

姜　山

深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爱戴的刘伯承同志，戎马一生，功勋卓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一生，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永不休止地追求革命真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一个普通的革命士兵成长为共和国元帅，优秀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卓越的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驰名中外的军事战略家；由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崇高品德和军事理论、作战谋略、指挥艺术，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珍贵财富，是我们民族的瑰宝。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继承和发扬。对刘伯承早期革命思想和军事斗争实践的研究，是全面、深入研究刘伯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现就这一课题作以下初浅论述。

一、由立志"仗剑拯民出水火"的热血少年，成长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革命战士

刘伯承，字明昭，乳名孝生，公元1892年12月4日出生在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一个农民家庭里。当时父辈六兄弟还未分家，全家五六十口人，自耕自食，生活尚得温饱。

刘伯承四、五岁时，父辈分了家。他家只分得沈家湾（即故居处）一座三间草屋和十石薄田瘦土。父亲体弱多病，庄稼种得不好，连年欠收，加之弟妹相继出世，人口增多，生活十分艰难。尤其是父亲逝世后，弟妹都很年幼，生活更是难苦不堪。

贫穷卑贱的家庭身世，父亲受尽屈辱的历史，饥寒交迫的生活，种种极不公平的社会现状，使刘伯承稚嫩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刺激，同时也播下了反抗的种籽。

刘伯承的学生时代，正处于清朝末年大动荡时代，也是中国人大觉醒、大反抗的时代。

刘伯承的故乡开县，毗邻长江上游重要港口万县，是四川东部经济、文化、交通比较发达的大县，素有“金开县”的美称。因此，中国近代爆发的每次重大革命运动，在这里都有强烈的反响。开县的许多仁人志士英勇地投入了这些革命斗争，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刘伯承在这片热土上度过了他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并受到了熏陶和锻炼。

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早年曾参加过开县的科举考试，因其父辈当过吹鼓手而被逐出考场。自从早年科场受辱后，对功名仕途早已意冷心灰，但他对儿子的未来前途仍寄予满腔希望。因此，刘伯承在童年和少年时期，能幸运地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形成和渊博知识的获得，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伯承还不到六岁就启蒙读书。启蒙老师任贤书，是从外地流落到开县的一位幸存下来的太平天国革命志士。任贤书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精通武术，懂得文韬武略。他治学严谨，不但认真负责地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课余时还指导学生操练武术，而且，他很重视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经常给学生讲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历代贤相良将安邦治国、用兵遣将的故事，教学生吟诵《满江红》、《正气歌》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词。在他的影响下，当年刘伯承最爱读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尤其对《汉书》、《战国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书，更是读得滚瓜烂熟。这些书中的人和事，都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伯承在任贤书塾馆里受了六年教育，不仅在文化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思想、性

格、道德、情操诸方面，也受到了很好的陶冶。使刘伯承从小就萌发了忧国忧民之心和救国救民之志。

1904年春，开县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开明绅士刘华英出资在他家乡灯草坝创办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学堂，定名为“汉西书院”。刘伯承有幸被接纳进入汉西书院学习。

刘伯承在汉西书院开始接触到算术、地理等现代科学，他如饥似渴地利用一切机会去猎取文化科学知识。同时读到了《饮冰室文集》、《新蜀报》、《渝报》等鼓吹君主立宪、维新变法的书报。使他在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启迪的同时，也受到了富国强兵等一些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

1904年8月，开县举行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年仅12岁的刘伯承，在刘华英的鼓励下，本着报效国家和对世俗观念抗争的动机，同父亲一起参加了这次考试。通过第一轮考试，父子二人都名列初榜前茅。不料，初榜刚一贴出，又被人向官府检举了他们上辈当过吹鼓手的身世。结果父子二人一同被逐出了考场。这件事，使年幼的刘伯承在心灵上又一次受到极大的刺伤，直接感受到科举制度的不公平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黑暗。

1905年春，清庭颁布诏书废除科举，改革考试制度。随着考试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1907年春，开县新设的高等小学堂正式招生开办，刘伯承报名应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开县高等小学堂首届招收了300名学生，根据成绩分为五个班，实际是五个年级。刘伯承分配在甲班。在这里，刘伯承废寝忘食地学好各门功课，他的各科成绩差不多都是优等。特别是国文、外语和史地成绩，更是出类拔萃，深受教师们的赞扬和同学们的敬佩。他与同窗好友邹靛澄、谢南城，是当时县高著名的“三才子”，甚至被人们称誉为开县的“三杰”、“三子”。在封建时代，只有那些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能获得“子”字的尊称。可见当时世人对他们评价之高了。但是，刘伯承的修身课成

绩却很差，因为他厌恶修身课讲的那套封建伦理道德。他对人们赠他带“子”字尊称，是非常鄙夷的。他认为，古往今来戴有“子”字桂冠的人中，不是沽名钓誉庸碌之辈，就是奸佞狡诈的凶顽之徒，根本不屑与这些“子”为伍。因此，他以幽默的态度，给自己取下了个刘贫的单名和“讨口子”的诨号，以表示对世俗观念的蔑视和嘲弄。

1907年5月，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开县爆发了震惊清庭的红灯教起义。受尽洋人和土豪劣绅欺凌的贫苦百姓，在外地流入开县的义和团骨干分子余老师的策动下，揭竿而起，公开竖起了“反清灭洋”的旗帜，毁教堂，打局所，杀洋人，诛恶霸，但不久，就被清庭调集重兵血腥镇压下去了，成批成批的红灯教徒惨遭屠杀。

刘伯承目睹这惨绝人寰的暴政，更加激起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府的仇恨，无比崇敬红灯教徒们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牺牲精神。

1908年秋，开县高等小学堂决定甲班学生提前毕业，参加夔府中学堂的招生考试。刘伯承的各科成绩都是优等，本应录取。但侯知县认为“该生出身卑贱，思想偏颇，言行不轨，恐有新党之嫌，不宜录取”，便亲自挥笔从新生录取名单上，把刘伯承的名字划掉了。

刘伯承得知他落榜的内情后，并不感到意外，但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黑暗，他曾忿忿不已地对友人说：“看来，我只有走弃文习武这条路了！我一定拿起刀枪来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道！”

不录取刘伯承的内幕揭开后，在县高、甚至在全县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校长刘念祖和教员朱璜、傅让三以及刘华英、胡穆昭（清末两江总督李宗曦的女婿，开县维新代表人物）等著名绅士，纷纷到县衙找侯知县评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侯知县才不得不收回成命，补取了刘伯承。

刘伯承入夔府中学后，本人的生活、学习费用在刘华英的慷慨资助下，尚能免强维持。在此期间，琼英大姐和谨兰二姐相继出嫁。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人肩上。这不能不使刘伯承常常忧虑在心。贫困的家境迫使他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辍学回家务农，接过压在母亲肩上的家庭生活重担，履行长子的义务。

1910 年上半年，刘伯承参加了巡警教练所的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开县巡警分署当巡警。不久，通过几桩案件，亲眼看到了封建官府的黑暗，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巡警不仅不能除暴安良，造福桑梓，而只能是充当官府衙门的走卒，豪绅富商的看门奴才。清政府的所谓推行新政，也只不过是愚弄黎民百姓的骗局。他对推行新政的某些幻想彻底破灭了，从而更加激励了他那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立志另觅救国救民之道。他怀着悔恨交加的心情，毅然决然地脱掉警服，向巡警分署递交了辞呈。

刘伯承当巡警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不畏权势，除恶济善的许多事迹，在开县城里有口皆碑，深受老百姓们的敬重。有一位名叫李云伍的药材商，敬慕刘伯承的人品和才干，同时也了解和同情他的贫困家境，主动向刘伯承表示，愿意出资帮助刘伯承经营商业发家致富。刘伯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帮助。事后，有位朋友埋怨刘伯承不该谢绝这件好事，他当即十分激动地回答道："大丈夫应仗剑拯民出水火，岂能为利禄奔忙一生!"

刘伯承辞去巡警职务，回家务农，披星戴月地耕种完十石田土后，还得尽量挤出一些时间去挑煤炭卖，给别人打短工，挣一些钱粮，偿还为父亲治病和安葬父亲，以及两位姐姐出嫁时欠下的债务。倍受人世艰辛。

繁重的体力劳动，饥寒交迫的生活，更加磨炼了刘伯承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毅顽强的意志。他常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话勉励自己。刘伯承在回家务农的一年多的日子里，更深入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的

现状，直接感受到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疾苦，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仗剑拯民出水火”的宏愿大志。

在武昌起义的前后，四川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卖国卖路的罪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爱国群众运动。运动从和平请愿发展到罢市、罢课、抗捐抗税，进而发展成为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1911 年 11 月上旬，万县革命党人公开竖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组织起了同志军、学生军等革命群众武装。正在别人家打短工的刘伯承，听到这一消息后兴奋不已，立即抛下了肩上的粪桶，连夜赶赴万县参加学生军。

刘伯承从参加学生军那天起，开始了他一生漫长的戎马生涯，踏上了“仗剑拯民出水火”的战斗历程。

二、由“手执青锋卫共和”的猛士，成长为威震敌胆的川军名将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1 月，重庆革命党人宣布独立，成立了蜀军政府。

不久，重庆蜀政府在重庆创办了蜀军将弁学堂，在川东各州县招收学员。在万县当学生军的刘伯承报名参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选入速成队。开设的课程除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兵器学”、“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等军事科目外，还要学习国文和数学。刘伯承除了学好学堂开设的各门课程外，还尽量挤出时间自修历史、文学和中国古典军事著作。将弁学堂的学习生活虽然十分短暂，但确为他掌握军事科学知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伯承在速成队毕业后，分配到四川陆军第 5 师任司务长，不久后，改任排长。

窃国大盗袁世凯掌权后，妄图恢复帝制。孙中山号召全国各地兴兵讨袁，保卫共和，再造民国。四川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号

召，组织起以第5师为骨干的四川讨袁军，推举熊克武为总司令。1913年8月4日，四川讨袁军向全国发出了讨袁通电。袁世凯得报后，急调川、陕、云、贵、鄂五省军队围剿四川讨袁军。刘伯承所在部队，在隆昌一带与袁军激战。由于刘伯承骁勇善战，指挥有度，受到上司表彰，很快被提升为连长。不幸的是，他升任连长后不久，左脚就负了伤。

四川讨袁军在四面受敌，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节节败退。9月，熊克武只得下令："部队分散活动，保存革命力量。"熊克武、杨庶堪等主要领导人被迫出奔离川。刘伯承几经乔装改扮，多次易姓更名，历尽千辛万苦，只身潜回故乡。

1914年冬，刘伯承早年的同窗挚友，隐匿在家的熊克武部彭竹轩营排长邹靛澄，转来彭竹轩从上海的来信，信中说：讨袁失败后第5师的许多将士都逃到了上海，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于是他同邹靛澄商量决定，立即秘密奔赴上海参加战斗集体，寻求救国真理。当木船途经长江三峡即将出川时，刘伯承感慨万端，即兴吟诵了一首抒发胸臆的诗篇：

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

在上海，刘伯承进一步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在但懋辛的引荐下，参加了孙中山亲自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刘伯承参加中华革命党，这是他早期革命征途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他已由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1915年冬，袁世凯宣布恢复君主制度，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决心保卫共和。刘伯承、吕超、王伯常、李樾森、康云程等奉中华革命党的命令在川东组织起义。

刘伯承、康云程回川后，先后奔赴川东各州县，广泛联络各

地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首领，筹划武装起义。1916年初，辗转来到涪陵，刘伯承与当地革命党人研究决定：假借下乡清剿为名，杨光烈将县警备队开到新庙场，正式宣布起义。不久，即公开打出了“川东中华革命军”的旗帜。原5师炮兵营长王伯常，奉护国军四川招讨军司令熊克武的命令，也从川南赶到这里。两军会合后，将川东中华革命军改名为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王伯常任支队长，刘伯承任军事指挥官。

涪陵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川东各地，各阶层人民纷纷响应。不几天，起义军就由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这支新成立的起义队伍，高举护国讨袁的旗帜，严重威慑着敌人，使驻扎在川东各州县的北洋军，只得龟缩在防区内，不敢轻举妄动。

3月中旬，刘伯承带领这支队伍从新庙场出发，南渡长江，经长寿袭击丰都县城。在丰都县革命党人和哥老会的配合下，出奇制胜，一举攻克丰都县城，击溃北洋军第8师李长泰部一个加强营和一个县警备队，击毙、击伤敌官兵数百人，俘获并处决了袁伪丰都县知事许石生，缴获各种洋枪600余支以及大批弹药。

不幸的是，在战斗中刘伯承的颅顶和右眼被敌流弹击中，负了重伤。

四川护国军一支队攻克丰都县城的情报，当天就传到了重庆袁军驻川指挥部，曹锟立即从重庆、万县等地调集重兵增援丰都，敌军数十倍于我，情况万分紧急。刘伯承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决定将部队向涪陵、垫江交界的鹤游坪转移。

一支队转移到鹤游坪后，敌军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扑来，企图一举围歼这支新生的革命队伍。此时，刘伯承伤重不能动弹，部队失去指挥中枢，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刘伯承为保存革命力量，将部队分遣转移到川东各地去打游击。这样，既避免无益的牺牲；又能推动川东各地的反袁武装斗争；还能牵制敌人的大批兵力，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配合护国军主力在川南战场的决战。

刘伯承因伤不能随部队行动，不久，转移到重庆，在美国教

会开设的宽仁医院手术治疗。刘伯承在这里治疗一段脑伤后，就转到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治眼伤。

为了中枢神经不受影响，施行手术时，刘伯承坚持不用麻醉药剂。为他施行手术的主刀医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医，人称沃大夫。沃大夫从欧洲到亚洲，作过成百上千次手术，可是象刘伯承这样不用麻醉药剂的高难度大手术还是第一次。沃大夫对刘伯承的坚强意志、惊人的毅力钦佩不已，十分感叹地称赞说："刘先生不是一般军人，真是军神!"

刘伯承手术后出院，但身体十分虚弱，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才能重返前线。而当时他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幸得他英语基础较好，才到求精中学（教会学校）去教体育课。

5 月下旬，刘伯承同璧山县革命党人张明安一起，从重庆绕道江津赶至璧山县丁家坳，组织起一支有 2000 多人的护国义勇军队伍，同忠于袁世凯的保皇势力进行了英勇斗争。

丁家坳位于璧山县城西 70 里处，紧邻永川县境，是成渝大道上一个较大的集镇。成渝大道是袁军在川中作战主要的后方补给线。当时，丁家坳及其附近的乡镇，几乎都有自发组织起来的反袁武装，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他们只能分散行动，零星的与袁军对抗。张明安和当地一些革命人士认为，只有把各方面的反袁武装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袁军战斗。

刘伯承到达丁家坳后，随即同张明安一道深入到各乡镇会晤各股武装头目，宣传护国讨袁宗旨，正式成立护国义勇军司令部，张明安被推举为司令，刘伯承以护国军四川司令部招抚员和参谋的名义，全面襄助司令。由于张明安不懂军事，司令部的一切全由刘伯承操持。

义勇军屯兵丁家坳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夏荒时节。由于连年战争，造成劳力流亡，田地荒芜，广大贫苦百姓处于缺粮断炊绝境。张明安、刘伯承商量决定，派出部队打开与袁伪有勾结的豪

绅、富商粮仓，把粮食发放给饥民。把成千上万饥饿待毙的贫苦农民从死亡线上解救了出来。

义勇军经过集中整训、开仓赈饥以后，纪律秩序焕然一新，战斗情绪空前高昂，更加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接着，刘伯承指挥义勇军，连续发起了奔袭璧南重镇来凤驿、围攻璧山县城、龙圹伏击敌运输队的三次战斗，给予来凤驿的商团、江津保商队等保皇武装及敌第30旅运输队等部以沉重打击，俘获第30旅旅长黄鹄举，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护国战争期间，刘伯承先后领导了涪陵、璧山两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当地革命党人和哥老会的配合下，发动群众，在敌人后方的重要运输线上开展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为护国军主力部队在川南、川中正面战场决战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表现出刘伯承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的品德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同时，也开始崭露出他不同凡响的军事组织领导才能，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

9月上旬，熊克武率部进入重庆，就任重庆镇守使兼四川陆军第5师师长职务。熊克武回重庆后，立即派专人请回了刘伯承，委任他为第9旅第20团第1营营长，不久，就升任第9旅参谋长。

刘伯承归队后，立即率部投入了扫清袁世凯余孽的战斗和护法、讨贼等战争。熊克武知道刘伯承善指挥，只要碰到顽敌或难打的仗，总是派刘伯承率部前往解决。许多有战斗力的敌军，都在刘伯承部队面前遭到惨败。不几年，刘伯承的名字就在四川军民中广为传开，被誉为川军名将。

三、在苦斗中觉醒，由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长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袁世凯毙命，护国战争结束，北京政权的实际权力落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1917年夏，段祺瑞逼走总统黎元洪，宣布废除

临时约法，解散国会，继续实行反动军阀的封建统治。

孙中山先生高举护法旗帜，在广州成立与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的护法军政府。

此时的四川局势，在“护法”的旗帜下，各派军阀又开始了新的混战和纷争。川军与滇、黔军争霸四川的冲突，新旧军阀间的斗争，国民党内部派系间争权夺势的内讧，斗争都相当激烈。熊克武、但懋辛系基本上是倾向孙中山南方政府的。他们的作战对象主要是北洋军阀和受到北洋军阀支持的西南地方军阀。

刘伯承重返熊克武部队后，为熊克武立下了不少战功。但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不可能不陷入军阀混战的角斗中，而当时他又很难认识清楚这个问题。”①然而，连年不断的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他是耳闻目睹的。1921年7月，第2混成旅奉命移防开县，刘伯承任团长的第1团就驻扎在陈家场、赵家场一带。阔别故乡多年的刘伯承，趁此机会回家探望慈母，在家短住了几天。他同亲朋故旧的广泛接触交往中，通过耳闻目睹到的无数事实，亲身感受到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给家乡人民带来的深灾重难。对于一个立志“仗剑拯民出水火”的革命青年军官来说，不能不使他深思反省。从而使他对那些一向打着革命旗号，为自己争官爵，抢地盘，对人民实行残酷压迫的上司们的军阀专制统治的本来面目开始有所认识。但是，如何才能拯民出水火？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他当时仍是一片茫然，还有待他在苦斗中去求索。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将所控制和影响的力量改称“讨贼军”，兴师讨伐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而当上总统的曹锟政府。随后，他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在四川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的侵川之战。

在讨贼战争期间，刘伯承被委任为第1路指挥官兼代行东防营行营指挥，统一指挥第2混成旅主力和1师李萼旅。3月间，刘伯承在率部同叛军杨春芳旅争夺万县的战斗中，采取奔袭战法，出

敌不意，一举歼敌 600 余人。

4 月 2 日重庆告急，刘伯承奉命率部增援。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兵力悬殊的形势，主张打不赢就走，不能硬拼。建议即时主动放弃重庆，以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反攻。遗憾的是，但懋辛没有及时采纳刘伯承的正确意见，造成寸滩战斗的失败，损失惨重。在失败的严酷的事实面前，但懋辛佩服刘伯承的真知灼见，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遂宁集中。刘伯承率部转移到合川，一面休整，一面派人到重庆附近收集在寸滩战斗中失散的士兵。在合川，他亲眼见到路断人稀，市场萧条，街面冷落；亲耳听到商民叫苦，百姓呻吟。他回顾自己从辛亥革命离乡投军以来，十余年出生入死东征西讨，从普通士兵到将军的历程，并没有实现"仗剑拯民出水火"的初衷。刘伯承在合川向四川东防督办但懋辛写了辞职报告。经熊克武、但懋辛二人苦苦挽留，多方慰免；同时，刘伯承从讨贼战争全局着想，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统一国家，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他收回了辞呈。

4 月 26 日，刘伯承率部抵达遂宁，在此专候他的熊克武、但懋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反攻部署。会议决定，由第 2 混成旅，1 师之邹旅、第 8 混成旅组成右翼集团，统归刘伯承指挥，从中江直插新都、广汉，歼灭该地敌军，切断北洋军与四川乱军的联系；由但懋辛率领第 6 师经淮州直取成都。

刘伯承率领右翼部队从遂宁出发，一路所向无敌，连克新都、广汉，迅速切断了北洋军与四川乱军的联系。随后，又增援但懋辛部，收复石板滩，讨贼军才得继续向成都推进。

5 月 13 日，熊克武、赖心辉等讨贼军将领率部进入成都。5 月下旬，正当刘伯承率部在北线棉阳一带追歼残敌之际，突然接到成都再度告急的通报，令他回师成都解危。

刘伯承深知龙泉山为成都东南屏障，龙泉山若失，成都必陷敌手。因此，他接到熊克武命令后，率部昼夜兼程，飞速抵达龙

泉驿，未作片克休息，立即上山勘察地形，并与赖心辉取得联系。他决定把主力的强大火力隐蔽部署在山顶侧翼，另以一部精锐奇袭敌后方，并截断敌后联络线。

龙泉山攻守战于5月28日凌晨打响，敌担任正面进攻的先头部队为北洋军精锐于学忠部。于学忠亲自督战，向讨贼军阵地连续发起猛烈冲击，第2混成旅顽强抵抗。敌我双方在龙泉山顶反复争夺，血战到天明，第2混成旅一部夜袭敌后方奏效，刘伯承趁势指挥部队勇猛夹击敌军。于学忠见腹背受敌，才被迫带着残部狼狈逃窜。这次战斗，敌军伤亡惨重，大伤元气。事后，熊克武曾通报表彰了这次名震四川的“龙泉驿大捷”。智勇双全的刘伯承又一次威震南北军界。

龙泉驿大捷后，刘伯承率部乘胜追敌，所向披靡，敌溃不成军向东逃窜，一直追到重庆西南的永川。

9月10日，刘伯承在大足前线观察地形时，被敌军冷枪击中右腿，流血不止，当即昏迷不醒。但懋辛闻讯赶来，组织抢救，派人日夜兼程送往成都医治。

刘伯承在成都养伤，有较充裕的时间静坐下来读书看报，思考问题。在那段时间里，刘伯承手不释卷地博览群书，接触到许多新思想、新文化。在新思想的启迪下，他重新认识过去，分析现实，探索未来。刘伯承痛感，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了，曾对友人感慨地说：“看来三民主义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②但是，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今后中国向何处去？当时他仍然感到茫茫然。

正当刘伯承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苦闷徬徨，探索前进的时候，马列主义的金光驱散了他心中的迷雾，给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此期间，刘伯承幸运地会见了他尊敬的革命前辈吴玉章，通过吴玉章又结识另一位四川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和四川共产主义组织创建人之一的杨闇公。

由于三人同怀救国救民之志，共同的志向使他们成了知己，结

下深厚的友谊。杨阍公慧眼识人，对刘伯承雄才大智和远大抱负甚为钦佩，他尤其是赞赏刘伯承在政治观点上的审慎态度。那时各种政治学派，都在社会上流传，除马列主义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1923年冬，杨阍公与吴玉章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国V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次年1月，杨阍公曾就参加组织的事征求刘伯承的意见。刘伯承坦率地回答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此后，刘伯承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4年秋末，他同吴玉章一道出川到上海考察。在上海，刘伯承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了解到许多新鲜事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作为工人阶级的独立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开展斗争；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开始；一个新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农群众运动正在兴起。……所有这一切，使刘伯承开阔了视野，受到振奋和鼓舞。不久，刘伯承和吴玉章先后离开上海。刘伯承取道湘、黔回到四川。

1925年1月，吴玉章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又约刘伯承一道出川。他们到达北京后，积极进行“VC团”的活动。刘伯承经吴玉章介绍参加了“VC团”的组织。一年来，刘伯承经过学习深研，观察对比，反复思考，终于认准了“方道”——决心永不动摇地走共产主义的道路。

5月初，吴玉章受党组织的派遣去上海活动，刘伯承同行。在上海，他们亲历了“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应刘伯承的要求，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秘密接见了他。随后刘伯承同吴玉章绕道香港、广州回到重庆，着手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建立临时省党部于莲花池，吴玉章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刘伯承负责军运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共重庆地委掌握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通过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推动四川工农运动、军事运动以及各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从此，刘伯承在中共重庆

地委的领导下，从事新的革命实践斗争。两年来，刘伯承从对革命真理的求索，进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而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又进一步丰富、发展和验证了他所追求的真理——共产主义。

经过失望、彷徨、求索、实践，刘伯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1926 年 5 月 13 日，在重庆，34 岁的刘伯承同志，由杨闇公、吴玉章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标志着他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长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他英雄史诗般的革命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从此，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建立了永垂不朽的历史功勋。

注　释

①《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版，第 85 页。

②《刘伯承回忆录》（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学习刘伯承军事教育理论和实践
把我军教育训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韩怀智　中将

刘伯承是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我军的缔造者之一。他戎马一生，精于韬略，善于用兵，足智多谋，身经百战，功勋卓著，闻名于世。朱德总司令曾称誉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小平同志说：“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巧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刘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典籍之精华，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善于结合战争实际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提炼和升华。他独具特色的军事理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全面、系统的见解。他是我军军事教育工作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为创立和发展教育训练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教育训练有许多非常精辟的论述，在我军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我军今天进一步加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搞好教育训练改革，提高我军的战斗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我仅就教育训练的有关问题，谈谈学习刘帅军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几点粗浅体会。

一、充分认识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开始进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从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从“小米加步枪”向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转变的新时期。刘帅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一贯主张并率先提出“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的重要思想，深刻地揭示了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切中了我军建设的要害，在军队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以将帅治军的高度责任感和紧迫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于1950年7月，主动上书毛主席、党中央，毅然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务，担当起创办军事学院的重任。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又一次为全军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不仅如此，他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的七年中，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以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率领全院广大师生员工把军事学院办得生机勃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将领和中高级指挥人才。到1956年8月，军事学院已发展成为一所既有陆军，又有海、空军，既有军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综合性最高学府，并为后来分别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和形成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军事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无不浸透着刘帅的心血和汗水；军事学院的一切成就，都是刘帅辛勤耕耘的结果，都是刘帅教育训练理论、智慧和实践的结晶，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刘帅是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刘帅思想敏锐，有战略眼光，分析问题富于哲理，精辟透彻。小平同志说他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这是恰如其分的，当之无愧的，也是值得庆幸的、大书特书的。

众所周知，我军教育训练曾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在我军教育训练经历正反两方面沉痛教训后的今天，重温刘帅关于教育训练的理论，深刻认识教育训练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更加由衷地感到，小平同志和中央军委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我军建设战略地位的决策是多么高瞻远瞩，气魄非凡。我们对此只有毫不动摇地、不折不扣地、坚定不移地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才无愧于刘帅的谆谆教诲，才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们的重托和殷切的期望。

二、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加强对教育训练的指导

刘帅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是伟大的实践家。他的教育训练理论博大精深，实践内容极为丰富。因此，他指导教育训练驾轻就熟，运用自如，硕果累累，有口皆碑。在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他就紧密结合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实际，适时向毛主席、党中央提出关于训练方针的建议：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种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随时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防御帝国主义侵略而勤奋学习。他认为，我军的教育训练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乃是人类最高智慧的体现，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军事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是我军作战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因此，我军的教育训练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并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教育训练的规律、原则和方法，解决教育训练的各种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我军教育训练的正确发展方向。

刘帅在指导训练的长期实践中，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科学正确的训练原则和方法，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

有很强的实践性，对于搞好今天的教育训练，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坚持一切从实战需要出发的原则。这是军事训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刘帅历来强调作战、训练、教学相一致、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以战教战，战教合一。他常说：训练要尽量符合我军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方向，按照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仗的原则。根据条件和我军编制装备的实际，做提高一步设想，拟定计划，以免落后于形势。刘帅的这些话，今天仍不失为指导教育训练的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同时，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根据我国周边环境、现代战争特点、部队作战任务和编制装备的变化，切实加强对教育训练的指导，进一步增强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切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增强我军现代条件下的战斗能力，使之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重要力量。

第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一贯倡导的原则，对我们指导教育训练极为重要。刘帅对此也有非常精辟地阐述。他指出："不以实践为基础，不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理论；不以理论作指导，不和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是瞎实践。"他又打比方说："经验好比一堆零散的钱，理论好比是一根钱串子，把各个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搞教育训练，同搞经济建设一样，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花气力，下功夫，作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者相互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通过实践发现和发展真理；另一方面，又通过理论而能动地指导实践。也就是说，实践一刻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同样，理论一刻也离不开具体实践。因此，学好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认真研究国情、军情，突出特色，把握

关键，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总结经验，经常变换新脑筋，从而形成实践与理论的良性循环，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不断开创我军教育训练的新局面。

第三，坚持以干部训练为重点的原则。刘帅在长期的教育训练实践中，始终坚持和贯彻了这一原则。他认为，干部决定一切，所以教育训练的重点应放在干部身上。干部提高了，部队才会进步。因为部队的训练，要通过干部的组织实施才能实现。刘帅有一句名言，叫做“军队以训练为中心，而训练干部则为中心工作的中心”，这句话言简意赅，概括得既准确而又深刻。他在强调训练好一般干部的同时，又特别强调训练高级干部对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掌握局面，掌握指挥。培养、训练高级干部太重要了。”刘帅的这些话说得是多么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我们必须铭记在心。我们在指导教育训练中，必须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执行。干部训练，主要是抓好两件事：一是抓好部队在职干部的轮训，一是抓好院校对干部的培养。当前，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全面贯彻办校方针和“一个服务、两个适应”的办学思想，认真把院校办好，切实把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充分发挥院校集体干部部的作用，培养大批指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管理人才和专门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光荣而又紧迫的重要任务。这是建军、治军的关键所在，务必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和重视。

第四，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原则。刘帅治军、治校以严格著称。敬爱的周总理曾赞誉他：“有学问，有搞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刘帅治学严谨、治校严格，而首先是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常说：“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有令不行。”记得 1956 年，国务院安排一位外国总统参观军事学院，全院校级以上军官准备列队热烈欢迎。然而天公不

作美，那天下起了大雨。有人向刘帅建议欢迎仪式是否改到礼堂进行。刘帅听后说："此事关系到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决按原计划办。"是时，他身着元帅礼服，带头站在大雨之中，带领五百多名校级以上的军官，冒雨列队夹道欢迎外宾。此情此景，至今都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件事对我们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古往今来，治军无不强调一个"严"字。因为凡是有战斗力的军队，都是严格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训练指导原则，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指导教育训练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都必须大力坚持和提倡。

在训练实践中，刘帅还非常强调民主练兵，提倡官兵互教，尊师重道，教学相长。他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率先倡导了战役、战术训练和军事演习法，就是"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战术，再作想定情况，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兵种串联组织起来，锻炼学员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战斗的能力。随后又由课堂到野外进行现地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证明理论原则。"概括地说，就是"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编织起来。"刘帅关于教育训练的原则和方法，是实践的升华，理论的结晶，因此长盛不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缅怀刘帅，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军宗旨和本质的体现，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只有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才能加快我军建设的步伐。教育训练担负着培育新一代德才兼备治军人才的神圣使命。因此，要振兴我军教育训练，把教育训练搞上去，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演变"与

“反演变”、以及各级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新形势下，搞好传统教育，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更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刘帅的教育训练实践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的好教材。刘帅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是在我军和平建设时期，总是把教育训练作为一件重要的大事，牢牢挂在心间。大到大政方针的运筹帷幄，小到具体问题的检查落实，无不浸透着刘帅的心血。在课堂上，在训练场上，都有他的身影，他的汗水总是和干部、战士的汗水流在一起的。他亲自选校址、调教员、配备干部，制定训练方针计划，翻译、校订外军条令、教材，亲自授课、总结经验，亲自给毛主席写报告等等，传经验，带作风，是那样细致入微，不遗余力。在战争倥偬的马背上，在呼啸奔驰的列车上，在住院疗养的病榻上，他学习总是那样的勤奋忘我，工作总是那样的全神贯注，育人总是那样的诲人不倦，有许多神话般的动人事迹至今仍被世人传为佳话。总之，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他总是那样光彩照人，风范长存，他是我军教育训练战线学习的好榜样。

教育训练要上去，领导要下去。今天，我们学习刘帅的榜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习刘帅的榜样，就要象刘帅那样，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心连心；

学习刘帅的榜样，就要象刘帅那样，深入实际，深入教育训练第一线，言传身教，率先垂范，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培养优良的作风，把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接过来，传下去，代代相传，永不变色；

学习刘帅的榜样，就要象刘帅那样，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扎扎实实，真抓实干，狠抓落实，讲求实效；

学习刘帅的榜样，就要象刘帅那样，亲自实践，勇于探索，认真总结经验，花气力、下功夫，切实把教育训练搞上去。

同志们，党的“十四大”为我军建设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正确道路，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的总目标，军委江主席为实现这个总目标，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永远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关于教育训练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指示，坚持以质量为核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快改革步伐，真心实意抓中心，脚踏实地搞训练，为把我军教育训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努力奋斗。

学习刘伯承从严训练的思想 努力提高新时期军事训练质量

陈希滔少将　温宗仁少将

刘伯承元帅，既是疆场上的常胜将军，也是建军治军的行家里手。我们部队的前身是二野第六纵队，是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曾直接指挥的一支善打硬仗、恶仗的“拳头”部队。在战争年代切身感受了刘邓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丰富的建军思想，聆听了两位伟人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教诲，对部队的建设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感到，刘帅建军治军的思想极其丰富，其中，着眼提高部队作战能力，从严训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刘帅从严训练的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将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应用于军事实践的产物，是对我军不同历史时期训练经验和训练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思想，为我军战争年代赢得胜利，和平时期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学习刘伯承从严训练的思想，对于发扬光大我军的优良传统，提高军事训练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练　为　战

练为战是刘伯承从严训练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长期的作战和训练实践中，他一贯倡导和坚持训练为作战服务，反对华而不实，形式主义。刘伯承认为，我们练兵的课目、内容必须使各种不同的部队“有的放矢”，力求适合作战任务的需要。事实也证明，用什么样的训练思想作指导，是训练质量生成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什

么时间坚持了练为战的指导思想，部队的训练质量就高，反之训练质量就低。尤其是在和平条件下练兵，更加需要认真贯彻练为战的指导思想。

一是作战需要什么就训练什么。这是刘伯承从严训练思想的基本着眼点。他时时处处以能赢得作战胜利为训练的最终目的，要求作战需要什么，就训练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根本要求着眼，结合我军实际指出，首先要把枪打准，枪打得准，才能迅速地消灭敌人，有效地保存自己。他强调："军人打枪不精通、不熟练，就说不上是军人，那是外行"①，"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②。他在四八年给中原野战军的作战指示中又强调指出，各兵种、各业务人员必须就实战研究、练习和提高各自的技术、战术及其他业务技能。刘帅不仅大力号召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而且事事处处身先士卒，为人师表。1946年6月10日，二野在邯郸召开各纵队军政首长和部分旅首长练兵会议，刘伯承司令员在开会的第一天就亲自带领大家去打靶。他对大家说："我跟你们比武，我先打三枪，我一只眼可能打不好，你们都要打好"③。于是，他打了三枪。接着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和各纵队、旅首长们依次打了三发。验过成绩后，刘司令员手持刚用过的步枪，面带怒色地说："有的旅首长、纵队参谋长，同我打得差不多，三发不过十环，还不如兵"④。严厉的批评，深刻的教训，极大地震动了包括我们六纵在内的广大官兵，激发了干部练兵的紧迫感和自觉性。联系到当前的训练工作，也亟待贯彻作战需要什么就训练什么的思想。首先要号准现代作战的脉搏，把现代作战对训练的要求搞清楚。对此，要特别关注现代局部战争的性质、特点、利弊得失，善于从其现象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寻觅其发展趋向，进而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从中找出值得借鉴和注意的东西，确立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训练内容。其次要突出训练重点。现代作战需要包罗万象，训练内容繁多，因此，要讲究方法，抓重点，带一般。剖

析近几年发生的局部战争可见，参战部队的机动、隐蔽、协同和战法等问题是其共同的重点问题，无疑也是我军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集团军部队训练实际，就是要加强战役训练，提高本级的组织指挥能力；突出实兵检验性演练，增强协同能力；实施有针对性的训练，以明了任务，熟悉对象，提高训练效益。

二是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既是对训练的高层次要求，又是提高训练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刘伯承从严训练思想的方法体现。他认为，训练服务于作战，作战又为训练提供方向和内容，因而训战必须一致。他在《关于人民武装建设问题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训练是战争的准备"，要努力"求得战教合一，学用一致"⑤。在长期的训练实践中，刘帅坚持区分不同的环境条件，贯彻训战一致的思想。在抗日战争后期，刘伯承针对我军作战中战术问题较多的现状，强调指出：只有把射击、刺杀、投弹、掩蔽工作学好，战术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才能完成任务。在解放战争初期，他又依据当时的作战需要明确指出："我们是在战争中进行训练，一次不能样样都学好，要着重技术、爆破、投弹、瞄准"⑥。这些思想都很好地指导了部队的训练实践，为提高部队的训练水平，增强作战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针对部队处于和平环境的实际贯彻这一训练思想，就是要下大力组织好以"三实"为主的险度大、难度大、强度大课目的训练，努力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对此，首先要确立对战争负责，对军队长期建设负责的思想，破除消极保安全的观念，加强训练，提高人的素质，以熟练的技术、周密的组织减少事故的发生。其次要讲求严谨而科学的施训态度。训练实践告诉我们，只要过细准备，认真落实各种安全措施，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险、难、强课目的训练是可以落实好的。再次要把落实险、难、强课目训练作为衡量部队训练质量，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标准。把落实情况同单位及领导的训练实绩挂起钩来，好者奖，差者罚，做到奖到实处，罚到人头，以此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切实把险、难、强课目的训练落实好。

三是实战的要求就是训练的标准。这是刘帅从严训练思想的标准观。刘伯承认为，打胜仗是实战的根本要求，训练能够打胜仗的部队是训练的最高标准。然而，和平时期，训练实绩接受实战检验的机会很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严格落实根据实战要求确立的各项训练标准。做到既严而有格，严而有法，又切实可行，确使受训者在其智力和体力条件所允许的“度”之中完成训练。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训练考核规定，既不要盲目拔高，更不能随意放宽考核条件，降低考核标准。该谁考的就谁来考，该考什么就考什么，该考谁就考谁，该怎么考就怎么考，尤其是对实兵实弹检验性演习等险难课目的考评，一定要自觉坚持高标准，避易求难，从严摔打部队，确保在近似实战的氛围中提高部队训练质量，缩小训练与实战需要的质量差。

二、抓“龙头”

刘伯承认为，“干部决定一切”，事实证明，抓训练也必须抓住干部这个“龙头”。在长期的作战和建军实践中，刘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把抓干部作为从严训练的关键，常抓不懈。早在1939年刘伯承就指出：“教育的重点要放在干部的教育，教育的干部”，以适应军委关于“以训练工作为中心，以训练干部为中心之中心”⑦的思想。可见，训兵先训官，抓“龙头”带“龙尾”，既是确保训练落实，提高训练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刘伯承一贯坚持的训练方法。目前，干部训练素质弱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四会”水平低，组训能力弱，指挥能力欠缺；有的技术素质差，“官不如兵”。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干部的组训任教能力、训练管理水平和部队训练质量的提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把提高干部军事素质作为提高部队训练质量的突破口，一以贯之地抓下去。

一是狠抓干部的责任心。刘帅认为，干部的责任心不强，战

时要害死人，和平时期要影响部队的建设。为此，他强调，作战要靠干部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激发广大士兵的杀敌热情和忘我精神，赢得作战胜利，训练也同样要靠干部强烈的责任感，去严密的组织，并带头施训。他在《大家发愤整军练兵》一文中明确指出："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必须担起练兵的重任，鼓起练兵热情。""切不可怕自己对练兵不熟悉而单委之于训练参谋与下级指挥员，来敷衍塞责"⑧，"党员无论在作风、训练、工作上都要起模范作用。"⑨事实也表明，刘帅抓干部责任心的思想是明确的，要求更是严格的。1947年8月26日，我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二野首长机关和六纵部队到达淮河北岸，此时，国民党的19个旅已尾追上来，其65师的先头已和我后卫部队接上火了。由于敌人破坏，渡河仅有十几条木船，在短时间内要渡过千军万马真是难于上青天。形势万分危急。此时，刘邓首长都来到了六纵十八旅渡河指挥所。刘司令员焦虑地向六纵先头旅的旅长询问着渡河情况。在对能不能徒涉、能不能架桥等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刘司令员还是亲自登上了小船用竹杆探测淮河的水深流速，在获得一手的渡河资料后，便立即指示：坚决架桥。至27日黎明，刘司令员又发现河水下落，有一处可以徒涉，于是命令部队迅速徒涉，终于抢在敌人之前渡过了淮河。当时，刘司令员曾严肃地批评说："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是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谆谆的教导，给我六纵官兵以深刻的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的责任心不强是制约部队训练素质提高的重要因素，其表现也很多：有的避难求易、拈轻怕重；有的训练标准比较低，组训施考马马虎虎；有的只图形式，不求实效，斩头去尾走过场等等，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训练质量的提高。要想使以质量为核心的训练"四落实"，就要象刘帅那样，把抓干部的责任心当作提高战斗力和确保作战胜利的重要环节来抓，自觉坚持高标准，一丝不苟抓落实。通过狠抓干部的责任心，来激发其为党的事业而发奋练兵的责任感，强化干部为事业而练兵习武

的意识，变要我练为我要练。

二是狠抓干部的技术过硬。刘伯承指出："干部要认真提高技术，部队技术才能进步。"在《目前部队工作报告提纲》中他又强调："只有军政素养强的干部，才能领导部队发展。"⑩这些都是刘帅"强将手下无弱兵"，"只有师高，弟子才会强"思想的集中反映。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建军实践中，刘伯承不仅十分强调干部自身素质的重要性，而且还为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实现技术过硬，作了大量具体明确的指示。如"要用多种多样的办法训练干部"⑪；只有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才能造就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才能不断提高干部的技术素质；不仅要熟悉以往学过的课目，更要熟悉少学习或未学过的课目。干部对技术要"精益求精"等。实践证明，这些要求都是客观的，对于提高干部的技术素质是行之有效的。当前，干部自身技术弱的问题还有一定的普遍性，抓之不紧，严之不足是干部训练落实不好、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干部自身技术素质必须着力解决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得过且过，不愿吃苦等问题，自觉地、高标准地坚持一严到底的思想，苦练加巧练，确保干部技术训练量足质优，切实把技术练精，把战术练活。

三是狠抓干部的组织指挥素质。刘伯承认为，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是作战胜利的关键因素，着力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是历史的责任，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抓紧抓好。他指出，战时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必须实行'以战养战'的办法。"并要求，"给予部属的任务要有重心而十分明确。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的行为"⑫。他还指出，懂得战术是容易的，适应新的情况，灵活地运用战术甚至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因此，他反对死背教条，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作战、训练的实践中不断提高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1947 年 8 月 23 日，刘伯承、邓小平率南下的二野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刚进到汝河，就发现敌人已先我到达汝河南岸，控制了渡口，并在飞机的配合

下截断了我军去路。这时尾追的敌人3个师距我已不到30公里。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刻，刘司令员、邓政委召集六纵领导亲自部署强渡，刘司令员指出："狭路相逢勇者胜"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敌人的进攻，劈开路冲过去。战斗发起，我六纵官兵枪上刺刀，手榴弹开盖，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硬是在敌人的层层阻截中杀开了一条血路，护卫中原局、野战军机关渡过了汝河。事后，刘司令员高兴地对六纵说：你们打得好！打仗就是这样，在关键性的地方指挥要沉着、果断，要机智、勇猛，这样就能战胜敌人。刘邓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深深地影响着六纵的每个指挥员，为六纵成为善打硬仗、恶仗，经得起严峻局面考验的"拳头"部队创造了条件。在战争年代，刘帅亲自抓干部轮训队；建国初期，又亲自抓军事学院，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尤为迫切，对此，一定要严密组织，多种形式并举。一是要有计划地选送优秀干部入校深造。各级都应从选拔干部，培养人才的高度出发，采取措施，切实把好选送关；二是要分层次组织集训。按职责分工，区分不同对象，归口组织施训。集训时间长短要适宜，主题要集中，人数要适度；三是要落实好在职训练。注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突破。切实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锻炼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

三、重 法 治

依法治训，是我军提高训练质量，实现军事过硬的重要保证，是刘帅建军治训的基本手段。早在30年代，刘伯承就明确指出，训练必须坚持统一部署，执行统一计划，不得胡来。40年代初又指出，要强化制度纪律，没有纪律，部队就不会有战斗力，就无法战胜敌人。他还强调："审慎制订与严格执行各种条令，也就成为我们部队训练的要项之一。"⑭干工作要靠自觉，但也要有纪律，

有自觉而严格的纪律，才能保持一致，否则就要乱套。事实确是如此，训练要高质量，仅靠基本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仰仗于训练法规的作用。从部队目前的训练情况看，法规意识不强，不能依法施训和依法治训是影响训练质量的重要因素。有的同志有法不知法，时常不自觉地违反训练法规；有的组训者依法施训的自觉性不够高；有的训练部门执法不严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涣散了训练作风，而且直接影响了训练质量的提高。要防止和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依法治训。

一是要立法、学法、明法。在战事频繁的环境中和建国初期的岁月里，刘伯承虽是日理万机，但仍针对我军训练法规薄弱的状况，十分重视结合实际，建立和完善具有我军特色的训练法规。他亲自校正条令条例；组织编写了各类教材上千种；编纂整理了从团到集团军、方面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等教范教程 350 余种，使我军形成了分类恰当、层次适宜、配套成龙的科学的教材体系，为依法治训奠定了基础。当前，以军事训练条例为“龙头”的法规体系已基本完善，应该说规范训练的法规都有了，但为什么还出现训练的盲目性、随意性？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有法不知，一是执法不严。为此，要先把训练法规学好弄通。刘伯承曾指出，温习的主要目的在于熟悉，练习的主要目的在于熟练。学法亦如此。学法是知法的前提，其目的在于深知、熟知训练法规，把法规的要求化为组训者和受训者的自觉行动。目前，应着重搞好训练法规的再学习、再教育。一方面要加强对问题的解剖分析，充分认识依法施训和依法治训的重要性，激发广大官兵学法知法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通过集训等多种形式，让广大官兵真正熟悉和掌握各种训练法规的基本内容，为依法施训和依法治训打好基础。

二是要善于运用法规来指导训练实践。运用规定、制度、条令等来指导、统一、规范部队的训练工作是刘伯承从严训练的基本手段。30 年代末，他就战斗间隙组织部队整训问题从教育训练

的重心、方针、组织、时间、方法等多方面作了规定。并据此认真组织训练。如师、旅、团轮训队要各有侧重，师轮训团干部，时间两个月；旅轮训连排干部，时间一个月；团轮训班长、小组长，时间半个月等等，并以此指导，认真组织训练，对于提高战时训练质量发挥了重大作用。50年代初在他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刘帅坚持以“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所明确的院校训练的目的、方向、内容、方法和要求为依据，从严训练，规范施教，使院校的教育训练提高了一大步。实践证明，运用法规指导训练是科学高效的。就目前来说，学好法规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在于自觉地运用法规来规范和指导训练工作，提高训练质量。当前，加强训练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就是要以《军事训练条例》、《训练大纲》和训练工作的“三个规定”（训练计划规定、考核规定、登记统计规定）等为依据，结合各自的任务和上级要求拟制训练计划；认真贯彻落实训练法规规定的训练内容、程序、方法、步骤和标准，不漏训，不偏训，不走过场，扎扎实实地抓好军事训练工作的落实。

三是要加强执法监督，严格训练奖惩。刘伯承认为：“好的例子必须在训练中表扬，从组织上奖励。奖罚严明，是军队的命脉，不可丝毫忽视，忽视就会削弱部队”⑮。因此，各级都要十分重视训练奖惩，把加强执法监督，作为解决训练随意性大、质量不高等问题的重要措施。为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各级党委、首长要亲自抓，适时组成由首长挂帅、训练部门人员参加的训练督查组，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训练执法监督。各级司政后机关要形成合力，把监督训练执法当作份内的事，努力形成一个人人管、大家抓的执法监督环境。在执法监督中，要特别强调法规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执法好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奖励，对于执法不力者要给予批评，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要追究领导责任。确使训练法规落到实处，保证和促进训练质量的提高。

四、循 规 律

遵循训练规律，自觉按训练规律办事，既是提高训练效益，实现训练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客观要求，也是刘帅一贯坚持的训练原则。实践证明，认识这一点并不难，要做到这一点却必须具有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能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然而，由于各职各类人员对训练法规认识和行动上的差异，事实并非如此。目前，不按训练规律办事，甚至违背训练规律的问题还时有发生，有的不按操作规程办事，导致训练事故发生；有的凭想当然，凭兴趣抓训练，导致偏训、粗训、漏训，训练效益低下；有的不讲科学，盲目蛮干，结果事与愿违。因此，提高新时期军事训练质量必须切实提高对训练规律的认识，增强按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1、要在训练实践中不断认识训练规律。刘伯承认为，训练规律往往要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能发现和认识。他曾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战术、技术就是要研究，要发展，要创造，然而不专就不能精通，不熟练就不能生巧。"⑯可见，对训练的研究、发展、创造的过程，既是训练实践的过程，也是揭示、认识和遵循训练规律的过程。然而，规律是发展的。为此，刘伯承又强调，认识规律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理论上，而是要深入下去，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在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把握训练规律的实质，从而使自己成为驾驭训练规律的主人。对此，目前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对训练规律的认识还不够，遵循训练规律缺乏主动性，由此使许多该落实的制度挂了空档，严重制约了训练质量的提高。由此可见，遵循训练规律，首先要认识训练规律。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在实践中验证和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要善于运用为我所认识的训练规律来指导训练实践，以增强遵循训练规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努力求得认识规律与实践规律的良性循环，不

断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训练工作，确保训练质量不断提高。

2、要按规律办事。训练规律同其它规律一样都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刘伯承在指导训练实践的过程中，一贯坚持按训练规律办事：一是强兵先强官，他多次强调，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训练质量要上去，干部的训练质量首先要上去；二是练多于训，要求在通过“训”教给理论、要领的基础上，更主要的是靠“练”来巩固、提高训练质量；三是专才精通，“熟能生巧”，要求将技术练成如用筷子吃饭那样，要吃那一块就夹那一块；四是循序渐进，要求先教单人到班的动作，由低到高，由易到难，逐步深化；五是先技术后战术，要求首先练好技术，在此基础上再练活战术。刘伯承的这些训练思想，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训练的客观规律。事实表明，什么时间遵循了它，训练就发展，质量就提高。提高新时期部队的军事训练质量，同样需要很好地、自觉地按训练规律办事，当前，要着力解决好违背训练规律的问题：如部分干部的训练素质不如战士的问题，“两严”训练方针贯彻不够得力的问题，训练指导思想不够端正的问题，训练监控不力、奖惩不严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同按规律办事，提高训练质量的客观要求都是不相符的，必须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提高新时期部队训练质量的重要一环，抓住不放，一抓到底。

3、要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刘伯承认为，无论是遵循什么规律都要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否则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遵循规律。训练是这样，作战亦是这样。在1948年7月举行的襄樊战役中，指挥攻城的我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提出了一反常规的“撇山攻城”方案，报到野司后，刘邓首长立即予以批准，刘伯承司令员还高兴地说：“这个王近山，真是好样的！襄阳已在我掌中了。”⑰事实确是如此，王近山指挥的六纵部队按计划胜利地攻克了战略要地襄阳，并使襄樊战役成为闻名全国的五路大捷之一。由此充分说明了遵循“水无常型，兵无常势”的作战指导规律，是夺取战役

胜利的重要因素。对此刘帅倍加赞赏。这是因为，规律是客观的，但遵循规律则是主观的，有时是不情愿的、被动的。因此，刘伯承十分强调，要不断改造思想，发挥主观能动性，适应规律的要求。他认为，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遵循训练规律要防止三种倾向：一是不可死啃教条，犯本本主义的错误。倡导到训练的实践中去学习理论应用理论。他曾指出："战术仅知原则，而不能在各种情况中作实地的熟练演习，特别是实战的锻练、发展，也是空口说白话，无补于事的"⑱；二是不可闭门造车，犯主观主义错误。他说：训练工作必须切合实际，必须非常熟练。要发扬军事民主，在群众性练兵热潮中不断攻克重点，难点，弱点。三是要严格按制度办事。他强调，训练制度是我军训练经验的结晶，是训练客观规律的体现，只有在制度内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是有益的，高效的。在新形势下，提高军事训练质量也同样需要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广大官兵的主观能动性都发挥出来了，才能把规律化为促进训练质量提高的"活"力，才能不断把新时期的军事训练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参与本文执笔者　林墩玉少校）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284、第 322、第 293、第 293、第 519、第 519、第 99、第 443、第 225、第 97、第 489、第 203 页。

⑬《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346 页。

⑭⑮⑯《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634、第 347、第 284 页。

⑰《一代战将》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3 月版，第 17 页。

⑱《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284 页。

学习刘帅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的思想 着力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

姜福安　少将

刘伯承元帅在七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就如何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论述，也有不少成功实践。其思想核心，就是要坚持以实战需要为指导，针对作战对象的规律和特点而练，突出实战所需的训练内容，运用紧贴实战的训练方法与途径，不断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运用、坚持和发展刘帅这一训练思想，对于贯彻落实军委提出的战斗力标准，不断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是刘帅教育训练思想的精髓，也是他抓军事训练的一大特色。和平时期军事训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练为战思想，瞄准未来战争需要，坚持以实战标准组织、指导和检验训练，切实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

早在1932年，刘帅就提出红军的训练和红军学校的教育，要从实战出发，根据目前红军的编制、装备、作战对象、地理条件及在数年游击作战中得到的宝贵经验来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始终坚持用战争的尺度，用鲜血和生命的尺度去衡量训练，强调以战教战，为战而练，以战促训，充分利用战斗间隙结合实战需要进行训练。刘帅的教育训练理论，具有鲜明的“实战化”特色，他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军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刘帅提出：要总结我军战争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用于指导教育训练。他还先后三次派出见习团，到朝鲜前线见习

取经，运用实战经验指导训练。强调“军队的平时训练教育，亦是作战的准备”①，并十分重视实兵演习，认为国家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必须依靠实兵演习的经验以代替实战经验”②，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军事训练，是对军事训练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必须在部队上下形成为战而练的共识。“实战化”训练，是战争对军事训练的客观要求。训练和作战是军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军事训练从来就是以战争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的，当今世界的军队，无不把它作为军事训练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是现代战争条件下，我军要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更应在“实战化”训练方面寻求优势，确保在未来战争中以劣胜优。“实战化”训练，是我军履行职能的需要。我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稳定的神圣使命，在当今世界地区性冲突不断，我国周边并不太平，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和实力政策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更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实战化”训练，提高部队应变能力和实战能力，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制止、直至赢得未来战争，确保不辱使命。“实战化”训练，也是改善部队训练现状的迫切要求。近年来，部队军事训练质量呈上升趋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训练的实战气氛不浓，练为看、练为考；把安全强调到不恰当的位置，避难就易，消极保安全；训战脱节的现象，在部队中不同程度存在。各级领导机关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经常性教育，在部队中重新叫响“练为战”的口号，使广大官兵自觉坚持训战一致和从难从严原则，努力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不断提高部队的实战水平。

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必须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锻炼部队。未来战争对部队战斗作风和作战能力要求极高，只有在平时尽可能贴近实战进行训练，使部队经常置身于实战般的环境，接受战斗般的洗礼，提高实际作战能力，战时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创造近似实战的训练环境，一要有意识增大训练的难度和强度，力求

利用夜暗、酷暑、严寒等不良天候条件，设想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摔打部队，做到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二要结合作战任务，在预定的作战地区，选择相似的地形，采取紧急出动的形式，把部队拉到野外，完成规定的训练课题，强化适应性训练；三要广泛运用对抗训练的方法，充分发挥模拟分队的作用，使训练象实战那样，"对"的起来，"抗"的激烈，增强实战感；四要充分运用各种先进手段，模拟战场环境，增强训练的实战仿真性，提高部队训练效益。

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必须严格用实战标准检验部队。实战，是衡量部队训练的唯一尺度，正如刘帅所说，"实战战场上的胜败即是测验我们教育工作成绩好坏的试金石"③。为此，一方面要以实战为标准，制定军事训练的评估标准，要坚持用具体、量化的评定标准，评估部队训练，不随意降低训练标准和条件，摒弃任何虚假、漂浮的东西，使训练的考评更接近实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坚持依"法"考评的基础上，各部队要根据部队的任务和训练基础，坚持从严从难检验部队的军事训练，技术训练突出在复杂、恶劣环境条件下的应用考核检验，战术训练把走、打、吃、住、藏、防、管、保等内容串起来进行综合检验，以促进军事训练更接近于实战需要，切实使为战而练落到实处。

（二）重视研究敌情，善于摸透对手，敢于以敌为师，是刘帅组织指导训练的重要前提，也是他指挥作战屡建奇功的重要"秘诀"。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必须十分重视研究作战对象，通过客观、全面、跟踪、分层、反制性研究，不断增强军事训练的针对性和抗争性。

指挥打仗，必须"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军事训练，只有熟悉作战对象，树立一个活生生的对手，才会有针对性和抗争性。这两方面，刘帅都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刘帅指挥打仗十分重视研究掌握敌情，把它作为"五行术"中的要素之一。他

说，“要研究打胜仗的办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才会有依据”④，打仗弄不清敌情，就是“狗戴砂锅乱碰”，“每一军人都应该把侦察勤务当作人民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看待”⑤。为此，刘帅指挥打仗，花心血最多的是了解、掌握和研究敌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尽管工作十分繁重，仍然千方百计了解敌情，注意从敌人的情报、俘虏的口供、缴获的文电中寻找资料。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走访国民党军将领，了解有关敌情。对获取的情况，刘帅都能以求实的精神，敏锐的眼光，惊人的洞察力，作出客观、详细、透彻的分析研究，进而摸透敌人，指导训练和作战。如在渡江作战前，针对敌人防守部署，研究了如何编排大小船只展开战斗，组织实弹射击训练。刘帅不但重视研究敌军，而且敢于以敌为师，从“对手”的作战和训练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抗日战争中，他要求把日军的条令、教令作为“第二种教材”，号召大家精细研究日军战法，结合实际训练，以寻胜敌之道。全国解放后，刘帅仍然十分注重对未来作战对象的研究，他批评了那种不重视敌情研究的错误倾向，反复强调要精细地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并重视研究总结抗美援朝和中印边界冲突的作战经验教训，以指导和促进学院的教育训练。和平时期，不直接与敌接触，对作战对象的掌握、了解比较困难，必须加强对作战对象的研究，以增强军事训练的针对性和抗争性，为此：

要客观研究作战对象。对作战对象的研究，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偏见，以准确把握作战对象的特点，进而为训练树立一个真实的对手。在此，应注意防止两种偏向，一是放大“对手”。瞄准“强敌”而练，立足复杂情况是对的，但对作战对象不能想当然地任意“拔高”，只看到作战对象的优势，看不到其弱点，不研究以长击短的办法，盲目迷信敌高技术武器，甚至产生“恐高症”，觉得作战对象什么都先进，我们什么都落后，结果，束手无策，丧失信心；二是贬低“对手”。树立必胜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对的，但不能任意夸大作战对象的弱点，对

其优势认识不足，把敌人想象得不堪一击，只需要用现成的几招，就可“克敌制胜”，这实际上是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这两种偏向都是设“假”敌而练，很可能把军事训练引入歧途。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现实，既不夜郎自大，又不妄自菲薄，实事求是地分析对方，锲而不舍地研究对策，切实为战备训练提供可靠依据。

要全面研究作战对象。一方面，对主要作战对象，要进行全面研究。既要研究它的作战思想，也要研究它的训练思想；既要研究军事，也要研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相关因素；把诸方面情况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把作战对象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去系统研究，以求全面、准确地把握对手，防止以偏概全。另一方面，既要重点研究主要作战对象，也要兼顾研究潜在作战对象。和平时期，主要作战对象相对模糊，今天的朋友，很可能是明天的敌人，今天的潜在作战对象，很可能就是明天的主要作战对象；从现代几场局部战争看，作战对象也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为此，研究作战对象的思维要拓宽，不能只局限于研究一个作战对象，也要注意研究次要、潜在作战对象。这样一旦有事，就可从容应付，而不至于措手不及。当然，类似研究要讲究策略，加强保密，不宜渲染，根据具体情况，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级别中进行。

要跟踪研究作战对象。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战对象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对作战对象的研究必须保持连续性。正如刘帅所说，“要经常思索可能的敌情变化，绝不能总是用一个战术来对付敌人”⑥，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发展变化迅猛的形势下，加强对作战对象的跟踪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就近几年作战对象研究看，热一阵、冷一阵，搞一阵、放一阵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断续性研究是十分有害的，既容易淡化官兵的敌情观念，也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被动，难以将研究引向深入，这也是我们一些部队至今仍在使用一、二十年前的敌军资料的重要原因。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

度重视。

要分层次研究作战对象。对作战对象的研究要区分层次，各有侧重，不能上下一般粗。战略、战役层次可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分析研究作战对象；师以下则应主要研究作战对象的编制装备、战术技术特点，没有必要组织基层官兵也去研究作战对象的战略、战役等高层次问题。研究的方法也应有所区别，较高一级的领导机关，应加强对作战对象的情况掌握、分析预测，则重于理论性；团以下部（分）队，则应加强应用性研究，则重于实践性，采取渗透性方法，把作战对象有关情况化整为零，溶入具体课目训练之中，在训练中熟悉、把握作战对象。

要反制研究作战对象。研究作战对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得出胜战之策。为此，在研究作战对象中，要善于分析其技术、战术上的强点和弱点，并研究相应的对付办法。比如，对方先进的坦克、飞机、夜视器材等有哪些特点，哪些弱点，我们应如何打击它们；敌人的战略空袭和“软杀伤”有哪些特点，我们应如何立足现有条件，着眼可能发展，去有效对付它们；敌人的战役、战术有哪些特点，我们如何避强击弱，如何创造敌人弱点，如何克敌制胜，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作战对象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强调“现实战术”，重练实战所需，求得“战教合一”、“学用一致”，是刘帅教育训练思想的特有风格，也是他求实作风的具体体现。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就必须科学规范训练内容，在基础与应用、全面与重点、按纲施训与针对施训的结合上练精兵。

战争需要什么，军队就练什么，是刘帅的一贯思想。在七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始终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突出实战所需的训练内容。在长征途中，他着重训练部队隘路战斗、夜间战斗、强渡江河和打骑兵的战术等，强调要以中国革命经验为

主，“创编”红军的军事教材；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侧重训练部队急需的游击战术，并把“现实战术”作为军事训练的基本内容，要求紧紧围绕当时的“现实”进行训练；进入解放战争后，刘帅对练兵内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在《大家发愤整军练兵》一文中指出，“我们练兵的课目内容必须使野战军、步骑炮工兵、地方部队、人民武装等各种不同的部队，‘有的放矢’，力求适合于在今后保卫边区群众性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各种不同任务的需要”⑦；全国解放后，他倡导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勇于创新，要求总结过去战争的经验，吸收外军的先进思想，以指导我军的教育训练，并十分强调认真探索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高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刘帅的这些思想，对指导我军的教育训练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练实战所需，应做到基础训练与应用训练相结合。刘帅指出，“部队训练要狠抓基础训练，要练硬功夫”⑧。近年来，我军上下普遍重视抓好基础训练，促进了全军军事训练的发展，用实践证明了加强基础训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但重基础、轻应用的现象比较突出，如应用射击、夜间爆破、现地识图用图等，落实情况就比其它训练课目要差，制约了这些单位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影响了部队实际作战能力的提高。究其原因，客观上应用训练的组织实施难度较大，但关键是主观原因，练为看、练为比的思想在作怪，避难就易，“偷工减料”；一些便于考核、竞赛的课目超占训练时间过多，应用训练只好草草收兵。要改变这一现状，应在树立“练为战”思想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应用训练较接近实战的特点，是提高实战能力的重要环节，增强从严落实应用训练的自觉性；制定“硬性”措施，落实应用训练的内容和时间；按规定落实考核制度，困难再多，难度再大，也要按纲施考，以考促训，确保应用训练的落实。

重练实战所需，应做到全面训练与突出重点相结合。所谓全面训练，就是按训练条例、大纲要求落实规定的训练内容，进行

全面、系统的训练，使部队掌握未来战争必需的各种战术、技术；突出重点，就是突出实战中常用的、起关键性作用的内容，将这些内容训够、训足、训过硬。全面训练与突出重点并不矛盾，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就当前部队的实际看，我认为应主要突出以下三方面内容：一要加强“三实”训练。实弹、实爆、实投训练，是最接近实战的训练内容，也最能锻炼和摔打部队，必须长期坚持，抓好落实。当前部队“三实训练”要克服两种偏向，一是怕打（爆、投），消极保安全，不训或少训“三实”内容，二是滥打（爆、投），只图热闹，不讲效益，部队实际锻炼不大，造成训练上的大浪费。二要加强合成训练。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已成为衡量现代军队战斗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加强合成训练，应在打牢共同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进行，按实际作战中可能的战斗编成，采取分级控制，同步施训，逐级合成的方法，逐级形成战斗力。使训练逐步向实战化的层次过渡，不断提高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三要加强战法研练。刘帅认为，“打胜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士气，一个是打法”，“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⑨。我军要在未来战争中“以劣胜优”，必须十分重视战法研练。就当前部队战法研练的现状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与实际结合不紧，缺乏新意，重点不突出。必须紧密结合敌我双方实际，紧紧围绕实战需要，研练实战中管用的战法；必须在敢于创新上下功夫，在传统战法上求突破，在研究敌军中找对策，在借鉴近期局部战争中寻新招，不断研究出克敌制胜的新战法；必须在突出重点上下功夫，要突出本级、本层次内容，突出可能担负作战任务的内容，突出当前急需解决的内容。

重练实战所需，应做到按纲施训与针对施训相结合。部队在按纲施训的前提下，还应结合可能担负的任务，突出作战所需的内容。海湾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实施“沙漠盾牌”、“沙漠风暴”、“沙漠军刀”行动，重要原因得

益于平时结合实战任务进行了相应的模拟训练。我军要保持随时应付局部战争的能力，更必须强调结合预定作战任务进行训练。针对作战对象的特点，结合可能担负的任务，选择战区相近的环境，设想多种复杂情况，突出实战所需的内容，强化适应性训练和快速反应训练，不断提高部队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四）“以战教战”和实兵演习，是刘帅十分推崇和擅长运用的训练方法，他认为实战是最珍贵的“教材”，而实兵演习是和平环境“训练军队收效最好的方法”。按实战要求训练部队，就必须力求采取紧贴实战的训练方法与途径，加强战例研究，突出对抗性和检验性演习，努力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

以战教战，认真分析研究部队作战中的经验教训，用以进行再教育，再训练，是刘帅深化部队教育训练的一个重要方法。刘帅认为，实战对于部队是最实际的锻炼和训练，对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锻炼部队的作风，都能起推动作用。指出，“最普遍最快的是在战争中学习的问题。战争中学习最重要”⑩。要求老干部要亲自给青年干部讲我军战史、战例，青年干部要向老干部学习战史上的经验。为了以实战促训练，他非常重视战斗总结，要求“每一行动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是军事的或政治的，都应拿出来讨论，作出正确的结论”⑪，组织自下而上的总结，并把作战总结看成是“活的极有实效的教育”⑫，把经验教训视为极为珍贵的教材，用以教育部队，指导作战，打一仗进一步。为深化以战教战的效果，他还经常结合实战组织实兵演习。如在百团大战以后，为了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各级指挥员在实战中取得的经验，他还把一二九师部分参战部队，拉到原战场再次摆开，进行战术研练，使部队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受到更深刻的教益。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刘帅“以战教战”思想呢？我认为，首先要深刻认识“以战教战”在和平时期训练中的特殊意义。和平时期，从

战争中学习，已从过去直接学习为主，转变为间接学习为主，唯其如此，部队特别是各级军官，加强战例学习研究，从中认识战争，拓展视野，吸取营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就目前实际看，战例研究还是个薄弱环节，各级对这些“活”的教材重视不够，不少指挥员头脑中装有的完整战例并不多。这样就难以深入掌握战争的规律和知识，对未来的指挥打仗也大为不利。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其次，要有选择地学习研究战例。古今中外的战例十分浩瀚，必须有选择性地学习研究，选择那些最典型的、最有价值的、与我军实际接近的战例，进行认真的学习研究，研究要突出重点，防止贪多求全，浮在面上。即要研究成功的战例，也要研究失败的战例，因为血的教训往往更发人深省；要以研究我军战例和近期局部战争为主，以研究外军战例、早期战例为辅，因为我军战例更接近部队实际，而近期局部战争反映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再次，要结合实际学习研究战例。战例研究要结合作战任务、我军现有条件、部队训练课题等实际进行，通常把战例研究溶入合同战术战役训练之中，结合理论学习进行，着重分析胜负原因和经验教训，研究谋略运用。

刘帅教育训练部队的另一重要方法，就是十分重视实兵演习，强调通过各种不同演习，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刘帅认为，“战术仅知原则，而不能在各种情况中作实地的熟练演习，特别作实战的锻炼、发展，也是空口说白话，无补于事的”⑬。并指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如国家长期处在和平的环境，必须推进国防建设而无法吸取战场经验时，就必须依靠实兵演习的经验以代替实战经验。这是训练军队收效最好的方法。”⑭他要求学员必须学会实兵演习的训练方法，“进而求得在全军中开展。”⑮自 1951 年到 1955 年，他曾多次亲临现场，组织指挥军事学院实施了 35 次实兵示范演习⑯，提高了广大中高级干部组织指挥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如何紧贴实战抓好部队的实兵演习呢？我认为，一要结合敌我双方的实际，体现现代战

争特点。实兵演习是直接为提高部队现实作战能力服务的，因此，演习要符合敌军特点，立足我军实际，体现我军现阶段作战原则，通过多种手段，把部队摆在现代战争的景况中进行演练。二要突出协同训练和战法研练。刘帅指出，“协同动作得好、就可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⑰，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必须特别重视，应从连战术开始，各兵种就要捆在一起，逐级训练，逐级合成；要注重把战法研究成果，置于实兵演练中加以论证和检验，并通过演练转换成部队战斗力。三要多搞检验性和对抗性实兵演习。实兵检验性演习，是一种不交原案、不搞预演，多课题、多情况、多地形，昼夜连续实施的演练形式，具有实战化、高难度、高强度、综合性的特点；实兵对抗演练，是双方以交战方式，实施针锋相对、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演练形式，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抗争性和实战感。组织对抗性和检验性演习，更贴近实战，更有利于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应力求广泛运用。

注　释

①③⑤⑦⑩⑪⑫⑬《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444、第 619、第 63、第 442、第 489、第 51、第 51、第 284 页。

②⑧⑭⑮⑯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杂志 1991 年第 3 期，第 31、第 32 页。

④⑥⑰《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6 月版，第 65、第 96、第 140 页。

⑨《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7 页。

浅论刘伯承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和理论

尚全孝　大校

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殊死博斗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对和平时期，无处不闪烁着刘帅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的光辉。他是我军军事训练工作和院校教育工作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为创立和发展我军的军事教育训练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做为一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刘帅善于结合作战、训练、教学的实际，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提炼和升华，形成自己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和理论体系。

(一)

刘帅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和理论，是他在长期从事军事教育训练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刘帅最早接触军事教育训练活动是在青年时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四川万县参加了革命学生军，受到了比较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刘帅对军事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具有浓烈的强兵救国思想。1912 年，为了深入钻研军事，刘帅考入"陆军将校学堂"，接受更为系统的军事学习和训练。半年后，刘帅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先后历经讨袁、护国、护法、讨吴等诸役，在带兵作战的实践中，刘帅对于军事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没有训练的军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没头的苍蝇，临战东闯西碰，四零五散，各不相顾，没有不失败的"①。因

此，他治军一向以重训著称，有“川中名将”之谓，他带的部队也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全川。1926年刘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也开始了他无产阶级军事教育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活动。先后参加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和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委托赴苏学习。在留苏期间，他发奋攻读，力求“精通军事以报祖国”②。1927年冬，刘帅在苏联写下了《南昌暴动始末记》，文中对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特别值得汲取的教训是缺乏军事人才，“我军内大半非同志领导，而无政治认识的部队，且训练能战的亦不甚多，因此无收指臂效果的可能”③。所以，他非常重视“党员军事化”④的问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召开，会上刘帅在《军事问题补充报告》中明确提出“党员军事化”⑤这一问题。刘帅认为，共产党人要想赢得暴动胜利，取得革命政权，就必须武装工农、领导工农，人人都要重视军事、学习军事，他说“苏联现在是已经革命成功的国家，……尚且都是非常注意军事设备与训练”⑥，中国共产党“暴动前之武装工农，乃至暴动后之建立红军，在在需要军事人材，若不就此时急急的利用中国军阀军官学校、国外兄弟党及其它公开或不公开的军事组织，以学习军事，则将来革命前途必蒙大多的不利”⑦。就暴动所需学习的军事内容，他指出：1、学会使用现代武器，射击、投弹以及旧式的刀矛；2、现代条件下的战术；3、暴动的策略。在这里刘帅明确提出了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人民军队，就必须培养和训练一大批懂得军事的干部，如果没有通晓军事的人才，革命军队就无法建立，革命也就无法成功的思想。

回国后，刘帅先是在军委工作，后进入苏区创办红军学校并任校长，旋又任红军总参谋长，后还兼任第二、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期间，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斗争的基本理论和当时红军作战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红军作战、训练和进行军队教育的正确主张和建议。在部队训练方面，由于当时战事频繁，刘

帅提出“以战教战”，运用实战和作战间隙来训练部队，并运用实战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来教育部队等思想。1934 年 5 月，他写下了《现实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翌年 10 月写下了《当前的隘路战斗》，1936 年 9 月又写下了《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等文章。在这些文献里，刘帅针对实际系统地提出和解答了当时红军部队作战训练中存在和亟需要回答解决的问题，从司令部工作到部队的具体战斗动作、战术原则，从部队的教育训练到指挥员的培训、培养和实施指挥，无所不论其及。例如，他要求官兵要熟练掌握手中武器，不断提高军事技术。他说：“射击的准确沉着，格斗的熟练骁勇，无论在任何战斗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⑧。在此基础上，他还要求部队掌握“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⑨。尤其应掌握侦察、警戒、夜间动作、袭击、攻击、协同、防御、伪装、设障、机动、转移、撤退等手段，不断提高实战能力。此外，刘帅还提出要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教育，指出“我们教育红军部队，不单要训练他们成为英勇善战的战士”⑩。而且还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从政治上保持红军部队思想的一致性。在创建红军教育训练机构方面，他要求各级都要办随营学校、教导队、轮训队，以培养和训练指挥员。在任红军大学校长期间，对红军各级院校和教导机构的办学指导思想、方针、培养目标、教员队伍建设、训练原则、学习内容、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都有明确的论述。他强调各级训练机构要从战争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提高学员军事技术、战术、指挥艺术的同时，还要重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他还注重教员队伍的建设和教学方法的改进，重视结合实际编写和翻译教材，重视运用想定作业、现地教学、现地演习，使学员在军政文体等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刘帅出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期间，军事斗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针对时局的发展变化，刘帅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也随之在发生变化，

且有新的发展。刘帅依据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战争实际，提出八路军的教育训练“要在游的空隙中来实现政治工作和军事教练”⑪，军事训练要“着重于现实的抗日战术与技术，力求其进展，而不是制式教练”⑫。要求官兵使用武器的准确与熟练程度必须超过敌人，尤应练好射击、刺杀、投弹等。强调技术是战术的基础，良好的训练素质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他说“无论现代新式武器——飞机、坦克、化学兵器、新式火炮、机关枪之类，怎样精良到了不得，总是死的，都要靠活的人来使用；如果人的质量（包括政治的、军事的与纪律的训练和素养）不强，那么只有打败仗”⑬。

解放战争时期，刘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等职。在这一历史时期，刘帅对于军事教育训练问题的论述和探讨更加广泛。刘帅将训练问题作为建军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看待，他认为训练是为赢得战争胜利而进行的必要准备，任何轻视这一准备的思想都是危险的和要不得的。他强调训练要突出重点，实事求是，学用一致，各级军政首长，尤其是军事指挥员要亲自动手，制订训练和教学计划，真抓实干，切实担负起练兵的责任。各部队要抓紧少而扼要的课目，结合实物，实地苦练。采取先个人后整体的办法，切实掌握射击、刺杀、投弹、利用地形地物、夜间动作、土工作业、城市村落战斗和野外机动等技术战术。干部还要在此基础上掌握一点少而扼要的、本职的、现地的战术作业，防止贪多无得、大而晃之、舍本逐末、光训不练。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要抓紧一切时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练兵，一面战斗，一面训练，以战教战，战教合一。

建国以后，党中央提出要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这在我军建设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自1950年起，刘帅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政委等职务。这一时期，刘帅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军

的军事教育训练事业中去，不断地探索、回答我军教育训练出现的新问题，总结和整理我军过去教育训练的经验教训，因而使得他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和理论更加成熟和完整。这一时期他在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和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部队和院校教育训练的方针、目的、内容等。在军事教育和训练工作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军先进的办学和训练经验；组织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建设和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军事教员队伍，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旧军官出身的教员为新中国服务；积极开展合同作战的训练和研究，并在院校中陆续开设了海、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系，为我军各军种、兵种指挥院校的建立和形成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军队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二）

刘帅在军事教育训练领域建树颇丰，他的思想和理论内容博大精深，十分广泛，涉及到军事教育训练理论的方方面面，本文只侧重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军事教育训练的指导思想。刘帅在长期的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实践中，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并结合实际加以运用、阐释和发展，对我军的教育训练指导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他认为我军的教育训练必须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乃是人类最高智慧的体现，乃是放之四海面皆准的科学”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说明世界的科学，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

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军事思想”⑯，“紧密地结合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情况，建立了人民武装，确立了建军传统与军事思想，制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建立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⑰，等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是我军作战训练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因而，我军的教育和训练就必须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并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来研究指导战争的艺术，研究军队教育和训练的规律、原则和方法，解决军队教育训练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才能保证我军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始终能够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关于军事教育训练的目标。教育训练的目标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训练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决定着教育训练的制度、内容、方法的确定和选择。我军是新型的人民的军队，因而我军培养和训练出的官兵，就应该是具有精湛的军事技能、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的合格军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刘帅都始终围绕这一目的，来制定军事教育训练的目标。红军时期，刘帅要求通过教育训练使红军官兵具备基本军政素质；专设训练机构要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顽强战斗作风、懂得一定技术战术、会指挥作战的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刘帅则强调要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战法，成为合格的抗日军人。解放以后，刘帅提出的培养目标则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业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成为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的新型革命军人。

关于军事教育训练的原则。教育训练的原则是根据军事教育训练目的、任务和训练过程中的规律提出的所必须遵循和依据的要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和建国后的相对和平时期，刘帅根据

毛泽东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结合我军军事训练和教育的实践，总结和提炼出一系列教育训练原则。(1)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原则，刘帅将这一理论原则运用到教育训练领域，强调"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早在红军时期，刘帅就提出红军部队和学校要本着"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⑱的原则进行训练和学习。刘帅一贯认为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他常说不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理论，不同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是瞎实践。他还提出了教育训练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具体办法：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必须使有工作经验的与有书本知识的结合补课，各向自己所缺乏的方面发展，首先就要使文化与武备结合才便于理论与实际结合；必须使院校与部队密切结合，我们为战争所需要的东西而训练干部，又为军队所需要的干部而训练学员，只有打通院校课业与部队实践相联结的道路，才能使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尽可能与实际战争相联系。(2) 军、政、文并重的原则。刘帅认为军事知识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必备本领，政治思想觉悟等则是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而文化科学知识又是打开教育训练大门的一把"钥匙"。因此，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解放以后，刘帅在教育训练中，总是坚持这一原则，既重视提高官兵的作战技能，又注重提高官兵的政治素养，使官兵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同时还注重开展文化科学教育，全面提高官兵的素质。(3) 精讲多练、练多于训的原则。刘帅针对我军官兵实践经验较多，理解力较强，但文化知识不高的情况，强调在教育训练的方法上贯彻练多于训的原则，即干部、教练员要少讲、精讲，战士或学员要多作业、多练习、多实地运用，通过练和用来理解、掌握和消化理论，以求得融会贯通，熟练运用。(4) 从实战出发，作战、训练、教学一致的原则。刘帅认为，战争的要求，就是训练的最高目标。军事训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因而训练的目的必须要与训练的效果相统一。刘帅历来强调训练教学要与实践相适应、相一致，仗怎

么打，兵就怎么练；战争需要什么，部队就训练什么，以求以训学战，战训一致。（5）以干部训练为重点的原则。在刘帅长期的教育训练实践中，始终坚持和贯彻了这一原则。刘帅认为，干部决定一切，故教育训练的重点应放在干部身上，而且要用多种办法训练干部。干部提高了技术和战术，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才会进步。因为部队的训练和教育，要通过干部的组织实施才能实现。因此，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不管条件怎样困难，刘帅都坚持办院校、办教导队、轮训队或进行短期集训，以培养和训练干部，始终把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放在部队工作的首要位置。（6）教学相长的原则。古人说过："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其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⑲。刘帅认为干部和教员不可能门门都通，也不一定样样都比士兵和学员高明，所以要提倡集体工作，大家实行互助合作，以提高学术水平，然后去教好学员和士兵。教员与教员、教员与译员之间也要互相学习，相互为助才能弥补各自的不足。干部和教练员也应向战士和学员学习，而士兵和学员更要向干部及教官学习，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关于军事教育训练的基本方法。为了提高我军官兵军政素质和作战能力，刘帅创造和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本文仅列举以下几个方面。（1）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战教战的方法。战争年代，我军不可能创办大量军事院校，培养和轮训干部。也不可能专门拿出大量时间训练士兵。因此，刘帅提出以战教战、战教合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一方面从战争实际和我军的战例学习，一方面向一般的军事理论学习。通过研究战斗中上级的命令和指挥，战后的总结讨论和伤亡评定，来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今后的作战行动。从自己的经验考证其中的结论，吸收有用的东西，拒绝无用的东西，创设自己所特有的东西。刘帅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得到课堂上收不到的效果。建国以后，刘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仍然组织学员到朝鲜战场去进行实地学习。（2）教

授法。刘帅认为，教授法是教育训练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 他在《目前部队工作报告提纲》中专门讲到教授法这一问题。他说教军事课对于初级干部应着重于实地演习，按着先讲大概，接着实做，然后讲评的顺序进行（小动作也可用沙盘进行）；对高级干部可在讲战术原则后，拟出想定，现场作业，为在短时间内教很多内容，对程度高者可作报告，并付讨论，或先让学员看书、临时指人作报告、大家讨论，报告人作结论，最后由授课人总结。（3）直观教学法。刘帅在教育训练中一贯倡导运用形象直观、通俗易懂、便于接受的方法进行教学。提倡使用模型、教具，增加学员和官兵的感性认识。他在教学中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例如在红军学校讲解射击学理弹道是曲是直这一问题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男孩挺着肚皮撒尿的图象，然后再从地球的引力，空气的阻力和射弹的运行轨迹讲开去。复杂的理论，通过形象的比喻，学员一下子就听懂了，而且都留下难忘的印记。（4）军事演习法。进行首长机关演习和结合实战的实兵军事演习，是刘帅组织教育训练的又一重要方法。他认为，战术仅知原则，而不能在各种情况中作实地的熟练演习，特别是作实战的锻炼、发展，也是空口说白话，无补于事。因此，只要条件许可，他经常组织不同规模的首长机关演习和实兵演习。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后，为了进一步深化各级指挥员在实战中取得的经验，他除了组织讨论总结外，还选择关家垴战例，把一二九师部分部队；拉到现场再次摆开进行战术研练，使部队官兵受到很大教益。解放后他在担任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期间，也曾多次组织学员进行现地演习。通过演习，提高指挥员协同作战能力和指挥水平。（5）军事民主练兵法。军事民主练兵法是我军创造并得到毛主席肯定的练兵方法，也是刘帅在部队教育训练中一贯采用的方法。练兵中，他既强调官教兵，指出各级指挥员既是指挥官又是教官，对部队要切实教育，言传身教，率先垂范，不能象痞子捉强盗，坐着喊。同时还倡导兵教官和兵教兵，调动士兵的积极性。他说练兵只有造成群

众性的热潮，才能实现教育训练的真正目的。(6) 经纬交织、螺旋上升的方法。刘帅把军事教育和训练看作是教和学的双边活动过程，包括施训和受训两个方面。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双边活动，提高教育训练的质量，刘帅强调军事教学要按照“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技术，再作想定情况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兵种串联起来锻炼学员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战斗的能力，随后又由课堂到野外进行现场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证明理论原则”⑳的方法进行。概括起来就是“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编织起来、经纬交织，螺旋上升。”㉑实践证明，这一训练方法收效甚佳。

(三)

刘帅倾毕生之精力于军队的建设、作战、训练、管理和院校教育事业之中，勤奋探索，耕耘播种，著述等身。终至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完整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和理论。概括起来看，他的这一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和理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博学古今中外之军事学说，约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在治学时曾讲过“博学于文，约之于礼”㉒，刘帅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了“博而约”㉓的思想以全新的含义。刘帅曾说过：“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是身当其时，身当其事的”㉔。也就是说刘帅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都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并且结合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自己取得的经验教训，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理论。但刘帅在创立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理论的过程中，并不是背离毛泽东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的原理去另搞一套，创立什么所谓的纯粹的教育理论和训练理论，而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博学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理论，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他的军事教育训

练思想理论中，有些理论、原则、方法，就是毛泽东直接提出来的，他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的。有些则是毛泽东在其它领域提出来的而被刘帅创造性地运用到军事教育训练领域中来的。也有些是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自己去发明和创造的，但却仍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丰富系统，包含了军事教育训练理论的主要内容。如前所述，刘帅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不同的是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高级军事指挥员，而且又是一位毕生都在“教坛”耕作播种的军事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贯古今、融汇中西的大学问家。因此，他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和理论才能近乎完境，独领风骚，自成一家。刘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事实践中，为后人留下了各种军事文献 50 余万字、180 余篇，其中收入刘帅军事文选中的有 80 余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训练理论体系。基本上包括了军事教育训练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关于军事教育训练的基本理论原则，部队教育训练的理论，军队院校教育训练的理论。在刘帅的著述中，这三个部分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共同建构起了刘帅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理论的框架。其中关于军事教育训练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是这个理论框架中的最高层次。它包含了部队教育训练理论和军队院校教育训练理论的基本思想，对二者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和支配作用。而部队教育训练理论和院校教育训练理论则处于理论框架体系中的第二个层次，是基本理论和原则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延伸。

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但又通俗易通，是刘帅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理论的又一特色。刘帅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理论，包含着深刻的军事哲学思想和辩证法，包含了人类军事思想史的精华和中国古代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的精华，可谓是“承古今之所长，融中外于一炉”。但是，我们学习他的思想和理论却一点也不觉得深奥、玄妙、晦涩和难以读懂。相反，读起来却觉得是那样通俗易懂，那样便于掌握和运用。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帅有着深厚的军事理

论功底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渊博的文化基础知识。他对军事问题分析深刻，论述准确，而且语言精辟，简明扼要，思想性强，同时语言又生动活泼、幽默含蓄。他特别善于三言两语就把深奥的理论化作常理展示给人们，善于把玄妙的兵法化作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喻、俚歌谚语、四言八句和口诀在部队和院校中加以普及。例如，在谈到作战与训练的关系时，他说："须知没有平时很好的练兵，战时就不能很好地用兵，犹之人没有积蓄的钱，就无钱可用。"㉕使官兵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科学地揭示了军事教育训练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长期从事军事教育训练的实践中，刘帅尤其注重抓住带有本质性的和规律性的起恒定作用的东西，来加以研究和探讨，以揭示出教育训练的本质和规律。刘帅认为，我军的教育训练活动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战略为依据，根据战争的需要，对部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军事知识、技能、掌握现代作战的组织指挥和战法、培养顽强的战斗意志，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全面提高官兵军事素质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军事实践活动。这一实践活动是为战争进行的必要准备，因此，就必须要与战争的发展相适应，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只要战争和战争威胁还存在，这一实践就不能停止和削弱。军队的教育训练不能脱离经济物质基础而盲目发展，要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军事教育训练还要立足于现有的武器装备，照顾可能的发展，研究和寻求战胜未来作战对象的战法。军事教育训练必须要以全面提高军人的军、政、文几方面的素质，提高军队战斗力为标准；和平时期军队的各项工作必须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治军必须要先治校，等等。刘帅正是在充分认识、揭示和把握这些带有普遍指导规律的科学基础上，提出和解决了我军军事教育训练的指导思想、培养目标、理论原则、方法内容等理论问题，建立起了科学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理论体

系，指导我军的军事教育训练工作不断发展。

今天，我军的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和国际的环境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刘帅所阐述和揭示的教育训练领域的普遍规律没有变；当今社会战争和战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依旧是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学习研究和探讨刘帅关于军事教育训练的思想和理论，运用刘帅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理论指导和解决我军教育训练在当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　释

①《中国名家军事教育思想研究》海潮出版社 1991 年 1 月出版，第 58 页。

②《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出版，第 482 页。

③④⑤⑥⑦《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出版，第 21、第 41、第 42 页。

⑧《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6 月出版，第 366 页。

⑨⑩《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出版，第 42、第 66 页。

⑪《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6 月出版，第 367 页。

⑫⑬⑭⑮⑯⑰《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出版，第 99、第 104、第 644、第 645 页。

⑱《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出版，第 118 页。

⑲《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5 月出版，第 228 页。

⑳㉑《中国名家军事教育思想研究》海潮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出版，第 70、第 71 页。

㉒见《礼记·学纪》

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出版，第 618 页。

㉔《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 6 月出版，第 7 页。

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概论》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出版，第 131 页。

试析刘伯承军事教育训练思想

郭安记　上尉

刘伯承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极其重视人民军队的教育训练，关心军事院校建设和培养军事人才。他有关军事教育训练方面的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治军必先治校

刘伯承认为，军队要完成肩负的任务，必须要有良好的军政素质，而军政素质的提高又主要靠教育训练来实现。他常说，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没头苍蝇，临阵东闯西撞，四零五散，各不相顾，没有不失败的。刘伯承始终把部队的教育训练当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一贯坚持"治军必先治校"的主张，除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大力开展教育训练活动外，着重利用院校、教导队进行正规的教育训练。

追溯刘伯承的军事生涯，他"治军必先治校"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26年，他领导泸州、顺庆起义时，就在所属部队办过军政学校，亲自担任校长。在以后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他又分别担任过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原地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全国解放不久，他又担负了筹办军事学院的任务。当时身为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为把"治军必先治校"的主张普及全军，经军委批准，相继在学院中增设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系，负责培养军、兵种指挥员和专业干部。在这些系能单独地完成教学任务时，刘伯承又建议军委批准把系

扩大为独立的院校，从而，使我军具备了比较系统的院校训练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刘伯承上述思想和实践告诉我们，在任何形势下，提高部队战斗力都离不开严格正规的教育训练，办好军校是提高军事教育训练质量的关键环节，一定要把军校建设当作头等大事列入部队建设之中。

从第二炮兵的实际情况看，第二炮兵属高技术部队，武器装备的多数组成部分都是新技术、高科技的集合体，掌握并熟练地运用它，需要人们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技术水平，而这种知识、技术显然不能仅靠摸索、干中学所能掌握的，必须要通过系统的学习、训练，必须要有专门的教育、训练场所，因此，办好院校显然是无可争辩的事情。为适应中央军委赋予第二炮兵的任务，促进二炮早日实现“精干、有效”，应学习和发扬刘伯承“治军必先治校”的教育训练思想，在加强院校建设、提高办校水平上进一步下功夫；要把院校建设纳入二炮首长、机关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中；要有战略眼光，舍得对院校在人才上的投入和经费等方面的倾斜。

二、严格合理　全面培养

刘伯承对部队训练严格，合理施教，注重多方面素质的培养。针对指挥员军事素质有待提高的问题，刘伯承强调：“军队的平时训练教育，亦是作战的准备”，“没有平时很好的练兵，战时就不能很好的用兵”，他一向要求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必须加强训练，并担负起练兵责任。如1946年夏，国民党全面进攻即将开始时，为迅速提高部队的军事技能和战斗素质，鼓起练兵热情，刘伯承亲自带领本部高级指挥员打靶。为加强指挥员的军事修养，提高其战术水平和组织指挥才能，刘伯承除平时抓紧对指挥员的训练外，战前很强调统一战术思想和对具体战术的研究，

在战术上、指挥艺术上、谋略思想的运用上，采用理论指导、模拟见习等形式，尽快使指挥员提高到一定水平和掌握几种有可能马上就能用得着的方法，为战胜敌人奠定基础。

刘伯承非常重视通过军事院校使军事教育训练达到“严格合理、全面培养”。他坚持正确的办学方针、设置合理的教学内容、建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完善科学的教学手段。如在教材的组织上，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工作的几年里，尽管其他工作十分繁重，仍抽出专门时间，亲自抓基本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各个环节。他强调编写教材要少而精；要内容准确，用语科学，提法妥当，标点符号无误；用严肃态度和科学精神，编审教材和讲义。全国解放后，为使军事学院实现“训练与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的培养目标，刘伯承从细微处着手，重视全面实施教育训练：按照总参颁发的队列、内务、纪律等条令指导学院制订了适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必要规定，建立起各方面的正规秩序；组织学员参观见习飞机、火炮、坦克等兵器和工兵、通信器材，启发学员学习技术兵种知识的兴趣。他说，我们已经进入机器时代，部队机械化摩托化程度天天在提高，指挥战斗如同使用机器，一颗螺丝钉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全体；组织和帮助学员总结自己的实战经验，并多次派见习团赴抗美援朝战场体会和搜集作战经验，多次组织学院举行实兵演习，力争使学员在认识上，懂得现代战争和打游击是大不相同的；在技能上，具备现代战争指挥所需要的多种素质。

刘伯承对部队严格训练、合理施教，坚持军事、政治结合，重视文化学习和体能锻炼的光辉实践，促进了人才的全面发展，使军事教育训练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炮兵部队担负的特殊任务，决定了全体指战员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和付出较大的代价。要完成使命，需要指战员具备全面的素质。为保证二炮部队的“有效性”，必须认真贯彻刘伯承一贯倡导的“对部队进行军、政、文、

体素质全面培养”的教育训练思想，一方面努力提高学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拓展学员的知识面，增强学员的创新意识，并引导学员打牢为部队建设无私奉献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要努力强化实践环节，在实践中培养合格人才。

三、立足现实　着眼发展

刘伯承认为：军人平时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努力掌握打仗所必需的“艺术”，高超的“艺术”可以弥补武器的缺陷；对武器装备能很熟练的使用，是这种“艺术”的体现，“艺术”性强，落后的武器也可以战胜先进武器。我军武器装备落后是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严酷事实，只有正视这一事实，通过严格的教育训练，提高对现有武器装备的使用“艺术”，才是正确的态度。刘伯承强调，无论武器优劣，要实现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要靠人去熟练地掌握它，不然再好的武器也不会比打狗棍强，要立足手中武器，把手中武器熟练到“如用筷子吃饭一样”。

在主张开展教育训练要立足武器装备现状的同时，刘伯承还表现出了面向未来、着眼发展的战略家胸怀。在抗战初期，刘伯承就预见到抗战的前景必然要发展到正规的、大规模的战略反攻。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即刻着手，以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为基础，不断地加强军事、政治、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习，全面提高部队的素质，为后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全国解放后，刘伯承在组织军事学院的实战演习中，始终强调演习想定要做提高一步设想，以免教育训练落后于形势。刘伯承曾教育军事学院的学员：在学习上也要跟上时代，我军装备落后是暂时的，会不断改进的，要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学习，不能把思想束缚在“小米加步枪”上。在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50年代军事学院的训练计划中，军的战术、战役学课目就增加了原子战术这一内容。

正确处理当前需要与未来发展的关系，是军事教育训练对部队战斗力长期具有促进作用的保证。刘伯承立足现状、着眼发展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告诉我们，处理这一关系的科学方法就是要使军事教育训练既能适应当前武器装备状况，满足近期所肩负的任务需要，又要有长期规划，在科学预测武器装备发展和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开展一定程度的“超前”教育，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只有坚持当前需要与长远储备相结合，军事教育训练才能有效保证部队成为“常胜之师”。

从第二炮兵武器系统看，尽管目前与世界军事强国相比还比较落后，但要真正熟练地驾驭它，熟练到象刘伯承说的“如用筷子吃饭一样，要吃那一块就夹那一块”的程度，显然还要花很大的气力进行训练。加之当前二炮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身体素质、以及思想觉悟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加强军事教育训练是当务之急。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二炮部队的武器装备将会不断更新换代，为能适应技术进步和作战方式的变更，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有一定“提前量”，也应引起重视。

四、从实战出发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教育训练实践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从实战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训练思想。他在军事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上所作的《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的报告中说：“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总结出的“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编织起来”的教育方法，就充分体现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刘伯承常用“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这两句话教育大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战争年代，每次部署作战，刘伯承都要交待战术、战法，启发教育各级指挥员；每次战斗结束，总是要组织战后总结；每一次重大战役、典型战斗，都及时召集干部认真分析研究，运用自己渊博的军事知识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用以教育部队，指导作战。

为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刘伯承经常组织实兵演习。不仅和平时期为使军事学院的学员亲自体会组织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合成军队战斗的复杂性而大力倡导军事演习，就是在战斗行动频繁的战争年代，刘伯承也能创造条件经常组织不同规模的实兵演习或到已结束战斗的现场，再次摆开兵力，进行战术研究，坚持用实践检验理论，并将新的实践经验、教训升华为新理论。正是坚持了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把理论与实战、训练紧密结合，因而刘伯承指挥的部队能不断壮大，不断胜利。

刘伯承把实践看作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根本途径，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对第二炮兵搞好教育训练，提高实战能力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第二炮兵武器装备技术尖端，系统复杂，要熟练地运用它，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缺一不可。在平时教育训练中，任何忽视理论或忽视实践的作法都是有害的，只能象刘伯承倡导的那样，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衔接，才能满足二炮部队对“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融每个指战员于一身”的特殊要求，才能克服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问题上存在的不足，增强教育训练实效，提高部队战斗力。

培养现代将校军官的开创性实践
——论刘帅主办军事学院的正确方向

黄玉章　中将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进入了高级阶段，即进入掌握现代技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阶段。建国之初，大陆残敌尚未完全肃清，国民经济正在恢复，美国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并进行侵朝战争，中国人民正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各项任务十分繁重。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急切需要培养能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协同作战的中高级指挥人才，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一所军事学院，来担负这一重大任务。

德高望重、功勋卓著、驰名中外的刘伯承深知这一任务的重大战略意义。早在1950年7月，他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局利益出发，主动请求军委，愿意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要职、去办一所学校，为国防现代化培养指挥人才。1950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翌年2月又任命他兼学院政委，直到1957年9月刘帅离开军事学院到北京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8年11月，受反所谓教条主义影响，刘帅离开了高院的工作岗位。

在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岗位上，刘帅不顾年高体弱，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领导并亲自实践学院的各项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培养指挥人才。1952年7月，学院高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时，毛主席发布训词指出：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是有重大贡献的。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

化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1954年4月，朱德总司令指出：军事学院创建三年，培养了一批具有先进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这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军事学院，听取了刘院长的工作汇报，在接见学院院、部、系领导与教授会（今称教研室）主任时，毛主席说，党中央委派刘伯承同志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他充分肯定军事学院的工作，并勉励大家在刘院长领导下把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好。

上述指示，说明中央军委、毛主席对军事学院1951—1956年的工作是肯定的。军事学院工作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军事学院工作的关心与重视，毛主席给军事学院开学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给学院学刊题名“军学”。中央军委给学院开学题词（贺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从建院开始，刘帅始终坚持执行党中央在建国前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每两个月亲自动手撰写一个有关军事学院工作与重大情况的报告，呈党中央与毛主席，在刘帅的一些报告上，毛泽东作过批示。另一方面是刘帅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结合建国初期我军干部军事、政治素质与军事学院的实际情况，在培养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所需中高级指挥员这一开创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办校方针、原则和措施。

刘帅指出，毛主席对军事学院的指示，应作为策动每个干部的圭臬。毛主席视察军事学院以后，全院同志受到巨大鼓舞，在院党委和刘帅领导下，不断改进各项工作，更加勤奋地工作与学习。然而相隔未几，国防部于1957年2月检查军事学院工作时，却认为军事学院教条主义错误相当严重。接着，展开了反教条主义运动，批判的矛头主要对着刘帅，甚至把军事学院视为教条主义大本营。

刘帅主办军事学院近7年时间内，笔者在基本系完成了四年学业，正在攻读军事学副博士研究生，没有参与过任何领导与决策。作为军事学院的一名普通学员，作为刘院长的一名学生，在军事学院党委和各级首长的领导与关心下受熏陶，深刻体会到刘帅的军事教育思想与军事学院的办校方向是正确的。本文试就此作概要论述。

（一）

刘帅指出，军事学院是人民解放军的学术思想机构，在战略上的地位与任务异常重要，必须根据解放军所承担的使命，坚决保障党的路线、政策和决议的执行，培养国防需要的指挥干部。他受命院长后提出，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业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

刘帅明确要求，军事学院培养的学员必须有德、有才，在喷气原子的现代条件下，军官必须有忠勇卫国之德，与精通现代武器之才，才能完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之庄严任务。德是政治品质，思想方法，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是会带兵、养兵、用兵，而且要在实际斗争中证明是其正确指挥军队，训练军队，指挥战斗的专门人才。他给军事学院学员的题词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修养为军事专家。他对每期毕业学员总是谆谆教导，希望大家毕业后不论在训练工作、部队工作、司令部工作中，都要把所学的理论拿到实践中去考验，勇于把普遍真理创造性地用于实际中去。以后，他又提出，现代条件下军官的德行标准应当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朴实顽强，细心大胆；忠诚遂行任务，个体

服从总体；亲密团结，遵守纪律；研究客观具体条件，发挥主观自觉能动性；揭开困难，克服困难；坚忍不拔，机断行事；强化组织工作，贯彻定下决心；熟练指挥技能，争取斗争胜利。

他认为，培养有文化、有政治与军事修养的、有德有才的指挥军官十分重要，在中高级指挥员中，将领干部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太重要了。要培养若干年才能见效。1954年，学院创办战役系，刘帅希望年壮的将领到战役系学习，他愿和大家共同学习。他要求选送学员要注意质量，选政治、文化、身体条件合格的干部入学，并请军委审查，学制要正规，对学员学习期间的思想领导必须抓紧，毕业要严格，学员毕业时，请军委派员临场监考。

刘帅指出，实现上述方针与任务，军事学院自身的工作不能不从我军的建军传统与军事思想上来考虑，要在我军原有军事思想基础上，加速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工作，尤要以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军事思想，克服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

（二）

从军事学院筹建到开学以后，刘帅十分重视研究军事科学，统一军事学术思想，并明确提出统一军事学术思想的标准是：统一于马列军事科学，即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刘帅在向毛主席作关于学院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报告，中心问题讲的即是统一军事学术思想。认为，统一军事学术思想的迫切性在于：学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需整理和系统化，对现代技术与各军兵种生疏，需提高；苏联专家学识丰富，热情负责，但初来中国，需要了解中国；选留的起义、解放的军官，有介绍学术的能力，但其学术思想庞杂而有浮夸。为统一学术思想，刘帅本人不仅亲自作报告，而且请陈毅元帅来学院讲述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传统；有组织地向苏联专家介绍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共党史、人民解放军素质情况及志愿军作战经验。刘帅还直接领导了学院的师资集

训。

刘帅提出军事学术研究方向：是以毛泽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去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有步骤地使学员学会现代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以毛主席著作帮助学员收集自己经验，加以整理作出总结；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经验及研究美军作战方法以教育学员。

刘帅强调，军事服务于政治，军事科学服从于政治任务，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不可须臾放松。他指出：实际是运动着的，全国胜利后的实际与我们过去的作战对象、地点、时间、任务的实际都不同了，从我们过去的实际，走到现在的实际，从现在的实际将走到将来的实际，只看以前的实际，就可能成为保守观点。

刘帅要求在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基础上，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1954 年 3 月，毛泽东将"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这句话改为："在毛泽东同志号召下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同时，刘帅提出：不仅要将学习苏联军事科学成就与认真总结我军经验结合起来，使我军建设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还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学术的成就，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去赶，从学习苏联、民主国家已有成就去赶，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就去赶，一切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去赶，这是捷径，省时间，可以迎头赶上。

刘帅提出，科研工作不像挖地，有时花很多力气，并不能生产那么多东西。科研工作者必须具备两条：政治上服从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学术上发扬创造性，发扬民主，百家争鸣，不要随便给人戴什么帽子，学术研究要能用于实际，一点没有误差不容易。

刘帅提出，研究军事科学的方法应是：坚持政治目标即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工农兵服务；做到有的放矢，准备与美帝国主义

侵略者作斗争；要博而约，约之于马列军事科学，具体为斯大林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工作要扼要、踏实，反对铺张浮夸。成立军事学院学术委员会、学术研究协会，以促进学术研究。

（三）

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刘帅明确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要根据马列主义军事科学、斯大林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根据我军的建军传统与战争经验，针对美帝国主义，精心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方法，特别要研究与学习志愿军的作战经验，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坚持实事求是，防止游击主义与经验主义，防止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要求教育上抓住三个环节：优良传统教育、现代作战研究、正规化建设。刘帅呈毛泽东主席的第三次报告，报告军事学院 1951 年 5、6 两个月工作，中心即是理论结合实际进行训练，防止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

军事学院课程设置有文化、政治、军事三部分，周总理针对建国之初我军干部文化、科技知识低的状况，指示军事学院要搞好文化、科技知识教育，刘帅强调，文化是掌握军事科学的钥匙，文化课重点解决语文和数学。政治课有社会发展史、党史、哲学、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军事课有战史、战例、合同战术与战役法。军事课实行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综合训练原则。

刘帅特别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改进，他向毛主席送的第二次报告，即报告军事学院 1951 年 3、4 两个月的工作，重点讲到教学方法。他强调发扬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作风，采用“练多于训”，采用“能活生生地表现事物的方法”，如去部队见学实习，举行现地实兵演习，总结作战经验以教育自己，派学习团去朝鲜考察，举行现地作业等。他指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国家较长时间处于和平环境，无法吸取战场经验，必须依靠

实兵演习经验代替实战经验，这是训练军队的最好方法，也是学院经常采用的训练方法。

刘帅提出了“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口号，指出尊师重道，是尊重马列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与苏联先进军事科学的传授者，军事学院应有尊师、敬师的良好风气与高尚校风。教学相长这是教员与学员之间相互学习，发扬集体智慧，发挥智力与毅力，向学习中的困难作斗争，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他要求教员帮助学员总结经验，并将学员总结的经验吸收到讲课内容中去，教员要认真研究训练计划，课业内容，充分备课，编好讲义和想定，做到理论与实际一致，主观与客观一致，“唱戏的人要注意听戏的人”，教学内容要切合学员需要，切合战场需要。学术研究与出版教材是学院的重工业建设，军事文章的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官兵的生死存亡，笔重千钧。要精练、踏实。教员要精通中文，精通军事。教员的启发与学员的自学结合，教员指导想定作业不要障碍学员思考力的发展。要求教员经常与学员谈心，一起研究毛主席军事著作，研究军事科学，研究战史战例，尤其研究志愿军的战例，加以“推断预见”，成为训练根据。刘帅指出，实战胜敌是测验我们教育工作成绩好坏的试金石。要依靠学员在战场上作战的成效来评定教员在训练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刘帅要求学员，到军事学院学习，在各部队团结会师中，一定要以毛泽东理论结合实际为统一思想的标准，要放下功臣包袱，谦虚谨慎，不骄不燥，克服保守思想，打开脑筋，专心学习，克服单打一方法，学会弹钢琴作风，尊重毛泽东军事著作与斯大林军事学说的传授者。他勉励学员以战争年代攻击敌人的战斗精神来攻读一切课业，日有进益，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在学习中，独自钻研与互助相结合，即个人智慧与集体智慧相结合。要求学员先用心钻研，强调自学，在独自钻研与自觉基础上互助。学问学问，又学又问。先用心钻研，不通之处再请教教员。要循

序渐进，不能一锄挖个金娃娃。刘帅要求学员学习中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脱离我军传统与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追求搞一套“现代化”；二是满足旧的一套，拒绝正规化现代化学术的保守倾向。刘帅针对当时一些学员的种种想法要求，要求学员纠正愿学战术不愿以少数时间学军事技术，愿学前线指挥不愿学后勤，愿学战斗指挥不愿学战斗训练，愿学指挥员定下决心不愿学司令部组织战斗与通信联络，愿当指挥员不愿当参谋长，愿学指挥不愿学组织协同的现象。并正确对待家属随队、学习“时间紧、内容多”矛盾等问题。

刘帅要求学院各级首长要与教员一样，成为师资干部，能教者即教，不能教者先学好了再教，不可置身于教学之外。

（四）

刘帅向毛主席报告军事学院 1951 年 7、8 两月工作提出，培养师资干部极为重要，是百年大计。他提出，提高师资干部的军事科学水平，是向科学进军，是提高训练质量的首要问题；办好学校，师资的质和量十分重要。

针对战争年代过来的不少同志不会当教员，不愿当教员，嫌教员待遇低，怕当上教员以后脱不了手等状况，刘帅除提出“尊师重道”，要求军事学院应有尊师、敬师的良好风气与高尚校风外，他又提出培训师资的一系列措施，院长、训练部长、政治部主任都要直接领导培训师资的工作。

刘帅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帮助从起义、解放的军官中选留的教员，提高他们的军事学术思想与教学水平；决定从每期毕业学员中选留学习成绩比较优异的当教员；选调比较优秀的知识青年作旁听生，放在基本系学习，毕业后送去部队实习，实习回来再发毕业证书，当助教。

刘帅还首创建立军事学研究生制度，决定从优等毕业生当中

选留研究生，请苏联专家直接指导，研究三年，经由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会考试及格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为此，刘帅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学衔章程》、《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学衔授予章程》、《学位学衔审定委员会组织章程》。刘帅指出，这些是提倡钻研学术，提高军事科学水平，鼓励干部前进，真正学会与掌握先进军事科学的最好方法。对获取学位的干部要提高薪金待遇，这样可以促使干部克服官位等级观念，安心钻研学术。

刘帅对译员工作十分重视，要求译员做到三个精通：精通外文才能发掘；精通中文才能表达；精通军事才能钻研军事科学本质。

刘帅指出，行政干部、政工干部、教师干部同是党的干部，但教员的工作是最辛苦的。为了提倡学习风气和提高军事科学水平，必须从物质优待和政治奖励两方面着手，尤其对费心较大的教员应给予较优的待遇。在当时，刘帅勉励教员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发扬"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他讲剧团要有梅兰芳这样的名角，饭店要有名厨师，医院要有高明的大夫，学校要有名教师。院长和各级领导都是搞服务的。为了重视教师的地位与鼓励教员，学院开一些会时，请一位贡献突出的教员上主席台，刘帅还决定给教员每天加二两米，上课教员周末多发一张电影票，给教员以少量的教龄补贴。

（五）

刘帅十分重视学院的政治思想建设以及改进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他指出：军事学院所做的学术工作，也是一种思想建设，在革命胜利后，把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集中到学院学习，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提高军事学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以保卫胜利，巩固国防，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完成毛主席交给的"努力学习，保卫国防"的

总任务。全院人员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奋起努力，不骄不怠，细心研究，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以取得过去战争那样的胜利。取得了成绩要认识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团结合作，绝不能居功骄傲。

对老干部的思想领导必须抓紧，不能放松，干部必须过群众的生活，首先过党的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长期地、认真地、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要加强政治教育。要重视党日活动，坚持每天课外半小时政治生活。一切思想工作通过支部，加强党支部工作是最重要的环节。

刘帅要求学院每一个成员都要以毛泽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为标准改造思想，提高思想，都应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之心为心，在学院岗位上安下心来，把自己当作学院的主人翁，"人人当院长"，不做过路人。思想教育必须结合实际，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热爱什么，憤恨什么都要鲜明，保持思想工作的经常性，培养每个人的科学见解，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政治教育结合思想工作进行，政治生活不要干预个人生活的自由。

为改进学院领导，刘帅提出了三个口号：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刘帅向毛主席报告学院 1951 年 9、10 两个月工作，主题即是增强工作效率，精辟阐述三个口号的精神。

刘帅提出，军事学院以训练为中心，增强工作效率，不在机构庞大，而在组织的合理与精干，干部使用确实做到执事者各职其事，充分发挥才能，不以量代质。学院机构要精干有力，不要庞大臃肿，横宽纵短，单刀直人基层，采用团一级的领导工作方法，采用面对面的领导。学院中不管军事、政治、行政、技术等任何干部，都要学习政治，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为人民工作与学习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同时，各自钻研业务，做好工作。

学院保持集中统一指挥，要简化工作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会议次数与时间，学院一切政治、行政、经济、保障工作都要深入到训练课业实施中去。学院领导不能脱离教员与学员，不能脱离教授会。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必须从首长开始，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最主要的是各级首长亲自动手，努力学习，实际干，不要坐着喊，必须共勉，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紧迫精神。

以上从五个方面概述了刘帅主办军事学院期间有关办校方针、原则的论述，这些论述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是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办好高级指挥院校开创性实践的重大贡献。实践证明，刘帅主办的军事学院办校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朱德的评价是公正的。把军事学院实际工作中一些缺点错误夸大为严重的教条主义是不正确的。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党和历史对军事学院的方向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刘帅“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邓小平：《悼伯承》）。

刘帅对军事学院教职学员的要求，他本人是率先垂范的模范。建国之初，物质生活还很低，工作学习又十分紧张。军事学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4月5日制定的首都政府机关全年作息时间规定每天工作、学习9个半小时（冬季9小时）的规定，实行每天上午6小时学习，下午3小时自习加半小时政治生活，不少人感到很紧张，反教条主义中，前述的严格考试与这个6小时一贯制，曾被作为教条主义的重要标志。尽管工作学习紧张，刘帅和大家一样，在军事学院近七年时间内，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廉洁奉公，严谨治学，除了散步活动，几无其他娱乐，他亲自编写集团军战役教授提纲，讲课，辅导，主持编写战例，担任军事导演，亲自校译条令教材，统一军语，今天我们应用的军语，有数以千计是刘帅逐条酌定的。他的办校思想和榜样作用，在他离开学院工作后的几十年间，仍然受到人们深深的敬重，得到

继承与发扬。几十年来，曾长期主持高级指挥院校工作的肖克、张震等首长，经常以刘帅当年的论述指导当前，加强学校的建设。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坚持刘帅创办高级指挥院校的重要论述与宝贵经验，结合新情况，把办好院校，培养人才的工作做得更好。

刘伯承办校思想
与空军指挥学院成长发展

杨振玉　中将

刘伯承元帅是我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事革命军旅生涯后，在他所统帅的部队中，创办了各类军政学校。在革命战争的不同历史时期，历任我军许多学校校长兼政委。全国解放后，又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在长期领导和治理军校过程中，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各种军事教育活动，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办校实践经验，确立了具有我军特色的办校方向和一整套治校原则，对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刘伯承革命实践活动中，总是把提高部队人员素质特别是把培养和提高干部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始终不渝地坚持“治军必先治校”的思想和主张。全国解放后，我军进人到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阶段。在大转变的关头，他强调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是两条铁轨、两列火车同时并进：一条是通过国家工业化实现武器和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另一条是通过办学校培养出既有马列主义水平、又精通本职业务的各类干部”①。刘伯承以一个伟大无产阶级教育家的远见卓识，把办校与治军和打仗，乃至革命前途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以适应革命斗争任务的需要。治军先治校，治校是为了更好地治军。要治好校，根据他的办校思想，主要是要坚持“五要”，即治校要先治本，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把政治放在首位；治校要从实，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正确的人才培养道路；治校要重才（材），就是要重视教员队伍和教材建设；治校要从严，就是要注重校风建设，树立良好的校风；治校要从远，就是教育要从长计议，不断深化教学改

革。

空军指挥学院以刘伯承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为基础，于 1958 年 9 月 12 日在北京组建。据原空军系的领导同志回忆，在搬迁前，刘伯承对空军系的同志们说："除了房子搬不走以外，其他的人和物你们都可搬迁到北京去"。他还特意指派人员到苏联空军红旗学院见学，并选派军事学院中懂合同战术的尖子教员到空军学院讲课。这为学院顺利筹建和施教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天，学院已发展成为一所具有我军特色的综合型、研究型、开放型的学院，为空军培养造就大批指挥人才做出了贡献。回顾学院所走过的历程，使我们更加缅怀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刘伯承元帅。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他的办校思想，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一、治校要先治本——坚持正确的办院方向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办好军队院校，首要和根本的问题是端正办学思想。坚持办学的政治方向，始终把提高人的政治素质放在首位，确保学校为部队输送政治上合格的人才是办学思想的根本问题所在，是我军院校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刘伯承指出："首先，政治思想上要严，要把政治方向放在首位"②。1933 年，他在办"红大"时，就开设了"党的建设"、"红军政治工作"等政治理论课，邀请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进行多次演讲。关于"红大"的教学目的，他强调指出："要把干部培养成有政治觉悟、有作战本领、有管理能力、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精神的人"③。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更进一步强调"学院应培养出有德有才的，有文化知识、政治修养、军事学术的，有思考能力、组织能力适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④"他还强调："不管是军事、政治、行政、技术单位任何一个干部，都应强调政治学习，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其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确立为人民工作与学习的态度。"

⑤可见，他总是把办校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空军指挥学院成长发展的历史，使我们体会到，院校既是军事人才的训练基地，又是我军干部成长的摇篮，它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听党的话，服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特别在新形势下，我军建设正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一切行动听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院校建设之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按照军委和空军的有关指示，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统一全院人员的思想和行动；坚持"三个面向"的办院方针，通过"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基本途径，树立全面的人才质量观，使"教书育人"、"全面发展"等新的教育观深人人心；坚持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教育，学院提出了"献身空军建设，刻苦学习锻炼，争做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指挥人才"的院训，使全体学员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坚持针对干部学员特点，强调思想教育内容要系统化，教育方法实行民主化，教育形式要注意社会化，使部分认识片面的学员自觉实现由单纯为提升面学转变为加强部队建设而学；由单纯为追求专业知识而学转变为全面提高军政素质而学。

30 多年来，学院为部队培养了一万余名军事、政治、后勤、参谋等各类指挥和管理人才，据 1988 年建院 30 周年统计，其中 70 多名毕业学员担任军以上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在空军作战、训练和部队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空军建设做出了贡献，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治校要从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院校培养人才的根本道路，是军委确定的办校原则之一，是刘伯承治

军办校思想的重要部分。这一思想体现在他办校的全过程中。他指出："军事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不以实践为基础，不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理论；不以理论作指导，不和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是瞎实践"。"实战战场上的胜败即是测验我们教育工作好坏的试金石"⑥。首先，在训练计划上，他说："训练计划应根据不同的对象、期限和目的制订出来，使它与测验的学员文化、政治和军事程度相适合"⑦。其次，在学制上，他从部队建设的需要和军事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根据大多数学员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速成和完成两种学制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三，在教学上，一方面，他要求"教"的一方"写讲义，写想定，一定要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把教的东西与学员实际接收能力作一个打算，设想如何教才能收效，使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⑧。另一方面，他要求"学"的一方"首先从实际出发提高到理论，理论又来指导实际，在实际中验证理论、丰富理论"⑨。为此，他积极组织学员编写战例和战斗经验，组织见学团到朝鲜前线见学取经，仅 1951～1957 年就组织了 35 次实兵演习和 12 次大的现场作业。

刘伯承这一办校思想和实践为院校培养人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典范，对于指导我们进一步落实新时期办校方针和办校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学习和贯彻刘伯承这一办校思想中，主要体现在"三个结合"上。

一是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它反映了军队院校的办校道路。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首先，坚持教学内容与部队建设实际相符合。为此，教学内容要首先满足学员第一任职需要，突出特点，使培养的人才在觉悟、知识、能力、气质、体魄等方面具有空军部队所要求的特有素质。另外，根据空军部队实际，修订教学大纲，调整学员的知识结构，改变教材内容起点低，联系实际差等状况，使之更加符合部队的实际需要。其次，坚持学院与

部队在人员、信息、成果等方面进行经常性的交流，使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较好地吻合起来。采取深入部队和军内外调查研究；在部队和空军机关建立多个信息点，并聘请了信息员；开办以培训为主体、以轮训和函授为补充的综合教学形式。第三，发挥机关与院校、部队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学院积极承担空军领导机关的任务，用我们的实绩取得领导机关的理解和支持；请机关同志和毕业学员来院讲课，谈体会，介绍经验，从而扩大接触实际面的机会。

二是课堂理论教育与实际结合。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与用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的认识论原则。对此，我们开发研制了具有实战背景的模拟训练环境，提高学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能力；组织毕业学员到部队代职锻炼，并利用寒暑假做社会调查；及时引导学员联系我国空军实际，对近期几次大的局部战争中空军作战使用问题进行研讨；请在院学习的有实践经验的学员讲课，以增强实践性的教学环节。

三是教学与学术、科研结合。它反映了军队院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采取有专业研究与群众性研究、集体与个人、院内与院外、计划课题与自选课题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学术和科研活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广交友，大协作的办法，推动学院的学术科研工作；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环节，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方向的学术和科研活动。通过这种教学与学术、科研相结合，提高了教、学人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推动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治校要重才（材）——狠抓教员队伍和教材质量建设

教员队伍和教材的建设，是院校教学的基本建设，是办好院校最基本的条件。刘伯承把教员视为院校建设的“宝贵财富”，把教材看成是院校建设的“重工业”。他常说：“搞剧团要有象梅兰

芳那样的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院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教员队伍”。“摊子铺开了，就如戏院开张，要有好戏给人家看，一要有好剧本，二要有好演员”⑩。

为了培养与造就一支红专教员队伍，刘伯承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第一，必须把教员队伍建设置于院校建设的重要地位上。他说：“如学校无坚强的教育干部，是无法实现教育计划的”⑪。第二，必须严格把握选拔教员的质量标准。他十分明确地规定了选拔教员的标准：一是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二是要有深人学习军事科学的兴趣；三是要有为革命军队服务的决心⑫。第三，必须十分重视对教员的培训。他特别强调，“无论是向军事科学进军或是提高训练质量，首先就要提高科学教师的军事科学水平，从而领导普及”⑬。因此，教员不仅要“为人师表”，处处作人“楷模”，而且要广学博问，全面发展，“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修养为军事专家”⑭，立志做“红专教员”。第四，必须在教学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几十年的军事教育实践中，刘伯承尤为注重在教学实践中提高教员队伍素质，提出了“教学相长，教中学，学中教”的方法⑮。第五，倡导尊师重道。在军事学院第一个学习节大会上，他郑重地提出一个口号：“尊师重道，教学相长”⑯。刘伯承在我军院校建设史册上，留下了他尊师重道的许多感人事迹。

同高度重视教员队伍建设一样，刘伯承也非常重视教材建设。他有许多重要论述。一是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注重质量。他要求：“编写教材、讲义，要言简意深，通俗易懂，内容准确，用语科学，提法得当，标点符号无误”⑰。二是要有针对性。他说，“根据训练的对象、期限和目的来拟制训练计划和编写讲义”⑱。三是要把认真总结和运用我军经验与吸收借鉴外军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他说：“要学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军事科学方面的成就，同时认真研究和总结我军的战争经验，并使两者结合起来，予以提高和发展”⑲。

刘伯承的这一办校思想，是院校建设的根本大计。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院校教员担负着培养合格人才的重任，他们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桥梁、主导、创新和表率作用。加强教员队伍建设，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大计。我们学院在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坚持红专两手抓，使教员队伍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坚持打牢专业基础，使教员在学、识、才方面综合发展；坚持使用与培养并举，重视教员知识更新；采取加强岗位练兵，组织进修深造，积极与部队交流，实际锻炼学习等措施，建立起一支适应教学需要与发展的教员队伍，对进一步提高学院的教学质量，扩大学院的知名度有着重要作用。教材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直接反映了院校教育的素质和水平，是深化教改，促进学科建设的重点工程。为此，我们重点抓了二件事：第一件，着力建设和完善我院教材体系。把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并以此作为完善课程体系的依据，在明确学科结构和范畴、突出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增强专业、课程和教材设置的系统性，形成了我院特色的教材体系。第二件，组织力量编写一批学科化重点教材。使教材在逐步由课题式走向学科化的进程中，实现由量变向质变的飞跃。这样，以学科化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为标志，逐步建立起空军军事学科的理论体系。经过努力，我院初步理顺了专业、课程和教材体系，进一步充实和更新了教材内容，形成了由 4 个知识范畴、52 门课程和 280 种教材组成的教材系列。其中，有 11 本被评为全军优秀教材，从而使教学内容逐步走上了学科化、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

四、治校要从严——树立良好院风

刘伯承在办校中，非常重视校风建设。他指出："现代化与正规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有了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还要

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⑳。并对院校正规化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必须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狠抓校风建设。他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是锤炼指挥员的阵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必须狠抓作风建设，……”㉑。为此，“就是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统一全校人员的思想和行动，把作风培养当成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使每个同志‘晓之以理’，‘行之有轨’，真正懂得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从而变为自觉行动”㉒。第二，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一律按条令规定执行。他谈到："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㉓。因此，“作风培养必须从点滴入手，扎扎实实地抓，抓就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光说不做”㉔。第三，必须从领导严起，发挥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他常说："已身正，不令而行；已身不正，有令不行”㉕。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因此，作为院校的每一个领导干部，要求别人、要求学员做到的，自己应该首先做到。刘伯承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我军院校的校风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刘伯承从严治校的思想，深刻反映了办好院校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之一，它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必然要求。院风是学院之魂，它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对于培养人才起着规范、熏陶、激励和促进作用。因此，我们感到，在建立和培养良好院风方面，一是抓教育，树立一面凝聚全院人员的旗帜。根据中央军委的办校方针，结合我院实际，以“开拓、求实、勤奋、严谨”作为我院院风，使全院人员自觉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形成良好的风气。二是抓制度，坚持依法治校。我们依照三大条令的基本要求，制订了《学院管理章程》，对各类人员，每一项工作都作出了明确要求，使全院人人有章可循，事事有法可依，从面使学院建设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三是抓表率，推进院风建设。从严治校，关键是各级领

导干部。因此，干部一定要在培养院风上为人师表。我们要求干部做到“四个表率作用”，即“院领导作全院人员的表率，上级作下级的表率，教员作学员的表率，干部作战士的表率”。这样，通过发挥表率的行为示范作用，较好地调动了全院同志的积极性，有效地推进了院风建设。

五、治校要从远——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我军院校教育的长期实践表明，院校只有在人才培养上坚持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正确思想，才能培养出适应和平时期部队建设需要、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合格人才，才能使院校教育更好地为军队建设服务。刘伯承从长计议的办校思想，对推进我军院校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全国解放后，我军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形势下，他认为：必须抓住时代的机遇，“乘国内的和国外的现代科学成就之势而利导之，以为国防服务”㉖，从“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军队院校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训练与培养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的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㉗，并以此明确院校建设的发展方向。他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就提出了建校设想：“先假定一个十二年的远景目标，然后拟出一个各时期的步骤计划，逐步去做。这样我们才有一个走往世界先进水平的‘路单子’。这也就是全面规划逐步实施”㉘。他多次语重心长对大家说，院校教育要放眼世界，重视未来，科学地预测发展方向。他常说：“世界是发展的，战争是发展的，装备技术和战略战术也是在发展的，因此，实际有过去的实际，有现在的实际，有将来的实际。实际是运动的”㉘。绝对不能把思想束缚在“小米加步枪”上，而应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从长计议，这样才能不断促进院校全面发展。

刘伯承从长计议的教育观，是做好军事院校教育工作的一个

重要原则。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特别是联系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我们更加感到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是实现新时期办学思想的重要保证。多年来，我院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深化指挥院校教育改革的意见》为依据，突出地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需要与可能的关系，提出了“打牢基础、突出重点、精选内容、体现特点”和“实事求是、博采众长、群策群力、重点突破”的教改原则，使学院教学改革积极稳妥地向前发展。二是在基本理顺学科关系，使教学内容逐步走上学科化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和更新教学内容。根据空军中、高级指挥军官的培养目标和知识结构，注重改革政治理论教育，突出了学员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把理想、道德、作风、纪律的教育渗透到各门课程的教学中；注重打好学员的科学文化基础，突出以合同作战和空军战役战术理论为重点的专业课；注重开发学员智力，培养能力，实行了学分制和选修、免修制，鼓励学有余力的学员攻读双专业，获取双学历，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员。同时，我们还以学术研究为先导，重视跟踪国内外空军军事理论的最新发展，狠抓教学内容的更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三是不断改革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针对我院学员大都是师、团、营领导干部的特点，推行了研讨式、学导式教学，提倡精讲多练，引导自学。与此同时，我们还实行开放式办学，积极开辟第二课堂，组织参观见学，下部队见学等。近些年，我们还加强了与军内外和外军的学术交流。另外，还不断改革教学技术手段，提高现代化教学水平。近几年研制的“长空一号”、和正在研制的“长空二号”空军战役训练系统等计算机软件，为把军事科学运用到空军作战、训练方面摸索了路子，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四是在管理工作中，认真贯彻“对学员既严格要求，又关心体贴”的原则。改革对学员的管理方法，区分对象、按层次管理，做到严格管理，严

而得法，严而有情，使“管理育人”落到实处。

刘伯承的办校思想和实践，是我们党我们军队关于军事院校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和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指导我军加强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提供了重要途径；为加强院校全面建设指出了基本准则；也为院校深化改革树立了光辉典范。深入研究刘伯承的办校思想和实践，对于进一步认识办好军事院校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今天更好地办好军事院校都将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刘伯承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温教诲，倍感亲切。我们纪念他、怀念他，更要学习、继承和发掘他的办校思想，使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大放光彩。当前，要特别注重深刻领会、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上的重要报告精神，以及军委关于军队院校精减调整改革的重大战略措施，结合学院实际，发扬求实精神，努力办好空军指挥学院，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努力奋斗。

（参与本文执笔者　孔繁海大校）

注　释

①1954年12月7日在华东军区军以上干部、驻宁各军事院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②③④⑤《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5、176页。

⑥⑦⑧《中国名家军事教育思想研究》海潮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0页。

⑨《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3页。

⑩《中国名家军事教育思想研究》海潮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3页。

⑪⑫⑬⑭⑮《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228、第64、第701、第64、第709页。

⑯《元帅教育家》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58页。

⑰《中国名家军事思想研究》海潮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5页。

⑱ ⑲《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701 页、684 页。

⑳《元帅教育家》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33 页。

㉑ ㉒《刘伯承同志办院校纪事》石家庄 高级陆军学校出版，第 24 页。

㉓《元帅教育家》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32 页。

㉔《刘伯承同志办院校纪事》石家庄高级陆 军学校出版，第 25 页。

㉕《中国名家军事教育思想研究》海潮出版 社 1991 年 1 月版，67 页。

㉖《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686 页。

㉗ ㉘《中国名家军事教育思想研究》海潮出版社 1991 年 1 月版，第 68 页。

㉙《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686、第 68 页。

试论刘伯承军校教育质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鄢慕先　少将

刘伯承元帅在七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历来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军大学，到全国解放后的军事学院，刘帅为我军军事人才的培养呕心沥血，卓有建树。综观刘帅的治校思想，中心环节是在于把握了军校教育的质量建设。今天重温刘帅关于军校教育质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加强我军院校和部队的质量建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学习，我认为刘帅关于军校教育质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定目标，确立高质量的人才标准

培养目标决定军校教育的方向，人才标准则是军校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党中央、毛主席对军事学院寄予厚望并规定了该院的培养目标：“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熟习与指挥现代化各技术兵种，组织与指挥协同动作，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①刘帅认为，军事学院的教育要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就必须确立高质量的人才标准，主要是：

（一）忠于革命事业

刘帅认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应是军事学院培养人才

的首要标准。针对军事学院的学员多为我军高级干部的特点，他指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要靠他们来掌握局面，掌握指挥。"②因此，刘帅强调学员必须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才能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首先，他要求学员要有坚强的党性观念，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政治修养。他强调："对高级干部学员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党性教育、统一集中教育、时事政策教育。领导上要经常有预见性地对学员敲警钟。"③"高、上级干部学员党的观念与自觉性虽强，但这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并不等于已解决了问题。工作经验证明，对他们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则是一时一刻不能够放松而必须予以重视的；否则就会自流散漫，影响学习。"④

其次，他要求学员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党和国家利益同个人利益的关系，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党和人民的"光荣工具"。刘帅指出："为祖国的利益中就包括有个人的利益，因而就成为个人和整体的正确关系。所以个人成为人民的工具是非常光荣的。我们要成为人民的工具就要成为有用的工具。什么是有用的工具呢？人民需要我们保卫祖国、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那我们就要保卫，并且保卫得好，保卫得住，尤其是无代价地去完成保卫任务。"⑤

第三，他强调学员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刘帅认为，学员大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受过火与血的洗礼，立过功，受过奖，总的说来，他们的思想主流是好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有的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有的个人主义严重，组织纪律差；有的还受小农经济的影响，思想比较狭隘等等。克服这些不正确思想，"对于贯彻总路线和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以及全军高干会议决议是极为必要的。要以自我批评和同志式的帮助，克服各种错误思

想，特别要把个人主义的骄傲情绪反掉”⑥。

（二）具有科学文化知识

刘帅认为，现代军事人才必须具有较高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他指出：学员“要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军事要学习正规化现代化科学技术。”⑦把具有科学文化知识作为现代军事人才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有远见卓识的。

一是进行现代化军队建设和战争，需要科学文化知识。刘帅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总结时指出：“全军现代化的装备有了，陆军、海军和空军进入到国防配置的位置去了。他们急需要学员快些毕业，特别是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我们应有所准备，所以不能不做速成训练；同时在原子武器喷气武器时代，必须提高科学水平，特别是需要的科学要在十二年内接近世界水平。所以我们提出老少结合，文化与武备结合，使学员先学文化”。⑧

二是学习军事科学要有科学文化这把“金钥匙”。刘帅曾说：“工农出身的学员，他们的文化都是从战争年代的识字牌上学来的。数、理、化从未学过。这就给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带来了困难。世界好比一间大房子，里面博大精深、万物皆有。……科学文化知识就是开门的‘钥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金钥匙’。我们要把这个‘金钥匙’送给学员，让他们打开房门，入室登堂，去攀登现代军事科学的高峰。”⑨

三是科学文化水平低是当时我军干部的主要弱点。当时，军事学院的学员相当一部分是“放宽”文化条件后录取的，小学文化水平的学员约占74％。刘帅认为“不懂科学，没有文化，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愚昧伤痕，是套在工农头上的一副枷锁。这是我们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奋起医治这个伤痕，打碎这个枷锁。”⑩为了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刘帅从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对文化水平较低的海军、空军、政治速成和高级速成等四个系实行半年预科制，首先补习半年文化，然后才入正科学习军事和政治。刘帅深入学员中蹲点，听取他们的意见，为

他们补课，教给他们学习方法，从而使学员进步很快，成绩也比较显著。

（三）能组织指挥现代化协同作战

能指挥协同作战是军事指挥人才标准的核心。这是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刘帅指出："现在我们在战胜敌人与建设中，现代化的诸兵种已在具有良好的传统的步兵的基础上装备起来的。这是对现代化敌人作战的好条件。有这些好条件，就要步兵与其他兵种协同动作，协同动作得好，就可以以小的代价取得更大的胜利，从而也就是保障了胜利。"⑪刘帅认为，一个合成军队指挥员不熟记各兵种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就学不好合同战术，学不好合同战术，不具备组织指挥合成部队的能力，就不能打胜仗。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指挥合同作战能力上坚持高质量，就会增添胜利的把握。为此，刘帅十分注重循序渐进地培养学员指挥合成军队作战的能力，其效果在朝鲜战场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具备优良的德行

刘帅认为，我军院校培养的学员必须具备高尚的德行，并于1954年3月第一次提出了军人的德行培养问题。刘帅指出："军委规定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德有才的干部，我们学院遵照军委规定的目标应在德的基础上培养才。……德的基础在先，而才是从德的基础上来的。"刘帅提出学员在德行养成上，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做到："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朴实顽强，细心大胆，忠诚遂行任务，个体服从整体；亲密团结，遵守纪律；钻研客观具体条件，发挥主观的自觉能动性；揭开困难，克服困难；坚韧不拔，机断行事；强化组织工作，贯彻定下决心；熟练指挥技能，争取斗争胜利。"⑫从而明确了革命军人德行的具体标准。

二、奠基础，建立高质量的教学内容体系

教学内容是实现军校培养目标的基础。高质量的教学内容体

系，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军校教学内容体系具体体现在教学计划和教材上。因此，刘帅强调要把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编写高质量的教材作为“重工业”来抓。

（一）根据战争和军队建设需要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

刘帅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对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十分重视。他要求：第一，制定计划要从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的客观要求出发，从学员的实际出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后拟出。1955 年上半年，刘帅指导制定战役系教学计划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战役系学员思想水平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工作经验，有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些特点，他指出：战役系的教学计划应以学习高级兵团的战役为主，以学习组织指挥及其思想方法为主；训练方法应当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提倡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为了制定好这一教学计划，刘帅深入到战役系学员中间，给他们讲述教学计划的制定过程和设想，让学员提出修改意见，在搜集整理学员意见的基础上，再经有关业务部门修订，最后下发执行。

第二，制定教学计划要遵循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刘帅认为，在拟定和审查教学计划时，对课目内容：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都应切实分开。在训练内容和时间配当上，刘帅要求：“重点课目要窄而深，非重点课目要宽而浅，不重要的课目索性删掉。这就是有所舍才能有所取，有所损才能有所全，主要的目的在于有所全。……因此，训练计划应根据不同的对象、期限和目的制定出来，并使教材有系统，适合于计划应有的课目份量和时间配当，而且要内容正确，文字清楚，再加上教法学法都好，这样就一定能达到有所全的目的。”⑬

第三，要不断总结经验，通过实践检验，使教学计划逐步完善。在实施教学计划过程中，刘帅不仅要求认真实施教学计划，而且要求在教学实践中检验教学计划，并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制定和实施教学计划中的规律性。1956 年 3 月，刘帅在总结基本系、情

报系第二期训练工作经验时指出："从这两个第二期军事政治训练计划的实施来证明下述的课目排列和进展是合理的。这就是：第一学年应是兵种技术和合同战斗原则与营、团战术及政治课，以使学员全面的严整学习，第二学年应是师战术和政治课，以使学员依托第一学年所学的成绩之上更加开展深入和熟练；第三学年主要应是军战术和政治课，略加一点集团军战役法常识，以使学员能依托前两年所学的成绩之上，能够以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分析综合和融会贯通而获得全面有系统的和透彻的理解，从而提高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⑭由此可见，刘帅为了使教学计划更加科学合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前进的。

（二）制定严格的教材质量标准

刘帅把教材看作是军校教育质量建设的"重工业"。以教材的高质量求得教学的高质量，是刘帅的重要治校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教材是发给全军使用的，一定要保证质量，不能误人子弟。""如写教材时不能多在质量上、分量上去研究一番，不能做到少而精，扼要踏实，只是拉杂拖沓，只怕'一刀杀死杨六郎'，没有戏唱，那是不正确的。"⑮为了确保教材质量，刘帅亲自制定了教材质量标准：

第一，教材编写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吸收我军的实践经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二，教材内容的编排一定要使教员的主观愿望和学员的实际接受能力统一起来，象俗话说的那样"唱戏要注意看戏的。"

第三，教材的内容要少而精。刘帅针对有的同志把讲义写得过长，以致两个小时的课拖到三至四小时的做法，幽默地批评说："杨六郎在该杀死时，就得杀死，该留下时，就得说个明白。"

第四，教材内容必须科学、正确，"既不能因某课本、某参考资料是某权威写的，因而有错或不当就不予纠正；也不能自以为是，乱改一通。"

第五，教材要按照条令、条例和教学大纲编写，"文字要通俗

易懂、言简意深，要珍惜祖国的语言文字，做到教材上不出一个错别字。”

由于刘帅与全院人员的共同努力，军事学院成立才五年，教材建设便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军事、政治、文化、外语等各方面教材上千种，形成了一个成龙配套、科学完整、高质量的教材体系。

（三）一丝不苟，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编写教材

在治学上，刘帅一向以严谨、细致著称。他一贯强调，在教学内容上要严谨，钻研问题要细致入微，既考虑到它的严密性、准确性，又注意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切不可马虎从事，误国误民。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更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个字都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关系到军官和士兵的存亡。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千钧！"⑯刘帅要求翻译外国军事著作要做到仔细认真，要有科学态度。如果翻译不准确，出现滥译、错译、曲译，轻则影响学术研究，重则贻误国防建设大事。他不仅要求别人这样做，而且自己率先垂范。1954年，刘帅利用在大连休假的时间，带着眼疾校对新的野战条令，在近二十万字的铅印本上修改了三遍。第一遍用墨汁改写，第二遍用毛笔蘸着蓝墨水写，第三遍蘸着红墨水写，三遍定稿，以红色为准。近二十万字的一本书稿，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准确无误。

（四）搞好科学研究，不断充实完善教学内容

刘帅在抓教学的同时，注重学术研究。他认为，开展学术研究是提高教学内容质量的重要手段。今天的科学研究成果就是明天的教学内容，因此必须把学术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上。刘帅强调：学术研究要为教学服务，学术研究的题目必须与教学内容相适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刘帅提倡"深入钻研，勇于探索"，对于意见有分歧的问题，要自由争论，各抒己见。学术研究既要借鉴外军的经验，又要吸取古代兵法的长处。他认为，"无古难成今，观今应鉴古"，知今知古，知中知外，才会提高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为了保证学术活动经常地、有计划地开展，军事学院成立了军事

科学研究部，并对研究成果突出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在刘帅的倡导下，各教授会积极主动地开展学术研究，把教学中的难点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军事学院的教学内容不断充实完善，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抓关键，建设高质量的教员队伍

刘帅指出："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⑰也就是说，教学质量能否提高，关键在于教员队伍建设。

（一）教员是"无冕之王"

刘帅认为，搞好教员队伍建设，首先要尊重教员，把教员放在院校建设的重要地位上去对待。刘帅提出"尊师重道"的口号，带头尊重教员，称知识分子教员是"电灯泡"，在学院建设中发挥着"光"和"热"。他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为教员过节日，名为学习节。1951 年 5 月 5 日，是刘帅为军事学院确定的第一个学习节。刘帅在庆祝大会上向全院郑重提出"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口号。当有人议论说，我们的学院是金教员、银学员，破铜烂铁是机关（指机关工作人员）。刘帅在大会上批评了这种说法："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党的干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在学校里，教员起五更睡半夜，工作是最辛苦的。应该提高教员的地位与待遇。教员是学院里的无冕之王，就象李太白，遇官高一级嘛！今后，每年的学习节首先应该树立这种尊师、敬师的高尚校风，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⑱文化外语教授会女教员谭寿芬刻苦编写教材，数理化课讲得深透，深受学员欢迎。刘帅每次开大会都把她请到主席台上就座，树为标兵。刘帅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尊师重道的榜样。

（二）注重教员的培养

刘帅认为，要建设高质量的教员队伍，就要在培养教员上下功夫，使教员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为此，刘帅通过多种渠道培养教员：一是举办师资培训班。对从部队和学员选调当教员的，刘帅把他们集中起来训练，并亲自上课。在一些主要课目学完以后，他对这些同志进行面对面的口试，评定等级，鼓励这些同志大胆登台讲课。新教员试讲，刘帅总要组织人员听课，互相观摩，进行考核，通过后方可上课。二是以老带新，提倡教员互相学习，发动老教员对新教员搞好传帮带。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刘帅以一个老教员的身份为新教员们作讲课示范。1952 年 5 月，他给高、上级速成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一课时，前后用了 18 天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编写了 3.7 万字的讲授提纲。这次课讲得十分成功，震动了全院。有一个教员向刘帅请教讲课诀窍。刘帅说：这是几番辛苦一堂课，18 天准备 6 小时讲完，如果有什么诀窍的话，那就是四个字：“昼夜不息”。三是抓好教员的在职学习，不断更新知识。1954 年，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军队以训练为中心的任务，而训练干部则是中心工作的中心。”这个决定在全军掀起了军事训练高潮，训练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面对这种新形势，刘帅说：“水涨了，船怎么办？水涨船必须高，不然，船就要沉。”刘帅提出对教员实行集训、函授，以不同方式提高在职教员的知识水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四是勉励教员刻苦自学。刘帅勉励教员要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刻苦勤奋精神，有“头悬梁、锥刺骨”的迫切求知欲望，还要广学博问，对自己担任的课程娴熟深解，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出水平，出质量，出成绩。

（三）关心教员生活，解除后顾之忧

刘帅非常关心教员生活，想方设法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使教员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学上，刘帅重视办好各类食堂，使教员一家一桌就餐，随到随吃，十分方便。在刘帅的支持下，军事学院试行“教员补贴费”制度，每月发给教员一些钱，让他们订购

学习进修的书籍杂志。建国初期，全军实行供给制。当时一般学员的供给标准每人每天是28两（每斤16两制）米，但对院校教员和干部日供26两米。为了差的这二两米，刘帅让训练部起草了一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并由他亲自签发。报告建议院校教员和干部的待遇应与学员一样。从这二两米的小事上，可以看出刘帅对教员无微不至的关怀。正是这种关怀，激励着教员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

四、循规律，实现高质量的教学过程

（一）摸清学员底数，因人施教

刘帅经常对教员讲：学员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和工作重点，我们一定要熟悉各类学员，面向学员，为学员服务。刘帅身体力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高上级速成系学员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有丰富的战斗与工作经验，政治质量、理解能力与进取心均强，求知心切；但多数文化低，记忆力弱，科学知识差；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容易接受真理，自我批评精神较好，但相互批评较差，因而在思想斗争上自由主义现象也较为普遍；课程内容较多，时间紧，消化不了，身体吃不消。对此，刘帅主张以“循循善诱”的方法向学员传授学业，并针对不同的学员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不搞“一刀切”。一是在文化补习上，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安排恰当的教学内容。将初中文化程度者编入甲班，将高小文化程度者编入乙班，将只具有初小文化程度者编入丙班。规定各班学习的主要课程均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地理，但其中甲、乙班以数理化为主，丙班以语文为主。二是针对学员在学习上听强于看，说强于写，理解力强于记忆力等特点，强调在教学方法上要改革，要贯彻“练从于训”的原则，即教员少讲、精讲；学员多作作业、多练习、多实验，求得融会贯通与熟练运用。三是在教学实践中总结教学经验，及时推广。比如，对丙班的语

文课，刘帅提出划分“写字、写话、写篇、综合运用”四个阶段实施。对甲班和乙班的语文课，他建议采取“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原则。对数学课，他总结了“边讲、边练、边研究、边总结”四个方面统一结合的方法。对理化课，他归纳了“讲解、实验、总结”六个字，使这些学科的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遵循技能形成规律，建立科学的教学程序

学员的技能形成是一个由不会到会、由不熟练到熟练的渐进过程，因此，只有建立一个与技能形成过程相适应的教学程序，才能达到教学目的，保证教学质量。刘帅经过长期教学实践，在总结了几年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一套适合学员能力提高规律的最佳教学程序，具体概括为：“先进行新兵种兵器、技术见学，以增进对新事物的感性知识。教授的顺序是：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战术，再作想定情况，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军兵种串联组织起来，锻炼学员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战斗的能力。随后又由课堂到野外进行现地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证明理论原则。这样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编织起来，是最实际有效的方法。”⑲

（三）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军事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军校教学必须突出实践这一重要环节，才能保证教育质量。因此，刘帅在抓军校教学时，始终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注重教学实践环节。他指出：“关键是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运用。”刘帅还举例说明实践的重要：“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⑳因此，在教学中，他非常强调课堂教学与现地作业相结合，尤其是战术课目，要尽量搬到野外去。刘帅认为：想定作业就是实践，

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搞好现地作业和战术演习，就是接近实际的战争锻炼。对军事指挥员来说，野外是个大课堂，眼能看到，手能指到，身临其境，便于设置复杂多变的情况，不仅利于练思想作风，更利于练战术技术，练组织指挥。野外训练搞好了，不仅可以将理论付诸实践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而且还会弥补理论的不足，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使学员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在刘帅倡导下，军事学院在战术教学中，野外作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高级系和基本系，差不多每期都要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术演习。据统计，在刘帅任院长期间，共进行较大演习35次之多。由于演习接近实战，提高了学员指挥作战能力。

五、重实效，建立高效率、高质量的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

刘帅十分注重从院校实际出发，改革院校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保障军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军事学院建院初期，由于迅速发展扩大，在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机构重迭、工作人员职责不明、规章制度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刘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依据办学规律，遵循“横宽纵短，单刀直入，减少层次，提高效率”的原则改革院校管理体制

刘帅认为，在体制上，院校不同于野战部队，不能照搬部队体制，而应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管理体制。横宽纵短，单刀直入，减少层次，提高效率，就是他改革院校体制的基本思想。刘帅认为院校编制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横宽纵短”，应实行团一级的、面对面的、单刀直入基层的管理方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帅决定裁并学院编制，砍掉多余的“小指头”。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使学员与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1∶2.3。这样一来，机关层次减

少了，教员队伍充实了，上情下达快了，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

“集中领导，分工负责”是刘帅对整顿组织、改革机关工作和训练工作提出的又一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学院制定了各级干部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职、有权、有责，使整个机关在统一集中领导下，经纬交织，协同动作。刘帅把这种做法叫做“执事者各执其事。”做到因事设人，各尽其职，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三）严格考试制度，把住教学质量关

严格的考试制度，是检验人才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手段。刘帅在军事学院期间，对学员实行国家考试。所谓国家考试，就是由国家统一命题，由中央军委各总部领导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实施军事理论与想定、政治课程考核。考试验收工作搞得隆重、严肃、认真。1954 年 3 月，基本系和情报系进行毕业考试，由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对毕业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和验收。考核主要是口试和想定作业。最后，由考试委员会按五级分制评定考试成绩。成绩不及格者不准予毕业。由于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不仅使学院教学质量受到了严格的检验，而且激励教员和学员认真教授和学习，有力地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四）实行淘汰制度，保证毕业学员的质量

实行淘汰制，是搞好教学管理保证教育质量的又一重要手段。在刘帅的主持下，军事学院的淘汰制相当严格。如军事学院规定：政治、德行不好，学员毕业考试哪怕门门 5 分，也不能评定为优等生；政治、德行不及格不发给毕业证书；文化考核不及格者，按规定淘汰。基本系和情报系第一期学员入学时是 427 人，到毕业只有 324 人，淘汰了 103 人，即 4 个入学者只有 3 个入合格毕业，从而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

刘伯承元帅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了，但他加强军校教育质

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以邓小平军事教育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刘伯承加强军校教育质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提高新时期军校教育的质量，为我军建设实现“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标做出贡献。

注　释

①《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624 页。

②《刘伯承回忆录》（第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第 39 页。

③④⑤《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885、第 644、第 660 页。

⑥《元帅教育家》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132 页。

⑦⑧《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657、第 688 页。

⑨⑩《元帅教育家》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100、第 101 页。

⑪《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682 页。

⑫《刘伯承元帅研究》（一）重庆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第 192—193 页。

⑬⑭⑮《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689、第 677、第 640 页。

⑯⑰⑱《元帅教育家》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110、第 51、第 57 页。

⑲《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888—887 页。

⑳《元帅教育家》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4 月版，第 154 页。

刘伯承开放办学思想浅探

谭仕禄　少将

刘伯承的开放办学思想，是他在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适应我军特点的行之有效的办学方法和艺术，也是他整个军事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伯承认为，要办好院校，必须打破闭关自守，冲破狭隘意识的束缚，开阔视野；必须立足我军实际需要，着眼长远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坚持运用毛泽东军事教育思想指导我军院校建设和教育训练；必须面向未来和面向世界。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建军人才，才能适应我军建设需要和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刘伯承的开放办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视外军研究，善于以敌为师，科学地借鉴有益经验，大力发展我军教育事业

我军的军事院校是在战争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军院校建设遇到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办校条件恶劣，师资力量薄弱，教材、教学手段、教学经验都比较缺乏，与战争的需要和与我作战对象相比差距较大。刘伯承认为要迅速改变这种现状，就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善于变别人经验为自己的经验，才会少走弯路，赶上和超过敌人。因此，他指出：尽管世界各国的国情、军情不同，发展军事科学的目的各异，但是，各国的军队在研究技术、发展学术，指导军队建设、训练和作战中的有益经验是可互相通融和借鉴的。只有广泛吸取外军的长处和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才是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加速我军建

设，增强我军战斗力所必需的，也才是发展我军院校教育训练的根本途径。为此，我军的教育训练绝不能搞"坐井观天"的封闭意识，要敢于大胆解放思想，实行开放性办学方针，虚心向别人学习，甚至敢于向敌人学习，积极吸取别人的先进经验和长处，兼收并蓄，才能不断提高我军的教育训练水平。基于这种认识，刘伯承在办学的实践中，积极带领大家进行外军研究，广采博览，取人之长，为己所用，不遗余力地把别人一切先进的东西学到手。在我军建设和部队教育训练的各个时期，刘伯承针对我军教育训练的实际需要，翻译、编著、介绍了大批外军有价值的、先进的军事经典著作和教材教令，并充实到教学中去。比如，在红军时期，他组织翻译了《苏军政工条例》、《苏军山地战斗》等军事著作。抗日战争时期又翻译了《合同战术》、《军队指挥法》、《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等著作。解放战争时期，他编译了《论苏军全国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军事论著。建国后又编译了大量的苏军条令、条例和军事教材。这些军事论著、教材、条令的编译引进，为我军的教育训练提供了依据，提供了最新的军事知识、军事技术和军事信息，极大地促进和深化了我军教育水平，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同敌人作战的本领和军事技能，使我军军事教育训练摆脱了低层次，迈向了高层次，也极大地发展了我军军事教育事业。

刘伯承的开放办学思想还体现在善于学习、研究、借鉴外军的先进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上，敢于以敌为师，大胆地从作战对象身上吸取作战和训练中有益的东西来提高我军教育训练水平。他认为，只要作战和部队建设所需，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日本的，先统统拿来，然后剔除糟粕，逐步消化，为我所用。他常教导大家：我们的敌人正在拼命的学习，以对付我之作战。我们作为劣势装备之军，更应善于学习，不但要学自己的，更要学习敌人的经验和长处。因为要战胜敌人，就要彻底了解敌人，摸透敌人的战略战术，掌握敌人的作战特点和规律，才能玩敌于股掌，彻

底制服敌人。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针对我军部队作战英勇，政治素质好，但军事技术差，战术水平低的特点，在军大和战斗骨干培训班以及部队训练中，把日军的《战斗纲要》、《阵中要务令》、《作战要务令》等军事教令和教材作为我训练和研究的根据，并明确地指出："把日本作战要务令，尤其它最近对我作战的教令等作为第二种教材"①。并积极带领大家以敌人为师，精细地研究日军战法，结合实际进行训练，苦练精兵，努力探讨胜敌之策，创造出了"麻雀战"、"破袭战"、"猛虎掏心"、"重叠伏击"等优秀战法，打得日本强盗闻风丧胆，使他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成为抗击日寇入侵的"铁脊梁"。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号召大家以国民党军队为师，探讨对付敌人的战法，并针对作战需要，广泛开展"以战教战"的群众性大练兵。明确指出："训练问题是建军的一个重要部分，训练是战争的准备"②。他反复强调教育训练的重要性，要求部队在探讨对付敌人的战法时做到四个结合，即：借鉴敌人的经验要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理论指导与实际作战相结合；练战术与练过硬的技术相结合；练战法与练谋略相结合。由于刘伯承的开放性教育和开放性训练，推动了教育训练的深入开展，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增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夺取解放战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为创建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伯承在倡导开放办学时，及时提醒大家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防止故步自封、自我满足，拒绝接收新东西的"关门主义"。他认为搞教育训练如果目光短浅，思想保守，眼睛只会盯住自己的一点经验和长处，不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不思进取或者吃老本，害处很大，就难以有较大的长进，时间一长，就会思路闭塞、眼界狭窄、耳目不灵，就容易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永远落后于别人。二是要防止脱离我军实际，不问情由，不顾客观现实的变化，只要是外国的东西，一切照搬照套的"拿来主义"。他认为这种"拿来主义"于我军建设没有丝毫好处，只能坠入机

械论和唯心主义的泥潭。正确的开放办学，应有选择的借鉴，剔出糟粕，取其精华，立足我军需要，创造性的加以发挥，这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才能真正达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

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大胆用其所长

刘伯承开放办学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大胆用其所长。他常说，一所院校能不能办得好，关键在教员。如果没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员队伍，编写不出高质量的教材，要搞好院校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十分重视尊重知识，珍惜人才，并积极发挥学有专长人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胆地让他们为我军教育训练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刘伯承在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期间就积极动员、广泛邀请他的许多老战友及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邓小平等担任红军大学的特约讲师或教官，并在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经过黄埔军校、保定军校、西北军校，苏联红军大学、苏联基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学校的军事教官。他认为，这些教官过去所学的东西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红军的要求，但是，这些人都具有相当高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水平，是红军学校的主要骨干力量，只要大胆用其所长，对提高红军部队的军事素质和加强红军建设十分有利。

建国后，刘伯承在创办军事学院期间，由于师资力量缺乏，他四处奔走，积极动员有关部门调出优秀人才加强学院的师资力量，尽管如此，仍满足不了教学的需求。经中央军委批准，他毅然选用了 200 多名国民党的旧军事人员当军事教官。当时军事学院的学员大都是我军战功卓著的高级指挥员，许多同志对刘伯承这一有胆识、有气魄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对此，刘伯承一方面积极开导这些旧军事人员，让他们相信我们党的政策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绝不纠缠历史旧账；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打消顾虑，大

胆发扬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军的军事教育服务。另一方面，他对一些有成见的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教育大家：古时候赵武灵王都知道以敌为师吗，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对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要用其所长，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在中央根据地时，就请了被俘的国民党52师师长陈时骥当红校的教员。红军2、6军团在长征时候，也曾请了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张振汉讲过课。大胆使用有专长的各种人才，有利于我军建设和有利于提高我军战斗力。他要求学员："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要老老实实学习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③实践证明，刘伯承这一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对迅速改变我军教育训练水平，提高教育训练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从实际出发，面向部队，拓宽我军教育训练的途径

刘伯承办学，始终坚持战争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学什么，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战争的要求，就是军队训练的目标。因此，他要求，教育训练必须紧密贴近我军实际，教育必须面向部队，才能使教育训练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

在战争年代主要方法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战教战。每次战斗结束之后，刘伯承都要求及时进行战斗总结，对行之有效的经验及时加以推广运用，并将这些经验拿到学校或干部培训班上加以研究，进行深化和提高。对战斗中的教训，则认真研究，找出其根源，制定出改进的办法和措施。真正做到了打一仗进一步。除此之外，刘伯承还利用战斗间隙对典型战例进行解剖分析，让大家都受益。如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关家垴歼灭战之后，刘伯

承利用战斗间隙将129师的干部和部分参战部队拉到战斗现场，进行实地教学，按战斗的实际进程，逐段推演、逐段总结分析，练战术，练指挥。使参战部队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受益匪浅。象这种利用战斗实例教学，以后还搞过多次。刘伯承的这种"以战教战"方法，使教学紧密贴近了作战实际，真正达到了"教育训练直接为战争服务"的目的，开创了战争年代教育训练如何面向实际的先河。

和平时期教育训练面向部队的主要方法是：走出去，请进来，变小课堂为大课堂。刘伯承认为，院校的教育训练必须加强对部队的针对性，必须面向部队的实际需要，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会受部队的欢迎。所谓走出去，就是院校教学一定要加强与部队的联系与协作，要经常深入到部队进行参观见学，学习部队训练的先进经验，带回学校运用到教学中不断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凡是部队组织大型军事演习，都应组织参观学习，变部队的经验为教学需要。比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刘伯承曾三次组织军事学院院系领导和教员100多人次的见习团到朝鲜前线见学取经，及时了解前线情况，以促进学院的教育训练工作。以后还多次组织学员到部队参观见学，密切了部队与院校的教学联系。所谓请进来，就是请部队的领导和分管训练工作的同志到院校来观摩教学，给院校的教学工作提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院校的教学工作，使之更加贴近部队的需要。所谓变小课堂为大课堂，就是院校教学应尽量结合现地，在课堂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把课堂搬到现地去，多搞实兵演习和示范性演习，使教育训练尽量符合实战要求。刘伯承曾明确指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如国家较长期处在和平的环境，必须推进国防建设而无法吸取战场经验时，就必须依靠实兵演习的经验以代替实战经验，这是训练军队收效最好的方法"。他又指出"经常实施各种不同的实兵演习，以贯通理论知识，以教会学员这种训练军队的方法，应为学院今后采用的训练方法，进而求得在全军开展"④。所以，刘伯承在军事学

院期间，十分重视现地作业和实兵演习，他亲临训练场，组织指挥军事学院实施了 35 次实兵演习和 12 次大的现地作业，较好地解决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提高了学员的合成指挥能力，使院校的教学贴近了部队的实际。

四、面向未来，努力吸收世界先进军事科学成就

刘伯承常说：世界是发展的，战争是发展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也是发展的，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看过去和现在而不看将来。因此，院校教育的根本着眼点始终是为了科学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培养适应未来军事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为我们“从现在的实际，走到将来的实际”去做准备。刘伯承反复强调，教育一定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如果我们的军事教育仅仅停留在过去的经验上，思想束缚在“小米加步枪”上，对未来世界的军事发展趋势不了解，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对现代条件下的诸兵种合同作战不熟悉，思想适应不了现代战争的需求，打起仗来非吃亏不可，迟早要被现代战争所淘汰。为此，他大声疾呼：“军队高级干部的素质如何，关系整个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要学习，要尽力学习，水涨船要高，不然要被淹没掉。自己学习，才能帮人，师高弟子强，强将手下无弱兵”⑤。为了使院校的教育训练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刘伯承在办教育中特别是办军事学院期间，费尽了心血，他亲自审定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材教案。突出抓好三点：

一是突出了狠抓干部的教育训练。刘伯承认为，干部训练是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环节，干部素质好坏，对部队军政素质高低和战斗力的强弱有直接影响。“干部决定一切，故教育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面”⑥。因为，干部的现代化知识多了，合成指挥能力强了，就能带动部队的现代化知识的提高。所以刘伯承倾尽全

力来抓干部的培养。他指出："要用多种多样的办法训练干部"。比如让干部进正规院校学习深造；举办短期培训班、轮训队培训干部；让干部积极参加各种军事演习，参观见学等来提高干部。总之，抓好干部训练，是训练中心之中心，要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各级干部的技术、战术水平和军事理论素质。由于刘伯承十分重视干部训练，注重全面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培养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指挥员，对加强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在教学上狠抓了突出现代战争知识和合同指挥能力的提高。刘伯承常说："现代军事科学，是现代军人不可缺少的学问"。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方法主要靠学习和研究，作为军事院校来说，应把掌握现代战争知识和指挥能力作为主要教学目的。因此，在教学课程设置上，刘伯承强调一定要突出现代战争特点，以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合同作战为主要教学内容，通过正规、系统的教学，让学员全面打牢基础，提高合同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在教学方法上应采取先讲理论、原则；再讲兵种应用技术和战术；尔后按现代条件下作战要求编写出想定进行图上作业；最后进行现地作业或实兵演习，一步一步地抓扎实。刘伯承为了让学员掌握更多的现代作战知识，他还亲自登台授课。比如，他用 18 天时间，昼夜不舍撰写出《集团军进攻战役讲授提纲》，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理论原则和实际指挥方法，使学员大开眼界深受教益。

三是狠抓了军事学术研究。刘伯承一贯认为，研究现代战争特点，掌握现代战争的指挥手段，一定要从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入手。只有从理论上搞清了现代战争是什么和为什么，行动上才会自觉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去做，要让军事理论研究走在战争的前面。为此，刘伯承注重了一手抓教育训练，一手抓学术研究。在军事学院成立了科学研究部，号召大家积极对未来作战、未来世界军事发展变化的趋势、敌人作战特点和作战手段的变化、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研究。

要求科学研究部经常举办学术报告会、研讨会，举办各种展览，用详细的资料带动学术研究的开展。刘伯承还带头开展学术研究，积极撰写研究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军事学院的研究空气蔚然成风，产生出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成果至今还在对我军建设和院校建设起指导作用。

学习刘伯承开放办学思想，最关键的是要掌握其精髓，运用其精深的理论原则，结合当前改革开放的实际，指导我军院校建设，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应着重把握以下问题：

第一，要树立大胆解放思想，进行教学改革的思想意识。

军队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直接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大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使军队院校建设有一个质的突破，大胆解放思想，实施教学改革是个关键。使军事教育跟上时代的步伐，贴近部队建设的需要，是院校教育发展的根本出路。解放思想，深化教学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出更多的合格、对路、顶用的、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高质量人才。要达到这一目的，教学中必须优化教学程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管理，才能真正把教学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院校教育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个面向”。

学习和运用刘伯承的开放办学思想，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紧密结合我军实际，认真探索现代军事教育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把握现代军事教育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军事教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具有生机与活力。因此，在教育训练中，要把教学的立足点和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员适应现代战争需要上和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上。在教学内容上，要突出现代战争特点，尽量把现代战争需要的东西融于教学中，让学员掌握更多的现代战争知识、作战技能和组织指挥能力以及管理部队、建

设部队的本领，以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在教学方法上，应以研究外军为突破口，瞄准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趋势，科学的借鉴外军一切先进的军事教育经验，为我所用，不断改进我军教育训练的方法，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军事教育训练的新方法，使我们的军事教育更加适应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的需要。

第三，密切院校与部队的协作，共育人才。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刘伯承开放办学思想，应注重加强院校与部队的密切协作，共同培养部队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一是充分发挥院校优势，多层次、多方面的为部队服务。一方面，应有计划、有步骤、定期、不定期、分期分批地派遣教学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教员深入到部队，对部队的教育训练进行指导帮助；及时为部队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为部队培养各种骨干；与部队共同探讨重点、难点训练课题，帮助部队解决训练中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院校要积极发挥智囊作用，为部队提供各种信息反馈和咨询服务，为部队建设出谋划策，帮助部队解决棘手的问题和带根本性的问题，促进部队建设。二是院校教学要及时吸取部队训练的先进经验，改进院校的教学方法。院校要经常聘请部队教育训练和管理教育有经验的同志到院校进行教学和经验交流，广泛听取部队对院校的意见和建议，使院校的教育更加符合部队的实际需要。三是部队要积极支持配合院校教学。部队要把院校培养学员当作是为自己部队培养干部，是自己部队的事，主动与院校进行联系和协作，把部队作为院校学员的实习基地，积极为学员实习提供一切有利条件，具体对学员实行传、帮、带，教给学员管兵、带兵、训兵的方法，增加学员的感性知识，让学员把理论知识变成实际工作能力。总之，只要院校与部队广泛联系，密切协作，训用共管，形成合力办校，院校教育就能搞得扎实，教学质量就会稳步上升，就会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从面推动部队教育训练的深入发展，把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注　　释

①⑥《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287、第227页。

②③④⑤《中国军事科学》1991年第3期，第29、第35、第31、第36页。

理论与实际结合

——刘伯承军事教育思想的精髓

王文荣少将　齐生平上校

刘伯承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同时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在艰苦的环境中办学，以战教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全国解放以后，他又创建了军事学院——这座全军最高学府，为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院校建设理论与实践，承古今之所长，融中外于一炉，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军事教育思想。理论与实际结合，融会贯通于他全部的军事教育论著和军事教育实践活动之中。今天，认真学习与发扬这一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化军队院校教育改革，促进新时期军队教育与训练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在军队院校教育中，为什么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认为，这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军事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的。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军事理论，都来源于战争实践，并经受了战争实践的严格检验，都是主观思维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产物。只有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培养出高质量的军事人才。

1951 年 7 月 1 日，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庆祝建党 30 周年大会上所作报告的题目是："我们应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

风，钻研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而善于运用之，以争取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在这个报告的前半部分，他着重讲了如何认识学习军事理论必须与实际结合的三个问题：

1、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说明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

刘伯承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不仅是说明世界的科学，而且是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由于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并经受了实践的不断检验，所以，它决不是圣经式的空泛说教，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列宁、斯大林把它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向前推进了它，用新的内容丰富了它；毛泽东把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向前推进了它，用新的内容丰富了它。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就要发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这样，才能真正弄清它的实质，并用它来指导现实斗争。

2、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军事思想

刘伯承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结晶体和统一体。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并不是照搬照套，而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有创造、有发展。“于土地革命时期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于抗日战争时期则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于解放战争时期则有1947年12月25日发表的‘十大军事原则’等。”①土地革命战争的理论拿到抗日战争有发展，到解放战争又有发展，到抗美援朝战争更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今天，

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样不能死记毛泽东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得出的现成结论，而是要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着重学习毛泽东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实际问题的胆略、气魄和能力。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新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推向前进。

3、一切军事理论都是与实战相结合，并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严格检验的理论

刘伯承认为，军事科学自然是属于理论的东西，同时也是极为实际的东西。应用性和实践性是军事理论的显著特征。从一般意义上讲，一切理论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从特殊意义上讲，军事理论所经受的实践检验是最为严格和最为残酷的。如果说，对其他领域、其他学科理论的检验是在试验中，在生产中，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那么，对军事理论的最终检验则是在两军交火的战争中，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军事理论，都是切合战争实际、符合战争规律的理论，因而在实战中也都是流血少、代价小，而歼敌多、胜利大的理论。军事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军队院校教育训练工作的艰巨性。刘伯承强调，军事学院的教育训练必须对学员负责到底。所谓负责到底，就是不但要负学习之责，还要负指挥作战之责；不但要负“杀敌三千”之责，还要负“自损八百”之责；不但要负胜利之责，还要负未达到目的而暂时受挫之责。教育训练的目的，是让学员把所学军事理论正确用之于战场。要根据学员在战场上作战的成效来评定教员在教育训练工作中所做的贡献，“实战战场上的胜败即是测验我们教育工作成绩好坏的试金石”。②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在军队院校教育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就原则讲原则，而是引导学员从军事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来源于战争实践、又

受战争实践严格检验的特性上，深刻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样做不仅使学员加深了对军事理论的理解，而且从中找到了正确的学习方法。

（二）

在军队院校教育中，怎样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刘伯承提出，从实际出发，把学员的实践经验提高到军事理论的高度，并正确运用这些理论研究现实问题，指导现实军事斗争。在现实军事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和丰富理论，以指导未来的军事斗争。这就是说，对一切军事理论，都要在实践中运用，在运用中丰富和发展。无论是运用也好，丰富发展也好，都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检验为唯一标准，并以指导新的军事斗争实践为根本目的。

刘伯承提出的这种办法，在军事学院的教育训练内容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相结合

军事学院创办初期，入院学习的学员都是经过一二十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干部，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刘伯承根据学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身当其时，身当其事”的特点，首先引导他们联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学习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军事著作。然后以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军事著作为指针，采取个人写作与集体写作相结合的方式，编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战役战斗战例，归纳和总结自己的实战经验。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共有100多名学员编写出82个战例。当这些战例汇集成册、付梓出版后，他又引导学员根据自己在编写战例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研究探讨正在进行着的抗美援朝战争问题，研究探讨未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1955年7月，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正式建立了战史系。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战史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实施计划，提出先研究抗美

援朝战争史，跟即溯而上之研究解放战争史及再前抗日战争史。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亟需系统研究人民解放军战史，使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发扬光荣的战斗传统。这些做法，不仅把学员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高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学员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学习现代外国军事理论与研究现代战争经验相结合

刘伯承一向重视学习外国军事理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曾翻译校正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合同战术及其他军事理论著述，并将其中有益的东西运用到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中来。在军事学院教育训练中，他进一步指出，不仅要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还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的成就”，“对敌、友、我三方面都要调查研究和学习”。③

当时，军事学院学习外国军事理论，主要是学习以集团军攻防战役为主的现代大兵团作战的理论概则及协同动作。这对提高学员在现代战争中的组织指挥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在学习这些理论时，刘伯承强调，第一，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结合。主要研究在苏德战场上，战争双方进行大规模攻防作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在太平洋战争中，美、英军进行岛屿登陆作战的一些特点。重点研究 1944 年 1 月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在一年之内接连发动的十个战略性进攻战役，即所谓的“十次打击”。研究其战役准备、战役布势，以及战役实施过程中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和技术保障。第二，与研究朝鲜战争经验结合。从朝鲜战争一开始，刘伯承就密切注视着这场战争的每一步发展，并通过多种渠道把这场战争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学员：让调到朝鲜前线任职的高、上级速成系学员汇报战争情况；邀请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到学院作报告，介绍战争情况；派见学团到朝鲜前线实地考察、见学取经，直接汲取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丰富营养。他曾经组织院、系领导干部和各教授会主任近百人次，三次到朝

鲜前线见学，调查了解美军的战略战术、备战措施和战争潜力，学习研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阵地设置、步炮协同和通信联络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并指示见学团编写了《朝鲜战地见学报告》、《朝鲜战争有关情况汇集》等资料，印发全院学习。在此基础上，他领导全院教研人员广泛深入地研究这场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及对未来战争的深远影响，着力探索在现代战争中集中兵力、发扬火力和加强后勤保障等重大军事学术问题。刘伯承强调学习外军经验的目的是加速人民解放军的自身建设，以赶超世界先进军事科学水平。他认为这种赶超，并不需要一切都从头开始，“而是从自己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出发去赶，从学到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已有的成就出发去赶，从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就出发去赶”。而这一切赶超又必须建立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乘国内的和国外的现代科学成就之势而利导之，以为国防服务”，④才是走捷路，省时间，可以迎头赶上的办法。

3、学习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理论与现地见学、实兵演习相结合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方向转变。为适应这一转变，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学员认真学习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与指挥，并把这种学习同现地参观见学、实兵演习紧密结合起来。为此，他提出了“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编织起来”的施训方法。即：“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战术，再作想定情况，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兵种串联组织起来，锻炼学员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战斗的能力。随后又由课堂到野外进行现地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证明理论原则。”⑤

在具体实施中，刘伯承首先安排学员学习条令条例，领会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一般理论概则；尔后带领学员到海、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部队现地参观见学，了解这些军兵种的技术性能和战术动作，为组织协同打下基础；最后则指导学员实施一系列较大

规模的现地作业和实兵演习，从中掌握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

对现地作业和实兵演习，刘伯承非常重视，许多重大演习他都亲自担任军事总导演或演习指导部部长，亲自主持制定演习计划及实施方案，并亲临现场指导部队演练。他坚持全面演练的原则，不仅演练技术战术，还演练政治工作和司令部工作，把练技术战术与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高演习的质量；他坚持练为战的指导思想，做到部队建设缺什么就练什么，未来战争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他常说，演习应等如实战，一切都要力争与实战相同，才有示范指导作用。1951 年 6 月，在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演习，即临淮关演习中，他根据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经验教训，着重演练了步坦协同、战斗队形变换、工事伪装和通信联络等问题，取得了酷似实战的良好效果。1954 年 11 月，在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即山东半岛演习中，他根据“现代战争在主要战场上的正规战，是诸兵种的合同战斗”⑥的特点，又着重演练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与指挥。他让参加演习的 20 多名兵团级以上高级干部，分别担任演习部队的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情报、防化等部门首长，以及快速集群、航空兵、装甲兵等特种部队指挥员。要求他们现地摆兵布阵，谋划决策，并完成一系列图上作业。这次演习，不仅为全军高级干部学习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 1955 年 11 月中央军委组织的，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辽东半岛抗登陆大演习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注重现地见学和实兵示范演习，是刘伯承军事教育思想的突出表现。刘伯承认为：“实兵演习最接近实战，如国家较长期处在和平的环境，必须推进国防建设而无法吸取战场经验时，就必须依靠实兵演习的经验以代替实战经验。这是训练军队收效最好的方法。”⑦从 1951 年 6 月临淮关演习始，到 1955 年 6 月“登陆和抗登陆战役双方两级带通信工具的首长——司令部演习”止，在

四年的时间里，刘伯承组织指导军事学院共实施了35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和12次现地作业。其中临淮关演习还拍成了军事教育影片，在全军放映。这些实兵演习和现地作业，对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军事训练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结合，是刘伯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军事教育思想，在军事学院教育训练内容上的集中体现。其实，刘伯承的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教育训练内容上，还体现在教授法与学习法、教学活动与科学研究活动等教育训练的各个环节之中。从实际出发，把学员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再用理论去指导现实斗争，使理论不断发展和不断深化，始终坚持学与用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发展的统一，这就是刘伯承军事教育思想的真谛。

（三）

刘伯承认为，在军队院校教育中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不是一帆风顺和轻而易举的，而是需要认真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经验主义就是满足于旧有的一套，不愿意接受新事物，不愿意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教条主义就是脱离优良传统，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和本本，而企求另搞一套所谓的“现代化”。这两种思想倾向从认识论上讲，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此，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要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思想倾向。

根据军事学院干部队伍的思想状况，刘伯承指出，在反倾向中反经验主义是主要的。当时，军事学院的干部，特别是学员，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胜利之师”的中、高级指挥员。他们身上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二是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由于这两个特点，使得一部分人在人民解放军实行大转变时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存在着只看重实战经验而轻

视理论、轻视科学文化知识的思想倾向。对此，刘伯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纠正：一是结合建国初期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开展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等运动，对学员进行思想整顿，克服居功自傲、不求进取的思想倾向；二是通过大会小会启发诱导学员认识学理论、学科学文化知识，对于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重要意义，从而正确对待自己的斗争经验，自觉丢掉经验主义的思想包袱；三是深入到学员中间促膝谈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刘伯承曾经到高、上级速成系、基本系和战役系学员中间，给他们讲日俄战争史，讲苏联话剧《前线》，讲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大家不要学目不识丁、不学无术和孤陋寡闻的俄国将军，不要作《前线》剧中保守落后的军官戈尔洛夫，更不能重演李自成农民军的历史悲剧。

在主要反对经验主义的同时，刘伯承也注意防止教条主义。他曾多次批评基本系的个别学员只知道照搬照套外国的东西和背诵本本上的条文，而不能正确运用这些条文说明现实斗争的现象。他语重心长地对学员说，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不能致用就可能犯教条主义错误。“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⑧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学到手。

在反对两种思想倾向中，刘伯承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从 1953 年开始，军事学院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广大学员刻苦学习、学以致用，全院的教育训练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这说明，刘伯承在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做法是正确的和卓有成效的。今天，我们学习刘伯承的军事教育思想，认真总结和吸取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与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1、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就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分析世间一切事物，而不能用凝固的、僵化的观点看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试、敢闯、敢冒的革命精神，勇于打破传统观念和本本主义的思想束缚。这方面，刘伯承的做法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当时，他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一方面引导学员破除对经验的盲目性，要求把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另一方面又引导学员破除对本本的盲目性，强调理论只有在指导实践中不断发展，才有生机和活力。他常常对学员讲，世界是发展的，战争是发展的，战略战术也是发展的。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看过去和现在，还要看到将来。他在充分肯定人民解放军在“小米加步枪”时代形成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反复教育学员要放眼世界、重视未来，不仅要努力掌握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与指挥，还要学会原子武器、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战略战术，从而在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基础上，建设一支面向世界、驾驭未来战争的“如虎添翼”的国防军。今天，我们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样需要破除对旧有的经验、对传统的思维模式的盲目性，以及对某些原则、对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和认识。要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在深化院校教育训练改革的实践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创造新业绩。

2、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就要唯实务实、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在要求，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坚持这一点，就要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认识与实践相统一，保持一种唯实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当时，刘伯承提出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正是为了在军事学院的教育训练中提倡这种科学态度。他在对全院的报告和讲话中，多次列举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表现，指

出这些思想表现归结到一点，就是分析研究问题不从实际出发，或是把过时的陈旧的经验拿来指导现实；或是用外国的东西、本本上的东西生搬硬套现实。其结果必然是使思想认识与现实斗争脱节，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悖。他反复告诫学员，要从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以及即将全面开始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有的放矢地学习理论，深入研究探讨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建设问题。刘伯承的这些观点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我们应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性地研究解决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认真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思想路线，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而不是以验证旧有的经验或注解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为目的；要敢于坚持不唯书唯上、只唯实求实的科学态度，深入实际、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把院校教育训练工作搞好，把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3、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就要改进对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正确的理论永远是实践的指南。防止和纠正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完整地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正如刘伯承所指出的："我们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正是为了善于学习，善于致用。"⑨作为军队院校，尤其是指挥院校的学员，学一些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著作，增强理论素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对于组织部队训练，指挥部队作战都是十分重要的。学习军事理论，并不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时间的安排上越多就越好，而要结合实际精选、精读、精学那些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从中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学习军事理论，数不在多，贵在管用。注经释典、坐而论道的经院学风必须破除，照抄照搬照转的本本主义学风也要坚决摒弃。1953 年 5 月，刘伯承在给军事学

院《军学生活》报出版两周年的题词中指出："为保卫国防而学习，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这种学风才是我们最需要的。当前，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马列和毛泽东的一些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尤其要刻苦学习研究当今实践中的马列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用以解决新时期建军作战中的问题，在新时期军事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学习理论，运用理论，发展理论，创造理论。

理论与实际结合，是刘伯承在军队院校建设中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正有待于全军理论工作者和全军院校教研人员和广大干部共同继承和共同开发，并把它用到新时期军队院校建设更加宏伟的事业中去。这才是我们对刘伯承的最真挚、最深切的怀念。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⑧《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616—617、第619、第685—686、第685—686、第666—667、第633、第716页。

⑦1953年5月给中央军委的两月工作综合报告。

⑨1956年11月12日给军事学院党委的信。

共同学习政治　各自钻研业务

——刘伯承对院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创见

余伯由

军事学院成立时，刘伯承院长说："我的职责要求我做好两件事：一是贯彻党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办学方针，抓好全院的政治思想工作；二是抓好教学，圆满完成训练计划"。他在军事学院七八年期间，殚精竭虑、日以继夜地把主要精力倾注在这两个方面。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刘帅身边做秘书长等具体工作，他的嘉言懿行，犹历历在目，教益很深。正如邓小平同志说"伯承同志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

刘帅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人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号召"人人当院长"。他说："人人当院长、共同想办法，娃娃做'皇帝'，一个一个来"。当时学员都是我军高级干部，由于各自战争经验不同，文化水平高低不一，在学院学习一段后，对政治教育、文化学习、现代合同战术等，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学习态度和思想认识不尽一致。从乡村到城市，从前方到学院，环境和生活方式变了，暴露出各种思想倾向。要搞好教学，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院党委和院政治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了教学思想情况，刘伯承院长随即提出："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这一脍炙人口的口号。院党委规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为各系必修的共同课目。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武装头脑，联系实际，用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反对过去游击战争局限性所产生的经验主义，反对强调现代化而脱离我军实际

的教条主义”。同时，要求各级党委、总支、支部的领导同志，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结合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结合思想实际，整顿党纪和党风，建立和健全了适合院校特点的政治工作制度。

一、学院政治工作，要以保障训练为中心

刘伯承在毛主席1950年11月13日批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意见书》后，于11月21日从北京抵南京，第二天即开始办公。他抓紧在1951年1月8日开课前，于12月15日签发了军事学院训练大纲，紧接着花了十天时间召开了训练工作会议，明确了训练目的和各系训练计划，尔后又制定学院第一期政治工作计划大纲。强调“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指出：学院的政治工作，必须围绕军委赋予的培养高上级干部的总任务，加强党的领导，贯彻毛主席军事思想与建军路线，提高学习情绪，完成各项教学任务，以期加速现代化国防建设。

在1951年4月学院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上，刘伯承院长在讲话中强调“学院政治工作要以保障训练任务为中心，院政治工作就是训练的政治工作”。经过两年的摸索、实践和经验总结，院党委正式作出了《政治工作深入教授活动》的决议。院政治部、各部、系、班政工人员以大部分时间深入教学实践，逐步增加军事科学知识，逐步取得了发言权，为政治工作更有效地保证训练任务创造了条件。政工干部深入教学，一是能帮助教员与学员分析并找出学术进步快慢的原因；二是能提出讲授课业思想性方面的优缺点，并帮助纠正某些思想性和技术性的差错，提高教学质量；三是在研究问题或分析学员不满意见时，帮助判断意见的正确性。总之，只有深入教学实践，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更好地保障训练任务的完成。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军委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国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的长篇讲话。在讲到政治工作时，他说：“关于军队党委制，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首长分工负责，陈毅同志说得很简要很透彻，‘一是党委集体领导，二是首长分头执行，三是政治上动员群众’。政治工作提供保障作用的，较其他部门更加全面性。而且动员党与非党群众来行动的，用动员党的力量来保障的。现在是我们必须坚持发扬我军党的优良传统，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思想领导、群众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动员实现总路线，贯彻现代化正规化。我们军事学院以社会科学经济教授会为领袖教授会，用以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保障军事训练政治训练的实施。我们的口号是‘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肖华同志提出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政治工作必须与业务技术结合’，这是正确的。甘泗琪同志提出‘钻进去冒出来’，我认为非常好。政治工作要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培养出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人才。军队训练好了，敌人来侵略，就打得他片甲不留”。

二、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加强思想领导

政治理论教育必须结合思想实际，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刘院长指出：“学习理论，锻炼认识，提高思想”。

军事学院在进行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等系统的政治理论的教育时，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与此同时，根据毛主席给学院成立时“努力学习　保卫国防”的题词和军委关于“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指示，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刘院长就特别强调高度统一集中，反对分散独立；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习气；强调弹钢琴协同动作，反对单打一。在实施训练中，不断克服重战术轻技术，愿当指挥员、不愿做参谋

工作，重军事轻政治，重打仗轻训练学习；重前方轻后方等思想。除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密切结合思想实际外，特别加强党日教育和党日小组生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还规定每日半小时政治生活活动。刘院长在1952年“五五”学习节题词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当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解决各种具体任务的时候，那才是很有用的”。他在1952年10月军事学院党的院委会议上提出：“我们党委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走群众路线，以积极分子为骨干，与顾问密切合作，执行培养出现代化国防军德、才双全的干部”。他强调以身作则，院党委带头做好思想工作。他说：“我是真正努力学习的，愿和诸位同学”。他对学院部系班领导干部说：要学习，要努力学习，水涨船要高，不然要被淹没掉。自己学习，才能帮人学习，师高弟子强，强将手下无弱兵。

刘伯承在1954年1月军委系统高干会议上谈到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加强思想领导时说：“军事学院成立的第一天，就以‘放下包袱，开动脑筋’来勉励全院同志扫除现代化前进障碍——骄傲。开动脑筋就是努力学习，向现代化前进。学院在检查学术思想时，发现由于骄傲自满，而产生骄惰、骄横、骄奢。……骄傲自居是危害极大的，谦虚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彭副主席说得好，‘你不谦虚，装满一肚子屎，什么也接受不了’。只有放下包袱才能开动脑筋。学习稍微紧张一点，就喊消化不了，工作简单行事，不作调查研究，不愿多想苦想，思想懒汉。正是‘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特性，没有不劳而获或少劳而多获的。勤奋苦学是成功的秘诀”。刘伯承认为：我们老干部中最基本的思想倾向是骄傲，这个包袱相当重，鼓得高高的。必须反复宣传毛主席在南京接见干部大会上的指示：“团结一致，谦虚不骄，坚忍不拔，克服困难”。军队系统高干会议1月26日闭幕后，他接着参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2月8日他在会上发言说：居功骄傲、个人主义是障碍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源。然后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

个人原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又是从旧军队那里出来的。在入党的时候我的誓词是绝对服从党……我个人向党保证，愿在自己工作中确实遵守这些规定，并为党的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和做出必要的工作”。他的真诚赤胆之心，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出自肺腑的朴素语言。

为了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学院专门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并采用整风学习的方法，联系思想实际，每人都写出思想检查和努力措施，以巩固党的团结，加强党性锻炼。刘院长在 7 月 20 日大会上作了寓意深刻的讲话，他说“党纲党章是我们共产党员的路单子，我们打仗有路单子，党纲党章是万里长征的路单子。我们行军是有路单子的，为了怕走岔路，我们是把路单子藏在怀里的。我们说万里长征，这就是共产主义之路，这条道路是遥远的，这条道路是伟大的路。共产主义是一条康庄大道，是子孙万代幸福的大道，但是也有小路与岔路。我们把路单子拿出来看一看，有一个叫共产主义的大路，还有一个叫个人主义的岔路，因此上正路走，还要注意岔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要警惕。共产党员是党达到共产主义的工具，但是个人主义者，他认为党是他个人的工具，这就是岔路。我们看‘三打祝家庄’，只要冒失一下就是走岔了路。所以，这里路单子上有一个标志：认识到个人是党的工具是正路。另外认为党是个人的工具就是岔路。个人主义岔路是卑鄙龌龊的，这四个字是毛主席添的，安在个人主义身上是再恰当没有的。个人主义是不光荣的，是黑暗的，是妨碍党的团结，妨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的。

三、共同学习政治　各自钻研业务
向‘又红又专’方向发展

任何军队没有军事知识就无法作战，没有科学是不能建设好

现代化军队的。刘院长亲自向毛主席作的1951年9、10两月工作报告中，即提出：培养干部一定要让他们在正式岗位上负起一定的责任，做到执事者各执其事，充分锻炼与发展其才能。……现在培养胜任业务工作干部，提倡钻研业务，精通一门，向专门家方向发展。不能满足于'万金油'式的干部，项项都懂一点而项项不精通的现象。但是在总的方面不管是军事、政治、行政、技术等任何一个干部，都应强调政治学习，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提高其思想立场、观点、方法，确立为人民工作与学习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方法，这在军事学院开头时期尤为重要"。

刘伯承在军队系统高干会议上曾指出："合成军队像一个乐队，战略战术就是歌谱，合成军队有各军种兵种，正如乐队中有管弦乐打击乐一样。乐队必须按歌谱吹拉打才能奏出和谐悦耳之音。合成军队也必须有一个共同歌谱——条令。按条令办事，才能组织协同动作。军队行动就是一部机器的转动。有些掌握操纵杆的，有些是车床，有些是螺丝钉，必须个体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这部机器才能正确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是蒸汽机，是动力的来源。学校训练工作是技师、工程师，培养干部的熔炉。参谋工作是操纵杆，后勤物质保障工作作为机器车台依托之地，各有其功能，缺一而不可。全军同志必须全力以赴，重新认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钻研业务，掌握技术，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创造一切条件。训练就是教战，是教我们学会运用保卫和平的机器来反击敌人的侵略的法则。国防现代化的中心环节是训练问题，在现代正规军组织基础上训练战术与技术，使我们学会如何来操纵战争机器，保卫祖国，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学习的好坏，是要在打仗中去实践，只有反复实践（没有打仗就要演习、实验），才能证明原理之正确"。

他在1956年3月对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二期毕业总结中进一步指出：在职干部的政治修养、军事学术和业务能力很重要，

"学院应培养出有德有才的有文化知识、政治修养、军事学术的，有思考能力、组织能力适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指挥军官和政治军官，这就是军委、国防部给学院总的任务，因为如此，所以一切工作应以训练为中心，一切业务应保障训练任务的完成。……一切在职干部，他们在党务上行政上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有了政治修养、军事学术和业务能力，就可以作得好，否则就差些，这就是此次毕业总结"的一条经验。

1956年6月，他对军事学院成立《五年来的基本总结》中又进一步指出：科学教师、译员干部的培养是办好一个学院的中心问题，正如开医院要有高明医生一样。学院成立时，有军事教员190名，其中共产党员仅17名，主要作教授会正副主任，现有军事教员1007名，共产党员已占63%；政治教员原有5名，现有101名；开始文化教员106名，现已有197名；开始译员有20名，现已有177名，不仅数量增加而主要是在学术水平上有了相当的提高"。对在职干部的培养，他采用了多种办法：办短期师资训练班和带徒弟的办法培养成为教员者130人，抽调知识青年到各完成系为旁听生，毕业后至部队实习一年充任教员者59人；先后从基本系、政治系毕业学员以及其他渠道选调三百余名教员，并从中选调23名高材生为研究生，准备培养副博士教员，还让副教育长、系主任、教授会主任、秘书长到高级函授系学习一期并正式参加毕业考试等方法，来提高在职干部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在刘伯承院长倡议下，院党委还规定：各系、班主任都应在学院学习一期才能担任，各行各业教职员都要送有关院校学习一期，还规定工作不能脱身的干部，一面搞好工作和教学，一面努力自学，如经考试及格，发给学院毕业证书。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院教职员的业务能力，贯彻"师高弟子强，艺高人胆大，强将手下无弱兵"的精神，促使全院教职员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忘我学习风气，为钻研各自业务技术、精通一门的目的而努力奋起。

刘院长很重视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他提出，统一集中领导、横宽纵短、单刀直入基础。强调“执事者各执其事”，“教者安定教，学者安定学，保障者安定工作”。称之为“三定政策”。他还提出用人方针：“以强补弱、以质代量，宁缺勿滥”，做到“人尽其才，各尽其用”。使德才兼备的干部充分发挥其智慧和职能。他始终把提高在职干部的业务能力作为办好学院的中心问题抓住不放。

四、在德的基础上培养人才

刘伯承同志以“勉作布尔什维克”，“勉作毛泽东式的军人”为一生最大的光荣。他的高超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他的精辟独到的军事著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功勋卓著，但自奉俭朴，功高不居功，位高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他对党无限忠诚，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胸怀坦荡，顾全大局，他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任务。他严于责已，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他集“仁、信、智、勇、严”崇高军德于一身。他德高望重的名将风度，成为全军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心目中的光辉榜样。在军事学院上下，人人都赞不绝口称他是“德高望重的好院长”。当他提出要“培养军人德行，在德的基础上培养才”时，在全院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的身传言教、教书教人、教书育人，成为全院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关于军人德行的培养，他曾作过深刻的阐述。他说：我们解放军历来都是执行并保障党的路线政策和决议的工具，而我们军事学院必须据此训练出有德有才的干部。我们一方面应在政治教育上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培养共产主义的德行，同时在军事课业中必须培养军人的德行，这个职责尤应由军事课业教员担负起来。对军人德行的培养，就是逐步发扬我军的优良传

统，我以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朴素顽强，细心大胆；忠诚遂行任务，个体服从整体；亲密团结，遵守纪律；钻研客观具体条件，发挥自觉的主观能动性；揭开困难，克服困难；坚忍不拔，机断行事；强化组织工作，贯彻定下决心；熟练指挥技能，争取斗争胜利"。这九条十八句、九十四个字，是经过他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的。在当今院校教育中，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关于在德的基础上培养才的辩证关系，刘伯承说："军委规定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德有才的干部，我们学院遵照军委的规定应在德的基础上培养才。"他说：军事科学有它的阶级性，有它的斗争性，有它的目的性，如果我们没有保卫祖国之德，而只有才，就没有依据。那就是说，你究竟保卫什么，是没有基础的。德的基础在先，而才是从德的基础上来的。(1954 年 7 月 20 日在学院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整风学习会上发言)。在国庆六周年大会上，他又进一步阐述德才的辩证关系，他说："什么叫'学习'呢？'学'字怎样讲呢？我想应把'学'字当作'觉悟'讲，学即觉悟也。凡是没有觉悟的，我们要使他用学习的方法觉悟起来。从学习军事科学来讲，也是从政治责任觉悟来学的。但单靠政治觉悟不够，必须要有业务责任觉悟。在原子武器和喷气式武器的时代，应该觉悟到自己业务的责任，要战胜敌人，没有保卫祖国之才，不能表现保卫祖国之德。这里有一条经验，有了政治责任觉悟，业务责任觉悟，'才'才能表现出来了，如果没有政治责任觉悟，即使是文化高的，还是学不好的，还是要掉队的。"

刘伯承对军人德行的培养，一直十分重视。他曾与学院党委和政治部作过反复研究，根据当时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精神，针对学员思想实际，又在 1955 年 5 月学院党的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十六项德行标准。他说，这就是鉴定'德'从而鉴定'才'的标准。我们党委和各教授会、学习系、训练、军事科学诸部门尤其政治部门在上述思想教育上必须负起艰

巨的领导责任。首先应在政治教育中结合学员实际去培养他们的德行，德行就是政治教育效果反映的标志。

为了落实和考核学员德行培养的情况，基本情报系第二期学员毕业时，进行了德行评定，并把它列入政治成绩之内，使政治教育能从培养学员德行上表现出成绩来。院党委还规定：政治不及格不发毕业证书；即使军事每门五分，政治考不好，总评不能得五分，就不能取得优等生的荣誉。从而使军人德行的培养，贯彻到训练过程的始终，对每个学员的思想意识的锻炼、德行的修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对学院在职干部的德行修养，在 1955 年 5 月 12 日通过的军事学院党的代表会议关于执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的决议中也明确提出了要求："在机关部门，其理论学习与德行修养应作为调整级别、军衔、职务以及考核干部工作成绩的基本依据。理论教育工作者更应深修自己的德行，言行一致，在培养学员的德行上堪为师表。共同努力，各自勉为政治家兼业务专家"。这就是共同学习政治的基础上，各自钻研业务的一项具体措施。

五、教之以政治　绳之以纪律

纪律是贯彻执行路线的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是权威，是力量。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之一。刘伯承提出："教之以政治、绳之以纪律"时说："不教而诛是错误的，'说服说服，心悦诚服，若果不服，阿弥陀佛'。光念'阿弥陀佛'，赏罚不明，不能令行禁止，打起仗来就象赶鸭子一样，没有不打败仗的。对于违法乱纪，屡教不改者，无论一般干部或高级干部，都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他说：我们渡过长江时，毛主席写过四句话："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增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说：党纲、党章、党规、党法是我们的纪律，条令是常则也是我们的纪律。古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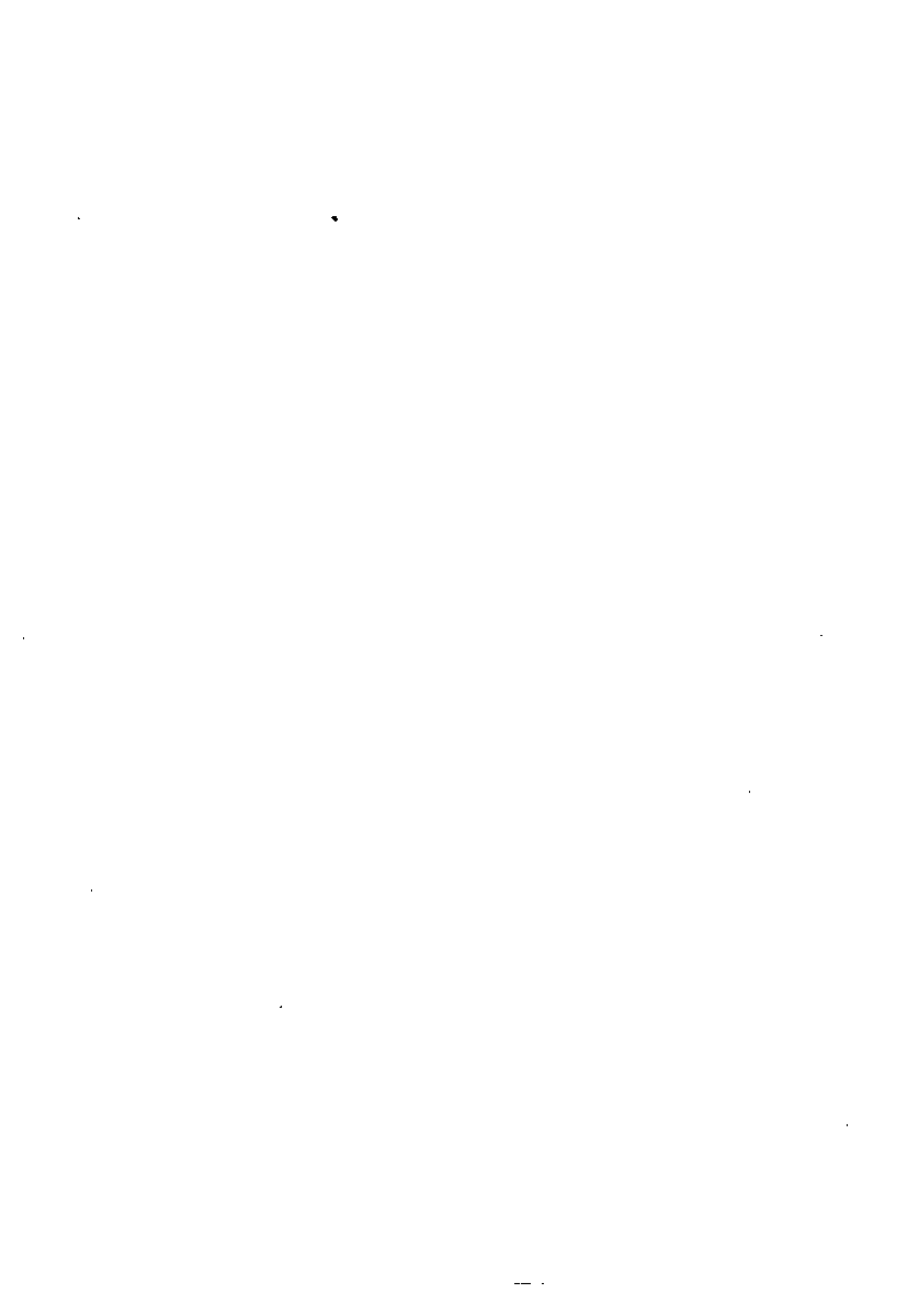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天下必乱”，“罚自上始，赏自下始”，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在总结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时提出：“总之，在进行思想工作中，首先把大道理放在前面做旗帜，这是首要一着；但同时又要十分注意讲究有关的小道理，这也是必需的。既要‘言必及义’又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以达到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相结合。学院是解放军学术思想教育机构，当然以思想教育为主。但如无学习纪律，亦即劳动纪律，即不能达成训练任务。因此，对违反学习纪律者加以惩戒也应为辅助教育。对个别不受任何法纪的约束，道德败坏、蜕化变质者，必须严肃党纪军纪，依法处理。当然对其错误，必须周密切实调查对证，具体分析，分别对待”。

他认为，思想斗争和执行纪律，一定要中肯，要交锋，要打中要害，把问题彻底弄清楚。这样既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也教育了全体同志。但对已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要欢迎，要让他革命，否则就很危险。如梁山泊的白衣秀士王伦不让别人革命，自己的头也就搞掉了。

刘伯承提出的“教之以政治、绳之以纪律”，是院校更好地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的良方。

“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这一响亮口号，成为学院贯彻训练方针、达成训练目的的重要指导思想。刘伯承对这一口号抓住不放。从 1951 年 10 月提出号召后，当年 11 月向毛主席作了报告；1954 年 1 月他在军事学院党代表会议作出决议进一步贯彻落实，决议第一项深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项钻研军事科学，即标明落实这一口号。1956 年 12 月他从上海来信说：“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今后必须自首长开始，否则不是首长，而是首短了。特别在百家争鸣时，首长好学，结合精通相关科学教师，在专家帮助之下，善于集中总结群众智慧，探讨并运用真理，以期在保卫国防上获得实效，这必须尽最大努力”。1958 年 1 月，他对《解放军报》发表谈话：“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

政治家和业务家。这两句口号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精神提出的。就是要求干部又红又专，就是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我深切体会到这两句口号，是办好院校的宝贵的经验。在当前，我们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重视科学技术，加快培养科技人才，解放思想时，仍须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立清风、扫腐叶、澄浊浪。刘伯承同志提出的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和业务家，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的思想，对搞好院校教学仍未失去它的光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刘伯承对我军司令部建设的杰出贡献

陈明义

刘伯承元帅是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我曾长期在刘帅领导下做司令部机关工作，亲自聆听过刘帅的教诲，得到过他的指点与帮助。我深深体会到，他在我军司令部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其丰富与光辉的建树，他对我军司令部建设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建立了特殊功勋的。

（一）

我军司令部是随着我军的不断发展壮大，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健全，从一般规模到现代规模逐步健全发展起来的。刘帅对我军司令部建设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主张，其要点是：

司令部是战争和军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首长实施指挥部队的机关。早在我军建军初期，刘帅就非常注意学习中外军事著作，着力研究人类战争和军队发展的理论，考察了军队司令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他认为，司令部是战争和军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论断，真正能从现代意义上称之为军队指挥机关的司令部，是从19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老毛奇所创建的司令部开始的。司令部的产生，使军队的指挥从“司令时期”（指挥机关由首长、文书员及乘马通信组成，有时由首长亲自发口令指挥战斗）进入到“指挥时期”（有了指挥作战之机关的司令部，有了参谋人员帮助指挥事宜），并随着作战形式的演进和司令部组织的科学化，逐渐进入到现代的“组织战斗时期”。①刘帅的论断，

对军队司令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那么，司令部的地位和使命是什么呢？刘帅说："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指挥机关……，因此，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而，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② 刘帅对司令部及其地位和使命的科学考察，为当时的红军官兵认识司令部及司令部工作在军队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正确的理论引导，从而使司令部建设不断得到加强。

学习和借鉴外军司令部建设的成功经验。在红军时期，刘帅就已重视司令部工作，主张学习和借鉴外军司令部建设的成功经验。他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期间，为把总参谋部工作搞好，花费了许多心血，研究了很多国家的军队、特别是前苏联红军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首先健全了我军司令部的各部门，调进了一批有一定文化知识和工农出身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军事学识和实践经验，为我军司令部门拟定了一系列原则和规定。就工作的职能上，刘帅规定："总参谋部不但要管行军作战和训练，而且要管兵员的补充、后勤保障等。总参谋部不但要指挥中央红军，而且要指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地方部队和游击队"。③他还不顾战事频繁和工作的艰辛，根据我军司令部建设的需要，于 1932 年率先摘译了《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刊登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瑞金创办的《红色战场》杂志上。在长征途中，他又为初入司令部工作的同志续译了这本教令，并专门著文加以评介和分析，指出在我军的作战行动中，要根据我军的实际借鉴和运用别人的成功经验。他对外军司令部建设的研究成果，为我军早期司令部工作建设提供了依据。他在总参谋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军司令部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设精干的司令部机关。在刘帅的军事生涯中，他曾长期襄助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擘画军事，指挥作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

个时期，他都非常重视司令部机关的组织建设，强调司令部机关要精干，在战争中要战斗化。红军时期，他在前方指挥作战时就只带作战局长、情报局长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指挥灵便，迭创重敌。抗日战争时期，为挫败日军袭击我军首脑机关的企图，他指出："指挥机关的组织务求减小，人员务求精干。"④他还说："我们的统帅机关必须做到短小精干，成为战斗的组织。"⑤因此，他和邓小平同志将一个战略区的指挥机关按工作性质和战争需要编为 3 个班，外加两个警卫排，全部也不过 1 个连的人数，做到了指挥机关组织精干，行动便利，从而不断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他强调必须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健全司令部的各部门，"规定各人工作范围，使之放手工作。"⑥建国后，他仍坚持统帅机关要精干的思想。他认为"要使工作做得好，并不在乎机构的庞大，而在乎组织的合理精干。"⑦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组织上的叠床架屋，人多事少，也难免各自成一局面，层层下达久而不行，文牍手续麻烦，甚至个人问题也吵闹不休"⑧等问题。刘帅的这些论述，极好地体现了他注重军队领率机关质量建设的思想。

部队正规化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对部队正规化建设从哪里入手的问题，刘帅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作了深刻的研究和明确的回答。1948 年 12 月，当淮海战役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电请刘帅到中央商谈今后战略方针问题，除解决当时一些主要问题外，亦涉及到加强我军各级司令部建设问题。刘帅在《关于今后作战准备和军队建设意见》中提出："现在是转变关头，如何正规化，从何着手，想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⑨建国后，他再次指出，"应该认识司令部是军队的头脑，在正规化、现代化军队建设中尤为重要。"⑩他的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是他几十年军事斗争的切身体验和重要的建军主张，而且反映了他重视司令部工作是一贯的。因而，在我军即将实行战略转变、进行正规化建设的关键时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司令部机关的

正规化建设，把加强司令部机关的正规化建设作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突破口。他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从而使我军各级司令部建设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

（二）

刘帅是我军参谋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他关于参谋工作的许多精辟论述，不仅为我军参谋人员确立了正确的行为准则，而且为我军司令部的作风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刘帅关于参谋工作的论述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是：

1、参谋的职能主要是参与谋划。刘帅说："参谋，参谋，就是要参与谋划，要多谋善断。"⑪他还说："做参谋工作的，要参，要谋，要动脑子，做事要有计划。"⑫参与谋划，就是在党委和首长意图下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参与指挥部队行动、了解情况、提出建议、管理和训练部队。所以刘帅讲，"参谋人员就是指挥人员，参谋工作就是指挥工作。"⑬参与谋划，就要求参谋人员要及时向首长提供准确的情况，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做到这一点，参谋人员在平时就要做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和资料积累，成为本行工作的"活字典"、"活地图"，把工作需要的有关情况、数据都装在脑子里，才能随时回答指挥员提出的问题，才能参与好，谋划好。

2、参谋应有胆大包天的胆略。刘帅讲，"打仗是一件胆大心细的工作……，参谋人员要有胆大包天的气概。"⑭刘帅所说的胆大，并非指随心所欲"傻胆大"，而是讲参谋人员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应该具备的胆略。这种胆略的具体表现：一是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不仅要有勇于承担重任、战胜强敌的决心和勇气，而且要有战胜强敌的信心与智慧；二是要在授权有限的条件下，全局在胸，凡是指挥员要思考解决的问题，都要深入研究，得出结论，提出建议；三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善于独立思考，不人云亦

云，甚至敢于提出不同于指挥员的见解；四是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陈规，超常思维，提出出敌不意的建议。

3、参谋要具备心细如发的作风。刘帅经常要求参谋人员必须做到：研究上级指示要细，研究敌情要细，军事组织工作要细，检查工作要细，草拟军事文书要细，下达任务、传达指示要细要准，不可含混其词。刘帅的心细是闻名于世的，他历来反对粗枝大叶，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刘帅50寿辰的贺文中所说："……他对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导同志的口语。"⑮

4、参谋应有案无积卷的办事风格。刘帅要求参谋人员必须做到案无积卷，事不过夜。既讲了参谋工作的秩序，也讲了参谋工作的效率。刘帅认为，参谋工作必须要有很高的效能，要围绕着使首长能尽快定下正确的决心和保证不间断指挥的要求紧张地工作。为此，必须做到：(1) 了解情况要快。参谋人员要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情况，以最简明的方法提出报告；(2) 研究情况要快。参谋人员要随时做到"心中有数"，生活在情况变化之中，随时随地进行研究，重要情况要及时上报。(3) 计划、部署要快。参谋人员在制定计划、尤其是制定作战计划时，要强调速度。部署工作也要雷厉风行，不可拖沓。(4) 传达命令要快。要善于运用快速通信手段和尽可能使用现代化的指挥器材。(5) 总结经验、捕捉战机要快。刘帅讲："必须及时总结每一次的战斗经验，研究敌情变化及其行动规律，拟出具体对策。"⑯

5、参谋要有守口如瓶的纪律观念。刘帅认为，"保守军事机密为制胜与失败的重要关键。"⑰参谋工作既然是指挥工作，那就说明这一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准备与使用武力的策划，这一工作所涉及事项均属军事机密。因此，"我们的参谋人员应守口如瓶。"⑱并把暴露军事机密称之为"愚蠢之极的自杀行为。"⑲他指出，

“倘不立即纠正，确会招致亡国亡家之祸，深望大家警惕，”⑳并要求“在机关中、部队中、群众中进行深入教育，特别要采取有效的组织办法加以保障。各级首长对此务必亲自动手，万勿马虎。”㉑

6、参谋要有甘当无名英雄的高尚品德。甘当无名英雄，是参谋人员应具有的思想品质。刘帅说：“做参谋工作的同志，要有‘甘当牛尾，不做鸡头’的精神，要埋头苦干，任劳任怨，要做无名英雄，不要计较什么权力、地位和功绩……。”㉒他曾批评过那种不安心于参谋工作（要当带兵官）的人是由于存在军阀主义的实权思想，倡导所有指挥员都必须当参谋长，并特别提出“不反对实权主义，就很难加强司令部建设，也谈不上树立参谋人员的良好作风。”㉓他还经常对参谋人员进行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事业的教育，要求参谋人员不容有个人打算，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党和民族的事业之中，争当无名英雄。

（三）

刘帅重视司令部建设，关心、注重参谋人员的培养和使用，为我军造就了许多有丰富司令部工作经验的参谋人才，对我军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帅认为，参谋工作很重要。他说：“参谋，历史上称之为幕僚，就是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这些人。他不是总指挥，也不是将军，是为指挥员筹谋划策的。但是参谋工作很重要。”㉔历史上有一句话：“谋臣如云，勇将如雨”。把谋臣比作云，勇将比作雨，无云，雨就不能形成。刘帅基于对参谋工作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从1930年协助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开始，就一直关心我军的参谋工作，重视培养和使用参谋人才。1932年10月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后，更加重视参谋工作。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关心和支持参谋人员的工作，他曾严厉地批评过不重

视发挥参谋人员作用的不良现象，明确指出："参谋长就是首长的第一个助手和代理人。"㉕各级首长要放手让参谋长去工作，"使其能代表首长为部队作战组织指挥，在首长意图下处理和落实军事工作上的实际问题。"㉖在长征途中，刘帅从部队选调粗通文墨的基层干部和青年战士组成参谋训练班，手把手地教参谋业务，让他们在战斗、行军和日常工作中提高业务水平，尽快适应司令部工作的需要。刘帅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讲，"我们是红军，要打胜仗，要讲究谋略，讲战略战术，就得多读书，多研究。"㉗在作战频繁、条件极为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刘帅在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期间，对司令部和参谋长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关心，使参谋长和司令部工作在部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同时，他在华北敌后的太行山区还多次开办参谋训练班，亲手为参训班翻译外军资料，根据我军的特点和实战经验编写教材和撰写军事论著，给参谋训练班的学员讲课，教大家学习文化，学习战术、技术。他还针对当时参谋人员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规定每人每天的学习量并予检查。还不厌其烦地传授识图、用图，拟制战斗要图和战斗文书的方法及要领。刘帅常常以"考考"参谋的方式督促和启发参谋人员学习，随他行动的参谋经常都要接受他的"考试"。他讲："当参谋的，打仗的事可不能问樵樵不知，问牧牧不知！"㉘他要求司令部工作人员既要有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又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在复杂的情况下，脑子要更清醒，工作秩序、指挥要不慌乱。解放战争时期，他再次指出，参谋机关是军队的头脑……，指挥员要认真听取参谋长的意见，发挥参谋长的作用，"必须反对轻视参谋工作的观点。"㉙建国后，刘帅在创办军事学院期间，仍很关心司令部建设，把培养司令部工作人才放到了重要位置。在他主持制定的军事学院训练大纲中就明确规定："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的指挥员及参谋干部。"㉚他在学院还专门设置了司令部工作教授会。在教学过程中，他注意纠正一些学员只愿学作战指挥，不大愿意学司令部工作和后方勤务的不良倾

向，要求学员既要熟悉现代各军兵种技术和组织指挥，又要熟悉参谋勤务等知识。他在军事学院期间所培养的数千名干部中，就有不少优秀的参谋人才。

刘帅不仅重视参谋人才的培养，而且重视对他们的使用，让参谋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他不断把部队中优秀的营、连、排干部选拔到司令部机关当参谋，勉励他们立足本职，努力干好参谋工作，又把优秀的参谋人员派任部队的指挥员，致使司令部机关经常保持着朝气和战斗性，有力地促进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和部队的建设。经他培养和教育的一批批参谋人才，许多人先后成为我军中、高级指挥员，有的还担任了中央军委和总部的领导职务，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刘帅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以他自己能参善谋的军事实践，为我军司令部工作人员树立了光辉典范。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帅就曾几度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按他自己所说，就是“三总参戎幕”。㉛他无论是担任总参谋长，还是担任战略区指挥员和军委领导职务，都一直把自己当成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名参谋人员。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仍把自己作为军委的一名“编外参谋”，㉜一如继往地关心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潜心战略研究，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方针，适时为中央军委出谋划策。他的许多深思熟虑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重视。我深深感到，刘帅是我党我军难得的军事奇才，他以自己能参善谋的军事实践为我军司令部工作人员树立了典范。他做参谋工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是善于通观全局出谋划策。刘帅认为，参谋人员的活动首先就是思考，参谋人员要深思断行。那么，思考的出发点和角度

正确与否？把握的层次是否准确，就直接关系到谋划的质量和效果。因此，参谋人员在思考中最要紧的是把握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要善于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即站在一定的高度，站在首长的角度思考问题。否则，就万难达到为指挥员出好谋划好策的目的。刘帅在中央军委当参谋长时，对此就把握得非常好。如在遵义会议上，对于中央红军今后行动方向这样的重大问题，刘帅以战略家的眼光，从战略全局出发，和聂荣臻同志一起，正确地分析和估量当时的敌我形势，准确地提出了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建议而被党中央所采纳。实践证明，他们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善于审时度势出谋划策。审时度势，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受任何框框和预定计划的束缚。在战争年代，刘帅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指挥部队作战时，审时度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时给中央军委提出建议的典型事例就很多。如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二阶段时，原定华东野战军围歼徐州之敌，中原野战军歼击南线之敌。刘帅和陈毅、邓小平同志根据战局发展的实际情况，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改变原作战计划，把作战重点放在南线的建议，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采纳。后来，又鉴于黄维兵团孤军冒进，出现了歼灭黄维兵团的有利战机。刘、陈、邓首长再次提出“由中原野战军全力对黄维”的建议，毛泽东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战役第二阶段就是按刘、陈、邓首长的建议付诸实施的，结果取得了全歼黄维兵团的满意战果，为夺取整个战役的全胜进一步奠定了基础。这一史实充分体现了刘、陈、邓首长能从战场实际出发，帮助军委思考，创造性地贯彻军委的战役方针，及时反映战场实际情况，提出深思熟虑的建议，使军委的最后决策更加符合现场实际。

三是善于抓住事物的关键出谋划策。把握事物的本质，抓住事物的关键环节进行谋划，是参谋人员应具备的基本功。刘帅在这方而堪称典范。从他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完全可以看出，凡是他

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能抓住事物的要害，所以都有独到的见解。建国初期，我军相继建立了新的军兵种，武器装备也随之得到了改善，所以迫切需要转入正规化训练。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帅对此非常关心。他认为正规化训练就是要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力量的思想为指导，在条令、条例的规范下实施统一训练，以实现诸军兵种密切的协同。为此，他于 1950 年 12 月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编写我军条令、条例和编写条令、条例应参照苏军条令，以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及好的历史习惯为基础，力求简明易行，适合现在，照顾将来的原则。㉝这一建议，既抓住了我军如何才能进行正规化训练的关键，又指出了进行我军条令条例建设的基本思路，完全符合当时我军军事建设的实际，因而被中央军委采纳。从 1951 年起，总参谋部抓紧了条令、条例和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很快颁发执行，为全军军事训练走上正规化轨道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帅在几十年的军事斗争和我军军事建设的许多方面，类似上述谋划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他尽心尽力为中央军委出好点子，参好计谋的实际行动，为我军司令部工作人员树立了光辉典范。

刘帅对我军司令部建设的贡献并非上述言词所能表达得完的。他的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财富，指导和促进了我军过去的司令部建设，而且对于我军现在乃至今后的司令部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尽管今天的形势、情况和任务有了很大的变化，未来战争的条件和环境将会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随着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和运用，现代局部战争已打破了许多传统的作战模式，战争立体性、纵深性更加增强，大大加快了战争的节奏与进程，给司令部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加强司令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纪律建设，增强司令部机关的整体素质等基本内容却与过去司令部建设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继承刘帅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贯彻质量建军方针，

在高新技术条件下，以现代化建设为重点，提高司令部机关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组织指挥能力，全面加强司令部建设，以实际行动把我军司令部建设成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指挥有力的领率机关。

注　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㉕㉙《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版，第52、第54、第239、第334、第567、第665、第665、第577、第54、第567页。

③《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64页。

⑩⑪㉚㉛㉜《刘伯承传》(送审稿) 1983年版，第681、第412、第613、第743、第725页。

⑫㉒㉘《刘伯承》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02、第103、第102页。

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㉓《刘伯承回忆录》第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35、第231、第234——235、第237页。

⑮《邓小平文选》(1938～1965)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㉔《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5页。

㉖《刘伯承元帅研究》(一) 重庆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37页。

㉗《刘伯承回忆录》(二)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71页。

㉝《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学习刘伯承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柴成文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有机会在大军事家刘伯承、大政治家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十分幸运。今天，在刘伯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就刘伯承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谈点个人学习的体会。

（一）

刘伯承是我军司令部工作的奠基人，他对建立、健全和发展我军司令部工作，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无论是建设武力还是使用武力都越来越需要一个健全的有科学分工的司令部来筹谋划策，来组织实施并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日臻完善跟上时代的步伐。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恩格斯就说：现在"除英国军队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这些军官都是从最有才干的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并在高级军事学校中受严格的训练。"①刘伯承早在我建军初期，就彻底抛弃了旧中国军队把参谋人员当作主官豢养的谋士那种腐朽观念，确立了司令部在我军中的首脑地位；确立了参谋长是司令部的首长；建立了参谋人员同指挥员之间的正确关系等项基本原则。三十年代初，他就指出："首长应使司令部在自己决心之下自动而宽大地活动起来；而司令部则应重视首长决心的权力，站在他的阴影里面，根据他的决心组织作战，以至监察其实施"。②抗

日战争时期，他多次讲，我们发展了大量的军队，必须有善于组织作战与善于军队建设的强有力的司令部及其参谋人员，才能从战术、技术与指挥上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解放战争时期，他曾试图把“军令”、“军政”适当分开，使司令部的机构更为科学合理。他认为，在司令部设置军政处，就是一种正确的尝试。建国以后，他又说：“应认识司令部是军队的首脑，在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建设中尤为重要。”③

建设具有全军首脑作用的司令部的基础是，要造就一大批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具有较高政治、军事素质的，有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既善于思考又能实干的参谋人员。为此，半个世纪以来，他呕心沥血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办学校、办参训队、组织在职学习、组织学术研究会、翻译介绍外国的军事学术成果，直至手把手的教导，特别是他在每次战役中，从情况判断到决心下达，从战役前的战术指示，战役中的应变措施到战役后的战役总结和战术总结，既为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作出了典型示范又为全军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又自告奋勇去办学校。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他是“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④。他既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指挥员，也为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参谋人员。

（二）

刘伯承要求参谋人员既善于思考，又能实干。

善于思考就是要求参谋人员，在建设军队、指挥军队或者说在积蓄武力、使用武力上筹谋划策。但在长期的战争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参谋人员的文化、科学、军事知识的基础都比较差，真正要做到“能参能谋”是有困难的。所以我认为那时他讲筹谋划策，与其说是对参谋人员的要求，不如说是一种殷

切的期待。作为一位战略区的指挥员，他口头上常说，他的任务就是下达战役决心，而事实上在决心下达之前或之后，他都在精心运筹。每当他伏案起草好一次次重要建议或指示后，站起身来，摘下眼镜用手揉着他那疲倦的左眼对参谋们说“送给政委审查”时，不难想象，他是多么地渴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参谋人员能快成熟起来呀！1941年，在129师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当检讨参谋工作缺点时，头一条他就感慨地说：“对自己军队的实际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和适时的反映与解答问题；对敌人缺乏深刻的研究，没有想出足够的对付与制服敌人的对策。所谓真正要参要谋的工作，是没有确实建立起来的。”到了60年代初，他仍然对我们总参谋部的参谋人员说，你们的主要工作不是搞个图，画个表专做那些技术性的工作（当然，必须搞的还是要搞），而是要调查、研究、分析、判断及时向首长提供定下正确决心的材料。由此可见，他盼望参谋队伍的成长与发展又是何等的急切！

学习刘伯承关于筹谋划策的论述和实践，我理解他把参谋人员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是专业参谋，对这部分参谋要求他们专业精通，熟能生巧，精益求精，在专业方面提供咨询成为首长的专业助手。对其他大部分参谋人员则要求在建设与使用武力上筹谋划策。下边我要讲的主要是这一个方面。

筹谋划策的基础是深入的调查研究。刘伯承说：“司令部要有调查才能研究，要有研究才能参谋组织战斗。”⑤一切从实际出发，“谋”是调查研究的结论。他要求司令部工作要作到三个面向：即面向部队，面向敌人和面向战争。面向部队，但不要当“钦差大臣”，而是通过深入的检查，发现问题帮助解决，一切为了部队的巩固，特别是战斗力的提高。

面向敌人，主要是集中精力寻求克敌制胜之道。刘伯承把对敌人的调查研究称之为“侦察研究”。侦察研究既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又是贯彻政策的保证；既是定下正确决心的基础，又为实现决心提供保障。他把提出制服敌人的办法称之为“侦察研究拟对

策的工作”，要求所有参谋人员都要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研究敌情，不能只是报告情况，要研究敌人的战略思想、战役企图、作战方法；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特别要研究它的弱点。敌人进行的是反人民的战争，要从它这个致命的根本弱点出发寻找以至创造它的弱点以便集中力量击而破之。他常说：战术的结晶就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以我们的重点对付敌的人弱点，即使是很强硬的敌人，它也是有软弱之处的。他常以“攻硬者则软的亦硬，攻软者则硬的亦软”这个道理，来开导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解放战争之初的邯郸战役，是利用敌人“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这个特点创造了敌人的弱点。敌人总是要沿平汉铁路北进的，西边是我们的山区根据地，他不便走，只好走东边，而东边又是沙漠，行动困难，我们正好在那里设置歼敌战场。大家知道，定陶战役在中央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是列为典型战例的。这次战役抓着了蒋军弱点，即其整三师犯了骄兵之忌，和打蒋嫡系时杂牌一般都不积极增援。所以我军采用战役上集中力量打整三师这个嫡系；战术上又以兵力的重点打击这个骄敌的弱点而达到各个歼灭的目的。

面向战争，要学习研究战争的规律来组织战争；学习观察与掌握战场情况，不仅要掌握情况还要“操纵情况”的发展，争夺主动，谋取更大的胜利。刘伯承、邓小平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在组织作战，操纵情况发展方面，曾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过很多好文章。在“敌进我进”方针之下，就写出了其中的大文章。

早在红军时代，刘伯承就提出穿过敌人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军对我华北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以跳跃式封锁向我推进，但敌后空虚的情况，他提出在强化游击集团顽强斗争的同时，把主力适时转入外线，扼其补给咽喉，断其交通。在敌后活动的各游击集团，要坚决到敌后交通线上进行破击，切不可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加身。解放战争时期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重

大转折。1947年底，当敌人以33个旅的兵力向大别山围攻时，我则实行再展开的对策，在陈粟、陈谢两大集团配合之下，既粉碎了敌对大别山的进攻又开辟了桐柏、江汉、淮西等新的解放区，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形成了我三路大军逐鹿中原的战略布势。

筹谋划策的依据：一是要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我军的实际状况有深刻的理解。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解决为谁参、为谁谋的问题。为此，刘伯承要求参谋人员在研究军事时，必须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央每个时期的战略方针和它在实际运用中的经验教训。他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现代战术才能正本清源。二是要对我军每个时期的任务或者每个战区、每个部队的任务有深刻的理解。特别要把局部任务同整体任务的关系以及它对整体任务的作用弄清楚，不使任何筹划妨碍整体任务的实现。说到底就是要胸怀全局，抓住主要矛盾。任何时候如果离开了主要矛盾的解决，即使你的谋略说得头头是道，相比起来，也都是小道理。胸怀全局才能抓着每个时期的关键。日本投降时，当我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时，他要求迅速集中分散的部队，形成拳头，并且提出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了，形成了拳头就是胜利。1946年2月当停战协定、政协决议一公布，他立即提出“大家要愤发整军练兵”。他说，我们整军练武的任务，就是准备粉碎反动派可能的大举进攻。胸怀全局才能把个人、局部的得失置之度外。渡江作战时，原定突破江防后进行京沪杭会战，刘伯承根据我渡江成功后敌人溃乱的态势，决定二野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为此取消了四兵团接管蒋介石首都南京的任务，而全力出贵溪、上饶、徽州直趋浙赣线切断蒋、桂两敌的联系，迂回蒋敌侧背造成对赣西、闽南机动的便利条件，扩大了战役范围，加速了敌人的溃灭。1950年初，刘伯承连续找我汇报所了解的康、藏情况。有一次，他拿着中央要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电报说，进军西藏是否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多路向心迂回才更为有利？我说，既然中央把任务交给了我们，再

要其他战略区出兵支援恐怕不好。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的军事学术学到哪里去了，都是党的事业，怎样有利就应该怎样想，不能只从局部考虑问题。

此后不久，班禅派计晋美等到达重庆，刘伯承要任白戈和我先见他们。他们当时的思想倾向是，要我进藏部队带着他们进藏把达赖一派赶走。当刘伯承听取我们的汇报时斩钉截铁地说：要治藏不搞民族团结是不行的。

讲到这里，我要提起解放战争之初毛主席讲过的话：现在我党面临的任务很多，但是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它都无从谈起。一切局部决策和具体策略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就同现在一样，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多，必须沉着应付，但如果不能抓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中心，其它也是无从谈起的。八大以后一个时期的教训一定要记取，对于这个道理，作为一个参谋人员，任何时候都是不能糊涂的。

筹谋划策的主观条件是，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经验和全神贯注于情况演变的工作精神。刘伯承的指挥艺术之所以被人称之为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是由于他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的精华，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而同时他又具有从技术到战术、从战斗指挥到战役指挥，从士兵到元帅的丰富经验，再加上他对于战局的推演，战场的变化，总是全神贯注地进行观察并及时找出它的规律，提出自己的对策。

解放战争一百天打了五仗之后，他总结敌人的战法先是步步为营，接着是并进长追，接着又是步步为营，（即所谓战略进攻，战术防御。）他说："总而言之，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两套都带一点。"⑥当我大量歼灭敌人之后，他又总结说，因为"敌人屡战屡败，但其狡如兔，不易捕捉。这是要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而应在注视战机进展中，以自己积极行动的因素

去开展战局，走向歼敌”⑦。即使在所拟对策之下的计划都如愿地实现了，也要认真进行总结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进一步侦察研究的起点。敌人的全面进攻失败了，改为重点进攻，形成“哑铃战略”，我来个中间突破，它的重点进攻也失败了，搞重点防御，可是它的后方就成为“空心战略”了。淮海战役之后，敌人那套“守江必固淮”的办法被打破了，敌人又来了个和谈，谋求划江而治，此计不逞即士无斗志，我则百万雄师过大江，端了他的老巢，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他的总统府大楼。总之，全神贯注表现一个伟大战士忠于革命事业的顽强斗志，而筹谋划策则是智慧较量的斗法。他说：“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敌我两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强，而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者必败。”⑧

（三）

刘伯承要求参谋人员“要能实干”。参谋不只是人们常说的“谋士”或“智囊”，他们不仅要筹谋划策，还要组织实施。能实干就是要在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制定之后，战役战斗决心下达之后，具体组织实施以保证每一任务的完成。早在1940年刘伯承就严格指出，一切工作，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具体的指示，彻底的检查，按时的总结。并说，这些是我们参谋人员在今后必须做到的。

严密组织。军事组织工作最要严密，从准备到完成的全过程不容许有任何空档与漏洞，任何疏漏都会在实施中立即受到惩罚。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作战时，由于对民兵破路工具的准备和战前训练不足，结果5千人两天才破路10公里，但当纠正了这种情况以后，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他们两天的任务。渡江作战时，在

周密侦察之后，由于组织严密，我三、五兵团6个团首渡成功，伤亡不到10人。

下达任务必须明确无误。刘伯承讲：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行为，但又不得妨碍下级指挥员的机断行事。他说："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之下，必须预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成歼敌任务。""由于机动作战，必须发挥指挥员捕捉战机的灵敏性与责任感，而上级指挥员的指挥，宜以训令方式示之（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以便于下级机断行事。"⑨

刘伯承不仅强调参谋人员必须根据指挥员的决心组织作战，还强调"监察其实施"。命令下达之后首先要严密监视情况的变化和发展，诸如敌情的变化，战斗行动的发展等等，并切实掌握每一变化以保证不间断的指挥。刘伯承说："战争情况的欠确实性（敌人严守秘密、佯动、伪装为尤然）与流动性，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可能与新的情况有不符合者。这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机断行事，灵活执行其计划。但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⑩。因此参谋人员在遇到出我所料的情况时，要快速反应，协助指挥员实现灵活机动的指挥，求得正确处置。上党战役时，当我扫清长治外围，开始围攻长治时，得悉阎军三个师七千余人自太原南下增援，于是我军改用"围城打援"战法吸打援军。但当将来援之敌合围于老爷岭、磨盘脑时发现敌人不是三个师七千余人，而是八个师两万多人，其中还有两个炮兵团。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刘、邓为增强我军优势避免"啃硬核桃"，决心投入后续兵力并改用"围三阙一"战法，终于歼灭了该敌。

刘伯承常讲：没有检查就没有真正的领导。对部队的要求是令行禁止，这是绝对的，但有号令必有号令检查，否则就不能及时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高应变能力。没有及时检查也不能适时发现并纠正对命令、指示的错误理解；没有及时检查也难以及时发现并弥补组织工作上万一发生的漏洞。

及时总结经验才能打一仗进一步。战争的双方是互动的，我动敌动，敌变我变，除了计划时就必须预计到在我行动影响下敌情的可能变化外，还要及时总结经验。刘伯承要求：及时总结每一次的战斗经验，研究敌情变化及其行动规律，拟出具体对策。他说："我军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乃是极为珍贵的教材。各级干部应根据毛泽东军事原则，在实战经验的切实整理中加以发挥，使我军能打一仗进一步，以不断的进步，争取不断的胜利。"⑪

（四）

司令部的首脑地位确定了它必须具有的模范作用和优良作风。刘伯承对司令部的要求十分严格。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凡要求部队做到的事，自己必须首先做到：精简机构，司令部带头精简；整顿纪律先从司令部整起；部队遇到了困难，司令部带头克服；实现正规化也要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刘、邓都曾讲过，一个部队的纪律好坏，首先要看各级直属部队和指挥员的警卫人员。1947年冬天到来时，到达大别山的部队冬衣尚未解决，刘伯承亲自指导参谋人员自己动手缝制棉衣，对部队影响很大，至今仍传为佳话。淮海战役之后，刘伯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谈到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时他说："如何正规化，从何着手；想来只有首先从司令部着手，只有加强司令部，才能组织战争。"⑫

讲到司令部应有的作风，我们几位老参谋曾经多次重温他讲过的"胆大包天、心细如发、案无积卷、守口如瓶"的要求。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句，他谆谆告诫于参谋人员的还有要反对"实权主义"和"马弁作风"。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刘伯承关于司令部建设的思想和他培养参谋人员、提高司令部决策水平的实践，还表现出一位大军事家的高瞻远瞩。现在，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正改变着军事斗争的某些规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在未来的战争中，如果没有一个以决策水平很高、

快速反应能力很强的参谋集团为基础的司令部来组织战争，那么胜利将是不可能的。

（作者现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8页。

②⑤⑦⑨⑩⑪⑫《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4、第283、第481、第508、第563、第577页。

③刘伯承1954年在军事学院两个系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④⑥⑧《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1989年版，代序第3、第345、第365——366页。

谈刘伯承培养参谋人员的基本思想

李　林　上校

刘伯承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我军司令部建设、参谋工作的奠基人。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他亲自实践和指导了参谋工作，为培养提高我军参谋人员的素质总结了大量丰富宝贵的经验。今天我们纪念刘伯承同志诞辰100周年，重新学习刘帅关于加强司令部建设和培养提高参谋人员素质方面的指示，以及他那生动感人的事迹，对于加速我军在新时期司令部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争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以及进一步提高我军参谋人员素质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令部是组织部队建设和作战的主要部门，是军队的领率机关和指挥中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都很重视司令部建设。刘伯承同志是我军最早的总参谋长，在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他就担任起义军的参谋长，一九三二年底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他不论担任总参谋长还是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以及在建国后，一向都非常重视和关心司令部和参谋队伍建设，作过很多重要指示，为我军的参谋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谋是司令部的主要成份，是指挥机关发挥智囊、头脑作用的基本力量，是作战、训练和一切军事工作的具体计划、组织和实施者。参谋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辛苦、非常光荣的工作。古今中外的任何政治家和军事家无不重视和发挥参谋的作用。刘帅认为，指挥员不仅要善于使用参谋人员，充分发挥参谋的作用，而且要重视培养参谋人员，不断提高参谋素质。在这方面，刘帅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参谋要具有“甘当牛尾，不当鸡头”的奉献精神

参谋工作是崇高的事业，没有完全彻底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做不好参谋工作的，因为参谋工作实际是做“幕后”的工作，参谋人员的高明谋略和才能，只有通过指挥员的决心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参谋人员无论作出多大贡献，取得多大成绩，立下多大功劳，都只能甘当“无名英雄”，这是参谋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做好参谋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在红军时期，刘伯承同志就非常重视教育参谋人员要争当“无名英雄”，要有“甘当牛尾，不当鸡头”的精神。他经常教育参谋人员要克服那种只愿在前方，不愿留后方；只愿在部队，不愿来机关；只愿当指挥员，不愿当参谋和认为当参谋吃亏的想法。勉励参谋人员要立足本职，努力做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革命队伍，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分配到当时刘伯承同志担任师长的一二九师当参谋。刘伯承同志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培养教育，经常启发他们要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要彻里彻外地改造自己，不要军人其表，学生其里。他还亲自给青年学生干部讲课，用小圈圈套在大圈圈里的形象比喻，要求他们去克服个人主义，改造世界观。他说：“要用共产主义这个大圈圈，把个人主义的小圈圈套进去，这就叫做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些青年学生干部，在刘伯承同志的亲切关怀教育下，健康成长，很快都成了部队的战斗骨干和优秀的参谋人员。

为了加强参谋队伍的建设，刘伯承同志要求各部队要从军政干部中抽调大批教导员、指导员、营长、连长及经过实际锻炼的知识分子参加司令部工作。由于刘伯承师长的重视，当时一二九师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的素质，都有明显提高。参谋人员中党员占 90%，大多数是经过战争锻炼的十九至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

干部。这对一二九师司令部的建设，参谋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战争的特点，参谋工作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对参谋人员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谋人员在政治上必须忠实可靠，绝对合格。坚决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能抵抗名利地位的诱惑，不出风头，不图享受，胸怀坦荡，心底无私，忠心耿耿，尽职尽责。我们要学习刘伯承同志那种为革命寻求真理，把自己的全部才能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尚品德。

二、参谋要具备过硬的军事技术和参谋业务

“军官不懂本行业务在参谋部门造成的害处比在其它任何部门都大”。恩格斯这句名言充分说明了参谋人员精通本职业务的重要性。刘伯承同志非常重视培养参谋人员，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通过集训、作报告、总结、个别帮助等多种形式，培养提高参谋的业务能力和军事素质。他认为作为一个参谋，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军事技术，只凭热情是做不好参谋工作的，是当不好首长助手的。早在一九四一年，刘伯承同志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素质和工作能力，创建了参谋集训队，规定了参谋人员的学习制度。他亲自给参谋集训队讲红军光荣传统，教大家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战术。要求参谋人员要刻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在战争中学习，在战争中提高。他认为提高参谋人员的军事、文化水平，除了办好参谋集训队外，还要加强参谋人员的在职学习，他规定了现职参谋人员的学习制度。要求参谋人员按其工作性质的不同分别学习不同的内容，并明确规定三分之二时间学习军事，三分之一时间学习政治。刘伯承同志对参谋人员的学习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规定师部的参谋除打仗、行军外，每天要写一百个字，并

交他本人亲自审阅。要求侦察参谋每天要标绘出当日情况图，每周要标绘出综合情况图。由于刘帅重视亲自抓，一二九师的参谋人员情绪高涨，学习劲头足，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军事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刘伯承同志狠抓参谋业务学习的做法和经验，不仅对当时加强参谋队伍建设，培养提高参谋业务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现今的参谋训练，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熟练精湛的参谋业务，是参谋人员的基本功，是做好参谋工作的基础。多年的训练实践证明：哪个司令部坚持参谋业务基本功训练得好，哪个司令部的工作能力就强，工作效率就高。但是必须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里广泛应用，参谋业务的内容也要随之发展和拓宽。为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需要，参谋人员都应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具备宽厚的文化基础知识，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精通的专业知识，娴熟的参谋业务知识，而且还应学会操作和使用指挥自动化、办公自动化的工具和器材，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参谋要有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是参谋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对参谋的基本要求。我军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心培育下，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作风，有力地保证了各项战斗任务的完成。刘伯承同志就十分注意培养参谋人员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每项工作、每次战斗都要做到有布置、有落实、有检查、有报告、发现谁的工作粗枝大叶、他总是谆谆教诲，耐心细致地帮助和教育。如抗日战争时期，一二九师一部分主力进行白晋铁路大破击作战时，有一个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参谋，在向师首长写书面汇报材料时，未查看地图，把白晋路上的“来远”写成了“涞源”。刘伯承同志发现后，把这个参谋找来，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你把晋察冀的一个县城，一下就搬到太行山来了，要是聂司令知道了，一定会问你，你为什么把我们的涞源搬跑了呢"？同时，刘帅还勉励他不要背包袱，工作要细不要粗枝大叶主观臆断。这个参谋非常诚恳地接受了批评，一直把刘帅的教诲铭记心中。刘伯承同志要求司令部参谋人员，工作一定要耐心、细致、准确、及时，他认为在军事上一字之差就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战斗的成败。因此，他要求参谋人员对待工作要象姑娘"描花绣朵"那样认真细心，每项工作都应考虑得非常具体、细致、周到。刘伯承同志不仅是这样要求下级，而他自己处处事事都身先士卒，身教重于言教，工作作风十分严谨。他批改文电，处理问题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不论工作多忙，不管白天黑夜都是始终如一。如派遣一个参谋去执行任务，他总是交待得一清二楚。一九四0年一月，刘伯承同志派一名参谋去给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送信，临行前和这位参谋详细分析了各种情况和可能。告诉这位参谋去时走什么路线，回来走什么路线，见了九十七军军长如何回答问题，交待得十分具体，这个参谋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刘伯承同志这种严谨踏实、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当时在全军传为佳话，现在仍是我们参谋人员学习的榜样。

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由于高科技尖端武器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更加复杂，更加急剧，对参谋工作的细致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以往可能是一种夸张，但在现代战役战斗中，却是严酷的现实。美国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曾几次因电子计算机数据出错，在演习中险些弄假成真。因此，在现代条件下，参谋人员应该强调树立快、准、严、细、实的工作作风。

四、参谋要胆大包天，足智多谋

"胆大包天，足智多谋"，既是刘伯承同志军事指挥艺术中一

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参谋人员提出的基本要求。他经常教育参谋人员，作一个有勇有谋的参谋，既要胆大包天，又要足智多谋，不做到这两点，就不能战胜敌人。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军进行的陇海战役，奇袭敌人开封至徐州全长三百里的铁路大动脉，他打破常规的战法，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以“猛虎掏心”的战术，一下子破袭了从开封到徐州约三百里的铁路线，毙、伤、俘敌一万八千余人，切断了敌人东西运兵的大动脉，使敌人惊恐万状。刘帅这种胆大包天、有勇有谋的行动，与他事先经过细致的调查，周密的谋略部署是分不开的。他还通过给参谋人员讲“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告诉参谋人员，参谋就要有勇有谋，特别是在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中，不大胆、不勇敢，缺乏足智多谋，是不能克敌制胜的。

刘伯承同志熟知古今中外的兵书，精通我国古代兵法，善于把兵法中的精华灵活巧妙地用于战争实践，神机妙算，打了很多胜仗，是闻名中外的“常胜将军”。刘帅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兵不厌诈，战场上能根据敌人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自己的战法，以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便可达到出奇制胜之目的。一九三七年十月刘伯承同志指挥的山西七亘村伏击日军的战斗，神机妙算，抓住日军迷信教条的心里，三天之内两次在七亘村同一个地点伏击同一个敌人并取得胜利。刘伯承同志为这种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出敌意料的战法，在战术上命名为“重叠待伏”。由于刘伯承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习和运用有很深的造诣，他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实战，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战法，总结了很多作战经验。所以，朱德同志曾赞扬刘伯承同志“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之将才”。刘帅还经常教育参谋人员要足智多谋，英勇果断，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去战胜敌人，反对那种“牛抵角”的战法和鲁莽蛮干、不动脑筋、不按战术原则指挥打仗的“战将”。他还特别强调，指挥员决不可墨守成规，优柔寡断，这样会贻误

战机。

列宁说："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利用古代兵法作战取胜的不仅在我国历次战争中屡见不鲜，就连现代条件下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运用"无中生有"、"声东击西"的战法都收到了奇效。参谋是作战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出谋划策是参谋工作的基本任务。因此，参谋人员必须把为首长和指挥机关献计献策，谋划方略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不断提高自己的谋略能力，这样才能当好首长的助手。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双方不仅是兵力兵器的较量，而且也是双方指挥决策上的较量。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平时实践中就应该注意培养参谋人员敏锐的观察力，科学的判断力，丰富的想象力，良好的记忆力，灵活的应变力，提高参谋人员的创造性、预见性和谋略水平。

刘伯承同志对司令部和参谋队伍建设的论述，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总结的宝贵经验，是刘伯承同志在几十年战斗实践中呕心沥血，千辛万苦的真实记录。这些重要指示，不仅对当时的司令部建设和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至今对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司令部建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战争的突然性、破坏性、快速性明显增大，战场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变化急剧，这就要求参谋人员必须具备更高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指挥能力，工作必须要有预见性、计划性、主动性，同时还必须要掌握过硬的军事技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军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因此，参谋人员必须要牢记刘伯承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努力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努力学习深刻理解我军的作战方针、原则，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使司令部真正成为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分工的司令机关。

论刘伯承元帅的参谋工作艺术

刘雷波中校　吴朝全中校　李言斌上尉

刘伯承元帅曾担任我军的总参谋长，是我军参谋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为我军参谋工作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刘帅长达7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他曾较长时间直接从事参谋工作。即使作为一个战略区主官，独挡一面组织战区作战时，他也注重从战略全局出发，积极主动地为军委当好“参谋”，并亲自参加和指导了我军参谋工作的实践，表现出一个军事家卓越的组织运筹才能。直至建国以后，刘帅担任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组长，他也自称自己是“部外参谋”，创造性地为中央军委运筹决策方案，表现出很高的参谋工作艺术。今值刘帅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回顾刘帅的参谋工作实践，学习和研究刘帅“善谋”、“唯实”、“求严”的参谋工作艺术，对于指导我军参谋工作的健康发展、培养优秀的参谋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善谋——全局在胸，深谋远虑

参与谋划是参谋人员的基本职能，也是参谋工作的核心内容。能否善于参与谋划，历来是衡量参谋素质高低的主要标准。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刘帅深刻认识到参谋工作中“谋”的意义。他指出，“参谋就是要谋，要想事情，要出谋划策。”①认为参谋人员要善于参与谋划，就应多方面了解情况，做到全局在胸；应本着“多想、深想、仔细想”的精神提出建议，做到深谋远虑。具体的要求就是不仅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参与谋划的质量。刘帅特别重视强调参谋人员参与谋划要具有“包天胆

略”；要善于“就大势与局部沉思”；要做“沙里掏金”的工作，创造性地运筹决策方案。

（一）参与谋划要具有“包天胆略”

刘帅认为，“包天胆略”体现了“勇”与“谋”的辩证统一。他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不做到这两点，我们就不能战胜敌人。这就告诉我们，要提倡勇敢，敢于冒险，必须以足够的智谋作为前提；而实施谋划，运筹奇谋妙计，又必须以过人的胆略为后盾。只有大勇，才能迸发超常智慧，形成奇谋妙策，从而出敌意料之外，并置敌于死地。刘帅在指挥作战的历史上，常常能以少胜多，以劣胜优，迭挫强敌，实与他本人所具有的“包天胆略”分不开。人们熟知的七亘村重叠设伏战斗，人们在叹服刘帅用兵神妙的同时，不难联想到若没有过人的胆量为后盾，并超越常规思考，是难以筹划出如此绝妙之谋的。一出陇海路作战，刘帅“不顾虑侧背”，反常用兵，果敢行动，一举切断敌人陇海大动脉，毙俘伤敌一万八千余人，若缺乏“包天胆略”，是难以取得如此辉煌战果的。作为参谋人员，能否在艰难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为指挥员运筹奇谋妙计，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具有“包天胆略”。只有象刘帅那样，运筹谋划胆勇结合，才能拓展多种思路，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计谋供指挥员选择，真正做到既能参又善谋。

“包天胆略”外在表现为一个“勇”字，这是刘帅十分赞赏的有谋之勇。他常讲，“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是军人最可贵的品质。他认为“打仗是一种胆大心细的工作”，必须强调勇敢精神。作为参谋人员，这个“勇”字主要体现在面对强大的敌人，以“胆大包天的气概”，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并且，还“要具有敢想、敢说、敢于提出个人见解的精神。”“敢想”就是要求深谋远虑。“敢说”就是要不患得患失，敢于直谏。这不仅反映了参谋人员的可贵思想品质，同时也体现出善谋的工作艺术。通常情况下，参谋人员的“勇”与“谋”是成正比的，只有胆大，才能善谋。遇

事顾虑重重，优柔寡断，是拿不出最优制敌之策的。刘帅之所以要求参谋人员有“包天胆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指挥更加错综复杂，面对高技术装备之敌，更加需要大量的有勇有谋的参谋人员协助指挥员指挥。过人的胆略，仍然是每个参谋人员应追求的基本目标。

（二）要善于“就大势与局部沉思”

刘帅认为，“就大势与局部沉思”，首先应在“准确理解上级意图”上下功夫。就整个作战情况而言，上级意图常常体现全局，参谋“是站在首长后面从事具体工作的”，不能够准确理解上级意图，就很难从全局上把握作战的进程，参与谋划也就很难参到点子上。他经常强调，我们的战略行动、战术思想、军队建设和我们所执行的一切政策，都要服从党中央这个全局。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在准确理解党中央的意图下开展工作。因此，刘帅常常能高瞻远瞩，洞察敌我战略态势，高度自觉地遵循和坚持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刘帅理解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个全局出发来考虑的，认为它不仅是发动群众、抗击日军侵略、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途径，同时也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党我军、积蓄革命力量、建立长期斗争战略基地的英明决策。在这一战略决策的指导下，刘帅指挥129师实施了许多漂亮的令人拍案叫绝的战役和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从千里跃进大别山，直到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刘邓大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实得益于他们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刘帅善于“就大势和局部沉思”的参谋工作艺术。

善于“就大势和局部沉思”，还要关照各个局部的特殊性。刘帅在指挥工作中，既全局在胸，全面运筹谋划，又注意把握关节，关照好局部，特别是对全局有影响意义的局部，更是他注意的中心。如在红军长征途中，刘帅不仅直接参与了全局性的运筹谋划，

而且经常亲临最前线，直接指挥有关部（分）队，克服了无数艰险，建立了奇功，有力地保障了全军的行动。正如朱总司令所赞扬的那样，在长征中，刘帅率领部队，“有时任先遣，有时作殿后，所负任务，无不完成”②。

（三）要“沙里淘金”，创造性地运筹决策

参谋“善谋”，可贵之处就在于参与谋划的过程中能够提出独到见解，创造性地运筹决策。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智力劳动，刘帅曾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沙里淘金”的工作。他认为，必须改善参谋队伍“既不能参又不能谋”的状况，要求“消除所谓三大任务（接电话、送文件、挨骂）参谋的情况”③，使参谋人员真正投入到“沙里淘金”工作中去，创造地运筹决策。

刘帅指挥作战从不草率行事，运筹作战方案总是多方对比分析，反复权衡利弊，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参谋人员怎样进行“沙里淘金”、具体运筹谋划，刘帅曾谆谆告诫指出，首先“要多设想一些情况”，“在作战中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要深想、仔细想”，全面分析判断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运筹决策方案时，刘帅认为，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必须将前后得来的材料进行融恰的研究”，第一步“先确定其可信度，时间性与价值”；第二步“然后综合之，给以分析，做出正确的结论，以适应定下决心的需要。”④从而使决策方案适应现实情况。刘帅之所以在指挥作战中，算无遗策，智高一筹，是与其本人务实精神和“沙里淘金”的工作艺术分不开的。参谋人员善于参与谋划的艺术，不仅体现在谋划的结论具有独到性、创造性，同时也体现在谋划过程中“沙里淘金”的工作方面，只有象刘帅那样，全局在胸，坚持多思考、反复分析对比、权衡利弊得失，才能确保最佳方案的形成，才能真正称得上“善谋”二字。

唯实——戒虚戒浮，注重实际

唯实，是参谋工作首要的、最基本的原则。参谋工作只有坚持“唯实”原则，才能保证首长决策及指挥工作的正确、高效运行。刘帅在其长期的军事工作实践中，始终强调要戒虚戒浮，注重实际。他自铭“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现之”⑤。他坚持用一个“实”字来规范自己的指挥行为，突出表现为，重视调查研究，“对‘五行’作综合的估计、考虑”；善于总结提高，力求“在实战经验的切实整理中加以发挥”；注重扎实工作，强调不图虚名“求实用”，充分体现出“唯实”的参谋工作艺术。曾经和刘帅并肩战斗、工作多年的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评价刘帅工作特点的，“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⑥

（一）重视调查研究，“对‘五行’作综合的估计、考虑”

参与运筹决策是参谋工作的基本职能，能否掌握第一手可靠的情报资料是关系运筹决策正确与否的关键，所以调查研究就成为参谋工作的重要内容。刘帅对此曾明确指出，“我们参谋工作，就是研究工作，要到处搜集研究材料，提意见。”⑦对于如何调查研究，他反复强调要注重一个“实”字，认为要指挥好作战，必先深入战场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刘帅就讲“司令部要有调查才能研究，要有研究才能参谋组织战斗”。⑧他要求指挥人员对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一定要明了，不能“雾中取宝”。刘帅在其指挥、参谋工作艺术上的一大鲜明特点就是把左右各级指挥员作战决心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种作战指挥要素，称作“五行”，强调要对这“五行”做周密调查研究，做到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是定下决心的基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⑨

在作战指挥中，敌情是“五行”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而掌握

敌情的基本手段就是侦察。刘帅认为，“侦察是战斗最重要一部分，如没有侦察，或侦察不详，就象狗戴沙锅乱碰一阵”。⑩为此，刘帅指挥作战首先着眼于周密地组织战前的敌情侦察，要求对敌人的作战态势、作战企图、作战部署进行周密的调查，力求对敌情了如指掌。他认为，敌情不全明了，宁肯不打，也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刘帅的作战命令和战术指示中，总是首先分析敌人的特点，“从军队的组成、编制、装备、训练及部队传统诸方面来认识它的本质。”⑪对不同作战对象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都通过侦察做到洞察入微、了如指掌。在战斗实施过程中，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的变化，保持指挥的不间断，刘帅认为“要经常思索可能的敌情变化，绝不能总是用一个战术来对付敌人。”⑫所以他强调在战役、战斗实施过程中，也要对敌情及战场的全貌有个透彻的了解，如果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应当重新研究确定新的对策。如抗日战争时期，刘帅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当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后，下级报告敌人可能发现我行动企图，刘帅没有轻易改变作战决心，而是进一步组织了不间断的敌情侦察，准确掌握敌人的真实情况，判断出敌人没有发觉我伏击企图，保证了既定作战决策的坚决贯彻，从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除有组织地实施侦察外，为切实掌握定下决心的第一手资料，刘帅还十分重视指挥人员的实地侦察。在关键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线，亲自侦察敌情和地形。在神头岭战斗时，他亲自到现场选择伏击阵地；抢渡淮河时，他冒着危险亲自测量水深，寻找部队徒涉渡河点。总之，由于刘帅身体力行，注重并善于组织调查研究，从而对各种情况都能做到明察秋毫，这就为他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善于总结提高，力求“在实战经验的切实整理中加以发挥”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刘帅深刻地体会到，要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既要重视战争实践对发展战争理论的作用，也要

重视战争理论对战争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在作战指挥及参谋工作中，就是要及时总结并运用实战经验，不断提高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作战能力。刘帅认为，如果只在书本上打圈子，不愿联系实际，只注意接受过去战争流血的经验，而不注重今日流血的经验，那么或者变成空洞的武盲，或者成为教条主义者。他强调，“我军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乃是极为珍贵的教材。各级干部应根据毛泽东军事原则，在实战经验的切实整理中加以发挥，使我军能打一仗进一步，以不断的进步，争取不断的胜利。”⑬

刘帅认为，作战经验的总结应及时地把握那些对作战全局具有指导意义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更好地指导全局的作战。在长期的作战指挥实践中，刘帅就十分重视总结和运用初战经验指导以后的战斗，尤其是在战略变换的时节，能及时地根据中央的战略方针，结合初战的实践经验，用适应当时条件的战略战术来指导作战。如他在率领 129 师开始对日寇作战的一个多月中，就及时总结了初战的经验教训，作了题为《游击战术》的军事报告，以后又适时地总结了关于袭击、破路截车、断敌交通和打麻雀战等经验，有力地指导太行山军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

刘帅在总结作战经验中，强调深入实际戒虚戒浮，注重总结的针对性，所以对部队作战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如在抗日战争的交通破袭作战中，刘帅不仅要求部队深入动员群众、严密组织实施，而且要求不断提高破击技巧。他总结出破坏敌人铁轨的方法：“使火车出轨是一个费力小、收效大的好办法。我们实行这个办法应该作到下述事项：1. 要熟悉每段铁轨的组成……。2. 破坏时不需要把道钉完全拔去，只需要把轨内或轨外的道钉拔去某一边就行了。3. 拔去道钉后，稍微把铁轨一头外移一二分就行了。……”⑭。由于总结的经验针对性强，从而在交通破袭战中，有力的指导群众性的破击与技术性的破击相结合，使我军的破击战如虎添翼、大显神通。

（三）注重扎实工作，强调不图虚名“求实用”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刘帅在指挥工作上始终注重从实际出发，不图虚名，讲究实效。在战争年代，他就十分强调机关工作应适应紧张、复杂的作战环境及作战指挥需要，他要求机关要“减少工作中不必要的复杂手段，减少冗长空洞的指示、决议、报告和谈话，减少铺张门面的长时间大规模的会议等等。切实提高工作的速度和效率，以弥补反扫荡转移行动中所耽误的时间。这里就需要与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敷衍了事，把一日可能完成的事拖延数日等现象，作坚决的斗争。”⑮他要求参谋人员在侦察、研究敌情时，要踏实报告、精密处理、切不可因对我有利而“放大”良好的情况，因对我有害而“缩小”不利的情况。刘帅不仅熟悉掌握敌我全盘情况，而且经常亲自查阅从敌军手中缴获的材料，研究审讯记录。他起草的许多战役战斗指示，不仅对部队作战运用的战术考虑十分周到，甚至对具体通信联络的方法也安排得非常周密。充分体现出他极端负责的精神和认真严谨、实事求是、扎扎实实、万无一失的工作作风。

求严——严谨细致，一丝不苟

求严，即在参谋工作的诸环节中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参谋工作的伸缩性很大，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是参谋；挂挂图，画画表，打打电话也是参谋，但是任何参谋工作均事关作战全局、马虎不得，麻痹不得。刘帅在军事斗争实践中，不仅是一位善谋、唯实的大师，也是一位参谋工作的严师。他经常告诫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要“仔细侦察，冷静估计，踏实报告，精密处理”。⑯并认为，求严、力争“万无一失”，是掌握主动，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刘帅经常反复教导参谋人员所要做到的“心细如发”、“案无积卷”、“守口如瓶”等名言，体现了“求严”的参谋工作艺术风格，是我军参谋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一）"心细如发"，规范参与行为

刘帅向来以周密细致的组织指挥作战而著称，要求参谋工作必须十分准确精细。他认为，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作为一个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要有"包天胆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令敌丧胆，而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则要象"描花绣朵"那样仔细，做到"心细如发"，力求精确无误。

刘帅在军事实践中，十分重视参谋工作的准确性，认为参谋工作欠准确，就会使首长难以定下正确的决心，下级理解上级意图就会产生困难。他曾把参谋工作不准确，形象的比喻为"山西毡帽"和"丈二和尚"。他指出，有些参谋提供的情报好象"山西毡帽"，如"数千敌军集结，似有侵犯根据地企图。"刘帅讲，"数千可以理解为二、三千，也可以理解为八、九千。"敌军"可以是日军、伪军或皇协军（各军战斗力不同）。这样的情报有碍首长定下决心。刘帅还把文书中那些含糊其辞，令人难以捉摸的语句称作"丈二和尚"。例如有的战斗报告写着，"战斗激烈残酷，双方无一伤亡。"无一伤亡的战斗怎么称得上"激烈残酷"呢？使人费解，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他告诫参谋人员，工作必须讲究准确性。

参谋工作的"准"与"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力求工作过细，才能求得准确无误。刘帅坚持要求，参谋工作不仅要准，而且要细，认为快而不细做不到准。他历来反对粗枝大叶，反复提醒告诫参谋人员"粗枝大叶害死人"。对于一字之差、几分钟的迟延从不轻易放过。抗日战争时期，129 师一位文化程度较高的参谋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当时由于没有仔细察看地图，误将白晋路上的"来远"写成"涞源"。刘帅发现后，及时对这位参谋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他告诫说，"在军事上的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战斗的成败。"⑰

因此，"司令部的参谋工作，一定要耐心、细致、准确、及时。"⑱

（二）"案无积卷"，追求工作效率

参谋工作是一项时效性很强的工作，时间与效率决定了参谋工作的自身价值，甚至将直接影响整个军事机器运转的效率。刘帅十分强调参谋工作的时效性，要求参谋人员要"案无积卷"，要有雷厉风行，事不过夜的作风，以保证首长不间断指挥的需要。

上情下达是参谋工作的重要内容，时效性对其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刘帅注意教育参谋人员不能书生气十足，慢条斯理，而应随时研究情况，进行战役、战术计算，迅速拟制简明的战斗文书，及时上报下达。在战争年代里，129 师作战科的一位参谋，在给八路军总部报送作战计划时，晚了 50 分钟才送到，超过了规定的时间，刘帅对此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责任重大吗？在你们手上有千军万马，耽误一点时间就要死很多同志，耽误了军机是要误大事的！。"⑲同时，刘帅也很注重命令传达的速度，认为快速地传达命令是取得全胜的保证。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他也从不忘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著名的长乐村急袭战斗，歼敌两千余人，成为粉碎敌人九路围攻晋东南的决定性战斗。事后，刘帅指出，这次战斗的主要缺点是在"急袭以前，命令传达非常迟缓"，只有两个团协同一致，另两个团落在后面，"以致不能在短时间内使用全力突然干脆地压溃敌人"。⑳

参谋工作的效率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参谋人员的工作态度。在战争年代里，为了更好地掌握部队，刘帅对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以及作风要求特别严格。他要求侦察参谋每天要标绘出当日情况图，每周要标绘综合情况图。凡是部队的请示报告，都要机要部门先送主管此项工作的参谋，标出"晓示图"，以便指挥员一目了然地掌握情况。现代条件下指挥作战，对参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更需要"案无积卷"的工作作风，更需要忘我的工作精神与科学的方法相结合，以求得参谋工作的效率能适应新时期参谋工作的需要。

（三）"守口如瓶"，把不确实性留给敌人

参谋工作具有较强的保密性，许多内容往往涉及全局性、长期性和关键性的问题，有些经办的工作也往往是首长、机关正在控制的绝密事宜，在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时期仍然如此。刘帅经常教育参谋人员，要"守口如瓶"，力求把不确实性留给敌人，并指出，"保守军事机密为制胜与失败的重要关键。"

在战争年代里，刘帅针对参谋人员是自始至终筹划组织部队军事行动的参与者，也是敌特获取情报的重要对象的情况，要求身边的参谋人员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他特别厌恶那些喜欢眩耀自己，参与了某一机密就到处吹嘘、好出风头的作风。在工作中，刘帅经常提醒大家要力戒案头紊乱、文件乱扔、带着机密文件乱串的散漫习惯。他把暴露军事机密称之为"愚蠢之极的自杀行为，"认为，"倘不立即纠正，确会招致亡国亡家之祸。"㉑1941 年 1 月 27 日，129 师某部在韩壁遭受蟠龙之敌的袭击，其原因除侦察不力，警戒不严外，电话泄密也是主要原因。

在对敌斗争中，刘帅认为，搞好侦察与严守机密应作为对敌斗争的两个重要手段，把它们与整个军事斗争的全局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必须搞好侦察，把我们的耳目弄聪明；很好的保守机密，使敌人耳聋目瞎。""把战争的不确实性留给敌人，保密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和平时期，刘帅也反复指示，"现在我们各方面情况有很大变化，敌人会千方百计的搞我们的情报，保密的问题请同志们多加注意。"㉒保密的问题如此重要，往往成为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从事机密性工作较强的参谋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相比，更应强调保密观念，把保守机密做为对敌斗争的利器，真正做到刘帅要求的那样"守口如瓶"，把不确实性留给敌人，确保首长意图的圆满实现。

注　释

①③⑦㉒《参谋工作文献选编》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1 月第 1 版，第

334、第328、第327、第337页。

②《军事历史》1986年第3期，第17页。

④ ⑩⑫⑭⑮⑱《刘伯承指挥艺术》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189、第197、第197、第96、第250、第157、第205页。

⑤⑥《刘伯承回忆录》(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300页。

⑧⑬⑳《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第283、第563、第172页。

⑪《刘伯承元帅研究②》重庆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32页。

⑯《元帅用兵之道》海潮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85页。

⑰《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第195页。

⑲《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1982年6月第11版，第123页。

㉑《军队后勤参谋学》教学参考资料选编，后勤学院1989年1月，第61页。

学习刘伯承关于借鉴外军经验的思想

陈世俊　少将

刘伯承同志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坚持不懈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刻苦研究中外军事典籍，十分注重学习借鉴外军经验，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军事建设、军事教育和充实我军的军事理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当前深入贯彻“十四”大精神，认真落实军委关于注重军队质量建设方针的形势下，重温刘伯承同志关于学习外军经验的思想，对于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刘伯承借鉴外军经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刘伯承同志学习外军经验的思想，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军事著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刻研究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军事斗争实践，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刘伯承同志生于1892年，自幼好学，1911年参加了革命学生军，1912年考进重庆蜀军政府将弁学堂，毕业后正式从军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先后参加了反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

刘伯承19岁从军后，博闻强记，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军事知识。通过对以《孙子兵法》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及流传于当时国际间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他感到，有必要把我国的传统军事理论与当代外军的军事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对比的学

习和研究，以增强理论的针对性和推动传统理论的发展。1927年以前，尽管中国军事思想的主体部分为传统的军事思想，但当时已有很多外国军事思想在中国传播。如苏联向黄埔军校派遣军事教官，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长期驻军，不同程度地将外国军事思想带到了中国，使刘伯承比较我国军事思想有了参照系。“师夷长智以治夷”的认识也由此而产生。为适应我党军事斗争的需要，1927年，根据刘伯承同志的请求和我党的挑选，于11月赴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当时他已年近40，为了尽快掌握学习外军经验的语言交流工具，他以惊人的毅力，仅用一年时间就熟练掌握了俄语。在学习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军事论著，拿破仑、苏沃洛夫等军事名家的著作，研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战史，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正规战和游击战战术，司令部工作、野战军和军区建设，大大开阔了视眼。

刘伯承从苏学成回国之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破裂，正值我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之时，当时我党虽然已有红军二、三十万，但与反动派武装力量相比仍然非常弱小。同时，我们的红军成分绝大多数是起义的农民，不仅军事作战理论水平很低，而且文盲占相当大部分；即使在中高级干部中，军事理论素质也普遍较低。革命的坚定性与作战指挥的正确性难能达到统一，因而在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作战指导上往往举措失当，造成损失。我军当时的现状和血的教训，使刘伯承清楚地看到，要“师夷长智以治夷”，就必须将外界的东西、特别是敌军的东西如实客而地介绍给我军中高级干部，藉以提高我军中高级干部克敌制胜的指挥艺术。为此他针对我军当时的形势，任务、作战对象等情况，一边指挥作战，一边有的放矢地翻译外军军事著作，尽快地将外军的军事理论、特别是那些反映现代战争特点又可为我军借鉴的军事理论，介绍给我军中高级指挥员。1931年底，刘伯承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时，为了教学和部队建设的需要，他翻译了多种军事论著，以拓宽指战员的视野。1933

年11月，为帮助红军指挥员明了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互相区别与联系，他翻译了《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在淮海战役前夕，为了提高中高级指挥员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他翻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在渡江战役作战前夕，为提高中高级指挥员攻坚作战的指挥艺术，他翻译了《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由于刘伯承的辛勤耕耘，及时将大量外军军事著作翻译介绍给我军中高级指挥员，对提高我军中高级干部的作战指挥艺术，加速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军队也由作战状态转向和平建设。为加快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刘伯承同志主动请求，负责筹办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在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期间，他遵照中央当时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指示，坚持在总结我军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学习苏军现代化战争的组织指挥经验。为保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习外军，他请参加赴朝作战的有直接对外军作战经验的同志到校作报告，从实践中总结吸取外军作战经验，以促进学院领导、教员和学员加强对外军的研究与学习。他还十分注意军事翻译工作和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强调“翻译工作处于学术介绍的关键地位，是学术介绍中很重要的一环。”他把教材建设看作是整个教学工作的“重工业”，而把翻译工作又称为学术介绍的“水龙头”。他曾说：“现代化军事科学没有好翻译是谈不到学习的”。①也就是说没有好的翻译就没有好的教材和资料，就谈不上借鉴外国的军事科学成果。他曾要求翻译人员必须具有三套本领，即“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外文修养上，必须有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②在他的指导下，军事学院培养了大批的军事翻译人才，大大地促进了我军的翻译工作，为我军博采外军经验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刘伯承关于借鉴外军经验的思想，是他在长期革

命斗争实践中，根据战争的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不仅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和研究外军经验，同时还注意对外军经验的普及，把外军经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促进了外军经验与中国的传统军事思想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合，对加速我军军事理论的发展，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刘伯承借鉴外军经验的主要思想

刘伯承借鉴外军经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科学地接收一切有益的经验

刘伯承指出："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有两方面：一是向我军自己的实际战例学习；二是向一般的军事理论学习"。③因此，"必须科学地接受一切有益的经验而总结之，作为今后行动的指导"。他还提醒我们的高级指挥员要尽量去了解世界军事实际和军事学术所达到的新水平，以免在和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反动军队作战中，对对方的装备与战术一无所知，而丧失寻求对策的能力。在军队建设、作战原则、战略战术运用等方面，世界各国的军队虽然各有其特点，但许多方面是有共性的，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进的、科学而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毫无顾忌地加以学习和借鉴。

（二）注重博取众家之长

刘伯承虽然在苏联学习过，也翻译了大量的军事理论，但是在五十年代我党指示要向苏联学习的情况下，并不偏颇于研究、吸取一家的经验，而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广泛研究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的军事思想，强调要根据作战对象、当前和将来的作战任务、军事理论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博取众家之长，予以提高和发展。刘伯承借用"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的古训，指出：我们"研究军事科学的方法要博而约，约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具体说来，就

是约之斯大林、毛泽东的军事学说”。④所谓“博”，就是在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时要广而通，不论是我军的，友军的，还是敌军的，不论是古代的、近代的或是现代的，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三）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刘伯承在学习外军经验时，坚持马列主义的学风，反复强调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把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和外军的先进军事学术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针对我军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坚持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他在莫斯科高级步校学习时，他就认为：“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⑤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就反对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做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针对我军反对教条主义而对经验主义批判不够的情况，告诫各级指挥员在学习中“要克服教条主义，尤其要克服经验主义”。全国解放后，在他领导军事学院期间，面对全党上下向苏联学习的大气候，不时地提醒闭门造车的经验主义和邯郸学步的教条主义做法，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指出：“无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它们都是把军事科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真理”。⑥他还用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变化的观点，阐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他指出：由于实际情况是运动的，因而；实际经验还必须提高到理论，再按新的实际情况来运用它。可见，刘伯承是多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四）坚持学习外军经验与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相结合

刘伯承同志十分重视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明确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先进的军事科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说明和运用的军事科学，是产生在人民解放世纪的军事科学”⑦。他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对世界军事理论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它本身就包含了科学地学习外军经验的思想。外军的先进军事思想一般是反映了世界军事斗

争的普遍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反映的是适合我国军事斗争的特殊规律，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军事斗争。刘伯承在翻译介绍外军的军事论著时，十分注意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加以分析，他说：我们的干部，在研究军事时，首先必须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才足以正其本，又必须根据毛泽东军事著作及其在实际运用中所发展的战例，来读现代战术，才可以清其流。否则，即使不流于教条主义，也将流为经验主义。

三、新时期仍要坚持刘伯承借鉴外军经验的思想

贯彻军委关于注重质量建设的方针，加快我军建设步伐，是改革开放新形势对我们的迫切要求。在革命化，现代化的建设中，有些方面是我军的优势，但有些方面与外军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军队的某些差距，需要我们在总结我军、学习外军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刘伯承注重借鉴外军经验的思想，加强与外军的交流，大胆地将外军现代化建设和与作战有益的思想为我军所用，加速我军质量建设步伐。

（一）解放思想，学习外军一切对我有用的经验

要学习外军对我有用的经验，首先要解放思想，树立一个“敢”字。不要一提及“洋”就谈虎色变，更不能把“洋为中用”认为是崇洋迷外；同时，还要纠正过去那种单纯为寻求反面教材才去研究帝国主义的做法。既要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要看到几百年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国军队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所积累的先进经验和方法是没有阶级性和国界的，谁掌握它，就为谁服务。如果别人已经总结并被实践证明是好的经验，我们不能很好地去借鉴，硬要另起炉灶，从头做起，则将使我军难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我们要明智地、大胆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军队一切对我们有用

的东西，谁先进、就向谁学习。现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战争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精确制导武器、人工智能武器在战争中的运用，改变了老式的作战模式，而我军在装备、编制等方面、与现代战争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面对这种实际情况，我们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军事水平，缩短差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胆地学习和引进外军的先进技术及其有关的管理经验。刘伯承在《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一文中，对学习外军经验论述时指出："我们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脱离我军建军传统、军事思想的优良基础而企求另搞一套'现代化'；另一种是满足于旧的一套，拒绝正规化的学术的保守倾向"。⑧那种不论外军的经验是否先进、是否有益、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和我军特点，不加分析一味地全盘端过来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反之，那种认为有我军原来的那一套就够了，而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做法也具有很大危害性。因此，我们在军队深化改革，吸取借鉴外军经验工作中，必须分析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从我军建设实际出发，选准学习的内容

学习要有方向，赶超应有标准，要学习外军的经验，必须弄清学什么？否则，学习就是一句空话。学习外军的经验，首先是要研究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因为军事思想是外军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论基础，作战原则是外军作战基本规律的概括和组织实施作战的基本依据及行动准则。掌握了外军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就把握了外军军事活动的普遍规律，是知已知彼不可缺少的内容。其次是要学习外军的一切军事学术成就。外军军事学术成就是外军军队建设，作战指导客观规律的集中体现和军事实践的总结。因此，我们要学习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成就，战争潜力及其战备措施等方面的特点，如编制、体制、武器装备，作战、训练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搞好我军的软件建设。再次是要追踪外军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刘伯承指出：军事技术随生产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军队指挥则又随军事技术发展而

复杂专门化了。当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在军事上得到应用，不仅使武器装备向高精尖方向发展，而且也在改变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法。在这种新情况下，墨守陈规，不及时吸取新的信息，新的军事科技成果，我们势必要处于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大胆吸取国外现代军事科学的成果，发展我军的“硬件”建设，是刻不容缓的。

（三）学习外军经验，走有中国特色的建军路子

学习外军经验的目的就是用外军的有用经验，充实我军的军事理论，用人类最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我军的装备。要提高我军质量，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军路子，否则，学习就没有针对性，难以收到较好的效果。从我国、我军的现实情况看，要建设好我们的军队，首先面临的是更新观念，树立质量意识。从最近的几场局部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都说明了数量不能代替质量。现代军事领域，竞争十分激烈，我军在追赶世界军队先进科技水平已失去许多可贵的时间，质量建设已是当务之急，势在必行。我军肩负着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历史重任，加强我军质量建设，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和平环境的前提。现代战争，是科学技术、人的素质、人与武器相结合的综合较量。因而质量建设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任何军队建设都需要注意的问题。可以说，军队建设没有质量，就没有军队的现代化，就没有战斗力。二是坚持“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不断完善编制体制。要优化诸军兵种结构，合理调整、精简员额，减少重叠机构，理顺指挥关系提高军事效益。三是提高军人文化科技素质。军人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需要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现代军事思想和现代化指挥才能的人去掌握、使用。我们不仅要提高我军官兵政治素质、军事素质，还必须提高文化科技素质。四是必须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我军质量建设的重点是现代化，只有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才能产生战斗力，才具有现代化的意义。因此，必须正确

处理人与物、革命化与科学化、武器装备与军事理论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充分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效能，在有什么武器练什么兵，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同时，还应积极学习先进的军事科技知识，为掌握和使用新武器，运用新技术积累知识，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五是要深化改革。从我国国情和军队特点出发，学习、借鉴外军的有益经验，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整改革，使我军建设更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与我军的实际。六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高新技术。海湾战争的经验证明：进口人家的东西，总是第二流的，最终要受人制约。因此，我们在发展高新技术时，要强调未来打什么仗，就要研制、生产和发展什么武器。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走捷径，大胆地学习外军有益的经验，做好引进、消化、吸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依靠我们的科技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高新武器装备，贯彻多研制、少生产的方针，有重点地加强国防科研和技术储备，积极对现有武器装备进行技术改造，逐步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

总之，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发展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的精神，深入学习刘伯承同志注重学习外军经验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质量建设的道路，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

注　释

①②《刘伯承回忆录》（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5 年 2 月第一版，第 264 页、第 263 页。

③④⑤⑥⑦⑧《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502、第 618、第 285、第 503、第 614、第 635 页。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略论刘帅关于军事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王　羊

刘伯承元帅在70余年漫长的军事生涯中，立足我国革命战争实际，把握世界军事科学跳动的脉搏，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军事学术著作，翻译和评介了数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论著，为形成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笔者曾在刘帅创建的军事学院俄训班学习和翻译室工作过，关于刘帅在军事翻译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有不少是亲耳聆听和亲目所睹的，现结合个人的回忆，将几个重要方面写出来，供在军事翻译和外军研究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精辟的翻译观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度，翻译作品少，军事译作更少，至于军事翻译理论则几乎是白纸一张。而刘帅正是在这样一张白纸上，重重地写下了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的一笔。他站在我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实际的基础上，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大力翻译介绍各国现代军事学术著作，并在实践中确立了军事翻译工作的重要地位，正确评价了军事译作的美学价值，郑重提出军事翻译的新标准，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翻译理论体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帅最先确立了军事翻译在介绍外国军事信息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称之为“水龙头”。50年代初，我国刚刚从长期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但又面临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及其对我新中国实行的

全面封锁，当时只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援助我们。因此，刘帅认为，军事翻译工作处于介绍苏联军事理论和红军作战经验的“前沿”地位，是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他坚决主张把译员和教员相提并论，把翻译工作与教学和研究工作看得同等重要。他强调指出：没有翻译，就没有借鉴；没有借鉴，就难以发展和丰富现代中国的军事科学。

1952 年 2 月，俄训班开学不久，刘帅亲临教室给我们作报告，整整讲了一个下午。他开头就说：“我也是来自旧军队的”。听说俄训班学员中有小部份同学参加革命前曾在旧政府或旧军队任过职，现在背历史包袱。他现身说法，劝这些同志放下包袱，在工作和学习中改造思想，丢掉旧的一套。对其他同学，他强调也要改造思想，端正学习态度，克服诸如不热爱军事、不喜欢学俄语等各种私心杂念。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好俄语、汉语和军事，做一名合格的军事学术翻译。

在谈到军事翻译的标准时，刘帅在这次报告中提出了八个字：“内容正确，文字清通”。为了进一步阐释这“八字标准”，刘帅借用了他十分赞赏的中国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翻译理论：“信、达、雅”；并且，根据军事翻译的特点，对这三个字分别作出新的解释。

他指出，“信”——就是准确无误，忠实原著；就是要求译文在内容上跟原文一致，在结构上、风格上要保持原有的特点，做到真实可信。他特别强调，许多军事译文是要用来指挥打仗的，它的准确性要求更高。俗话说，差之丝毫，失之千里。如果译文中有不准确甚至是错译，那就会使读者发生误解，到战场上就要死人。

“达”——就是译文文字通顺明白，突出重点，要把原文的要旨转达给读者，不能轻重不分，含糊不清，也不该隔靴搔痒，使人不得要领，扑朔迷离。

“雅”——就是要突出汉语表达的特点，讲究结构，讲究语法、

要象行云流水，不佶牙赘齿，不文白夹杂，不要在布衫上打几个绸补钉。

刘帅还强调指出，军事科学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决不是两国文字的表层“粘合”，而要进行深层的发掘，嫁接两国文化的“基因”。1953 年 9 月 28 日，他向军事学院翻译人员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发掘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这是刘帅关于军事翻译理论的一次最深刻和最完整的阐述，也是对我们翻译人员的最严格的要求和最殷切的希望。这一寓意深邃的题词一直铭刻在同志们心上，成为激励我们刻苦钻研奋进不息的巨大动力。

丰硕的翻译实践

刘帅几十年如一日，发扬“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奋精神，放弃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挤出一切的作战和训练的间隙时间，从事翻译和写作。

早在 30 年代初，刘帅从苏联留学回国后，由于历史的需要，当上了我党我军第一位专门从事军事翻译的中央军委编译科长。从此，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翻译战斗历程。刘帅的翻译事业，完全是为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进行的。在严酷的白色恐怖氛围中，他把位于上海一幢楼房亭子间的“地下翻译所”，同广大的革命根据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亲自参加和组织翻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等书，并印送各根据地，供前线各级指挥员参考。他在主持中国红军学校工作期间，为满足前线的需要，针对红校缺乏统一的军事教材而借用中国旧军队和日军操典上课的情况，大力组织翻译并亲自编审各类军事教程和教材。仅在 1932 年上半年，红军学校就

出版了10种军事教材，6000余册。如《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敌进攻战斗要领》、《劈刺教范》、《兵器摘要》、《爆破摘要》、《排教程述要》、《夜间战斗》、《迫击炮讲义》等，还专门翻译了苏军的战斗条令，作为红军学校的借鉴和参考。刘帅于1932年底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后，翻译了《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建设的参考；并在前线翻译了《苏联的山地战斗》，转译了日本、法国军队的山地战斗经验，介绍给浴血奋战在山地的工农红军，“供前线同志研究山地战斗之用，并要同志们斟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之。”以后，在指挥战争的间隙，又翻译了《战斗胜利的基本原则》、《对防御的敌人进攻时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苏联红军步兵指挥员分为四级》、《苏联红军步兵主要的几个队形》、《追击》等苏联论著。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建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面对新的斗争，他继续坚持翻译、介绍外国军事理论著作，供抗日将士参考，以寻求最后战胜日寇法西斯的道路。他首先翻译了《游击主义的克服——摘译＜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一文。以后，又与左权同志合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并完成全书校订工作；还从苏军《战术备考》中摘译了《军队指挥法》；翻译了苏联《军队建设》（内务条令）一书，并于反“扫荡”的作战间隙，完成了补译和校订苏军《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

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均20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刘帅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完成《合同战术（下部）》的补译和全书校订工作；并于翌年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淮海战役决战前夕，刘帅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供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总结自己作战经验作参考。渡江战役期间，刘帅完成了编译《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论苏军加强的步兵团对阵地防御的突破》等军事文稿的工作。

大陆解放不久，刘帅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给党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军事学院。为开创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军事教育事业，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高上级干部，他呕心沥血，在仅剩的一只左眼的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数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著名“火炉”——南京的三伏暑天，于紧张的的野外演习之后，不顾疲劳，精心校译和部分重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这篇长达数万字的译文。他为准备《集团军进攻战役》一课，鏖战18个昼夜，查阅了大量资料，修改了原译稿，编写了3.7万字的讲授提纲，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亲自讲授了6小时。他编译了《斯大林的统帅学术》，校译和重译了《战役法概则》、《白俄罗斯战役》等一大批讲义。他还利用大连“休假”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两个多月，先把条令的每条文字自己译成中文，并与原译稿对照，择其善者而从之，然后再与助手研讨，逐句逐段反复推敲，将20余万字的《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的译稿前前后后修改了三遍。

刘帅的军事翻译成果极其丰硕，这里只是挂一漏万地介绍了一些，但已能充分表明刘帅译作之多，涉及面之广，这些译文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和几次院校工作期间，对我军赢得战争胜利和获取训练成果，乃至推进我国军事科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紧密联系实际　放眼预见未来

刘帅是“火线翻译家”和“马背上的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不是文人骚客书斋中的风雅之作，也不是绅士学者茶余酒后的消闲文章。它与中国革命军人同在，与中国革命战争共存，是为枪林弹雨里的“阵中读者”提供的另一种武器——这种武器同人民

的事业、战争的胜利紧紧相联，因此它的价值非一般译文可比拟。刘帅的译作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1、针对性很强。刘帅的译作，多是为了解决当时战争中最迫切的问题的。如前所述，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翻译了大量的游击战、山地战斗方面的材料；抗日战争时期，翻译和校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第三次国内内革命战争时期，完成了《合同战术》全书校译工作，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在建国以后，校译、补译和编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斯大林统帅学术》，以及卷帙浩繁的条令、条例和军事教材。

刘帅译作的针对性，还突出地表现在紧密地配合路线斗争的需要方面。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所谓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死搬硬套苏联军事教程和教材，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教条主义，驱使红军与兵多势众的敌人硬拼。刘帅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中国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与李德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他一面撰文总结中国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一面翻译介绍苏联游击战争的经验，以此来表明：“毛泽东游击战法和运动战法是正确的，是有根据的，应当把它还给中国红军。在此期间，刘帅选译了苏联红军的权威著作《合同战术》中的有关章节，编成一篇文章，篇名定为《任丹吉在＜合同战术＞上所述袭敌后方的穿袭和游击队动作》。这篇译文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他还有意找出苏军野战条令的老版本，专门从中挑选有关章节，译出《苏联旧野外条令的游击队动作》，其笔锋所至，处处显示出译者坚持实事求是，洋为中用的思想光彩。面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横行霸道和反“围剿”战争的不断失利，刘帅忧心如焚，寝卧不安。他几乎天天同李德进行争吵，但是没有结果。于是，他继续挥动如椽巨笔，撰写文章宣传游击战和运动战，赞扬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同时翻译《机动的要义》等苏联学术著作，抨击军事教条主义，与李德进行不妥协的

斗争。

2、超前性突出。20世纪30年代的战争，已带有相当浓厚的工业化色彩，国民党军队仗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拥有当时先进的武器装备，而红军武器装备却差。刘帅适时介绍一些武器装备的特点及其使用和对付方法的军事译文，为红军打开了一个观察外部世界，进而了解当面敌人的窗口。

现代科学技术以其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朝前迈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又总是最先应用于军事。要想建设中国的现代国防，必须认清这一趋势，并以卧薪尝胆的精神作艰苦的努力。刘帅有远见地指出："在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时，必须结合我军原有的经验，更要结合朝鲜战场的经验，而且还要预见到将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够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的无比生动的威力。"①因为，时代在前进，实际在运动，搞军事科学研究，一定要看准世界军事发展的水准，要善于预见将来，要有超前性，要从现在的实际，"走到将来的实际。"②

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刘帅的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而，也表现在他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建设的问题，先后翻译出《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军队建设》(内务条令)、《合同战术》等一系列军事著作。这些译作印发各部队，引起了广大指挥人员、特别是高上级干部的强烈反响。这对推动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无疑地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3、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刘帅的译文不但及时响应革命战争的呼唤，而且能站在理论高度上，介绍苏联的军事科学。例如，《莫洛若夫说明战术、战役和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一文，就是从理论上阐述了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的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篇译文的发表，不仅使中国红军指战员对苏联军事学术的理论体系有了较完整的了解，也促使他们去考虑如何建立

中国军事学术的理论体系问题。

刘帅不但注重从实际出发确定翻译选题，还注意用“译评结合”的方法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他主张，介绍和借鉴外国军事理论和经验，要按照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去做：“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特有的东西。”为此，刘帅几乎对其每篇译作都写了前言或后记、序或跋。在这些序或跋中，他反复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来读”；“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要分析我们的实际条件，活用此原则”；“我们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乃极为宝贵的教材”。例如在《游击主义的克服——摘译＜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一文的《译者附注》中，他指出：“为要说明建立现代军队的重要性及强化游击战争的重点起见，特把这一篇文章译出来作为同志们进行军队建设的参考。当然我们的游击战争必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展与强化，以配合正规军作战，绝不能因为建立正规军队而放松，相反地，因建立正规军队而加强了游击战争。至于读这篇文章应着重于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及其运用此原则的环境时间性，那就用不着说了。”③再如，刘帅在译完《军队指挥法》后写的《译者前言》中指出：“在学习中必须尽量引导到我们作战的实际环境中，力求切合我们的需要，来发挥我们军队的指挥法。”④当《合同战术（上部）》出版的时候，他在所写的《译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在学习苏联战术中，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战术为核心，而寻求所以战胜日寇之道”⑤。他在《＜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译版序言》中强调指出：“我军现有武器自然是不及敌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使用武器的准确与熟练的程度，必须超过敌人，并力求在战斗中夺获敌人的武器。”“现在我们部队使用武器的训练与指挥员现实战术的学习，应成为我们军事教育基本的内容。”⑥他在《＜合同战术＞译版再序》中写道：“为利于斗争，我们在现代战术进程之中，必须知道各兵种的性能及其协同动作，尤其要知道的是在研究各兵种弱点当中，寻

找所以防御的办法，在缴获了敌人现代武器之时，即可以迅速使用它们的办法，这就是我之所以急于将此书出版以贡献于我们干部的一点薄意。”⑦他在《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中，着重指出：“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有两方面：一是向我军自己的实际战例学习；二是向一般的军事理论学习。”⑧

培养宏大的翻译队伍

1950年，刘帅受命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着有效地借鉴苏联军队的战争经验，编写出适合我军需要的军事教材，必须先有懂得俄语的军事翻译人员。为此，他在呈报中央的《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中，就提出专门设立翻译室和开办俄文译员训练班的建议。

鉴于当时军事学院军事教材绝大部分是参考苏军教材编写而成的，所以，刘帅就亲自抓教材的编译工作和翻译人员培养工作。他在给我们翻译人员作报告时指出，军事翻译工作同军事教育工作一样，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南，正确认识和处理翻译与教材、翻译与教学、翻译人员与军事顾问的关系。这是端正翻译工作方向，明确军事翻译要求的主要环节。后来，刘帅在《把我们的教授法和学习法提高一步》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这里首先关连着翻译工作，就是要翻译能准确介绍学术内容。”⑨为解决这一问题，刘帅曾几次为我们翻译人员做报告，改译文，做讲评，还专门开过几次翻译工作会议。

由于翻译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刘帅十分重视翻译队伍的思想建设，专门为翻译室调配了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定期进行思想整风，以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还经常到翻译室开座谈会，与我们翻译人员促膝谈心，说明只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才会有钻研业务的革命动力，才能在学术上不断进步，

有所造诣，并提出了“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兼业务专家”的口号，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和奋斗目标。1952年12月21日，刘帅以《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为题，再次专门为我们译员、教员做了一次报告。在报告中，刘帅重申了军事翻译工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性。他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是要在解放军原有的基础上着手，要学习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诸兵种学术。这些学术就我来说，也是无经验、无知识的，必须依靠顾问同志编写教材，而顾问同志不懂中文，因此需要译员同志把它译成中文。这好象顾问的学术是自来水的发源地，而翻译工作则是自来水龙头，它使顾问的学术源源不绝地输送给教员、学员，同时也要将教员和学员的思想综合反映给顾问。所以，翻译工作是一个“关键”工作。译员同志把译稿给教员，经过教员介绍给学员；学员有问题，教员能解决的为之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归纳起来请教顾问。这样协同互助，以达介绍军事科学的总任务。”⑩

在这次讲话中，刘帅严肃而中肯地批评了我们，指出我们主要的思想缺点表现在：内部闹不团结，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文人相轻，不问政治，生活散漫不坚持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纪律、赏罚、总结、考核等制度都很差。特别是骄傲自大、文人相轻的缺点表现得最严重。中国旧社会里文人相轻是很严重的，看不起别人，文章总是自己的好，自己的作品不准人家改一个字，若人家改了一个字，就如丧考妣，就有不共戴天之仇……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当时听了都面红耳赤，但心里都认为老院长批评得很对，都暗下决心要改。

刘帅这次还特别批评我们有的译员同志工作马虎，潦草塞责，懒得查词典，但因没有军事学术上的素养，又不虚心问别人。只凭想象或从字句上推测一下，张冠李戴的武断、轻率现象时有发生，以致闹出笑话。如某教材中把“登陆战”和“抗登陆战”译成“登陆队作战”和“反登陆队作战”。甚至还有的把“我军”错

译成“敌人”。这些都是不可原谅的。

关于思想意识的改造和军事科学的深造的辩证关系，刘帅在这次报告中阐述道：“军事科学不但包括武装斗争的军事知识，而且还包括政治工作。如果思想意识不改造，是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的。恩格斯说：‘客观事物是思想的源泉，思想是客观的反映。所以思想经常落后于客观事物。’我们的思想是已经落后在翻天覆地的现实之后了。今天我们已经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推翻了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推翻了几十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我们是处在人民当主人的新民主主义的时代了，是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时代了。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看到这样巨大的转变，还没有发觉自己的落后。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努力改造自己，跟着时代前进。”⑪

在结束报告时，刘帅运用形象的比喻，语重心长地指出：“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旧斗争，是阶级的矛盾，要随时发现缺点，纠正错误。毛主席说：‘我们不要脱离实际，要好好地学习千百万人民血汗换来的经验。把旧的、肮脏的东西抛弃，新鲜的东西只有冲破旧的才能新生’。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对‘文人相轻’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文件。鲁迅先生也说过：‘文人象有刺的刺猥一样，不能互相撞碰，一接触就要你刺我我刺你地相打’。这是很深刻的话，有这个毛病的同志，必须引以为戒！朱总司令对旧军事科学这样说过：‘过去旧的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的学生’。毛主席的《实践论》，是马列主义宝库中中国的经典著作，我们必须仔细研读。今天我对思想改造问题提出如上意见，愿与大家共同勉励，响应毛主席号召，把军事学院的工作做好。”⑫在聆听和学习刘帅这一报告后，我们翻译室的政治空气比以前浓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较前开展了，“文人相轻”现象比过去也少得多了。以后，刘帅又多次地为我们做报告，找个别谈心，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督促我们进步。直至1956年7月在北京送走首席顾问返

苏休假后，在我们一道回南京的火车上，刘帅还问我："你们翻译室现在还有'文人相轻'的现象吗？"我回答说："还有，但比以往要好多了，不那么严重了"。刘帅听后很满意，但仍然嘱咐我们"改得越彻底越好"。

为提高全体翻译人员的素质，刘帅指示学院有关部门采取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如为了提高译员的俄语水平，订购了大量的外文书刊，聘请俄语教授来院讲学。为了增长大家的军事知识，组织译员参加在职干部军训班学习战术，轮流去步校集训，或随各系（班）旁听，参加军兵种见学，参观军事演习。为了提高中文水平，学院政治部开办了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讲座，采购了《新著国语文法》、《修辞学讲话》等书籍发给译员学习。刘帅还辅导我们的业务学习，介绍他自己学习和掌握俄语的经验和体会，提醒我们重视语法学习和口语锻炼，号召我们每天早晨朗读俄语一小时，译员之间互相用俄语对话（政治学习时除外），等等。

由此可见，刘帅对军事翻译工作的政治方向问题是把得很稳的，对军事翻译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是抓得很紧的。由于刘帅的春风化雨和言传身教，由于刘帅的艰苦努力和卓越的工作，我军得以在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人数较多，政治素养较好，业务能力较强的军事翻译队伍。

给我们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军作战和训练的情况表明，有分析、有选择地借鉴外军的经验，的确能收启迪思路、扬长避短、减少伤亡和少走弯路的效果。目前，正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之际，我军事翻译和外军研究工作者，很有必要重温刘帅的一系列指示和教导，从以下两下方面改进工作。

第一，要着力提高外军翻译和研究成品的质量。近年来，外军翻译和研究工作呈现繁荣景象，出了不少好的成品。但是与形势的要求和需要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和不足，需要改进。提高翻译和研究成品质量要注意抓好以下三点：一是在“准”字上下功夫。这就要求准确翻译，准确、发现、研究外军带规律性、走向性的东西，把它及时介绍出来。二是在“新”字上使劲。广看细读外军资料，适时翻译、介绍和提供有益的经验，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三是在“深”字上做文章。这是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发掘世界军事科学的本质，特别注意外军的新动态、新萌芽，准确把握外军学术的脉搏。

第二，要加强外军翻译研究与成果利用单位间的紧密联系。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部队、院校感到外军资料缺乏，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和载体得到的外文资料又未完全发挥作用。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外军翻译和研究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工作积极性，尽量多地翻译介绍各种外军资料，尽量多地研究外军资料，善于从中找出启示、对策和方法，介绍和提供给各机关、部队、院校，并要多方面沟通与他们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需要，以便提供对路、适用的翻译和研究成品，主动为他们服务，不辜负党的培育和刘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

注　释

①②⑤⑦⑧⑨《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47、第659、第287、第475、第502、第639页。

③⑩⑪⑫《军事翻译家刘伯承》书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第330、第331、第332页。

④⑥《刘伯承军事译文序跋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第19页。

试析刘伯承运用古代兵法之特色

李能学　少校

刘伯承元帅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朱德元帅赞誉他“有古名将风”，是“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称赞他“论兵新孙吴”，是当代杰出的兵法家；邓小平同志评价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当年，根据地人民曾给他挂起“常胜将军”的金匾；就连敌军将领也佩服他用兵“深合孙子兵法”。人们之所以喜爱借古喻今地赞扬刘伯承，皆是有感而发，言之有据，诚非过誉。纵观刘伯承长达七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南征北战，屡战屡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运用古代兵法，其成效卓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本文试就刘伯承运用古代兵法的特色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广征而不滥引，谙熟古典，博而有约

古为今用的前提是知古，积知越厚，方能发知越深。刘伯承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熟练掌握了古文工具。他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注重在知古上打下厚实的根基。

(一)涉猎广泛，博采众长。刘伯承对古典知识涉猎的范围广、种类多。他读过的古书，既有《武经七书》等经典兵法，也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军事文学名著。刘伯承读古代兵书有着明确的目的和动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多读书，多掌握知识，多学点战术，就能多打胜仗。”①他从自身战争实践的今用所需，始终把研究的核心

放在古代兵法上。为了理解和掌握古代兵法，他反复读过大量的古兵书，以求从中直接吸取精华；同时，也通过博览其它古典，为研究古代兵法服务。

例如，刘伯承读《孙子兵法》时即兴写下的笔记，不仅高度提炼出书中的精华，而且还大量地借用其它古典中记载的人或事，形象透彻地阐明了许多兵法之奥妙。如他以二十四史中的“鸣条之战”说明《孙子》谋略思想的具体运用；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成语和《水浒传》中武松为什么能打死猛虎的道理，分析《孙子》兵势中的若干问题；还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空城计”去解释《孙子》虚和实的中心思想，等等。这种博采众长的研究方式，使他对古代兵法的研究始终能深深地根植于肥沃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从而培育出他那绚丽多彩的军事理论之花。

（二）不断探求，肯下苦功。刘伯承博古通史，并非是天赋“良缘”，而是与他不断探求，终生努力分不开的。他少时就养成了爱读古书的好习惯，并一直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即便在戎马倥偬的恶战间隙，也从不舍弃。他读古书时非常专心，甚至常常把自己的情感也与书中人物相沟通。1947 年 4 月，他曾同随军记者深有体会地说：“我想起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读到关公走麦城最后被杀，难过得哭了。真是看三国流泪，替古人担忧。”对一些好的古典文学，他读过多遍也不撒手，时常把熟记的情节和人物事绩讲给大家听。他对有价值的古兵书，力求都能记在头脑里。为了锻练记忆力，竟然逐字逐条地背过字典。曾被后人誉为世界兵书圣典的《孙子兵法》，他早年就能熟练地背出全文。为了扎实地研究古代兵法，他更重视对原文的反复理解，以深刻而准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他读过的古书上留下了许多圈点和批注，有的甚至满书皆是，可见刻苦用功的程度之深。正是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大量的以兵法为主的古典知识，成了刘伯承丰富而渊博的知识宝库里的重要部分。也正是因为他对古典达到谙熟的程度，所以在战争年代，他无论是写作战指示，做战役战术总结，还是给部

队讲解兵法，引用起典故来总是信手可摘，大家无不为之感佩。

（三）博而有约，相得益彰。刘伯承在治学过程中，继承和改造了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的旧博约观，以独到的见解提出“博学古今中外军事，约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②这里的“博”是指积累丰富的知识，“约”是强调要以先进的思想加以鉴别，使博能建立在吸取精华、丢弃糟粕的基础上；并从广博出发，继而务精深，变繁为简，以利于指导实践。这种全新的博约观是非常科学的。“约而不博”如同“无米之炊”，“博而不约”则是“无的放矢”。这是刘伯承把博学古代兵法同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的经验之谈。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认识和论证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思想，得出了“遵之则胜，违之则败”的结论。因此，他把对古代兵法的研究完全自觉地约之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例如，刘伯承曾说：“古代兵法家孙子讲，敌众而我寡，我以十击一，则寡可胜众。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对强敌斗争的经验，就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精辟论述，这些反映战争客观规律的普遍真理，在当前的现实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之。”③显然，这正是他结合现实斗争的经验和需要，深人研究孙子“敌众我寡，我则以十击一”的用兵方法。刘伯承就是这样，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钻研兵书、看待历史、解释典故，并通过古为今用的军事实践，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并为此作出杰出贡献；同时他的兵法造诣在这种先进的军事科学的指导下，也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奥妙无穷，从而获得相得益彰的双重成果。

二、务实而不求虚，学以致用，注重效果

刘伯承古为今用能取得卓著的成效，关键则在于学以致用。

（一）以务实为思想准则。刘伯承研究和运用古代兵法一贯的

思想和准则，就是联系实际，注重实用。他常说："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不以实践为基础，不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空理论；不以理论作指导，不同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是瞎实践。"并反复强调"研究战术是拿来打仗的，能消灭敌人才算数。不管黄猫黑猫，咬得住老鼠的才算好猫。"④他反对信而好古、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的老学究作风，曾讽刺那些只知古而不用古的军人是"军人其表，书生其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毛色甚美，捕鼠无能。"⑤他自己始终以务实的态度，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力求将学到的以兵法为核心的古典知识用于自身实践中。正因如此，在革命战争的不同发展阶段，他总是能根据实际的需要，适时提出种种克敌制胜的办法和著名的作战原则。

例如："乘敌之隙，寻找、抓住并制造和扩大敌人的弱点，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扬自己的所长，掩护自己的所短"，"趋利避害，趋胜避败"，"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宽大机动，紧握主动"，"适时集中，适时分散，待机破敌"，"支作战与主作战配合；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主突击方向与箝制方向配合"，等等。这些经过实战检验具有极大实用价值的制胜之法，只要稍加探索和分析，都不难从古代兵法中找到它们的雏形原本。这既证明刘伯承研究古代兵法具有一贯务实的思想，又充分表明他的军事理论处处体现了与古代兵法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离的渊源关系。

（二）不拘一格广泛用古。刘伯承不仅主张学古必用，而且尤其善于不拘一格因敌、因地、因时、因情而用。1945 年 10 月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指挥的邯郸战役就是典型的例证。邯郸是古代赵国的国都，古称四战之国。刘伯承根据古代兵法"胜在得威，败在失气"的道理，首先引用这个典故对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强调"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⑥并结合典故教育指战员树立必胜的信心。当时，邯郸北面有一个小车站叫"黄粱梦"，附近还残留个小庙，这就是传说中"黄粱梦"的古迹。刘伯承要求部队上下都得了解这一典故，并形象地借此讽刺蒋介

石企图夺取邯郸，打通平汉线是在作“黄粱梦”。

作战中，他采用古代兵法“将愚而不知机变者，设法而诱之”的办法，诱使数万之敌陷入预设的“口袋”。尔后，又把古代兵法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夺其魁，以解其体”派上大用场。他不断用小部队攻击、疲惫被围之敌，当敌精疲力尽，士气沮丧时，一举发起总攻，以猛虎掏心的动作冲入敌首脑部位，生俘敌“主将”数名，使失去指挥的敌军一片大乱，四散奔逃，最后被我军各个歼灭。

邯郸战役大胜后，部队的一些基层干部因滋长居功自傲的情绪与当地干部发生争执，刘伯承又以古代兵法中“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王者之师所向无敌”的道理，利用也是发生于邯郸的《将相和》典故，要求部队和地方有关部门：“组织参观一下蔺相如回避廉颇的回车巷故址，写一篇有关他俩的通俗故事，发给部队阅读，还要排演《将相和》的戏，以此促进军政、军民间的团结。”⑦这项工作落实后，使军地干部群众普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三）具有画龙点睛之效。刘伯承在战争实践中，不但用古广泛，而且更为注重效果，主张不用则已，用必奏效。他常常出人意料而又恰到好处地运用古代兵法打了许多漂亮仗。例如，1938年2月22日的长生口伏击战，刘伯承就是以孙子“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的战法，首先把主力设伏于井陉和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然后以一部袭击日军的旧关据点，诱使井陉日军出援，一举歼敌一个加强中队。随即转师南下，于3月16日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先于拂晓以一个营的兵力袭击黎城，主力三面设伏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附近，神奇般地歼灭由潞城出援的日军1500余人。这种“吸敌打援”战术的一次次得手充分表明，孙子“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的战法，被刘伯承用得非常绝妙！就连日军统帅部也不得不称它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在指挥作战的具体问题上，刘伯承用古同样屡获奇效。例如1947年6月在率部遂行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的征途中，刘伯承借用古乐府诗中“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和《史记·赵奢传》中“其道远险狭，壁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的寓意，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口号，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士气。他借用宋岳珂《程史·徐铉入聘》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之句，富有预见地指出：“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⑧战争的进程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三、师古而不泥古，标新立异，举一反三

刘伯承以古为师，从古代兵书中学到了许多制胜之法，但他师古而不泥古，主张学古人超古人，从不视古人定论为金科玉律，而是结合自身的战争实践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其突出地表现：

（一）把握实质，赋予新意。刘伯承从不照搬照套古代兵法，而是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思想武器把握其精神实质，并结合现实情况加以阐发，赋予新意。比如孙子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名言，刘伯承解释说：“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是说战争形势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又不是说战争捉摸不定，不可知的，而是有它固有的客观发展规律可寻的。它既有一般规律，又有特殊的规律，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战争中认识和掌握其规律，驾驭它，利用它，才能无往而不胜。所谓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说要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改变自己的战法，以符合战争发展的规律，便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地步。”⑨这样的理解，既不违背名言的原意，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对现实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战争实践表明，任何一种纯熟的战术，在错综复杂的战场上，由于受不同的因素和条件的制约，用法自然千变万化。所以，运用古代兵法时，必须把握其精髓，根据其中的基本原理结合实际需求，视情而行，巧妙组合，不断创新，才能增大取胜的把握。这正是刘伯承运用古代兵法始终能稳操胜券、百发百中的奥妙所在。同样是用古人的某一种战法，别人无效，刘伯承却有奇效，这次用了能成，下次用也毫不逊色。他古为今用的战术透明的可以告诉敌人，而敌人终究还是败在他的手下。

（二）标新立异，不法常可。刘伯承研究运用古代兵法时，还常常针对战争实际，敢于提出新奇的主张，树立奇异的论点。例如古代兵法中"兵无地不强"，说的是用兵打仗一定要选择有利的地形，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定论，对此刘伯承敢于标新立异。例如，在指挥神头岭伏击战时，战前他亲自到神头岭观察地形，只见那里是一片光秃秃的山梁，一条公路纵贯纵深，公路两边没有任何荫蔽物。显然，神头岭的地形条件于伏击的荫蔽、展开极为不利。但刘伯承认为，神头岭做为设伏点按常规确实是不得地形之利，可是敌人必然依此产生麻痹大意，我可一反常态，有意造成敌之错觉，出其不意打击敌人。于是他近乎"押宝"似的在神头岭狭窄崎岖山梁上设伏了三个团的兵力，其中一个营埋伏在距敌行进道路只有 25 米的旧工事内。实战证明，他标新立异选择这样的设伏点是非常高明的。

再如"用兵不复"，这是一条为历代兵家所熟知的原则。但刘伯承却以"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的观点，指挥部队在山西平定地区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输送军需物资的日军，创造出"重叠伏击"的战法。可见，标新立异，不法常可，使刘伯承运用古代兵法创造的种种战术更加扑朔迷离、高深莫测，让敌手无法捉摸，屡吃败仗。当年日军将领们吃了许多苦头后，深感刘伯承非常善用古代兵法，于是竭力地研究他的战术和我国古代兵法的关系，并提出"以子之略，攻子之略；以子之术，攻子

之术”的策略，但却始终解研不出其术之精、其略之妙的奥秘，更谈不上找出什么有效对策。

（三）举一反三，充实扩展。战场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任何一种战法必须随时适应新情况。刘伯承善于从古代兵法中引伸出种种实用的战法，用于指挥作战。例如，在1948年冬的淮海战役中，刘伯承从孙子“围师必阙”的兵法中得到启示，决定采取“围而不阙”的战法吃掉蒋介石的王牌黄维兵团。而有些参谋不理解，刘伯承对他们解释说：“情况是变化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战法，该‘阙’就‘阙’，不该‘阙’就不‘阙’，绝对要不得教条！比如说，鲁西南战役打郓城，我们就是‘围而不阙’。郓城城墙本来就不太坚固，又是掉在我军后面的一个孤点。对于这里的敌人，你再搞什么放口子，算啥子用兵法？我们只用了五个旅，死死地把它围住，就消灭了一个师嘛！而鲁西南战役打六营集，我们又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这是为了避免敌人自恃还有两个师的兵力，搞‘困兽犹斗’。结果，我们把敌人引到六营集外的一个大洼地的口袋阵中，全歼了它两个师。再有，在大别山时的高山铺战役，有的同志想把它搞成‘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这不对！本来，我们已经把运动中的敌人引入了地形对我十分有利的合围圈内，逮住了老鼠，你再搞什么‘网开一面’，岂不是又让它从鼻子底下溜掉？”他联系打黄维的战法说：“在目前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敌人一定很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你放口子，他就会给你个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而敌人每占一村，不但可利用我原有的工事组织防御，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不利。所以，权衡利弊，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想法，坚持紧逼敌人于狭小范围，使其困饿，而我们采取一点一点吃的方法，逐渐削弱他，然后再把他一口吃掉！”⑩这番话语，犹如一场精采的军事演说，其中一系列战例充分说明刘伯承对孙子“围师必阙”的用兵方法，历来是举一反三，为我所用，从而使这种古老的战法，内容更充实，用途更广泛，效果更显著。

对古代兵法进行科学组合以寻求有效战法，是刘伯承举一反三的重要特点。如他把《孙子兵法》中“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和《孙膑兵法》中“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以揆其虑，施伏设援，击其移庶”这两种战法组合在一起，从一个方面发展成为两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⑪的新战法。他广泛运用这种战法，出色地指挥了诸如巨金鱼、滑县等著名的战役、战斗。

刘伯承举一反三，还在于他能从对古代兵法的对策性研究中悟出新的战法。如古人推崇的“常山之蛇”阵，这是一种“击其首而尾至，击其尾而首至，击其中而首尾俱至”的战法，刘伯承针对性地提出了“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于死地而后已”⑫的打“蛇”法。解放战争中，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常常主动或被迫形成类似的“常山之蛇”阵，并企图以此与我抗衡，刘伯承正是以他独创的打“蛇”法来对付之。这样，纵然蒋介石摆兵布阵真是“常山之蛇”，也只能落得个屡战屡败的可悲下场。

刘伯承通过对古代兵法的举一反三，充实扩展，还先后创造出“围城打援”、“夺城打援”、“攻城打援”、“猫盘老鼠”、“釜底抽薪”、“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先施拖刀计，再杀回马枪”等等许多新战法。从而，有效地借鉴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兵法。

四、精深而不玄妙，深入浅出，彰明较著

刘伯承虽然拥有博大精深的古典知识，但实际运用中，那些难以理解的古文，奥妙无穷的用兵理论，经他深入浅出地加工，变得彰明较著、生动具体并且幽默风趣，让人喜闻乐见，回味无穷，成为易学易懂易记的通俗知识。正因如此，他的许多战法，非常容易被广大指战员理解消化并得以推广运用。

（一）现身说法，传授形象化。刘伯承研究和运用古代兵法，非常注重和善于围绕自身的作战意图，并根据实践的具体情况向下属指战员现身说法。从而，把古代无形的取胜之法变为现实有形的制胜之策，使下属指战员理解他所用的兵法，完整准确地把握他的作战意图。正因如此，他借鉴古代兵法指挥的许多战役、战斗，总能顺畅地通过下属指战员的具体行动落到实处，每每奏效。

例如，刘伯承常结合自身实战经历或当时受领的作战任务，反复给下属指战员讲解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法、谈自己的具体理解和实际运用中的经验体会。久而久之，部队指战员对此心领神会，并在实战中总会想到以他为榜样，也能绝妙地运用。1937 年 10 月 19 日夜，八路军 769 团就是根据刘伯承的意图，成功地运用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法，发兵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大获全胜。刘伯承就是这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为我党我军培养出一大批博古通史，善用兵法的谋士强将。

（二）提炼升华，形成要诀化。刘伯承根据"厚积薄发"的道理，研究运用古代兵法时，总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化繁为简，变博为精。例如古兵书中对作战定下正确决心的重要性及方法，论述很多。诸如"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兵因敌而制胜"，"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此用兵之要术也"等等。刘伯承对此加以高度归纳说："指挥员研究情况，要对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作综合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⑬他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个要素提炼升华为"五行术"，还以"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一定，必定打胜"这样的要诀，教育部属定下正确的决心。

再如，他强调部队训练的重要性时，引用《论语·子路》中孔子的"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戒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以及诸葛亮在《将苑·习练》中的"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等论点，将其归纳成十六字诀，指出："不

教而战，是谓弃之；教而后战，是谓善之”。⑭以此阐明部队没有经过训练就去作战，是糟踏生命；训练之后去作战才是爱护兵员的道理。他还归纳了类似的许多要诀，如“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⑮等等。通过对古代兵法提炼升华，使其主题更加鲜明，言简意赅，便于运用。

（三）表达通俗，力求大众化。刘伯承给部队讲解兵法，还总是针对当时我军指战员文化程度低的实际，善于采用通俗的语汇和大家所熟悉的事例作比喻，往往把作战原则和战法分析得入木三分。比如他借用老百姓“杀鸡不用宰牛刀”的俗话，反其意提出“杀鸡要用宰牛刀”，形象地表达出古今必循的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用兵准则。又如“势险节短”，这是《孙子·兵势》中的重要内容，寓意深奥。刘伯承对此举例解释说：“四川有种水鸟，绿色的羽毛，像八哥。这种鸟，嘴很尖，它在空中发现水中的鱼，就将双翅夹拢，依靠全身重量，自天而降，有时竟能捉到比自己大几倍的鱼儿。”⑯他把鸟俯冲捉鱼的态势很猛喻为“势险”，时间快速喻为“节短”，从而通俗准确地说明古代兵法造势取胜的深刻道理。他指挥的神头岭伏击战，虽不得地形之利，但正是得了“势险节短”的造势之利。

刘伯承运用古代兵法还非常幽默风趣，能让人从笑话中领悟道理。如七亘村重叠伏击成功后，有人曾问他怎么知道日军会再次上当。他风趣地说，反动军队就像老百姓家饲养的猪，只记吃食不记挨打，蠢得很！为了“吃食”，他们自然会中我们的二次伏击。就是这样，刘伯承巧妙地把群众的语汇与古为今用的实际有机地触合在一起，使古代兵法中那些深奥、抽象的原则完全通俗化，进而在长期的人民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得以重放光芒，发挥出了奇效。

综上所述，刘伯承研究和运用古代兵法，具有超出常人的特色和诀窍，这是他军事理论中的奇葩。他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战争实践中以古人为师而不迷信古人，以古兵书为教材而不照套

古兵书，赤心诚至地继承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遗产，使古代兵法变成更有强大生命力的克敌制胜之宝，从而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楷模。我国自古就是兵学昌盛之国，研究和运用古代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新时期的军事实践中，我们应该根据党的十四大赋予我军的神圣使命，学习刘伯承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敢于涉足中华民族知识宝库中古代兵法这座宫殿，撷精取华，兼收并蓄，批判地继承，创造性地运用，使古代兵法这个瑰宝放出新的光彩，结出新的硕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注　释

①⑥⑦⑩《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 7 月版，第 10、第 186、第 190、第 273 页。

②⑭《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6、第 206 页。

③⑨《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版，第 221、第 107 页。

④⑤⑬《刘伯承回忆录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7、第 38、第 186 页。

⑧⑪⑫⑮《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第 176、第 482、第 547、第 417 页。

⑩《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海军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第 473 页。

吸取兵法精华　丰富战役理论

——刘帅独具慧眼的“兵势”新论

吴如嵩研究员　毛元佑助理研究员［文职］

刘伯承元帅以博古通今、满腹韬略而蜚声中外，倍受赞誉。考察刘帅的军事理论与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在他身上，带有中国优秀军事文化传统的明显印记。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刘帅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青年时代投身军旅生活时，刘帅就曾认真研读过《孙子兵法》，在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从未中断过。全国解放后，他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主持和领导军事学院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不仅亲自给有关干部和教员讲授《孙子兵法》，还亲自校改《孙子兵法·兵势》篇的白话译文，作为《战役法原则》的指导教材。他指出：“我们正研究战役法中的战役布势与战役的持续时间及其发展速度，特引孙子兵法的兵势几段以供研究参考之资料。”

刘帅认为：“攻书求实用，应如攻坚求战果。”他学习研究古代兵法，注意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吸取各家兵法之长，并在实践中予以创造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役指挥艺术，为我军战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朱德同志称赞他“有古名将风”，陈毅同志赞扬他“论兵新孙吴”，人们赞誉他是“无产阶级的孙武”。

刘帅从战役理论的角度来运用《孙子兵法》，把《孙子兵法》的精华概括为谋略（计）、兵势、正兵与奇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等六个方面。这种高度概括，实际上涵盖了战役指挥的几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可谓是独具慧眼，识见超人。本

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明五行、知彼己是做出战役决策的基础

组织和实施战役的首要环节是知彼知己、精心计划、定下战役决心，作出战役决策。刘帅经常教育干部："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知战之地，知战之日，才能打胜仗。"他还把"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内容明确化，具体化："指挥员研究情况，要对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作综合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刘帅借用"五行"这一古代哲学概念，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5个要素概括为"五行"，认为"五行"是打仗下决心的基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并且认为，"五行"中任务是中心。战斗任务的明确，是完成任务的重要前提。敌情是重点，"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我情是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观条件，只有熟知部队的长处和短处，才能正确地使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地形和时间，是敌我双方交战的特定客观环境。这五个基本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五行"以任务为首，任何一级指挥员，首先必须明确自己承担的作战任务。同时"指挥员给予部属的任务要十分明确，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是犯罪的行为。"刘帅还说："指挥员为了给部属争取行动的时间，尽可能力求早明了任务、早下决心、早发命令。"布置任务力求正确、明了，这是弄清任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对接受任务的部队的执行和理解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落实，一旦发现问题，立即纠正。他举例说："我们拿使用重机关枪连来说，团长对于他的射击任务，弹药计算，隶属系统种种问题，要经常仔细考虑，才能得到战术上应有的效果。给予射击的任务，必须适时确切指示之。譬如说：'射击某敌人'，这是不够的；说'在某地点占领阵地'也是不够的，必须说

明："某连以援助某营的冲锋之目的，应于明日（六日）五时在某地以袭击的火力侧射某高地之敌。这才算是确切地指示其任务。"

对"五行"的了解和研究，要以敌情为重点。刘帅十分注意了解和掌握敌情，在他的军事著作里，无论哪一次作战的指示、报告和总结，开头都是讲敌情。如何才能弄清敌情呢？刘帅指出，要弄清敌情，必须重视侦察工作。"侦察是战斗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没有侦察，或侦察不详，就象狗戴沙锅乱碰一阵"。"用兵应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决心和计划，应与敌人配备和行动的实在情形符合。"为此，他对侦察队伍的建设、实施侦察的手段和战役侦察的任务、内容等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刘帅非常注意搜集有关敌军的资料，要求部队在作战中对敌人的片纸只字都不能丢掉，对敌人的战斗文书、公文信件，报刊杂志，俘虏口供乃至私人日记，都不放过，以求对当面之敌的企图、兵力、部署、装备和行动了如指掌，对敌军主官的出身、地位、个性、派系和作战特点都基本掌握。刘帅还深刻地辩证地指出，对所占有的材料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的态度，"一切材料的取得与整理，特别是在判断情况时，须考察来源与实战参证，勿为敌人佯动、伪装、谣言所欺骗"，"要把材料在何时、何地、用何手段取得的，可信程度如何"弄个明明白白。在充分占有敌情资料的前提下，"必须将前后得来的材料进行融洽的研究"，"先确定其可信度、时间性与价值"，"然后综合之，给以分析，做出正确的结论，以适应下决心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凿枘不入"的情况，达到用兵如神，每战必胜。

真切地掌握己军的情况，是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知己"却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刘帅经常教育干部，不要自以为熟悉部队而疏忽了知己。他以身作则，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掌握各种情况。从部队的伤亡情况到干部的补充，从部队的情绪到官兵之间的团结，从部队的训练水平到战斗力现状，甚至衣食住行都悉心了解。正因为对部队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哪支部队能攻，

哪支部队善守，甚至连一些基层指战员的个性脾气都心中有数，他才在用兵时得心应手，恰到好处。

《孙子兵法》说："地形者，兵之助也。"刘帅引用《孙子兵法》的话，强调研究地形的重要性："战场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他指出："我们要认真研究河川、山地、道路、城寨以及地形平坦、起伏、开阔对我行动和火力发挥的影响，只有对敌情、地形判断正确，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又善于利用地形，对准敌人之弱点，实施突然袭击，才能收到歼敌之效。"刘帅不仅严格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战前认真侦察地形，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每个战役前，都亲自勘察地形，精心选择战场，因而常能借助地形条件，扬长避短，克敌制胜。如抗日战争初期的神头岭伏击战就是突出的一例。神头岭地区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当时有的同志感到这样的地形不便于部队展开，而刘帅却认为我之兵力不便机动，那么敌人的技术兵种就更难以展开。经过刘帅的巧妙设伏和部队英勇作战，日军尚未展开就基本被歼。再如解放战争中，刘帅把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粟野战军会师后的战区态势概括为依托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控制四河（江、淮、河、汉），逐鹿中原。寥寥数语，就使人们对一个战区的地理形势和作战任务一目了然。如果没有通晓地理的深厚功力，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孙子兵法》把"知战之日"和"知天"等作为预见战争胜负的一大要素。而刘帅则更多地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来看待它。刘帅认为，时间和任务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各级指挥员在明确任务时，必须把部队开进、驻止、集结的时间，出击、撤退的次序作为重要环节来弄清楚。他告诫参谋人员办事务必正确及时，雷厉风行："在你们手上有千军万马，耽误一点时间就要死很多同志，耽误了军机是要误大事的！"其次，对于时间的战术运用，刘帅总是结合天候一起考察，认为不能把时间单纯地理解为年月日，而应当把时间同白天黑夜、雨雪阴晴、严冬酷暑等天候联系起来，从

中发现有利于已，不利于敌的有利战机。如在分析怎样选择进攻敌人的时间时，刘帅说："倘主攻方向上我火力有压制优势时，于黎明前从东方主攻，一则收朝阳照明目标之助（敌人对我展望不易）；二则便于白天决战。如系奇袭，则以深夜为宜"。

二、巧布势、求险恶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前提

战役方针确定之后，跟着而来的就是要组织兵力，巧妙部署，创造和建立能够达成战役目的的有利的战役布势。刘帅认为："《孙子兵法》中的《兵势》篇，主要讲的是战役布势"。他说："兵势一篇，就是说明兵力的分布，正兵与奇兵的战斗行动（正兵就是指主要集团，奇兵就是指辅助集团）；布势必须险恶，战斗经过短促干脆。"因为在战役战斗中，军事力量本身并非一定是有利态势的现实事物，它必须经过指挥员正确的主观指导，也就是通过"布势"这一中介环节，才能使军事力量与有关作战因素结合并发出一种实际的作战锐势。因此，作为一个指挥员，应当"以人力和物力结合着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势'，来求胜利的，决不是仅仅只靠个人或个别部队来取得胜利的。英明的指挥员知道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战胜敌人，就要善于结合人力物力和自然条件来创造有利的形势，并且善于发挥这些力量。"

战役布势在战役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刘帅再三强调："军队之所以能打败敌人，也和布势有很大的关系，军队若没有险峻的布势，就不能发挥其威力。所以未经很好地布势就与敌人作战，就好象没有拿着武器同敌人战斗一样。"

那么，战役布势应该把握哪些环节呢？刘帅在这一问题上对《孙子兵法·兵势篇》所提出的"势险"和"节短"原则给予了充分阐发。他指出："拉满的弓是非常急迫的，一动就可以发箭杀人，兵势之险也要这样。扣动强弓的扳机，它的反应是极短促的，扳机一动箭即射击，用兵时节之短，也要这样。""战胜敌人的要诀，

一是由于布势险恶紧迫，使敌人不能支持，二是由于战斗过程短促干脆，使敌人来不及防备。”刘帅进而举例说，比如：“人们走在悬崖深涧的边沿，自然就会停止下来，这是害怕形势险恶的原因。江河奔流澎湃，首当其冲者，必然惊骇颠倒，束手无策，虽有千万人也来不及合力营救，这是因为水势来得猛烈迅速而时间倏忽的原因”。这就把《孙子兵法》“势险”和“节短”这两个含义抽象的概念作出了明确、具体、清晰的界定。他进而告诫指挥员：“英明的指挥员要明了这些道理而善于运用之，在战斗布势上则必取其险恶，在战斗过程中则务必求其短促干脆。”“因为‘险’，敌人就不能抵挡；‘短’，敌人就来不及躲避。所以军队经常要保有高度的士气和战斗力，要善于分布主要集团和辅助集团，力求接近敌人，进行猛烈的紧迫的突击，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抵挡。这就是取得胜利的要诀。”

刘帅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奇险的战役布势，能够造成一种泰山压顶、猛虎下山的战役锐势。“凡遇战斗，必须先行周到审察各种要素，因势利导，以作奇险的布势以待敌人。迄敌人进入我势力之下，突然发起迅速有力的突击，如疾风之扫秋叶一般，即使是强有力的敌人也没有不败的。”敌人想要挡住我军的进攻，就象“抓沙子搪水”。布势一旦险恶，首先就会给敌人心理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使其产生惊慌，指挥错乱，士卒恐惧，丧失斗志，不战自败。而要做到“节短”，就应该力求战斗经过短促干脆，战斗进展速度很快。为此，必须利用近战、夜战、袭击战等，尽可能抵近攻击，达成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和猛烈性，出敌不意，击敌无备，打敌人措手不及，克敌制胜。

刘帅指挥的许多战役战斗，都体现了“势险”、“节短”的特点。例如被日军称为“支那军第一流游击战术”和“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的神头岭伏击战，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1938年3月，为了打击进犯晋南的日寇，刘帅决定在神头岭伏击敌人。在兵力部署上，他以一个营的兵力作箝制部队，奇袭日军重要补

给线——邯（郸）长（治）大道上的兵站集结地黎城，吸引驻守潞城之敌来援。同时，秘密将主力三个团部署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神头岭地区地形复杂，敌陆空技术难以施展，骑兵难以机动，步兵难以展开。为了达到短兵相接、出奇制胜的目的，刘帅利用司空见惯的原有工事，将部队荫蔽配置在距公路最近 20 米、最远几百米的两侧。战役发起后，我钳制部队猛袭黎城，诱使潞城之敌急驰增援。当援敌越过神头岭进入我伏击圈时，我伏击部队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然出击，敌在不意无备中大部被我歼灭。此役由于布势险恶，保证了战斗时节之干脆、短促，进展迅速。其势之险，其节之短，令人击掌叫绝，叹为观止。正如刘帅在战后的经验总结中所概括的那样：火力与白刃格斗结合使用，采用迂回式的横宽队形，猛扑敌人，在敌人毫无准备、正摆着"皇军"臭架子唱歌行进的时候，在它的新式步兵炮尚未放列、骑兵尚未上马、火网还来不及组成的时候，就马马虎虎、干干脆脆完蛋了！

三、避实击虚、奇正多变是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

正确的战役布势只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前提条件。要取得战役的最终胜利，还必须在战役的实施过程中，力争和保持战役的主动权。而争取和保持主动权的关键则是避实击虚和奇正多变。

避实击虚实际上是打击方向和目标问题，刘帅指出："腾出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常易得手。""在战斗之先，要详细察明敌人军队的布势，哪里是力量薄弱的地方，哪里是力量坚强的地方，在进攻中要避开坚强的地方，去突击薄弱的地方。若能这样，就没有突不破的。并且我军要虚张声势引诱敌人，使他的兵力分配在没有用的地方，用我们之实，突击敌人之虚。这样用兵，就容易击破敌人，如同以石击卵一般。"总之，要打敌要害，打敌关节点，打敌弱点。那么，在战役上，敌人哪

些地方是弱点呢？刘帅认为："攻击目标要选择其弱点，一般是部队的接合部、阵地的侧背或突出部，特别注意寻找其指挥机关，打碎反动派的首脑，收效特大。"

如果敌人没有弱点，那就要设法调动敌人迫使其暴露弱点。刘帅这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深刻而又系统。"宽大机动地创造或寻找敌人的弱点，并抓住他的弱点，给以有计划地突然地袭击，是把握主动权最好的方法。""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争取主动和自由的途径。"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更需要特别机动。""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援救其被突击的弱点。"简而言之："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人的弱点而消灭之（这是主要的），或者大踏步地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游'所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所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通过示形动敌，"声东击西，佯动于此，实动于彼"，"要能动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和其他各种对付手段"，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迷惑欺骗以调动敌人，敌人的弱点必然会暴露出来。最后，一旦发现寻找到敌人的弱点，就应该"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刘帅说："古代兵法家孙子讲，敌众而我寡，我以十击一，则寡可胜众。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对强敌斗争的经验，就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精辟论述。这些反映战争客观规律的普遍真理，在当前的战斗中，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之。"

对于避实击虚，刘帅可谓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如1946年11月的滑县战役，避开敌人前锋，主力插向朱楼、邵耳寨、上官村，"猛虎掏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敌人的指挥机关；1947年1月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不打正面密集之敌，主力插向敌人后方，"釜底抽薪"，攻打敌土顽据守的薄弱据点，等等，都是避实击虚原则的典型运用。

灵活的战术，古代称之为奇正多变。对此，刘帅十分重视，并作了深刻的阐述，充分的发挥。他指出，奇正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从兵力区分上有奇正之别。“正兵就是指主要集团，奇兵就是指辅助集团。”早在1936年他为红军学校写的《我从实践中联想到的我军教育要注意事项》中的第一条论进攻战斗，就精辟地阐述了兵力必须分为突击队与钳制队的道理：“每一进攻战斗，必须选定主要突击方向，集中主力，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但同时对于次等方向，必须以另一部钳制敌人，吸引其注意力及后续部队，借此保障我主力突击的成功。换句话来讲，我们可以在次等方向用一个人去扭打三个敌人，这样就能在主要方向抽得三个人来痛打一个敌人，求得总体上的胜利展开。这就是进攻战术区分为钳制队和突击队的缘故。”

正兵和奇兵即主要集团和辅助集团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刘帅既强调主要集团和辅助集团应密切配合，互相协同，合力达成战役目标，又强调辅助集团在发展顺利时，应机断行事，善于捕捉战机，发挥自身有余不尽的力量，适时转为主攻，以扩张战果。因为“单凭力量，就不足以抵御众多的敌人，偏重于勇敢，就不能攻克敌人坚城，所以必须‘奇’、‘正’互用，多方策应，而后才能战胜敌人。主要集团，首先必须有充足的兵力及其高度的勇敢，这样固然可以与敌战斗，但是只是使用正兵指向一个方向，若遇到敌军防御得当，就难以获得胜利，必须在使用正兵的同时运用奇兵，而且奇正互变，可以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则敌人顾其后必失于前，防于左必疏于右，乘他仓惶动摇的时候，用奇兵击其要害，用正兵突破其防御枢纽。这样，虽然众多的敌人也能被我击败。”

平汉战役的作战指导就是体现这一原则的典型战例。这次战役，刘邓调集太行、冀南、冀鲁豫3个军区的主力6万多人，并有后方指挥部组织的10余万民兵群众直接参战与担任后勤。平汉北段，以少数兵力牵制已由同蒲、正太进抵石家庄之敌第3军和

第 16 军，使其南北不能呼应，以便集中主力，攻击弱敌。后来根据情况的发展，将平汉战役中路东本来担任牵制第 106 师的我军 1 纵队由击败第 106 师转换为协同友邻歼灭第 106 师，即由钳制队变为主攻队。正如刘帅在战后所作的《平汉战役战术总结》中所指出的："我们在兵力火力的使用上，各级指挥员均必须明确区分自己的突击方向与箝制方向。""指挥员下达命令时，对于主攻、助攻只有暗示在基本部署如何使用兵力、火器与规定任务的区分上，但绝不能在命令词句上指明谁是主攻，谁是助攻，以免限制了下级在战斗过程中之机动。""突击队、箝制队这些名称之所以不要在命令中写出来，也就是要适应情况，特别是在实际过程中要向胜利方向发展，扩张战果。""如箝制方向识破战机，突击胜利，应立即向此胜利方向发展，变为主攻方向。"

对于奇正相生的第二层含义，刘帅也有独到的见解："大体上讲：按照通常的战术原则，以正规的作战方法进行战斗的，都可以叫做正兵。根据战场情况，运用计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打敌于措手不及，不是采取正规作战方法，而是采取奇妙的方法作战，都可以称为奇兵。"即从战术上分，按正规战法作战的是正兵，按非正规战法作战的是奇兵。但奇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变化无穷"，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灵活机动地运用作战原则，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作战形式和作战方法，是战役指挥的中心任务。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因时、因地、因敌不同，灵活用兵，巧妙变换战术。刘帅指出："在一定计划上，应根据新变化的情况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要经常思考可能的敌情变化，绝不能总是用一个战术来对付敌人。"他再三强调，不仅要善于正确运用战术，更应善于根据新的情况灵活地变换战术。一个指挥员，"懂得战术是容易的，适应新的情况，灵活运用战术甚至变换战术就不容易了。""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

予交换，是灵活的指挥之重要的任务。”因此，“进行战斗，必能使奇正互变，使敌人因惊骇于我军的布势而不知如何来防备。且用各种方法促使他判断错误，分散他的兵力，使不能互相援应。当进攻敌人时，应如同以石击卵似的，一击即破。”

刘帅对伏击战法的不同运用，突出表明了他不拘一格、用兵灵活多变的特点。伏击是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广泛采用的一种战术。刘帅指出：“运动之敌比驻止之敌好打得多，而伏击又是打运动之敌的好战术。”伏击的特点是我静敌动，以逸待劳。但刘帅认为：“这种打法也不能呆板地等待着”，不能守株待兔。比如神头岭战斗，刘帅将《孙子兵法》关于“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必救”的思想，明确为“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综合运用袭击、伏击手段，吸打敌援，取得胜利。解放战争时期鲁西南战役中的六营集战斗，刘帅批判地将《孙子兵法》关于“围师必阙，穷寇勿迫”的消极思想，发展为“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积极的歼灭战战法，为防敌困兽犹斗，故意不作四面合围，将“利诱”与“威胁”结合使用，伏击、突击、阻击融为一体，在敌逃路上暗设“口袋”，创造了大规模运动战中实行伏击战的新打法。在高山铺战役中，刘帅指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先施“拖刀计”，后杀“回马枪”，以预伏手段歼敌于运动中，又一次创造性地发展了伏击战法。由此可见，同是伏击战法，但刘帅却能从实际出发，因敌因地制宜，因时因势而异，说明刘帅指挥艺术的高超和灵活多变。

学以致用，吸取中国古代兵法精华，并创造性地运用到他所组织指挥的许多重大战役中，使刘帅的指挥艺术显示出兵法家和谋略家的浓厚色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战役战术理论。刘帅告诫我们：“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不光是用，学也重要。学不能致用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

一个不是教条主义。”刘帅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科学态度，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优秀军事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繁荣军事学术研究，为国防现代化服务树立了光辉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将兵驭将称楷模　元帅风范铭后代

——学习刘伯承的带兵风范

王祖训　少将

在纪念刘伯承同志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集团军作为当年刘邓大军中的一支部队，全体官兵深切地怀念着刘帅。刘帅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他是善于带兵、练兵、用兵的全能将才，正如朱德总司令所称道的：“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革命战争年代，在刘邓麾下，聚集着一大批文武兼备、德才兼优的各级指挥员和成千上万敢于赴汤蹈火的人民子弟兵，带出一支支令敌人丧胆的劲旅。刘帅将兵驭将堪称楷模。我们部队长期在刘帅的领导下，对他的带兵风范感受尤深，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当前我军建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努力学习刘帅的带兵风范，是我们纪念刘帅，发扬光荣传统，提高指挥员素质，促进部队全面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试就学习刘帅的带兵风范谈些自己粗浅的体会。

一、率先垂范，英勇无畏

纵观古今中外，凡有作为的带兵者，无不把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视为带兵的首要品格。刘帅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更是率先垂范，正人先正己，严人先严己，处处以自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为部属作表率，对部队起着无声命令的作用。他的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了部属的衷心拥戴，讲话有号召力，命令指示得到坚决

执行，牢固树立了军事指挥员的权威。1937年9月6日，八路军129师召开抗日誓师大会，突然下起大雨，警卫员给刘师长送上雨衣，他用手一摆说："你没看见全师都淋着雨？我怎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面前呢？"刘师长在大雨中巍然挺立的模范行动激励着全师指战员抖擞精神，一个个象雨中青松，一动不动。刘伯承"雨不撑伞"的佳话，至今仍在我们部队广为传诵。就在这次誓师大会上，刘师长在讲话中，为了提高部队的思想认识，克服不愿换军帽的情绪，首先概述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然后说道："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129师。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接着，他拿出军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率先把那顶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当即，全师同志一齐戴上黄军帽，把戴了多年的红军帽小心翼翼地放进挎包里。刘帅就是这样通过讲道理、作表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战士，带领部队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将帅带兵的表率作用最突出的莫过于勇气超人，身先士卒。将帅不可无勇，"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只有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将帅，才能带出一支在危难面前经得起考验的部队。刘帅堪称"勇冠三军"，他既智多识广、满腹韬略、深谋妙算，又英勇顽强、临危不惧、敢打必胜，把高超的谋略智慧与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巧妙地统一起来，形成大智大勇的指挥风格。正如他所说的："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刘帅一生带领部队打了各种各样的恶仗、险仗、硬仗，以敢打善打硬仗、有勇有谋著称于世。在百战沙场的岁月里，他先后9次负伤，陈毅元帅曾用诗句形容过："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

敌机来袭，刘帅和夫人汪荣华负了伤，战士们来抢救，他平静地说："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刘帅身先士卒，勇打硬仗的事例很多，护法战争中，他所任旅参谋长的靖国军第九旅向成都方向进攻途中，被依附北洋军阀的旧川军阻于太和镇江边，该旅三营强渡时伤亡甚多，未能渡过去，营长望江而哭被撤职，刘伯承改任该营营长后，立即整顿部队，严声喝令："附北军队是帝制余孽。我将士当奋勇出击，冲过江去，不能怕死。后退者处以军法！"说完，亲乘第一艘船，冒着弹雨冲向彼岸，一举占领滩头。刘帅常说的名言："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是军人最可贵的品德"，"无角的绵羊受欺压，有蜇的黄蜂不可侮"，"在关键性的地方，要勇、要猛，才能战胜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等等，一直铭刻在广大官兵的心里，经久不衰。

二、仁厚慈爱，宽宏大度

带兵的将帅，历来强调爱兵的观点。但是，剥削阶级的军队讲"爱兵"是虚假的，是为了收买人心，他们实质上奉行的是"官贵兵贱"的哲学，采取强迫命令、欺骗宣传、惩办主义等手段驱使士兵充当进行战争的工具。唯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官兵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政治上一律平等，军官才能真正做到爱兵。刘帅作为我军的缔造者之一和重要领导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了无产阶级军事家关心部属、热爱士兵的美德。他无论对干部还是战士，都诚恳相待，和蔼可亲，体贴入微，与之同甘共苦，深为部属、士兵所拥护爱戴。他常说："带好兵的经验千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同甘共苦，以身作则"。1942 年，日寇对八路军 129 师师部实施"铁环合围"式的"扫荡"，他率部突围，夜行山间崎岖羊肠小道时，黑骡子跌下山沟，战士们看到年过半百、视力不好、腿部又受过伤的刘师长越走越吃力，就一再要求

他坐担架，他却说："大家都是来革命的，你们在地上走，让我坐担架，这怎么行呢！"当他问："口有点渴，带的黄瓜还有没有？"警卫员说："真糟糕，刚才我们把黄瓜吃掉了。"他说："这有啥子糟糕嘛！吃就吃了，大家都口渴"。透过这些"平凡的小事"，我们可以看到刘帅对士兵的慈爱。这种深厚的阶级情、战友情是无形的巨大力量，使士兵受到强烈感染，把部队牢牢凝集在一起。过去，军队里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勤务人员都叫做"伙夫"、"马夫"等等，是刘伯承、邓小平首先认为：在革命队伍中这样称呼不好，不尊重士兵。因此，他们率先在本部机关里改用"炊事员"、"饲养员"等称呼。刘邓身上真正体现着无产阶级军事家尊重士兵、爱护士兵的崇高品格。

刘帅在部队里不仅年龄长，而且资历深，地位高，功勋显赫，又有深厚的学问和高超的谋略智慧，被誉为"常胜将军"。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关心同志，爱护部属，谦虚谨慎，克己奉公，虚怀若谷，襟怀坦白，一生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争功，更不诿过。俗话说："将军肩上跑得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刘帅正是一位以党的事业为重，视野开阔，能以包藏宇宙、吞吐天地的胸怀度量待人接物，能见人之长、学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带兵元帅。与他长期并肩指挥作战的邓小平政委曾经说过："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做去。"刘邓首长之间这种互相敬重、同心协力的战斗友谊和工作关系，在部队一直传为佳话，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在刘帅手下担任过指挥员的秦基伟、李德生等老将军深切地回忆说：刘帅"确是一位仁厚的长者，严格的良师，为部属爱戴、令敌人丧胆的大军统帅"，"对敌人，他是威震敌营的常胜将军；对同志，他又是一位和蔼、慈祥的忠厚长者。"刘帅这种仁厚慈爱、宽宏大度的带兵风范，对部队具有很强的感召力，是使部队形成牢固的凝集力，转化为坚强的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号令严明，律以法纪

刘帅带兵，既仁厚慈爱、宽宏大度，又号令严明，律以法纪。他一贯要求各级指挥员要严格带兵，常常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只有打不得的官，没有打不得的兵，会带兵的带雄兵，不会带兵的带窝囊兵”。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身体力行。在作战中，刘帅深思断行，一旦定下决心，下达命令，必贯彻到底，绝不动摇，绝不迟疑。他的作战命令里通常最后都有：“后退者处以军法！”这类的话。他向来强调：“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军中无戏言”，“军令如山倒”。号令严明、军威严整是刘帅带兵的突出特点。

刘帅从严带兵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方法，就是认真、严格地贯彻执行军法、军纪、军规，以它们为准则，建立和完善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对部属实行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以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淮海决战前夕，刘伯承偕同陈毅、李达到第4纵队（4纵后整编为二野4兵团，我们14集团军前身是其一部分）参加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开始，他手持花名册一一点名，干部们见状十分惊奇诧异，不禁交头接耳，悄声议论。刘司令员严肃地说：“队列、点名是军队最基本的课题，连这样的课目也感到惊奇，说明我们头脑里一点没有正规化的观念。我们很快就要在中原放手大打，形势的发展对部队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稀稀拉拉、各自为政的游击习气再也不允许存在了。大兵团作战，更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今天首先从到会的团以上干部做起，带动部队的管理教育。”这一席正颜厉色的话对干部们教育很深，我们部队的许多老首长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刘帅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以法纪规范部队行动，从而带出了一支在极端艰难困苦情况下特别能战斗的部队，从中可以看到刘帅精湛的带兵艺术。

建国后，在我军实行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时期，刘帅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根据毛主席有关军队正规化的指示，在《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等论文里，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正规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他所强调的，“最要紧的就是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规律性，一定要从各方面正规生活秩序中去练习。”至今仍对部队正规化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刘帅在审查修改我军三个共同条令，即《纪律条令》、《内务条令》和《队列条令》时，极其严肃认真，亲自动手逐字逐句地推敲。他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条令作为一种军事法规，具有能够把全军指战员的行动集中统一起来，形成强大战斗力的特殊功能。离开了条令等法规制度的规范，部队就要失控，就会各行其是，成为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可言。特别是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没有严明的法规制度，就无法按统一号令，遂行作战任务。刘帅从严治军、以法带兵的风范，深刻体现了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军队职能决定了治军必须从严，必须律以法纪，这是建设精锐之师的必要条件。

四、善遣将领，恰用部队

优秀的将帅，都善于遣将调兵，培养人才。识别、考察、选拔、培养、使用军事人才，是将帅带兵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刘帅两任全军总参谋长，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方向）的主要军事指挥员，数次担任或兼任军校领导。在这些高级军事领导的实践活动中，他十分重视培养部属，善于用人，调兵遣将恰如其分，真正做到既明于知彼，也明于知已，因而常打胜仗。综观刘帅用人之道，一是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刘帅有知才之明，在实践中考察部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和水平如何，道德品质、思想作风是否适应部队建设的需要，识别他们才力的勇怯、艺能的精粗，全面衡量其德才，知

人善任。他坚决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搞亲疏贵贱。二是充分发挥人才群体的整体效益。刘帅有尊才之德，善于把各种各样的人才合理地搭配起来，根据他们的性格、才能、特长、爱好等等，量才用人，扬其长抑其短，以长克短，发挥人才群体的整体效益。三是用人不疑，选人不拘一格。刘帅有扶才之行，为部属的成长搭桥铺路，祛邪扶正。他以高度的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不拘一格地提携新秀，对部属赦免小过，不掩大德，允许犯有过失的下级改正错误。对部将既任之则信之，放手让他们在职权范围内自主自决地指挥，充分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作战时，刘帅一方面对部属进行全面具体的指导，另一方面不猜疑，不从中掣肘，尽量调动部属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创造性。在刘帅指挥的许多著名战役战斗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他的高超谋略和英雄胆魄，又可以看到一大批各级指挥员智勇双全的杰出表现。

带兵者才能的高低，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对部队的使用是否恰当上，遣将与用兵实质上是一致的。刘帅使用部队达到了至善的境地，一是对部队了如指掌，运用自如。从指挥员的素质到士兵的技能，从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作风纪律到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哪些部队善攻，哪些部队能守；哪些部队攻城有术，哪些部队野战有招等等，都胸中有数。作战时，根据各个部队的特点，赋予合适的任务，以致各尽其长，使用得当。二是训用一致，重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他反复强调：军队教育训练“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不教而战是为弃之”，一贯提倡“技术与勇敢相结合”，“以战教战”，把养兵、带兵、用兵、练兵紧密结合起来，言传身教，亲自动手。解放战争初期，他发动部队利用战役间隙抓紧练兵，并亲自主持练兵会议，亲自带领旅以上干部打靶，为部队作出榜样，极大地激发了全体官兵的练兵热情。三是勤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部队素质。我读《刘伯承军事文选》有许多深刻的感受，其中一条就是刘帅勤于总结作战和部队建设经验。他对南昌起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著名战役都

进行了认真总结，从经验和教训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用以指导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许多老同志在回忆中都谈到听了刘帅的总结讲话，收获很大，对自己是个很好的提高。总结，是不断提高部队素质的一个好方法。刘帅不断总结经验，提高部队素质的风范，值得我们努力学习。

五、胆大包天，心细如发

刘帅的带兵作风，既胆大包天、敢作敢为、热情似火，又心细如发、日理军机、极端慎密，二者高度统一。他明确指出："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的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象'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并经常强调，做一个称职的指挥员、一个有勇有谋的参谋，既要胆大包天，又要心细如发，做不到这两点，就不能战胜敌人，尤其对付力量比我强大之敌，更是如此。刘帅在谈到培养与识别干部时一再指出，调选那些胆大包天、心细如发，有勇有谋、德才兼备的干部到领导位置上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胆大包天，是带兵者的基本素质之一。一个优秀的带兵者，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英雄胆魄，敢于冒险，勇闯难关，善于把所属部队带成一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精锐之师。那种怯懦胆小、畏首畏尾的指挥官，是不可能带出好部队的。刘帅一生带领部队打了几百次重要的战役战斗，在枪林弹雨、千难万险中，他胆大包天，刚胆精明，出奇制胜，无不令敌丧胆。淮海战役中，刘陈邓首长为靠近我主力兵团并且便于观察敌情，把总前委指挥部设在离敌人很近的小李庄，头上有敌机盘旋，总前委安然不动，坚毅地指挥几十万大军夺取了战役的胜利。

心细如发，也是带兵者的基本素质之一。带兵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刘帅常说，胆大要建立在心细的基础上；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他坚持反对那种粗枝大叶、马马虎虎的作风，十分严肃

地批评那些用士兵的勇敢来代替和弥补自己指挥无能和意气用事的人。每次作战，刘帅在定下决心的前前后后，都要周密细致地下一番苦功夫。定下决心之前，他身体力行，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彻底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行”，为定下决心打好基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是刘帅的一句至理名言。定下决心之后，他精心部署，过细检查。他指出：“官僚主义就是只有部署，没有检查。”刘帅的精细周密，处处可见，事事如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途中，行至淮河岸边，河面船只已被敌人拉走或烧毁，好不容易在芦苇中找到几只隐藏的小船，但对千军万马渡河无济于事。刘司令员为使部队能够徒涉渡河，亲自登上小船，手执竹竿，一下又一下细心地勘测河水深度，从面保证部队在敌人追到之前迅速渡过了淮河。诸如此类“心细如发”的事迹数不胜数。刘帅这种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耐心细致的工作精神，深刻地教育和影响着部队。刘帅对待指导部队行动的军事文件、军事文章也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对每一个军事术语的使用都要反复思索、仔细推敲。他常说：“什么文章也没有军事文章具有美学价值，因为每一个字都关系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不能轻易下笔，笔重有千钧啊！”这些警句对于那种不认真，不严谨，写作草率，讲话随便的带兵作风是极好的教育。

刘帅是带兵治军的行家里手，正所谓“治众如治寡”、“统百万之夫如一人”。他那富有特色的带兵艺术和风范，是我军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后一代人应以刘帅为榜样，学习他的带兵风范，继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大力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促进部队全面建设。

高风亮节　长范人间

薛洪兴　上校

一代名帅刘伯承，不但以其辉煌的军事工作业绩，杰出的军事理论，卓越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丰富的办校经验，赢得了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的非凡称号而彪炳史册；而且以其高尚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称号而深受人们的敬仰和爱戴。深入地宣传刘伯承在品德和作风方面的感人事迹，发掘它的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促进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革命斗志百折不挠，革命信念无比坚定

刘伯承一生奋战，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功勋卓著；全国解放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长达70余年的斗争历程中，他遭受过无数的挫折、失败乃至磨难，但他从不屈服和气馁；始终坚定不移地朝着革命的目标前进。朱德曾称赞他“尽瘁革命，奋进不息”。

他的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比坚定的信念。而他这种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又是在刻苦的学习和不断的实践中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才形成的。他从旧军队转到共产党的队伍，用了三年的时间来进行学习和考察。学习中不但钻研马克思主义，还对照阅读国民党三民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其他书籍，从中加以分析比较。考察不但作四川地方的社会调查，而且跟随共产党人吴玉章出川，广泛地了解共

产党的活动和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正是这一系列深入的学习、研究和实际考察活动，开阔了他的眼界，确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1926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因为他的革命信念来之不易，具有坚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所以更显得牢固和坚定，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后来，无论是长征前夕被错误降职，由红军总参谋长改任军团参谋长；或是反"扫荡"中陷入日军重围；还是挺进大别山，遇到了一连串难以想象的困难，他都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而是从容应对，勇往直前，一一胜利地渡过了难关。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遭到错误的批判后，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而是继续以革命事业为重，根据自己丰富的作战训练经验，毫无保留地就边海设防、战略问题、训练原则、后勤保障等，向中央军委积极地提出建议。真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鞠躬尽瘁，万死不辞"。①

二、始终保持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自觉地置身于党的监督之下

刘伯承是以治军严格著称的，他把严格的纪律列为部队战斗力的要素之一。指出："军队没有严格的纪律，是不可能打胜仗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慈不掌兵"。可他更强调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常借用古话说："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有令不行"。按照这样的要求，他时时、处处注意严格遵守党和军队的制度和纪律，从不稍有懈怠。1937年129师举行抗日誓师大会，适逢大雨，参谋给他披上雨衣，他一把扯下雨衣，并批评说："为将者必须'夏不张盖，冬不衣裘'，才能服众。"有次夜间他下令不准部队进村，为的是怕惊扰村民。警卫员想带他单独进村住宿，他坚决加以阻止，说："我自己规定的纪律怎么能随便违犯呢？那以后我还怎么去管别人呢？"在他和邓小平的带动和教育下，129师直至后来的第二野战军，终于锤炼成为一支著名的

钢铁大军，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刘伯承把执行组织纪律与接受党的监督紧密地联系起来。他认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队的高级干部来实现的。他曾多次讲到："我在入党时的誓词是'绝对服从党'，此后即经常自勉：我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尽无限的忠诚，并以身作则，教育所带军队完全接受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而成为光荣的党的工具"。②他反复地以张国焘的反党行为作反面典型，告诫军队高级干部"必须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否则，"不管你是好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大，如果昏头昏脑地骄横起来，走上军阀主义道路，那就是非常危险的"。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有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并以此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致评价他"组织纪律性很强"，为高级干部遵守组织纪律作出了表率。

三、真诚地热爱人民群众，发挥人民战争的固有威力

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强大敌人的基本方针，刘伯承把它说成是发挥"人民战争的本质"。在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刘伯承不单是从结合民众力量，依靠民众帮助打胜仗来考虑的，更主要的是从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着眼的。他认为，在军队和民众的关系中，军队居于主导的地位，军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为转移的。这也是发扬人民战争固有威力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军队作战首先要考虑保护人民群众，"无论任何部队都有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必须将敌人的到来与退走情况及动向，适时通知民众，并指示以安全地带"。他还曾深刻地指出："爱人民大众要爱到肯牺牲我们自

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们的程度”。④推而广之，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对党的群众路线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指出：我们常说要联系群众，但群众是否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党的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

军队真诚地爱护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不惜代价地支持和帮助军队。刘伯承认为，军队跟觉悟了的群众结合起来，就强大了不知多少倍，就将无敌于天下。战争中，他常常指挥部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全力相助。如著名的上党战役和淮海战役，兵力对比上人民解放军都是处于劣势，但由于有根据地强大的民众力量作后盾，加上其他因素，胜负的天平就很快倾斜到了解放军一边。他曾通俗地说：“没有老百姓给吃给穿给人，军队就不能打仗”。为此，他一再告诫指战员们：千万不能忘了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每个成员都是人民的“子弟兵”。

四、与士兵打成一片，团结一致去夺取胜利

二野的指战员爱用“士兵兼统帅”来称颂他们敬爱的刘伯承司令员。刘伯承确实当之无愧。一方面，他是从士兵逐步成长为一位杰出的统帅的；另一方面，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士兵的本色。他对士兵的作用有深刻的理解，对士兵倾注了无限的爱。他认为战争是敌对双方斗智斗力的行动，尽管斗法关系胜利的成份很大，但最终还是要靠士兵的拚杀，“消灭敌人是要拚刺杀，用枪弹，用炸药，把敌人打死”。他心里总装着士兵，无微不至地爱护和关怀士兵，这是阶级感情的流露，也是为了保护最根本的战斗力。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一旦有缴获或配给，他首先想到的是士兵。一次部属给他送来一些奶粉和一条虎皮褥子，他转手就让送给医院的伤病员。有次他派骑兵排帮助医院的伤员

转移，特意叮嘱排长要在医院驻地一里外把马停下来，以免马蹄声惊扰了伤员。他的乘马，常常驮着伤号或士兵们的枪支。他亲自教警卫员们写字、学文化。战士们把他看作既是严师，又是慈父。

他爱兵，更深刻的是体现在练兵上。他常说，杀人三千，自伤八百，打仗不可能没有伤亡。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的职责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士兵的伤亡。除了讲究战术外，练好兵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他批评不重视练兵的指挥员“不教而诛是谓弃之”，他责备那种只知硬打硬拚，不知爱惜士兵生命的行为：“二十年才能成长一个人，要爱惜人力！”

他爱兵，十分注意尊重士兵，尊重士兵的创造精神。在他统帅的部队里，军事民主开展得非常普遍、深入。他常在一些战术报告里总结和表扬战士们的好主意、好办法。淮海战役中，交通壕困敌和飞雷炸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首先是由战士们在作战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刘伯承及时加以总结、提高，他把前者归结为“地平线下前进”，把后者称为“土飞机”。他常感慨地说：战士真好。带这样的战士不打胜仗的话，真是惭愧！

统帅爱士兵，士兵爱统帅。战争年代，士兵们都说，跟着刘司令员打仗，什么敌人都不怕！每当战役战斗的紧急关头，战士们只要看到刘伯承的身影或听到他的指示、命令，就会奋不顾身地去冲锋陷阵。1946 年 9 月定陶战役时，敌军主阵地大杨湖久攻不下。刘伯承亲临第 6 纵队指挥。战士们群情振奋，高呼着“坚决拿下大杨湖，让刘司令员放心”的口号，与敌拼杀，顺利地解决了战斗。

“士兵兼统帅”，最贴切不过地表明了刘伯承是一位崛起于士兵之中，又永远不脱离士兵行列的统帅。

五、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之一，刘伯承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从参加革命起，他就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他几十年如一日，一贯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创造出了不朽的业绩。他博览群书，广纳古今中外优秀的军事精华。这大多是在繁杂、艰险的战斗环境中进行的，而他仅凭一只残存的左眼，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为了掌握俄语，他付出了惊人的努力。留学苏联时，他不顾自己年龄大、基础差，除了认真上好课外，还利用课余时间补习。节假日，每天的早、晚，差不多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为怕影响别人，他常常到操场或走廊上去学。就这样，硬是闯过了俄语关。五十年代初在军事学院，出于组织领导翻译教材的需要，他又进一步学俄语，每天清晨必读，连上厕所的工夫也不放过。陈毅得知后很感动，主动送给他一台钢丝录音机。

他的工作精神更是让人钦佩。战争时期，他依着老乡的土炕或缸盖，借着昏黄的油灯光，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军事文书和理论文章，翻译了苏军的大量条令、条例和有关材料，用来指导部队的作战和训练。有时其他领导人或记者来访，他都舍不得放下笔杆，说："请坐，我的功课还没完，要赶呢"。全国解放后，他的这种拚命精神有增无减。他在军事学院倡导"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而且带头身体力行。除了白天勤奋工作外，他还给自己加了两个小时的晚间工作时间，而且常常超额。他工作往往全神贯注，达到忘我的地步。有次棉鞋让短路的电线烧着，他全然不觉，是警卫员发现后把他从屋里拽出来的。邓小平曾说他对时间太"势利"了，指出"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⑤这是对他艰苦奋斗精神的最好褒奖。

六、任人唯贤，利党利国

在用人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两种不同的路线。刘伯承坚持的是一条“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他常说，我们讲的是阶级关系，干部战士统统是一个阶级，不论什么亲戚朋友，舅子老婊。他还认为，在战争中，干部特别是主官的使用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作战的成败，关系到人员伤亡的多寡，关系到部队的生存发展，丝毫不能草率从事。他以军事家的特殊视角，把对主要干部的了解列入“知己”的范畴。他指出，只有熟知所属部队特别是主要干部的素养和脾性，指挥上才能得心应手，谁个能攻，谁个善守，到时候拿上去就行了。了解得如此深入，使用上自然就贤者得位。从 129 师到二野，中高级指挥员都服膺他的安排和分配，认为是各得其所、各尽其能。

建国后，根据和平建设新形势的需要，他用人的视野更广阔，执行“任人唯贤”的原则更坚决。他常说，用人不当，特别是高级干部使用不当，小则误事，大则误党误国。1950 年，中央军委委派他创办军事学院。所需干部，他只提原则要求，全部通过总政治部统一调配。他提出两个口号：一是“组织起来”，二是“团结会师”。在教员队伍中，原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人员占多数，他又欣喜地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这‘两块银’镶在一起了。”人们为此评论他的用人特点是：“圈子大，班子精，骨干强，能者师”。

他深恶痛绝任人唯亲的用人办法，常严斥张国焘和高岗等的恶劣事例，教人引以为戒。他在用人问题上堪称是以身作则的楷模。他不但从不给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以任何额外的照顾，反而经常教育和要求他们正确对待职务、待遇等问题，要经得起名利的考验。建国初，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一位侄子想通过他找一份工作。他对侄子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封建社会

的官僚，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现在国家安排工作得凭条件，你条件不具备，还是回家好好从事生产。他三弟建国前曾为我党我军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有关部门想给他安排一个区政协委员的职务。他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说四川还有那么多民主人士没有得到安排，怎么能先安排我的弟弟呢？一位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淳朴踏实，机敏勤快，深得他的喜爱。这位警卫员被安排复员时想请他说说情。他说，组织上决定的事我个人不能去干涉。现在国家搞经济建设，正是用人之际，你还年轻，到工厂去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警卫员被他说服了，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在他身边任过随从参谋、秘书的一共有好几位，这些人当年都是经再三选拔才到他身边工作的，是同类人员中的佼佼者。到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职务、待遇比相同资历的人要低得多。如今，这些老同志谈起各自的升迁沉浮，不免有些感慨，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刘帅在用人问题上真是一心为公，太值得后人学习了！

七、清廉如水，一尘不染

廉洁奉公，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刘伯承真正做到了清廉如水，一尘不染。入党以前，他在旧军队里生活了十几年，官至“路”指挥。论享受，他经过的也不算少。可贵的是在他入党以后，坚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只讲奉献，不讲索取。1942 年敌后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他跟机关人员一起，经常啃一种红高粱或黑玉米面加野菜、树叶和在一起蒸成的菜窝窝。当时他已年过半百，过度劳累，加上创伤复发，身体日见消瘦。部属们怕这样长期下去，会把他拖垮，劝他吃点好的，增加点营养。他断然加以拒绝。他始终坚持跟大家共患难，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意志。

进城后，条件变了，他的这种作风一直没有变。他任军事学

院院长兼政委期间，许多事不用他说就有人办。他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让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出现有违制度的事情。当时实行供给制，他按月查问伙食帐，看有没有超支。他交代炊事员不要买刚上市的时令菜，要多买普通菜，以节省开支。他的座车，是一辆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制旧式轿车，管理部门按规定要给他换一辆苏制新式轿车，西南方面也买了一辆新车送来，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国家新建，要用钱、用车的地方很多，我有辆车坐就可以了，不必论等级讲排场。他的车，从不让家属子女乘坐。有一天南京下大雪，连自行车也没法骑。司机开车把他爱人从工作单位接了回来。事后被他好一顿批评。孩子从外地学校回来休假，他一律不让小车接送。他说，专车就是要“专”，这车是供我办公用的，不是供我办私用的。他的住房，是原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别墅，洋式结构，不适合住家。营房部门多次提出改建，他不同意，说没有必要白化这个钱。因他家人口多，营房部门乘他外出的机会在楼后加盖了两间平房。他回来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把这两间房安排给秘书和司机住。

实行薪金制后，国家对高级领导干部发放津帖，他不要。有关部门向他解释说：这是按人头发的，你子女多，负担重，更应该照顾。他还是不要，说国家大规模建设正需要钱，我们能省一点是一点。我的生活虽不算富裕，但比普通老百姓强多了。1957年中央军委任命他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学院按规定给他盖了新宿舍楼，他看了后觉得过于豪华，没有住，把家搬到市里一处旧房里去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座被人称作“帅园”的小楼，实在只能算是一幢普通的建筑，但“帅园无帅”，却作为一段佳话流传了下来。

在他的心里，总是装着国家和人民，所以，他对廉洁就有了高度的自觉性。

八、帅门家风，芳泽流长

刘伯承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很欣赏我国历史上许多家教有方的杰出人物和那些影响深广的治家格言，主张取其精华为现实社会服务。在他的孩子小的时候，他要求他们抄写《颜氏家训》等，领会其中崇尚勤俭、鄙弃惰奢的积极思想。他多次向人推荐曾国藩的家书，说别看曾氏政治上反动至极，但治家别具眼光，主张不为子孙治恒产，而着重培养他们安身立命的品德和本领，在实践上也颇有成效，子孙也多有出息。

对无产阶级的家教，他看得更高，想得更深。进城初期，他就对夫人汪荣华说，战争年代，我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只要一打仗，就把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我们许多老干部的孩子，都是吃乡亲们的红薯干和小米粥长大的。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贫穷，人民的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千万不要因此而让孩子们忘本。他常对子女们说："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廉洁的品德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只有工作上、生活上廉洁奉公，政治上才能无私无畏。"

他对子女教育严，要求更严。他认为有教不严，等于无教。五十年代初实行供给制时，规定只给他本人供应特优大米和精白面粉。他坚决不准孩子们吃。有次炊事员悄悄塞给孩子几个白馒头，他发现了立即加以批评和制止。有人觉得他太过份。他说，天下哪有不爱自己子女的父母？我是要他们从小就懂得遵守制度，没有特殊化的观念，长大了他们会受益无穷。他几个孩子的衣服，一向是老大穿了老二穿，缝缝补补给老三。有时孩子们不乐意穿旧衣服，向妈妈叫屈。汪荣华说，看看你们爸爸，在家总是那件军便服，袖口补了又补，领口都洗得发白了。叫他换件新的，他一直不肯。经妈妈一说，孩子们便不再吭声了。在住房问题上，他

给孩子们立了一条规矩：结婚以后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与本单位干部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他那位备受全家人宠爱的长孙，降生后也没有得到爷爷奶奶的额外照顾，而是跟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在妈妈单位的幼儿园长大，上的是一所普通小学，随后又考进西郊一所普通中学，口袋里揣着月票，脖子上挂着钥匙。

他最为关心的是孩子们学有所成，奋发向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总不忘检查和督促孩子们的思想修养和学习。一次，他看到教育部的一个通报，反映在校大学生中干部子女的学习成绩较差。他马上给正在上大学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干部子女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扭转某些落后干部子女的坏意识，才能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他常对子女们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他还谆谆告诫子女们："没有那个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那个官，即使当上了，也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伯承的心血并没有白费，他培育和倡导的革命家风正在不断发扬光大。他的六个子女，个个学业有成，人人奋发有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其中有的还是先进工作者或全国"三八红旗手"。他的夫人汪荣华，曾被评为北京市的"好家长"。

刘伯承在品德和作风方面的感人事迹和精辟论述，还有很多很多。在这里，我们只能选取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内容，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纪念和爱戴。仅仅这些，就足以反映他的高风亮节。"怀古钦英风"，让我们以刘帅为榜样，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去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注　释

①②⑥《刘伯承回忆录》（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版，第 9、第

3、第394页。

③《二野战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第145页。

④《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75页。

⑤《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2页。

“刘伯承诞辰 100 周年
军事理论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

研讨会学术组

1992 年 12 月 4 日是刘伯承元帅诞辰 100 周年。为缅怀刘帅的丰功伟绩，继承他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促进国防现代化建设，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于 12 月 3 日至 5 日在京联合主持召开了刘伯承军事理论研讨会。会议共入选论文 70 篇。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国防部长秦基伟，就刘帅执行中央军委战略方针的坚定性、创造性和刘帅军事理论的独特风格这两大主题，分别撰写了题为《受命中央千钧负　号令三军行如流》、《真理无华》长篇学术论文。李德生、陈锡联、陈再道、杜义德、向守志等二野老首长和刘帅直接领导过的老部队，以及在现今领导工作岗位上的许多负责同志，都纷纷向会议提供了学习刘帅军事理论和用以指导今后实践的文章。这次会议入选的论文，多出自我军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之手，所述内容基本上覆盖了刘帅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各个主要方面，充分展示了研究刘帅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

与会同志认为，刘伯承同志的一生是极其光辉的一生。他不愧为“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保卫新中国的领土完整、为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熠熠生辉的千秋业绩。他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崇高的优良品质，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光辉的楷模。他的军事理论，既博采古今中外兵家之长，又约之于马列主义军事学术、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风格

和特色。正如和他长期工作过的邓小平同志所赞誉的那样："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现将理论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份的。"与会同志认为，刘伯承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大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他所领导的、由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参加的战略区的军事实践活动，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伟大实践的组成部分，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他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创立的游击集团，曾是我军"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雏形；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所指挥的上党战役，被毛泽东誉为用革命的两手粉碎反革命的两手的得力行动；他所指挥的定陶战役和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之战，曾被毛泽东称赞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思想的典型战例。这方面的事实还有很多。二是他的许多重大创见和建议的提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参谋、咨询的作用。他在 1934 年 5 月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在 1937 年 9 月提出的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艰苦的民族革命大战"的基本见解和随后提出的"综合群力"的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向军委提出的许多战略性的、特别是关于战略决战的建议；在建国后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院校建设的提议和建议，都被党中央及时采纳，被毛泽东所吸取。三是他在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所总结出的军事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宝库。他写下了百万字的军事篇章，从各方面系统阐述了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其中军事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更是光彩夺目。四是刘帅谙熟古代兵法，并作了大量的

诠释；重视对国外军事学术的借鉴，校译了大量的外军学术著作。他广泛地汲取古今中外军事学术之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既贯彻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又增添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作为人类军事思想优秀成果的光辉。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军事辩证法思想

刘伯承作为一个大军事家，对战争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并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从刘帅的军事著作和战争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他早年寄希望于“取军事最后之胜利，而拯人民于水火”，坚持为人民而战的正义战争，反对军阀混战的非正义战争。这是刘帅走上军事生涯的基本出发点。二是着眼政治，运筹军事，认为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军事斗争从属并服务于政治斗争。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军事一刻也离不开政治。这是刘帅军事理论的根基。三是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没有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主张对敌展开“综合群力”的战争，即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一切力量，对敌展开全面的斗争，反对搞单纯的军事斗争。这是他开展军事斗争活动和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刘伯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他深刻领会和把握了军事理论的精髓——军事辩证法，并始终把军事辩证法思想贯穿于战争实践之中。其中，他特别注重以下几点：一是认为战争的“情况是辩证的”，因此，“必须由实际出发，就是考虑敌我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等一切不同的因素，以及地形、天候、季节、政治、经济等，而求得辩证的学术。”也就是说，战争情况是千差万别并且是发展变化的，要赢得战争，就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与战争客观实际高度一致起来。这是其军事辩证思想的基本观点，也

是对军事辩证法本质最深刻的揭示之一。二是运用军事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揭示了错综复杂的战争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对军事与政治、全局与局部、强与弱、虚与实、攻与防、游与击、集中与分散、存人与失地、内线与外线、五行要素、袭击与反袭击等矛盾运动中包含的辩证哲理进行了深刻地揭示,进而为军事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三是强调运用军事辩证法就要贯彻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防止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认为"无论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它们都是把军事科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把片面的相对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真理,不符合客观的全面的实际",完全背离了军事辩证法,因而没有不失败的。因此,学习运用军事辩证法,必须从我军具体实际出发来对待书本上的定论,不能一成不变。有经验的人,要把经验总结起来,上升到理论,就好比用一根钱串子把零散的钱串起来,这时你才能说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钱。刘帅这些精辟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既是其高超军事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灵魂,又是其军事理论的思想基础。

三、关于战略战术思想

刘伯承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理论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善于从全局来论兵用兵,强调在战略指导下来确定作战的总任务和总方针;强调必须从敌强我弱、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总形势和总条件去制定战略战术;强调必须着眼战略全局组织实施好每一个战役、战斗,为了全局的需要,既要"吃肉",也要"啃骨头"。二是他善于根据进攻和防御两种不同的基本作战类型,实施作战指导。在防御时,要以"敌进我进"为原则,进行积极防御。在进攻时,要以"分进合击为原则",以强大的突击集团对敌形成"钳形"攻势,实施坚决的合围和割裂。无论防御、进攻,都不能搞"牛抵角",都要在宽大

灵活的机动中趋利避害，创造战机，争取主动。三是他善于集中兵力，合理运用作战形式，促成强弱转换。强调我军在战略上应以弱胜强，在战役战斗中则应以强胜弱，要“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每战必集中优势兵力，确保作战重点。在作战形式上，他认为游击战、运动战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鸿沟，必须根据情况恰当调剂它们的份量，搞好多种作战形式的结合。四是他善造作战之势，使之“势险”“节短”。他指出“军队若没有险峻的布势，就不能发挥其威力。”“未经很好地布势就与敌人作战，就好象没有拿着武器同敌人战斗一样”。战役布势要力求“势险”“节短”，“因为‘险’，敌人就不能抵挡；因为‘短’，敌人就来不及躲避”。为达成战役布势的“势险”“节短”，要奇正活用，搞好作战运筹和部署，寻找敌人弱点，创造敌人弱点，突击敌人弱点。五是他善于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组织合同作战。他认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一切战术都要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他说“离开技术的战术就等于零”，“部队开不动，打不准，联不上，指挥不灵，就是抽筋（忽略了技术）的结果”。重视技术对战术的作用，就要随着技术的发展，重视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掌握合同作战的学术。

四、关于军事指挥艺术及谋略思想

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是其军事理论中的瑰宝，与其战争观、军事辩证法和战略战术思想融为一体。就其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来说，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指挥艺术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突出之点：一是强调指挥必须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他提出“五行术”，“研究情况要从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五行”以任务为首，以了解敌情为关键，敌情我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进行着矛盾的运动。指挥员指挥作战，必须掌

握“五行”，“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二是强调辩证指挥。他指出：“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物质是变动的，环境是迁移的，昨天的正确战术到今天不一定是正确的了”。一切都要因敌变化而取胜，能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三是强调指挥方式的多样性。“集中指挥用于打死猪，分割指挥用于打野猪”。对重要的作战方向要亲临一线指挥。对下级的指挥，着重在战法的指导、任务的明确，要充分发挥下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四是强调建立科学的指挥体制，特别是高效能的司令部。刘帅指出："司令部的作用、通信、侦察、训练、军政、卫生和后勤等部门人员应成为各该首长的有力助手。各该首长必须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把这些部门的人员健全起来……，反对轻视参谋工作的观点”。

刘伯承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他的谋略思想光辉灿烂。一是强调对敌斗争不但要斗力，也要斗智。他把智力的发挥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把以弱胜强作为军事谋略的出发点。他认为，人民战争的战略就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战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靠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断地窥破与创造敌之弱点”，扬我之长，击敌之短，战而胜之。可以说，刘伯承的用兵之道，就是以弱胜强之道。三是间谋略于军事行动之中。认为军事谋略的运用，应与作战行动和指挥艺术融为一体。部队一动，即应将奇谋妙计寓于其中。谋略一出，必杂于利害，或隐真示假，造成敌之不意和错觉，陷敌于被动；或造成险恶之势，陷敌于被动挨打的绝境；或调虎离山，或关门打狗；或“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或“围三缺一”，“暗设口袋”；或避实就虚，声之东而击之西；或“猫盘老鼠，盘软了再吃”；或杀“回马枪”，或施“拖刀计”；或“猛虎掏心”，“釜底抽薪”；或“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刘帅的谋略运用，就连他的对手也不能不叹服。四是不拘常法，出奇制胜。主张“兵者诡道，去留不

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因此，他的谋略运筹，常常一反常规，不拘一格。如在神头岭一地重叠设伏，接连取得两次伏击战胜利，就是生动一例。

五、关于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理论

刘伯承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刘帅在军队建设方面有着系统的理论阐述。他强调，必须建立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的建设，必须遵循党的建军路线，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必须坚持在军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设立政治委员、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制度；必须积极开展军队中的各项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视为我军的生命线。刘伯承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其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他就从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面对现代战争的特点，他提出了一系列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思想。刘帅认为，军队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生活秩序的建立，具体地说，就是制订并严格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象一部大机器一样，能有准确地运行规律，向共同的目标协调一致地行动。他特别强调，实现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关键一环，是要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的战略位置，并且“治军必先治校”，“治校要重人才”。为此，他向中央请缨，创办军事学院，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中级人才，并形成了一整套院校教育的思想理论体系。刘帅还认为，军队要打仗，就离不开后勤，特别是现代战争对后勤的依整性越来越大，所以后勤工作、后勤建设、特

别是后方基地的建设和补给问题，不是第二位的工作，而是战争中首先要考虑的工作。为此，他强调在搞好“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同时，还要健全后勤体制。他说：军队的后方犹如大树。战略后方如同树干，是不动的；战役后方犹如树枝，是半动的；战术后方犹如树叶，是全动的。只有把三者的关系解决好，才能使我军后勤这棵“大树”，“树干”粗壮，“枝”繁“叶”茂，保障军队的作战胜利。